

A color photograph of Zhou Enlai, a Chinese statesman, riding a brown horse. He is wearing a dark brown Mao suit and a matching cap. The background shows a misty, mountainous landscape under a blue sky. Overlaid on the bottom half of the image is large, stylized Chinese text in a golden-yellow color with a red outlin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two lines: the top line reads '偉大的軍事家' (Great Military Leader) and the bottom line reads '周恩來' (Zhou Enlai).

偉大的軍事家  
周恩來

## 后记

《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一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重点课题，陆军指挥学院承担了这一科研任务，该课题通过了“八五”规划办公室组织的鉴定，军委主席江泽民为本书作序，并题写了书名。

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周恩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军事功绩彪炳千秋，军事理论博大精深，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他生前虚怀若谷，从不愿宣传自己，加之有些资料尚未公开，至今没有全面系统反映其军事生涯及军事理论的专著。我们怀着对这位伟人的无限思念和崇高敬意，早就酝酿撰写一部书，弘扬周恩来在军事方面的光辉业绩和精深理论，进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国防现代化建设和未来军事斗争继续发挥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我们接受这一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陆军指挥学院党委、领导和机关对完成这一任务非常重视，原院长贾启玉少将、副院长陶自成少将负责领导完成这一课题。本书依据的资料，主要是中央档案馆、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新中国成立前周恩来的数千件文稿、电报、书信、讲话记录和大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常委会议记录，还有许多同周恩来有过直接接触的同志的回忆录、访问记录等。在调研、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总参谋部领导机关、军事科学院有关部门、解放军档案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童小鹏、张清化、张作文等同志对本书的撰写非常关心，从多方面热情支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力平、编审刘武生、副编审赵春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张家裕等同志也给予热情帮助和指导。由张家裕任主任，刘武生、赵春生、魏德松、杜宏奇、张健组成的鉴定委员会极为认真负责地审阅了书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课题成品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童小鹏同志不顾年迈体弱，审阅了书稿。在此，我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是陆军指挥学院课题组集体劳动的成果。写作过程是：康杰、孙启庆、金新果、赵力兵、宋学德分章写出第一稿，然后在康杰、赵力兵的协助下，由金新果进行修改统编，形成了送审稿，根据课题鉴定委员会的意见，由金新果对全书进行了补写、修改和统编，并核对了全部引文及注明出处，其中〔〕号内的字均为作者所加，（）中字为原文所有。赵力兵参加了统编和核对引文的部分工作。孙启庆对全书进行了文字斟酌。最后由陶自成审阅定稿。科研处处长黄培义参与了组织指导工作，孙君滇、汤立双也协助课题组做了许多工作。

在撰写过程中，我们还研读了许多专家学者的论著，吸取了其中一些研究成果，特此一并公开致谢。

由于我们的能力和知识有限，加之史料收集不足，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很多有关档案尚未公开，本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不足乃至错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指挥学院课题组  
1997年1月

(京)新登字 12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贾启玉主编.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7.3

ISBN7—80137—006—6(精)

ISBN7—80137—069—4(平)

.伟... .贾... .周恩来 军事思想 研究 .E0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12251号

责任编辑:夏征难 封面设计:姜沛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青尤桥/邮编:100091]

印刷者:北京市海淀区海丰印刷厂

发行者:军事科学出版社发行处

经销者:新华书店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8.25

字数:452千字

版次:1997年3月第1版

印次:1997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01—3500册(精装) 6501—14500册(平装)

书号:ISBN7—80137—006—6/K·001(精装)

ISBN7 80137—069 4/K·003(平装)

定价:36.00元(精装) 27.00元(平装)

(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本社发行处调换)

伟大的军事家  
周恩来

## 第一章 较早懂得武装斗争极端重要性的革命家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出生于江苏淮安。当时，中国社会在向半封建半殖民地演变中已经历了半个世纪。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大举入侵，可爱的祖国被肢解宰割，大好河山惨遭践踏蹂躏。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为了救国救民，许多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当时的中国，新与旧，进步与保守，革命与反革命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搏斗。周恩来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中，逐渐地成长起来了。

### 一、接受救国救民的启蒙教育

周恩来诞生于中国近代著名的“百日维新”失败的那一年。其诞生地淮安城，因是历代郡、州、路、府的治所所在地，即便到了晚清，仍设有大清帝国总漕部院和钞关等派出机关及府县机关。清朝的一些王族权贵曾在这里任过潜总，官府衙门星罗棋布。周恩来的祖父虽在官府任职，但只是一个小小的师爷而已。他的父亲和伯父们都很老实，只会本分做事，不善在官场中投机钻营，生活比较清苦。外祖父虽是知县，但在周恩来出生时，就已病人膏肓，气息奄奄，不久便去世了。这些都说明周氏家族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在当时官府林立、等级森严的淮安城里，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下层。此种地位就决定了这个家族“人的本能中有一种抵抗力”。这种抵抗力一旦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就会加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周恩来后来曾讲过：“中国有句俗语：‘逼上梁山’。……我们都是‘逼上梁山’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于外来的压迫和环境造成的。但他所以能产生革命性，是由于人的本能中有一种抵抗力，不愿受外来压迫。”可见，这种本能的抵抗力，对周恩来以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着根深蒂固的制约作用。

周恩来“五岁从母教”。其嗣母陈氏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妇女，熟悉历史和诗文，尤擅长讲故事，常使幼年周恩来“辄绕膝不去，终日听之不倦”。淮安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军事重镇，兵家必争之地。淮安人民有着光荣而悠久的爱国传统和反抗压迫与反抗侵略的传统，历史上从秦汉经隋唐到明清，涌现出大批爱国志士和著名将领，如一代名将淮阴侯韩信、抗金女英雄梁红玉、抗御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英烈关天培等等。这些都成为陈氏对周恩来进行启蒙教育的材料。她常给周恩来讲韩信如何破釜沉舟，决战该下。创立辉煌战绩的动人故事；讲梁红玉、关天培等爱国英雄们如何抗击外来侵略，宁死不屈的感人故事；讲军事斗争中机智和勇敢的故事。这一切都大大激发了周恩来强烈的求知欲，使他从小就对反抗压迫和侵略，对战争及军事的知识、故事抱有浓厚的兴趣。后来陈氏又引导8岁的周恩来阅读小说，先后读了《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一些书籍。这些书中英雄豪杰们的反抗精神、无畏斗志、谋略胆识、聪明机智，给了周恩来以难忘的印象；对周恩来产生了长期和潜移默化的影响。著名英籍作家韩素音就认为，周恩来尽管“成为一位革命家，致力于铲除过去，但是恰恰是过去，是中国历史上英雄豪杰们的胆略和机谋激励并指导了他的行动。”

周恩来的表舅龚荫荪，是个革新派人物，信奉孙中山，结识同盟会员，赞助革命，常向周恩来介绍新思想和时事政治知识。周恩来曾把他称作自己政治上的启蒙老师。龚家不仅收藏有大量中国古代书籍，而且还有不少宣传

近代中国历史和西方科学文明的书刊。周恩来在龚氏家塾里读书期间，渐渐地了解到，帝国主义强盗用鸦片和大炮轰开古老中国的大门后，强迫中国订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占领中国领土，控制中国主权，进行经济压迫和文比侵略，展示出帝国主义“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图画。”它深深地刺痛了周恩来的心灵，使周恩来本能中潜在的抵抗力，及对历史上反抗压迫和侵略的英雄的崇敬，逐渐上升成为对帝国主义列强的痛恨和对民族前途命运的担忧。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像一颗种子深深地埋进了周恩来的心里，并随着他的成长与日俱增，进而长期地发挥着主导作用。

1910年春天，12岁的周恩来告别淮安，随回家探亲的三堂伯周贻谦到东北读书求知。这是周恩来思想和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后来说：“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刚到东北时，周恩来先入铁岭银岗书院读书半年。其间，由于他聪明好学，很快成为优秀学生。但他兴趣广泛，不满足于学校课程，常常到城外郊游，攀登龙首山，以扩大视野。在苏北平原长大的周恩来第一次登上山巅，不仅欣赏了那壮观的景色，而且看到了山上那块“中俄战迹”的石碑。这石碑告诉少年周恩来，东北是个战火连绵、民族灾难特别深重的地方。10年前、八国联军侵略中国，15万俄国军队杀过边境，攻占了东北。战争结束后，仍然拒不撤兵。5年前，后起的日本军国主义又以东北为战场，同俄国进行了为时1年零7个月的争夺势力范围的罪恶战争。日俄双方在几次大的战役中，厮杀争逐，这龙首山就是一个主要战场，就在1910年，日本军国主义又正式吞并了邻近朝鲜。直接威胁和窥伺东北。不难想象，这些罪恶的战争史实和战场遗迹，会给少年周恩来以多么强烈的震撼。他在震撼中觉悟，在震撼中发奋，决心探索和追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日本创价大学教授山口和子认为：“负笈铁岭时期，对日后周恩来先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等的形成，有一定影响。”“可以说周恩来的革命家的生涯是从铁岭开始的。”1962年，周恩来重游龙首山时深情他说：“铁岭是我深深怀念的地方，是我的第二故乡。”

1910年秋天，大伯父周贻赓把周恩来接到奉天府（今辽宁沈阳市），插入第六两等小学堂高等丁班读书。在学校里，老师经常向学生讲述时局的危急，激励同学们的爱国情感。暑假期间，周恩来到本班同学何履楨家做客。何家住在沈阳南郊的魏家楼子，这是当年日俄战争的又一个战场。村子后山上有沙俄立的碑文，东头山上育日本军国主义建的纪念塔。当年日俄两军在这里激烈争夺，血洗村庄，而清政府则无耻地宣布“中立”，任帝国主义强盗蹂躏国土。何履楨的祖父何殿甲是这场不义战争的见证人。为了教育后人，他带着周恩来、何履楨、何天章三人，去参观旧日的战场，眼含泪水诉说在那场战争中，战败的俄军血洗了魏家楼子，仅他们何家就死了4人，重伤4人。老人悲愤地书写了《登东山歌》，曰：“登彼龙山兮山巅，望彼河水兮潺潺。忆甲辰年兮神往，想日俄战兮心酸。吾已生于斯兮长于斯，恨不能翱翔兮五湖烟。今吾老兮有何志愿？图自强兮在尔少年！”从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了解和认识中，周恩来深感中华民族危机深重，前途堪忧，要觉醒，要救国，要斗争。他踏着弹痕犹存的战场，满怀悲愤地唱起了当时流行的谴责日俄战争的歌曲，大声疾呼：“俄败何喜，日胜何欣！吾党何日醒？”

周恩来再也平静不下来了，晚上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睡，起身仿杜甫

《春望》，写下了一首《村望》，诗曰：“国破山河在，村残草木深。感时勿落泪，誓叫寇惊心。烽火连岁月，捷书抵万金。白头休志短，患除贺更新。”表达了周恩来救国的理想和抱负。有一次他听到何殿甲老先生颂读陆游的《示儿》，感触很深，便模仿《示儿》原韵写了一首诗：“战火洗劫万室空，吾济争见九州同。华师尽扫列强日，捷书飞传告鳌翁。”何殿甲字“鳌峰”，故诗中说“告鳌翁”，老先生对周恩来救国大志十分欣慰，并出了一个上联：“勿当列强之奴仆”，要周恩来作对子，周恩来略想即对：“誓做中华之主人。”何殿甲大加赞赏。

魏家楼之行，使周恩来不仅了解了许多关于战争的史实和知识，而且大大激发了救国救民的热情。也许他那“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愿就发轫于此吧！从那以后，周恩来时刻关心国事，养成了坚持读报的习惯，及时分析时势和战局。他坚持锻炼身体。在东北寒冷的天气里，跑步、踢球、做操，这对他以后艰难困苦的戎马生涯有很大好处。1964年8月2日，周恩来在同亲属的谈话中回忆说：“到东北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是把身体锻炼好了。在上小学时，无论冬天、夏天都要做室外体育锻炼，把文弱的身体锻炼强腔了。再一个好处是吃高粱米，生活习惯改变了，长了骨骼，锻炼了肠胃，使身体能适应以后的战争年代和繁忙的丁作。”

1913年2月，周恩来随大伯父一起迁往天津。同年8月，周恩来考入南开学校，这是他求学的重要时期。当时他和进步的同学们非常关心时局，经常研究政治形势和战争局势。1914年，周恩来和一些同学发起成立了“敬业乐群会”，并专门提议在会内组成了“军事研究团”。他还发起了“国防演说会”，请人作“军界一炮台一陆路”的专题报告，周恩来以超乎于一般同学的政治洞察力和锐利的军事眼光，常常在会刊、校刊上发表文章，或在“国防演说会”上发表演讲，表达自己对时势和战局的看法，抒发救国和抗争的悲壮激情。1914年秋天，北洋军阀各派展开混战，中原上空战云密布。当时，“敬业乐群会”的会刊《敬业》以“春日偶成”为题，发表了20多首诗歌。在众多描写鸟语花香、春光明媚的诗句中，惟有周恩来从“极目青郊外”中，看到祖国上空“烟霾布正浓”的黑暗景况。他痛恨军阀之间的不义之战，抨击军阀们制造“中原方逐鹿”的混战局面，是犯下了投降卖国的严重罪行，表达了自己对黑暗时政的忧愤心情和“博浪踵相踪”的矢志救国的决心。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北洋军阀各派势力积极扩充军队，抢占地盘，准备内战，叫嚣用武力统一中国。安徽省省长甚至挪用教育经费做军饷，竟使“全省可以无学校”。对此，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军阀官僚们此次军事行动，名为统一中国，实则“仅知固其势，保其位，焉有所谓国家思想哉！”他痛斥军阀“辛亥光复，于今五载，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反手为云，覆手为雨，暮四朝三，愚鼓黔首……使居世界四分之一之人民，蒙不洁之耻”。其矛头直指军阀统治者。1916年6月，张勋勾结北方军阀，订立北洋七省军事攻守同盟，妄图复辟帝制，辫子军一时耀武扬威，周恩来愤怒无比，先是写了“茫茫大陆起风云，举国昏沉岂足云”的诗歌，从军阀重开战的风云突变中，明确指出由反动军阀造成的“举国昏沉”是不足道的。他严厉抨击黑暗时政，痛斥各地卖国军阀的种种丑行。同时，他又撰文强调，帝制穹民主共和是“新旧不并立，冰炭不同炉”。提出了要用革命的武力，消灭拥护帝制的复辟分子，保卫民主共和。他认为，封建军阀张勋之流虽有不少兵马，一时甚嚣尘上，不过像秋虫一样，是死亡前的绝望哀鸣罢了。由于周恩来能够

把军事观察与政治分析相结合，因而具有比一般人更为深刻的政治和军事洞察力。

周恩来在南开求学4年，随着国内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发展，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为探求救国之路，他认真考察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历程。在《中国现时之危机》这篇重要政论中，他总结了辛亥革命和历次起义、战斗失败的教训，指出中国资产阶级领导革命，虎头蛇尾，不能坚持到底。他说，“国中无何种事业，当其兴也，如火如荼，及其渐也，无声无臭。考其弊，莫不由于取敷衍手段、姑息手段以养成之。”他指出民国以来，有辛亥议和，癸丑革命，云南反袁起义等，都因同封建势力妥协而失败。“使辛亥一役，不以敷衍结果，直捣黄龙，剪除旧类，彼时政治可以一新，又何致有二次三次革命”，这正是辛亥革命教训之所在，能对辛亥革命做如此深刻的分析，不仅表现出周恩来在政治上的高超见识，也显示出他在军事上的才智。在南开学习的过程，也是周恩来吸取辛亥革命的教训，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追求救国真理的过程。然而，周恩来感到，要救国，要斗争，无论是政治上、军事上、科学上，现有的理论和知识都不够用。正确的救国之路在哪里？“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周恩来不惜“蹈海”，也要“破壁”，另觅新路，因而下决心东渡日本，寻找新的救国和斗争的真理。

## 二、暴力革命意识的萌芽

### 三、

周恩来在五四运动前后的革命活动，客观上起到了为他以后从事武装斗争做准备的作用。这种准备集中到一点，就是周恩来经过激烈的革命行动，“认识了反动政府的狰狞面目，认识了爱国自由和民主权力决不是不经过斗争和流血，就能轻易得到的。”应该用“铲除”和“推倒”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一种坚定而又明确的暴力革命意识的萌芽产生了。这一萌芽在后来的旅欧期间，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浇灌，终于生长成革命武装斗争的幼苗。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在战争爆发以前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为了准备战争的，例如五四运动（一九一九年）至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那一时期。”

1917年秋天，周恩来东渡日本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其间，他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中，认清了日本侵略中国，推行强权政治的反动性；从中国留学生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斗争中，看透了封建军阀出卖祖国的可耻行径；从日本人民掀起的声势浩大的“米粮暴动”中，深深感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和反动统治阶级的虚弱，认识到：“日本的米骚风潮，朝鲜的独立运动，这都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动，在东亚历史上增加些国民自觉的事绩。”这一切都为年轻的周恩来接受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思想，起了最初的铺垫作用。

周恩来到日本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时期，很多书店都有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进步书刊。周恩来以极大的热情，阅读了《震动全球的十日》、《贫乏物语》、《社会主义神髓》、《我的社会主义观》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他学习非常刻苦，思想也



逐步发生深刻的变化。从周恩来的旅日日记中可以看出其思想变化的轨迹。开始，他曾认为，中国之所以衰败、保守，其原由在于政权“全在几个武人手里拿着……很不容〔易〕把这班相传不绝的‘北洋系’、‘士官系’推翻。有这一想法，于是‘军国主义’的念头非常坚固。”但是周恩来很快从日本现实中认识到，军国主义一是“有强权无公理”，二是“扩张领土”，“我从前所想的‘军国’……可以救中国的，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那么，什么主义才能救中国呢？周恩来仍觉茫然。

在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周恩来受到极大的启发。有一次，他在书店的一本刊物上看到一篇论述俄国党派的文章。回来后，凭记忆写下了 800 多字的摘要，其中讲到：“政府越压制的利〔厉〕害，国民想改革的心越发坚固。百折不磨的精神，一直等到去年的春天居然把俄罗斯皇帝的位子推翻了。”但革命党派别众多，“有的赞成君主立宪，有的赞成民主，还有赞成无政府的。”“国民的心里还没有一定的标准去走，这也是改革必须的阶段。”而社会民主党里有“一派是‘过激派’，他的主义是主张完全的民主，破除资产阶级的制度，实行用武力去解决一切党纲。他的行为大半与社会革命党很接近，党魁就是现执政的赖宁（即列宁——作者注）。”凭追忆写摘要，说明这些内容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而这些内容又正好宣传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本质和特点。摘要后周恩来写下了自己的看法：“总起来说，俄国现在的各党派除了保皇党少数人外，大宗旨全不出于‘自由’、‘民本’两主义”，按现在情形说，俄国革命的宗旨“最合劳农两派入的心理，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都打破了。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这一时期艰难地求索过程，集中体现了周恩来从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时，就把焦点聚集在暴力革命的思想。他好像在“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暴力革命的思想犹如“一线阳光穿云出”。“真愈觉姣妍。”从而摆脱了茫然的心情，感到喜悦和振奋。

五四运动爆发的前夜，周恩来返回了天津，运动一开始，周恩来就天天到南开去参加斗争，组织学生演讲、罢课、示威游行。他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像匕首，像投枪，直刺反动势力的心脏。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周恩来提出了对中国必须进行“根本改造”的革命主张。他在一系列文章、演讲和发言中，多次阐述了这一主张，明确提出“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周恩来把这一段话定为“觉悟社”的纲领，表明周恩来已经明确认识到，中国改造的对象是军国主义、资产阶级等一切反动落后的东西，改造的方式是“铲除”。他在《黑暗势力》一文中大声疾呼，“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应当怎样防御啊？”“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依仗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藉的军阀，推倒安福派所请来的外力。”周恩来还在《讨安福派的办法》中指出，舆论固然重要，但“天天打电报，发宣言书，上请愿书，骂安福派”是骂不倒的。用什么办法呢，周恩来认为，要“罢工！罢市！不纳税！罢课！种种的举动，那才真足以致安福派的死命。”

周恩来深刻认识到上述思想符合历史新潮流应该成为中国人民在 20 世纪新潮流中都具备的一种很深的“觉悟”，从而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向“觉悟”道上走。尽管当时周恩来还不可能提出用武装斗争的手段改造中国，但

已萌发了暴力革命的思想，而且将之提高到改造中国的纲领、20世纪的新潮流、所有人都应具备的觉悟的高度。

在汹涌的五四运动浪潮冲击下，周恩来看到反动势力的本质是虚弱的，但官僚、军阀和帝国主义是三位一体，仍有不小的能量。他从工农大众在十月革命中显示的伟大力量中受到了深刻的启示，初步接受了群众创造历史这一根本观点，并且把发动和依靠群众，运用群众实力攻击反动势力，改造现存社会，作为组织斗争的一个指导思想，面对着排山倒海的黑暗势力，他认为，只要群策群力，众志成城，则目的终可达到。“我们所恃的是群众运动”，要把群众组织起来，全国一致，互作声援，“用全国的实力攻击他。”<sup>21</sup>群众的实力是无坚不摧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周恩来认真研究了“学生和社会上的真正地位”，主张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深入到群众之中去，运用两件武器，一是演讲，一是办报，向工人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在整个五四运动中，周恩来大力倡导，并以身示范于青年们，主动破除等级观念，努力接近劳动界一般苦同胞们，做了大量演讲和发动群众的工作，使学生运动有了强大的后援力量。

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周恩来迫切感到，不能停留在一般的群众组织阶段，要选择先进分子和骨干人物，这些人必须具有严格的纪律性，高昂的战斗意志，出众的智慧与才干，以便组成更加严密的领导团体，使之成为巩固持久的对敌“作战的‘大本营’”。周恩来创建并领导的“觉悟社”就是这样的组织。社员都是当时中国青年中的先进分子，他们以“革新”和“革心”为宗旨，思想上强调要适应“现代‘觉悟’的潮流”，组织上“取严格的主义”，规定须有社员三人以上的介绍，经全体社员讨论后才能吸收。内部生活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保持朝气蓬勃的战斗性。觉悟社被称为“天津小明星”，其存在时间虽不长，但它使周恩来明确了建立严密的革命组织的重要性，锻炼了组织才干。这为他以后开展革命斗争和军事工作，做了很好的准备。

五四运动充满惊涛骇浪，面对反动势力的打击和迫害，周恩来提醒大家：“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sup>(22)</sup>并时刻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他日以继夜地拼命工作，带头组织请愿，游行示威，遭到反动当局的毒打和逮捕。在狱中。他坚贞不屈，不怕威逼，拒绝利诱，机智灵活地组织大家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更为可贵的是，周恩来利用半年（1920年1月29日至7月17日）被反动政府羁押的时间，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他首先起草了“公共读书法”，组织被捕代表学习经济学、历史、法律等，同时还组织了政治、学术、社会问题讨论会。他不顾个人安危，经过精心备课，分六次给大家宣讲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在讲解“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又突出讲解了“阶级竞争史”，并深入分析了阶级斗争的经济基础，即“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在此基础上，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武器，结合自己的实践，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都进行了深刻的回顾、思考和总结。用他的话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sup>(23)</sup>，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sup>(24)</sup>。周恩来出狱后，决心到欧洲求学，因为他虽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到暴力革命的重要，们他是非常注重实际的.他要到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去学习考察，从实践中探求出一条真正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

### 三、初步确立武装斗争的思想

1920年11月，周恩来前往西欧，到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求学，进行社会考察，把马克思主义与各种社会思潮进行反复比较。通过深入的学习和思考。周恩来终于从思想上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决心走俄式革命的道路。但是，周恩来并没有停止追求，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暴力革命的一般规律出发，认真分析了俄国十月革命和西欧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深刻总结了从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教训。通过艰苦的探索，周恩来对中国革命道路和方式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他不仅一般地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而且深入地了解了革命的特点；不仅一般地主张贯彻暴力革命的原则，而且初步形成和确立了武装斗争的思想。

（一）中国“要大刀阔斧地来主张共产革命”。五四运动期间，周恩来已有了明确的阶级斗争观念，而在西欧的深入学习，使这种观念很快升华到确信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在一本《卡尔·马克思的生活与教育》的书上，周恩来用粗粗的着重线画出了马克思的一段话：“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因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断，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他运用这一基本观点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指出，中国应当实行“共产革命”，这是一场伟大的变革，是能够解决“世界乱象”的救时良方，“世界上只有一个共产主义……能使中国民族得列于人类中间彼此一视同仁”。周恩来驳斥了胡适等人改良主义的“好人政府”的主张，以及“实业救国”的幻想，认为这是“陷中国于歧路中的麻醉剂”。他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因此，“共产主义决不作枝叶的问题，要大刀阔斧地来主张共产革命。”“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势，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我们与其在现状中作法自毙，莫如大彻大悟集合众力一心一意地从事革命。”（25）周恩来排除了一切改良主义的企图与可能，坚信共产革命是惟一正确的救国之路，这是他确立武装斗争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

（二）“共产革命”的任务就是要使国家“政权落到劳动阶级手里”。中国“共产革命”的任务是什么呢？周恩来下了很大功夫进行调查和思索。1921年春夏，他考察了英国120万工人的大罢工，从中了解到工人阶级是最坚强有力的革命阶级，认清资产阶级的目的完全在于置工人于死地，提出要永远与资本主义为敌，“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这个根本解决指什么？周恩来在1922年发表的《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等文章中，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明确指出，要根本改变工人阶级所处的境遇和地位，决不能满足于经济斗争，而必须投身到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中，他说：“革命未成以先，一切罢工，减时，加薪，自治，国有，协作等事件都不过被视为训练劳动群众帮助革命进行的种种手段，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的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他结合中国的实际指出：“依着现在中国的时势，一切缓和修正的办法都无所施。”（26）“共产革命”的任务就是夺取政权，而且这是劳动阶级求解放，社会求发达的根本前提。

（三）夺取政权必须“经过极长期的血战争斗”。周恩来通过深入地研

究认识到，在中国要夺取政权，必须经过流血的武装斗争。1921年1月，他在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谈到：“俄之成功，在能以暴动施其‘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而收一洗旧弊之效。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27）。周恩来意识到，只有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把劳动人民武装起来，进行暴动、起义和战斗，才能夺取政权，从而求得对中国的根本改造。到1922年底，长期地探索，使周恩来有了坚定而明确的思想。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一文中，他指出：“革命事业本是要经长期努力长期奋斗才能保住成效的。一国一种的民主革命，如法国革命，美国独立都是经过极长期的血战争斗才得使共和奠定，更何况无产阶级的共产革命”（28）。他批驳了诬蔑革命是“驱下层阶级以杀上层阶级”的谬论，指出：“至于杀与不杀，那纯视反革命的举动如何为定。革命是不能不流血的”。周恩来已清楚地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共产革命必须进行流血的武装斗争，必须用武力推翻反动统治，而武装斗争又必将是长期的。

（四）“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1922年3月间，周恩来高度评价德国无产阶级领袖卢森堡说的“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这句话是“见到之语”。同年3月，他在《西欧的‘赤’况》一文中指出，在遭到咬动派镇压之后，西欧革命的机会在最近的几年确是很难，但法国工人同军队一旦能联络起来，革命便有了希望。1922年12月，周恩来在《评胡适的“努力”》一文中明确提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若徒以手枪炸弹、罢工罢市来恐吓，则手枪炸弹，他有躲避之法，罢工罢市，他更可以军队来压迫。这样薄弱的主张亦自不能与有组织的革命视为同值。”周恩来不但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军队，没有革命军队便不能打倒反动阶级，而且还提出，革命军队与旧军队是完全不同的，其斗志要极坚强，其组织要极严密，其目的在于推翻军阀的反动统治，夺取政权。如此强调革命军队的重要性，强调用革命武力去战胜反动势力，标志着周恩来的武装斗争思想有了新的突破。

（五）必须注重培养革命军事干部。周恩来在五四运动中就已认识到，做任何一项革命工作，都必须培养一批坚强的先进分子作为骨干和核心。旅欧时期。他进一步认识到，要建立革命的武装，要建立极有组织的革命军，就更需要培养一大批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强意志的军事干部，以便将来成为中国武装斗争所需要的骨干和人才。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他在中共旅欧总支部内专门设立了“军事部”；有意识地组织一些党、团员，学习军事理论，研究军事问题。他还有计划地派遣一批同志到苏联去学习军事，为党培养军事骨干。聂荣臻回忆说：“即使在当时，在1922年和1923年。恩来就告诉我们必须学习军事科学。党不能够总是停留在政治辩论俱乐部的水平上。如果我们要改造我们的国家，就需要有一支军队。”何长工也回忆道：“从一九二三年初开始，在中央指示下，中共旅欧支部在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领导下，培养的大批骨干力量，为迎接国内即将到来的大革命，有计划地回归国内担负军事和工农运动的领导工作。我们留法勤工俭学的党员骨干基本是分两个部分。一部分送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去深造，一部分回到国内充实革命领导力量。”尤其是朱德，他在1922年离开滇军，到上海找共产党，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结果被丝毫不懂得武装斗争重要性的陈独秀拒之门外。他辗转万里，在柏林见到了周恩来，倾吐了心曲，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周恩来满腔热情地支持朱德，并亲自介绍他入党，为我们党

发展了一个军事上的将帅之才。朱德回忆说：“我当时真高兴极了。从此，我抛弃了旧我，开始了最有意义的革命的新生。”的确，朱德入党后，在周恩来的领导和帮助下，先在欧洲学习马克思主义，后转到苏联学习军事，回国后从事武装斗争，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周恩来旅欧期间的武装斗争思想和培养军事人才的工作，对人民军队建设和中国革命战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四、较早确立武装斗争思想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那么中国革命应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式，就成为党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毛泽东后来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曾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前后的一个时期认识不足，重视不够。”那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的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这一论断是就党在初创前后的指导思想和工作全局讲的，是完全正确的。但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要比同辈的绝大多数人认识得早一些，深一些。他在旅欧期间初步确立起的武装斗争的思想，以及他为中国革命武装斗争所做的许多军事组织工作，都表明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先懂得武装斗争极端重要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是最先确立武装斗争思想的优秀共产党员的杰出代表。那么周恩来为什么能够达到如此的高度呢？

第一，执著而又深入地探求“主义”。周恩来在南开学习时，就矢志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他探求“主义”的过程中，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执著，二是深入。由于他付出了大量的艰苦劳动，达到了常人所达不到的程度，因此他探求“主义”才能达到别人达不到的高度。从南开学校毕业后，他东渡日本探求，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时期他在狱中探求，产生了暴力革命意识的萌芽。赴欧求学，他以旺盛的革命热情，坚定的革命意志，读书、演讲、写文章、办刊物，共写出了20多万字的通讯和大量的文章，多方面地进行深入研究，终于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刚到欧洲，他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谈到，欧洲“有以保守成功者，如今日之英也；亦有以暴动成功者，如今日之苏维埃俄罗斯也。”“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足见在革命方式这一根本问题上，存在着矛盾心理。而经过深入地探求比较之后，周恩来终于得出了结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关于这一点，周恩来在给谌小岑、李毅韬的信中谈到：“我认清 C. ism（共产主义——作者注）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正是“求真的心又极盛”，才使得周恩来在探求“主义”的艰难历程中，比别人深了一步，高了一层，因而才能通过暴力革命理论的引导，探求到进行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军队的真谛，从而成为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的理论先锋。

第二，在社会实践中“求真”。周恩来在探索革命真理时，十分强调实践的作用。他认为：“实验的工作，在学生身上是不可少的。”“实验的目的是证明他所研究的与这个社会合式[适]不合式[适]”，好促进他的判别力同审察力，加一层研究，预备到社会生活时期，有真正作战的能力。”五

四运动时期，周恩来勇猛地参加了爱国斗争，阶级斗争实践，激励了他的革命热情和思想。他在总结自己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原因时，曾谈到：“前年北京的‘全武行’于我也非常有帮助”，“也引起我探求主义不少的兴味”。周恩来赴欧的“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虚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为此，他决定“起首于此邦社会之考察”。可见，周恩来到欧洲也是为了扩大社会实践的范围，在更大的范围里去探求救国的真理。事实确是如此。周恩来在欧洲深入到煤矿、工厂去参加生产劳动，实地考察法、英、德等国的工人运动，填密研究由于十月革命影响而发生深刻变化的国际局势和阶级关系。同时他还具体参加了赴欧勤工俭学学生的斗争实践活动。周恩来在丰富的实践中努力探索，思想上很快发生了质的飞跃，不仅在政治上完成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而且在五四运动中产生的暴力革命意识的萌芽也不断发展，形成了武装斗争思想。勇于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努力“求真”，这是周恩来能够较早确立武装斗争思想的决定性因素。

第三，在“推求比较”和“鉴别”中坚定信仰。周恩来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这段活表明了周恩来的一个思维特点，即不轻易下结论，往往于各种主义的“推求比较”中去辨别真假，鉴别对错，进而确立起信仰。到欧洲之后，周恩来发现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派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甚为泛滥，在中国留学生和工人中都有影响。他一面学习马克思主义，一面对各种思潮加以剖析，认清其错误实质，从而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同时，他还发现各种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已渐渐地被欧洲工人阶级所摒弃。他在以伍豪笔名给天津觉悟社成员的一封信中写道：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近已见衰”；欧洲的无政府主义“其势力渐渐等于零”；社会党人“朝三暮四”，“吃党的太多”，许多工人日渐摆脱他们的影响，而倾向于俄国十月革命。法国本是无政府工团主义影响非常严重的地方，“现在 C. ism 差不多可说要起而代之了”。“法国的共产党自前冬与社会党分裂后，独立为共产党，近来已大行发达。”正是通过这样的“推求比较”，周恩来坚信马克思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惟一真理。在此基础上，周恩来奔走于中国工人与学生之间，发表演讲，写文章，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不少资料表明，周恩来关于武装斗争的思想和言论，许多都是在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阐发出来的。“推求比较”和“鉴别”确是推动周恩来思想认识比其他人更为深化的巨大动力。

第四，“一切全可牺牲”，为共产主义而献身。要确立武装斗争的思想，不仅要有理论的鉴别力，而且还要有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彻底的献身精神。有这样一件事，周恩来给一位南开同学写信，讲自己准备从事武装斗争，为共产主义献出一切。对方尽管也明白道理，却没有勇气去说，更没有勇气去做，回信提出要和周恩来分手，各走各的路。这说明没有牺牲精神，没有献身勇气，就不可能提出并去实行需要为之流血牺牲的武装斗争思想。周恩来不仅是探索理论的“博士”，而且是革命斗争的勇士。他向“觉悟社”的战友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他认为：“理愈明，信愈真，感愈切，革命的精神遂能愈久而愈坚。”他以非常崇敬的心情赞扬说：“列宁真可爱！……只要于共产主义将来的发展有利，一切

全可牺牲”。可以说从那时起，周恩来就以列宁为榜样，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革命事业。这种献身精神促使他坚定地相信革命必须经过长期的暴力斗争才能胜利，提出要进行流血的武装斗争，并且准备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武装斗争之中去。当周恩来从邓颖超等人的来信中得知“觉悟社”的一名成员，因受封建婚姻的逼迫而自杀；另一位曾经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的黄爱，又因领导长沙纱厂工人罢工英勇牺牲。

两位战友的相继死去，使周恩来“一时百感交集”，遂作诗一首，其中写道：“壮烈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没有耕耘，那来收获？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那有这类便宜事？”<sup>45</sup> 这具有高尚情操的诗歌，被周恩来冠题目为“伍的誓词”。它的确是周恩来决心为共产主义流血牺牲，奋斗到底的誓词，充分反映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性和彻底性。这种坚定性和彻底性，也许就是周恩来能够较早懂得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进而确立起武装斗争思想的深层动因。

## 第二章 革命军队建设的开拓者

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根据党的指示返回祖国。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于9月初到达广州。周恩来在国外虽然只有几年，但国内政治形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3月，聘请苏俄顾问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6月，在黄埔长洲岛建立了陆军军官学校，培养军事干部。7月，又在广州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运干部。国共的合作奋斗，促进了革命风暴的到来，广东已成为全国人民希望所系的革命根据地。

周恩来一到广州，就立即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中，和叶剑英、聂荣臻、恽代英等同志一起，拉开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武装斗争的序幕，由于周恩来在旅欧期间已经确立起武装斗争的思想，因而对许多军事问题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在党领导武装斗争，创立革命军队政治工作，创建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以及开展人民战争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对此，朱德曾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同志，以及党所举办的秘密军事训练班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他还指出：“我们党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注意军事工作，就开始在军队中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就开始注意到了武力和人民相结合、革命的武装斗争和群众斗争相结合。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北伐战争的迅猛发展和巨大胜利。”“虽然那时党对掌握革命武装还没有经验，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这个问题事实上已经接触到了，这件事已经着手做了。因此研究党的军史时，应当从这个老根上研究起。”周恩来在大革命时期的军事理论和实践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对当时的革命战争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并对以后我党独立进行武装斗争，直至形成马克思主义正确的军事路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一、首创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

1924年6月，黄埔军校成立后，即仿效苏联红军，建立了党代表与政治部，目的是通过党代表和政治部的工作，以革命的思想武装师生，从而组建一支真正忠于国民革命的军队。然而，黄埔军校的前两任政治部主任，却没有使政治工作有效地开展起来。第一任主任戴季陶，不仅对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一窍不通，而且没于几天就走了。中间几个月没有人负责，也没有具体组织，只有两个记录员，政治部成了空头招牌。第二任主任邵元冲是一个官僚，根本不懂政治工作，隔几天从广州到军校政治部，例行公事地走一趟。黄埔革命师生早就对此强烈不满，提出了“加强政治部工作，撤换邵元冲”的要求。11月间，邵元冲跟孙中山到北京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原已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的周恩来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从此开始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首创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光辉实践。

周恩来上任时虽然还很年轻，对政治工作也比较陌生，且在当时的中国又无经验可借鉴。但他凭着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以苏联红军为榜样，结合当



时大革命的需要和黄埔军校的实际情况，以其出众的才华和创造精神，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很快就开创了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崭新局面。一是以革命思想武装师生。周恩来把政治训练和教育作为政治部的中心工作，主要方式是上政治课，内容很丰富。他还把“军队政治工作”列为军校的一门课程进行讲授。通过政治教育，给广大师生灌输革命理论，培植革命思想，除上课外，周恩来注意采取多种方式，如办好图书馆和书报室，创办报纸和刊物，成立演出剧社，举行演讲会和讨论会，利用标语、口号、革命歌曲等，创造良好的政治教育气氛和环境。二是建立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周恩来扩充了政治部的组织机构，增设了指导股、编纂股、秘书股，增加部员 20 多人。以后又陆续建立了各学员队的党代表制度，并对党代表的职责范围、各级党部、党小组会议、报告制度都做了明文规定。三是培养政治工作的优良作风。周恩来多次强调，政治工作人员必须深入下去，了解情况，做思想工作，强调要言行一致，起模范带头作用。他本人就是最好的榜样。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指导股主任的王逸常回忆说：“周恩来同志每日除了用少量时间浏览我们为他准备的报纸剪辑、工作日记，批阅来往函件外，大量的时间都花在找人谈话和抓工作落实上。”正因为周恩来有着扎实的作风，因而使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很快开展起来了。四是在军校的校军中开展政治工作。1924 年 11、12 月，由黄埔军校学生组成的军校教导团第一、第二团先后成立，这是区别于旧军阀部队的国民革命军，周恩来在部队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开展政治训练，并选派黄埔一期生，共产党员曹渊、蒋先云、张际春等分别担任教导团下属各连的党代表，统属政治部领导。由周恩来一手建立的黄埔军校和军校教导团的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的良好开端，其作用一开始就十分显著。崭新的政治制度，丰富的政治教育，吸引着广大革命师生，校园内革命空气空前高涨。经过革命的政治训练，培养了一大批军事政治人才，他们在以后的革命战争中建立了巨大的功勋。

1925 年初，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乘孙中山在北京患病之机，怂恿和支持盘踞在广东东江、潮梅一带的军阀陈炯明进攻广州，阴谋推翻广东革命政府。为了巩固革命政权，广东革命政府决定讨伐陈炯明，并于同年 2 月和 10 月先后两次举行东征。周恩来参与了两次东征的领导工作，并开创了战时的政治工作。

1925 年 2 月进行的第一次东征，是国民革命军第一次对敌作战。周恩来以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分随军出征，负责黄埔校军两个教导团的政治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领导军队政治工作，而周恩来也成为我党第一位军队政治工作的领导人。当时东征军虽号称 10 万，但多为军阀部队，战斗力不强。而黄埔校军的两个团，虽刚刚成立，但英勇善战，无坚不摧，建立了赫赫战功。这支新军所以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开展了战时政治工作，使官兵知道为谁而战，为何而战，因而士气高昂，纪律严明，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如何开展战时政治工作，这是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周恩来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主要抓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大张旗鼓地开展政治宣传工作。通过宣传使每个军官、每个士兵都明白仗是为人民而打的。本着这种精神，周恩来在东征誓师大会上做了政治动员。出发之日，政治部印发了《敬告士兵同志们》的传单。为了加强宣传，周恩来抽调人员组成一支 20 多人的宣传队，散发宣传品，张贴标语、口号、布告，进行宣讲，教唱革命歌曲，组织军民联欢，演出文艺节目等等。广泛深入地宣传工作，

鼓舞了士气，壮大了声势，使官兵明确了东征的意义，精神面貌为之一变，士气高涨，战斗勇敢。二是建立军队中的党组织。各团营连除了军事指挥员外，都设有国民党的党代表。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不少共产党员担任了党代表，他们不仅负责行军和作战时的政治工作，而且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影响官兵。党代表制度对激发官兵作战热情，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三是深入发动群众。在周恩来的具体组织下，东征军一路上发动群众，组建农民协会，动员群众支援配合作战。有一次，周恩来看到党代表蒋超雄在讲解军民关系时，指着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奶奶说：“她很像我的祖母”，又指着一个50岁上下的伯伯说，“他很像我的父亲，我现在看见了你们，就和看见了奶奶和老子一样。”周恩来当场称赞他“讲得很精彩”，要大力倡导和推广。周恩来自己也多次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向群众进行政治宣传。深入的宣传和动员，使群众明确了东征的目的，参战热情空前高涨，用种种方式配合东征军作战。四是教育东征军树立严明的纪律。周恩来把维护群众纪律看成是革命军区别于军阀部队的重要标志，指示军校政治部制定严明的纪律，提出“不拉夫，不筹饷，不占民房”的口号，并且向群众发出由廖仲愷、周恩来署名的《黄埔军校布告人“我军奉命东征，实为讨贼救民；父老苦秦久矣，不得已而用兵；所过秋毫无犯，所到鸡犬不惊；不住民房抢物，买卖尤属公平；绝不拉夫筹饷，三民主义实行；我军所到之处，革食壶浆以迎；党军讨贼勇敢，与民相见以诚；望各安居乐业，指望东区安宁。”有违犯纪律者必依法惩办。校军的这些行动，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第一次东征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初次实践，初步显示了政治工作的威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25年9月中旬，任命周恩来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授于少将军衔。周恩来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中的第一位军队政治部主任。第二次东征时，周恩来又担任了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全权负责前方政治工作。他总结了第一次东征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主持东征军总政治部，更加卓有成效地开展政治工作：一是全面加强政治工作的领导。周恩来抽调了几十名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到政治部工作，又组织了163人的政治宣传队，共产党员李之龙、周逸群、卢德铭等都先后在其中工作过，这样就使政治工作的组织更加严密和有效。二是进一步完善政治工作的内容。总政治部颁布了《战时政治宣传大纲》，把政治工作对象分为对本军、对群众、对敌军三个部分，详细规定了政治工作内容，使政治工作有了基本依据。三是使政治工作的作风更加扎实细致。总政治部要求政工人员以身作则，加强指导，耐心细致，保持镇定，抓住有利时机，把政治工作渗透到战时的各个方面去。据统计，仅散发和张贴的宣传品就有孙中山、廖仲愷画像10万张，小画报20万册，革命标语8万条，革命歌词10万份，新三民主义浅论5万份，《告敌军官兵》传单5万份；《告东江同胞》传单20万份。第二次东征的政治工作，在周恩来的组织领导下，比第一次有了新的提高和发展。

两次东征的政治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周恩来作为主要领导人，为创立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作出了特殊贡献。周恩来以及当时所有政治工作人员的宝贵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军队政治工作方面所做的最早的尝试，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此，当时的社会舆论有许多褒扬。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第3期刊登的《东征纪略》一文中说：“革命军与别的军队最大不同点，就是他军队内面的政治宣传，这是革命军打胜仗的根本原因。这种政

治宣传工作，在平时要紧，在战时更发要紧。”就连反共的国民党人也不得不承认，所以作战胜利，“政治部之功绩确乎不可磨灭”，“此乃中国军队，第一次战时政治工作之成绩。”两次东征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将政治工作的全套制度，在所有的国民革命军中普及推广。这对北伐战争的胜利起了巨大作用。

北伐战争开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北伐战争的许多工作，都是由周恩来所领导的广东区委军委担当。周恩来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军队政治上。在这方面，历史资料有许多记载。例如：

1926年5月初，为加强北伐军的政治工作，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合作，用中山大学国民党特别党部名义，举办了一期军队政治干部培训班。周恩来亲自负责培训班的工作，讲授军队政治工作课程。培训的100多人都回到了国民革命军，成为北伐军政治工作的骨干。

5月1日，叶挺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锋，率先出师。独立团到广州时，周恩来在越华路（今名）叶家祠堂叶挺家召集连以上党员干部开会。他首先分析了形势，北伐的条件，农民运动情况，又着重指示：（1）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2）注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3）注意统一战线工作，很好的与友军团结；（4）作战要勇敢，要有牺牲精神，要能吃苦耐劳；（5）要起先锋作用，模范作用，骨干作用；（6）现在有些军都不愿意派部队先出去，只要你们打了胜仗，他们就会跟上来。周恩来最后用“饮马长江”的话鼓励大家。他临走时与每一个同志握手，很有信心他说：“武汉见面”。独立团党支部决定把周恩来的指示分别在党内外传达讨论，并作为从广州出发到湖南行军中的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5至7月间，周恩来以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的身分，主持党对北伐战争的各项准备工作。他分别召集国民革命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军和黄埔军校中的中共党组织的负责人开会，以会代训，听取汇报，部署政治工作，并要求他们向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以提高政策水平。

在此期间，广东区委军事部还开办了军事政治讲习班，周恩来不仅自己授课，还请毛泽东、李富春、林伯渠等人担任理事，讲授政治理论。同时，周恩来还为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举办的特别政治训练班讲《中国政治军事的观察》、《政治工作的设施及运用》等课程，传授政治工作的理论和经验。

6月22日，周恩来出席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主持的北伐军战时工作会议，在会上报告战时宣传训练班计划，还同邓演达商讨了北伐军政治部的工作方针和人事配备，并向邓推荐共产党员朱代杰任总政治部秘书处长。

7月，国民革命军举办战时政治训练班，为北伐培训军队政治工作干部，周恩来作《国民革命及军事政治工作》的讲话，对军队战时政治工作的必要性，以及政治工作的一整套新的制度，作了全面的总结和阐述，是大革命时期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一篇重要理论文献。

同月，周恩来指示聂荣臻以特派员身分到北伐军中做政治联络工作，向带兵的共产党员传达中共中央和广东区委军事部的指示，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秋天，中共两广区委在省农会礼堂举办政治训练班，培训骨干。黄埔军校每周选派大批党员干部参加。周恩来常到该班作报12月，周恩来撰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批驳国民党右派的诬蔑之词，强调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并号

召全体革命分子：“当此北向军阀，外向帝国主义。内向半封建势力作决死战的时候”，“都应团结起来”，以最终实现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

周恩来在北伐战争期间，为做好军队政治工作，耗费了巨大的心血。这大量的工作和活动，从政治上、思想上武装了政治工作人员，武装了革命军队中的先进分子。在周恩来的具体指导下，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和政工干部，一方面大力开展各种形式的政治宣传工作，出版战报，发行书刊，上政治课，组织政治学习班，部队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另一方面又以自身的榜样作用，吃苦在前，冲锋在前。带领官兵们浴血奋战，以鲜血和生命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总而言之，周恩来是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首创者。他的政治工作理论和实践活动，不仅在当时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以后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的创立和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7年，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指出：“国民党的军队本来是有大体上相同于今日的八路军的精神的，那就是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时代。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毛泽东的评述是对周恩来在大革命时期开创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高度赞扬。

## 二、创建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

早在旅欧时期，周恩来就已深刻认识到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性。回国后，他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探索中国革命这一关键问题。他按照列宁的建军思想和经验，在改造旧军队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初步解决了革命军队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创建了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无产阶级的革命武装，从而成为人民军队的杰出奠基者之一。

周恩来回国之初，即按照党中央的命令担任了两广区委委员长，后又改任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成立的领导军事工作的部门。1924年9、10月间的广东，革命形势并不乐观，广州虽然是革命的中心，但革命政府所能管辖的区域只占广东的1/3，其他地方仍控制在陈炯明、邓本殷等军阀的手中。孙中山没有自己的军队，他是靠杨希闵的滇军和刘震寰的桂军才占领广州的。杨、刘二部挂着革命的招牌，实为军阀部队，一切行动均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拥兵自重，为非作歹。孙中山和广东革命政府虽极为愤怒，但苦于没有自己的武装，不得不向他们退让。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政府号令不得他们同意，虽令亦不能行。反之，他们的主张虽违政府号令，政府亦必须屈从”。反动武装商团更是甚嚣尘上，他们不仅作恶多端，民愤极大，而且还密谋兵变，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他们勾结帝国主义，偷运大批军火枪支，被广东政府查获后，便以罢市相威胁。英国驻广州总领事也向广东政府扬言，如果进攻商团，便要炮击广州。在这紧要关头，周恩来主持中共两广区委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依靠广东各界群众，对反动武装商团进行警告性示威大游行。

在 10 月 10 日的示威大会上，周恩来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号召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面对各界群众的游行示威，反动商团竟然开枪射击，当场打死 20 多人，打伤 100 多人，抓捕了许多工农群众，并在广州街头武装巡逻，威胁广东革命政府。面对商团的叛乱，当时驻守广州的军阀杨希闵、刘震寰态度却十分暧昧，不肯出兵，坐等观望。远在广东北部韶关督师北伐的孙中山听到消息后，在苏俄顾问鲍罗廷、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成立了平定商团叛乱的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周恩来参加了临时军事指挥部的工作。他坚决主张：“立刻以少数的可靠的革命军力，向一切反革命的商团和军阀下总攻击，以决最后的死战。”革命委员会决定抽调一部分军队回师广州，在工农群众大力支持下，迅速平定了商团叛乱。这一回合的斗争虽然获得胜利，但严重的时局，工农的鲜血，反动军阀武装的猖狂，都引起周恩来深深的思考。他迫切感到，依靠旧军阀的军队是不可能完成国民革命的艰巨任务的，必须武装工农扩充革命实力，建立一支能为国民革命纲领而奋斗的革命军队。这支军队与旧军阀军队完全不同，它不仅自身能够冲锋陷阵，而且能够带动旧军队的革新和改造，以完成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周恩来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并在实践中自觉地开始了创建革命军队的艰巨工作。这也是周恩来来到黄埔军校去工作的最重要的原因。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就开始了创建革命军队的尝试。他首先在理论宣传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对军队的地位、作用、阶级性、革命军队与反动军队的区别等，都作了精辟的分析，使黄埔师生对建立革命军队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在此基础上，周恩来按照党的指示，指导建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由共产党员蒋先云、周逸群、徐向前、李之龙、陈赓等负责领导，以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为骨干，联合粤军讲武堂、滇军干部学校、桂林军官学校等的青年军人和学生组成。这是以周恩来为首的黄埔军校政治部联系青年军人的桥梁，是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军人进行革命思想教育的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周恩来的具体指导下，创办了《中国军人》刊物，大力传播革命思想，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主张革命军一律采取党代表制，建立政治部，从事政治训练。他们还派人到全国各地的部队去发展组织，最多时发展到 2000 多人，团结了大批革命军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所作的大量工作，为创建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建立听从党指挥的新型人民军队，做了思想、组织和舆论上的准备。

1924 年 11 月，反动军阀蠢蠢欲动，广东的政治局面充满风险，动荡不安。为了使共产党有力量应付各种突然事变，在关键时刻能有听从共产党调动的革命武装，周恩来和孙中山商量后，决定建立“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周恩来从黄埔军校调来了共产党员徐成章、周士第任正、副队长，又调共产党员廖乾吾任党代表兼中共党小组长，调共产党员赵自选、曹汝谦为军事、政治教官。还通过党组织从各地调来部分有觉悟的工人、农民共约 150 人，组成了铁甲车队，装备有铁甲车、机关枪和长短枪。铁甲车队名义上属于大元帅府，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指挥的最早一支革命武装。铁甲车队官兵的调动和战斗活动，都由中共两广区委和周恩来等同志决定。周士第后来在纪念铁甲车队建立 50 周年的诗歌中写道：“中国共产党建军，屈指如今五十年。周总理亲自组织，毛主席思想领先。”“政治军事严训练，国际歌声珠江流。事事都是党领导，处处总与人民亲。”事实确实

如此。1924年12月，广宁县反动地主武装摧残农会，压制农民运动，铁甲车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到广宁击败了反动武装，支援了农会，并把缴获的武器送给了农民自卫军，壮大了农军队伍。第一次东征时，铁甲车队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由政治教官曹汝谦率第三排乘铁甲车活动于广州至石龙的铁路线上，进行警戒、侦察、修补铁路和发动群众的工作，充当东征的先锋部队。当东征军回师广州，镇压滇、桂军阀的叛乱时，铁甲车队按照周恩来的命令，渡过珠江，歼灭部分叛乱军队，为使广东革命政府转危为安立下了战功。1925年夏，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铁甲车队与省港大罢工的工人纠察队一起封锁香港、九龙，并肩战斗。

由于国民革命需依靠部分军阀的军队，初建的国民革命军中还有一部分成员也来自旧军队。因此，对旧军队的改造工作，就成为建立革命武装的一件十分迫切的大事。周恩来认为，要使旧军队不为军阀所利用，而转变成成为革命的武装，关键的问题是启发广大士兵的阶级觉悟，用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和革命军队的良好榜样，去影响、带动和改造旧的军队。周恩来多次指示黄埔军校的革命师生对滇、桂、湘等旧军队进行革命宣传，联络和团结其中的一些先进分子。他还指示共产党员李之龙等人，担任特别宣传队队长，专做对滇军、桂军的宣传工作。第一次东征时，黄埔军校的校军与粤军同为右路军，学生军的高昂斗志、严明纪律和顽强的战斗作风，都给粤军以很大的影响。他们仿效学生军，激励斗志，与黄埔校军并肩作战，奋勇杀敌，取得了重大胜利。国民革命政府改编粤、桂、湘、滇、闽各部队为国民革命军时，周恩来积极主张设立政治部和党代表，对旧军队进行教育和改造。周恩来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后，亲自挑选了几十名共产党员去做教育改造工作，使许多官兵因受党的教育和革命思想熏陶而倾向革命，从而提高了第一军的战斗力。第二次东征时，攻打惠州是决定性的战役。周恩来不仅提出了正确的攻城方案，而且率领政治部到前线，同各级党代表密切合作，鼓舞士气。在久攻不下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令第三师第七团党代表蒋先云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组成敢死队，强行登城。第一军在共产党员和革命官兵的带领下，经过30个小时的英勇战斗，大获全胜。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说：“惠州要塞实际上是共产党人拿下的，他们的意志比攻不破的城墙还要坚硬。”周恩来迅速提高了共产党员在军队中的形象，适时提出了改造旧军队，建设革命军队的重要任务。他在追悼惠州阵亡将士大会上指出：“现在有第一军的力量，已有这样的成绩，假使能够把各军都化成和第一军一样，那末广东统一，就在目前了。进一步就可统一中国”。必须”把全中国的军队都要化为革命军。”周恩来的这些思想和实践，为改造旧军队取得了经验，指明了方向。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到1925年11月，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的周恩来，决定创建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正规化的革命武装，作为可靠的核心的军事力量，以壮大共产党的斗争实力。于是以铁甲车队为基础，从黄埔军校调来一批共产党员做骨干，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这个团名义上属于第四军，实际上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团长叶挺、参谋长周士第都是共产党员。从叶挺独立团成立那一天起，周恩来就非常关注独立团的建设。他亲自挑选和任命了营长、连长及各级领导，指示独立团成立了党支部，各连建立党小组，共青团组织直属党支部领导，独立团的干部任免、战斗员补充都由党直接负责。第四军军长张发奎曾不满地说：“你们真是独

立的，总是先斩后奏的”。周恩来还指示独立团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他亲自力独立团制定干部和新兵训练计划，编写政治教育提纲，对广大官兵进行革命的理想和纪律教育，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改变旧军阀部队的不良习气，从思想上保证独立团具有无产阶级性质和坚强的战斗精神。通过深入的政治教育，独立团呈现出崭新的精神风貌。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在广州军部看到独立团的练兵报告后，得知独立团成绩很大，遂亲自到肇庆视察。关于这次视察的情景，周士第在回忆录中写道：“陈可钰在独立团看见每天晚上熄灯后，许多干部还在工作，有的甚至工作到深夜，早上又同战士一齐起床出操，非常感动。他对叶挺说：‘你们的军官夜以继日地工作，太疲劳了。’叶挺说：‘他们的革命热情很高，有的是在准备次日的课，有的是在解决当天没有解决了的问题，有的是开会，有的是学习，所以往往睡觉很晚。他们都是青年，多得些锻炼有好处。’

“有一天，陈可钰听到俱乐部里唱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全靠自己救自己……粉碎那旧世界的锁链……和那些强盗们战斗……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我们是新社会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他对叶挺说：‘这不是《国际歌》吗？你们为什么不唱《国民革命歌》？’叶挺说：‘《国民革命歌》是经常唱的，今天是学习《国际歌》。’

“陈可钰来了独立团几天，看到连队官兵伙食一样，俱乐部里除挂孙中山先生像外，还挂马克思、列宁的像，常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官兵常在一起玩，士兵很活跃，团部、营部、连部经常有老百姓出入等情况，就对叶挺说：‘你们把旧军队的习气都扫除了，这是很好的。你们真是革命军！但是太红了。’叶挺说：‘要红才能打胜仗。’

“……临走前一天，叶挺在俱乐部里集合了全团排以上干部，请他讲话。他说：‘你们真是革命军，你们好象是一个军事学校……’满口都是称赞的话。陈可钰离开肇庆时，排以上干部都去欢送，一直把他送到船上。他带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回广州去了。”

在北伐战争中，这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夺长沙，战武汉，打垮了北洋军阀中实力最强的吴佩孚的部队，为北伐胜利立下了大功。攻打武昌城时，共产党员曹渊身中数弹，仍一边攀登城墙，一边高呼革命军万岁，其余官兵叠肩而上，打垮了守城敌军。曹渊和其他牺牲的烈士。集中体现了独立团的无产阶级先进性，和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的英雄气概，表现出与旧军队根本不同的新型军队的战斗风貌。为了表彰烈士们的英勇事迹，扩大共产党武装的政治影响，周恩来指示要撰写曹渊等烈士的传略，以鼓舞北伐官兵的斗志。

由周恩来亲自创建的“铁甲车队”，以及在此基础上组建的叶挺独立团，是中国第一支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武装力量，与旧军队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直接负责，排除了国民党的干涉。二是设立了党代表，主要由共产党员担任，许多党代表都是由黄埔军校抽调来的，他们把在黄埔军校和两次东征时建立培养起来的政治工作制度和作风带过来，进行思想和组织建设。三是建立了中共党组织，支部建在团上，小组建在营连，一切重大问题由党组织决定，从而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四是建立了军队的民主制度，革除军阀作风，废除打骂恶习，培养官兵同甘共苦、团结一致的新风尚。五是注重民众工作，维护群众纪律，

关心人民疾苦，打倒土豪劣绅，扶持工农武装，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六是懂得力谁而战，为何而战，因而激发出高昂的战斗热情，以一当十，以少胜多，连续作战，显示出了强大的战斗力。铁甲车队和叶挺独立团的建立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雏形。

当然，周恩来创建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并非一帆风顺，从一开始就遭到严重干扰。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顽固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妄图取消工农武装。他要求工农武装不要超出自己的范围，不可有常备组织，不要注重军事训练，反对共产党直接掌握军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蒋介石乘机大抓军权，排挤共产党员。在极端复杂的斗争形势中，周恩来则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识破蒋介石的反动本质，揭露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重危害，在实际斗争中，为共产党争兵权，为无产阶级争兵权。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对黄埔军校革命师生和校军官兵的领导，在周恩来的具体指导下，建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设法扩大共产党在黄埔军校中的组织和影响。周恩来后来曾说，蒋介石开办黄埔军校时，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黄埔军校内的队长都是他的私人。有一次，周恩来派了几个左派的人当队长，蒋介石大为不满，撤销了任命。对此，周恩来指导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分子，采取多种方式，同反动的孙文主义学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到第二次东征时，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发展大大超过孙文主义学会，军队中3个师的党代表，共产党员占2个；9个团的党代表，共产党员占7个。在连、排、班以及士兵中部有共产党的组织，各军还成立了政治部。蒋介石企图限制革命力量的发展，他要求把所有在黄埔军校以及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单都告诉他，被周恩来以请示中共中央才能决定为由，加以拒绝。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反共的“中山舰事件”，在广州的共产党人大部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周恩来赶到李富春住处，和毛泽东、李富春等同志商讨对策。后来周恩来曾回忆说：“三月二十号事变是国共关系一个关键。这以前是广东省委主张进攻，上海中央主张退守。事变打击主要对象是俄顾问、黄埔共产党、省港纠察队。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备军力量，主张反击。”“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共产国际顾问——作者注），他说不能破裂。而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可以反蒋的，黄埔有五百余党员”，“只要我们强硬，国民党左派是拥护我们反蒋的”。这个宝贵的建议可惜被陈独秀和共产国际顾问否定了。“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被迫辞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同时被排挤出国民革命军的共产党员还有200多人，周恩来为他们举办了特别政治训练班，并亲自担任主任，将他们培养成军事骨干。毕业后，大部分学员被派往叶挺独立团。当时，周恩来和毛泽东都很重视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他们曾商谈，主张在国民革命军所有6个军中，都要搞一支像独立团一样的由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1926年底，国民党右派掀起了反共高潮，他们对共产党员在军队中的活动极为不满，恶语中伤。对此，周恩来连续发表3篇文章，予以全面驳斥，给国民党右派的阴谋以无情的揭露，同时也抵制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倾向。

在创建人民军队的最初实践中，充满了激烈的斗争。周恩来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气概，他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污蔑，顶住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压力，坚定不移地创建了共产党直接领导



的第一支革命武装。

### 三、进行人民战争的探索性实践

周恩来是人民战争理论的开拓者和人民战争最早的实践者之一。从大革命一开始，他就坚定地认为，战争的实力存在于广大人民之中。1924年10月，广州各界群众举行集会，周恩来在演讲中就明确指出：“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的势力极大，反革命派的气焰日张，我们只要下我们团结的决心，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兵士可以作先驱，有学生可以作宣传，有商人可以作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而要把这种“实力”激发出来，必先要使人民联合起来。他早就鲜明地提出了“工农兵大联合！共同打倒帝国主义”的主张，并进一步指出，由于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所决定，工农群众“需要国民革命之成功，比任何人都感觉急切”。工人农民和革命军队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们所受是同一种的痛苦，他们就有联合的需要与可能，他们形式上所受的痛苦不同，而他们永远是联合为同一的阶级。”因此，只有团结全中国的革命民众，向反革命进攻，革命才能够彻底成功。为此他大声疾呼：“吾革命之工农阶级乎！其速自起！其速联合！其速组织起吾人自身唯一可恃之革命力量！”

从上述基本认识出发，周恩来注意把工人运动和军事运动结合起来。1925年6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罢工委员会组织了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周恩来亲自选派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到工人纠察队担任领导职务，并指示黄埔学生军第三营和铁甲车队加入到罢工活动中，与工人纠察队相结合，成为罢工的中流砥柱。6月23日，周恩来亲自参加领导了广州各界反帝示威大游行。他还经常深入到罢工工人中间去，到工棚去，支持和鼓励工人的英勇斗争。这次罢工历时一年零四个月，不仅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而且对广东的革命战争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周恩来从中看到了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看到了工人运动对军事运动的巨大推动力。他在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深刻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工人是先锋，我们的任务除罢工外，还要“武装起来与英帝国主义决一雌雄”，工农运动与军事运动“休戚相关，守望相助。”他还具体指出：“军队里头要有很多明白的分子，知道兵士自身是由工农失业而来的；在工农方面，亦要有明白的分子，加入军队里去，使军队能为工农保障的军队”。在周恩来这一思想指导下，工人纠察队中的一部分工人编入了北伐军，壮大了革命军队的力量。1926年初，周恩来到东江工作后，仍多次致电省港罢工委员会，并赠送锦旗和徽章，支持工人的斗争。到下半年，他还把一部分黄埔军校毕业生分配给工人纠察队。这些措施，大大增强了罢工工人的实力。

周恩来对农民运动也极为重视，强调农民运动要与武装斗争相结合。鉴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周恩来特别指出，革命战争应该依靠农民，取得农民的支持。他说：“揆之事实，拥护革命政府者，农民也；受帝国主义与军阀以及一切反革命派摧残者，农民也；武装自卫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且兼以为革命政府之前卫者，亦农民也”。在领导广东农民运动中，周恩来每到一处，便通过各种方式掀起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把成千上万农民身上的“实力”解放出来，转化成强大的革命力量。1925年11月，东征军收复广东东江各地，周恩来被国民革命政府任命为东江各署行政委员，正式

设立行政委员公署，管辖惠州、潮州、梅县和海陆丰下属 25 个县的行政工作。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个地区范围内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地方政权机构。其间，周恩来深入贫苦农家中，了解农村情况，了解农民的革命要求，教育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彭湃领导的海丰农民运动很出色，他还写了一本书。周恩来亲自题写书名《海丰农民运动》。为了使更多的农民接受革命教育，周恩来还主持举办了农民运动培训班，培训了不少骨干。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东江地区农会纷纷建立，并组建起了农民自卫军，广大农村迅速掀起了革命高潮。与此同时，周恩来发挥高度的组织才能，统筹开展各方面的工作，组建起东江地区的国民党、共产党、共青团等各种组织，改组地方的政权机构，惩办贪官污吏，整顿社会秩序，从事各项基本建设。可以说，周恩来是第一位靠枪杆子创建一个地方革命政权的共产党人。1926 年 5 月，周恩来还参加了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主要讲授《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由于周恩来卓有成效地把农民运动与军事运动结合起来，使广东的农民运动空前发展，最多时达到了 62 万之众。组织起来的农民，开展减租、反对民团、反抗土豪劣绅的斗争，形成了汹涌澎湃的革命巨浪。

随着工农革命运动的空前高涨，以及革命军队的建立，周恩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革命军队来自人民，革命军队要为人民打仗，人民需要革命军队。既然革命军队是为人民打仗的，“人民应与革命军联合起来，如同兄弟一样互相亲爱，互相提携，将敌人早日打倒才是。”为此，就必须依靠群众，动员和组织群众支持军队，进行战争；把群众武装起来，使之与革命军队一起并肩作战，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为达此目的，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

首先是宣传和发动群众。周恩来要求黄埔革命师生人人都“作无线电机，将革命的思想传到全中国，使全国的民众革命化。”“要使人民知道政府政策实施之目标，然后合作可成。”这样，群众的组织和武装战斗力才能得到充实和发展。长期以来，广东人民群众受尽了军阀的压迫和蹂躏，对横行不法的军队谈虎色变，要想与人民打成一片，让群众拥护支援军队，最好的办法就是拿出实际行动来。为此，周恩来要求革命军要爱护人民，保护人民。他主持编写的《爱民歌》，就生动地体现了这一要求。歌中写道：“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筑街前路，砍柴莫砍坟山树，挑水莫挑有鱼塘”。“莫进城市占店铺，莫向乡间借村庄”。“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兵不许岸上行。”如此细致周密的纪律规定，加上东征军的自觉遵守与严格执行，其结果是：“军行所至不扰民间一草一木，老妇孺，喜而挤观。鸡犬不惊，商市安堵。入夜无公家空房，则扎篷营露宿，东江人民父老，谓民国以来，仅此次所见，乃是真正革命军，真正卫国保民之革命军。”这种行动，比任何宣传部有力，使人民和军队迅速团结起来。第二次东征抵达潮汕时，码头欢迎者数万人，沿途道路均被堵塞。周恩来深有感触他说：“此盛大之欢迎，实为我政府及我军将士为主义奋斗之所致。”

其次是组织群众支援革命战争。周恩来总是在宣传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进一步组织群众，以群众的巨大革命力量支援革命斗争。他曾精辟地指出：“打平东江，不是军队的能力，是工人、东江农民气革命军联合的势力；打倒杨、刘，亦不是军队的能力，亦是广州工农与革命军联合的势力。”事实确是如此。陈炯明过境时，广大群众坚壁清野，或往井里放毒，粥里放桐油，

把陈炯明搞得狼狈不堪。东征军占领惠阳、平山后，周恩来立即率领政治部工作人员到平山调查，当地群众纷纷向周恩来控诉军阀陈炯明派款拉夫、抢占商店、苛征暴敛的罪行。周恩来号召他们组织起来，积极配合东征军消灭敌人，在场群众热烈响应。为了使群众支持革命战争的巨大热情持久不衰，周恩来坚决主张打击土豪劣绅，严惩违纪现象。土豪劣绅在农村势力很大，不打击他们的威风就不能把群众真正组织起来。东征时，周恩来在各地欢迎会上反复宣布：要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一切贪官污吏，政府为你们作后盾，有话尽管说。在揭阳，他点名批评了当地英商代办林逸才的罪行。在五华，他传讯了大地主张谷山、陈卓人等，责令他们写出忏悔录。周恩来兼任黄埔军校的军法处长后，对违纪现象严惩不贷。有一个姓黄的连长带了两个士兵抢劫农民财物，激起群众的愤怒。五华县长闻报后，派人将黄连长逮捕，押往梅县请示裁决。周恩来调查属实后，为了维护东征军的声誉，赢得人民的支持，遂下令将该连长枪决，群众赞不绝口。正是这些努力，使广大群众迅速组织起来，掀起了参军支前的热潮。有的当挑夫，为部队运送枪弹；有的指路带路，给革命军当向导；有的帮助部队站岗放哨，封锁道路；有的主动送情报，充当革命军的耳目。革命军每到一地，群众纷纷打出“欢迎义军”的旗帜，敲锣打鼓，玩龙舞狮，燃放鞭炮，不少农妇还把糖稀饭送到阵地上慰劳部队。人民群众的支前热情感动得战士为之泪下，极大地鼓舞了官兵的杀敌决心和勇气。据当时史料记载：“人民亲党军如亲其家人”，当革命军开拔时，“群众痛哭请留”。纷纷要求革命军常驻保民。所以如此，正如周恩来所说：“打东江的时候，黄埔的党军，有特别的表征，他们都是江浙失业的工农，一句广东话都不懂，为什么潮梅的工农，甘愿为他们作先锋、作向导，或是担任后方的运输呢？这就是因为黄埔的军队，知道工农的痛苦，而为同情的保护，所以该处的工农，亦能力同情的互助”。这些都充分反映出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人组织革命群众，支援革命战争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反映了人民战争思想的巨大威力。

再次是建立群众武装，奠定人民战争的可靠基础。周恩来一直十分重视武装群众，指出：“民众武装在广东已成为自然必不可少的组织”，“农民自卫军、工人自卫队之组织亦为势所必需。”他还提出、党和政府应给民众武装以积极的援助和指导，“因为革命民众的武装力量是日以拥护革命政府向半封建势力斗争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周恩来在战争实践中，竭尽全力积极建立群众武装。第一次东征前夕，周恩来就指示共产党员李劳工、林务农在广州召集人力车工人数十人，经过武装训练，组成先遣军，为东征军作向导。而后函调卢德铭等人到海丰、陆丰协助训练农民自卫军，又派李劳工、吴振民为海陆丰农民自卫军大队长兼教官，发展农民武装。第二次东征，周恩来指导制定的战时政治宣传大纲明确规定要“恢复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并在东征军政治部设一社会运动科，专负其责。11月下旬，周恩来指令第一军政治部工作人员李侠公将缴获的400多枝枪，发给海陆丰中共党组织，用以武装农民。类似这样武装群众的事情是很多的。在周恩来的领导和支持下，几个月内，广东的工农武装就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地方成立了农民自卫军，潮梅各县都有一个用快枪武装起来的农民模范队。到1926年5月，广东农民自卫军发展到3万多人。在革命战争中，工农武装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与革命军并肩作战，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周恩来在大革命时期萌发的人民战争思想和开创性的实践，为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更

大规模的人民战争播下了种子。

#### 四、探索建设革命军队的理论

大革命时期，周恩来不仅是创建革命军队的实践者，而且也是革命军队理论建设的开拓者之一。他清醒地认识到军队建设理论对实践的重大指导意义。因此，在大革命的战争实践中，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当时军队的情况，边实践，边总结，边提高，对革命军队的性质、地位、作用，对革命政治工作的任务、目的、内容，以及建设革命军队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都做了艰苦的探索和开拓，形成了周恩来早期的建军思想。这些理论问题主要有：

##### （一）革命的武装斗争在中国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直到1924年，还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是从一九二四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周恩来早在旅欧时期就已经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而在大革命时期，他对这个重大问题的认识则开始理论化系统化了。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基本原理，分析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明确阐述了产生武装斗争的阶级根源，指出历史上的压迫阶级不管是古代酋长、封建诸侯，还是现代资本家，总是用武力压迫劳动人民，“但这不是永恒不变的。被压迫阶级觉悟的时候，这例子便冲破了！压迫阶级压迫过甚，即是说资本家大地主压迫工农过甚，被压迫的工农也会起来利用这武力了。”有压迫就有反抗，有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就有武装斗争，这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工农受了过甚的压迫，必然会觉悟起来，利用武力去反抗压迫者。例如俄国十月革命，工农利用武力推翻了俄皇贵族，同样中国被压迫的民族及其他被压迫的弱小民族，觉悟到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压迫的时候，也会从他的本身造出的武力用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虽然同是武力，但是被压迫阶级运用武力来进行斗争，是革命的，正义的，因为这种“被压迫者的本身组织起来的武力，也并不是压迫人的，而成为解放人的武力了。”周恩来初步阐明了中国武装斗争产生的根源、必然性和革命性质，从理论上深刻揭示了革命的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指明了中国劳动人民必须觉悟起来，拿起枪杆子，打倒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才能求得自身的解放。

但是，“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周恩来有针对性地批判了剥削阶级的欺骗和恐吓，以提高人民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比如，“好人不当兵”，这是一种流传很久、影响很深的传统观念。周恩来专门作了批判，指出：“凡是一个社会都没有永远不变的道德，道德、宗教、文化习惯通通都是依着当时的社会环境而变迁的。”他举例说明，在过去“凡是一个社会的风俗习惯道德，都是用来束缚和压制被压迫者。他们所谓‘好人不当兵’，封建社会的好人，是天子诸侯士大夫，他们是瞧不起农人的。把农人看做不是人的。至于无产游民，那更不是入了。……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大地主，都把农工看做顽民暴徒，或叛贼。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军队，还是要这些顽民暴徒叛贼去当兵的。从这点看来，军队中的兵士，都是被压迫阶级的农工。”所以“我们要认清什么是好人。”周恩来就是这样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穿所谓“好人不当兵”等传统观念的阶级欺骗性，使工农大众增强

了参加革命军队，进行武装斗争的自觉性。

## （二）革命军队是革命的工具，是实现革命理论的先锋

中国的武装斗争靠什么进行呢？周恩来明确指出，要靠革命的军队，因为革命军队是中国革命的有力武器和工具。当时有一种谬论，认为“中国有有枪阶级与无枪阶级，有枪阶级是压迫者，无枪阶级是被压迫者。”对此，周恩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军队的本质作了科学的揭示。他说：“我们要明白军队能否成为一个阶级，须先了解阶级的意义。我们要知道阶级的意义，不是一群人生活相同就可以说他是个阶级。”他通俗地解释了阶级是同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是由经济地位来决定的，进而深刻阐明：“军队不是一个阶级，乃是工具。”“压迫者拿这工具去压迫人，如酋长以其工具去压迫奴隶；天子诸侯王拿这工具去压迫乡村的农奴和城市的市民；又如现在的军阀、资本家、大地主，利用这工具去压迫农工或其他的群众，但被压迫阶级也可利用这工具去反抗他们的压迫者。”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军队是一种工具——武器，谁也可用的。”只有认识到军队是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工具，才能劳动人民掌握军队提供正确的理论前提。周恩来正是从这一理论前提出发，进而断定中国人民完全可以利用军队来达到革命的目的。他说：“这工具（军队）压迫阶级可利用，被压迫阶级也可以利用，拿来造成他本身的武力，达到世界革命的成功。”周恩来还把中国革命同世界革命联系起来，阐明革命军队对进行武装斗争夺取革命胜利的重大意义，他说：“西方是无产阶级革命，东方是国民革命，会合起来成为一个世界革命。这世界革命成功，便进于世界大同。这样说来，军队的组织更有重大的意义！这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周恩来不仅阐明了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且原则上指明了革命军队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建设的基本方向。需要指出的是，以周恩来当时的身分，他的话既是讲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又是讲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具有一定的策略性。所以，说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实现理论的先锋，其中就包括了军队是无产阶级的工具，是实现共产主义理论的先锋的含义了。也就是说，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要推翻旧社会和旧制度，就必须掌握属于自己的革命军队。

## （三）革命军是人民的军队，必须坚持革命政党对军队的领导

军队是一个工具，但又是一个具有特殊作用的工具，是属于一定阶级的工具。能否正确认识这个问题，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对中国的革命具有决定意义。

周恩来分析总结了历史上的军队制度，看到过去由剥削阶级建立的军队，虽然其具体组成人员，即广大的士兵都是被压迫者和被奴役者，但却被统治阶级利用去打劳动人民和阶级兄弟，从而造成了压迫阶级更大的势力。而现时进行的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推翻压迫和奴役的革命，必须建立新型的革命军队。为此，周恩来明确指出，和以前的旧军队完全不同，真正的革命军是“为人民所用的军队”。他曾反复阐述人民军队必须为人民谋幸福。指出：“革命数十年尚未成功者，因多数军队均系前清遗留而来，即有新招之兵，仍仿前清编制，此种军队不知人民痛苦，不知政治意义。”真正的革命军必须知道：“今者人民痛苦极矣，不受土匪之害，则受反革命军之骚扰，工无工作，农无耕地，商人停止贸易。”因此，革命军“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若非为人民而打之仗，彼等必不去打，能如此者为党军，不

能如此者非党军。”这一精辟论述，表明了革命军队的根本性质和宗旨，指出了革命军和旧军阀军队最本质的区别。本着这一思想，周恩来在革命战争实践中，每到一地总是要求“革命军向人民宣传解释，使之了解人民与革命军之关系。”明确“如欲使中国和平，须有真正之革命军，须有为人民所用之军队。”他本人也多次向群众宣告：“本军系解除人民痛苦而来”，“完全是为人民幸福而来”。周恩来所说的人民概念，虽然是指国民革命联合阵线下的人民，但其主体则是工农劳苦大众，因而他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性质和目的等重大理论问题，同毛泽东后来概括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在思想体系上是一致的。

周恩来在大革命时期建军思想的另一条根本原则是，必须坚持革命政党对军队的领导，没有这种领导，革命军队便不可能完成革命的任务；甚至还可能成为新的军阀军队。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强调军队一定要“党化”，“要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因为革命军是党的军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成为实现党的理论的先锋。为此，周恩来强调要用党的理论主义政策去统一革命军的思想 and 行动，使广大官兵“晓得革命军的使命”，“晓得时代的政治”，在“革命进行中，一定要遵党的政策”。从而使革命军始终是“党军”，始终保持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周恩来还大力加强革命军队中党的组织建设，以保证党的领导。为使军中党组织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周恩来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工作制度，例如：“（1）各连队党部每星期必须依章开会，党代表及常务委员须负全责。（2）各连队党部小组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两次……党代表须亲往参加会议，执行委员须轮流参加。（3）各连队党部小组会议须注意下列各事：（甲）从实际问题上解释主义之理论的根据；（乙）报告重要时事及党务；（丙）讨论士兵生活之改良；（丁）同志间互相批评，以党的见地为中心”等等。这些组织措施有力地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然，周恩来在这里论述的党，是指大革命时期进行国民革命的国民党，不是中国共产党；所说的军队是东征北伐的国民革命军，还不是工农革命武装。但周恩来关于革命军队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的基本思想，在以后中国共产党建设人民军队的实践中，得到了借鉴、继承和运用。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反对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直接掌握军队，这对创建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革命武装极为有害。周恩来不仅在实践上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了坚决的斗争，而且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与陈独秀的一些奇谈怪论进行了理论交锋，从中进一步发展了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军队的思想。针对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掌握军队会变成军阀的谬论，周恩来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组织革命军队不是像军阀一样，为排除异己扩张势力，而是为实现党的理论和政策进行斗争。坚持共产党领导革命军队也是为了保证军队的政治方向，是为了党的理论方针政策能更好地贯彻执行。由于“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要领导农人、兵士而为工农兵的大联合，共同来打倒帝国主义。”因此，要使军队不为军阀所利用，不为帝国主义做走狗，而成为革命的军队，这个责任完全落在工人阶级身上，“工人不仅要努力工人运动，而且要努力跑入军队里去做军士运动”。这是因为军队的成员绝大多数是农民和手工业者，虽说“国民革命原是中国各被压迫阶级共同的出路，不过在这革命过程中，各阶级却有他们各自的出发点”。“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下妥协的革命阶级。要靠他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不妥协地与敌人争斗，才能达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

总之，在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所阐述的改造旧军队，建立新军队，保证共产党对革命军队领导的根本目的和根本途径的思想，是十分重要和宝贵的。但是由于受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这些正确的思想并没有真正在党内得到采纳和实行，因而使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没有独立的军事工作和独立的革命武装。在国民革命军中已有的共产党的组织也没有充分发展，没有更深入地开展工作，使得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未能真正掌握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以至在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时，没有军事力量来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从而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这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一个深刻教训。

（四）革命军队必须建立政治工作，政治工作必须建立一整套新的制度

怎样才能保证革命军队服从党的领导，真正遵循党的主义和政策呢？周恩来认为，必须在军队中建立起革命的政治工作，并形成一整套新的政治工作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把党的主义和政策灌注到广大官兵之中，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听从党的指挥，为人民打仗，为革命冲锋。周恩来说，应当“于军事教育外，授以政治教育，告以中国如何受列强压迫，军阀压迫，以及农工商各界之痛苦，告以解除压迫与痛苦之途径，要使每个军官每个兵士均能了解此理。”周恩来还结合中外军队的历史经验，进一步论述了革命军队建立政治工作的基本途径，指出：“冯玉祥的军队有宗教运动，因此，他的军队格外的团结、朴实、耐劳、廉洁、守纪律。这是宗教运动的效果，可是他的目的是错误的。法国革命时期的军队也有政治工作，广大的宣传目的是对的，可是他方法不对，所以结果〔形成了〕拿破仑第一帝制。最近苏俄红军的政治工作目的也对，方法极好，我们革命军里政治组织就是效法红军。”周恩来正是吸取了苏联红军政治工作的成功做法，结合中国的国情与军情，对革命军中政治工作的目的、任务、范围、内容、方法等等，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总结，从而形成了一套新的军队政治工作的制度。例如，军队政治工作在当时的根本任务，“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转到革命方面来，“使革命军队确实其革命观念”，形成巩固的思想基础。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最近目的，“是使广大的群众明了帝国主义的罪恶”，晓得“最近国民革命军唯一的使命，就是反帝国主义。”军队政治工作人员的作风，要比一般的军队人员有更高的要求，“在军队里做政治工作，要以身作则，严守纪律，常常表示勇敢的态度，比士兵更要勤苦”。军队政治工作的实施方法，必须按组织系统行事，“就系统方面说，政治部是军队组织里面的一部分、要辅助各部处的工作，以进行政治教育实施的目的”等等。周恩来亲手创建的这一套政治工作制度，是大革命时期政治工作实践的科学总结，对于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后来我军政治工作的一些制度，也是在周恩来创立的政治工作制度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和完善而建立起来的。

（五）要以团结作战为目的，正确处理革命军队的内外关系

革命军队是革命的中坚力量，但不是惟一的力量，要取得革命成功，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作战，共同为主义而奋斗。周恩来指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不能仅局限于革命军本身，必须包括革命军队、军阀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三个方面，这就需要摆正军队的位置，处理好各种内外关系。一是要正确处理军队与人民的关系。周恩来把获得人民的支持，看成是赢得革命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他说，单靠军队“力量大小，若无人民援助，仍不足负重大责任。”要让每位官兵明白，必须同“人民通力合作，以促革命成功。”

他领导的东征军政治部编写的《敬告士兵同志》书明确指出：“我们做军人的，吃的饭，穿的衣……都是人民给的，我们这次出发的时候，就应该千万爱护人民。”周恩来的许多言论和他在东征中正确处理许多军民关系的感人事迹，充分表明了他在军民关系问题上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思想，这就是爱护人民，军民一家，依靠人民，军民合作。而这些思想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建军的重要思想。二是正确处理本军与友军的关系。周密来非常注意处理好各部队之间的关系。他主张各部队之间应互相配合，共同对敌。他要求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以自己的模范骨干作用，去影响友军带动友军。三是正确处理军队内部的关系。周恩来强调官兵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官长要平等待人，废除打骂，关心士兵生活。尤其是政治工作干部要处理好与军事指挥员的关系，要多接近士兵，常与士兵谈话。周恩来还在革命军内部狠抓纪律教育。他强调纪律“是革命最重要的一个原素”，严整的军纪可以集中革命力量，军队内部没有纪律约束，就“不能把我们的仇人一概打倒。”更为重要的是，周恩来当时就明确指出，革命军队的纪律同军阀部队的纪律是不同的。军阀部队是靠惩罚作为维持纪律的基础，而“在革命之下，守革命党的纪律，并不是强迫的，是各同志甘心愿意遵守的”。为此，就必须加强纪律教育，以革命精神做维持纪律的基础，达到“革命化、纪律化、统一化”的目的。四是正确处理革命军与敌军的关系。周恩来提出，要通过政治工作把敌军改造过来。他主持制定的优待俘虏的政策，规定要教育敌军俘虏，并殷勤安慰之优待之。他还率领宣传队员在战争中张贴标语，散发传单，阵前喊话，使敌人军心动摇，士无斗志，或逃亡离队；或缴械投降，或倒戈起义。这一切都显示了瓦解敌军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周恩来关于正确处理军内外关系的一系列思想和论述，体现了他要努力建设的新型革命军队的本质，人中不难看出它与人民军队政治工作总方针和三大原则的某些渊源关系。

综上所述，周恩来在大革命时期关于革命军队建设的理论，尽管是萌芽状态的，但毕竟向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他关于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思想，他创立的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他萌发的人民战争的思想等等，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五、指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从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上海工人阶级为了响应革命军北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三次武装起义。1926年12月，周恩来被调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担任组织部秘书，并兼任中央军委委员。1927年2月，第二次武装起义爆发，周恩来没有参与准备和领导工作，而且起义很快就失败了。但周恩来参与了向上海区委军委传达中央的决定，向中央反映第二次武装起义的情况，对中央的方针、起义的过程有较多的了解。由于周恩来在东征北伐时就参与制定过军事计划，参加过战役战斗的指挥，显示了出众的军事指挥才能，在党内被公认为富有军事工作经验的人，因而中央派他去负责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为了搞好这次武装起义，周恩来首先对第二次武装起义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他认为，第二次起义是一次“名符其实的起义”，尽管这次起义存在着缺点，但仍然具有很大的意义，“尤其是经过这次起义，工人们懂得了很多”，“应该把这次起义看作是为将来起义作



准备。”同时，周恩来也指出了第二次起义的两条教训：“问题全在于没有准备，在于党的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针对这两条教训，周恩来在领导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切实做好准备工作，正确选择起义时机，并在起义爆发后，以其出色的军事才能，指挥起义取得成功和胜利。如果说起义之前，周恩来已是党内公认的富有军事工作领导经验的人，而通过起义，周恩来的军事领导才能和指挥艺术，则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示。

起义准备，细致周密。周恩来对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特别重视。中央和上海区委决定成立特委和特别军委，周恩来担任特委委员和特别军委书记，以后又担任了起义总指挥。他根据特别军委的讨论，提出并着重抓了五项军事准备工作：第一，建立领导机构。特别军委原有5人，再增加罗亦农、王一飞参加军事准备工作，各部委（即区委）分别组织军委，使之与军事指挥相适应。第二，组织武装力量。起义的武装力量，主要有工人纠察队，总数近3000人；自卫团，约1000人；特别队，约900多人。这些人是核心力量，通过他们很快把上海工人阶级带动和武装起来了。第三，加强队伍训练。编制符号，考察人数，印发宣传大纲，教授巷战技术。周恩来从工人中选调当过兵、有实战经验的党员做教员，从北伐军中调来共产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生侯镜如担任纠察队指挥。第四，武器准备。周恩来在召开的十六次特别军委会上，有11次谈到武器问题，足见重视的程度。经过多方努力，纠察队购买了250枝枪，并从租界内秘密转运出来。第五，加强敌军和情报工作。在周恩来直接指挥下，成立了敌军委员会，负责联络和策反，并向各方面写信或派人直接了解情况，搜集情报。经过严密、周到、细致地准备，到3月5日，周恩来在特委会议上报告：“各方面动作已预备好”，“集中力量在闸北”。

选择时机，坚决果断。究竟选择什么时机起义，这是一个当重要的军事问题。陈独秀认为我党武力薄弱，起义“不要太早”，提出两条标准：“一、上海已无驻兵，二、北伐军到松江后仍前进，或待进到龙华。”周恩来则根据当时的战争形势和军事情况，主张“假使松江下，必可动，因毕（庶澄）决不致再守上海。苏州下，也必可动，因他也不能枯守上海，同时他的兵队必有一部分溃散。”陈独秀接受了周恩来的主张；确定：“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这就决定了选择起义时机的正确方针。3月20日傍晚，北伐军占领龙华。周恩来立即抓住机会，召开区委紧急会议。他分析了形势，认为驻守上海的敌人军心涣散，已无斗志，而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已达沸点，各种有利条件表明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机成熟。到会同志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正确分析，并通过了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制定的起义计划，包括行动时间、战区划分、战斗步骤，以及作战纪律等等。会后，起义计划传达下去，一切准备就绪。1927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作出起义的最后决定，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

出敌不意，组织伏击。起义从21日中午12时开始，至下午4时，除闸北区外，各区战斗均已胜利结束，缴获了大批武器。周恩来当即决定，调集各区工人纠察队支援闸北。这时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敌军毕庶澄部500人左右全副武装，于早晨乘一列铁棚车开往吴淞，准备从海上逃跑。列车到达吴淞附近时，敌人发现吴淞已被工人纠察队占领，调头返回上海。周恩来接情报后，当即立断，决定组织伏击，歼灭该敌，以免敌冲破我虬江路防线。他

亲自带领纠察队员到天通庵车站附近组织伏击，将队伍分为两支，选择有利地形，埋伏在铁路两侧，并将路轨道钉拔掉，黄昏前后，列车进入伏击圈，火车脱轨，埋伏在两侧的纠察队员猛烈射击。敌人毫无准备，又因车门反锁，无法打开，只能在窗口抵抗。天黑后，周恩来又命一部分学生纠察队投入战斗，并发动政治攻势，高喊缴枪不杀。经过一夜战斗，除少数敌人溜走，其余400人挂了白旗，丢出武器，全部束手就擒。

围而下打，逼敌就范。东方图书馆是敌人军需处所在地，虽然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但凭借四层楼的钢筋水泥建筑，并有两挺轻机枪，子弹充足，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战斗一开始，强攻不下，伤亡增多，工人急了，准备硬冲。这时周恩来赶到了，他查看地形后决定，为减少伤亡，改用围而不打的办法。通过政治喊话，敌人被迫同意停火，但又不愿马上投降。次日下午，敌人支持下住了、用白毛巾绑在竹杆上伸出墙外，并停止射击。由于工人不懂打白旗的含义，仍继续围攻，又牺牲数人。这时周恩来又及时赶到了，命令停止进攻，接受敌人投降，总指挥部随即迁入东方图书馆。

靠前指挥，发起总攻，围攻北站的任务是最艰巨的。这里的敌人守备力量很强，有重机枪阵地，在白俄雇佣军的装甲火车上有迫击炮两门，还有帝国主义军队的火力配合，进攻非常不顺利。在周恩来周密部署下，工人纠察队修起三道工事，利用工事向敌人进攻。黄昏后，敌人的炮火引起居民房屋着火，火借风势蔓延开来。周恩来考虑到居民的安全和敌人可能乘机反扑，立即亲临现场，一面组织救人，一面加强人力配备。果然敌人乘机进攻，企图迫我后退。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亲自到前沿阵地指挥一支突击队冲上去，会合前线纠察队，发起猛烈反击，把敌人打退，夺回了防御工事，火灾也被扑灭了。第二天，周恩来到阵地前沿检查工事时，一颗炮弹突然落在附近，他立即卧倒，被炮弹爆炸后溅了一身泥沙。但他毫不在意，从容掸去泥沙，继续检查工事。周恩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鼓舞着工人们，更增强了战斗勇气。当时国民党右派搞阴谋，阻挠北伐军接应上海工人纠察队。周恩来得知情况后说，我们上海工人纠察队是有志气的，我们完全有力量拿下北站。他当即在前线指挥所召集会议，调整部署，把武器弹药全部集中起来。当得知毕庶澄已逃进租界，敌人近于土崩瓦解时，周恩来立即下达了总攻命令。全体纠察队员士气高昂，发动猛攻，6时攻下了敌人的最后据点——北火车站。经过近30个小时的战斗，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取得胜利。作为总指挥的周恩来又一次显示了他的一贯作风，在重要军事行动的关键时刻，总是亲临第一线，靠前观察和指挥。

就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的当天，蒋介石的部队不费一枪一弹开进了上海，企图篡夺上海人民已经夺取的政权。蒋介石早就决定，在夺取上海、南京后开始“清党”。这个罪恶的阴谋在加紧进行。3月25日，周恩来已从各种信息中觉察到一些不正常现象，他向中共中央报告说，白崇禧将薛岳师调开，将刘峙师调来闽北，“即将谋解决我们的纠察队”。3月30日，周恩来又在特委会议上报告：“整个的情形，他们对付我们已有准备。”并断言：“将来他们对付武汉及解决上海只有凭武力。同时，对付民众只有如江西雇佣流氓。”这些极其重要的警告，并未被共产国际代表和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所重视。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一再让步，致使蒋介石的阴谋一步步得逞。4月12日凌晨，蓄谋已久的反动派终于向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下了毒手。当时周恩来正在商务印书馆组织改编工人纠察队，加强训练和戒备，准备用战

斗来保卫武装起义的胜利果实。11日晚，周恩来被敌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骗到师部扣留，同时对工人纠察队下了毒手。周恩来虽在罗亦农等人的营救下脱离虎口，但各处工人纠察队已被缴械，局面已无法挽回。在敌人疯狂屠杀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被迫全部转入地下。周恩来于14日也转入秘密据点——吴淞附近徐家宅一处工人住家的小阁楼上继续工作。

4月16日和18日，中共上海特别委员会召开了两次会议。会上周恩来非常愤怒地指出，在政治上，上海暴动后有右倾错误，致使此次大受其亏。在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而主张先北伐，并怕老蒋军事力量太大，完全自己站于弱点，是很下好的。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无法，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马上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活动。”会后，周恩来起草了致中央的电报。即著名的《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在这封电报中，周恩来强调：“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此外，周恩来还主张“下决心讨伐，迅速出师，直指南京”。并且对如何出师讨伐在军事上做了战略分析和建议：“安庆有三军二师与芜湖七军隔江相持，二、六军之一部闻已退至安徽，可任侧面攻击。……芜湖如下，南京必震动。蒋能直接使用之军队仅五个师……如何能抗东下之兵、……南京一失，苏、沪可不战自定。”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到周恩来已在政治上识透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并且在军事上做了周密分析，利用敌之弱点，利用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影响，联合一切反蒋军事力量，打败蒋介石，保住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周恩来等提出的“东证讨蒋”，尽管未被接受，但却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这一切都表明，经历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与失败；周恩来不仅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而且在军事上对武装斗争的认识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政治上和军事上迅速成长起来的周恩来，在妥善处理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善后事宜后，于1927年5月下旬到达武汉。此时大革命已危在旦夕，随着7月15日武汉政府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屈服，他们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只有拿起枪杆子，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才能夺取政权，中国革命由此跨入一个新天地。正是在这样一个紧要的历史关头，周恩来奉中共中央之命，开始从事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从此周恩来的军事理论和实践活动也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 第三章 联单 领导创建红军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面对蒋介石的屠刀，中国共产党内一批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高举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旗帜，走上了探索中国武装斗争的艰难而又曲折的道路。周恩来是其中优秀的和主要的代表者之一。

周恩来到武汉后，在中共中央负责军事工作。他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竭尽全力把党的工作重心从政治斗争转到军事斗争方面来，不仅从思想上，而且从组织上使党做好应付突发事变和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拟定切实计划，准备发动湘、鄂、赣、粤秋收起义，开展土地革命。他亲自组织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之后，周恩来又回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岗位上，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指导创建工农红军，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斗争。他及时把各地创造出来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和斗争经验转发给各根据地的红军，指导他们坚持农村的游击战争，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保存革命力量，坚持武装斗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工农红军的主要成员是农民。为了保证这支军队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忠实工具，周恩来在总结大革命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以及各地工农红军创立过程中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初步总结归纳出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以及一整套新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并把这个原则和工作制度迅速推广到全国的红军中，为人民军队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探索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规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处在幼年时期，政治上还不成熟，在共产国际“左”的思想的影响下，党的政治路线在一段时间内被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所支配。党的一部分领导人还不懂得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看不清国内革命斗争的形势，只会不切实际地照搬国外的经验，坚持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否定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由于党的中央机关和军委领导机关设在上海，处于秘密状态，周恩来没有能够亲身参加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游击战争的实践，因此，还不能从理论上深刻认识 and 批判“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但是，由于他勤于学习，善于调查研究，能从各个根据地的创建和红军游击战争的实践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所以他在军事方针、作战原则以及斗争策略等问题上，同“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逐步认识到党的武装斗争的重心应该放在农村，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道路，并以此作为指导创建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理论依据。由于周恩来坚持不懈的努力，使李立三“左”倾错误时红军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制草案》、《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和《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全国红军组建了军团，统一了编制，建立健全了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制度和党的工作制度，以及士兵委员会制度。为红军实现从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的军事战略转变，顺利进行反“围剿”战争，作了组织上的准备，进而使红军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

这个时期，周恩来一直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因此，他的实践与理论探索的正确与否，就具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事实证明，周恩来为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人民军队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之一。

## 一、准备和组织武装暴动

1927年5月中旬，周恩来在聂荣臻的陪同下，秘密乘英国轮船离开上海去武汉。他们两人都是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当他们到达武汉时，大会已经结束。周恩来虽然没有赶上参加这次大会，但他在广东领导军事工作和在上海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表现出来的卓越才能，已被全党所承认，因此，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周恩来到达武汉时，武汉地区的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反革命活动迅速表面化。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迅速走向反动。5月13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叛变，率部攻击武汉，推进到离武汉只有六七十里公里的纸坊。担任武汉卫戍司令的叶挺，奉命率部奋起反击，迅速打败了叛军。但汪精卫却命令叶挺停止追击，回师武汉，致使夏斗寅残部得以在鄂南、鄂东一带流窜。5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即“马日事变”，残酷屠杀大批革命群众，反共声浪甚嚣尘上。在这紧急时刻，中共中央从22日起多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局势。刚刚到达武汉的周恩来列席了这几次会议。会上大家认为，国民党控制的军队多次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我们党必须加强对军队的工作。会议决定周恩来由中央秘书长改任中央军事部长，当时又叫军人部长，并规定，军事部长在必要时可参加常委会议。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又决定，周恩来代理张国焘的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共中央核心领导。

到武汉不久，周恩来就感到原来在上海设想的要求中共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出师讨伐蒋介石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无论是大资产阶级还是中小资产阶级，都被汹涌澎湃的工农运动吓坏了，他们篡夺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已在所难免，国共分裂也已不可避免。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周恩来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党的军事工作中去。他认为党应该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注重军事斗争上来。5月30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周恩来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军事问题，利用时机开展武装斗争。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虽然发生了马日事变；农民运动受到挫折，但是湖南农民运动的力量仍然很大，并且拥有不少武装。叶挺指挥的部队在击败夏斗寅后正驻扎在湘鄂边境一带，可成为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而此时武汉国民政府的主要军事力量唐生智的第八军主力还在河南，武汉的反动力量只有何键的第三十五军一部，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良机，切不可错过。但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仍对开展武装斗争犹豫不决。

进入6月份，武汉的局势更加危急。汪精卫解除了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等人的职务，并与冯玉祥在郑州会面，预谋反共。国共两党的全面破裂已经迫在眉睫。何键正准备在汉口制造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新的“马日事变”。陈独秀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完全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政治局对每个问题都是动摇、犹豫和下一致的，对下一步该怎么办也感到迷惘。在这种沉闷的空气下，党内人心更加涣散。6月17日和20日，周恩来两次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湖南暴动计划的报告，指出，现在浏阳、平江一带的农军还有8000枝枪，军事部已派了军事干部10人（其中有营长3人）到那里去。并准备再派150人到各地做农军及地方工作。要在湖南省委下设军委，各区设农军委员会，技术上建立交通处，组织领导起义。会议基本同意了周恩来的

报告，并决定派周恩来来到湖南去指挥这次暴动。但是这个计划却因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而未能实行，虽然周恩来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由于他的努力工作和积极领导开展武装斗争的建议，打破了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一直笼罩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沉闷空气。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积极协助的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被蒋介石破坏后，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具体任务应该是什么？周恩来关于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思想和举行湘鄂赣粤四省农民暴动的建议，无疑对这些同志的思考，以及后来党在八七会议上提出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的正确决定具有重要影响，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后来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写道：

“此时中央政治局有点‘进攻’的新空气”。“开始宣传反对反动的国民党中央。同时派去大批军事同志赴湘发展农民暴动，推翻许克祥。这些军事同志去时，中央常委出席说明是要准备对付整个的唐生智的反动之到来。于是中央与国际代表之间，组织一湖南特别委员会，专为指挥湖南暴动。后来此会开会数次，外国同志将暴动计划改了又改，同时所决定之款项迁延不发，而我们已派去大批军事同志前去，须要计划与款项异常之急；最后外国同志听了一个不关重要的报告，认为我们自己在湖南的势力已完全瓦解，暴动为不可能，对于前次所决定之款完全翻腔。于是军部周恩来同志与（国际代表）鲁（罗）易大闹一场，取消此委员会。”

湖南暴动计划被取消后，陈独秀再也拿不出任何主张来，许多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越来越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结束了陈独秀错误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统治地位，主张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力量占据了领导地位，从而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八七会议的召开开辟了道路。

新的中央临时常委成立后，立即确定了组织民众武装起义的新政策。为了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到来，临时常委紧急组织大批共产党员撤退，把党的组织迅速转入地下。周恩来夜以继日地处理着各种复杂的问题，不仅完成了把党转入地下的任务，而且作为军事部长，积极筹划如何领导全党开展武装斗争，并向常委会提出建议。7月中旬，临时中央常委会决定，着手制定湘、鄂、赣、粤四省秋收起义的计划，并初步确定以党所掌握和受党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以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7月24日，临时中央常委会议最终决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顾问的建议，决定起义后部队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求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会议还决定切实制定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举行秋收起义。李维汉后来回忆说：

“‘七一五’后，党中央机关即转入地下筹划反击。临时政治局常委决定了三件事：一、将我党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织起义前敌委员会，领导起义；二、秋收季节，组织湘鄂赣粤四省农民起义；三、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时期的新政策。”

在向中共中央提出加强军事工作的同时，周恩来积极进行军事斗争的组织工作。他以湖北省委军委为基础，建立了中央军事部的领导班子，调聂荣

臻及王一飞、颜昌颐、欧阳钦等人为助手，负责对军队的组织、联络和政治工作。当时，有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群众汇集到武汉。他们中间有从国民党军队中退出来的，有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共产党人、革命群众的血雨腥风中冲杀出来的，有农民暴动失败后出来寻找党组织的。周恩来指示军委要找到这些同志，如朱德、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萧劲光、何长工等等，林彪也在其中。周恩来要求他们坚定革命的信念，不要被当前的困难所吓倒，鼓励他们转移到军事斗争方面来，并把这些同志分别安排到党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叶挺指挥的第二十四师，或是派到湖南等地的农民自卫军中去组织农民起义，有的通过关系派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做兵运工作，有的送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去工作和学习，还有的送到苏联去学习军事。周恩来的这一措施不仅为党保存了一大批干部，还为后来红军的建设聚集了一大批人才。他们之中，有的成了创建人民军队的先驱，有的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军事家、高级将领。为了斗争的需要，周恩来还把武汉总工会纠察队的绝大部分枪支和队员转移到贺龙和叶挺的部队里。为了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需要，从5月份起，周恩来就着手组建了以情报工作为主要任务的特科。一方面派遣一批党员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另一方面在国民党军队内发展了一批秘密党员从事情报工作。如叶剑英就是当时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秘密加入党组织的。在汪精卫、张发奎企图逮捕叶挺、贺龙，以及他们部队中的共产党员，破坏南昌起义的紧急时刻，叶剑英及时地把情报通报给了叶挺和贺龙，使他们迅速脱离了险境，从而保证了南昌起义的顺利进行。

周恩来积极主张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十分注重研究军事斗争的策略。他在召集吴玉章、刘伯承、黄慕颜、李嘉仲等四川籍同志座谈军事问题时，不赞成把党所掌握的武装西退四川的建议，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运动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目的在于求得中国之自由平等，任务在于推翻国内封建军阀的统治，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目前革命势力虽有分化，但革命洪流不可阻挡，终会浩荡前进。共产党人不达此目的，誓不终止。他强调，革命的武装要向基础较好的广东发展，西退四川是没有出路的，四川的封建军阀力量强大，而且日益反动。重庆“三三一”惨案和沪顺起义的失败就是明证。现在我们一遇挫折，怎能反而退依本欲打倒的对象呢？对于那些急于暴动，攻打大城市的同志，周恩来则劝说他们要做好准备工作，集中力量，听从党的指挥。当得知湖南农军准备从三面攻打长沙后，他即通知湖南的同志把部队“暂集中湘南”待命，“不作硬来”。在组织湖南暴动时，周恩来计划先取湘潭，集中浏阳、平江，然后全力攻下反动势力薄弱的城池，而在反动势力较强的地方则到各处打土豪劣绅，在可能的范围内成立乡村的临时委员会。对广东普宁农军起义失败后退到湖南汝城的部队，也要求他们不要到武汉这样的大城市来，要尽快返回湘南和汝城的农军合编为一个师，参加湖南的暴动。周恩来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武装起义如果没有一批有军事经验的同志参与组织领导，是难以成功的。因此，他尽可能把一批有军事经验的同志派到农军中去，作为暴动的骨干。

从周恩来这些军事活动中可以看出两个特点，一是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内土地革命战争的最早的领导者 and 组织者之一，其许多主张和建议虽然在当时并没有能够完全得到落实和实行，但对于党在以后领导军事斗争的实践，则起到积极的作用。二是在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始，周恩来

就注意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看到广大农民有着要求反抗剥削和压迫的强烈愿望，浩浩荡荡的农民自卫军是开展武装斗争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只要党能够把农民群众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武装斗争就一定会打开新的局面。周恩来探索中国土地革命战争规律的实践，从开始起就有了一个比较正确的基点，这对他以后的探索活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 二、领导和指挥南昌起义

决定发动南昌起义是在大革命失败后那种异常严峻的时刻作出的，是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中国革命的伟大壮举。6月中旬，汪精卫在郑州和冯玉祥会谈后，把北伐军撤出河南，他利用唐生智与蒋介石的矛盾，打着“东征讨蒋”的口号，把部队集中在九江、南昌一线与蒋介石抗衡，企图在和蒋介石的交易中增加几个筹码。其中，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所辖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是叶挺指挥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的第七十三团和第七十五团是以北伐时的叶挺独立团为骨干编成的，分别由共产党人周士第、孙一中指挥；第二十军是由接近共产党的贺龙指挥的。这些部队是党在大革命时期培植和给予重要影响的正规革命武装的主要部分，正集中在九江地区。在南昌还有受朱德指挥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的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市公安局的保安队。这正是举行武装起义的好机会。

临时中央常委会初步选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后，周恩来立即传达给在军委工作的同志，指定聂荣臻、贺昌、颜昌颐组成前敌军委，由聂荣臻为书记。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党内的同志，让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

在九江的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叶挺、聂荣臻等人开会讨论了中央的决定，一致同意立即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鉴于张发奎的态度日见右倾，提议“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会后，一面委托瞿秋白返回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告，一面开始陆续将部队调往南昌。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根据张发奎的政治态度，改变了“依张”的政策，决定立即发动南昌起义。

7月26日，周恩来化装成商人，在陈赓的陪同下，乘坐宋庆龄的汽车，秘密到达武汉江边码头，换乘江轮赶往九江。在九江，周恩来传达了中共中央正式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并针对与会同志讨论中发生的是否要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列入政纲的争论指出，应该以土地革命力主要的口号。会议同意周恩来的这个意见，并作出了决定。随后，又作了加紧把起义部队调到南昌集中的部署，并派聂荣臻到马回岭去，设法把第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

7月27日，周恩来到达南昌，住在朱德的家里。随后与先期到达南昌的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会面，并在江西大旅社主持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详细讨论了起义的有关问题，决定在7月30日晚举行武装起义。当天，叶挺和贺龙的部队也先后到达了南昌。第二天，周恩来到设在子固路的第二十军指挥部会见了贺龙。周恩来紧紧握住贺龙的手说：“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开门见山，我是找你商量起义计划的。我们立刻就谈行吗？”贺龙连连点头说：“好极了，我洗耳恭听！”周恩来大笑，指着贺龙说：“洗耳恭听是不够的。你是大将军，光动耳朵怎么成？还是要动手动脚动枪动炮呢！”随即周恩来向他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动南昌起义的决定和具体的行动计



划。举行起义是党的核心机密。周恩来在离开武汉时连邓颖超都没有告诉。那时，贺龙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这位靠两把菜刀闹革命起家的北伐将领，真心拥护共产党的主张。6月间，他在武昌会见周恩来时就曾明确表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班王八蛋拼到底。”这时，贺龙听了周恩来的转达后，非常激动，感激党对他的信任。他毫不迟疑地对周恩来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

正当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时，29日上午，周恩来接连收到张国焘从九江发来的两份密电，提出，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他到南昌后再作决定。周恩来在同其他前委委员商议后果断决定，暴动决不能停止，继续进行一切准备工作。30日早晨，张国焘到达南昌，前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张国焘提出两项条件：一是要有成功的把握，二是要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能起义。周恩来和其他委员都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表示：“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可停止。张（发奎）已受汪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在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张国焘看到自己的意见受到大家强烈的反对，就声称这是国际代表的意见。周恩来气愤地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激动他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二十多年后，他提及此事时说，“拍桌子这个举动，是我生平仅有的一次。”可见当时周恩来对放弃起义的错误主张是气愤到了极点。会议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争论，也未能解决问题。第二天早晨，周恩来主持前委会议，又继续辩论了几个小时，在得知张发奎已参加了庐山反共会议后，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委员们的意见。于是会议决定当晚举行起义，

8月1日凌晨，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国民革命军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国民党反动军队3000余人，于拂晓占领南昌城，取得了起义的胜利，按照中共中央事先的决定，为了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一切愿意继续革命分子，这次起义仍使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当天上午，在南昌召开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由25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委员。此外，还成立了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的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构。

起义军占领南昌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准备南下广东。当晚，周恩来主持召开参谋团委员会会议，研究南下的行动方案。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沿赣江南行，经樟树、吉安、赣州、韶关，直下广东。这是一条大路，所经地区比较富庶。另一种则主张由赣东经寻邹直取东江。周恩来认为，第一条路线虽然是一条大路，但也是敌人重兵驻扎的地区。吉安有朱培德的第三军，赣州有钱大钧部，广东的李济深可利用铁路将其主力集中到韶关一线与起义军决战。而张发奎余部1万余人也可能沿这条路尾随起义军南下，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有可能使起义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第二条路线虽然条件要差些，但是敌军的力量比较薄弱，我军可以避免敌人的主力直取广东的东江。那里有革命军两次东征和海陆丰农民运动打下的基础，起义军在那里很快可以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使兵力得到补充；汕头又是一个重要的海口，可以取得共产国际的接济。周恩来中肯的分析说服了大多数同志。最后会议决定取道临川（今抚州）、宜黄、广昌，直下广东。第二天，革命委

员会任命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贺龙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第二十军军长；叶挺代前敌总指挥兼代第十一军军长；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后因第九军军长韦杵未到职，朱德不久即任军长。这一天聂荣臻、周士第率第二十五师大部也赶到了南昌。周恩来听了聂荣臻汇报把队伍拉出来的经过后，很高兴，说：“行动很成功！我原来没想到这样顺利，把二十五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

为了早日到达广东，实现既定的方针，起义军没有很好地休息和认真进行整顿，也没有等候一些正在赶往南昌参加起义的部队，如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由国民政府警卫团改编的第二方面军警卫团等。从8月3日起，起义军陆续开始南下。为了保障南下的顺利，周恩来专门找了江西省委的负责人，向他们了解沿途各县农民运动的情况、地方反动武装的情况、宗族封建势力的情况，以及沿途居民的多少、有什么特殊的风俗习惯等情况。5日，周恩来写信向中共中央报告南昌起义的情况后，随革命委员会机关撤离南昌。这以后，前委和中央的联系就中断了。

起义军踏上南征的道路后，各种艰难和挫折接踵而来。蔡廷楷部第十师突然脱离起义部队，一下拉走了将近1/4的兵力。8月的江西正是酷暑季节，起义军携带着大批从南昌缴获的辎重，在崎岖的山路上行军，天气热得使人难以忍受。加上反动派的造谣，沿途居民大都逃散，连食物和茶水也难以买到。一路上起义军官兵病倒和脱队现象十分严重。7日起，起义军陆续到达临川。周恩来和前委决定在这里休息几天，对部队加以整顿，并送给当地农民协会一批武器，鼓励他们就地开展武装斗争。为了解决部队经费的困难，周恩来决定改变原来派款、借款的办法，实行征发地主的粮食、没收豪绅反动派的财产和对土豪劣绅罚款的新政策。之后部队继续南进。为了巩固部队，周恩来把追赶上起义部队的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党委书记陈毅派到第七十三团任政治指导员，加强这支党最早建立的武装力量的政治工作。他对陈毅说：“派你干的工作大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爽快地回答：“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周恩来的这一人事安排，后来被证明是非常具有远见卓识的。当起义最终失败时，陈毅到这支部队的时间虽然很短，但由于他迅速整顿了党的组织，并把广大起义官兵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巩固了部队，使这支铁的队伍在朱德和他的率领下保存了下来，第二年春天，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师，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起义军矛头所向直指广东。盘踞在两广的军阀李济深大力紧张，急忙调集七个师的兵力全力堵截起义军。在赣州的钱大钧部9000余人向东推进，企图在瑞金、会昌一带截击起义军。黄绍竑部约9000人也正由赣州经雩都向起义军逼近。26日，起义军在瑞金以北的王田市将钱大钧的两个团击溃，乘胜进占瑞金。起义军从缴获的文件中得知钱大钧和黄绍竑准备在会昌集结18个团的兵力与起义军决战。此时，钱部主力已集结在会昌一带，黄部正在赶往会昌的路上。周恩来主持召开参谋团会议研究对策。当时敌军在会昌的部署是：钱大钧的3个师为主力，在会昌城东北地区及城西之岚山岭、寨亲构筑工事防守，环绕会昌城的贡水沿岸也构筑了工事。黄绍竑部前卫2000余人已到距会昌城以西100余里的白鹅一带，与会昌成犄角之势。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决定首先击破会昌之敌。由第二十军从东北面向会昌发起攻击，吸引敌

人的注意力。主力第十一军从西北面向会昌发起攻击，切断钱大钧部的退路，并攻占会昌城。30日，起义军发起进攻。周恩来、刘泊承、叶挺、聂荣臻等来到担任主攻的第十一军阵地前沿指挥战斗，周恩来问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和党代表李硕勋：“部队是很疲劳，可是会昌一定要打下来。你们有没有把握呀？”周士第和李硕勋都表示：“我们向党保证，一定打下会昌。”经过反复冲杀，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阵地，下午5时，起义军攻入会昌城，歼敌6000余人，钱大钧带着剩下的残兵败将落荒而逃。在会昌，周恩来从敌人的报纸上得知，原第二十军参谋长陈浴新叛变投敌后，将南昌起义的经过以及起义军南征的目的和进军路线都出卖给了敌人。起义军的行动已全部暴露。他立即主持召开前委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大家认为，李济深已在寻邹一带集结了重兵阻截起义军南下广东，如继续走寻邹这条路，不仅要和强敌作战，而且都是山路，运输困难，大批的伤员和缴获的枪支弹药也无法携带。而福建方向的敌人兵力比较空虚，如出长汀、上杭，则行军阻力较小。于是前委决定，部队改由长汀、上杭入东江。9月2日，黄绍竑部5个团从洛口进攻会昌，企图牵制起义军东进，被起义军击溃。起义部队向长汀进发。在瑞金，贺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组织上对贺龙很了解，贺龙同志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很不容易。多年来，贺龙同志积极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他还说：“贺龙同志是个好同志。”50年后他仍然记得这句话，并在贺龙的追悼会上重说了一遍。

9月5日，起义军到达长汀。周恩来在这里向中共中央写了起义后的第二个报告，汇报离开南昌后部队在瑞金、会昌与敌人作战的经过。他写道：“经此两战，我虽胜敌，但兵员与子弹之缺乏，实成为人潮梅后必生之最大困难”，提出“我方目的在先得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如情势许可，自以早取广州为佳”，并要求“电知粤省委号召东江潮汕工农响应一切，以巩固工农政权及其武装。”报告还促请共产国际在起义军取得潮汕后，设法接济武器弹药和支援经费。报告由秘书陈宝符化装成商人，经过半个月的辗转到达上海，送交中央。

在长汀，周恩来再次召开前委会议，对攻取东江的计划进行再一次的详细讨论。会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周恩来和叶挺提出，潮汕地区敌军兵力空虚，又无险可守，预计我军可以不战而得。如果以主力取潮汕，然后还要折回经兴宁、五华进取海陆丰。这样主力军出潮汕不仅劳而无功，而且延误了时间，使敌军有可能赶在起义军之前集中兵力，抢占有利地势攻击我军。所以，应“以主力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以小部分军力（至多两团）趋潮汕。”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为代表的另一种意见则担心敌人死守潮汕，起义军如果久攻不下，就难以尽早得到共产国际的援助。因此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坝监视梅县之敌，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当时大部分军官经过长途艰苦行军作战后，都希望能早点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地方休息，因此都赞成第二种意见。周恩来没有能够坚持住自己的正确主张，于是决定采取后一种方案。以后的事实果然如周恩来和叶挺所预料的那样，这一错误的决定是后来起义军迅速失败的直接原因。

9月10日，周恩来和彭湃率领一个团先行进入上杭，听取了福建省委宣传部长罗明的报告后，向他介绍起义军下一步的任务主要是打到潮汕，同海

陆丰的农民斗争会合起来，建立革命政权和根据地。当周恩来知道闽西地区有党的组织和农会组织时，便要求他们积极协助起义部队，并拨出几十枝枪给他们作为发展武装斗争的基础。离开上杭后，部队进入广东。19日，起义军进占三河坝。三河坝是汀江、梅江和韩江的合流处，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起义军按照长汀会议的决定，在这里实行了分兵，由朱德率第十一军的第二十五师等部留守三河坝，监视在梅县的钱大钧部，掩护全军的侧背；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其余部队进军潮汕。第十一军是由第二十四、第二十五师组成的。这两个师是由叶挺独立团发展起来的，是起义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三河坝的分兵把这支部队拆开，使起义军的战斗力受到很大的削弱。23日，起义军进攻潮州，守敌一触即溃，起义军顺利占领潮州。第二天起义军进驻汕头。周恩来回到了离别一年多的城市。

汕头是起义军南下的重要目的地之一。起义军占领汕头后，想先在这里站住脚跟，因此，一入城就着手建立革命政权，恢复社会秩序，肃清反动分子，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当地农民武装。与此同时，敌人则倾全力对付起义军，重兵悄悄地在潮汕地区周围集结。敌军兵分三路，第一路由陈济棠率领粤军主力3个师又1个旅由西向东进攻。这一路敌军乘起义军直入潮汕的机会，抢先占领了揭阳西北汤坑（今丰顺）一带的有利阵地；第二路由黄绍竑率领桂军两个师从粤北渡过韩江上游，从北面向南进攻起义军的后背；第三路则由钱大钧率领，前出到梅县以东的松口一线，监视并牵制留守三河坝的起义军。而更为严重的是起义军对周围的敌情并不了解。26日，起义军再次分兵1000余人留守潮汕，主力6000多人则西进揭阳，迎击从广州来的敌军，并乘机向海陆丰发展。揭阳的北部是一片丘陵地带，起义军作战十分勇猛，很快就击溃了王俊的警备旅，并夺取了薛岳的新编第二师所控制的一片山地。起义军从缴获的文件中得知敌军的后续部队远比预计的要多，而且陈济棠所率两师已经赶到并占领了有利地形。起义军继续与敌人展开激战。经过连续三昼夜的苦战，起义军伤亡已达2000余人，弹药也将用完，无力再战，于30日凌晨主动退出战斗，撤回揭阳。敌军也因伤亡3000余人，同时后退，不敢追击。当起义军与陈济棠部苦战之时，黄绍竑部9000余人已绕到起义军背后，于30日向潮州发起突然袭击。起义军无险可守，寡不敌众，战至当晚撤离潮州，汕头也随之放弃。

周恩来在广昌时就因连日操劳而生病，一个多月来，又不断为起义军的作战行军、前途、党的工作、地方工作、政权建设等等日夜操劳，这时已重病不起，撤出汕头就一直被担架抬着行军。10月3日，前委机关和从汤坑前线撤下来的部队在普宁县的流沙会合。周恩来和其他领导成员在这里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郭床若回忆这次会议时说：

“主要是恩来作报告，他是在发着疟疾的，脸色显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了一下。”“把这些失败因素检讨了之后，接着又说到大体上已经决定了善后的办法——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理，向海陆丰撤退，今后要作长期的革命斗争。这工作已经做得略有头绪了。非武装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已经物色了好些当地的农会会友作向导，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分头赴香港或上海。”

这时，周恩来发高烧到40℃，一些人劝他离开部队。周恩来坚决他说：“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你们快走吧！”

会后，起义军继续向海陆丰前进。周恩来由担架抬着拉在队伍的最后面。当部队行进到乌石地区时，遭到敌重兵的截击，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指挥部队奋起还击。不久部队逐渐失去控制，很快被冲散了。周恩来发着高烧，常常处于昏迷状态，有时神智不清，还在喊：“冲啊！冲啊！”聂荣臻和叶挺始终守在他身边，但是路下熟，话不通，几个人总共只有一枝小手枪，连自卫能力都没有。他们设法找到了当地党的负责人杨石魂，帮助他们隐蔽了下来。之后杨石魂又找了一条小船，送周恩来一行去香港。后来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到这段经历：

“那条船，实在大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三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起义军经过两个多月的征战，由于种种原因最后终于失败了。其经验与教训概括起来有两点：一是大革命失败后，新的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制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土地革命的历史性转变，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方向这一重大的问题。南昌起义是最早实行党的总方针的一次伟大壮举，由此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因此，正如周恩来所评价的那样：“八一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这在大方向上是对的。”周恩来在这一问题上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怎样领导武装斗争？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说要比前一个问题困难得多。因为第一个问题可以从历史的经验、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中寻得答案，而第二个问题既不能从马克思和列宁的书中找到答案，也没有历史的经验可以借鉴。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有理论上的探索，更重要的是需要实践。鲁迅先生曾说过：“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探索武装斗争的道路也是同样的道理，这条路，不是仅仅迈出一两步，或是由一两个人就可以走出来的，它必然是一个需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长期的探索过程，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探索这条道路的关键是要解决把武装斗争的中心，也就是党的工作中心放在城市还是放在农村这样一个核心的问题。从临时中央常委会到八七会议，党的斗争策略是无论农村还是城市，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就要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周恩来领导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后来到武汉，即着手组织湖南农军的暴动。临时中央成立后，周恩来在积极筹划南昌起义的同时，竭力主张发动湘、鄂、赣、粤四省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并要把南昌起义的队伍带到海陆丰与当地的农军相结合，建立工农政权。

当时，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还未能明确提出把党的工作中心放到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和政权，是有其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

第一，城市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活动的中心，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战争的最后胜利都是以夺取城市为标志的。中国的武装斗争也不例外。当时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要经过漫长的农村斗争，直到 21 年以后才开始攻取大城市，夺取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二，工人阶级诞生于城市，世界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从巴黎公社起义到十月革命的胜利，无不是从城市开始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把工作的中心放在农村，要实现这样的思想转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人、工农红军、革命人民几乎经历了十年艰难曲折的土地革命战争，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才使全党从根本上实现了这一思想转变。

第三，孙中山从几乎一无所有，几经失败，最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在广州站住了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共产党人积极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的乡村和城市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掌握着几万革命军和拥有数以十万计农军的条件下，想要重演历史的一幕，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进行第二次北伐，这是很自然的。

第四，中国共产党人，包括周恩来在内，都还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还认识不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土地革命战争的规律，需要在实践中经过许多次的胜利和失败的反复比较，经过不断的艰苦探索，才能逐步得出正确的结论。

周恩来深刻总结了这次起义失败的教训，他说，当时武装暴动的思想，不是马上就地深入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然而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周恩来在当时都已经开始重视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了。因而，当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失败后，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要把队伍带向农村，以求建立工农政权，准备长期开展武装斗争。周恩来即使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躺在担架上也坚持要带队伍到海陆丰去，开展农村的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但是历史把毛泽东留在了农村，留在了战争实践的第一线，而把周恩来送到了城市指导全国的武装斗争。远离战争实践的客观环境，必然会对周恩来的思想发展产生影响，尽管如此，周恩来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在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土地革命战争规律的伟大实践中，为创立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 三、指导创建红军和建立根据地

在起义队伍南征广东时，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制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通过了中央临时常委制定的秋收起义计划，实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指导方针的重大转变。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新时期。周恩来虽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9日的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又决定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之后中央又任命周恩来为中共南方局成员和南方局军事委员会主任。

11月上旬，周恩来大病初愈就赶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指导下进行。这次会议受到罗米那兹的“左”倾错误观点的影响，强调要“无间断的革命”。错误地规定了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虽然决议也提出了领导农民暴动，实行农村割据；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耕种；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等正确主张，但是却强调“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在中国共产党内激起的强烈仇恨和复仇情绪，也助

长了“左”倾思潮的滋生。这次会议使“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会上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委因南昌起义的失败而受到“警告”处分，周恩来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不久又在中央常委下设的组织局任主任，领导组织、宣传、军事、调查、特务、交通、文书、出版分配等项工作，实际上担负起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在此期间，他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 （一）组织指导各地的武装起义和创建红军

周恩来积极参与指导了全国许多地方的武装暴动。他在香港养病期间就出席了广东省委研究广州起义的会议，到中央工作后又继续指导广州起义的各项工作。他指示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坚持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武装斗争。他向中央建议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的队伍，积极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扩大武装割据的局面。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他提出：湘鄂赣边界的割据区域要连贯起来。朱德军队要坚决留湖南，向茶陵发展为好。毛泽东的部队还是在遂川。军队的调遣由两特委协商。根据贺龙的请求，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派贺龙、周逸群回湘西开展武装斗争。临行前，周恩来请贺龙、周逸群吃饭，他告诉贺龙：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徐特立、柳克明为委员，要按照“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的方针，发动群众，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并由他们两人负责组织湘鄂边前敌委员会，3月下旬，贺龙等在湖南桑植组织起工农革命军，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1928年1月27日，周恩来在起草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的信中说：“中央认为广东全省暴动的布置除海陆丰的发展、北江的发动以外，应特重琼崖的割据，中路的斗争，西江的响应，以及香港、广州工人斗争的发动。”他还在信中着重指出：“在暴动割据的局面中，省委要十分注意于工农武力的创造。”

周恩来还参与指导了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广东、福建、陕西、云南等省的武装暴动工作，为了加强党对军事斗争的领导，他还选调了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到苏联去学习军事，为党培养军事斗争的骨干，如叶剑英、刘伯承、萧劲光、刘伯坚、李卓然、傅钟、曾涌泉、郭化若等等。在武装暴动的基础上，各地的革命武装逐步组建成了最初的工农革命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武装暴动的硝烟中诞生了。

#### （二）纠正武装暴动中的“左”倾盲动错误

武装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是非常复杂、细致和周密的，搞得不好，不仅不能推动革命，反而会使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力量受到削弱。周恩来有组织领导武装起义的实际工作经验，深深懂得这一点。他在指导各地开展武装斗争的实际工作中，发现许多地方根本不具备武装暴动的条件，因此注意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制止和纠正。

1927年12月6日，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批评共青团内存在的先锋主义倾向，指出，上海党部近来实在有点军事投机——冒险，为的是怕青年团说是机会主义，被小孩笑话。如青年团不注意，青年团将变成冒险主义，走到虚无主义的另一面去。青年团大部分人主张“试验”，认为失败也不要紧，这也是孤注一掷的错误，这个危险可以牺牲许多同志，此点要注意。12月24日，在政治局讨论共青团湖北省委控告罗亦农和长江局制止湖北10月举行暴动的会议上，周恩来再次批评共青团组织中的冒险主义错误。他说：估量时局，青年团实有“无动不暴”的意见，可见他们的暴动观点并未成熟。

翌年1月3日，在周恩来参加下，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湖北党内问题的决议》。决议肯定了罗亦农在长江局“反对马上暴动是对的”，批评了部分同志不顾及实际条件就决定总暴动，“是有玩弄暴动的危险的。”指示湖北省委应停止原定的两湖年关总暴动计划，并对两湖的暴动重新加以部署，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应迅速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民主政权。

12月18日，周恩来在起草《中共中央致浙江省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各县农暴还未发动群众使土地革命深入，便先计算到扑攻省城，这不仅客观事实不能做到，即在主观上勉强去做也必是专靠几杆枪的军事投机行动。”“暴动计划因为太不切实故中央未予核准。”强调浙江省委的工作重点在于迅速恢复和建立党和工农群众组织，并指导他们“发展广大的乡村游击战争和城市工人的日常斗争。”“只要有了得力的党的组织的领导，割据的暴动局面可以创立起来的。”

12月29、30日，周恩来在起草《中共中央致硕夫（尹宽）和福建临时省委的指示信》中，对“暴动”再次加以完整的阐述。他说：“凡是斗争就认为暴动的观念要纠正过来”，“暴动这一名词必须用在群众斗争发展到最高点以武装形式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这一意义上。至若城市工人带有武装性的斗争，或是乡村农民非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都不得谓之暴动”。1月8日，周恩来再次起草《中共中央致福建省委的指示信》，信中指出，福建省委“所决定的暴动条件，既缺少主观力量的估计，又没有农民群众激烈斗争的事实，这样子便贸然说‘闽省的暴动条件已十分成熟了’，实在是一个错误。”“斗争还没有起来，暴动便先决定，不是误解暴动，便是玩弄暴动。”不久他又在中央致福建临时省委的信中强调：“福建目前总的任务是发展城市工人群众的日常政治经济斗争，领导乡村农民自发的斗争并谋扩大，指导他们以党的游击战争的战略，土地革命的政纲，由日常斗争而达到工农暴动的割据局面，夺取政权，推翻乡村封建统治。”

1928年1月2日，周恩来在起草《中共中央致陕西省委的指示信》中给暴动规定了四个条件，他写到：（一）驻地附近要有群众运动，要有工农的坚强组织；（二）要有党的领导；（三）要能造成一个暴动的割据局面；（四）要较有胜利把握。2月8日，周恩来在起草《中共中央致云南临委的指示信》中，再次对这个问题加以说明，他说：“不能空想一个总暴动之来临”，“暴动的发动是要在工农群众继续不断的争斗中才能产生，暴动的时期也要依着环境情形、斗争程度、革命情绪、组织力量如何而定，决不能在斗争还没有起来的时候便预定一个期限认准三月后便可发动暴动。”

1月28日，周恩来在起草《中共中央致江西省委的信》中，批评省委准备在南浔路沿线举行暴动并造成割据局面的布置是不妥当的，因为“南浔路路工、九江城市工人、南昌工农群众的斗争，尚未达到剧烈的发展，兵士运动尚没有成绩的时候，这一沿路暴动必致流产，必致引起统治军阀更残酷更广大的屠杀，必致影响全省割据的发动而削弱了党在南浔路一带的力量。”暴动应该在客观主观的条件齐备之时才能举行。

周恩来还在指导江西、广东、江苏等地的工作时，努力纠正当地党组织盲目要求暴动，强迫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和盲目烧杀的错误，使党和群众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周恩来不仅科学地解释了“暴动”的含义，而且具体规定了举行暴动所必备的条件，这为全党组织武装暴动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克服党在武装暴动中的“左”倾盲动错误起到



了积极作用。

4月下旬,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不断革命”的主张是错误的,强调党在目前的任务是“征取千百万的工农群众”,纠正“工人阶级某种成分之中的盲动主义”。这就从政治上纠正了党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为此发出了通告,使“左”倾盲动主义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周恩来连续起草了几个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对国民党统治区秘密工作和红军工作作了新的指导。

共产国际的决议案虽然认为中国革命运动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当时还没有全国范围的新的新的高潮,但却强调“正走向这种新的高潮”,因此“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可见这种纠正是不彻底的,对中国共产党彻底纠正“左”倾错误起了消极的影响,以至于不久再次出现“左”倾错误,使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内有很长一段时间被“左”倾思潮所困扰,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惨重的损失。

经过这一阶段的工作,周恩来在指导中国革命特别是各地农村武装斗争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中国革命因为农民占了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与俄国的不同,由此发生一个不平衡的发展问题/因此,他在给各地党组织的指示信中多次强调要把农村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结合起来,夺取政权,实行武装割据,并努力扩大这种局面,为在实际工作中纠正党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这时周恩来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认识到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只是在战术上,即在党的具体工作上提出纠正军事冒险的错误。因为在对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认识上,对党的工作中心应放在什么位置的问题上还没有摆脱罗米那兹和瞿秋白的影响。1928年1月6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我的观点是:客观条件的充足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是暴动的布置及区域问题,同时只靠客观条件是不够的,主观条件也要重视。”2月12日,在中央常委召集政治谈话会,讨论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估量问题时,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认为自去年11月9日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中央的政策的确是进步的,自然很多地方有盲动现象,对此中央仍在奋斗,但我们不能因为政策及运用政策的方法而怀疑到革命潮流是在低落,这是不正确的。”虽然他重视农村的武装斗争,仍然认为:“中国现在革命的发展,事实上形成特殊的方式:‘农民割据’但“这种割据局面必须发展大城市的中心。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就要在这上面表现坚强起来”。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革命转入到土地革命后,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革命进入新的阶段,共产党在思想上、方针政策上都应该随之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还必须建立在对中国革命形势进行系统的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身为中央组织局主任的周恩来,担负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还难以集中精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回答这些新问题,因而也受到共产国际“左”的观点影响,认为“中央的意见是革命潮仍是高涨的,但不是一个最高潮。我以为现在还是这样解释。”其次是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曾出现过一种悲观的论点,这使周恩来产生一个顾虑,总担心说革命潮流低落会在党内滋长灰心、沮丧的情绪,对革命的推进产生消极的影响。

### （三）总结创建红军的初步经验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和八七会议以来的党的工作，制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28年5月初，周恩来化装成古董商与邓颖超一起从上海出发，经大连、哈尔滨赴莫斯科，筹备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期间，周恩来承担了筹备会议的大部分工作。

6月9日，斯大林会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等同志，讨论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等问题。斯大林谈了三点意见：一、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二、目前我们不能说中国革命已经处于高潮，革命高潮是将来的事，而不是眼前的事。三、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最重要的结果，是创建红军。如果能够把参加农民运动的人们争取过来，并且集中部队打下几个城市，那末，这将对今后的局势有更大的意义。但是在任何时期，农民都不能领导工人和革命。革命必须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革命正处低潮的看法是正确的。他的谈话，使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了明确的指导方向。斯大林一方面指出中国的红军是土地革命的成果，但另一方面由于对中国的具体情况缺乏了解，提出了集中红军打下几座城市的看法，则是不符合实际的，并且成为一些“左”倾观点的依据。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6月18日在莫斯科召开。周恩来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主持会议的全部日常工作，任务异常繁重。他还在大会上作了两个重要报告：组织问题报告和军事报告。周恩来在军事报告中主要讲了两个问题：

一是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党的军事工作的经验教训。周恩来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党在军队政治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也严肃指出党在军事工作中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观念：“为了联合战线，不能破坏国民革命军，而要帮助国民党巩固国民革命军”。“这种巩固国民革命军的工作方针，就是根本取消了我们自己独立的军事工作的意义。”“没有尽力发展工人纠察队，没有将农村中的农军发展起来，来做夺取乡村政权的力量。”结果蒋介石一叛变，革命便遭受到严重挫折。

二是关于建立红军的问题。他在报告中说：建立红军的原则，一、是要把旧军队的雇佣性质加以改变，可先采取志愿兵制；二、是军官不一定非工农分子不可，但一定要无产阶级化；三、是红军一定要有政治工作。他还强调，红军一定要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否则就“失了红军的阶级基础”。在指出红军的行动和任务时说，红军建立后，不是保守在一个地方，而是要移动的，这与赤卫队的常在一地是不同的。红军要帮助苏维埃政权的发展。

他在报告中还指出，党的“目前任务在夺取成千成万工农群众，在军事方面，开始军事组织，军事技术工作。”“在现在中国军事新局面下，武装暴动准备是非常重要的。在准备武装斗争（中），军事力量是主要原素。”

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军事斗争上来，周恩来还组织“六大”的代表们进行军事训练。还请正在苏联伏龙芝军官学校学习的刘伯承当教官，对代表们进行队列训练、射击训练和巷战训练等，提高代表们对全党要注重军事、学习军事的认识。会后，周恩来专门看望了在苏联学习军事的干部，向他们传达了党的“六大”精神，鼓励他们努力学习，还查看了他们的档案材料，考虑他们回国后的工作安排。

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又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并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此外，周恩来还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使周恩来对中国武装斗争规律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他到莫斯科后，生活和工作环境比较安定，可以集中较多的精力来研究党的军事工作和红军建设的问题。他还抽出时间参加部分“六大”代表组织的南昌起义讨论会，在总结南昌起义军事上的教训时说：“主力下潮汕是错的。到汕头后忽略了军事。”他还请联共（布）军委代表座谈讨论中国革命中军事工作的中心任务，红军的建立、编制，军队中的党组织和政治工作等问题，从中获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受到了不少启迪。因此，他的军事报告能够对大革命失败在军事工作上的原因作出深刻的分析，对党在新的历史阶段军事斗争的中心任务、红军的建军原则、红军的任务、红军的政治工作等一系列问题都作了科学的阐述，为党的“六大”决议提出的：“建立工农革命军，在现时游击战争发动的区域，是可能而必要的……应当是党在农民运动中，所应特别注意的中心问题”，农村“游击战争将成为主要斗争的方式，党必须积极领导”等思想提供了理论根据，对进一步推动农村游击战争的开展和创建红军有重要意义。军事报告是一个成功的报告，标志着周恩来在探索中国土地革命战争规律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 （四）指导红军渡过创建时期的难关并健康发展

11月初，周恩来回到国内后，以主要精力首先恢复和重建在大革命失败时遭受严重摧残、又在“左”倾盲动错误中遭受新的损失的党的各级组织。同时，周恩来也非常重视党的军事工作。当时，在农村的红军正处于初创时期的极困难阶段。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刚刚夺得全国政权，与各地军阀的矛盾还没有激化到发生战争的程度，因此，可以调集较多的力量镇压各地的武装起义和“清剿”建立工农政权实行武装割据的红军。许多地区的武装斗争遭到失败和严重挫折。如实力较强的海陆丰地区的工农政权和红军在强敌的进攻下遭到失败；海南岛的人民革命军战斗接连失利，特委书记杨善集、司令员冯平等主要领导人先后牺牲；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在湘南遭到“八月失败”，损失严重。红军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异常艰难的时期，急需党中央及时给予正确的指导和帮助。根据这种情况，周恩来要求中央秘书处，侈到苏区送来的文件要首先办，抄好后立即送交中央。这些文件总是他第一个看，大多也是先由他提出意见在中央讨论的，因为当时中央一些领导人仍不重视军事工作。192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重新设立军委，由杨殷任部长，不久杨殷因叛徒出卖牺牲后，周恩来又继续兼任军事部长的职务。2月，中央发出经周恩来修改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党员军事化的通告。强调军事工作对整个革命斗争的重要意义，提出“以实现党员军事化的口号，做整个军事工作的核心，整个军事工作能否做得有力，完全要视党员军事化的程度以为断。”

周恩来积极贯彻中共“六大”关于农村中“游击战争将成为主要斗争的方式”的精神，指导各地红军的武装斗争。他在起草《中共中央致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暴动是革命斗争发展到了最高峰的一种群众武装推翻反动阶级、夺取政权的直接行动。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一

种直接革命的形势。”但是对“农民暴动的直接行动，我们不但不应加以阻止，且应对农民自发的暴动极力加以领导，对农民的武装斗争极力加以扩大，使群众对于推翻豪绅乡村统治、建立农村苏维埃的观念日益明了与热望其实现。”“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故你们此时主要的任务，还在游击区域之扩大，群众发动之广大，决不应超越了主观的力量（主要的还是群众的力量，不应只看见武装的力量），而企图立刻占领中心工商业的城市。”他中肯指出：“红军拟向下游发展，将来以湘西之常德或鄂西之宜昌为目的地，这种计划还太大而不切实。”“游击战争的发展，应该是向农村阶级矛盾与斗争到了更激烈的地方，党与群众的组织有相当基础的地方，以及给养丰富、地势险峻的地方为最宜。不过这些条件很难俱备，你们可斟酌实际环境，取这些条件最多者而选择之。”

周恩来非常注意运用红军在斗争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经验去指导各地农村的游击战争。1929年2月7日，他在起草《中共中央致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特委的指示信》中，请朱德、毛泽东“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不久，他就把这些经验传往各地红军。在给贺龙的信中写到：“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每连建立一个支部，连以下分小组，连以上有营委、团委等组织。因为每连都有组织，所以在平日及作战时，都有党的指导和帮助。据朱、毛处来说，这样组织，感觉还好，将来你们部队建党时，这个经验可以备你们参考。”6月15日，他再次向贺龙介绍了毛泽东和朱德提出的包括“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在内的游击战争指导原则，指出：“这些经验很可以作你们的参考。”1929年7月底，周恩来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军事会议，与各地红军负责干部讨论研究红军的性质、发展方向、游击策略和组织机构等问题，交流红军建设的经验。

为了加强红军的建设，周恩来把一些有军事斗争经验的干部送往苏区，但远远不能满足部队的需要。1929年夏，周恩来主持举办中共中央军事训练班，培训红军急需的军事干部和政工干部，派往各红军部队。如许光达、孙一中等派往洪湖苏区工作，徐向前等派往鄂豫皖苏区工作，刘安恭、郭化若等派往红四军工作。为了提高红军的技术水平，周恩来还为党和红军培养了一批无线电通信技术人才。此外，周恩来还组建了情报机构、秘密交通站，并指示有关省委在苏区周围各县建立了一批文具、百货、布匹、药材、电器商店，为苏区提供物资支援。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红军战胜创建初期的严重困难，取得了显著的发展。

在指导农村游击战争的过程中，周恩来也有过一些失误。例如红四军于1929年1月中旬撤出井冈山根据地后，遭强敌尾追，多次战斗失利。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个反映情况的报告。而当时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容易被敌人消灭，并且会妨害老百姓的利益，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缩小目标。根据国际的指示及杨殷的报告，周恩来曾写信给毛泽东和朱德：“你们应有计划地有关联的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中央这一指示，主要的条件是根据于目前全国的政治形势，需要发展农村广大的普遍的斗争，所以采取这一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的政策。”“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当

时红四军正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需要坚强的领导人亲自掌握部队，闯出一条在农村坚持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的道路来。朱毛如果离开红军，只能削弱红军的力量，不仅土地革命无法开展，甚至可能使红四军遭到失败。

产生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当时工农红军诞生不久，本身的战争实践还不足以回答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遇到的急需解决的一系列理论上、政治上、策略上、方法上的问题。因此，周恩来同党内绝大多数同志一样，还没有完全确立党的武装斗争的中心应放在农村的基本思想。对农村斗争和武装割据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估计不足，认为农村的武装斗争要以城市为中心方能长期存在。他说：“中国游击区域割据的形势是存在的，问题是要有城市的领导。城市工作一旦发展，割据局面一定可以发展到固定方面。”毛泽东曾批评说，当时中央的主要思想是“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二是客观环境恶劣，中央和各地红军不能保持通畅而及时的通讯联络。中共“六大”之后，周恩来几次派人给红四军前委送信，一直没有收到回音，对红四军的情况缺乏了解，十分焦急。周恩来给毛泽东和朱德的信就是在情况不明以及红四军处于最困难的时候写的，而毛泽东、朱德收到信的时间是两个月以后，这时红四军已取得了在大柏地歼灭追敌刘士毅一个旅大部，并和赣南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胜利会合，渡过了转战赣南闽西的困难阶段，并站住了脚跟。信中对形势的估计也自然不会符合两月之后的情况了。当时形势的变化是很快的。1928年底至1929年初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开始出现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这个世界最大市场中的矛盾日益突出，他们在中国的利益的代表——各军阀之间的冲突也日益激化，军阀之间的战争“终不可免”。处于秘密工作状态下的周恩来虽然难以预测军阀战争爆发的时间，但是他又及时写信给毛泽东、朱德，指出红军目前的总任务是，扩大游击战争范围，发动农民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如毛泽东、朱德一时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不再坚持要朱毛离开红军。三是周恩来没有处于农村斗争的实践之中，对于农村斗争的规律还不甚了解。当敌人集中兵力对根据地实行“清剿”时，不仅分散的红军很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而且农民在土地革命中获得的成果和红色政权也都会丧失，使红军失去了生存的依托。因此，在强敌进攻面前，红军只有集中力量，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粉碎敌人的“清剿”，保卫翻身农民的利益和新生的红色政权，才能使土地革命真正深入发展，使红军有赖以生存和发展壮大的土壤。毛泽东概括的“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这一开展农村武装斗争的基本原则，还没有被大多数人所认识，在城市工作的同志就更难以了解其中的重要意义。

#### 四、阐明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

坚持深入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的工农民主政权，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红军及其党组织长期在农村游击

战争的环境中活动，其主要成分来自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这就使党的组织和红军受到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个人主义、主观主义、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等。这些错误思想极大地妨碍了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妨碍着红军的发展。在农村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红军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与此紧密相关的是红军长期处于敌强我弱、四面受敌的恶劣环境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军事斗争策略，实行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同样也是关系到红军的生存、巩固和发展的重要问题。从党中央到各根据地的党组织和红军的领导人都在进行艰苦的实践和探索。

毛泽东在领导根据地斗争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党和军队的建设。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针对红军中农民成分占多数的情况，毛泽东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强调必须在党内和红军内进行政治教育，努力提高红军指战员的阶级觉悟，自觉为工农阶级而战。毛泽东、朱德等提出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农村武装斗争的基本原则，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这对红四军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红四军受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长期的，错误思想也不是在短期内能够消除的。红军在频繁的战斗中，有胜仗也有败仗，急需从中总结指导战争的规律。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直萦绕在红四军领导干部脑海中，经常需要讨论研究。毛泽东后来在概括这段历史时说：当时“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干部，在总路线上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于党怎样领导军队，军队在农村怎样开展武装斗争。

1929年5月，中央派刚从苏联留学回国的刘安恭到红四军工作，刘安恭参加过南昌起义，又到苏联学习过军事，一到红四军就受到推崇，前委任命他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和临时军委书记。但是刘安恭不了解中国红军的发展历史和斗争实况，又未能深入考察红军的实际情况，而是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在他主持的一次临时军委会议上，竟错误地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前敌委员会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负责对某一区域实行党、政、军的一元化领导，成员都是由中央任命的。刘安恭主持军委作出的决定违反党的组织原则，是非常错误的。以临时军委问题为焦点，使红四军内本已存在的有关党对军队的领导、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等问题的争论加剧起来。为了解决矛盾，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临时军委，改由陈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但是组织措施解决不了思想认识问题。6月下旬，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打算通过总结建军以来的经验，解决以上问题。但是红四军内大多数的同志对如何建设红军的问题，无论是斗争实践，还是政治经验都还很不充分，认识上还不可能产生飞跃。结果会议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留在闽西指导地方工作，红四军随后出击闽中和广东梅县，接连遭受很大损失。刘安恭也在梅县战斗中牺牲。红四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

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红军第四军，在全国的红军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中共中央负责军事工作的周恩来自然对这支部队的发展一直是十分关心的，竭尽全力给予指导和帮助。对于红四军的这一场争论，周恩

来从一开始就给予极大的关注，但由于当时通信极为困难，对红四军的情况很难得到及时和具体的了解。1929年6月12日，在周恩来的建议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红四军的情况。周恩来指出，全国军阀混战的局面将有可能延续一个较长的时间，这对于红军的发展是一个难得的极好机会，需要红四军来一个得力的同志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详细研究红军如何发展的问题。8月上旬，中共中央收到了红四军前委关于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红四军的情况。周恩来认为，这是历史上很久以来意见不同的冲突，因为他们工作很努力，故未大的爆发。应和即将来中央的陈毅讨论后再作整个的回答。目前应去一封信勉励他们，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已解决的问题不应再争论。

8月21日，周恩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起草了一封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的信——八月来信，对红四军党内争论中涉及的一些原则问题作了比较全面正确的阐述：

一“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负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要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

二“在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尤其是目前环境中之红军党的组织原则，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才能行动敏捷，才能便于作战，才能一致地战胜敌人。但这并不是说如此便没有党内民主化了，如此便不执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了，如此便可恢复家长制”。“既有一个书记，他在会议席上、在处理日常事务上，必然要比别人多负点责任。尤其在军队中，在作战的军队中，党的书记当然更要多负些处理日常事务与临时紧急处置的责任——这是书记的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同时又指出要“纠正过去党的指导机关常有包办一切代替支部工作或直接指挥党员工作的现象，绝对不是说党的一切工作一切事务一切问题都要拿到支部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民主集中制的党既绝不容许，尤其在红军中，在日有战斗的红军中更绝对不容许有此种倾向之生长。所谓集权制当然是指在集体指导组织中的集权，绝不是个人的集权。”

三“‘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你们这一意见非常正确。……但红军扩充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地方武装上。有了武装农民的事实，广大的农民才更易投身到红军里来。故武装农民是扩大红军的前提，你们必须坚决地执行这一路线，应视与发动群众斗争一样的重要，不容许有丝毫动摇。”

四“红军中政治部工作及宣传队组织（或如你们所称‘宣传兵’）是红军中政治命脉，其作用决不减于战斗兵，如工作不好，组织不得法，那是另一问题，然决不能因此便动摇了根本路线。否则我们的红军，为着何来？红军对全国的政治影响又建立在那种基础上去？”

信中还对一些具体问题作了回答，如：“‘党管一切’的口号，在文字的涵义上，在群众的了解上都不正确”；“在目前游击状况下，前委与军委实无须采取两重组织制。”周恩来的信回答和解决了红四军中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

周恩来对红四军寄予极大的希望。他在信中满腔热情地写到：“你们应知现在朱毛红军对于全国的政治影响较对于闽西一处大的多，能保全这部分实力而更扩大之，便是对于全国政治影响的保全与扩大。”因而红四军首要

的任务是：“游击区域的发展，农民武装的加强，红军的扩大，而土地革命的深入更是根本的任务。”并强调说：“凡你们经过之区，必须使红军不仅尽其作战的努力，还须成为广大的宣传队以发动群众彻底地收缴民团散军的枪械以武装农民，使群众能广大地在土地革命任务之下行动起来。”红四军“在目前敌人四面包围中，主要的任务是在向敌人奋斗。党内为正确路线的斗争应从积极方面联系到与敌人斗争的任务上，使全体同志热烈的精神不仅用在党内为正确路线的斗争上，且更因此精神集中力量向着敌人。”他号召红四军的全体同志们：“消灭一切纠纷，一致地拥护此正确路线，向着敌人奋斗。”希望前委的同志“在中央这一指示的精神之下，整饬自己的队伍，正确自己的路线，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意识，向着敌人作艰苦的战斗！”周恩来的这封信是比较系统地阐述人民军队建军思想的光辉文献，不仅对红四军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红军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8月下旬，陈毅受红四军前委的委托，到达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听取陈毅的汇报。陈毅在会上对红四军的历史、建设、战斗、工作等情况作了全面而详细的报告。他襟怀坦白，公正无私，如实地报告了红四军近两年来的发展历史以及党内争论问题的内容和情况，对红四军的战略战术、组织编制、政治工作、政策策略、斗争艺术都作了准确的叙述。

当时，在中央工作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是从小农村根据地中出来的，也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到农村去实地考察过土地革命、政权建设、武装斗争和红军建设的情况。陈毅生动的报告使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大开眼界，同时也深深感到红四军创造的众多的斗争经验和正在争论的问题极为重要，是关系到红军发展前途和方向的大事，也关系到土地革命是否能深入发展的大事。因此，政治局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责，有李立三和陈毅参加的三人委员会，进一步全面深入地总结红四军创造的经验，讨论研究和解决他们所争论的问题。

会后，周恩来以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他和李立三一次次来到陈毅的住处，对陈毅根据汇报内容写的《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和《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的问题》等五个报告，每一篇都进行了认真的阅读，然后和陈毅进行了反复的讨论。他们经常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这对周恩来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使之对农村斗争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赞扬红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创造出来的斗争经验“在全国政治局势中有极大影响”，“红军四军有此种伟大意义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继续努力下去，将必然要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这是无疑义的”。后来，在他主持下，中央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刊登了陈毅的一部分报告。编者在按语中热情赞扬说：“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朱毛红军这个‘怪物’，在我们看了这个报告以后，都可了然。”他们在编制、筹款、政治军事训练、官兵平等、开支公开与群众关系等方面的经验“是在中国别开生面”。红四军在艰苦的游击战争环境中积极地探索建设人民军队的道路，使得这支部队的领导更加成熟，部队的战斗力更加旺盛，他们创造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他们的发展方向是全国红军的



方向。因此周恩来：“四军是所有红军的主干，中央必将以最大力量注意。”

通过和陈毅、李立三的讨论研究，周恩来认识到“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进而使周恩来在探索人民军队建设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大的飞跃。他把大革命时期在国民革命军中创造和领导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同工农红军创造的新鲜经验结合起来，参考苏联红军政治工作的一些做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加以归纳、总结和提高，提出了对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陈毅根据周恩来的这些思想，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经周恩来修改审定后，9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封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在这封信中，周恩来对建设人民军队的重大问题，从理论高度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

（一）关于红军的根本任务。周恩来指出，红军不是一支普通的军队，不能只局限于单纯的军事行动，它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并且指出“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信中就红军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作了专门的论述，强调：“凡红军一切行动务要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要与群众斗争取得密切联系。”批评了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思想。他还进一步指出：“红军四军此时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去实行游击以求本身的扩大，如何集中力量去实现党的政治口号以发动群众斗争。”在这里，已较明确包含了人民军队必须是战斗队和工作队的思想，概括了红军任务的基本内容。

（二）关于红军的发展战略。红军的根本任务规定了红军的发展战略，而发展战略的正确与否，不仅关系到红军任务的完成，更关系到红军的生存与发展。对于这样一个红军建军原则问题，周恩来明确指出：“要知在统治阶级政权未崩溃以及革命高潮未到来的时期，红军应该是采取经常游击的政策，若停留在一个地区，或企图固守一个地带，求其继续存在，这不但不可能而且必然陷于失败。”并且进一步指出，“红军发展的方向，应该向着群众有发展斗争可能的地方，去扶助其发展，使当地的革命斗争深入”，以及到“敌人军事力量空虚地带”发动群众斗争。在作战方法上，“对于较小于我的敌人，应该坚决地去歼灭他，非如此不能扩大本身及群众武装。”但是“决不应以较小兵力硬与较强之敌作殊死战”，其结果只会使红军牺牲许多力量，仍然没有胜利的把握，以致于使敌人从容退却。这种得不偿失的战斗丝毫不能扩大红军武装，而且无益于游击战争。对于从中央到红军长期争论的分兵与集中问题，他指出：“分兵与集中只某一个时期中工作方式的利便问题，绝不能把红军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这样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或者把红军四军分小，化成无数的游击队而不相隶属。两者皆是取消观念，皆原于对政局的估量不正确，恐惧反动势力稳定……的右倾思想。”并且强调：“分兵游击集中指导是不可移易的原则”，还指出红军集中行动，虽然会遇到一些困难，如行军、宿营、给养等的不方便，“但这大部分是一些属于技术上的困难，绝不能因此而取消集中指挥的必要条件与忽视了对于全国政治影响的伟大作用。”

（三）关于党对军队的领导。周恩来反复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红军由前委指挥，对外用军

部、政治部号召，目前是可以的”。他不仅从原则上肯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而且阐述了党领导的正确方法。周恩来指出：“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问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样不但削弱上级指导机关的权力，而且也不是下级党部的正确生活，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同时周恩来又辩证地指出，党对军队的领导并不是党包办一切，因此，“党管一切这口号，在原则上事实上都是不通，党只能经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由政治委员监督，前委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前委正确的领导方法应该是“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党的机关设在政治部内，党的机关的人员不要过多，要尽量利用群众组织中的人做事。要把党的系统、军事系统、政治系统分清楚。为了体现人民军队与党领导军队的一致性，周恩来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当各根据地扩大时，则必将成立几省边境的苏维埃政权，党就应该通过政权机关的军事部门公开指挥红军。虽然从实质上讲仍然是党指挥军队，却有助于“使群众认识红军是自己的阶级军队”，而不是某党某派或某种政治势力的军队，充分体现出“红军本身是一种阶级的集聚力量。”

（四）关于红军的政治工作。周恩来强调指出，红军政治工作在红军内部是组织进行政治教育，对外作政治宣传以至管理地方政务，发动群众斗争，扶助群众组织。政治教育方面的重要任务是纠正红军中存在的一切不正确的倾向，诸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生存等。因为这些错误思想“皆原于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必须以坚决的态度加以肃清。

（五）关于红军的组织与训练。为使红军建设能够适应战争环境，提高战斗力，周恩来指出，红军的编制最要紧的是必须适合游击战争的特点，指挥单位不要过多，军事组织及名称不必拘于某一固定的形式；军队要加强军事训练，红军有了好的军事技术，有严格的军事训练，才能有战斗力；红军主要靠从敌人手中夺取枪支弹药来补充自己，因此不能轻易错过任何能夺取敌人枪械的机会。他还强调了红军不同于一般群众组织，“他是经常与敌人在血搏状态中的战斗组织，他的指挥应该集中。”“军队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伸缩，不应漫无限制，以妨害军纪之巩固。”纪律的执行又应该建立在“士兵自动守纪律”的基础之上，必须坚决废除肉刑的行为。

此外，周恩来还谈到了如何处理红军前委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红军的战术问题、红军的给养与经济、以及红军目前的行动等方面的问题。“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取得的伟大成绩和丰富的经验，在“八月来信”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红四军中长期争论未能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中肯地批评了红四军中存在的错误思想，为解决红四军领导同志的思想分歧、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根据，对团结党的组织和巩固发展红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会后，陈毅将这封信带回红四军。临行前，周恩来又嘱咐：“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在这封信的指导下，红四军前委统一了思想，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逐步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在此基础上，红四

军召开了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毛泽东以“九月来信”为基础写成的决议，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了红军建设的根本原则，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服从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一重大问题。随后，周恩来将这个决议的精神迅速发往各地，指导全国红军的建设。这个决议几十年来一直是建设人民军队的纲领性文件。

在此期间，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军事工作会议，研究红军的性质、发展方向、游击策略和组织机构等问题。周恩来给红四军的两封信中所阐述的思想，对这次会议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了加强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组织措施，决定：在贺龙游击战争区域及其附近设立湘赣边特委；彭德怀红军归赣委领导；方志敏部队受赣东北特委领导；鄂东北与豫南的红军统一指挥机关属鄂豫边特委领导。周恩来还根据中共中央讨论开展游击战争的精神，把全国红军游击战争开展较活跃的地方划为闽粤赣、湘鄂西、赣西南、湘鄂赣、赣东北和鄂豫皖六个主要的游击区域。根据各个区域的不同特点和具体情况，分别拟定了扩大红军的策略、红军的发展方向、发展的路线和策略以及进行联络的方法。1929年12月，周恩来看了贺龙给中央的报告，建议中央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帮助解决湘鄂西红军中存在的党组织机构和红军编制不健全的问题，以及红军发展方向的问题等等。中央就如何扩大红军，推动游击区域周围广大农民斗争，提出了具体计划和策略，并派陈昌等三人到湘西去工作。对于江西省的军事工作，周恩来尤为重视，他专门主持中央军事部讨论研究江西的军事斗争形势，要求江西各地方红军克服单纯军事观点，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学习朱、毛红军的经验，起到宣传队的作用；要加强政治教育，纠正极端民主化等一切错误思想。在周恩来的正确指导下，江西的红军游击战争成为全国发展最快最好的地方。周恩来还根据豫东南、皖西和鄂东北红军游击战争的情况，决定统一鄂豫皖边区党的领导，建立鄂豫皖边区特委，统一三省边区军事指挥，建立红一军。周恩来的这一决定是根据朱毛红军的经验作出的。红四军在朱德、毛泽东的率领下，游击于闽西、赣南、赣西南等游击区域，在当地红军和游击队的配合下，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清剿”和“会剿”。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有一支集中统一指挥的红军主力部队，才能够与国民党正规军队作战，保卫红色区域。如果仅靠各游击区域自身的力量，难以对付国民党正规军队的进攻。建立和巩固主力红军是农村革命根据地存在的重要条件。周恩来关于把鄂、豫、皖三省边区的红军主力集中起来建立红一军的决定是非常英明的，对鄂豫皖边区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红军一军成立后，立即显出其巨大的威力，根据地迅速扩大，红军力量成倍增加，边区的革命形势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成为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不久，红一军发展成为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为中国红军的主力部队之一。

红军在无产阶级建军思想的指导下，得以迅速发展，力量日益壮大。全国的游击区域不断扩展。到1930年3月周恩来去莫斯科之前，全国各地“共有红军六万二千七百余人，枪支三万八千九百多支，编为十三个军，分布在鄂、豫、皖、湘、赣、桂、粤、闽八省一百二十七个县；并且豫、苏、皖、赣、浙、闽、鄂、湘、粤、桂十省内的一百六十二个具力游击县。”这与周恩来同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在探索和传播人民军队建军思想过程中所作出

的巨大贡献是分不开的。

## 五、把军事工作的中心放到农村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能够从根本上纠正“左”的错误。因此，当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空前的经济危机及中国的军阀混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思潮重新抬头。从1930年2月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内、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及国际远东局之间，就取消还是坚持开展农村游击战争，以及农村游击战争在土地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左”倾思潮的抬头与共产国际的指导直接有关。从1929年2月到10月，共产国际连续给中共中央发来四封指示信，其中含有许多“左”倾错误观点。如在2月的来信中就提出，中共在目前的基本任务是反右倾，“如果中国共产党不用警觉的激烈的自我批评态度来批评这一切右倾的错误和动摇。来加以预防，则右倾是会变成可怕的危险的”。特别是10月26日的指示信，更是改变了中共六大对中国革命形势和任务的正确论断，认定“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底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底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重申要首先反对中国共产党内“右倾的机会主义的情绪和倾向”这一主要危险。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给予中国共产党以重大的影响。虽然党的六大认定中国此时正处于革命的低潮之中，但是党内仍有许多同志，并没有真正认清这个问题。所以“左”倾冒险主义思想一遇合适的土壤就迅速滋生起来，逐渐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

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的李立三，全面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错误主张，并以此为理论依据，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左”倾冒险主义的主张。周恩来也受到共产国际一些错误观点的影响。党的六大之后不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结合而成的托陈取消派竭力宣扬，中国革命失败了，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中国社会将是和平发展的社会。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革命斗争，尤其反对红军游击战争。这些人在党内有一定影响。他们四处活动，拉帮结派，阴谋分裂党的组织，对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周恩来回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参与组织领导着同托陈取消派的斗争。这场斗争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不仅要理论上批判托陈取消派的错误观点，肃清其影响，帮助和挽救一批有糊涂认识的同志，还要恢复和整顿被他们搞乱了的党组织。斗争的复杂性使周恩来感到右倾错误对党的危害极大，认为右倾是党的主要危险，赞同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进入新的高潮的主张。

但是周恩来在如何分析革命形势、是否组织武装暴动以及在斗争策略上却不同意李立三的观点，并与之发生了争论。李立三否认中国革命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认为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一个东西，而直接革命形势就是举行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应该立即采取行动，布置各地的武装暴动。周恩来则认为：“所谓新的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不同的，现在已经有了新的高潮，但还不是直接革命形势。”他不仅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与李立三辩论这个问题，还在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专门阐述了这个观点。后来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曾说：“我在去年便两次提出反主要的危险

右倾，同时必定要反‘左’倾；对高潮问题，我在江苏代表会上，在中央政治局，我都主张照国际的解释，中国现在已有革命高潮，但不等于直接革命形势”。李维汉在回忆录中也写到当时周恩来与李立三“在不少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如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和组织各地暴动等问题就有争论。”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远东局在关于如何看待中国富农、游击战争、赤色工会，争取国民党上层人士等问题上，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1929年春夏间，共产国际派了一名德国人和一名波兰人到上海，组织了新的远东局。他们不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会议，而是在中共中央开会之前或开会之后，由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就有关问题去同他们协商，看政治局会议的发言记录。不久双方对中国农村游击战争等重要问题发生了争执。远东局坚持认为，在目前中国环境之下，游击战争一定会失败，应该取消游击战争。到12月初矛盾已经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于是，远东局在没有同中共中央商量的情况下，通过了一个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的中国问题部分断言中共中央犯了右倾错误。中共中央得到这个决议案后很震惊，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与会者对远东局的做法很愤怒，认为远东局的决议案是非常错误的。他们要求取消游击战争，才是犯了右倾错误，希望他们能纠正这个决议。会后，政治局派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去同远东局讨论这些问题。会上远东局的代表抓住项英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过“远东局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话，强词夺理他说：“这就是说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不仅拒绝中共中央提出纠正决议案中错误的要求，反而要求中共中央解除项英的职务。会议连续开了两天，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结果不欢而散。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人到共产国际直接反映情况。1930年3月初，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并参加苏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周恩来化装成出国留学的学生，乘轮船赴欧洲，再改由陆路去莫斯科。

无论是与李立三还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论，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在中国农村到底要不要建立红军，开展武装斗争，实行武装割据？它在中国革命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和地位？远东局认为应取消红军的武装斗争，李立三虽然认为红军有存在的必要，但只是为了配合城市无产阶级武装的辅助力量。李立三虽然参加了和周恩来、陈毅关于红四军建设的讨论，但对农村的武装斗争和工农政权这些中国革命的新生事物视而下见，丝毫也不懂得它的伟大意义。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至少我个人过去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周恩来则不同，他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和指导着中国农村的这场伟大革命，特别是在中央军事工作会议期间，与陈毅就红四军问题的讨论研究，使周恩来对中国工农红军在土地革命中的伟大创举有了全新的认识。他说：“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扩大，的确要成为决定新的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从南昌起义以后，仅仅两年半的时间，红军犹如燎原烈火，燃遍了中国半壁江山。这是对国际远东局和李立三错误观点的有力批判。周恩来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经过德国，应德国共产党《红旗报》的约请，写了一篇题为《写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文章，介绍中国苏维埃运动和红军的发展状况，指出：“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

周恩来出国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思想急剧地膨胀起来。他批评毛泽东“以乡村包围城市”的主张“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李立三强调现在红军“是

需要夺取中心城市，向敌人主力进攻，向交通中心发展”，把毛泽东、朱德提出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说成无非是“逃、跑、走”。他主持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计划规定红三军团攻打长沙，切断长沙至武汉的铁路；红一军团攻打南昌、九江，切断长江；红二军团、红一军进逼武汉；武汉则组织武装起义。五支力量“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组织南京士兵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支援武汉的起义，先取得一省和数省的胜利。并且异想天开地认为“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并且声称：“我们的战略也必须推动国际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决战”，“国际在目前形势，我想必须采取积极进攻路线才有办法，首先是苏联，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他要求苏联和蒙古一起大批出兵进攻中国北方，支援中国革命。这样一来，日本帝国主义必很迅速地向苏联进攻，引起世界大战，而中国革命就会在世界革命高潮中取得胜利。因此，苏联现在就应将西伯利亚数十万中国工人迅速武装起来，“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向忠发、李立三等还致电在莫斯科的周恩来，要求他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革命已接近直接革命的形势，使国际能够肯定他们提出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并要求共产国际动员各国党加紧保护中国的革命运动。

周恩来坚持认为：“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同时，这一民权革命是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联合农民才能彻底完成。”他强调指出，当前中国工人运动的新高潮是在农民战争的背景之上兴起的。此时中国更加发展的还是农民土地革命的深入。中国工农群众不仅有他们的苏维埃政权，并且有了为这政权斗争的十万红军和数十万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是在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的特殊产物，当前应加紧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周恩来在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上作了关于《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特点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的报告，再次强调指出：“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他还会见了斯大林，介绍了中国革命特别是红军一年多来显著发展的情况，使斯大林接受了中国红军有重大发展的事实，改变了以往对红军的看法。斯大林最后认为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根据周恩来的报告和斯大林的建议，共产国际于7月23日发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决议认为：“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涨，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此刻“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指出：“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7月30日，共产国际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政治局，批评“中国党目下路线是盲动精神”，目前“中国党本身的组织力量大弱，不能领导工人群众的暴动”，要中共中央停止执行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

7月27日，红三军团乘虚攻入长沙，不久即遭到国民党军队重兵围攻，红军主力虽然撤出长沙，但是长沙的党组织及万余参加攻打长沙的工农群众却惨遭杀害。李立三不仅没有从中汲取教训，反而被红军暂时攻占长沙而冲昏头脑，以为他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是共产国际犯了右倾错误。他认为共产国际不赞同他的路线，“恩来同志要负这一责任。恩来同志向国际的报告，一定没有说明革命发展的总的趋势，所以使国际不能（了解）这一迅速的发展。”有些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中央必须对周恩来作坚决的斗争，并建议在“政治问题解决后，周恩来同志可去北方责。”。向忠发则在政治局会议

上总结说：“恩来同志尤其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暴露他右倾的危险，应在政治上负严重的责任。”

8月1日，李立三在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把共产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停止党、团、工会一切正常活动，准备领导各地暴动和罢工，进而组织全国的总暴动和在武汉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当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维汉同志，在前一段工作中，贯彻李立三的路线，组织了许多次工人罢工运动和武装暴动都遭到了失败，使江苏的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上海、南京等城市的一些党组织和赤色工会组织遭到破坏，群众积极性受到打击，一些优秀党员和积极分子遭敌人杀害。仅半年时间，江苏省被国民党杀害的党员和群众就有3130人，被捕的有1480人。李维汉开始怀疑李立三的一些做法是否正确。他对李立三说：看来上海暴动搞不起来，要举行全国暴动，这样大的事，是否应向共产国际请示？李立三听了以后很生气，说：“红军已打下了长沙，攻下武汉没有问题。……现在就看你们江苏的了，看你们能不能砍下蒋介石统治的‘头’了。”“等打下武汉，中国革命胜利了，再同共产国际讲话。”当时中共中央的会议记录都要送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同际远东局，李立三的这些话，使他后来受到共产国际的残酷打击。

8月19日，周恩来回到上海，和随后回国的瞿秋白一起纠正李立三的错误路线。周恩来一下轮船就受到李立三和向忠发的质问。周恩来连续两天找他们谈话，通过耐心的说理和具体的分析，终于使他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接着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由周恩来作报告，一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二是着重讲了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和发展红军的重要性；三是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周恩来说：“根据地决不是割据、保守，而是站住脚跟，一步一步的有力发展。”“在中国什么地方最适合作苏维埃的根据地？赣西南、闽粤边等处，不仅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而且有党的基础，有广大的群众，巩固这许多地方以向着工业中心城市发展。在策略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因为在这许多区域不仅是敌人力量最弱的地方，而且有党所领导的广大基础，党将这力量巩固起来。”“中央过去特别指出割据的错误，因此对于根据地这一点确实注意得比较少。我回国后，与特生（向忠发）、柏山（李立三）两同志谈话后，都认为这是工作中的缺点。”

为了尽快实现把党的军事工作中心放到农村去的战略性转变，周恩来一方面从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另一方面抓紧从军事上制止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当时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指挥中心是在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9月初，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接连给长江局发出三封指示信，要求他们立即停止组织武汉暴动和攻打中心城市的行动。他在信中指出：“在今天武汉还不能暴动，还不是暴动的前夜。”“红军向中心城市发展这一路线是不会实现的。”他还告诫长江局的同志们：“当我们估计敌人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过低的估量，不容许我们忘掉敌人的任何强点；当我们估计我们自己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夸大的估量，不容许我们有架空而不切实的计划，尤其不容许我们忘掉我们自己的弱点。”他严肃批评那种以为“‘左’倾会比右倾好些、在现时只怕右倾不怕‘左’倾”的错误观念，深刻指出，“要知右倾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而‘左’倾也同样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的。”党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发动和组织群众上，党的干部应深入基层、深入农村、深入红色区域，绝不能成

天在暴动上做文章。“为加强红军和苏维埃根据地的工作，军事干部必须以派往三、四、五、八、二、六军去为第一等工作。”针对红一、红三军团第二次攻打长沙受挫一事，建议红军“是否可调转头来，击破赣边敌人，以聚集自己的力量，以巩固自己的阵线”，采取“巩固的而不是猛进的向前发展”的方针。这三封指示信基本上停止了武汉暴动的原有计划和攻打中心城市的行动，把党的工作重新转移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周恩来在停止“左”倾冒险主义行动的同时，指出党目前中心的问题是如何发展苏区和红军的问题，明确指出了党的工作中心应该是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他在9月27日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强调指出：“现在中心是在苏维埃区域。不仅党是（有）政权的党，而且有红军、赤卫队，而且是要发展及于全国”<sup>①</sup>。他在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上多次强调苏区和红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关于全国工作布置，在组（织）决（议）案上有一原则：首先是加强苏区工作，苏区中央局的建立，苏区下级的健全、强健红军之领导，是首先在组织上重要的工作。”他在9月30日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针对许多人认为“打下大城市要较发展广泛的农民战争的意义要大得多”的错误看法，进行耐心地解释和说服，并用红军两次攻打长沙失利的例子，说明红军拼命围攻长沙延期而不能攻下的时候，则发动全湖南的农民战争，不但比死攻长沙要意义大，而且即是进一步的扩大革命战争。

周恩来不仅从理论上、政治上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和建立工农革命政权的正确轨道上来，而且从组织上采取措施保证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虽然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受到错误的批判，但是他仍坚持把党的工作中心放到农村。他在起草以向忠发的名义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到：“要从中央政治局起以百分之六十的干部力量去加强与巩固苏区的领导”，“军事干部不论是在莫〔斯科〕学过军事的或在国内做过军事工作的，都要以百分之九十以上派往苏区”。对于党的地方组织，周恩来也要求他们把大多数的干部派往红军和苏区去工作。1931年3月7日，他在起草《中央关于广东党的工作决议案》中指示广东省委：要刻不容缓地派遣100至150名工人到红军中去，征调95%以上有军事经验的同志和党内60%以上的干部到苏区去，加强军事工作和苏区领导工作。

党的五大以后，中共中央一直把城市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而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抱着轻视的态度。周恩来的一系列言论和行动，表明中共中央在建立并发展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这个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同时也表明周恩来跳出了以往无产阶级革命要以城市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在指导思想实现了把党的工作中心放在农村的战略转变。这是他在探索土地革命战争规律，确立党的战略方针上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周恩来不仅在引导全党重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这个根本问题上走在了前列，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主动向中央要求到苏区中央局去工作，决心投身到血与火的战场，投身到正在中国农村广袤的大地上掀起的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去。

## 六、初步总结指导土地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

李立三的错误路线统治中央虽然不到半年的时间，却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左”倾冒险行动，促使蒋介石加强



了对红军的进攻。当红三军团第一次攻下长沙之后，蒋介石就命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召集湘、鄂、赣三省党、政、军高级官员召开“绥靖会议”，确定了以军事为主，党务、政务密切配合，分别“围剿”各个苏区红军的总方针。面对新的战争形势，周恩来在1930年10月1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醒党中央注意，一切反动势力正在联合起来组织反革命“围剿”。接着他又为党中央起草了《中央通告第九十二号——为发动全国的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运动，以纪念十月革命和广州暴动》，通报全党全军：国民党军阀最近在湘、鄂、赣三省调动了将近20个师的兵力，准备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实行他们的“围剿计划”，这是目前的主要危险。指出党和红军当前最中心的任务是调动全国劳动群众和红军，打破敌人的进攻。随着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入，随着反“围剿”战争的展开，红军一系列新作战原则和战略战术逐步提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运用自己的军事知识，结合红军的作战经验，研究了土地革命战争的一些带规律性的问题，及时总结并初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指导革命战争的一系列基本原则。

第一，红军战争的中心任务是粉碎敌人的“围剿”

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以后，中国工农红军以游击战争为主要作战形式，实现了保存革命力量，建立农村根据地，发展和壮大自己的战略任务。敌人的大规模进攻使红军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红军的作战形式如何适应这一变化，是摆在战争指导者面前的紧迫问题。周恩来认为，目前红军的主要任务已不仅是发展游击战争生长红军，而是“要使革命战争能大规模发展起来，攻破敌人的‘围剿’”。因此，“冲破敌人的‘围剿’，这是目前阶段中革命的中心任务。”这就明确提出了红军战争的主要形式应从游击战争转变为反“围剿”战争这一重要思想。为了实现这一转变，周恩来指导红军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做了充分的准备。

为了使红军指挥员尽快地适应作战形式的转变，周恩来反复强调，红军能否攻破敌人的“围剿”，“这完全要看共产党运用的策略正确与否”，“要知道现在红军的作战已超过了散乱的游击战争的范围，广大的红军已开始了以国内的革命战争来消灭军阀战争的战斗；这样，目前党之最中心的策略〔是〕如何组织革命战争来击破敌人的‘围剿’与进攻。”使苏区在“巩固的基础上，坚决地向外发展。”如果“不以组织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为红军的中心任务，而仍回到过去‘分散以游击’‘兜圈子以避敌人围剿’的道路上去……必然要遭受严重的失败，而为敌人各个击破。”周恩来的这些重要指示，为统一红军指战员的思想，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起了思想准备和动员的作用。

1930年9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对红军在组织上如何适应反“围剿”战争，进行了专门研究，周恩来在会上作了《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和结论。会后，根据周恩来的布置，中央军委制定了改编红军的计划。为加强军委的工作，军委下设总政治部、参谋部、武装工农部、军务部、经理卫生部和士兵运动委员会。各省委军委也相应设立这些机构。周恩来和聂荣臻一起为前往苏区工作的同志举办军事训练班，专门为训练班讲述党的工作中心开始转到苏区后的任务及军队政治工作，由刘伯承、叶剑英、博钟、李卓然等翻译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译成后送往苏区。10月3日成立了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三人组成的新的中央常委，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等人组成苏区中央局，

负责指导全国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工作。至此，形成了在中央军委指导下六大苏区红军实行集中指挥的组织指挥体制，全国红军有了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番号，统一的条令条例，这是红军建设史上的一次重要飞跃，为红军实现从游击战争向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反“围剿”战争的转变，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 第二、指导红军作战的核心是夺取并保持战场主动权

战场主动权历来是战争指导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主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不能分离的，而被动则和战争力量的劣势分不开。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红军在数量与装备上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能否夺取并保持战场主动权呢？周恩来认为红军必须并且能够“站在主动地位而支配作战形势的。”

对红军如何才能夺取主动权的问题，周恩来在中央给各地红军的一封指示信中写道：“在战略上，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击溃敌人的主力。当着敌人大举包围，我们必须利用敌人的弱点，击溃敌人的一方。如能诱敌深入，聚而歼灭他，这也是可采用的战略。总之，不应执着一端，而固守某一办法成为不可改变的定理，这是容易造成失败的前提的。我们作战，只有一个是不易的法则，即是时刻不忘与群众武装斗争的配合，此外，都是要我们站在主动地位而支配作战形势的。”

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论述。周恩来一方面主张采用主动出击的战略指导思想，另一方面，他又不排斥诱敌深入的战略指导思想。他认为不管是采用哪种战略，运用什么样的战术，战争指导规律的核心就是夺取战场的主动权，谁夺取了主动权，谁就掌握了取得战争胜利的钥匙，这是他军事理论的精髓。同时，也反映出周恩来对军事战略指导思想的选择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只要能达到夺取和保持主动地位的目的，哪种战略指导思想都可以运用。这在理论上是对的，但是在实际战争中，战略指导思想贯穿于整个战争过程之中，或贯穿于某一战略阶段。它一旦推动战争机器转动起来，再要改变方向那是非常困难的，不仅要丧失宝贵的时间和大量的人力物力，甚至会在战争全局上造成严重混乱。实际上，军事战略指导思想的正确与否是夺取战争主动权的关键因素。正确选择战略指导思想，即使在战争爆发的初期处于被动地位，但通过一系列的作战行动可以夺取主动权，直至夺取整个战争的胜利。相反，如果选择了错误的战略指导思想，即使在战争爆发时拥有主动地位，但是在作战中会逐渐丧失原有的主动权，直至导致整个战争的失败。

周恩来主张以进攻击破敌人“围剿”的策略，体现了一种“先发制人”的战略进攻思想，而不是以进攻为主要作战手段实行战略防御的思想。这种战略思想不符合红军当时的实际。那时中国红军所面临的情况是，敌军在数量上数倍于红军，红军的武器装备又远差于敌军；红军指战员没有经过大规模运动战的实践，还不适应高度统一的集中指挥方式；缺乏现代战术技术的训练；没有稳固的后勤保障能力，给养要靠打土豪来筹集，弹药要靠从敌人手中缴获。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求红军深入敌人统治区域，先敌实施战略展开，用进攻行动粉碎敌军的作战准备，以阻止敌人的“围剿”，红军的行动将难以得到苏区广大翻身农民的热情支援，只能受到它自身弱点的掣肘。这显然同周恩来长期处于中央的领导地位，没有亲身参加到红军战争的实践中去有直接的关系。

1930年秋，蒋介石向各苏区周围调集了大批兵力，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

“围剿”。其中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到 11 个师又 3 个旅共 10 万余人。11 月初，敌军总指挥鲁涤平将 7 个师又 1 个旅编为 3 个纵队，从西、北、东北三个方向，沿浙赣铁路和赣江北岸，向集结在新余以北地区的中央红军发动进攻。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建议红一、三两军团把进攻方向选在浙赣线上，首先击溃从湖南开进江西的湘军，控制浙赣铁路樟树到萍乡段，使中央苏区与湘鄂赣苏区联成一片，把湘敌与赣敌隔开，而避免形成敌人控制浙赣线，截断中央苏区与湘鄂赣苏区联系的局面，这样在战略上就可以取得主动地位。然后集中两军团的力量，击破一方的敌人，从而迫使另一方的敌人转攻为守，以达到粉碎敌人“围剿”的目的。当红一方面军没有采纳他的向浙赣线出击的建议，而是采取逐步退却、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时，周恩来作为负责军委和苏区工作的中央常委，并没有因此斥责方面军的领导，而是继续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当红一方面军退入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区后，中央又及时发出给红军的训令，指出，“第一三军团在目前情况之下，应以赣南和赣东南为作战地区；而以闽粤赣为后方根据地。”同时，又考虑到红军反“围剿”万一失利时，“则可以闽粤赣为后方地区，如再不可能时，则可选择赣南或湖南为发展根据地，这须视实际情况来决定。”从这些训令中可以看出，夺取战场主动权是周恩来指导红军作战的基本出发点。他坚持从实际出发，积极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从全局上指导和帮助战区指挥员决策，同时又十分尊重前线指挥员独断专行的权力。

### 第三，集中兵力，协同配合是红军的作战原则

周恩来指出：“集中红军主力，实行各个击破敌人，这是我们的原则。”同时他又指出：“不是说要集中主力，便连一部分的必要的分兵配备去发展游击战争，去巩固后方，去袭击敌人的力量都不要了。”在作战上，红军应该“用占优势的力量去打，击破〔敌〕人。对于占优势的了解，不只是在数量上，而是与一切能够给我们在斗争中占优势的东西的配合，特别是群众动作的配合。”周恩来不仅重视战略上的集中兵力，而且在战术上也非常强调要集中兵力，指出：“须集中主力于主要决战方面，极力避免分散兵力，否则会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

集中兵力先决条件是统一和集中红军的指挥。红军从游击战向正规战和运动战转变，要求其指挥方式也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变游击战的分散指挥方式为正规战的集中指挥方式。为此，周恩来特别强调在红军中党的领导要有最高权威，实行集中指挥，建立红军总司令部。他指示，红一、三两军团“军事指挥必须统一”，“仍以朱德同志为二三集团军总司令，当其他部队与中央区发生作战联系时，亦归一三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目前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集中到中央局。”这些措施有力地保证了集中兵力原则的贯彻落实。

集中兵力必须做到密切协同。周恩来认为，红军在作战中必须根据主要的作战方向和任务，各部队应该“在各地进行自己适当的配合，使各地的行动都能牵制敌人的调动和援助，而收到我们自己相互策应之效。”他在指导红军作战中，把这一原则化为具体的部署，并要求各地红军“依此原则指导各部队。”例如，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他指示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训令：（1）闽赣边界地区的红十二军应对闽东之敌和闽南、闽西之敌取积极防御，保障红一、三两军团侧背之安全，并直接受朱德、毛泽东指挥。（2）红七军应尽快开往湘赣边地区，归红一方面军指挥。（3）赣东北的红十军应威胁由南昌、抚州进攻红一、三两军团之敌，策应红一、三军

团作战。(4)红二军团应以主力威胁长沙之敌，吸引进攻红一、三军团的敌军回师湖南。(5)红一军应在平汉线上积极行动，牵制汉口及平汉线之多数敌人，以削弱进攻红一、三军团的敌人兵力。(6)湘鄂赣苏区的第一独立师和红十六军以最大限度发展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向赣西发展，争取与红一、三军团会合。这一部署保证了中央红军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集中兵力要充分发挥游击战的重要作用。周恩来指出：“在进行大规模的革命战争时，我们决不应放弃运用广大农民赤卫队、游击队的游击战术，以牵制和袭击敌人；相反的，游击队的游击战术，正要成为我们战胜敌人的优点，然而它必须是附属于大规模作战的范围之内。”由于敌军在数量上远远超过红军，从数个方向上对苏区发动进攻，为了保证最大限度地集中主力红军，就必须充分发挥部分地方武装和广大农民赤卫队、游击队的作用，广泛开展游击战，破坏敌人运输线，牵制和迟滞敌人的行动，才能有效地保障主力红军能够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歼敌一路。

#### 第四，必须坚持人民战争的思想

周恩来把依靠人民群众作为人民军队克敌制胜重要指导思想。早在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就十分强调革命军队必须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关系，战争的胜利要靠人民群众的支援。到了红军时期，他更加重视人民军队与广大群众的关系。他在给红军的每一封指示信中都强调，发动群众斗争是红军的重要任务，红军是为保卫红色政权而存在的，是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而战斗的。只有坚强的红军才能建立和保卫红色政权，而只有巩固且不断发展的红色政权才能进一步使红军得到发展和壮大。人民群众是红军力量的源泉。他曾批评红七军：“没有充分注意建立苏维埃政权，没有分配土地，没有组织农民。你们要采取最有力的方法，努力去消灭这种绝不容许的现象。政治机关没有努力的工作，便不是也不能使红军成为有阶级觉悟而有战斗力的队伍。红军如果不宣传分配土地，不帮助农民分配土地，不煽动与帮助农民建立苏维埃政权机关，就不能成为革命的军队，也就不会是红军。”他针对红二军团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批评了那种没有巩固苏区、建立根据地与改造红军的根本认识，而只凭脱离群众的单纯的军事行动企图取得大城市的错误观念，强调指出：“在湘鄂西要特别注意的是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要能在配合群众的斗争，利用敌人的弱点的条件下，击破这一线敌人的一方。”“只有使红军真正成为接近群众、发动群众的阶级军队，使红军真正成为实行土地政纲、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军队，则红军才能得到广大群众坚固的拥护。”

#### 第五，把瓦解敌军作为红军的一项重要工作

瓦解敌军的工作，过去一直是党组织兵运工作的主要任务。周恩来一直非常重视开展此项工作。早在国民革命军东征时期，他就有计划地安排一批广西籍的同志组成宣传队，专门从事瓦解广西军阀的工作。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到上海党中央工作，仍然非常关注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秘密工作，经常强调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他指示中央军委在上海秘密组办多期兵运训练班，训练投诚或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派回国民党军队开展兵运工作。并将参加学习的袁汉澄、王超、李肃等派往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工作，后来促成了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举行暴动，创建了红五军团。在红军反“围剿”战争日益扩大的情况下，瓦解敌军的工作更加显得重要。周恩来在给红军的指示信中多次提出红军要非常注意争取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和下级军官。1931年2月，

他在起草《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不仅把瓦解敌军工作作为一项秘密工作，而且强调它是红军全部人员都应去做的一项基本任务。他指出：“要用红军的全部人员与政治机关去做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用传单、标语以及开联欢会等等的政治宣传，去夺取他的士兵群众，并在我们俘虏的士兵中进行适当的工作。派遣红军专门工作人员到敌人军队中去，组织兵变与煽动倒戈，侦探，扰乱与破坏敌人的后方等等。所有这些方法，红军应尽量地使用。”为进一步加强瓦解敌军工作，周恩来还起草了《对于目前兵运工作的决议》，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决议指出，兵运工作对于粉碎国民党军对苏区和红军的“围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求党以及一切革命的组织必须要在敌人军队中进行破坏和瓦解工作，在政治上夺取兵士群众到革命方面来。周恩来把瓦解敌军工作第一次正式写进了党中央的决议中去，后来发展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

#### 第六，高度重视情报、电讯和机要工作

周恩来早在武汉领导中央军事部的工作时就组建了特科，开展情报工作。到上海后，他仍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建立了专门负责收集情报的第二科，并派陈淩负责二科的工作，对重要问题他都亲自过问。经他批准由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最高秘密指挥机关——党务调查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为党和红军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在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行第一、二次“围剿”期间，钱壮飞获取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经中央转发到各根据地。例如，周恩来在1931年3月2日起草的《中央给一三集团军总前委，第二集团军前委，各军前委，各特区军委，各集团军与各军的军长、政治委员的公函》中就有“谍报的材料附上”的文字记载。为了更迅速地传递信息和情报，周恩来在1928年5月开始着手组建无线电通讯工作，他除了派毛齐华到苏联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外，还从军委抽调李强及张沈川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自力更生，筹措资金，购置器材，研究技术，建立秘密电台。1929年冬天，李强、张沈川终于试制成功第一套收发报机，第二年1月，建立了上海与香港党组织之间的电讯联络。1931年9月，上海党中央与中央革命根据地之间正式开通了无线电通讯。周恩来还要求他们组织培训班，为党和红军培养了一批无线电通讯技术骨干，又先后将这些骨干派到各地红军中去，如涂作潮、伍云甫、曾三等人被派往中央苏区；王子纲、蔡威、宋侃夫等派到鄂豫皖苏区，喻杰生等被派到湘鄂西苏区。他们和红军的电讯人员一起，建立了红军中的无线电通讯工作，并逐步建立起中央与各地红军以及各地红军相互间的无线电通信网。为了保证无线电通信的安全，周恩来十分重视机要工作。机要工作的核心是密码，而周恩来堪称是党和红军中最早的密码专家。党和红军的第一本密码——“豪密”，就镌刻着周恩来的光辉名字。这是因为它是由周恩来亲自编制，并用他的化名“伍豪”命名的。1931年3月，任弼时将“豪密”带到中央苏区。两地通讯沟通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上海，任弼时在苏区，亲自担任译电工作。周恩来的这些功绩，不仅对当时红军反“围剿”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而且为我军的通信事业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初步总结的指导土地革命战争的一系列基本原则，指导各地红军及时实现了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辉煌胜利。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各地红军共歼灭敌正规军20余万人，主力红军发展到15万人，农村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成为

红军发展的全盛时期。

正当周恩来全力领导苏区和红军进行艰苦的反“围剿”斗争时，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由于顾顺章参与中央特科的领导工作，所以熟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党的主要负责人所在地及住址，了解党的秘密工作的规律和特点。他向国民党当局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对党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个极端机密而又重要的情报，被打入敌人心脏的钱壮飞得到，当时正值4月25日，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立刻派女婿刘根夫连夜将情报送到上海，向李克农、陈质报告，随即又报告了周恩来。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周恩来沉着冷静，当即找到陈云商定对策。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协助下，周恩来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销毁大量机密文件；迅速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把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到星期日晚上，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驻上海的机关全部搬了家。后来，聂荣臻回忆说：“这两三天里真是紧张极了，恩来和我们都没有合眼，终于抢在敌人前面，完成了任务。”由于周恩来机智、果断的组织指挥，使党避免了一场特别严重的大破坏及大灾难。在这以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活动范围被迫更加缩小，周恩来的活动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他仍然坚持领导着军事工作和中央苏区、赣东北苏区的工作，指导着那里的武装斗争。6月下旬，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又被捕叛变，供出了周恩来的住处，周恩来和邓颖超被迫再次转移。他们在上海已很难继续存身了，不得不更加严密地隐蔽起来。不久，中央决定他停止工作，等候转移到中央苏区。但周恩来并没有完全停止工作，仍为党中央起草了《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等许多文件。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了坚持4年地下斗争的上海，前往他向往已久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 第四章 探索土地革命战争的规律

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取得了三次粉碎国民党军队大规模“围剿”的胜利。在战争实践中，红军的作战原则和战略战术基本形成。从1930年起，中共中央陆续派领导人进入中央苏区，其中一些人不懂军事，到苏区后又不能深入前线，深入战争实际，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探索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而是在“左”倾错误理论指导下，排斥红军在战争实践中产生又被战争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和战略战术。

周恩来非常善于学习。他到中央苏区后，以主要精力抓军事工作，并深入前线，同毛泽东、朱德一起指挥红军作战，对土地革命的战争规律有了新的认识。因此他坚定地同前方领导人站在一起，抵制苏区中央局的错误意见，取得了乐安、宜黄战役的胜利。同时，周恩来也深切感到毛泽东对红军的重要作用，在宁都会议前及会议中，周恩来竭力争取和保留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宁都会议排斥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后，周恩来继续竭力抵制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错误方针，他指挥红军采用大兵团伏击的战法，一仗歼敌两个正规师，把红军的运动战推向新的高度，取得了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伟大胜利。周恩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结合自己指挥革命战争的实践，学习研究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军事理论，在此基础上，融合自己坚定、刚毅、顽强、果断、灵活、缜密、严谨的优秀品质和作风，在军事指挥艺术方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一年多的战争实践中，周恩来为红军的建设和作战胜利作出了一系列新的贡献，使红军的建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战斗力得到了空前提高。

### 一、指挥红军作战的最初实践

1931年12月上旬的一个晚上，周恩来化装成工人的模样，从上海黄浦江边的十六铺，登上了一艘英国洋行的小火轮。在统舱里他们和预先等候在那里的绰号叫“小广东”的交通员接上了头。然后就由“小广东”护送周恩来去汕头。这艘轮船的吨位很小，只能沿着海岸线航行，但却能够避开国民党军警特务的搜捕，比较安全。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周恩来一行平安到达了汕头。中共汕头交通站站长陈彭年把周恩来安排住进当时汕头最大的旅社——金陵旅社。住进旅社后，周恩来发现旅社的墙上挂着1925年汕头市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合影，其中就有他自己，当即告知陈彭年应该立即转移。这次他们选择了潮汕国民党驻军最高长官独立师师长张瑞贵秘密开设的旅社，这里反而比较安全。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又改扮成一个画像先生，在中共中央交通局负责人肖桂昌等人的护送下，乘火车到达潮安；然后换乘开往大埔的轮船，溯韩江而上，在大埔又换乘小木船在清溪上岸，到达大埔交通站所在地。这里与福建的永定县交界。永定那时大部分地区已成为苏区，靠近大埔的地方也是游击区。国民党军队和民团在这里修筑了许多碉堡，设了许多关卡，建立了严密的封锁线，白天不能走，只能在夜间通过。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安排了六名武装交通人员护送周恩来通过封锁线，他们攀藤附葛，翻越人迹罕至的高山峻岭，越过封锁线，于12月中旬到达永定县的乌石下村，再由永定交通站的交通员继续护送进入苏区。

一进入苏区，周恩来对周围的一切感到那样的亲切，不断地利用行军休

息时间，同农民和乡、区干部谈话，了解苏区工作的实际情况。22日，周恩来到达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和省苏维埃的驻地——长汀。12月底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周恩来会见了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项英、王稼祥等领导人，并就任中共中央局书记，担负起领导中央苏区和指挥红一方面军的任务，同时还负有指导其他苏区和红军的责任。

此时的中央苏区已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红一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歼敌3万多人，迫使敌人转为守势。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后组建了红五军团，使红一方面军发展到3个主力军团，共6万多人。赣南根据地与闽西根据地已开始连成一片，并扩展到近30个县。根据地内敌人许多据点被拔除，地主武装大部被消灭，土地革命普遍开展，广大农民分到了土地，为了保卫翻身果实，拥护工农群众自己的红色政权，踊跃参加红军。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苏区的首府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朱德任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地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革命景象。

但是中央苏区面临的局势也相当严峻，根据地仍处于敌军的重兵包围之下；在与敌人生死搏斗的紧急关头，发生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苏区中央局中影响越来越大，正逐步取得支配地位。这些都是直接影响苏区建设与红军反“围剿”战争胜利的重大而又紧迫的问题。

周恩来一到中央苏区，就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迅速采取果断措施，制止肃反扩大化的错误。1932年1月7日，他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报告，通过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的决议案》。会后，又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使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基本上得到了纠正。对安定党心、军心、民心，巩固红军起到了重要作用。

军事问题是苏区最主要和最紧迫的问题。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国民党军队虽然全线处于守势，但是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基本情况仍然远未改变：红军经过几个月的连续作战，急需休整和补充；苏区屡遭敌人严重摧残和破坏，经济困难；赣南苏区同闽西苏区尚未完全连成一片；苏区内还残存着少数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阻碍着群众的发动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根据面临的这些情况，决定以一部分地方部队监视北面之敌，主力红军和另上部分地方部队则与敌人主力脱离接触，由兴国以北地区南移到以瑞金为中心徊地区，准备波浪式地向着敌人力量较弱、党的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闽西北和赣西南发展。主要任务：一是整理、补充、训练部队和筹措给养，加强和扩大自己；二是逐次拔除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发动群众，恢复和建立党、团组织，建立和加强苏维埃政权及群众武装，巩固和发展苏区。整个计划分为两步，首先做好瑞金周围的石城、长汀、零都、会昌4县工作，然后继续做好武平、宁化、清流、归化、泰宁、建宁、寻乌、安远、信丰、南康、赣州、大余、上犹、崇义、遂川、万安等16县的工作。准备用较长的时间去争取上列20县400万群众，同时扩大红军10万人。而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却要求红军“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这是比李立三更为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 （一）赣州战役



周恩来离开上海之前，曾于12月6日为中共临时中央起草了一封致苏区中央局的电报，认为敌军“对赣江上游防守较松”，建议“红军主力似宜乘此改向西进，首取赣州，迫吉安，与赣西南打成一片，巩固赣南根据地。”周恩来到了苏区后，就攻打赣州的问题同毛泽东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对周恩来来说，赣州是赣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筑有坚固的城池，而且三面环水，易守难攻；国民党军队在那里又驻有重兵，赣州以北的峡江、万安、吉安一带驻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5个师；赣州以南的大余、南雄、韶关一带驻有广东军阀阳十多个团。赣州一旦遭到红军攻击，蒋粤两敌均能随时增援，所以现在还不具备攻打赣州的条件。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致电临时中央，告知红军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还不能够去攻打赣州。临时中央复电坚持要攻打中心城市，要求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周恩来召集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临时中央的复电。毛泽东仍不同意打赣州。周恩来和苏区中央局的大多数成员认为要执行临时中央的电示，打赣州要比打其他两座城市有利。赣州处在苏区的包围之中，攻下赣州可以使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连成一片，加上对赣州守敌的兵力了解不准确，错误地以为赣州有把握打下来，于是发出了攻取赣州的命令。

赣州战役由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率第三军团和第四军为主攻部队，战斗于1932年2月3日发起。红军原来估计赣州守敌只有8000人，而实际上却有1.8万人，而攻城的红三军团才有1.4万人。红军刚进抵赣州附近，赣州守敌立即收缩战线，据城固守，以待外援。赣州素有“铁赣州”之称。红军缺乏攻城的重武器，虽然组织多次攻击，都未能奏效。蒋介石为解赣州之围，令陈诚率其嫡系第十一、第十四两师约2万人增援赣州。红军攻城部队腹背受敌，不得不撤出战斗。这次战役历时33天，不仅城未攻克，反遭到很大伤亡，而且丧失了充分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巩固与扩展苏区的有利形势和宝贵时间。

红军撤离赣州后，主力转移到赣州以东以南地区整训补充。周恩来赶到前方，在赣州东北的江口圩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都出席了会议。会议总结了攻打赣州城的教训，认为，在作战指导上，对国民党军队重视重要城市的程度估量不足；对夺取主要城市的困难估量不足；没有威胁赣江下游的大城市，迫使敌人不敢增援赣州。在战术上，红军没能在统一指挥下密切协同，相互配合；存在着游击习气，不能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战斗警戒下严密；后勤工作下健全等等。赣州战役，是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决策打的第一个战役，遭到失败无疑教训是很沉重的。虽然他还没有能够认识到这是在军事上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恶果，但是从战术上，周恩来开始认识到红军技术装备差，难以攻克敌人重点据守的中心城市。

## （二）漳州战役

江口圩会议还研究了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问题。对于红军的发展方向，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批评攻打赣州是行动方向的错误，认为赣东北以及闽北、浙江、苏南、皖南等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赣东北和闽北还有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活动，还可以依托武夷山、仙霞岭、天台山等有利地势，是红军发展的方向。他提出了向赣东北方向发展，以求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的广大农村建立根据地，发展革命战争的战略计划。但是大多数苏区中央局委员受临时中央“左”倾错误影响很深，

没从赣州战役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坚持认为红军的中心任务是“争取中心城市，实现革命在江西首先胜利”。他们拒绝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坚持“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创造苏区来包围赣江流域的几个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樟树，以便利于我们迅速的夺取这些城市”的方针。

3月18日，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的决定发布训令，以第一军团和第五军团组成中路军，在赣江东岸活动；以第三军团组成西路军，到赣江西岸活动；而后两路军“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时隔不久，由于发生了广东军阀和福建军阀的部队相勾结，\*中革军委：全称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是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立的中国工农红军最高指挥机关，掌管红军的组织、给养、教育训练，并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朱德任主席。入侵我闽西苏区的情况，中革军委决定中路军改为东路军，临时到福建活动一段时间，打击福建敌军和侵入闽西苏区的粤军，巩固闽西，筹措经费，而后集中东西两路军，继续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

毛泽东当时随东路军行动，一路上反复思考，红军如沿赣江向北发展，则进到南昌附近，那里是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敌军必死守，赣江下游江面宽阔，又有浙赣铁路横贯东西，使红军大部队行动困难，而敌人正好可以利用火车和轮船迅速机动兵力，在那里红军难有大的发展；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红军没有迅速跨越江河的能力，大部队往返不方便，难以创造运动歼敌的机会；向南发展则必然会和粤军的主力顶牛；如果向东发展，龙岩、漳州地区只有福建军阀张贞第四十九师，其余则是地方保安部队，战斗力较差，红军如果依托闽西根据地，出龙岩打漳州，漳州地势易攻难守，有攻克把握。攻占漳州还可能调出粤军，红军还有可能寻找战机打击粤军人闽部队；如果不成，红军还可乘机北上攻泉州、福州，入闽北、赣东北，还可以重新实现经略闽、浙、赣、皖、苏的战略方针。3月3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非常重视，决定亲自到长汀同毛泽东面商，召开作战会议研究具体方案。会议听取了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同意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决定由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分率领东路军执行攻打漳州的任务，周恩来留驻长汀，组织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前线的需要。

4月3日，红军开始向龙岩地区进发，10日拂晓，红一军团乘敌不备一举攻克龙岩，歼敌第四十九师2个团。14日，红五军团赶到龙岩与红一军团会合，随后两军团继续向漳州进发。20日，红一军团在红五军团的密切配合下，乘敌丢失龙岩，魂魄未定之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占了漳州。此战红军歼敌第四十九师大部，俘虏敌人1600余人，缴获飞机2架及大量军用物资。由于红军在数量上不足敌人的两倍，无法派出迂回部队断敌退路，致使残敌逃走4000余人。漳州是福建当时第二大城市，闽南的商业中心。打下漳州后，红军迅速在漳州周围6个县的范围分散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大红军，筹款筹粮。“一个多月中，我军共筹款一百多万元，还有大量布匹、粮食、食盐等。这些钱和物资，绝大多数送到当时中央局和军委总部所在地长汀和瑞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央根据地和红军在财政上、物资上都很紧缺的困难。”4月22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给这次战役以充分肯定的评价：“南靖一战，张贞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

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因此争取对粤敌的胜利，成为今后中心任务。”

红军攻占漳州，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政府。蒋介石于5月初设立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陈济棠为副总司令；把上海“一·二八”抗日有功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围剿”红军；令粤军乘红军向东西发展之机，以3个师共19个团的兵力由韶关、南雄出梅岭关，部署在赣州、南康、大庾、信丰地区，入侵我赣南苏区，向零都窥进，企图切断在湘赣边界一带活动的红三军团的后路。随后，蒋介石又亲任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赴庐山召集赣、鄂、豫、皖、湘五省军事会议，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制定第四次“围剿”红军的计划。蒋介石决定调集63万军队分两个阶段对苏区进行“围剿”，第一阶段，先以主力“围剿”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对中央苏区暂取守势；第二阶段，在取得第一阶段的胜利后，集中兵力“围剿”中央苏区。

### （三）南雄、水口战役

6月5日，中共临时中央向中央苏区发出军事训令，强调：“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赣州如一时不能攻下可先取吉安，同时应一部分兵力牵制临[川]南丰线与樟树吉水之敌”。根据中央的训令，周恩来命令红军东路军回师赣南，以全力求得此次战役完全胜利，给粤敌以重大打击。为了统一指挥，周恩来在长汀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取消东路军和西路军的名称，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一方面军仍辖第一、三、五军团，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任方面军总司令，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对于政治委员的人选，出席会议的许多人提议由周恩来担任，但是周恩来不同意，认为毛泽东是最合适的人选。在他的坚持下，会议最后同意毛泽东仍“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主持大计”。会后，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建议在对粤军作战时“必须专赖果断之攻击，与实施迅速之追击，才得将敌完全歼灭，取得连续的胜利”。

7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在赣南、粤北发起了南雄、水口战役，经过池江、梅岭关、大庾、水口圩等一系列战斗，红军击溃敌军15个团，毙伤敌近3000人，打击了粤军的嚣张气焰，基本稳定了中央苏区的南翼，为红军尔后在北线作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这次战役也有很大的缺点，因兵力不够集中，打成了同敌人拼消耗的战斗。红军不仅没有获得重要缴获，而且自身伤亡2000余人。

红军在很短的时间里，攻打规模相当的两个中心城市却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紧接着一个山地运动战又打成了得不偿失的击溃战。这一负、一胜、一平三个战役对周恩来有很大的震动。毛泽东的许多正确主张，对周恩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毛泽东在瑞金会议上提出赣州是敌人必守之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下，“攻坚，在我们现在条件下是不利的。真正要打赣州只有把四周农村群众发动起来了，游击战争普遍开展起来了，赣州城的砖就会一块一块搬掉，最后进入赣州。”对于易攻难守的漳州，则主张采用长途奔袭的办法坚决夺取。打漳州不仅是从战术上易于取胜的角度考虑，更重要的是从战略上考虑问题。毛泽东在给周恩来及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中，深刻分析了国内的形势，指出，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和东北“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势力受到很大的打击，因此，目前对红军“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红军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决不是主要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不得不移转其向中区的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行动。”同时毛泽东又指出，临时中央既然规定了“我们的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胜利，似要以消灭敌人做前提。”明确表示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错误主张。周恩来通过指导战争的实践，认识到红军在选择作战对象时，不仅要从战略方向上考虑问题，还要从战略战术、敌我情况的对比、战场环境以及战地群众条件等各个方面进行通盘的考虑，才能正确选定作战目标，忽视了哪一点都可能导致战斗的失败；集中兵力不仅要拥有相当数量的兵员，更重要的是要通过组织指挥，把部队的战斗力充分调动起来，形成强有力的、有重点的打击力量，才是真正的集中兵力。许多正确的意见往往来自于在前线直接指挥作战的一线指挥员，如果坐镇后方的领导对具体战斗行动干涉太多，不仅干扰了前方指挥员的指挥，甚至会导致作战失利。周恩来虽然从上海来到苏区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仍然没有接触到红军作战的实际，于是决心暂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工作，深入到战争的第一线，到实践中去探索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规律。7月21日，周恩来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的身分到达信丰红一方面军总部，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会合，开始直接参与指挥红军作战。

#### （四）乐安、宜黄战役

周恩来到达红一方面军总部之时，摆在红军面前有两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的人选问题；二是方面军下一步作战方向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中共苏区中央局对于毛泽东反对中央局的“左”倾错误主张很不满意，因此，多次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则认为毛泽东很有军事指挥才能，具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他的许多意见和建议是正确的，因此不同意撤去毛泽东原来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周恩来到前方与广大红军指战员有更多的接触后，更加感到红军需要毛泽东，毛泽东离不开红军。7月25日，他和朱德、王稼祥及毛泽东一起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此种办法如何，飞电复。”

对此中共苏区中央局迟迟不作决定，7月29日，周恩来再次亲笔写信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坚持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他反复陈述，如果由自己兼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而“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在周恩来的坚决要求下，中共苏区中央局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同时决定在前线组织军事最高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以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处理前方的行动方针及作战计划。8月8日，中革军委主

席发布通令：“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现毛同志已到军工作。我第一方面军全体战士，今后应坚决在朱总司令与毛总政治委员领导之下，一致为发展革命战争，争取革命在江西及邻近几省的首先胜利而努力。仰我全体战士一体知照。此令。”

关于第二个问题。当时中共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制定的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方针，要求红一方面军与敌人决战，迅速夺取赣江流域各个中心城市，实现江西首先胜利，并规定方面军应以一部兵力佯攻赣州，调动敌人，以求主力乘机在赣江上游渡河，沿赣江西岸北进，同蒋介石嫡系陈诚部4个师决战。周恩来本来是带着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到前方的，在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人反复研究讨论后，认为这一计划难以实现。当时国民党军已集结了40个团以上的兵力，准备阻止红军西渡赣江。7月25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我们再四考虑，认为赣州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绝断危险，如攻新城、南康，将引起宁、赣敌人分进合击，或隔江对峙，造成更不利条件”。“因此，决往赣江下游先取万安，求得渡河，解决陈、罗等四个师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同时认为如能把敌人吸引到河东地区，作战将更有利于红军。

会后红军沿赣江东岸迅速北进。8月上旬，周恩来在兴国主持召开前方最高军事会议，重新讨论行动方向问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认为：敌军已发现红军北移的行动，已决定将支援粤军的第十四、第五十二师调回吉安、泰和，与第十一、第九十师靠拢，将主力集结于河西地区，防红军西渡和北进，如果红军攻打万安，渡河北上，敌人可以依托赣江阻击红军过江。即使红军渡过赣江，在当前粤赣湘三面敌人靠拢包围的形势下，敌可在红军还未能集合整理部队的情况下，立即出击，陷红军于不利地位。而当前赣东敌军较少，3个师分布在南丰、南城、乐安、宜黄地区。因此会议决定，红军集中力量先消灭乐安、永丰、宜黄方面的敌人，而后求歼由赣江西和由南丰、南城等地来援之敌，进而调动湘鄂赣和赣东北两地区的敌军，造成由赣江下游渡河夺取吉安的有利条件；如抚州空虚，则夺取抚州。这一正确的决定，为红军下一步的作战奠定基础。同时为了适应新的作战任务，对红一方面军进行了整编。

1932年8月8日，中革军委下达训令，决心集中全力，以坚决、迅速、秘密的行动，首先消灭乐安、宜黄方面的敌第二十七师，并相机消灭敌军增援部队。经过整编的红一方面军以崭新的面貌投入了新的战斗。8月15日，红军秘密到达乐安附近，敌人毫无察觉。8月16日清晨，红军采取袭击的战法向乐安城发起攻击。经过一天多的战斗，全歼守敌第二十七师第七十九旅（吕汝河旅）又一个营，从旅长、团长到勤杂人员无一逃脱。此战共俘敌3000余人，缴枪2000余枝，机枪10余挺，迫击炮10余门，无线电台1部，击落飞机1架。当时在中央苏区击落敌机还是一件新鲜事，红军指战员个个兴高采烈，都说：“这一仗打得真痛快！”紧接着，红军乘胜直取宜黄。20日拂晓，红军发起总攻，经一昼夜激战，歼敌一部，击溃守城敌军第二十七师主力第八十、第八十一旅。敌军弃城逃跑，红军尾敌追击，又歼敌一部。此战红军攻占宜黄城，俘虏敌军2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2000余枝，迫击炮10余门，大获全胜。红军攻克乐安、宜黄，极大地震动了周围的敌军，敌军惧怕被歼，纷纷收缩集中。南丰守敌毛炳文部第八师、许克祥部第二十四师放弃县城北撤南城，与南城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三师会合，红军乘机占领南丰，

闽西红军也乘敌军收缩之机占领了宁化。至此，乐安宜黄战役胜利结束。

乐安、宜黄战役，是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第一次共同组织指挥的一次进攻战役。他们审时度势，从实际出发，两次正确改变了原定西渡赣江北进，与敌军主力进行决战的冒险计划，正确定下了求歼兵力比较薄弱的乐安、宜黄之敌的方针。在作战中，集中优势兵力，先消灭乐安之敌，再转兵攻打宜黄，各个击破，速战速决，消灭敌第二十七师，7日内攻占4座县城。红军的胜利震动了南昌、樟树、抚州的敌人，使江西与赣粤边各路敌军纷纷移防部署，不仅使粤敌不敢深入中央苏区，而且把赣江西岸陈诚部3个师吸引到赣江以东，给湘赣苏区的红军创造了发展的机会，并可进逼吉安。同时，迫使蒋介石赶忙下令将胡宗南的第一师从武汉调往南昌，减轻了敌人对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的军事压力，直接援助了这两个苏区红军的反“围剿”作战。

## 二、抵制“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一场争论

乐安、宜黄战役后，前线最高军事会议各领导人与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领导人之间，在如何决定红军下一步行动的战略指导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 （一）坚持红军向东发展的方向

中共苏区中央局前方和后方领导人的分歧，是从乐安、宜黄战役后，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是应该向东还是向西的争论引起的。中央局要求红军西取吉安或北攻抚州。而前线最高军事会议则认为敌情已发生了重要变化，红军不应仍执行原定计划。

当红军实施乐安、宜黄战役时，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何应钦，为防红军深入北进，各个击破，“随改令第八、第二十四两师由南丰北撤，与第二十三师集结南城，并准备出击；第二路军指挥官陈诚率第十一、第十四、第九十等师集中樟树，新涂以东地区，寻匪主力进击；第九路军及第二十五师与第二十七师收容之部队集结临川，诱匪进犯，以便于围歼；第五师推进至临川东北赵公渡附近策应；第一路军远〔应〕以两师接防遂川、万安；第四十三师交防后速集结吉安；第一师及唐云山旅限二十五日以前赶赴南昌，巩固省防。”

以周恩来为首的前线最高军事会议决定，再次改变中央局原定的计划，挥师东进，攻打南城，以求打开赣东的局面，为粉碎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准备战场。周恩来致电中央局：“我们判断乐宜攻下，迫近抚州、樟树，威胁南昌，敌大震动。在赣东北之周浑元、李抱冰两师将迅速开至抚州、崇仁，赣西北之罗霖、岳森、朱耀华等师将开至丰河沿岸，敌之主力吴、罗、朱\*三师及李明，刘绍先两师将向东寻找我主力作战”。“我军决立即向东消灭毛〔炳文〕、李〔云杰〕、许〔克祥〕三师，占领南丰，以至南城、黎川，然后迎击西来之敌。”

8月24日，当红军主力进抵南城近郊时，发现敌军3个师共17个团的兵力已龟缩在南城布防，而且城内外地势险要，工事坚固，硬攻不易得手。周恩来认为，由于乐安、宜黄、南丰三城的丢失，敌人开始注意“固守城镇”。红军的战术应是以“坚决迅速秘密的行动，攻其要害，能使其离开据点，在运动中消灭之，这点很重要。”于是毅然决定放弃攻打南城的计划，改令红军撤至南城、南丰、宜黄之间地区，分兵发动群众，一方面巩固新开辟的苏

区，另一方面待机打敌增援部队。这说明周恩来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处理红军的行动问题，对红军的作战特点有了新的认识，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但是在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人不同意前线最高军事会议的决定，于8月28日致电前方，提出，我主力军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问久待，应绕至乐、宜一带，从敌之左侧背，给以各个击破。红军只得遵令向乐、宜方向移动。8月底，何应钦调集了6个师，组成左右两个纵队，从北面和东面两个方向对红军实行夹击。由于敌军队形密集，两纵队互相呼应，加上红军连日行军作战非常疲劳，难以寻得战机，于是前线最高军事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回师苏区的东韶、洛口一线，随后又撤至宁都以北一带，准备依托苏区的有利条件，寻机求歼来犯之敌。这样既避免了红军强行攻坚可能造成的损失，又始终保持着战略上的主动地位。

\*吴、罗、朱，分别指国民党军第九十师师长吴奇伟、第十一师师长罗卓英，朱是错字，应为第十四师师长周至柔。

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后方领导人对前线最高军事会议的决定非常不满意。9月7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打电报指责前线最高军事会议，在撤出南城后“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则是缺点”，“撤退东（韶）洛（口）”、“再撤退宁都青塘，待敌前进”，更“是不正确的决定”，“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影响”。同时中央局要求红军首先袭取永丰，将敌人向西调动。这样，前后方领导人关于一方面军作战方向的分歧越来越大，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并且公开化了。

## （二）坚持对湘鄂西、鄂豫皖苏区实施战略配合

前后方领导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支援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和湘赣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后方领导人要求红一方面军向西进攻中心城市，直接实现战役上的配合。前方领导人则认为按照红一方面军现有的装备和作战能力，既没有攻打大城市能力，也没有在敌占区长时间作战的能力，因此不能进行直接战役上的配合，只能根据红一方面军自身的能力和敌情变化，求得整团整师地歼灭敌人，实现战略上的配合，并对各苏区的反“围剿”战争给予积极地指导和帮助。

9月8日，周恩来电复中央局：“我军五号始在东〔韶〕洛〔口〕集中完毕，西袭永丰不仅疲劳未恢复，落伍更多，并且，敌军已先臻安防我西进，五十二、四十三、五十九各师又均在永〔丰〕吉〔安〕附近，袭取永丰将成不可能”。“方面军现在小布、安福、平田一带休息七天绝对需要，已令二十二军及十二军在宜乐、宜南之间广大发展游击运动与新苏区”。同时指出：“在目前湘鄂西受损失，敌加紧进攻鄂豫皖，对中区前线进攻正在计划之时，我中区红军仍应以积极准备陈〔诚〕吴〔奇伟〕为主要目标，至〔于〕如何布置，须看这几天敌军行动。”之后，苏区中央局一直坚持并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向北出击，威胁南昌。9月17日，周恩来写信给中共苏区中央局，指出：“西从固县，经招携肖田，东达甘竹——这一线以北，在永〔丰〕、乐〔安〕、崇〔仁〕、宜〔黄〕、南〔城〕、抚〔州〕、〔南〕丰、黎〔川〕之间，有一块极大的地区，纵四五百，横七八百里，还完全没有赤化。”要求中央局和江西省委重视这一地区的工作，并且批评了认为红军在赣江以东地区不能发展和苏区离开红军不能发展的错误观念。9月23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再次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进一步陈述对红

一方面军行动方针的意见：

“目前红军的行动最好能立即出击敌人，开展闽北，发展局势，振兴士气，并给鄂豫皖、湘鄂西以直接援助。但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现在因敌人固守白区城市据点，在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城、南丰、黎川一线城市周围，还有广大区域未曾赤化，加以过去我们战略错误所造成的困难条件，致攻城打增援部队必须时时顾及敌人分进得以合击，又红军因疾病离队之多，补充不及，在白区还不易打击与消灭敌人三个较强的师的靠拢行动。”“因此，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作为目前行动方针。具体的布置，以大部兵力放在南丰之西直到乐安附近，以一部兵力放在南丰东南做扩大苏区工作，经过一期工作，即以小部队经常向南丰游击，引起敌军增援南丰而准备打击增援部队，并相机与闽北苏区求得联络。这一布置虽不是立即出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因为这片地区之赤化与逼近这几个城市，必能变换敌情，并给红军以有利的群众条件，消灭敌人与取得中心城市。”“在这一行动中必须估计到敌情将有变化，当其有利于我们出击时，自然要机动地集中兵力去作战”。“我们决定后日出动，如中央局有新意见，望火速电告。”

第二天，周恩来又以个人名义打电报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再次申述前线最高军事会议确定行动计划的理由，强调这是目前情形中最好的办法。同时指出，对前方的作战指挥不能老是议而不决，“军事行动须当机立断”，“前方组织既不是集权于个人负责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长有短”，因此，在作战指挥上应“须行专勿疑，大家都不放心，事情一定做不好，即使有错，也要在检阅时予以批评，否则遇事干涉，遇事不放心，即不错也会弄错。”建议中央局在后方的同志能到前方来，开一个中央局全体会议。这样既可以解决问题，又可以了解前方的实际情况。但中共苏区中央局不接受建议，复电周恩来等前线领导人：“在目前全国苏区红军积极行动艰苦作战中，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进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群众条件来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将于鄂豫皖、湘鄂西与更直接的河西十六军、八军积极而艰苦的行动，不是呼应配合的。而且更给敌军以时间来布置。分散亦有被敌袭击危险，于我们不利，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周恩来接到电报后，认为中共苏区中央局指责前线最高军事会议不能积极支援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苏区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同时还错误地给敌人以发动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准备时间，是不能接受的。他立即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中央局的电报。会上，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经过认真研究，一致认为：“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打开目前困难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须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具体布置，我们更主张



第一期以赤化南丰之西、宜、乐之南一片地区，并作战争的准备，随时打击东西进攻，或宜、乐、丰的袭击部队。这样才能胜利地配合全国红军的进攻，这自然是积极进攻的。”会后，立即将这些“考虑再四”的意见电中央局。第二天，周恩来等再次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强调：“乐安敌吴奇伟师，非高树勋一旅可比，前次攻乐犹费时两日，如攻乐三日不下，西来援敌必至，内外夹击转增不利……”因此攻乐安无把握，且用最大力量，即使能消灭吴奇伟，以现时红军实力，将不能接着打强大增援敌队。此请中央局特别注意。”同时告知中央局，现在只有执行前线最高军事会议的原定计划，“布置宜、乐中间一带战场，争取群众以调动敌人。”后方领导人因项英、邓发到闽西巡视工作，不同意到前方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周恩来再次致电中央局要求项英、邓发回来后，能到前方来开会讨论前后方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可见前后方领导人之间在如何支援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及其他几个苏区的反“围剿”问题上的分歧，已经达到了十分尖锐的地步。

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认为红一方面军应该采取“进攻路线”向北出击，攻打吉安、抚州、南昌这些中心城市和省会，才能把“围剿”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赣苏区的敌人吸引过来，减轻这几个苏区的军事压力。而前方领导则认为红一方面军当时还不具备攻打中心城市的能力。前几次攻打漳州、乐安、南丰都是乘敌人不备，采用突然奔袭的办法获得成功的。而在此之后，敌军已接受教训，注意加强城市的防卫措施。红军根据现有的训练程度和武器装备水平，采取攻坚的方法夺取中心城市将更加困难，如果硬要攻打中心城市，即使能够攻下，部队伤亡也会很大，将无力再战，在各路敌军密集靠拢的情况下，还很可能被敌军合围，那将造成更大的错误，这根本无助于支援各苏区的反“围剿”斗争，还可能使红一方面军受到很大损失。中央苏区与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相距较远，红一方面军当时的作战能力还不能直接进行战役战斗上的配合行动，而只能采取间接的配合行动。应该充分发挥红一方面军善于打运动战的特长，寻找战机，整旅整师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是最实际的支援办法。

### （三）指导湘鄂西、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

周恩来和前方的各位领导人对湘鄂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一直是非常关注的。8月初在兴国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就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作战，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红军反“围剿”。他们根据所了解到的各苏区反“围剿”情况，尽可能积极给予指导和帮助。

**对湘鄂西苏区** 1932年9月初，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得知湘鄂西中央分局面对国民党军以重兵围紧鄂西苏区，决定红三军兵分两路行动时，立即发出急电，强调指出：“分散与持久硬打是给敌人各个击破我们和分进合击的最好机会。”指示红三军：“应集结全军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先打击并消灭他这一面，以地方武装及群众的游击动作牵制其他方面，然后才能各个击破敌人。如因顾虑苏区被敌侵入而分一部兵力去堵，不仅兵少堵不住，对于决战方面又减少兵力，损失更大。”“现在中心区只四五十里，七师与八、九师应迅速设法利用黑夜小道避免战斗，偷出敌人重围圈外，集结一起，选择适当地点，准备相机打击敌人，一面并发展新苏区。中心区内外线应广大发展游击运动战，阻扰敌人，而不应照分局计划，八、九师回来，七师到另一县。”

**对鄂豫皖苏区** 1932年8月上旬，国民党军开始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

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指挥下苦战一个多月，不仅没有能够大量消灭敌人，反而处处被动不得不退出豫东南地区。周恩来和前方领导人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致电鄂豫皖中央分局，告诉他们，蒋介石“围剿”鄂豫皖苏区的战略战术，类似于去年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建议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相当的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利于我们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地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等动作，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而不宜死守某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

时隔不久，周恩来和毛泽东等人再次致电鄂豫皖红军，指出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战争环境下，“红军尚须力求避免过大的牺牲，争取便利于消灭敌人一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在一次激战后，须力争相当时间的休息与补充，以免过度的疲劳而影响和减弱红军战斗力。敌急追亦宜以游击战术去疲劳与扰乱他，以争取便于消灭他的有利条件。若机械地固守一地求战大急，反足以招致自己损失大敌人不能消灭的不利条件，敌人再进，所固守的地区仍要失去。”9月下旬，周恩来等人再次发出急电，指示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与敌决战，必须具备消灭与击破敌之一方的把握，以转变目前不利局势，并准备继续作战的力量。因我们必须估计红军补充的速度，在现时苏区条件下尚赶不上敌人继续求战之快，若仅击败敌人，而不能消灭敌人，不能缴获枪弹、俘虏，不能继续作战，这将不易变更现有局势，他苏区援助亦难消灭敌人，不易调动进攻鄂豫皖敌军。”“因此，鄂豫皖在现时必须选择敌之弱点，首先消灭敌之一部，如无此把握而苏区尚能活动，应勿急求战，多疲劳敌军，俟造成更有把握的决战。”周恩来和前方领导人的这些意见、建议，是红一方面军从作战实践中得出的宝贵经验，是非常中肯的。但是没有被张国焘所采纳。

#### （四）宁都会会议上的斗争

为了迅速作好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准备工作，9月26日，前线最高军事会议各位领导人根据战场实际，不顾后方中央局领导人的反对，决定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敌人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训令正确阐述了蒋介石第四次“围剿”的策略是先湘鄂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后中央苏区；在“围剿”湘鄂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同时，对于中央苏区则采取坚守据点，封锁围困，游击进扰，镇压群众，积极准备的方针。当前对湘鄂赣苏区和赣东北苏区的积极“围剿”，则是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前兆，其目的是解除进攻中央苏区时减少后方两翼的威胁，基于敌强我弱这一基本特点，红一方面军目前的任务是在敌人准备“围剿”的同时，进行我们的反“围剿”的准备。因为对于敌人的一次有计划的“围剿”，如果我们没有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必然陷入被动地位。临时仓卒应战，胜利的把握是没有的。这时红军的注意力，主要的要放在创造战场，征集资材，扩大自己和训练自己的计划上。训令判断未来反“围剿”的战场将会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创造战场的具体做法是：向中央苏区以北地区做为期10天的争取群众、扩大苏区的工作；部队的教育训练工作，要求消灭这一地区内敌军的游击部队，肃清地主武装，赤化敌据点附近地区，整顿扩大红军游击队，并且随时准备打击敌人的出击部队。

经周恩来同意后颁发的这个训令，全面否定了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计划。使中共苏区中央局后方领导人极为恼火，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因此，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宁都会议。

10月上旬，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有来自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和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人。

宁都会议的召开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早在1931年秋，王明、博古就开始在各苏区积极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2年1月，在《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取得胜利的决议》中，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认为“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变动了；这个变动是有益于工农的，有益于红军苏维埃的。国民党各派的力量都削弱了”。“红军成了极大的坚固的力量”，“红军与游击队的发展，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目前的任务：为扩大苏区为将几个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而争斗，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争斗。”6月21日，临时中央又作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拒绝红军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采取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提出“必须向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造成占领南昌与包围武汉的形势。”他们还要求红一方面军“采取更积极的进攻策略，使红军行动达到最高度的积极化，迅速的向外发展，消灭敌人武力，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新进攻，摧毁国民党的统治”，“夺取赣河流域的南昌、九江、抚州、吉安、赣州、萍乡等中心城市，以实现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的首先胜利，乃至争取全国的革命胜利。”并且提出：“全国主力红军的统一指挥系统必须建立起来，红军的主力必须集中，必须最大限度的迅速行动：要努力做到解除红军主力‘分散’筹款、‘分散’，做地方工作的任务（当然不是说红军不做群众工作），使红军用全力于决战方面，到白色统治区域去开展胜利的进攻，连续的战胜敌人，消灭敌人武力。”

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反对“左”倾冒险主义攻打中心城市的战略主张，认为攻打中心城市“要以消灭敌人做前提”。因此，“提出夺取中心城市的口号现在过于早”，“争取中心城市是远的前途而不是目前行动方针”。批评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迅速争取中心城市的策略是盲动主义”，“以争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发展路线是错误的。”指出，红军“现在应该向偏僻的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不断发出指示，要求“以革命的全线进攻”，回答“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革命的全线总进攻”，“完全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大‘围剿’”。并严厉指出：“谁不坚决执行积极向外发展的进攻路线”，谁就是“革命的罪人！”

会上一些人借毛泽东、朱德发布的《敌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发难，按照临时中央的意图，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毛泽东。他们把毛泽东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把未攻克赣州，反使红军受到严重损失归罪于毛泽东等不执行“进攻路线”而“遂未坚决布置”所造成的；对毛泽东指挥红军攻取漳州的胜利，虽肯定有一定政治影响，但批评为“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把毛泽东提出的，在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克敌制胜的“诱敌

深入”的战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要及时和无情的打击”。他们还批评周恩来，“对于政治情势估计不足，因此，对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及进攻的路线，缺乏明确的肯定的指出”。后方中央局成员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要把毛泽东调回后方，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前方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周恩来在会上发言承认“前方同志在会议前与发言中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但同时指出后方同志对敌人大举进攻认识不足，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不同意把毛泽东召回后方的意见，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坚持主张毛泽东留在前方，并提出两种办法：“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这两种方案都是要把毛泽东留在前方。朱德和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会上有许多人反对毛泽东留在前方，毛泽东也因不能得到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战争全责”。会议通过周恩来提议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虽然没有能够把毛泽东留在前方，但也因此而没有形成会议决议，只是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通令，仍以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因工作需要暂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由周恩来代理总政委职务。会后，周恩来到毛泽东的住处道别，毛泽东向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此后，红一方面军发布的战役计划上是这样署名的，“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恩来”。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领导人对会议的结果很不满意，他们向中共临时中央告状：“恩来同志在会议前与前方其他同志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未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电”，并且“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周恩来则在给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中表示：“我承认在会议中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临时中央支持了周恩来，但是免去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任命周恩来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与红一方面军前方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实质上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反“左”倾冒险主义之间的分歧。周恩来在这场争论中处于非常特殊的地位。虽然那时他在许多具体问题和在指导工作上，与“左”倾错误作了很多斗争，但是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摆脱共产国际和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加上他有很强的组织观念，服从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的决定，顾全大局。但是由于他能深入前线，对红军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因此能够积极支持毛泽东等前方同志的意见，根据红军的实际作战能力和当面敌情的变化，正确地定下战斗决心和制定符合战场实际情况的作战计划。另一方面，对于判断红军应采取何种基本战略方针，还缺少更多的实践基础。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经过反攻阶段，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攻之后，就应迅速转入战略进攻，扩大根据地。如果不能积极地发展红军的胜利，就是犯了右倾的错误。但是红军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因此，红军必须在

敌人发起新的“围剿”之前的适当时机停止进攻，进行休整和分散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以巩固新开辟的苏区，建设反“围剿”战场，做好应付敌人下一次“围剿”的战争准备。由于敌人的“围剿”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准备的，因此红军进攻到何种程度应转入战争准备，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转入战争准备过早，则没有能够充分利用前一次反“围剿”胜利的成果；转入战争准备过迟，则会影响下次反“围剿”战争的顺利实施。红一方面军在粉碎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之后，在发展进攻时，敌人已做好了第三次“围剿”的准备，很快开始了第三次“围剿”，红军转入战争准备过迟，曾使得红一方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开始阶段处于很困难的地步。一般说来，在不能准确判断敌人发动下一次“围剿”的时间时，宁肯早一点转入战争准备，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比前者要小，因有备而无患，其所得则是从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周恩来是在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三个多月之后来到中央苏区的，未能经历“围剿”与反“围剿”战争的反复，因此还不能深切了解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这一基本特点。

### 三、组织指挥第四次反“围剿”

宁都会议后，周恩来决定向敌人力量较空虚的东北方向发展。他和朱德、王稼祥决定，红一方面军向广昌东北出击，乘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部署尚未完成之际，发起建黎泰战役，迅速击破其一方，以求先打通与赣东北苏区的交通线，进占黎川、建宁、泰宁三城，并首先赤化宁化、建宁、广昌之间的一片地区，解决红军的给养与冬装问题。在红一方面军发布的战役计划上，周恩来注明，“如有便，请送毛主席一阅。”此后，所起草的作战文电在报送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同时，也报送临时中央政府，以便毛泽东能够随时了解红军的作战情况。

周恩来和朱德亲赴前线指挥作战，决心择敌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向敌发起进攻，争取以较小的代价打开赣东闽北的局面，并调动敌人，以求在运动中寻找战机，大量歼敌。他们以红二十二军为右纵队向泰宁之敌进攻，红一军团为中央纵队向建宁之敌进攻，红三军团为左纵队向黎川之敌进攻，红五军团为战役预备队。1932年10月16日，红军开始向建黎泰地区开进，从10月18日到10月24日的7天时间内，连克赣闽边界的黎川、建宁、泰宁、邵武、光泽5城，并在新开辟地区以备战姿态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征集资材。建黎泰战役的实施沟通了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但是未能达到调动并大量歼灭敌人的目的。11月中旬，为了继续调动敌人，寻求战机，周恩来、朱德决心发起金溪、资溪战役，命令红一方面军继续向北发展进攻，指挥红军接连攻克了资溪、金溪两座县城，开辟了大片新的苏区，并且分别在渭水桥、游湾、黄狮渡、枫山铺等地将向金溪合击的敌军击退，这几次战斗，红军虽然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是由于分兵击敌，未能将其歼灭，没能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

#### （一）实施战前准备

在此期间，湘鄂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红军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的指导下，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进攻。继9月底红三军退出湘鄂西苏区之后，红四方面军主力也于10月10日越过平汉线，向西转进。这样，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第四次“围剿”就迫在眉睫了。周恩来

和朱德、王稼祥连续向红一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发出紧急训令，指出：敌人“正将四次‘围剿’的重心从湖北移到江西”，“加速的在布置大举进攻中央苏区”，号召全体红军战士“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来消灭敌人，来争取比（第）三次战争还伟大的胜利。”敌人大举进攻的战火就在眼前，要“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一切牺牲，抛弃一切动摇，来争取战争胜利。”周恩来认为，在两次进攻战役都没有能够打破和制止敌人第四次“围剿”准备工作的情况下，红军应该转入积极的备战工作。在他的具体组织指导下，中革军委按照敌人可能进攻的方向，将中央苏区划分为东北、东南和赣江3个作战地域，各设立了总指挥部，任命陈毅、叶剑英、马炳连分别为各个战区总指挥，统一指挥战区内的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为更好地发挥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的整体力量打击敌人创造了条件。但是临时中央不同意周恩来备战的主张，指示红一方面军主力攻打南城。周恩来认为国民党军队在没有完成进攻部署之前，是采用“固守坚固堡垒工事，集结兵力待机出动”的策略，红军应坚持“集全力引动敌人，求于运动战中解决之。如直攻南城，则敌集重兵于此，地形工事较邵武尤险，攻之于我不利。”他和朱德一起，利用和临时中央争论未决之机，一方面对红军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和教育，使全体指战员深刻了解自己所担负的政治责任，努力提高军事技能，坚定牺牲的决心和团结制胜的信念。另一方面为了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进行战前改编、整顿和训练。他们将赣南、闽西、和闽浙赣苏区调来的红军第二十一、第十二、第十军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使红一方面军发展到3个军团、4个军和若干个独立师、团，共约5万余人；健全军团和军两级参谋部，建立师参谋部，着重对机关进行了精减，减少了指挥层次，充实连队的战斗兵员；发布《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关于军事训练问题的训令》和《红一方面军一周间集中训练大纲》，要求各级指战员必须抓紧战斗间隙进行军事训练，重点学习《步兵战斗条令》、《步兵教程》。针对部队在作战中出现的问题，规定一般战士，要学会目测距离，做到善于使用手中武器，达到射击准确，刺杀熟练，投掷手榴弹能命中目标，要求每班中培养一名特等射手和一名观察员；要善于利用地形地物，特别注意伪装和夜间动作，提高夜战能力；要学会长途行军的本领；还要学习各种侦察及警戒的本领。规定指挥员，一要学习指挥劣势兵力兵器的军队对优势兵力兵器之敌军作战，能以迅速秘密的手段，在相当的地点和时间内，集中一切力量，干脆地消灭敌人，使敌运转不灵，援助失效，被我各个击破的能力；二要学习根据任务、敌情和地形而定下决心，并坚决实现此决心，不可有一成下变的处置，尤不可有三心二意的犹疑不决；三要学习确定进攻的主要方向和次等方向，分出主力的突击方向和一部的钳制方向；四要学习人力与运动的配合，特别是冲锋或反冲锋的火力准备和火力援助，以及实施斜射、侧射、交叉射的火力效用；五要学习组织火力和运动追击，迂回和包围敌人收容队，使其无整顿的余暇，同时整顿部队，防止敌人的反冲锋。同时还强调部队要重点学习山地战斗和遭遇战斗的战术。这一系列措施，使红军的素质有了提高，战斗力得到加强，装备得到改善，为红军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创造了条件。

1932年12月下旬，蒋介石从湘鄂西和鄂豫皖调往江西的部队大部到达，对中央苏区两翼的湘赣、湘鄂赣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围剿”正加紧进行。在南昌指挥的何应钦制定了“以三路分途向匪巢进剿，主力集中于中路，包围匪军主力于黎川附近地区一“举而歼灭”的作战方针，12月30日下达了

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命令。中路军以蒋介石嫡系部队为主的12个师约16万人组成，由第十八军军长陈诚任总指挥，任务是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左路军以驻福建的6个师又1个旅组成，由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右路军以驻粤北、赣南的粤军6个师又1个旅组成，由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任总指挥。左右两路军分别担负在闽西和赣粤边地区的“剿办”和策应中路军进攻的任务。以4个师又2个独立旅担任永丰、乐安、南丰、南城、抚州及万安、泰和等地的守备，防堵红军并维护后方交通。以第二十三师为总预备队。以2个航空队支援地面部队作战。陈诚到达抚州后，将中路军的12个师编成3个纵队。第一纵队以3个师组成，由罗卓英任纵队长，在宜黄南部地区集中，向广昌方向进攻；第二纵队以4个师组成，由吴奇伟任纵队长，在抚州以南地区集中，与第三纵队协同作战，侧击黎川；第三纵队以4个师组成，由赵观涛任纵队长，在金溪地区集中，与第二纵队协同作战，向黎川正面进攻。另以1个师为预备队。限令各部队于1933年1月6日以前集中完毕。

国民党各部队行动缓慢，没有按时到达指定集结地区。蒋介石大为恼人，于1月底来到南昌，亲自组织指挥这次“围剿”。他表示，“剿除长江流域之赤匪”，特别是“肃清赣匪”，是他“深思熟虑经千百回而决定之方针”，并于2月6日自兼江西“剿共”总司令。

## （二）反对攻打南城、南丰

在如何粉碎敌人“围剿”的问题上，周恩来、朱德等前方的领导人有着战争实践经验，对红军的作战能力和敌军的情况有深切的了解，因此在如何反敌人第四次“围剿”的问题上，与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有着很大的分歧。

周恩来等认为红军的主动进攻必须是有条件的，要符合红军的实际作战能力，决不能实行红军作战能力所不及的盲目的进攻。在作战方向上，周恩来主张选择敌人的左翼出击，在抚河以东、信江以南之间的广大地区于运动中消灭敌人。敌人如向苏区中心进攻，红军则可击其侧翼；敌如向金溪、资溪、光泽地区寻我主力决战，红军则可南依中央苏区，北托闽浙赣苏区，利用这一地区多山的有利地形，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虽然这一地区根据地建设尚未完成，但红军在这里作战和开展群众工作已有三个月的基础，只要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充分做好支前工作，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而我军具有的这些有利条件都将是敌人的不利条件。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则要求红一方面军主力从正面出击。他们认为红军主力出击金溪、资溪地区，离苏区中心地区太远，后方感到受敌威胁太大，敌人如向苏区腹地进攻，则会打破许多坛坛罐罐，坚持要红军到抚河以西地区作战。在作战方法上，周恩来等主张利用山区的有利地形，以运动战为主要手段，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则坚持要红军主力去攻打南城、南丰等敌人坚固设防的城市，求得消灭敌人的增援部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敌人的包围圈，粉碎敌人的“围剿”。这样，前后方的领导人再次爆发了激烈的争论。

1933年元旦，红一方面军全军在黎川城举行北上誓师大会，周恩来出席了大会。第二天，周恩来和朱德一起率领红军出发，向金溪地区开进。1月4日，红军以一军团、三军团、二十二军、三十一师的绝对优势兵力，以突然动作将驻守在金溪以南20余公里处的敌军1个旅包围，战至第二日，将敌军全部歼灭，并乘胜再次占领金溪县城。国民党军为夺回金溪，由吴奇伟指挥3个师的兵力，由抚州和金溪之间的浒湾出发，分两路向黄狮渡和金溪夹击。

周恩来和朱德决心集中优势兵力消灭这股敌人。1月8日，红军主力在枫山铺与敌军遭遇，经过激烈战斗，红军将西进的敌军全部击溃，并跟踪猛追，沿抚河东岸直追至抚州城对岸的千金坡机场。两次战斗共俘敌4000余人，缴枪4000余枝。红军初战的胜利，为粉碎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创造了条件。

苏区中央局不顾红军已经取得的胜利，坚持要红军主力攻取南城。1月16日，项英等致电周恩来、朱德，要求一方面军主力迅速转移到抚河以西，调动敌人作战，“首先打击南城城外敌人”。1月24日，又致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我们绝对的要你们在将来关于策略上的问题立即告诉我们，不要拖延过迟，我们要你们站在一致的路线上执行以下的指示”，“集中我们所有主力取得南城并巩固和保持他”，“然后再进攻和取得南丰并巩固和保持他”，并强调指出：“特别着重的指示占领南城和南丰。是以上新作战计划重要的一部分。”要求“立刻将你们和前方的决定清楚直接电告我们”，“并电告我们执行之结果”。

1月7日、27日，周恩来两次致电苏区中央局，不同意进攻南城、南丰两城的决定，主张红军在抚河以东以运动战消灭敌人。他在电报中指出：“依现时敌情，即抚河流域敌之两个较强的‘进剿’军还未组织完备以前，我军能在抚河东岸会合十一军求得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确比围攻南丰暴露我军企图去打敌增援队为好，且抚河东这一地域，幅员并不窄，地形尤好，尤便征集资材”，“转到抚河西，须攻城才能立即调动敌人”，“一有暴露企图二有易受夹击的不利，故不如在东岸自如。因此在东岸目前如不能求得运动战，决不应轻易过河。这须请你们注意。”并重申红一方面军当前的方针是“万分谨慎地弄清敌情，以迟迟进逼的战略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的胜利，决勿忽视敌之进攻与截击的观令。”

1月30日，周恩来再次致电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陈述不应强攻南城和南丰的理由，说：“连续的残酷的战斗转眼就到。我如立即转到抚河西，只有攻城才能调动敌人。攻城除前电所述，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之不利外，还有三损伤大，四不能筹款，五耗费时日的不利。在大战前如蒙此不利，而坚城又攻不下，增援军三个师并进又不便打，则不仅未破坏敌人进攻部署，且更便于敌人的进攻。因此在敌人部署完毕前，如能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我都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城。”

2月3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连续的残酷的战斗立刻就到，战争与军事布置更应确定统一指挥，提议中央局经常给我们前方以原则上与方针上的指示，具体部署似宜属之前方。”

### （三）南丰撤围，诱敌深入

1933年1月下旬，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苏区。从此，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全部大权都集中在博古的手里。苏区中央局在临时中央的直接支持下，拒不接受周恩来为首的前方领导人的意见，寸步不让。第二天就复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强调“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避免攻击坚城”，要求“在总政治任务之下，应以抚州为战略区，目前行动先攻南丰”，“并乘胜威胁南城、抚州是我们目前的方针。”并以“经中央局全体通过”的名义，强令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得不于2月7日向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报告关于攻击南丰的部署。针对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顽固地坚持错误决定，愤怒地质问道：



“坚持唯一是猛攻南丰，虽大损失亦所下惜，虽敌三四师由马路并进亦非与之决战不可？”电报发出后，周恩来冷静地思考如何才能使红军减少伤亡。他再次致电中央局，建议寻求机会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提出红军不宜先在攻坚上损伤过大的战斗力，如损伤大而又不能攻入，则将严重挫伤士气，要求中央考虑前方同志的意见，同时他还与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要求博古、张闻天到前方来实际了解红军的情况，并且“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非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在情况变化或不利的条件下，使负责者非常困难处置。因在组织上，尤其在军事上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不容丝毫延搁；但在责任上、环境上我们又不得不向你们陈述意见。”而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执意不肯。周恩来、朱德只得在2月9日率领红一方面军向南丰开进。为减少强攻南丰可能造成的损失，周恩来设想了多种方案：“如强袭不成，而已驱逐城外工事中敌人，则可一面坑道作业，一面准备打击增援队”；“如城外工事中敌人尚未驱逐，而敌增援队已至，则只能准备打击增援队”；“如我牵制敌人兵力不奏效，敌以增援队三四师由马路并进，迎击则我受夹击，侧击则便于城内外敌人会合，如此则便须转移地区，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解决。”这就为后来改变决心，撤围南丰，实行以运动战打破敌人“围剿”奠定了基础。2月12日，红军完成了对南丰的包围，傍晚发动了全线进攻。经一夜激战，红军消灭敌军不足1营，而自己伤亡达400人，红三师师长彭邀亲临前线侦察敌情，指挥攻击，不幸牺牲。

红军进攻南丰，陈诚立即作出反应。他深知南丰城地势险要，是“进剿”中央苏区的重要支撑点。因此，一方面电令陶峙岳指挥第八师6个团，坚守南丰，第二十四师从南城驰援南丰，吸引红军于南丰城下；另一方面令其中路军3个纵队立即迅速南下，分三路向南丰合击，企图将红一方面军主力消灭于南丰地区。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和朱德商量，毅然决定不待请示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改强袭南丰为佯攻”，将红军主力秘密撤出战斗，向南丰西部一带集结，准备背靠苏区，待机消灭敌增援部队。周恩来的这一果断决策，使红军避免了一场严重危机，从反“围剿”初期的被动局面中解脱出来。重新争得了战场主动地位，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后来对这个正确的决策十分赞扬，说：“第四次反‘围剿’，时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

#### （四）黄陂战斗

2月22日，周恩来、朱德得知国民党中路军第一纵队3个师将由乐安、宜黄向东推进，企图迂回我军后方；第二纵队3个师由抚州经南城向南推进；第三纵队4个师由金溪地区沿抚河东岸向南推进。他们考虑到敌人3个纵队共10个师的兵力，相互靠得比较近，过于集中，难以寻找战机，各个歼灭，毅然决定撤围南丰，采取退却步骤，令红十一军伪装主力东渡抚河，向黎川方向退却，迷惑和吸引敌人主力向东追击，迫使敌各纵队拉大距离；主力陆续从南丰以西地区秘密向中央苏区的东韶、洛口地区转移，待机寻歼运动之敌。这一正确的战略决策，是红一方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关键。

红十一军的佯动和苏区人民群众严密封锁消息，使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退向黎川，一部退向广昌。2月24日，陈诚为寻求红军主力决战，命令第一

纵队于宜黄南部地区集中，然后向广昌、宁都推进，堵截红军归路；第二纵队由南城、南丰侧击黎川；第三纵队由金溪地区南下，从正面攻击黎川。三路纵队分进合击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敌第一纵队指挥官罗卓英接到陈诚的命令后，即令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由乐安地区东进，亲率第十一师由宜黄南下，两军在黄肢会合后，一起向广昌、宁都进攻。26日拂晓，敌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分两路，间隔十余里向东开进。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敌第一纵队与其他两个纵队相距较远，其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向黄陂东进，右翼完全暴露在红军面前。黄陂一带山高林密，层峦叠障，道路崎岖，地势险要，有打伏击战的良好地形。去年乐安、宜黄战役后，红军就在这一带发动群众，准备战场，大多数指挥员都专门勘察过这一带的地形，对战场情况非常熟悉，是歼敌于运动中的大好时机。他和朱德立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拟于二十七日，以遭遇战在河口、东陂、黄陂以西，东坑岭、固岗、登仙桥以东地带，侧击并消灭乐安来敌。”为了行动迅速，命令还规定全军分为左、右两路，平行北上，包抄敌军。左翼队以一军团、三军团、二十一军组成，由林彪和聂荣臻统一指挥；右翼队以五军团、二十二军组成，由董振堂和朱瑞统一指挥；独立第四师和独立第五师牵制敌第十一师，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保障右翼队的侧翼安全；十二军为预备队。

当晚，周恩来和朱德率领4万多红军，冒着连日阴雨，翻山越岭，披荆斩棘，向预定地区开进。他和红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发出指示，号召各部队以最大的决心与勇气争取第一仗的大胜利。要求全体红色指战员绝对服从上级命令，自觉执行行军、宿营尤其是火线上的纪律，克服一切疲劳困难进行战斗；要求共产党员以身作则，在战斗中成为“绝对的模范”，利用行军宿营与作战间隙进行鼓动，提高指战员士气；要有组织地在火线上开展对白军士兵的宣传工作；要求无论战斗如何紧张，时刻不能失去与群众的联系。27日拂晓，红军先敌到达了黄陂、蛟湖地区，隐蔽在深山密林中。由于当地群众帮助封锁消息，加上山林中大雾迷漫，红军如此大规模地运动竟没有走露一点风声。下午1时，敌军两个师分别进入了红军的伏击圈内。周恩来、朱德立刻命令红军突然发起全线攻击。经过两天激战，全歼敌第五十二师，消灭第五十九师大部，俘虏敌师长李明和陈时骥。红军取得了第一回合的重大胜利。

聂荣臻在回忆这次战斗时说：“我们才发出总攻信号，顿时象天崩地裂似地爆发了震动山岳的枪炮声，把敌人的师部和四个团加辎重部队，压到了蛟湖北面我军的伏击阵地。这时，敌五十二师师长李明以一个团冲锋，一个团掩护的办法向我阵地猛冲，企图突围逃跑。打到后来，敌人东奔西突，想夺路逃跑，果不出所料，他们是企图从西北面突围。我赶到了十一师三十二团的指挥阵地，刘亚楼也到这个团的指挥阵地。凭肉眼就能看出，向西北突围的敌人，持短枪的不少，似乎是敌人的指挥机关和他们认为得力的掩护部队。而且它越攻越接近三十二团驻守谷口的山头。我一边用望远镜观察，一边对该团政委杨成武说：‘这是紧要关头！’杨成武很激动，扬起驳壳枪，边跑边喊：‘同志们跟我来，冲呀！聂政委刚才讲了，这是紧要关头，冲呀！’他带领部队迅速将这股敌人压到了谷底，与友军一起展开了捉俘虏竞赛。这时，我手头只有一个特务连”，“当时这激动人心的战斗场面，我顾不得这些，带着那个特务连冲了下去。只见敌人的军官到处东奔西窜，嗷嗷乱叫，

一个个束手被擒，那真是痛快啊！那时蒋介石实施连坐法，敌人后卫一个团在登仙桥附近眼看着主力已被歼，它仍然不退，被刘海云同志带着他那个师把这个团歼灭了。”

敌第五十九师溃败时，师长陈时骥率残部数百人乘夜暗向蛟湖方向逃窜。他甚至还不知道第五十二师已先于他覆灭，还给李明写了一封乞援信，信中写到：“文献兄：弟无能，于本日午后一时失利，现部队已溃散，弟仅率士兵数十人在距蛟湖七八里之山庄中，请迅速援助为盼”。不久他及其所有的随从都当了红军的俘虏。

这次战斗，红军消灭敌军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聂荣臻回忆说：“至于武器弹药，山山谷谷，丢得到处都是。许多新式自动武器和望远镜还未开箱就被我们缴来了。附近几个县，派了很多农民前来帮助红军打扫战场，搬运战利品，搬了一个星期才搬完。”朱德后来说：“那都是最精锐的兵，有最新式的捷克轻机关枪几百挺，还都是一枪未发过的。因为敌人不晓得，来袭击我们，却不料突然遭到我们的袭击。这次的袭击算是最大部队与最大的成功。”

#### （五）草台岗战斗

红军在黄陂围歼敌军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时，陈诚急令第二纵队的3个师、第三纵队的2个师迅速向第十一师靠拢，解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之围，并寻歼红军主力。周恩来当机立断，未等战场清理完毕，即令主力部队秘密撤离战场，再次向苏区腹地撤退，集结在广昌以西的东韶、洛口、小布、南团地区，隐蔽待机，准备“仍选敌一翼，求于运动战中消灭之。”由于苏区军民严密封锁消息，陈诚仍以为红军主力滞留于东陂以南太平圩、固岗、招携一带地区。从3月初开始，敌人在这个地区转游了十多天，连红军主力的影子也没有找到。

3月中旬，陈诚将“围剿”初期的“分进合击”战法改为“中间突破”，并重新调整部署，以第二纵队3个师为前纵队，以第一纵队残部加强第三纵队的第五、第九两师为后纵队，采用交叉掩护的办法，梯次轮番向东南方向搜索前进，徐徐向苏区的腹地广昌推进。由于敌人队形密集，行动谨慎，不便于红军各个击破。3月16日，周恩来决定，调红十一军“至广昌西北，配合独立师、团及地方武装，牵制并抑留敌进攻广昌之前纵队。我主力决以待机姿势，准备侧击敌之后纵队，并首先消灭其行动中后卫部队，以便连续作战，各个击破敌人。”陈诚果然被周恩来这一措施所迷惑，误认为红军主力位于广昌附近，立即命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前进，并将后纵队的第五师加强给前纵队，以增强进攻力量。此时红军主力经过十多天的休整和补充，士气旺盛，正秘密地向敌之侧翼运动，准备进至草台岗、徐庄一带隐蔽待机。这个地区，四周群山环抱，峰峦起伏，丛林密布，道路崎岖，敌人的重装备难以发挥威力，飞机难以实施有效的空中支援，而装备轻便又擅长山地运动战的红军，却易于发挥自己的优长。这里正是毛泽东去年9月所选定的战场，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

3月20日，敌军前后两个纵队已相距百余里，后纵队也是一字拉开，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其前卫第十一师已到达草台岗、徐庄地区，第五十九师残部紧随其后，与在东陂、五里排的后卫第九师相距30余里。第十一师是陈诚赖以起家的部队，是蒋介石嫡系中的主力，装备最好，战斗力也最强。这时刚好孤军行进在险峻的山路上，兵力无法展开，火力难以施展，前后不能

呼应。而红军主力已秘密接近草台岗地区。周恩来和朱德立即抓住这一战机，果断改变原定消灭敌后卫师的计划，决定：“于二十一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岗、徐庄附近之十一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21日拂晓，红军以一军团、三军团、五军团主力和十二军从四面向敌第十一师发起了围攻，以一部兵力向东陂、五里排之敌发起攻击，阻止其向第十一师增援并加以牵制，另以一部切断敌人前纵队与第十一师的联系，并阻其回援。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将敌第十一师和第五十九师残部基本消灭，第二天又在东陂歼敌第九师一部。这次战斗，红军击毙敌团长4名，击伤敌师长1名、旅长和团长各2名，消灭敌军万余人，缴枪数千枝。

黄陂、草台岗两次战斗，是第四次反“围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共歼敌3个师2.8万人，缴获各种枪支1万余枝。至此陈诚不得不停止进攻，改取守势，指挥各路军向抚州方向退却。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这两次战斗，是周恩来和朱德运用“诱敌深入”方针，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法，首创一仗歼敌2个师的战例，充分体现了他审时度势，决心果断，机动灵活的高超指挥艺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赞扬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一次“空前光荣伟大胜利”。江西军区司令员兼东北战区总指挥陈毅当即赋诗《乐安宜黄道中闻捷》一首：

千崖万壑供野宿，羊肠鸟道笑津迷。

半夜松涛动山岳，中天月色照须眉。

工农儿子惯征战，四破铁围奇中奇。

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陈诚接到蒋介石手谕后哀叹，“诚虽不敏，独生为羞”。

#### 四、红军建设和作战理论的新发展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在领导军事斗争的一年多时间里，特别是从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实践中，对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规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对党的工作重心是开展武装斗争，武装斗争的中心是在农村这一基本的方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能够把这一基本思想用于指导战争。他认真研究和总结红军的作战经验，学习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形成了自己指挥作战一系列原则和方法。他为红军的全面建设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使红军的建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红军的战斗力空前提高，并取得了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伟大胜利。

##### （一）坚持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

周恩来在到中央苏区之前，就已确立了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中心应该放在农村的思想。到了苏区之后、从亲身的实践中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农民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所爆发出来的革命力量之伟大，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他坚持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他与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关于红一方面军作战方向上的争执，实质上就是把武装斗争的中心放在广大的农村，以发展农村根据地为主要任务，还是以红军夺取大城市，求得“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为主要任务的斗争。

周恩来用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思想指导战争，坚决支持毛泽东反对攻打吉安、樟树、南昌等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主张，强调红军要在敌人统治薄

弱的地区发展进攻，扩大苏区。他指出：我们“多争取一分群众，多赤化一个地方，多组织一个游击队，敌人即多受一分威胁。以赤色包围城市与以武力封锁城市，前者较后者尤能持久地围困敌人，便利我红军由间隙中出击，使敌人（要塞）失其支点的作用。”例如，在乐安、宜黄战役胜利后，苏区中央局坚持要求红军去攻打吉安、抚州、南昌等大城市，而周恩来则把眼光放在永丰、乐安、崇仁、宜黄、南城、抚州、南丰、黎川这一大片“纵四五百里，横七八百里”的广大农村，力求尽快地将这一地区建设成为巩固的苏区。这种思想体现在战术运用上，则表现为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还是以攻城掠地为主。周恩来强调：“我终觉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坚城之背后，否则徒损主力，攻坚不下正中敌人目前要求。”他的这些认识和主张，对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 （二）总结归纳红军的战略战术

周恩来非常注重从战斗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他认为这是提高指挥员理论水平 and 指挥能力的重要方法，是战士提高战术、技术水平的重要途径。他要求红军指战员，每次战斗之后，都要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进行战斗总结，每打一仗都要有所提高，每吃一堑就要长一智，不能使红军的鲜血白流。尽管周恩来日常工作非常繁忙，但每战之后，他都亲自进行战斗总结，报告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以便各种经验能够迅速推广。他还身体力行，连续发表了《论敌人的要塞——（堡垒及炮台）与围攻乐安的教训》、《从实际战斗中认识战术原则》、《火力与突击》等一系列文章，对红军的作战进行了认真而中肯的分析，使红军的许多作战原则不断地得到深化和发展。

1. 必须从全局上把握战争的趋势。领导一个战略区域的战争，应该首先从研究当时国际或国内的整个形势入手，根据敌人力量的变化，提出整个红军的总任务和实现任务的总方针，并以此作为制定作战计划的依据。正因为如此，周恩来能够高屋建瓴，统揽全局，掌握各个局部环节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因素，迅速抓住影响整个战争局势的关键环节，把握指导战争的主动权，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计划，使战役、战斗在各个阶段之间有机地联系起来，一环扣一环，把战争引向胜利。把握战争全局，不仅是指导战争的基本法则，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思想方法，只有从全局着眼，才可能在具体问题上避免产生盲目性和发生偏差。

2. 强调运动战，尤其是山地运动战，应是红军的基本作战形式。坚决反对攻打敌人坚固设防的城市，这是他与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长期争论的焦点之一。为此，他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在紧急关头甚至采取断然措施，不征得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的同意，即指挥红军撤出攻打敌人坚固要塞的战斗，转而以运动战形式与敌作战。他在《论敌人的要塞——（堡垒及炮台）与围攻乐安的教训》一文中总结了红军作战中的经验教训，指出敌人“是要用野战军乘我军长久硬碰、踌躇紧贴或留恋不舍（如攻赣教训）干某一要塞之下来消灭我们。”因此“一般说来，我们应先消灭敌的野战军，再攻取其要塞。”批评那种坚持“以为在要塞大空隙中不能作战，而主张专打要塞”的错误观点。同时，他又辩证地指出红军并不是一味地反对攻打敌人的城市，“对敌人要塞用兵，应基于战略和政策必要上来决定，实行时又须依据当时情况来决定”。就是不仅在战略上和政策上需要，而且还必须要具备攻打的条件，即敌人没有坚固设防，或完全不知道红军即将实行的攻击而麻痹大意

的情况下，以突然袭击手段去夺取敌人的城市。例如红军攻取漳州，袭取乐安、宜黄便是如此。

3. 坚持红军作战的基本指导思想应该是歼灭战，力求通过消灭敌人来补充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实行歼灭战的方针，必须把握好的几个原则和方法：

一是在力量使用上，坚决贯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周恩来在作战指挥中，始终强调要“在决战方向集中优势的兵力和兵器”，“我们要用少数的兵力放在次等方向，去抓住多数的敌军，以便抽出多数的兵力，在主要的突击方向，有把握的去消灭敌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周恩来运用这一原则，集中红军4万多人包围敌人两个师，其中又以主要力量首先围歼第五十二师，奏效后再转兵歼灭另一个师。从而能够迅速解决战斗，取得了一战歼灭敌军两个师的胜利。

二是在选择打击对象上，坚持“避强击弱”的原则。所谓“弱”敌，除了战斗力较差之敌外，还包括那些态势孤立、运动之中、立足未稳、地形不利、饥疲困乏、疏于戒备以及由进攻转为迟却之敌，应适时抓住战机，加以歼灭。1932年7月，周恩来力主红军改变原定攻打敌主力部队守备的万安、吉安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乐安、宜黄方向攻击，取得了乐安、宜黄战役的胜利。草台岗战斗中，当兵员充足、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敌第十一师处于孤立、运动之中、立足未稳，地形不利等态势时，周恩来果断改变原定计划，将敌第十一师作为首先打击的对象，成功地一举将其全部歼灭。

三是在战术运用上，善于采取“迂回包围”的原则。周恩来在指挥黄陂、草台岗两次歼灭战的过程中，采取二面、三面，甚至四面包围的部署，以一部兵力正面牵制，主力迂回敌之侧翼，断其归路，从侧后发起攻击；同时控制强有力的预备队，适时用于主要突击方向或随时准备追歼突围之敌，因而取得了大兵团歼灭战的胜利。

四是在战斗中，坚决实行“速决战”的原则。能否“速决”，是周恩来定下战斗决心时所考虑的重要因素。他认为不能速决的进攻战斗，对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红军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因此，他在签署的许多作战命令中都十分强调“速决”、“采取迅雷手段”等等。为了达成“速决”，红军应以袭击、伏击、远距离奔袭等为主要作战手段。

五是千方百计地调动敌人，创造歼敌战机。周恩来善长谋略，利用佯动、示弱等手段，诱使敌人判断失误，大意轻敌，错误决策，贸然急进，造成原先两翼配合、前后呼应的整体布局被撕裂，出现漏洞。结果红军适时抓住战机，接连以两个漂亮的歼灭战，一举粉碎了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第四次“围剿”。在黄陂战斗中，周恩来命令红十一军向黎川方向佯动，吸引敌第一纵队向东跟进，主力在东韶、洛口一带隐蔽待机，准备侧击敌人。为了更有效地吸引敌人，红军假拟了一份乐（南）军分区司令员给乐（北）军分区司令员的文件：“我工农红军正围攻南丰，旦夕可下，惟乐安之两师白军，若向河口、黄陂前进，则我红军不特无法攻下南丰，本身亦感至大危险，万望派人监视此两师敌人，果其南来，即迅速报告，予当率乐大两团竭力抵抗之”。敌人获得这一情报后，判断乐安附近无红军主力部队，令第五十二、第五十九两师放心大胆地向东开进，结果被红军全歼。

4. 红军的战术必须是灵活多变的。他对红军的战术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和概括，认为袭击是红军的主要战术。要想达成奇袭，“奇袭部队在事前要有正确的侦察，适当的编组，绵密的伪装，恰切的袭敌部署，临事要秘密向

攻击点潜行，遇敌警戒兵或小部队，则以一部当之，且用白刃刺杀之，主力仍应猛向攻击目标前进，……一旦为守兵查觉时，则决行猛烈的强袭，力求到达目的”；进攻的战斗队形应有纵深配备，适时扩张战果；火力必须与部队的运动与突击紧密配合。指出：“为了要在战斗中移动人器接近敌人，使其更有效的摧破敌人，又为了要引导步枪战士接近敌人，用白刃消灭敌人，这都需要运动的，所以运动成为步兵战斗中很重要的因素，然而火力又是压伏敌人火力的抵抗，并束缚其意志，以掩护步兵运动，使其少遭损害，接近敌人，突击敌人。于是火力又成为与运动不可分离的东西。”在火力运用上要以交叉射、侧射、斜射为主；战斗中各个方向上的部队必须协同动作，密切配合，用穿插分割等战术；注意运用伪装和欺骗手段隐蔽自己的意图；在作战指挥上，他认为应在上级总的意图下遂行战斗任务，同时又要“能适应情况变动，在不违反整个意图下，发扬其机断专行的能力”，要求红军各级指挥员“特别提倡活泼机动的运用战略战术，而不需要呆板的服从命令，对于任何情况的变动都不越雷他一步”。在战斗作风上，提倡发扬勇猛顽强、不怕疲劳和连续战斗的作风。

### （三）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

周恩来认为建设一支无产阶级化的、有极强战斗力的红军，是实现党的任务的保证，是红军战胜敌人的前提。因此，他以极大的精力全面抓紧红军的建设。

1.调整部队编制，适应战争需要。随着“围剿”与反“围剿”战争的不断扩大，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也需要不断深化。周恩来非常重视适时调整部队编制，使之不断适应战争需要。他到中央苏区后不久，就决定改变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红一方面军所属部队的做法，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和3个军团的编制，重建了红一方面军总部。这一措施改善和加强了红军的作战和指挥。

为了进一步适应大规模运动战的需要，在周恩来主持下，拟制了《中国工农红军军团暂行编制表》，健全和统一了红军军团以下的编制。对各级机关进行了精简，军团以下不再设军一级的编制，改由军团直接指挥师，方面军直接指挥的各个军仍保留。同时，建立健全了军团或军、师两级司令部，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如报告制度、军职划分规定、《保护红军文电、电台机密的几项规定》，以及《工农红军纪律暂行条令》等，大大提高了司令部的参谋业务能力和组织指挥能力，初步改变了机关臃肿的状况。

为了保障作战决策和指挥的需要，周恩来以加强侦察情报工作为重点，整顿各级侦察队，开办谍报班。他强调：“侦察工作是组织战斗的第一步工作，是首长下定决心的基点，是完满作战计划的主因，是战斗过程复杂环境中达到机动的先决条件。它能使战略更加巧妙，使红军的战斗力更加发扬，因此它是司令部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并亲自掌管和领导红军的情报工作，为红军的作战及时提供了大量准确可靠的情报。

为了进一步加强红军的统一指挥，提高大部队协同作战的能力，适应大规模运动战战场瞬息变化的情况，迅速捕捉战机，灵活机动地歼灭敌人，周恩来着力整顿无线电队，要求电台工作更加健全起来，使之成为红军主要的通信工具，及收集情报的重要手段，保障作战时能够进行适时而不间断的指挥。后又在红军无线电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工农红军通信学校，培养通信技术人才。

2. 加强军政训练，提高部队素质。周恩来非常重视红军的军政训练，认为这是提高战斗力的重要保证。由于红军战斗异常频繁，没有专门时间进行训练。因而，他规定部队必须“利用战斗间断及配置后方的一瞬间内来实施训练”。要求各部队抓紧难得的战斗间隙，切实进行短期训练。规定政治训练以进行阶级教育为主，增强指战员英勇斗争的决心和团结制胜的信念。军事训练在技术上要以练射击、刺杀、投弹、目测距离为主，学会利用地形地物，特别是夜间动作。在战术上要学会组织和运用火力。干部训练主要是学会组织指挥战斗，在进攻战斗中如何选择主要、次要和钳制方向，确定进攻部署；战斗胜利后如何组织兵力、火力追击以及打击敌人的反扑，巩固阵地和整理部队；学习如何组织侦察、警戒和保持顺畅的通信联络。特别要重视研究以劣势兵力兵器的军队对优势兵力兵器之敌军作战的战法。

他多次起草和签署的加强军政训练的训令中，始终贯穿着练为战的指导思想，强调把学习军事技术和加强政治教育作为当时的中心任务，特别强调政治工作干部也要学习军事。各级军政机关要运用多种形式、采取各种办法、千方百计地提高部队练兵热情，提高训练质量。为了消除训练中的薄弱环节，还专门发出加强勤务人员训练的训令和新战士教育训练的训令，在全军掀起了“学习提高新的军事技术”的活动。

周恩来极为重视干部的教育训练和培养。一方面他要求各部队根据需要组织各种集训班，有针对性地对在职干部实行短期培训，另一方面他非常重视各类红军学校的建设，签发了《关于改编红军学校的命令》，先后扩建和组建了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以及培养炮兵、工兵、装甲兵、防空兵等技术兵种人才的红军特科学学校、工农红军通信学校、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工农红军供给学校、地方武装干部学校等，形成了由初级到高级、由单一兵种学科到多兵种学科的教育体系。选调了刘伯承、叶剑英、萧劲光、何长工、邓萍、粟裕、陈赓、左权、伍修权、郭化若、孙毅等一大批既具有多方面科学文化知识，又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和教学经验的干部担任领导和教员，为红军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各级各类干部。

3. 不断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推向深入。作为中国军队政治工作的创始者，周恩来对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尤为关注。他到红军后，对军队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调政治工作必须着眼于战时的特点；指出政治工作不仅要靠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来做，而主要靠充分发动党团员和红色战士的积极性，实行群众性的政治工作；要求红军各级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干部改进工作作风，提出改变机关主义，实行直接的活的领导，少开会布置，多用口头传达，加强工作的预见性和灵活性，以适应瞬息万变的情况；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通过向部队讲解政治军事形势，分析战争的有利条件和困难因素，使广大指战员了解形势，明确任务，知己知彼，充分准备，树立信心，提高作战勇气；要求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领导作用，把战时政治工作的重心放在连队，发挥连队党支部的堡垒作用，使之真正成为连队团结战斗的核心；要求在紧张激烈的战斗环境中，注重发展与健全党的组织，使连队党员保持一定的数量；重视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进攻作战中，做部队冲锋陷阵的模范，在防御作战中，做坚决抵抗的模范，在长途行军中，做互助友爱的模范，真正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组织红一方面军各部队开展轰轰烈烈的立功创模运动和创造模范党支部、模范连队的活动，使广大指战员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把



群众工作提到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位置，把“加紧作战地域的群众工作”作为“每一红色战士一日不可忽视的政治工作”。在政治机关设立了专门的群众工作部门，协同地方党组织向人民群众进行政治动员，组织群众参军参战，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重视开展敌军工作，把瓦解敌军看作是红军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重要条件之一，在政治机关设立敌军工作部门，在敌军内部开展兵运工作，争取敌军起义，开展对敌宣传工作，争取敌军官兵放下武器，做好俘虏兵的工作，争取他们参加红军；他还要求努力改善部队政治教育的方法，改变背书式的教授法和传教式的灌输法，采取启发式和讨论式，以提高政治教育的效果。

为了进一步总结红军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红军总政治部于1934年2月在瑞金召开了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这是红军创建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工作会议。会议对过去政治工作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对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战时政治工作方法，游击队、赤卫军与少先队、地方群众中的政治工作以及敌军工作等进行了讨论。周恩来在会上再次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要“坚决地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反对忽视政治工作的现象，巩固政委制度，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建立党在红军中的支部生活，成为红军的血脉一样，更加保证战斗力的提高。一切政治工作为着战争，为着红军最大的胜利”。

4. 加强后勤建设，保障部队供给，在大规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的后勤保障，仍然主要依靠就地取给和取之于敌的方法。红军的生活异常艰苦，作战保障非常困难。周恩来非常重视红军的后勤保障工作，到苏区后不久，他就在苏区建立了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亲自担任主席，负责主持计划并指导战争的一切军事、经济、财政、劳动的动员事宜，以他卓越的组织能力，使苏区有限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效能。在他的领导下，红军总供给部的组织机构逐渐健全起来，形成由上而下的比较完整的后勤保障体系。他要求在战争沿线派出得力干部主持区委、区政府与训练赤卫军。在要道左右三四十里的区域预先选择可以存储粮食、弹药、物资和转运伤病员的偏僻山寨或村庄；红军卫生保障形成了连有卫生员、营有卫生所、团有卫生队、师以上育卫生部的医疗体系；在战场救护上，形成了连营有火线抢救组一团绷带所一军师野战医院一兵站医院一后方医院等比较完备的后送、医疗体系。从而有力地保障了红军战斗的顺利进行。

5. 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周恩来一贯重视地方武装的建设，认为这是开展人民战争的基础。在上海担任中央军委领导工作时，他就十分强调建设地方武装的重要性，经常指示各地苏区和红军要重视发展地方武装。到中央苏区后，他重申毛泽东关于扩大人民武装的精神，指出红军的扩大，主要是由地方赤卫队、游击队造成地方红军，再由地方红军造成超地方的红军。在力量使用和武器分配上，既反对地方主义、分散主义，也反对绝对集中。对地方武装的政治和组织建设，要求建立坚强的党的领导，巩固政治委员制度；在组织编制上，要求把地方武装区分为两种，一是脱离生产的独立师团营连，其任务和行动原则是集中应敌，分散游击，争取与发动群众，巩固与发展苏区；二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以乡村为编制单位，其任务是平时巩固苏区政权，战时配合红军作战。要求从各地红军中抽派最坚强的干部去加强地方武装的领导力量。从1932年夏到1933年夏，中央苏区地方武装蓬勃发展，新组建了兴国模范师、瑞金模范师等十多个模范师、独立师及若干个独立团。

1933年5月，仅江西苏区地方武装就有约2.6万人加入红军，有些县的模范赤卫军和模范少先队，整营整团甚至整师地加入红一方面军，有力地增强了主力红军的力量，为保证红军的胜利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所以能对红军建设作出许多新的贡献，与他尊重实践的精神分不开的。一是他非常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从实际斗争中去探索真理。到苏区不久，他就深入前线，亲身参加指挥红军作战，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探索指导战争的规律。二是他还十分尊重别人的战争实践。对长期领导红军作战的毛泽东、朱德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都非常重视，并且细心加以研究和采纳。他始终认为这些意见和建议是他们在长期战争实践中形成的经验，是极其宝贵的财富。在宁都会议上，当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人执意要把毛泽东排斥出红军的领导岗位时，周恩来坚持要求把毛泽东留在前方，强调毛泽东有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应让他充分发挥其优长，极力反对让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的主张。时隔不久，周恩来又向新到中央苏区的张闻天建议，毛泽东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对创建中央苏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对如何开展苏区工作，有很多办法，应该请他出来参加领导工作，发挥他的作用。相反，有些从党中央派到苏区来领导工作的人，既没有从事军事工作的实践，也没有军事斗争的经验，到苏区后却长期蹲在后方，不调查下研究，凭主观臆断和临时中央及共产国际的指示指挥红军作战，所以他们的意见总是脱离实际，与前方红军领导人不一致。对于不同的主张和意见，他们更难以采取从战争实践中加以验证的正确态度，反而采用排斥异己的恶劣手段，对毛泽东、罗明、邓小平、谢唯俊、古柏等坚持正确主张的人加以打击。其结果只能是严重损害了红军，损害了根据地，损害了革命。

## 第五章 全面认识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没有从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吸取经验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地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特别是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之后，更是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使红军和苏区人民面临着严重困难。在军事上，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把红一方面军主力一分为二，实行“两个拳头打人”的错误方针；继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导致红一方面军错过了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围剿”的时机；最后被迫放弃苏区，在战略转移中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红军和苏区遭受到极为严重的损失。

周恩来在主观上想和临时中央尽力保持一致，以维护党的团结，保证党组织的坚强战斗力，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又深感临时中央的路线，既不符合红军的实际作战能力，也不适合战场的具体环境，因此，他与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争论更加激烈了。临时中央把周恩来看成是推行军事冒险主义的主要障碍。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博古把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红军广昌战役失败后，周恩来开始逐步认识到李德、博古的错误。他从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中，从成功和挫折的对比反思中，结合自己一年多指挥作战的切身体会，开始从政治路线，特别是从军事路线的高度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规律，这为后来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奠定了基础。第五次“围剿”失败后，中共临时中央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长征开始后，周恩来深入到前卫部队组织指挥行军和作战，为大部队开辟通路。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遭受重大损失后，李德、博古再也无力指挥红军。在这危急关头，周恩来毅然挑起了继续指挥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重任，他采纳毛泽东关于红军改向川滇黔进军的建议，指挥红军突破乌江，袭占遵义，为遵义会议的召开，红军的休整，赢得了时间。遵义会议的召开，使周恩来在探索土地革命战争规律问题上，实现了一次重大的飞跃。他从领导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毛泽东是党内正确军事路线的代表。因此，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衷心拥护毛泽东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上。此后，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始终是毛泽东在军事上的主要助手，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形成作出了卓越贡献。

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指挥红军转战川滇黔，突破蒋介石数十万军队的合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在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周恩来与党中央领导人一起，战胜了张国青分裂红军和危害党中央的阴谋活动，实现了红军北上陕甘的战略任务，为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地完成战略转移作出了巨大贡献。

### 一、力求纠正军事冒险主义者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指挥

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博古等人不仅不从他们的错误指导中吸取教训，反而把周恩来、朱德等前方领导人竭力抵制他们的错误主张，全力挽回由于他们的错误给红军造成的被动局面，进而以“诱敌深入，打歼灭战”为方针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说成是他们指导的结果。

苏区中央局一些领导人对周恩来批评、反对和抵制他们的错误极为不

满，在排斥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后，又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后，为了加紧推行其“左”的政策，更是急于把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权抓在自己手里。先是提出他和项英应增补为军委委员，接着他们又以要在瑞金领导全局工作，不能到前方去为由，提出把中革军委搬到瑞金，继而又提出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不便于工作，由项英代理军委主席，在前方另行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由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总政委。这样前方红军领导人只有组织落实博古、项英的决定的权力，而失去了对红军行动的决定权。随后博古又把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改称中共中央局，实际上又解除了周恩来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把周恩来以党的领导者的身分对红军行动的决定权也撤销了。

#### （一）反对“两个拳头打人”的错误方针

1933年5月，蒋介石撤销了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改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在美、英、德、日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开始了对中央苏区实行第五次“围剿”的各项准备。一是继续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针，实行军政一体化；二是推行“堡垒政策”，对中央苏区进行严密封锁；三是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提高军官反共的信心和作战指挥能力；四是向美、英、法、德、日等帝国主义乞求援助；五是改编部队，适应山地作战。

中央红军第几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本应进入一个相对发展与巩固的时期，进行发动群众，筹集资材，准备战场，休整部队各项工作，以便粉碎蒋介石第五次大规模“围剿”。但在6月间，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施特恩在上海拟定了一个红军夏季作战的计划，以中共临时中央指示的名义发往中央苏区。这个被称为“沪”电或“长电”的指示，完全违背了红军积多年战争经验所形成的基本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提出了后来被毛泽东概括为“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企图用进攻阻止国民党军队的集结和战争准备工作。这个计划对红军的军事斗争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对随之而来的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起了极坏的作用，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

指示认为：红一方面军过去实行“主力集中于一个单独的作战单位，即方面军，这就不能从各方面配合作战。”要求“从方面军调出若干部队，为着在六月、七月进行分离的作战。”计划以第五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第一阶段，东方军“向石城方面前进，其目的是在向宁化、清流”。“方面军的任务主要的是：巧妙用计划进行次要的战斗目的，以便其真实目的不致过早泄露”。第二阶段，“东方面军应从清流、宁化区域继续向北进攻，以将乐为总方向；消灭敌人力量五十六师与第二旅，以及其他可在归化、清流、将乐、泰宁、南搓等区域发现的部队，这第二个任务应在七月完成”。第三阶段，“方面军向东北前进，超过崇仁或在崇仁之北或在崇仁之南以攻抚州”；东方军“继续向资溪、金溪及抚州以北进攻”。目的是“以方面军与东方军团的集中力量，在抚河西岸，开始从抚州区域向南昌的进攻，以便由抚河方向与南丰（南昌）一师一师的消灭敌人。”博古、项英等人将指示发给前方的周恩来和朱德时，提出改由红三军团为基干，组建东方军，并要求周恩来和朱德立即表态。

周恩来、朱德和前线的领导人充分研究了 this 作战计划之后，于6月18

日，由周恩来和朱德联名致电中央局，提出不同意见，坚持“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分开”。但是为了求得一致，周恩来和朱德建议“东方军应以五军团（一个师）第三师十四师三个师组成”。认为“在选择敌人方面，攻清流、将乐又将陷于攻坚，我力弱将不能与十九路军一个师的增援队决战；力强敌侦知可缓来。”与其“在清流进行残酷战斗，莫如决心在北面与赣敌一部分进行战斗”。指出：“酷暑远征，且多大山，须记着去年漳州回师近二千人的减员”。主张，“东方军以活动于建泰将乐邵光地区为合宜”，“这不仅较打卢兴邦、十九路军易于求得补充，并容易求得运动战，且对于赣东北目前严重现象也给了直接援助”。对于周恩来、朱德的意见，中央局拒不接受，坚持要“改进从前一手打入的单一作战线，而成为更有利的配合各方的两根作战线，来开展战斗新的局面”。强调“现在已非我们从容讨论一个又一个计划的时（候），请于接电后重新考虑接受上海整个计划及我们的提议，即以三军团代五军团并立即行动”。中央局还专门发电，严厉斥责周恩来不执行中央的指示。周恩来是一个严守党的纪律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一面发电表示“绝对服从你们命令，并立即执行”；一面再次提出：“要求在部队调动中回瑞〔金〕一行，面陈不同意见或改在博生〔县〕开军委会或中局会”。但是中央局拒绝周恩来的要求。用共产国际的意见来压服前线的领导人，接连在电报中强调：“必须记着：我们不能允许以讨论或含糊的步骤来浪费我们的任何时间。”7月1日，项英发布命令，以红三军团（缺第六师）和红十九师组成东方军，向福建的清流、归化地区进发。博古、项英没有军事斗争的实际经验，在指挥东方军作战时，随意改变决心，时而命令部队向北，时而又命令部队向南，使部队作战完全无所适从。虽然中央局曾规定“东方军团的行动，仍归朱、周统一指挥”，但他们却经常绕过方面军总司令部直接给东方军的领导下达命令。

周恩来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仍然顾全大局，对博古、项英等人的错误决策和指挥，接连发出电报，提出意见和建议：

“首先袭取泉上，尔后逼近清流，才易于打击援敌，是早在博生（即宁部县）就商定好了的，现敌情又没有发生变化，在敌未动之先，以红三军团主力过清流河猛进不妥”。“闽省不利游击，各河流急水深，运动大兵团不便，加以天热多病，红三军团沿途已留下五百病员，请你们决定部队行动时稍稍顾及此点。”

“尽可能求得运动战中消灭卢部与增援之十九路军。但在战略实行上必须有步骤且须以极坚决的信心与一贯的路线赴之”。“除直接通知敌情与紧急危险时的处置外，项代主席请勿直接电令彭、滕、周、曾，使他们对上级整个部署无所适从，这在战斗中大忌”。

“我坚决主张应依照一个计划有步骤地完成，不要因暂时危险与变动转移已定路线，必要的修改不应与其基本原则相反，因为原则变动过多，这个计划便残缺不全，失去中心是军事大忌”。

“东方军进入第二阶段之目的在求得继续消灭闽敌一二个师，于运动战中以破坏赣敌的东方侧翼并藉以分散闽敌兵力，最后集结强大的优势兵力出现邵武、光泽、资溪之间，寻求敌之五六两师突然袭击之。以便逼使赣敌移动与重新集中，造成中路军北向的有利条件”。

但是博古、项英等人对这些建议和意见大都不予理睬。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一方面军实行分离作战的方针，采取“两个拳

头打人”，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求胜，进而集中全力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蒋介石却一面从容地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策划第五次“围剿”的方针和计划，一面增派兵力，储备作战物资，构筑碉堡封锁线，准备发动新的进攻。使红军丧失了准备反“围剿”的宝贵时间，给后来的反“围剿”作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 （二）力主“尽早结束两个拳头打人”，准备应付敌人大举进攻

由于第四次反“围剿”时，在赣东北苏区诞生、成长、壮大的红十军被抽调南下，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使得闽浙赣苏区武装力量受到削弱，虽然在闽浙赣苏区又成立了新的红十军，但战斗力不如老红十军。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失败后，加紧了对闽浙赣苏区的“围剿”。而这时红一方面军的东方军迟迟不北上进入资溪、金溪、光泽、贵溪一带新开辟的苏区发展胜利，长时间在清流、归化、连城一带作战，又久攻顺昌、将乐不下，被滞留在闽西，不能机动作战。闽浙赣苏区在敌人强大兵力的围攻下根据地日渐缩小。1933年8月底，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准备工作即将完成，于是决定从“围剿”闽浙赣苏区的部队中抽出部分兵力南下，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围剿”。9月初，敌一部分兵力南下，开始向中央苏区进犯。其中第五、第六两师，加上原在南城的第九十六师准备首先攻占黎川，夺取第五次“围剿”的主动。在博古、项英等人“两个拳头打人”方针的错误指挥下，中央苏区中部的黎川地区，由于部队基本都被抽到东线，随同东方军作战，造成兵力极度空虚，黎川危在旦夕。

黎川位于闽赣边界地区，东连光泽、邵武，南达建宁、泰宁，西通南丰、南城，北出金溪、资溪，是连接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周恩来发现蒋介石的企图后，接连电告博古、项英，建议赶快结束东方军在闽西的作战行动，准备迎击敌人新的进攻，并在没有得到中央局同意的情况下，预先下令东方军于9月4日前结束已进行了近一个月的将乐、顺昌攻城战斗，收拢部队，准备回师。同时命令闽赣军区司令员萧劲光指挥当地游击队，尽力迟滞国民党军队南下。博古、项英等人听不进周恩来的意见，一面空喊“粉碎敌人的新的五次‘围剿’”、“保卫与扩大苏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等口号，一面又要求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执行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的指示，令东方军延长在福建的作战时间，继续向东推进到闽浙边界，在崇安、浦城、松溪一带创造新的游击区。坚持要东方军继续留在福建作战。

国民党军队进攻黎川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周恩来对红一方面军处于这样不利的态势，十分焦虑，再次致电博古、项英，建议：“求得胜利的结束东方战斗，迅速北上”，可取得当敌军南进，进攻黎川时，东方军从侧翼向南下敌军发起进攻，以求将其歼灭于运动之中的战机。但博古、项英坚持要等东方军攻下将乐、顺昌再作下一步行动。9月24日，敌人向黎川方向的进攻已经迫在眉睫，周恩来再次紧急致电项英和苏区中央局，提出必须“迅速结束东方战斗，否则将会失去剪除赣敌左翼良机，坐视其抢先集中抚河。”第二天，周恩来再次致电项英，指出敌人对我军的全部部署已经清楚，已提前在抚河西集结兵力，敌人的进攻就要开始，要求“东方军必须最大限度集结兵力，以最大机动求得胜利地结束东方战斗，下为坚城所系，不为强敌所滞，以便能在运动中灭敌一部，赶早北上。”9月25日，国民党军3个师由南城

出发，经硝石向黎川发动进攻。直到9月27日，敌军逼近黎川城下，博古、项英等人才醒悟过来，一面急忙命令红一方面军总部应“即结束东方战线，集中泰宁，出其西北地带，首先消灭进逼黎川之敌，进而会合我抚（河）西力量，全力与敌在抚河会战”；一面令萧劲光死守黎川。这时防守黎川城的部队只有一个70人的教导队和一些游击队，根本无法阻止敌人的进攻。而红一方面军的东方军正在围攻将乐、顺昌，红军的中央军正在永丰、乐安地区阻击国民党军的进攻，一时难以赶到黎川。28日，敌军占领黎川城，隔断了中央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使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开始，就陷于不利的作战态势。

战争的开局没有打好，固然对整个战局有很大的影响，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只要认真处理好以后的战局变化，争取化被动为主动，夺取战争的胜利是完全有可能的。黎川失守后，周恩来致电项英，指出：“抚东战局因我为将、顺坚城所系之误，将使赣敌得先筑据以守，现我必须以极大机动性处置当前战斗。正面迎敌或强攻黎川都处不利。”应依敌情变化，“调动敌于运动战中给以各个消灭”。“目前行动仍以先剪除赣敌左翼为方针”。而此举的先决条件是红军的东方军与红军的中央军两支全力的会合。但是博古、项英仍不接受周恩来的建议，致使战局的发展越来越不利于红军。

### （三）力求集中红军主力实行运动歼敌的方针

国民党军占领黎川后，获得了向中央苏区腹地进攻的前进基地。10月，蒋介石已在中央苏区周围集结了64个师又7个旅、6个团，共约65万人；还调集了空军11个飞行队，共有飞机105架，完成了全部准备工作，正式下令开始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这次“围剿”，蒋介石坐镇南昌，亲自指挥。他将驻赣、粤、闽、湘、鄂五省参加“围剿”的部队分别编为北路、西路和南路军。北路军辖33个师又3个旅，以顾祝同为总司令，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是“围剿”中央苏区的主力。该路军以4个师又2个旅编为第一路军，由顾祝同兼总指挥，任务是从新注到宜黄一线构筑碉堡封锁线，阻止红军向赣西北方向前进，逐步向中央苏区推进；以6个师编为第二路军，由蒋鼎文兼任总指挥，任务是从滕桥到金溪一线构筑碉堡封锁线，阻止红军向赣东北方向前进，逐步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以18个师又1个旅编为第三路军，由陈诚任总指挥，任务是用14个师编为3个纵队的机动作战部队，在第一、二路军的配合下，依托碉堡封锁线向广昌方向推进，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总司令部直接指挥2个师，扼守吉安、泰和等地，任务是阻止红军西进；此外以3个师编为总预备队。西路军辖9个师又3个旅，以何键为总司令，任务是分别“围剿”湘赣、湘鄂赣苏区，沿赣江和湘赣边界修筑碉堡封锁线，阻止红军向赣江以西前进，相机向赣南方向推进。南路军辖11个师又1个旅，空军5个飞行队共54架飞机，以陈济棠为总司令，任务是从福建的武平沿粤赣边界到江西的上犹一线，构筑碉堡封锁线，阻止红军向南发展，逐步向北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

蒋介石要求各路军本着“战略攻势，战术守势”的原则，加紧构筑碉堡封锁线，稳扎稳打，逐步推进。强调：“今日剿匪，不在时间之缓急，亦不必忧匪之难觅，而在我将士忍性坚心”，“剿匪要领，不必先找匪之主力，应以占领必争之要地为目的。我军只要先有目的地，向之前进，第一步求能占领目的地，使匪不得不来争为最大任务。”陈诚根据蒋介石的训令，在黎川、硝石、资溪桥方圆不到20公里的三角地带集结了9个师又1个旅的兵力，

构筑堡垒工事，以逸待劳，等待红军的进攻，准备同红军主力决战。

在这关键时刻，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比名李德，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正被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弄得六神无主、束手无策的博古和项英，就像遇到了救星，急忙把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军事指挥大权拱手交给了李德。博古、李德急于收复黎川、由李德制定了作战计划，命令周恩来、朱德，以小部分部队迅速赶到黎川以南地区阻止国民党军队继续向南推进；红一方面军的东方军兼程北上，消灭硝石、资溪桥、黎川附近之敌；红一方面军的中央军由永丰、乐安等地东移，攻击和牵制南城、南丰、宜黄之间开进的国民党军，以保障东方军的行动。敌人占领黎川后，立即加紧构筑黎川城和硝石、资溪桥的工事，并派重兵驻守，巩固黎川与资溪桥、硝石之间的联系。周恩来接到命令后，坚持认为红军目前不能强攻黎川附近之敌。指出：“目前敌既抢先着，我东方、中央两军主力必须首先靠拢，并派有力支队加紧向赣敌两翼活动，迷惑与分散敌人，以便主力决战。”但是，博古、项英等人因黎川一城之失守而惊慌失措，拒绝周恩来等人的建议，复电强调：“无论任何情况，中央军不得过抚河，以后你们决须根据军委意图”行动。周恩来、朱德据理力争，反复致电博古、项英、李德等人，指出：“硝石东南为河所阻，恐亦不易强攻，东方军应以一部继续作有力佯攻，催促敌援主力，集结机动消灭援敌”，同时命令红一、三军团首长：“我东方军各兵团在目前几天中须以最大的积极活动，尽力求得阻止和迟滞敌人集中（但不应强攻堡垒，不应向阵地战的敌人作正面攻击），以便东方军能用大的运动、机动、包围和迂回，争取在有利条件下，首先侧击行进中敌之部队来扭转局势。”

博古、项英、李德等人不顾敌情的变化，强令红军进攻硝石。红军连续攻击5日不克，陈诚迅速调集了近9个师的兵力，从三面向进攻硝石的红军实施反包围。红军有陷入被敌军合围的危险，被迫撤出战斗。博古、李德等人不思吸取教训，再令红军强攻资溪桥。结果，红军又连续攻击4日，也未能占领资溪桥。红军两战受挫，实力受到很大削弱。按编制，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缺额达2.5万人。这时，“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们在总结前一阶段的作战时，虽然承认未能迅速撤去将乐、顺昌之围，迟缓了北出金溪、资溪、光泽地区作战，是“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但同时又指责周恩来、朱德等“方面军首长是动摇的，对军委的一般意旨没有了解，对敌人计划的估计，与中革军委的不同，一到执行命令的时候就越发明显起来”。他们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下求变换，坚持提出：“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是拒绝战斗。”继续命令红一方面军深入敌人堡垒地域间隙中去作战，使红军陷于苦战之中。

#### （四）主张联合“福建人民政府”打破敌人五次“围剿”

红一方面军东方军在深入福建作战时，曾在“一·二八”抗击日本侵略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领导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对蒋介石竭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和“剪除异己”的反动政策非常不满，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在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保卫中国及争取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这三个条件下，红军同全国任何武装部队合作抗日的主张，于8月间秘密派遣曾和周恩来一起旅法留学的陈公培到延平（今南平市）前线同红军联络。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敏锐地察觉到，如果红军能与第十九路军结成联盟，不仅在政治上有利，而且在军事上将会立即解除来自东侧的



威胁，红军可以全力对付北线的国民党军主力。9月22日，周恩来致电项英、彭德怀等人，建议派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到南平西郊的西芹与陈公培面谈，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真实意图。双方会谈后，由陈公培转交给蒋光鼐、蔡廷锴一封回信，对十九路军提出的合作要求表示欢迎，双方在前线处于休战状态。这本是一个将红军的东方军主力迅速北调的极好机会，但是博古、项英全不加以利用。10月，第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作为全权代表秘密到达江西瑞金，正式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反日反蒋谈判，于26日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止敌对的军事行动，临时划界而治；恢复贸易解除对苏区的经济封锁；释放在福建关押的政治犯；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实行一定程度的合作。

11月20日，第十九路军的将领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这是有益于革命的行动，对红军反“围剿”作战是十分有利的。

事变发生后，正在抚州坐镇指挥的蒋介石，深恐红军与第十九路军联合，异常紧张，每天都要找侍从室主任晏道刚，询问是否有红军与第十九路军联系的情报，后来没有发现第十九路军有与红军联系的征候，才松了一口气。为了镇压第十九路军，蒋介石急忙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中抽出9个师，与其他部队组成“入闽军”，由蒋鼎文率领，向福建进攻，而对中央苏区则暂取守势。当时，蒋介石几乎把他能抽调的全部兵力都投入到“围剿”中央苏区中来了，福建事变发生后，他又把拱卫京沪杭京轰要地的第八十七、八十八师也抽编到“入闽军”中，参加对第十九路军的镇压，后方已经十分空虚，“连南京一带那样重要城市的防务，只是以宪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团队来维持”。这是红军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极好时机。

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许多前线领导人都积极向中央局建议，乘机机会向赣东北方向出击，以求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周恩来和朱德还指示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军军长刘畴西等人：“福建十九路军宣布反蒋独立，蒋介石已抽兵向浙赣闽边境集中”，“赣东北应抓紧这一机会”，“广泛发展上述地域的游击战争，截击敌人的连络运输，扰乱其后方”；“令闽北独立团移在邵、光以北活动”；“令陈毅尽力迟阻敌之进扰”。

毛泽东看得更远，建议红军不仅要向赣东北打出去，更“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却拒绝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的正确建议，从“左”倾观点出发，对福建人民政府抱着完全不信任的态度，不仅下予以积极支援，还向红军发出训令：“下应费去大的损失来与东北敌人新的一路军作战，而让十九路军替我们去打该敌”。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和朱德一起再次向中革军委提议：“立刻调一军团及十四师（留守备部队）至康都、西城桥，准备会同三、五、九军团主力，甚至七军团主力一部，于东山、得胜关间与陈敌主力决战。因不如此，我突击兵团分割作战……常不能达到高级要求的胜利，且常付过大代价，此点在目前特别重要。”应力求“再集中全力给敌以更大杀伤”，“使东北暂归平静，而使我战略转移。”项英却反其道而行之，将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一、三军团及4个独立团编成西

方军，转移到永丰一带与税警团作战；以第五、七军团及部分地方部队编成东方军，留在建宁、泰宁、黎川、光泽、金溪一线，开展游击战争；以第九军团及2个独立团编成中央军，牵制敌人，策应东方军和西方军作战。项英甚至在24小时内4次变更作战命令，造成部队指挥混乱，使周恩来、朱德在前线无法工作。周恩来致电博古、项英，愤慨地指出：“两日来命令屡变，最后部署仍回至我们的第一密令时部署一样，此对下级信用确有影响，务请仔细考虑，且更证明相当范围内职权似应给我们。”“请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否则亦请以相机处理之电令给我们。事关战局责任，使我不能不重申前请！”

周恩来的这个电报不仅再次触怒了博古、项英等人，也使李德大为恼火。于是，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由，向博古、项英建议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将前方的总部并入后方的中革军委，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各军回和独立师、团作战。12月20日，项英电告周恩来和朱德等人，中革军委决定撤销红军总部，由军委直接指挥东方军、中央军和西方军，方面军司令部即回瑞金。1934年1月4日，周恩来到瑞金，2月3日，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副主席。这以后，他就没有了前线部队的指挥权，只担负一些技术性的组织工作，落实李德、项英等制定的作战计划。

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优势兵力的进攻下遭到失败。博古的“左”倾政策不仅使红军失去了打破“围剿”的有利时机，也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境地。福建事变被镇压后，蒋介石重新调整了“围剿”中央苏区的部署：将入闽的部分部队和收编的十九路军余部共16个师、1个旅又2个团编为东路军，以蒋鼎文为总司令；北路军辖第一、第三、第六、第二十、第二十六路军和总预备队，共23个师、2个旅、1个支队又3个团，另外还辖浙赣闽皖边区警备司令部所属4个师又5个保安团，仍由顾祝同任北路军总司令，改由陈诚任北路军前线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部署调整后，蒋介石命令东、北两路军采用“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重新向中央苏区发起进攻，国民党军队一边前进，一边筑碉，平均每天只进二里，朝根据地的中心区进逼。

在敌人新的进攻面前，博古、李德实行消极防御的方针，命令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抗，推行“以碉堡对碉堡”和“短促突击”的战术，还经常轻率地命令红军以主力对敌军的堡垒阵地发动进攻，致使中央红军不断遭到严重损失。4月中旬，敌军集中了11个师分两路向中央苏区的北部门户——广昌进攻。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调集红军主力，采用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所谓“正规战争”，保卫广昌。在前方组织野战司令部，由朱德兼司令员、博古兼政治委员。实际上由博古、李德决定一切，指挥一切。周恩来留守瑞金。

博古、李德到前线后，调集9个红军主力师坚守广昌，同有着优势兵力和武器装备的敌人进行“决战”。广昌保卫战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最残酷的一场战斗，从4月10日到28日，整整打了18天。3万红军在广昌城下同数倍于己的敌军对峙，在敌人飞机、大炮猛烈的轰炸下浴血奋战，仍无法挡住敌人的进攻。4月27日，博古、李德对战局已束手无策，只好求救于周恩来，当晚给周恩来发出急电：“广昌西北之战未能获得胜利，现只有直接在广昌支点地区作战之可能，但这不是有利的，提议放弃广昌而将我们的力量暂时撤至广昌之南。战斗经过另报，请立即以万万火急复。”周恩来在对前线战斗状况不十分清楚的情况下，表示“在广昌支点直接作战又无把握

时，原则上同意放弃广昌，但仍须以一部扼守广昌，迟敌诱敌，抽一军团秘密东移，突击汤（恩伯）敌。”“最后决心由你们下。”28日，红军撤出战斗，广昌保卫战结束。此战，红军毙伤俘敌共2626人，而自身伤亡5093人，是红军历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它给尔后红军的作战带来了极为有害的影响。

广昌战役后，红军转移到广昌以南继续阻击敌人向苏区的中心区进攻。面对敌军分多路向苏区腹地推进，博古、李德继续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方针，红军实力不断受到严重损耗。中央苏区的形势急转直下，红军丧失了在内线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可能。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节节失利，使周恩来对红军战争的理论进行了许多新的思考。在总结红军作战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他坚持并发展了红军以运动战为基本作战样式和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基本原则。他虽然没有对红军作战的决策权，但是对博古、李德等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错误地套用苏联军队的作战理论，不懈地予以批评和斗争。

作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既要保持对他们组织上的服从和尊重，负责将他们的指示贯彻落实，又要从党和红军的利益出发，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设法弥补博古、李德等瞎指挥造成的漏洞，尽量减少以至消除可能的损失。”他多次在军委会议和红军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作报告，强调红军必须坚持运动战的方针，阵地战、堡垒战只“能够配合着我们基本的运动战的胜利，来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当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周恩来“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特别在如何使用兵力的问题上，李德强调所谓‘正规军’打‘阵地战’，用红军的‘多路分兵’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周恩来同志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则部署牵制力量，使红军保持相对的优势和机动兵力，以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是，李德拒不接受周恩来同志的正确建议，使分兵把口的红军被敌人的强大兵力各个击破。进行这些争论时，我经常在场，有时由我从中翻译，有时周恩来同志直接用英语对李德讲。”

这一时期，周恩来不仅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与博古、李德的错误进行了斗争，更重要的是，他开始从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高度上考虑这场斗争的性质，认识到“左”倾路线在军事上的严重危害。在为《红星》报第40期撰写《广昌虽然陷落了，我们无论如何要粉碎敌人》的社论上，他批评“单纯防御的堡垒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兵把口子”是机会主义错误的具体表现。这些都为后来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 二、参与长征的军事准备工作

1934年春，博古、李德和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施特恩等人，在“四面出击”、“两个拳头打人”的“进攻路线”遭到失败后，对红军反“围剿”战争就再也提不出什么“高见”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是机会主义者的典型特征。博古、李德从“全面进攻路线”转向“消极防御路线”，保卫广昌战斗就成了他们的筹码，寄希望于死打硬拼的拙劣战术上。于是博古和李德亲自到前线组织指挥战斗，作最后一搏。但是事实又给了他们无情的教训。广昌保卫战失败后，博古、李德到了黔驴技穷、束

手无策的地步。李德无可奈何地向博古建议：“作一次战略大转移”，“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在5月份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只得作出退出中央苏区的决定，并报告共产国际。

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同时指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估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惶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的决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及红军灵活的策略，必须进行解释的工作，说明这种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不久，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又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筹划战略转移的工作。实际上“三人团”只开过两次会，一次在李德住处，另一次在中央局。实际工作，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只是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

#### （一）督促战略转移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

战略转移的决定作出之后，博古、李德在作战指挥上，只是一味地命令红军在前方拼死抵抗敌人对中央苏区腹地的进攻，掩护后方做转移的准备工作。在准备工作中，他们实行神秘主义的方针，认为“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因此，当时关于突围的传达范围只限于政治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其他人，包括政治领导干部和部队高级干部，只知道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必要措施。”连周恩来也不能与闻所有的事情。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的李维汉回忆说：“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主任，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本不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情况，他们也没有告诉过我。据我所知，长征前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中央红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要到何处去？始终没有在干部和广大指战员中进行解释。这些问题虽属军事秘密，应当保密，但必要的宣传动员是应该的。”

博古、李德的战略转移计划是：主力红军西征，“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留下项英等人组成苏区中央局，率领1.6万人的部队继续坚持中央根据地的斗争；派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前进；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苏区，向湘中前进。“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7月中旬和8月上旬，这两个军团先后出发了。在此之前，根据中央的决定，周恩来派程子华到鄂豫皖苏区，组织那里的红军主力作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程子华在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一九三四年六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和我谈话，他说：当前在鄂豫皖地区，敌人用碉堡、封锁线，以驻‘剿’和追‘剿’部队对我交替地攻击、堵击、追击，把我根据地压缩分割成小块。根据地缩小了，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人力、物力的补充。如果继续削弱，以至被消灭，那么根据地也就没有了。出路是什么呢？他说：中央决定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样，部队才能得到发展。把敌军主力引走了，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也就能够保存老根据地。周副主席讲如何建立新区时指

出：根据地要选择在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我党在群众中有较大的革命影响，或者是那里的群众容易争取；地形要便于我军作战。另外，还应该比较丰足的粮食和其他物质条件。周副主席考察分析形势和前途是这样的清晰，了如指掌；他对鄂豫皖根据地人民和红军的深切关心，他对党和革命极端负责的精神，成为催我就道的一股巨大的力量。在他对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的战略指导下，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并取得了胜利。这是周副主席领导我们反对消极、被动、单纯防御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光辉范例。”

程子华到鄂豫皖苏区后，担任了红二十五军军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红二十五军于11月开始长征，历经数十战，冲破了数路敌人的围追堵截，在豫鄂陕边建立了游击根据地。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领导人从缴获敌人的文件中得知红一、四方面军已胜利会师，正准备北上陕甘地区，于是率领红二十五军主力出击甘南地区，迎接主力红军北上，由于张国焘延宕了红军北上的时间，红二十五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只好先期转战进入陕北，同西北红军会师，大大加强了陕甘根据地红军的力量，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创造了重要条件。

转移的准备工作从1934年5月就开始秘密地进行了。李德说：“五月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拟了1934年五一七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计划规定：贮备粮食、冬服，以保障红军的物质需要；建造新兵工厂，以修理机枪、迫击炮和野战炮以及制造各种弹药，特别是迫击炮弹和手榴弹；政治上和组织上系统地加强志愿兵的动员工作；改编军队，配足各师的兵力，把这些师编入军团，每个军团至少有两个师；贯彻符合运动战要求的训练原则，以及其他内容等等。”但是这些准备工作并不适应战略转移的需要。

## （二）为党保存一批重要的干部

随着准备工作的深入，红军主力即将突围的消息不胫而走，在许多干部中间流传开来。红军为什么要转移？转移到哪里去？谁走谁留？这些问题在干部中间引起了思想波动。问题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他只能在严格纪律的约束下，做好大家的思想工作。

8月18日，周恩来在为《红星》报撰写《新的形势与新的胜利》的社论中指出，我们要坚决地挺进到敌人的后方去，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新的苏区，创造新的红军，采取更积极的行动调动敌人，求得整个的战略部署的变动，以在运动战中消灭白军。

在干部走留的问题上，“研究留人名单时，军事方面的干部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其他方面只告诉他一个数字。”但是周恩来从保存革命干部的大局出发，根据工作需要和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尽自己的职权和能力做好这项工作。在毛泽东去留的问题上中央开始有争论，在周恩来竭力坚持下，毛泽东才得以随队长征。当时的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回忆道：“后来我才听说，中央决定红军转移时，开始有的人甚至不同意毛泽东同志随军行动，还是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一再坚持，说毛泽东同志既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又是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应该随军出发，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应该说这是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为我党立下的一大功勋。”

1934年8月，陈毅在作战中身负重伤，右胯骨粉碎性骨折，痛得不能起床，躺在医院里难以行动。他于10月9日写信给周恩来反映伤情。周恩来得知情况后，立刻命令卫生部长贺诚打开已装箱的医疗器材，派人把电台用的

汽油发电机送到医院，为陈毅做了手术。第二天，周恩来赶到医院看望陈毅，对他说：“我们很快就要走了，中央决定你留下来坚持斗争。”“你有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既有政治斗争经验，又有军事斗争经验。更可贵的是你有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有中央根据地几次反‘围剿’的斗争经验。相信你一定能依靠群众，依靠党的领导，坚持到胜利。”

为了保证参加长征的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老同志和一批女同志的安全，周恩来不同意把这些同志分散到各野战部队中去的主张，指出他们不仅难以跟上战斗部队的行军，甚至还会贻误部队的战斗行动，于是决定将他们编成休养连，随中央纵队一起行军。他亲自指派何长工兼任连长。长征路上，何长工调到红九军团任政委后，周恩来又指派八军团卫生部长侯政任休养连的连长，并严肃地叮嘱道：“你当这个连长，担子不轻，连里的老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损失一个，我要砍你的脑袋。”后来休养连的同志绝大部分都胜利到达了陕北。周恩来的这一措施为党保护了一批重要的干部。

### （三）为战略转移开辟道路

8月初，李德又拟定了中央红军8~10月份的新计划，“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预定突围日期是十月底十一月初”。

8月下旬，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机关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领导人李竹声等人被捕叛变，供出了中央红军要向西突围的计划。因为当时中央红军的各项重大行动都要报告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路线是先用电台将文件发往上海局，然后由上海局派人秘密送到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由领事馆用大功率电台发往苏联的海参崴，再转往莫斯科。蒋介石获悉中央红军将要向西突围的情报，立即通报国民党西路军总司令何键：“中央据沪市府情报称：赤匪近经最高干部会议决定最近放弃闽赣，倾巢窜湘黔边境，以与川匪联络盘踞川、黔、滇等省为其大半〔本〕营。”9月13日，蒋介石又就巩固和增修碉堡封锁线，给何键发出电令：“兹特定两项原则如下：甲、完成并巩固原有之重要碉堡〔线〕；乙、增筑战略上之重要碉堡线。属于甲项者：1.由赣江两岸沿线至信丰、安远之第一纵线；2.由萍乡、莲花、大汾、桂东、汝城、仁化至曲江之第二纵线；3.由万安、遂川至大汾之第一横线。以上三线均须严密增筑，并确定部队守备，毋得再事疏忽。属乙项者：1.以沿湘水由衡阳至桂林为第三纵线；2.莲花、茶陵、安仁至衡阳为第二横线……；3.沿吉安、泰和、遂川、赣县、南康、大厦、南雄之公路线及衡、耒、郴、宜、乐昌、曲江之公路线分别筑护路堡，以维南北交通而便运输。以上甲、乙两项希飭属赶办，限期完成具报。”何键除了下令各部队和民团抢修碉堡外，为了加快修建碉堡封锁线的速度，将堵堵红六军团突围的2个师调往湘南赶筑碉堡封锁线。

西线国民党军队的异常活动，引起了周恩来的警觉。他亲自赶往零都侦察敌情，考察敌人封锁线的薄弱部位，选择突破口和行军路线，为红军突围做准备。为了能够秘密而迅速地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周恩来派何长工和潘汉年到白区与陈济棠的代表进行秘密军事谈判。何长工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同志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南天王’陈济棠电约我们，要举行秘密军事谈判，这很好，我们可以利用陈、蒋之间的矛盾。朱德同志已给他复信。根据目前党的统战策略思想及政策，我们准备与陈谈判。我们商定，派你和潘汉年（公开职务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为代表，到陈管区寻乌附近和陈派来的代表——第一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谋杨幼敏及两个师长，一个是独立第七师

师长黄质文，另一个是独立一师师长黄任寰，举行密谈。周恩来同志亲切而又郑重地对我说：长工同志，这是中央给你的重任，望你勇敢沉着，见机而作。他还向我交代了联络密语等项事宜。在场的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兴致勃勃地嘱托道：此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是很有益处的，要尽力而为；谈不成，也不要紧，关键是沉着灵活。于是，我们带着朱德同志署名的一封介绍信上路了。”

“经过连来带去三天三夜的谈判，终于达成了以下五项协议：

1. 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2. 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3. 解除封锁；
4. 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5. 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四十华里。

我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这次谈判的成功，和周恩来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为中央红军迅速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赢得了时间，起到很好的作用。

### 三、指挥红军突破敌人封锁线

9月，中央苏区的北线和东线的防御阵地相继被敌军突破，蒋介石在令各路敌军加紧向苏区的中心区进攻的同时，重新调整兵力部署，准备在10月下旬，中央红军突围的前夕，向中央苏区发动总攻。红军通过侦察和破译敌人的无线电通信，已察觉到敌人即将采取的重大军事行动，决定将突围行动提前1个月，在敌人发起总攻前冲出包围圈。中革军委命令各军团在10月1日前组织好后方机关，加强运输队的建设。但是由于博古、李德一直命令红军在前方抵御敌人的进攻，各项准备工作难以迅速完成，使得红军突围行动一再被推迟。10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接替中央红军主力的防御任务，主力向瑞金、雩都地区集中。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分别由红军总部和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组成的第一、第二野战纵队从瑞金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出发时，周恩来带了两条毯子、一条被单、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一件绒衣，这是他全部的家当。由于红军行动提前，加上行军队伍非常庞大，周恩来的工作极为繁忙，但他没有忘记正在谈判的何长工、潘汉年，行前发出密电将他们紧急召回。

10月21日，红军向敌人的碉堡封锁线发起攻击，经数小时激战，一举突破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并俘虏部分敌军士兵。这时陈济棠根据与红军达成的协议，命令其南路军部队退守广东，让开了进入湘南的通道。周恩来也命令部队放还俘虏和缴获的武器。红军在很短的时间内顺利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蒋介石在得知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并不十分清楚红军的战略意图，仍决心消灭红军于湘粤赣边区的碉堡封锁地带。他命令周浑元、薛岳各集结15个团左右的部队待命。这本是红军迅速行动的极好机会。但中央红军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以第一、第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在前面开辟通路；军委和中央机关组成的两个野战纵队居中；第八、第九军团在两翼掩护；第五军团作后卫压阵。由于中央机关把笨重的机器和各种“坛坛罐罐”都带上了，仅担子就有3000多副。队伍行进在南岭山区中，小路崎岖，拥挤不堪，

行军十分艰难，有时一天只能走 10 到 15 公里。在中央纵队教导师任特派员的裴周玉回忆说：“这些担子，有用稻草捆绑的机器部件，小件的三五个人抬着，大件的要十来个人才能抬得动；有用青的、蓝的、灰的、黑的、绿的各色破布包扎捆绑的大包裹，战士们用肩扛或用扁担挑着走；有用锡铁皮、木板或竹片制作的各式箱子，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走。这些东西夹在队伍中，弄得队不成队，行不成行，拖拖沓沓，全师拉了足有十几里长。当天下午 6 点从高围出发，经麻地，宽田，第 2 天上午 10 点才到达洛口，16 个小时，行程 50 华里。”

看到队伍在泥泞的山道上缓慢地行进，周恩来心中十分焦急，他和朱德一面令部队减少不必要的担子加快行进速度，一面命令前卫部队坚守路上的要点，保障大部队安全通过。

11 月 3 日，蒋介石命令周浑元率领 15 个团组成的纵队从遂川出发，沿着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跟踪追击；命令薛岳率第六路军经萍乡赶往衡阳，防止中央红军北上；令湘军和粤军沿湘粤公路南北对进，阻击中央红军于宜章、郴州以东地区，为了保证红军能够突破敌人衡阳至曲江的公路封锁线，周恩来赶到前方，亲自向红一师师长李聚奎交待任务，命令他带 1 个团在前面开路，掩护部队通过粤汉路。李聚奎回忆说：“周恩来同志摊开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指着地图上画好的箭头，告诉我应从哪里前进，在前进中哪里要放一个排，哪里要放一个连，以担负两侧的警戒。然后周恩来同志嘱咐说：

“一定要保证全军安全通过！”

“我一边领会首长的意图，一边考虑队伍如何前进，并随着周恩来同志手中的红铅笔在地图上所作的一个个标记，计算着一路上需要撒下多少部队，然后又琢磨着最后如何才能收拢这些部队，当时我感到部队撒下太多，战线拉的太长。周恩来同志看出我的顾虑，就笑着给我解释说：‘你不用担心，后续部队一上来，就会去接替你们的，你们就可以把部队收拢起来，继续前进了！’”

周恩来交待完任务仍下放心，又于 11 月 8 日赶到担任前卫的第一师第三团，直接掌握部队的行动，为全军开辟通路。三团的党总支书记萧锋回忆道：“一天早晨，部队在广东归仁、长江圩北一个茂密的树林里小休，周恩来副主席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来到了我们红三团。周副主席穿着一身灰色军装，披一件旧黄布雨衣，脚上穿着草鞋。从他那张消瘦的脸上，大家都知道他是够劳累的了。”

“周副主席、刘总参谋长交代任务后，就加入到我们团直属队的行进行列中去了。在急行军中，周副主席很少骑他那匹黄骡子，经常将骡子给害病的战士骑或驮武器。他利用行军小休和防空时间，找机会同战士拉家常、讲战史。中午大休时，他也是边吃饭边回答干部战士提出的各种问题。一宿营，周副主席总是找机会到连队看一下指战员，十分关心战士的思想、生活。来到团部，他总不忘告诫我们及时查看地形，研究敌情，规定紧急集合场，调查行军路线。常常是他刚回到自己的住房，还没有来得及休息一下，参谋人员又送来了电报、文件。团领导向他汇报，他总是边看文电，边听汇报，并迅速准确地加以处理。夜里，我们这些年青人一躺就睡着了。当半夜起来检查内外警戒时，可以看到周副主席屋里的小油灯还在亮着。周副主席跟三团行动期间，经常看到他通宵达旦地工作，却看不到他一丝一毫的倦意。那双



布满血丝的眼睛，始终闪烁着充满精力的光辉。”

11月11日，红军攻占了封锁线上的宜章县城，打开了通路。15日，中央红军全部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进入了湘南地区。

11月上旬，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西进的战略企图，于11月12日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刘建绪纵队和北路军薛岳、周浑元部，分五路从东、北两个方向“追剿”；令南路军陈济棠部4个师在粤湘桂边区堵截；令广西“剿匪”总指挥李宗仁、副总指挥白崇禧以2个军共5个师的兵力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封锁线堵截；令贵州省“剿匪”总指挥王家烈派有力部队到湘黔边区堵截，决心消灭中央红军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13日，何键向各部队发布了“追剿”命令。

11月17日，军委三局破译了何键13日发布的命令，周恩来和朱德决定调整部署，以红军主力改向东北方向前进，抢占漓水河畔的道县县城，打开通路；以一部兵力向江华、永明（今江永）佯动，以调动敌人。22日，红一军团第二师2个团以日行百里的速度，长途奔袭道县成功，为全军渡过漓水打开了通路。红军一部继续向永明、江华运动。白崇禧很快发现了向永明前进的红军，江华、永明距离桂北重镇桂林只有100余公里。李宗仁、白崇禧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白崇禧害怕中央红军深入广西境内，夺取桂林，急忙请示蒋介石，将全州、兴安一线湘江两岸的部队撤往灌阳以南布防，以屏障桂林，蒋介石怕红军进入广西后，李宗仁、白崇禧不让其中央军进入广西追击，于是同意桂军南移，由何键派部队接防。广西军队在接防的湘军还没有到达时，就慌忙撤走了。这是中央红军突破敌人湘江封锁线的极好时机。

11月25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发出抢渡湘江的命令。27日，红军的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到达湘江边，没有遇到敌人的抵抗，涉水渡过了湘江，并向全州方向运动，但敌人已赶在红军前面，抢先进入了全州城，红二师在全州以南利用地形建立阻击阵地，抗击湘军南下。与此同时，红三军团第四师也安全渡过了湘江，并向南组织防御，抗击广西方向的敌军。红军控制了湘江30余公里的河段，建立了以界首为中心的几个渡口。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这时离湘江渡口只有80多公里，如果采取轻装急进，本可迅速安全地渡过湘江，减少损失。但是部队仍然带着许多“坛坛罐罐”，在崎岖的山道上慢慢地移动，每天只能走二三十公里。这时蒋介石和李宗仁、白崇禧发觉上当，立即命令“追剿军”出动22个团，桂军出动12个团沿湘江两岸南北夹击，企图夺回渡河点；命令其余几路追兵分别向道县等地的红军后卫部队发动猛攻。红军指战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同优势敌军展开了激战，掩护后续部队过江。在战斗中，周恩来一直坚持在湘江渡口的东岸，指挥部队抢渡。他焦急地询问毛泽东渡江没有。当他看到毛泽东大步走过来时，立刻迎上去，请他迅速过江。毛泽东提出一起过江。周恩来说，你先过，我还要在后面交代任务。湘江两岸的掩护部队与敌人连续激战，但在优势敌军的猛烈攻击下，渡口不断缩小，红军时刻有被敌人切断在湘江东岸的危险。

12月1日凌晨，周恩来和朱德决定掩护部队必须再坚持一天，以保证更多的部队能够渡过湘江。三时半，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名义给红一、红三军团首长发出电令：

万万火急！

林、聂、彭、杨：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

中央局  
军委  
总政  
十二月一日三时半

12月1日的战斗最为激烈。各路敌军向中央红军各掩护部队发起了全线进攻，妄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红军广大指战员坚决响应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的号召，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不顾一切牺牲，同敌人展开激烈搏斗，用刺刀、手榴弹打退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又一次冲锋。周恩来和朱德一起坚持指挥战斗。经过整日血战，至下午5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了湘江。担任掩护的红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隔在湘江以东，与围攻的敌人进行了英勇战斗，予敌以重大杀伤，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的一仗，与优势敌军血战5昼夜，终于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保护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安全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消灭中央红军于湘江东岸的企图。但是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博古、李德面对红军的惨重损失，灰心丧气，一筹莫展。这样，部队的指挥实际上由周恩来担当起来，支撑着困难的局面。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红军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博古、李德的指挥对红军实在是一个灾难，不仅丢掉了中央苏区，而且在战略转移中又使红军受到如此严重的损失。红军的出路在哪里？这是许多人都在思索的问题，同样，周恩来也在考虑着这个问题。

#### 四、力主确立毛泽东军事路线的主导地位

11月中旬，蒋介石判明中央红军的战略意图后，一方面命令何键追堵红军，企图消灭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同时为防万一，又命令何键在湖南的洪江，贵州的松桃、铜仁、石阡一带加筑4道碉堡封锁线，以防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何键命令薛岳率第六路军和一部分湘军迅速抄近路赶往洪江地区，企图依托4道封锁线，组成袋形阵地，在追击部队和桂军、黔军的配合下，一举将中央红军消灭。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在湘桂边境的崇山峻岭中，边打边走，并没有摆脱困境。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红军不能继续执行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建议中央红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但是博古、李德仍然坚持要到湘西去。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湘黔

桂边界的通道县城召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周恩来在会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否定了博古和李德的意见，果断地决定中央红军继续西进，抢占贵州的黎平、锦屏，开辟前进道路，同时电令红二、红六军团向南发展进攻，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会后博古和李德仍然坚持要到湘西去。

12月15日，红军先头部队攻占黎平。17日，周恩来和朱德随中央纵队进入黎平城。为解决争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第二天召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这时大多数中央领导人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已经开始认识到博古、李德的错误，都转向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他后来说：“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由于博古等人坚持原来的意见，会议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在适当的时间开会总结讨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会后，周恩来和朱德命令中央红军改向西北方向前进，准备突破乌江，夺取遵义。这一正确决定，使中央红军从长征开始以来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

12月31日，中央纵队到达乌江边。博古、李德仍然坚持要返回湘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反对中央红军北渡乌江。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乌江边上的猴场再次召开会议，否定了他们的错误主张，重申“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样就彻底改变了博古、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压制下同意见，个人包办一切的状况，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为遵义会议做了准备。

1935年1月2日，中央红军突破了乌江天险，全军胜利地渡过了乌江，把数十万“追剿”军甩在了乌江右岸。红军长征初期，蒋介石的高参杨永泰曾提醒他，红军有可能经湘西入黔、川再北进；还有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入川的可能性。蒋介石不屑一顾，说：“这是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红军突然西进贵州，完全出乎蒋介石意料，既无思想准备，更没有作战预案，只得暂时停止追击，重新部署和调兵遣将。1月7日，中央红军乘胜夺取了遵义城，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为召开遵义会议和休整部队赢得了时间。

1月9日，中央纵队进驻遵义。周恩来立即组织各军团以遵义为中心，实施战略展开，一面对周围的敌军进行监视警戒，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一面发动群众，休整部队，调查研究，了解民情风情，为建立根据地做准备；同时积极筹备和组织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议程有两个，“（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对于第一个问题，会上根据几天的调查研究，认为遵义一带地形条件不

好，北有长江，东、南有乌江，西有横江和横断山脉，不利于红军大规模机动作战；当地党的工作基础薄弱，群众吸食鸦片比较普遍，红军难以扩大。根据朱德、聂荣臻、刘伯承等人的建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决定，改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对于第二个问题，会议以主要精力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首先，博古作了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总结的主报告。他在报告中把红军未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革命运动和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配合薄弱，而对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没有认识。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和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接着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系统地分析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也先后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发言。周恩来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他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大家对周恩来仍然充满信任和尊重。会议认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失利，“A（李德）、博（古）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并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与长征以来军事斗争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使周恩来对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特别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所作的精辟阐述，揭示土地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使他深切感受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军事路线的正确代表者。因此，他能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衷心拥护毛泽东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上来。这是周恩来探索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规律所获得的重要成果。由于周恩来当时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又是有着对红军最高指挥权的“三人团”成员，所以周恩来的态度对会议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周恩来是“三人团”中唯一支持毛泽东的人。陈云说：“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毛泽东向红一师的领导传达会议精神时，也说遵义会议的成功，“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从此以后，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指挥红军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任务。在以后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周恩来不仅是毛泽东在军事方面的主要助手，而且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者。遵义会议成为周恩来探索土地革命战争规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月19日，中央红军开始北上，准备渡过长江，向川西北方向发展，途中受到国民党军队重兵拦截。红军在习水县的土城与川军作战失利。周恩来和毛泽东决定，红军迅速西渡赤水河，进入四川南部，准备改由宜宾上游渡金沙江北上。29日，周恩来亲自指挥红军一渡赤水河，向西转进。

此时，蒋介石也已调整了部署，以进入贵州的薛岳所率的国民党中央军2个纵队和滇黔两省的部队组成“剿匪军”第二路军，由云南省主席龙云为

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专事“追剿”中央红军；调集川军40多个团的兵力组成“四川南岸剿匪军”，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调集湘鄂部队6个师又1个旅驻防乌江下游，阻止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2月上旬，红军中央纵队进入云南的扎西地区，在一个名叫“鸡鸣三省”的村庄，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遵义会议决议；并根据当时蒋介石已调集重兵，沿长江布防，堵截红军过江的情况，再次改变红军的战略任务，决定在川滇黔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川滇黔根据地。遵义会议的精神迅速地传达到全军，极大地鼓舞了全军指战员的斗志。为了适应新的任务，周恩来和朱德、王稼祥命令部队进行缩编，精简机关人员，充实连队的战斗力。全军作战部队编为16个团，再加干部团，共17个团，红军的人数虽然减少了，但是战斗力得到了充实和加强。这就进一步从组织编制上保证红军运动作战的顺利实行。

周恩来根据中央在川滇黔开展新根据地的决定，和毛泽东、朱德等人一起筹划了遵义战役。2月18日，周恩来和朱德命令红军“迅速渡赤水，争取有利阵势，以便集中全力消灭黔军一部，开展战局。”当晚，红军以突然的动作，再渡赤水河，返回河东地区插到敌军后方。周恩来和朱德命令红军以奇袭的手段，夺取桐梓县城，并乘胜攻占娄山关。红军占领娄山关后，防守遵义的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看到遵义失去屏障，急忙向“追剿军”前敌总指挥薛岳求援。周恩来、朱德决心乘黔军刚败，仓皇混乱之机，抢在敌军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再次夺取遵义，打开黔北地区的局面，以利红军下一步的行动。红军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一鼓作气，于28日再次攻占遵义城。为了巩固战果，红军，除留一小部在遵义打扫战场外，主力迅速南下，准备控制城南的高地，阻击敌人增援部队。在南进中与赶来增援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遭遇。红军以“两军相逢勇者胜”的大无畏精神，勇猛向敌军发起冲击。敌人被红军突如其来的冲击弄慌了神，军官找下到士兵，士兵找不到逃路，整个队伍被红军冲得七零八落，不战自溃。敌指挥官吴奇伟慌不择路，拼命南逃。红军乘胜追击，直抵乌江北岸。吴奇伟为保自己不被红军俘虏，刚逃过乌江就命令手下将临时架设的浮桥砍断，阻止红军的追击，结果将其数千名残兵败将弃之下顾，都送给了红军作俘虏。这一战役在周恩来、朱德的正确指挥下，共歼灭和击溃敌军2个师又8个团，俘虏近3000人，缴枪1000余枝，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对红军的指挥方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纠正过去中央政治局对作战领导不力的状况，政治局每天都要召开十几人的会议，研究讨论红军的行动。而政治局的多数成员不懂军事，对许多具体问题常常争论不休，议而不决，严重影响了军事指挥员拟定作战部署的决心，不符合军事工作的特点，违犯了作战指挥的规律，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遵义大捷后，政治局为实现在黔北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多次开会讨论如何打开局面的问题。为了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党中央还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3月10日，在中央会议上，大家就攻打打鼓新场（今贵州省金沙县）的建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大多数与会者赞同攻打打鼓新场，这些同志还沉浸在红军遵义战役胜利的喜悦之中，认为红军既然能够把有重兵把守的黔北最大的城市打下来，而只有一个师防守的打鼓新场肯定不在话下。但是毛泽东清醒地看到，红军是利用敌人情况不明没有准备，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巧夺遵义的。

打鼓新场的敌人虽然只有一个师，但遵义城再次被红军占领后，已加强了城防工事，防止红军的突然袭击，而蒋介石此时已到重庆督战，守军更不敢轻易弃城逃跑。再则红军缺乏攻城的重型武器，难以迅速夺取该城，而周围十多万敌人正兵分四路向红军步步逼近，如果红军不能在一天之内夺取该城，将可能陷入敌军四面合围之中，重新陷入被动局面。红军只剩2万多人，这些都是革命的种子，不能轻易损耗，因此坚决不主张攻打打鼓新场。由于大多数人赞同打打鼓新场，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了，并撤销了毛泽东刚任命没几天的前敌政治委员的职务。但毛泽东仍以大局为重，会后又找周恩来研究这件事。周恩来认为应该重视毛泽东的意见，连夜和朱德商量暂缓下达作战命令，等有关敌人动向的最新情报收到后，再做最后决定。第二天一早，再次召开会议，新的敌情通报证明了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周恩来说服大家放弃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使红军避免了一次大的危险。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虽然放弃了，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这场风波实质上是两种不同军事思想争论的余波。毛泽东以运动战为红军主要作战形式的思想虽然写进了遵义会议的决议里，但是真正理解和运用它，则是另一回事。那时政治局里的多数同志不懂军事，又是在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前后进入中央苏区的，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还没有深切的体会，一些红军领导人也因进行了一年多的阵地战，对运动战有些生疏了。许多人都希望能够尽快打几仗消灭敌人。当时任中央秘书长，后来成为张闻天夫人的刘英回忆说：“在当时，毛主席既没有后来那样的绝对权威，大家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也还没有完全领会”。

从1935年二三月间陈云传达遵义会议情况的提纲中可以看出，当时政治局对遵义会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到四川建立根据地的决定持批评态度，希望能早日打出块地盘来，开辟新的川滇黔苏区。所以又决定去打一个叫鲁班场的地方。鲁班场位于贵州省仁怀县的西南方，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3个师又1个旅共15个团于2月初进驻这一地区，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修筑了大量的野战工事。红军前敌司令部成立后，曾想把这部分敌人调动出来，以伏击的方法给予打击。但是周浑元在吴奇伟纵队被红军击溃后，小心谨慎，不敢脱离既设阵地，轻举妄动，红军未能给予打击。在攻打打鼓新场未成的情况下，政治局决定打击鲁班场之敌，显然不符合红军运动歼敌的基本原则，甚至也不符合进攻兵力应大于防守兵力的一般战术原则。红军能够投入战斗的总兵力只有15个团，除去警戒、掩护和抗击敌增援的部队以外，实际能够投入战斗的还没有敌人的兵力多。可想而知，决定攻打鲁班场和打鼓新场是同一个指导思想，是不符合毛泽东一贯主张采用的作战原则的。

3月15日，红军对鲁班场发起进攻，结果未能解决战斗，反而伤亡近500人。傍晚，增援敌军分路向鲁班场合围过来。红军各阻援部队均与敌人交火。形势对红军极为不利。周恩来当机立断，决定红军立即撤出战斗，当晚即向

仁怀、茅台方向转移，再次西渡赤水河，摆脱敌人的合围。16日，红军从茅台三渡赤水，甩掉了敌人。此后红军的作战方法有了很大的改变，不再主动求歼敌人，而是千方百计地调动敌人，避免不必要的战斗，尽量减少损失。3月20日，红军派出1个团的兵力佯装主力西进，吸引敌人继续向西追击，红军主力则以突然的动作四渡赤水河，绕到各路追兵的侧后方，开始摆脱被迫击的被动局面。

事后，毛泽东鉴于作战情况复杂多变，指挥需要集中，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一个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刘英回忆说：“闻天也认识到这件事处理失当。由此更觉得军事领导要改变办法。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必须临机决断，靠开中央会议来决定会贻误战机，而且他自己对打仗也不熟悉，自认是外行，觉得过多地参与军事指挥不合适，所以就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议，决定成立军事三人小组统一指挥。这个三人小组的成员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关于三人军事小组成立的确切时间，至今还没有历史文献可以查实。从一些当事人的讲话和回忆中可以证明，成立三人军事小组的起因是攻打打鼓新场之争。因此，三人军事小组的成立时间只能是在3月10日以后，这是可以肯定的。但具体是哪一天呢？从红军10日以后的行动和作战指导方针的变化来看，张闻天1943年12月在整风自述材料中写道，“在抢渡乌江以前，泽东同志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这种提法比较准确。这不仅因为在长征中，张闻天每天都记日记，这些日记本一直带到延安，有较为可靠的文字依据，而且成立三人军事小组的主要原因是改变指挥方式。指挥方式的改变是可以从红军的行动和作战指导方针的变化中反映出来的。因此三人军事小组成立的时间，应该在3月21日至3月31日之间。小组仍由周恩来负责。毛泽东成为军事上的最高决策者之一。

毛泽东很快察觉到，红军在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之下，要在川滇黔地区建立根据地是不可能的。他全面研究分析了敌情后，对蒋介石“外守内攻”的战略意图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外守是：在北面，以川军30多个团的兵力，依托长江天险，阻止中央红军北上，专防不攻；在东面，6个师又1个旅的兵力依托乌江天险，阻止中央红军东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专隔不迫；在南面，以黔军2个师、国民党中央军1个师、桂军2个师、粤军2个师依托北盘江、清水江和贵阳城，阻止中央红军南进，专守不进；在西面，以滇军4个旅，依托横江和横断山脉，阻止中央红军西进，因这一方向上兵力不足，其任务则是既防又攻；此外，还以3个师共7个旅的兵力，以遵义、桐梓为支点，沿贵阳至重庆的公路建立封锁线，限制中央红军的机动。内攻是：以国民党中央军、滇军和黔军组成的4个纵队，加上川军10余个团的兵力，专事在包围圈内对中央红军穷追不舍，采用层层堵截、四面合围、轮番攻击等方法，与红军纠缠，企图将中央红军一举消灭。毛泽东认为，红军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全力应付敌人的追击，不可能抽出力量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应该考虑放弃在川滇黔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跳出敌军的包围圈，寻找新的落脚点。而要摆脱目前的困境，最好的办法是选择敌军包围圈最薄弱的西面作为突破口，设法将滇军东调，红军就有可能冲出敌军的合围。

但是，毛泽东的正确方针仍有很多同志不理解，“在三人小组里，稼祥对毛主席的办法就有意见。他向闻天反映，说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稼祥要求开会讨论这个问题。”一些教条宗派主义者则在暗中活动，传言“毛

泽东同志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起来带头倡议的一个。”

“林彪一直埋怨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他还煽动彭德怀：“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周恩来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排除种种干扰，他和毛泽东一起指挥红军声东击西，大步进退，机动作战，穿插游刃于数路追敌的缝隙之间，想方设法将滇军调出来。3月27日，周恩来和中革军委领导决定：“我野战军主力决南移寻求机动”，令红九军团伪装我军主力“暂留现在活动地域籍制周、吴纵队，以配合我主力作战。”3月31日，红军主力在乌江上游的江口、大塘等处南渡乌江，歼灭守敌和援敌各1个营，进至息烽西北地区，巧妙地将数十万敌军甩在了乌江以北地区。红九军团完成掩护任务后，准备南渡乌江时，敌人已控制了渡口，被阻于乌江北岸。此后，军委通过电台指挥红九军团单独在乌江北岸活动，继续牵制敌军，配合红军主力的行动。周恩来非常关心红九军团的安危，特别指示军委电台要注意收听九军团电台的呼号，要优先接话。

红军主力突然南渡乌江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这时贵阳周围只有国民党中央军1个师，分布在北起乌江、南到贵阳东西两翼的大片地区，兵力单薄，中央军其他部队都远在赤水河一线，远水解不了近渴。离贵阳最近的是黔军2个师，蒋介石对黔军极不相信，只好求其次，急令滇军3个旅紧急增援，加强贵阳的防务，同时命令新调遵义地区的李韫珩纵队急速南渡乌江，尾追红军主力。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决定红军主力向东转进，在贵阳东北的紫江（今开阳县）地区隐蔽待机，派出一团佯装红军主力，前出到清水江架设浮桥，摆出红军主力准备继续东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态势。

蒋介石被红军的行动所迷惑，认定中央红军企图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急忙命令周浑元纵队在红军左翼，沿乌江北岸实施平行追击；滇军在红军的右翼，沿贵阳到都匀大道实施平行追击，两纵队力争超越红军；李韫珩纵队和吴奇伟纵队迅速渡过乌江和鸭池河尾追红军；调湘军两个师和桂军第七军紧急增援防守清水江东岸的部队。蒋介石还自作聪明，令防守清水江的部队“伪造六十三师、二十三师标语，分发各组侦探，宣传大军已到；在沿河鸣枪，故示警戒。”

4月7日，滇军超越中央红军，到达贵阳以东的贵定，与尾追的吴奇伟纵队之间出现了空隙。毛泽东提出的“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的战略意图，在周恩来和朱德的精心策划和组织指挥下终于实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有利时机，决定红军冲出敌人的合围圈，向云南进军。当晚，军委发布命令：“我野战军决以遭遇敌人，佯攻贵阳、龙里姿势，从贵阳、龙里中间向南急进，以便迅速占领定番[今惠水县]。”同时命令滞留在乌江北岸的红九军团向西前进，以积极的行动牵制敌人，与红军主力南北呼应。4月8日，中央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敌人的防线，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向云南疾进，把尾追的敌军全部甩在了身后。

蒋介石发现红军西进云南后，慌忙调整部署，急令周浑元、吴奇伟、李韫珩纵队掉头西进，沿黔滇公路在红军右侧追击，令滇军尾红军追击。但敌军由于往返奔波，已疲惫不堪，减员很大，士气低落，行动缓慢。



4月28日，红军逼近昆明震动整个云南。龙云一面向蒋介石紧急呼救，令滇军取捷径赶赴昆明，一面调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这样滇北一带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被大大削弱了。红军的行动再次调动了敌人，创造出有利的战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决定立即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指示：“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七十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中央红军接到命令后，即刻调头向北挺进。干部团作为全军的先遣队，以日行100公里的速度，昼夜兼程，于5月3日晚赶到金沙江的皎平渡口，巧渡金沙江成功。第二天，军委纵队渡过金沙江，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一起组成指挥部亲自指挥全军过江。5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了金沙江，进入川西地区，与5月5日从蒙姑、盐井坪渡口过江的红九军团会合，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当时担任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回忆说：“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主席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周恩来指挥作战，一贯重视‘知己知彼’，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他在作战前，总要首先认真研究敌我双方的军情，“每天夜里他都要研究清楚了，然后下命令到各个部队，哪个到哪里，后方应做什么，然后到三、四点才去睡觉。他的精神好，青年人都熬不过他。”“副主席知道敌人中哪个是嫡系，哪个是杂牌军，作战能力如何，都很清楚。对我们哪个师战斗力强，哪个战斗力弱，更是了如指掌。因为了解，他们就能发挥各自的专长。我带的是个小部队，只能打游击，他就叫我们打游击，不给我们硬仗打，这样我们就有信心完成。副主席了解部队水平到什么程度？比如部队有多少人，多少枪，多少子弹，你这回仗伤亡多少、补充多少，他都一清二楚。我们军团长罗炳辉对我们部队人员的变化，有时还没有及时掌握，就曾给副主席问住过。以后我们知道‘胡子’要来，就赶紧找参谋查询我们几个师、团人数及装备状况等。”“周副主席在干部中有很高的威信，大家都很尊敬他，但又很愿意和他接近。就象我们这样的干部，也跟他开玩笑，叫他‘胡子’。”

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附近的铁厂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再次批评了林彪，高度赞扬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危急情况下，采用兜大圈子的办法，甩掉了敌人，胜利渡过了金沙江。他强调红军只有实行机动作战的方针，才能摆脱敌人重兵的包围。会议决定红军通过彝族区，迅速北上，争取早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会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指挥下，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5月26日，周恩来赶到安顺场，看到大渡河水流湍急，不能架桥，船只又少，红军难以迅速渡河，于是和军委领导人研究决定夺取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当日朱德命令红一军团第一师由军团政委聂荣臻率领沿大渡河左岸前进；第二师由军团长林彪率领，沿大渡河右岸前进。两师夹江而上夺取泸定桥。5月29日，红一军团第四团占领泸定桥，与左岸部队一起攻占了泸定城，胜利完成了保障全军渡过大渡河的任务。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继续北上。周恩来考虑到铁索桥是川西地区的交通咽喉，如果为了阻止敌军的追击将其炸断，将给

大渡河两岸的人民群众带来极大的不便。因此，他命令担任后卫掩护任务的红九军团政委何长工，只锯断几根铁索，减缓追击敌人过河的速度。这充分体现了周恩来心中时刻想着人民的崇高思想境界，即使在红军处于危难之机，仍然把困难留给自己，使群众利益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的程度。此后，红军一路势如破竹，接连攻克天全、芦山、宝兴，翻越夹金山，于6月14日在懋功的达维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 五、反对分裂，坚持北上的战略方针

红军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的会师，是长征史上的一件大事。但长征并没有结束，红军还没有找到新的落脚点，没有完成战略转移的重大历史任务。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下一步应该向何处发展？是就地建立根据地以图发展，还是向别的地方求发展？这是关系到党和红军前途的生死攸关的头等重要大事，从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之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等中央和红军的领导人就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一路的行军和作战，使他们感到要在川西北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将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将眼光转向了川陕甘一带。

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和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认为：“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6月18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电张国焘等人，指出：“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邓（睐）、大（邑）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张国焘迟迟不答复中央的这些意见和建议，私下里命令李先念设法率部渡过大金川，继续西进。20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电张国焘等人，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如认为绝无办法，则须暂时抛弃川陕甘方针，改变力向川西南发展。……兄亦宜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但是张国焘仍然坚持向西发展的意见。

6月25日，中央红军和党中央机关到达两河口，与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会面。第二天，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战略方针问题。

周恩来受中央的委托，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说，当前两个方面军都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需要在新的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因此，在什么地区创造新苏区是我们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制定战略方针的基本依据。周恩来指出，战略方针应该是向北发展，把创建新苏区的着眼点放在川陕甘地区，而不应该向西向南或是留在原地发展。他从几个方面论证了北上方针的理由，并着重分析了出川陕甘的好处和留在原地的不利。周恩来指出，（一）川陕甘地区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理番、懋功地区虽大，但地形险恶，道路狭窄，利于敌人封锁，把我军困于入烟稀少给养极为缺乏的山区，同时这样的地形还很不利于红军向敌人反攻。（二）川陕甘地区的群众条件要比川西和川北地区好，那里人口较多，是红军得以

发展的基本条件，没有群众，红军就无从发展；而松潘、理番、茂县、抚边、懋功、温川地区面积虽大，但人口只有20万，又是少数民族聚集地，由于历史的原因，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隔阂很深，要想在少数民族中间扩大红军是比较困难的。（三）川陕甘地区物产比较丰富，解决红军的给养比较容易；松潘、理番、茂县一带粮食缺乏，有些地方甚至还不能自给，其他需要的物资，如布匹、药品等就更难以解决。因此，红军如陷在懋、松、理地区，就没有前途。他还进一步指出，向西北是广漠的大草原，条件更艰难；向东过岷江，敌军在岷江以东已集结了130个团，对我不利；回头向南，敌军已占领了夹金山以南的全部地区，而且一路跟踪而来的蒋介石中央军和在川西南的刘文辉一部兵力，也已集结在雅安一线，阻截红军南下。因此，红军只有北上甘肃这一条路。那里“道路多，人口多，山少，在此必定会遇到敌人，我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如何实现北上的战略方针呢？周恩来认为松潘是整个川西北的战略要地，控制了松潘，就能控制川西北地区，打开进出川陕甘的通路，保证红军北上方针的顺利实现。因此，红军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向松潘方向发展，同胡宗南作战，夺取松潘。红军的行动一定要高度机动，使敌人的部署赶不上红军的行动。同时应注意，红军自己不要被敌人所牵制，妨碍自身的机动权。另外，两个方面军还应由中央军委集中统一指挥，保证战斗的胜利。周恩来的报告，得到了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博古等人的赞同，张国焘在会上也不好表示反对。周恩来最后作了结论：要转入反攻，建立根据地，进入更广大的地区同敌人战斗。从两个主力会合至到达预定地区，口号是赤化川甘陕。各部队要行动，行动应迅速。政治局会议记录最后写到“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

6月28日，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明确规定：“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同时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针对张国焘想退往川康地区或青海、新疆的主张，强调：“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两河口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为两个方面军会师后的行动指明了正确方向，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周恩来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

6月29日，周恩来和朱德、张国焘、王稼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发布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乘胡宗南部前锋刚到松潘，兵力尚未集中完毕，碉堡工事还没构筑完毕之际，要求各部队按计划规定的任务迅速开始行动，坚决消灭松潘地区的敌人，打开红军北上的道路。

周恩来提出迅速夺取松潘的建议，在战略上是非常高明的一着。7月初，蒋介石到达成都后，即调来川西的兵要地志，研究对策。蒋介石很快发现，松潘是川西北的战略要地，进可以成为继续向红军攻击的前进基地；退可以扼制红军北上经松潘出甘南，或截击红军东出平武、青川、文县向甘南发展。于是他制定了一个“长城加八阵图”的战略方针，企图将红军困死在川西北地区。所谓“长城”即用其嫡系部队围堵红军。蒋介石一面命令离松潘最近

的胡宗南纵队抢占松潘，一面命令一路尾追红军的周浑元和吴奇伟两个纵队，经成都赶往平武、青川一带，协同胡宗南防堵红军向川陕甘一带发展。所谓“八阵图”就是继续采用在江西“围剿”中央红军的办法，从甘肃南部经川甘边界到成都平原，再折向西直至雅安以西的广大地区，修建绵密的碉堡封锁地带，红军一旦突围，进入碉堡封锁地带，就犹如进入诸葛亮的八卦阵，四面受击，不得而出，最后被消灭在里面。红军如果真正能够按照周恩来的部署行动，是可以迅速北出甘南，开创新的局面的。

开完政治局扩大会后，张国焘向周恩来打听一方面军的实力，周恩来坦率告诉他：“遵义会议时有三万多入，现在可能不到了。”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他自恃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比一方面军多得多，于是个人野心膨胀，企图挟制中央，向党伸手要官要权。他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要求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故意延宕四方面军的行动，并声称不解决这些问题便“无法顺利灭敌”。中共中央拒绝了张国焘的无理要求，希望他能够觉悟，服从中央的决定，加强两支主力红军的团结和统一。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联名致电张国焘：“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希望四方面军“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急盼兄及徐、陈速来集中指挥。”周恩来为了顾全大局，和毛泽东、张闻天等商量，决定把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以促四方面军迅速北上。7月19日，中央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指出：“依据目前敌情的变化，证明军委六月二十九日松潘战役计划中关于敌情的判断，是完全正确和适用的。”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夺取松潘。7月21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统一编为5个纵队和1个支队，成立前敌总司令部，负责统一指挥前方部队作战。

7月下旬，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到达毛儿盖，消灭胡宗南部1个营，接近松潘，准备继续前进，攻打松潘。这时，敌军胡宗南部的的主力已在松潘完成集结，薛岳已率周浑元和吴奇伟两纵队到达平武地区，与胡宗南部靠拢；南面的川军已占领了懋功、绥靖（今金川县）；东面的敌军占领了岷江东岸的北川、茂县、威州等地区，并逐步紧缩对红军的包围。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和破坏，使红军失去了夺取松潘的有利时机，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

红军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研究红军的行动方针。特别是红军失去攻占松潘，打开北出甘南通路的先机之后，红军是否应该继续北上，是一个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

这时，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继“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又一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大事。6月27日，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7月6日，国民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日本不战而获得了冀察两省的大部分主权，为全面侵华作了准备。接着又积极策划华北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自治运动”，组织亲日政权，以实现其变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的图谋。

中共中央从无线电台得知华北这一变化的情况后，立即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的高度重视。他们敏锐地察觉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正在加紧进行，中日全面战争不久将会爆发。在中国，民族矛盾的地位将急剧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华北将是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是未来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只有投身到这场伟大的

民族解放战争中，积极参加并领导这场战争，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占据重要的一席。相反，如果远离民族解放的战场，居安一隅，就等于自动地退出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不仅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机遇，更重要的将会失去民心，失去其政治地位，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因此，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党和红军的生存，红军的战略方向必须也只能是继续北上。

在政治局会议上，就南下还是继续北上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张国焘对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表示怀疑，坚持南下四川、西康的主张。周恩来和其他与会者驳斥了张国焘的错误观点，坚持北上的方针。周恩来说，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现在我们最高的原则是作战胜利，要将问题尽量提到最高原则上来解决。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重申：“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这个根据地的造成，不但是红军作战的后方，而且是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的苏维埃国家的领土。”强调指出根据地的存在，“是以鼓励全中国被压迫的工农劳苦群众起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做斗争”，“团集全中国革命力量的核心，与散布革命种子到全中国去的发源地。”针对张国焘的非组织活动和错误主张造成的影响，《决议》还强调：“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历史任务，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必须在部队中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动摇具体的表现在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现怀疑，不敢大胆的前进，而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会议还决定为加强和统一红一方面军的领导，组织一方面军司令部，由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会后，红军开始准备继续北上。根据红军总部拟定的《夏洮战役计划》，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红一、四方面军进行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军，穿越人迹罕至的大草地。“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桃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红军各部队为穿越草地，开始进行收集粮食、打草鞋等各种准备工作。

此时，周恩来突然病倒了。长征以来，周恩来一直指挥红军作战行军，劳苦异常，经常彻夜不眠。有一次，周恩来处理完工作后，已是下半夜了。他刚休息不久，一位参谋有事向他请示，周恩来在睡梦中“嗯”了一声，参谋以为他已同意，就退出来去经办了。第二天，他说完全不知道这件事。为此，他规定，以后必须把他喊得坐起来，才算叫醒。因为睡眠不足，白天骑马行军会打瞌睡，容易掉下来摔伤，只好每天徒步行军，终于因积劳成疾病倒了。杨尚昆回忆说：“长征中的恩来同志，也和中央苏区一样，军委的主要责任都落在他身上。他每到驻地，就叫人架起电线，接收各军团的电报；同时，挂起地图，以便观察和抉择行军、作战的路线。然后他才坐到椅子上稍事休息。等情况来齐后，经过分析研究和请示毛主席，就起草作战命令，下达行军路线，直到向各军团的电报都发出后，他才睡觉。这时天已快黎明，新的一天战斗生活又要开始了。本来刘伯承同志是总参谋长，但眼睛不好，晚上工作不方便，所以恩来同志不要他起草作战命令，而由自己承担起来。”

连续三天三夜，周恩来一直发着高烧，不能进食，昏迷不醒。毛泽东知道后，连夜赶来看望。当他得知中央医院院长傅连璋已随红军总部前往卓克

基，当即派人到红一军去请来最好的医生为周恩来医治，并派人通知邓颖超前来照顾周恩来。经王斌、李治两位医生诊断后，确认周恩来患的是肝炎，并已转变成肝脓肿，急需排脓。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无法消毒，不能开刀或穿刺。医生只能用治痢疾的药物来控制病情，并派卫士到 60 里外的雪山上取冰块敷在他的肝区上。经过抢救，周恩来终于脱离了危险。

8 月 11 日，刚苏醒过来的周恩来就给红一、三军首长发电报，指示他们依据总部《夏洮战役计划》，“准备在七天到十天内经班佑前进”。并且要充分利用最近的七天时间，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保证北上行军作战的顺利进行。

在周恩来病重期间，张国焘再次向党中央发难，提出红军要向青海、新疆发展的主张。为此，中共中央于 8 月 20 日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因病不能出席，由毛泽东专门作了关于夏挑战役红军行动方向问题的报告，指出，我们的行动方向，一是向东（陕西），一是向西（青海、新疆）。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政治局通过了毛泽东根据报告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第二天，右路军开始穿越草地北上。中共中央所在的军委纵队随右路军行动。正在病中的周恩来不要说过草地，就是走平路也不行。彭德怀断然决定将周恩来和身负重伤的王稼祥抬过草地。他嘱咐参谋长萧劲光负责组织担架队。萧劲光从红三军迫击炮连抽调十几名战士组成了担架队。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担任担架队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亲自参加抬担架，他的双肩都磨破了，走出草地就累病了。周恩来躺在担架上心里十分难受，多次挣扎着从担架上爬下来。经过 6 天 6 夜的艰苦行军，红军右路军终于走出了草地，到达班佑。19 年后，杨立三逝世时，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无论如何也要亲自给他抬棺送葬。这是多么深挚的同志之情啊！

红军穿越草地的行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当红军突然出现在班佑、包座一线时，敌人茫然不知所措。红军右路军在包座一战歼灭胡宗南纵队 1 个师，夺取了松潘之敌的后方粮草补给基地，不仅甩掉了尾追的敌人，而且打开了继续北上的大门。党中央立即致电张国焘，要他率领左路军迅速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执行《夏洮战役计划》。

张国焘在随左路军到达阿坝后，便借口河水陡涨，缺乏粮食，要求部队南下，并要求右路军也一并南下。在中央和右路军领导的一再坚持下，张国焘率左路军一度进到墨洼，但又再次借口葛曲河水上涨，退回到阿坝。9 月 8 日，随右路军行动的几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周恩来的住处开会，决定由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 7 人联名致电张国焘，要求他立即率领左路军迅速北上。这时张国焘已决意南下，对来电置之不理，并于当日密电第三十一军政委，命其“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蕃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9 月 9 日，张国焘密电陈昌浩，命令右路军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随即来到周恩来的住处，并请来了张闻天和博古，四人开会研究对策。为了贯彻中央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连夜率领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继续北上。

9 月 10 日凌晨 2 时，中共中央率领红三军向俄界进发，当日到达阿西。

党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同时，中央政治局还指令徐向前、陈昌浩：“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11日，中共中央和红三军到达俄界，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12日，周恩来出席了在俄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准了政治局常委决定的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五人团”，负责处理一切重大军事行动，并将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抢在敌军增援部队之前到达陕甘边界的天险腊子口。红军先锋部队攀登悬崖峭壁，一举攻占了腊子口，并击退了敌人的增援部队，乘胜占领了哈达铺。红军突破腊子口后，就进入了甘南的开阔地带。在哈达铺，党中央从敌人的报纸上得知陕北刘志丹领导的西北红军仍在坚持斗争，并和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会合，保存了一大片苏区根据地。9月27日，陕甘支队占领直罗镇，周恩来出席了在这里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选在陕北根据地，到那里与刘志丹领导的西北红军会合，保卫和扩大苏区，开辟新的局面。这个决定一经宣布，全军指战员一片欢腾，一年来的长征，终于盼到了尽头，有了明确的目的地。红军指战员们在即将到来的胜利的鼓舞下，一鼓作气，突破了敌人的西兰公路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胜利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在会上作的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和结论。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正式宣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实现了党和红军战略转移的伟大任务。

回首红军走过的艰难历程，周恩来感慨他说：“我们是有许多很优秀的同志倒在了长征途中，我们应当永远记着他们！”“但是，我们红军象经过了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存下了树身和树根！懂吗？保存下了树身和树根！”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的会合，使全国的革命形势和陕北根据地的面貌立即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了。

## 第六章 推动由阶级战争向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

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已察觉到，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大举侵略中国的战争准备，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们提出了中国的革命战争应该在巩固现有阵地的基础上，逐步由国内阶级战争转向民族解放战争。周恩来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看到蒋介石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抗日的一面，及时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逼蒋抗日”的主张，并为实现这个主张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卓有成效地领导了争取东北军和第十六路军共同抗日的工作，实现了“三位一体”的军事联盟，促成了西北大联合的局面。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以中共代表的身分，正确地运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手段，帮助张学良、杨虎城和平解决了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与蒋介石的谈判中，周恩来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独立领导权，为共产党争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周恩来为中国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 一、领导巩固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

1935年10月22日，周恩来出席了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苏区后的任务。会议认为，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到达陕北，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巩固和扩大陕甘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会议还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日益猖獗，中国共产党必须把反帝斗争与土地革命联系起来，把保卫苏区的斗争随时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

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组织局和后方的军事工作，博古负责苏维埃工作。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会议还决定陕甘支队改成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立即南下与红十五军团会合，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围剿”，虽然中央常委分工周恩来分管组织局和后方的军事工作，并担任军委后方办事处主任，主要承担根据地的建设任务，但是毛泽东认为这一次的作战，是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和红军能否在大西北站住脚的关键一战，前方离不开周恩来参与决策和组织指挥。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会议最后决定周恩来暂时仍和毛泽东一起到前线指挥作战。会后，周恩来便和红一军团一起南下，与红十五军团会合。

在此期间，周恩来听取了红十五军团和陕甘省委领导同志的汇报，深入了解陕甘地区的政治、经济、地形、敌情、民情等各种情况，基本摸清了敌人的作战意图和兵力部署。他还同彭德怀一起到张村驿一带实地勘察，组织红军肃清土匪，筹集粮草，准备战场。

当红军陕甘支队北上时，蒋介石为了统一西北方面“围剿”红军的军事行动，于9月26日决定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之职权，统一指挥陕、甘、宁、青、晋五省军队。11月1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在西安组建完毕，开始组织对红军的“围剿”。中央红军主力与陕甘红军的胜利会师，对国民党在西北的统治是一个



巨大的威胁。张学良企图乘红军初到陕北，立足未稳之际，围歼中共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于洛水以西地区。他命令第五十六军军长董英斌率4个师，由甘肃的庆阳、合水地区经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第六十七军的第一一七师由洛川北进郿县（今富县），然后西进，与东进的第五十七军会合，首先构成合水至郿县和郿县至延安的东北、南北碉堡封锁线，将红军压缩在一狭小区域内而一举歼灭。

在研究作战的军委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如果让敌人从容建立起新的碉堡封锁线，红军就难以迅速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这对红军在西北站稳脚跟的计划将十分不利。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并和彭德怀共同建议选择张村驿附近的直罗镇为战场。那里地形条件十分有利于打歼灭战，可以伏击由西向东开进的第五十七军一部，然后相机歼其余敌军。会议最后决定集中全军大部兵力，力求在直罗镇歼敌1至2个师，再视情况转移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打破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11月20日，西线敌军的先头部队第一九师，在红军的引诱下进入直罗镇。当晚，在张村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发布歼灭第一九师的命令，红十五军团由南向北攻击，红一军团由北向南攻击，将敌人全部歼灭于直罗镇。21日拂晓，红军发起全线进攻，战至中午12时，敌人大部被歼，师长牛元峰率残敌一个营退入镇东南的一个小土围子内据险顽抗，企图固守待援。当时指挥战斗的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回忆说：“这个小寨虽然被我军事先拆毁，但敌人昨天下午到达后又连夜改修，加上地形复杂，易守不易攻。我们派了一支小部队攻了一次，没能打上去。正组织第二次猛攻，通信员报告说：‘周副主席来了。’

这时太阳已升起老高。我们向山上看去，只见周副主席同其他同志从山上走下来。他们都拿着望远镜，边走边向敌人固守的小寨子观察。等走到我们近前时，周副主席和干部们一一握手，详细的询问了第一次攻击的情况。最后周副主席指示：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不好攻暂且围着算了。寨子里既没粮，又没水，他们总是要逃跑的，争取在运动中消灭它。”

周恩来的这一指示不仅减少了红军战士的伤亡，而且调动了敌人。牛元峰蹲在寨子里，一个电报接着一个电报请求董英斌解围救援，红军创造了围点打援的机会。当晚，敌西北“剿总”命令董英斌率第一一师和第一六师加紧向直罗镇、张村驿方向攻击前进，以解牛元峰之围。22日上午，敌人两师开始向红军发动攻击，但是一遭到红军的迎头痛击，就立即丢下牛元峰，向西溃逃，使红军歼灭援敌的计划未能实现。红军立即发起追击，又歼敌一个团，董英斌率余部躲入太白镇固守不出。23日深夜，牛元峰看救援无望，率残敌突围。红军立即投入追击，全歼该敌，并击毙师长牛元峰。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再次体现了周恩来善于利用地形条件，把握战机，调动敌人，以少胜多，善于打歼灭战的高超指挥艺术，以及集中兵力，诱敌深入和运动歼敌的作战原则。实践再次证明，他不仅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位主要缔造者、领导者，而且是杰出的军事指挥员，是毛泽东在军事上的主要助手。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基本上制止了东北军和西北军对陕甘苏区的进攻，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有了在西北地区发展革命大本营的基础之后应该如何建设，是一个亟待

解决的问题。直罗镇战役之前，周恩来在 11 月 3 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提议召开一次会议，详细研究今后一个时期内党的总方针，总任务。

12 月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集中讨论了政治问题和军事战略问题。

在讨论政治问题时，会议批评了“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错误观点，正确分析了国内国际的形势，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这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中国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在世界是战争与革命的前夜。”国内“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以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因此，党的基本任务与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

周恩来完全赞同会议的决定。随后，在 1936 年 1 月 2 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又专门作了《新的形势下党的组织任务》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党关于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的总方针，进一步强调指出：“整个政治形势中心问题是开展民族战争，党的组织任务是团结领导千千万万群众在党的周围，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他还提出党在目前的组织原则问题，一是无产阶级要在各种群众斗争中取得领导权；二是随着民族战争的开展，党的组织要迅速发展；三是由于党在苏区和白区所处环境和面临的任務不同，所以各地只能在统一政策下独立地进行斗争；四是党所领导的武装是中国革命最主要的力量，党的干部随红军行动，党要依靠武装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五是必须在政治上反对关门主义，要改变对于党员成分问题的机械理解，还要克服对知识分子的狭隘观点，欢迎他们参加革命，参加红军；六是要争取白军和地主武装。周恩来的这些论述，把党关于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的总方针进一步系统化和具体化了，成为各级党组织开展工作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在讨论军事战略问题时，首先由毛泽东作报告，指出党的战略方针是：“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总任务之下，首先须在一切政治的军事的号召上与实际行动上，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而在 1936 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毛泽东的论述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但是在讨论红一方面军行动方向的问题时，却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毛泽东认为，建设陕甘苏区必须在发展中求巩固。刚刚爆发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我们应抓住这一时机，苏区必须迅速向外发展，红军必须迅速得到扩大。当前红军行动的方向应该是东渡黄河向山西发展。有的人主张苏区应该在巩固中求发展，以巩固苏区为主，逐步向南发展，寻求同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作战；有的人担心红军主力东征会影响陕甘苏区的巩固；还有的人主张红军出宁夏或五原、包头，与日军争先机，并可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援；而有的人则认为红军转进到绥远，接近中蒙边境，会引起日苏战争。周恩来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他从分析红军反“围剿”的历史经验教训入手，强调指出，防御应站在主动

的地位，不是被动的地位，宁都会议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应当使全党了解，并作活的运用，集中主力于一个主要方向。毛泽东非常赞赏周恩来的分析，建议一定要把周恩来所主张的“主动”二字写进会议的决议中去。最后，会议一致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会后不久，周恩来再次致电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就红军东征的方针和军事行动提出建议，认为：依目前形势的发展，应将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为总方针。现在的军事行动应是巩固扩大根据地，而不是远离苏区，形成流动；须能扩大武装人员和解决经济困难，有利于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3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于中央瓦窑堡会议制定的“争取迅速对日作战的方针”问题，周恩来谈了看法。他认为，红军东征的具体任务，首先是“扩大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红军的发展方向基本向东。这不是一下子就同日本决战，而是要有阵地、有后方地作战。”会议前，毛泽东、周恩来于12月24日预先拟定了红军东征山西的《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开始进行东征的直接准备工作。后来，东征战役的实践证明周恩来的建议和预见是正确而及时的。

红军东征山西，要渡过黄河。离开苏区作战，在主力红军离开苏区之后，苏区的巩固就成了一个大问题，需要一位军政全才的领导人主持陕甘苏区的工作。由于毛泽东在党内分工主要负责军事，要随军出征。这样保卫苏区，支援主力红军东征的责任自然落在了周恩来的肩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西北中央局，坚持陕甘苏区的斗争，负责红军的后方工作。根据军委的计划，周恩来拟定了《第一步行动计划中的后方工作计划》，为东征和巩固苏区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

（一）充实和扩大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陕甘苏区开展声势浩大的“扩红”运动，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就有5000余名青壮年踊跃参加红军，并争取了2000余名俘虏兵参加红军。在此基础上，红一方面军进行了调整充实，实力增加到1.27万人。陕甘苏区的地方武装也扩建了2个军：第二十八军，由刘志丹任军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九军，由萧劲光任军长、朱理治任政治委员。此外，还整理扩建了6个独立营、10个基干游击队，在东征战役发起后不久，又组建了第三十军，由阎红彦任军长、蔡树藩任政治委员，大大增强了保卫苏区的力量。

（二）打击进犯之敌，巩固苏区。直罗镇战役胜利后，张学良为了阻止红一方面军向外发展，以第十七路军驻守宜川、韩城、白水地区；以第六十七军据守延安、甘泉、鄜县、洛川一带；第五十七军驻守合水、太白镇地区，阻止红军向南发展。以驻扎在陕北的第八十六师由榆林、横山、靖边、定边一带不断向南袭扰，力图夺占陕甘苏区的安塞、安定、瓦窑堡等地；以第八十四师据守米脂、绥德、清涧地区，以入陕的晋绥军5个旅据守吴堡，义合镇、神木、府谷地区，从东北面对陕甘苏区进行封锁、围困，1月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命令红一军团和红二十五军向洛川、白水、澄城、韩城、宜川地区进军，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扩大抗日宣传，筹集经费，“使苏区愈加向南发展，将来南面敌人向北进攻愈困难”。1月7日，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致电刘志丹、宋任穷，命令他们率领以红二十八军、第七十八师和骑兵团组成的北征军，向入侵苏区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发起进攻，直逼横山，调动援敌。并且指示红军“打援敌不论大小，必须以主力出动，实行两翼包围（自然要有主要突击方面），并切实断敌退路，以期一举消灭，勿使漏网。”

此外，红军还积极扫除根据地内一些地主武装据守的围寨，开展群众工作，使苏区得以巩固。

（三）筹集与制造渡河器材。周恩来作为军委后方工作的领导人，亲自制定计划，负责大力收集船只和各种造船材料，征调了造船工人和划船工人300名，加速建造渡河器材。到2月上旬，共制成大木船4只，羊皮筏100只，并选调了100名船工组成工兵连，准备随军行动。

（四）组织地方工作队。为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周恩来从红军及陕甘苏区抽调300名干部，组成地方工作队，另外还组织了一个220人的山西游击大队，准备随军东征，开展山西新苏区的地方工作。

周恩来组织领导的这些工作，有力地保障了红军主力东征战役的胜利。

1936年2月20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分两路从陕西绥德县的沟口、清涧县的河口强渡黄河成功，一举突破了阎锡山苦心经营的黄河防线，开始了东征战役。阎锡山极为惊慌，他一面调集山西的部队赶往突破口堵截红军，一面令在陕北“清剿”的晋绥军一部撤回黄河以东。周恩来立即指挥预先等待敌军撤退的红二十八军向敌军发起攻击，攻占义合镇。随后，周恩来沿黄河南行，巡视河防、渡口、船只、兵站，保障东征军主力的安全和黄河两岸交通的畅通。

红一方面军东征战役发起后，蒋介石急忙命令张学良调集东北军、西北军主力 and 胡宗南、毛炳文部向陕甘苏区进攻，企图乘红军主力东渡黄河之际，分期逐次完成酃县、黑水寺间封锁线，并相机占领陕甘苏区，夺取红军的根据地，然后与晋军协同围歼红军主力。当时张学良虽然和红军开始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谈判，但是在蒋介石的一再催逼下，逐步向苏区推进。

面对十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的进犯，周恩来在坚持继续与东北军接触的同时，深知谈判是要以实力为后盾的，如果不能从军事上阻止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进攻，谈判是不可能取得成果的。周恩来一方面继续指挥红二十八军向黄河西岸的晋绥军进攻，将其全部赶回黄河以东，寻歼敌第八十四师一部，夺取了吴堡、神木，并渡过黄河攻占了山西兴县的罗峪口，有力地支援了东征军的作战。另一方面，他针对南线敌人的部署，决定迅速充实留在苏区的地方武装，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在军事上，他制定了缜密的作战计划，决定“广泛发展关中、陕甘的游击战争，深入到底翼、侧后方积极活动，抵制和破坏敌人的筑堡垒、修路和前进的计划，并极力和缓杨虎臣部队的行动”；“以小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进行保卫苏区与围困敌人的任务”；集中关中、陕甘两省主力打击和消灭运动中的东北军一部，或国民党第三十七军向直罗镇、张村驿前进的一部，抑制蒋介石、张学良首先占领我关中苏区的企图。同时他还要求各军区部队既要依照作战方针行动，更要按照实际情况的变化，机动处置。各部队按照周恩来制定的作战方针和行动部署，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决抗击“进剿”的敌人，牵制其前进。特别是关中军区处于敌人后方，成了敌人的心腹之患。4月中旬，张学良调集东北军主力“围剿”关中苏区，企图首先占领这一地区。周恩来及时指示关中军区：“关中红军的战略方针应跳出敌人围攻圈外，以转向西北，配合华池、庆北、赤安、三边各地方部队创造陕甘宁的西北局面为主要发展方向，……在围攻圈内应以各游击队支持游击战争。”

由于周恩来正确制定了以敌后游击战拖住敌人，以苏区内的游击战困死敌人，及集中主力以歼灭敌人的战法，有效地制止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

进攻，为支援红军东征作战和巩固扩大陕甘苏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充分显示了周恩来驾驭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能力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标志着周恩来已开始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军事思想。

红军东征后所向披靡，使蒋介石大为震惊，他没想到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仍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他急忙派陈诚率其嫡系汤恩伯、胡宗南、关麟征等十余万大军驰援山西。为避免与国民党军决战，顾全抗日大局，红军决定撤回黄河西岸。为了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周恩来指挥留守陕甘宁苏区的部队保护渡口，准备船只，并到延川迎接红军主力回师。从5月2日至5日，红军东征军全部顺利地撤回陕甘宁苏区。

5月9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和红军干部会议决定，为了开辟新的根据地，红一方面军应发起西征战役。周恩来一面和毛泽东、彭德怀一起制定西征战役的计划，一面认真分析了形势，指出，在蒋介石的严令下，阎锡山部和国民党中央军有可能西渡黄河进占瓦窑堡，东北军也会由南向北步步逼近苏区。因此，在苏区的东部要坚持游击战，迟滞敌人的进攻，掩护野战军西征作战。中央完全同意周恩来的分析，决定由他留守东线，指挥东部各军及地方部队，抗击进攻的敌人，并负责中央及军委机关的安全。不久，中共中央军委又决定除红军大学及总政治部直属毛泽东领导外，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各直属独立部队、各省军事部、军委各部门后方机关统归周恩来指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红军利用游击战和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阻止了敌人对苏区的进攻，巩固了陕甘苏区，保障了野战军西征作战的胜利。

1936年6月，在日本帝国主义日益扩大对华侵略和全国人民普遍要求抗日的呼声中，国民党内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发动了“两广事变”，打出抗日旗号出兵湖南。蒋介石急忙从围追堵截红军的部队中抽出大批兵力调往湖南，对付“两广”的军队。中共中央接连给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领导人发出电报，要求他们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迅速北上，同红一方面军共同建造西北抗日根据地。7月初，红二、红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8月初，两军穿越大草地，进入甘南，并分别发起了岷县、洮州、西固战役和陇南战役，控制了甘南和兰州以南大片地区，红一方面军的接应部队也迅速南下逼进兰州到西安的公路。10月8日和10月22日，红一方面军分别和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控制了西兰公路两侧大片地区，形势非常有利，但张国焘仍不愿北上，企图西去青海、新疆，致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组织的以打击胡宗南第一军为目的的静（宁）会（宁）战役和海（原）打（拉池）战役未能实现，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被迫中止。此时红四方面军主力已西渡黄河，红军总部、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退往陕甘宁苏区。蒋介石却集中了5个军的兵力，在马鸿逵、马步芳的配合下，向红军紧追而来，企图乘红二、红四方面军经长途跋涉十分疲惫之际，给红军以歼灭性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和张闻天商量决定，派周恩来亲赴甘肃，做张国焘的工作，团结红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共同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11月18日，周恩来到达甘肃洪德的河边湾红军总部，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会面，并制定了三个方面军在山城堡地区共同作战的计划。11月21日，红军在山城堡地区联合作战，歼灭了胡宗南部第七十八师一个半旅，迫使胡宗南部全线撤出陕甘宁苏区，从而停止了国民党军对苏区的进攻。连张国焘也承认：“这次战争的胜利，周恩来的贡献最多。”与此同时，周恩来到红

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中，欢迎和慰问他们胜利完成长征到达陕甘宁苏区，向广大指战员宣传团结就是力量，只有三个方面军的团结一致，才能所向无敌，阐述党中央制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周恩来通过艰苦细致地工作，把三军指战员的思想统一到党的路线上来。山城堡战役后，周恩来、朱德、张国焘和三个方面军的领导及团以上干部联名致函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表示：“坚决实现军委的战略方针和每个战役的任务。三个方面军首先消灭拦阻我们抗日的蒋介石部队、开展西北抗日根据地、争取迅速增援绥远、直接对日作战，来领导全国人民并影响全国各地各党各派各军走向抗日统一战线，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党中央及军委的坚决领导之下，在三个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胜利会师一致团结一致努力之下，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12月7日，为了适应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新情况，从组织上保证红军的统一指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发布命令，决定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23人为委员，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7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从此陕甘宁苏区进入了一个更加巩固发展的新时期。

## 二、提出逼蒋抗日的战略方针

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民族革命战争的方针。但是，把蒋介石作为重要的统战对象，在中国共产党内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周恩来是最早认识这个问题的党的领导人之一，并且为此做出艰苦的努力，使党实现了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政策的转变，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

1935年的华北事变，不仅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战略方针的转变，同时也影响了蒋介石。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直接动摇了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中日矛盾急剧恶化，不仅使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不断高涨，国民党内的抗日舆论也日益强烈。在日本侵华初期，蒋介石动用了几乎全国所有的武装力量，历时多年，一度曾把中国工农红军逼到了濒临全军覆没的境地，但红军仍冲破重重包围胜利到达陕北，使蒋介石消灭红军的企图无法实现。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重新对形势进行思考，如果一旦中日开战，除英、美两国可能给予间接的支援外，惟一能够直接支援中国抗战的国家只有苏联，因为日本在远东的扩张也直接威胁到苏联的安全。因此，蒋介石决定在改善和加强同苏联关系的同时，调整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企图通过互相接触和谈判来解决共产党和红军的问题。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蒋介石一方面继续“围剿”红军，另一方面则开始从多方寻找同中共建立联系的渠道。

一是蒋介石亲自出面与苏联驻华使馆人员谈话，暗示要与中共和谈，希望苏方出面作双方的调解人。次年3月，他又派中国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在苏联设法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提出和谈的要求。中共代表团表示两党的中央都在国内，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并指定即将回国的潘汉年作为联系人。

二是责成其心腹陈立夫负责设法与中共取得联系，陈立夫交其亲信、铁道部政务次长曾养甫具体承办。1935年11月间，曾养甫要其部属谌小岑设

法“打通共产党的关系”。谌小岑在五四运动期间参加过觉悟社，认识周恩来和邓颖超，同一些进步文化人士也有交往。谌小岑从南北两个方向设法沟通与中共的联系。在北方，他通过翦伯赞找到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有联系的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约吕振羽到南京与曾养甫见面。吕立即向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汇报。市委研究后，决定要吕振羽“立即去南京，探明此事系何人发动和主持。”吕振羽于11月底到达南京，开始和曾养甫会谈。1936年以后，中共北方局又派周小舟到南京直接和曾养甫会谈。在南方，曾养甫通过在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的左恭，向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出希望和谈的信息。上海地下党派中共党员张子华以长江局代表的身分也到南京与曾养甫会晤，以摸清对方的意图。但张子华、吕振羽都不能代表中共中央进行谈判，蒋介石仍希望能直接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

三是蒋介石要宋子文通过宋庆龄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1936年1月，宋庆龄请曾是中共党员的牧师董键吾到陕北去，将一封重要的信件当面交给毛泽东和周恩来，上海地下党组织派张子华与董同行，向中央汇报与曾养甫会谈的情况，1936年2月27日，董、张二人到达瓦窑堡，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南京政府希望同中共进行和谈的要求和同曾养甫初步会谈的情况。3月，张子华还专门赴山西前线，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负责人汇报了和南京政府接触的情况。1936年3月，中共北方局负责人之一王世英经西安也到达了山西前线，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吕振羽与曾养甫会谈的情况。

当周恩来得知董、张二人到达瓦窑堡的消息后，立即洞察到蒋介石对日寇的“不抵抗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他认为无论是从蒋介石的个人利益，还是美、英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出发，蒋介石不是没有抗日的可能。蒋介石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政治、军事集团的头子，掌握着国民政府的大权，他对抗战的态度，对全国有很大的影响。虽然当前蒋介石决心抗战的态度还不明确，但是通过接触，可以宣传中国共产党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方针，去影响和促使其向好的方面转变，即使不成，也能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促使国民党内部抗日力量与亲日势力的分化，有利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他立即向中共中央建议：对蒋介石方面可答应派正式代表到南京谈判，谈判条件应依照拟定的抗日救国通电及宣言所定，而组织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为根本之点。同时建议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统战工作应分别进行。从这个建议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已经开始把蒋介石作为统战对象，而不是瓦窑堡会议决议中所提出的要打倒的“卖国贼头子”。此时周恩来已开始考虑能否“逼蒋抗日”的问题。

毛泽东、张闻天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于3月4日致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第二天，董健吾带着这个密件离开瓦窑堡，回上海交给了宋庆龄。这样，蒋介石与中共谈判的渠道正式沟通了。

周恩来在听取张子华、王世英的汇报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蒋介石的这些新动向进一步作了深刻分析，指出，由于日本侵略者总是前进，这就更尖锐地推动了民族战争的发展，对南京政府说来，“或降日，或抗日，其间的余地更狭了。”因此，促使蒋介石国民党抗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周恩来强调“正确应用统一战线，应该把上层和下层配合起来进行，并注意到国际的联合。”中央采纳了周恩来的意见，并决定由周恩来负责同蒋介石的谈判工作。这时周恩来已初步形成了“逼蒋抗日”的思想。

4月9日，周恩来在李克农的陪同下到延安同张学良会谈时，张学良认为蒋有抗日的可能，主张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促使蒋介石改变政策。周恩来当时就答复张学良，“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这充分说明周恩来当时已确立了“逼蒋抗日”的思想。但是当时在中央负责人中间，思想还不完全统一，因此周恩来还不便于向张学良公开表明态度。

当时张学良对蒋介石还很佩服，他还要依靠蒋介石提供军饱 and 装备，因而在会谈时他也公开向周恩来表示，目前他尚做不到反蒋，不能不接受蒋介石的命令，进驻苏区。张学良显然希望蒋介石能够抗日。而中国共产党人则不同，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蒋介石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蒋介石对人民群众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要联合蒋介石，这个思想上的转变需要一定的认识过程和时间。

周恩来回到瓦窑堡后，向留在后方的中央领导人汇报了与张学良会谈的情况。研究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对联合张学良有着直接的影响，而与张学良的关系，又直接影响着西北联合抗日局面的形成。他们把研究的情况向在山西的张闻天、毛泽东等人作了通报。4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的《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其中包括了国民党。5月5日，红军东征军全部回师陕甘苏区后，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布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表示：“为了促进蒋介石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在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

中共中央对待蒋介石政策的转变，“逼蒋抗日”的做法开始取得积极的效果。5月中旬，张子华第二次来到陕北，向周恩来汇报了国民党上层和各界人士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态度，并且报告了陈立夫提出的解决国共问题的四点办法：（一）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参加对日作战时，待遇同中央军；（三）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周恩来对国民党的这个态度表示欢迎，并做出积极的响应。他于5月15日写信给谌小岑，邀请曾养甫、谌小岑到陕北“商讨大计”。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提出所谓“广田三原则”，企图独霸中国；陈济棠、李宗仁发动的“两广事变”，也促使了蒋介石转变态度。7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发表演讲：“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接着，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在同日本驻华大使谈判中拒绝了日本的要求。表现出南京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投降政策开始发生变化。这一切与周恩来的建议和工作是分不开的。

8月初，潘汉年回到陕北，汇报了他上海、南京同国民党代表张冲会谈的情况，并报告了曾养甫希望在武汉和陕北之间建立电台联系的要求。周恩来认为，与蒋介石国民党正式谈判的时机已到来，改变“抗日必须反蒋”政策的时机也已成熟。

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周恩来在会上明确提出，应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同南京谈判时应提



出停止内战、实行抗日民主、发动抗日战争等实际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也指出，我们应该承认南京是民族运动中一种大的力量。我们的方针过去是愿意同南京谈判，现在仍继续这个方针。并在作会议结论时，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已不再适用的意见。9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党内发布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这样，中国共产党正式完成了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重大转变的全过程，这一转变为后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都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周恩来为此作出了主要的贡献。

8月27日，张子华第三次来到陕北，带来了与国民党电台联络的密码，并转交了曾养甫邀请周恩来到广州谈判的书信。31日，周恩来给曾养甫复信表示：“兹为促事速成，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第二天，周恩来又致函陈果夫、陈立夫：“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不久，中共中央派潘汉年为中共方面的代表，前往南京与国民党代表开始了正式谈判。

周恩来虽然积极主张“逼蒋抗日”，但对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的本质，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在和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等人致张学良的信函中指出，蒋介石一解决西南问题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北，建议“无论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此后不久，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指出，自国民党五大以来，特别是近半年中，他（指蒋介石）是有变化的。他在动摇着。察看 he 向着哪个方向动摇？是倾向抗日方面的。但要走到抗日，还要从斗争中使他实现，蒋要走到同我们合作，距离还很远，但我们不应放弃他，应逼蒋抗日。历史的进程证明了周恩来的预见。他在以后直接领导同国民党的谈判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政治警惕性。

### 三、促成西北联合抗日的局面

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俘虏了大批东北军的士兵和军官。根据红军的俘虏政策，对东北军的士兵和军官分别进行了教育，发现广大东北军士兵和基层军官深受失去家园和亲人的痛苦；有着强烈的抗日愿望，通过细致的工作是可以争取他们共同抗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的会议上制定了实现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后，决定加强对东北军的工作。为了做好东北军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立即加强了对被俘东北军的教育工作，宣传中国共产党愿意同一切赞同抗日的武装和团体联合，共同抗日。周恩来还亲自找他们谈话。红军的工作迅速取得了成效。许多被俘官兵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是真正主张抗日的。

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深受家乡沦亡之苦，有强烈抗日的民族意识。他接受红军宽大和教育后，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他提出回去劝说张学良和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同红军联合抗日时，周恩来批准了他的要

求。当时，张学良正为东北军到西北“围剿”红军才3个月就被消灭近3个师而心中烦恼，无计可施。当得到高福源回到洛川的消息后，第二天就亲自驾飞机赶到洛川。高福源见到张学良后说：“现在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我们东北军再继续打内战就快要被消灭完了”。当晚，张学良、王以哲和高福源谈了一整夜。最后张学良对高福源说：“你谈得很好，你休息一两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你今后可放心做这一工作。”

1936年1月中旬，高福源回到瓦窑堡，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与张学良会面的情况。党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去洛川与王以哲、张学良进行谈判。李克农到达洛川时，张学良正好去南京开会未能见到。2月10日，周恩来再次找李克农布置去洛川谈判的任务，要他们先谈局部合作抗日和通商的问题，先要多听张学良、王以哲的意见，然后再根据情况对不同意见加以耐心解释，对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中央请示报告，他还叮嘱道，这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大，不成功的可能性小。但有一定的危险，你们要有思想准备。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们无论如何不能谈崩，一定要谈好。2月25日李克农再次到达洛川，先与王以哲谈判，达成局部性的口头协定。协定的内容是，1.为一致抗日，红军与六十七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2.恢复六十七军在肤施（今延安）、甘泉、鄜县之间公路交通及通商；3.肤施、甘泉两城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出城向苏区购买。红军和地方政府可动员群众运粮、柴进城出售，恢复正常通商关系；4.恢复红白两地区通商，双方有保护对方采购人员安全之责；5.红军同意被困在甘泉城内的部队换防。此时张学良已从董健吾去陕北一事得知南京政府正与共产党建立联系。他认为：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3月4日，张学良到洛川会见了李克农，坦率地谈了对时局·的看法，同意李克农与王以哲谈妥的口头协定，并最后商定中共方面再派出全权代表，最好是毛泽东或周恩来能来延安同张学良面谈。根据张学良的要求，中共中央决定以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去延安与张学良谈判。

4月9日晚，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城中一座教堂内举行正式会谈。周恩来同张学良一见面，就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张学良说，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善说过。周恩来奇怪地问道，张伯善怎么是你的老师？张学良爽快地回答，我原来抽鸦片，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善的规劝，完全戒除了，因此拜张伯善为师。会谈便在这种亲切融洽的气氛中开始了。他们谈得很坦率。会谈一直进行到第二天凌晨4点才结束。有关会谈情况，第二天周恩来在给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的电报中写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完全同意，但他在公开抗日之先不能不受蒋令进驻苏区。”“他再不进兵无以回答蒋（蒋有电责他，并转阎电说他隔岸观火）。”“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他认为要抗日只有此出路，他愿酝酿此事。十大纲领，他研究后提出意见。”“对蒋问题，他认为蒋部下现有分化，蒋现在歧路上，他认为反蒋做不到。蒋如确降，他当离开他。”“经济通商，普通购物，由我们在他防地设店自购。无线电、药品，他可代办，并可送弹药。”“彼此互派一得力人伪装侦察，保持交通。另派有政治头脑及色彩不浓之人在他处做事活动（克农因太公开，不便在他处任事）。”对于这次会谈，周恩来很满意。他对陪同到延安去的李克农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

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

4月13日，周恩来回到瓦窑堡。在张学良处工作的地下党员刘鼎也随同回到瓦窑堡。在后方的中央负责人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

周恩来和张学良的会谈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谈，对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着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在做东北军工作的同时，中共中央与原西北军第十七路军的联络工作也在积极地进行。第十七路军的领导人杨虎城有一定的进步思想，北伐时期同共产党和一些共产党员有过友好关系，有抗日的要求。他的部队中有不少中共地下组织和党员。1935年12月，直罗镇战役结束不久，中共中央派遣曾长期负责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地下党工作的汪锋前往西安，代表红军同杨虎城谈判，争取他们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中共北方局也积极做杨虎城的工作。通过原任杨虎城秘书长的中共党员南汉宸的介绍，北方局负责人之一的王世英于12月底也到达西安与杨虎城会谈。通过双方共同努力，杨虎城消除了对红军的一些误会，初步达成合作协议。之后，汪锋和王世英一起回到瓦窑堡，向周恩来汇报了谈判的情况。4月5日，周恩来在中央常委会上介绍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的情况：杨虎城过去和我们有关系，不仅可能联合抗日，而且可能联合陕甘其他部队及孙殿英、宋哲元等部。杨虎城是可靠的同盟者，应真诚地同他谈判，加强对西北军的工作。会后，王世英再次到西安，将中共中央的意见转告杨虎城，并和西北军正式达成协议。协议规定：1.红军与十七路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以打假仗应付环境；2.双方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与中共中央联系；3.十七路军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来往；4.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

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红军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周、张延安谈判后，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统一接洽和指导红军与张、杨两部的关系，从此，周恩来统一主持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国共产党与他们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4月下旬。周恩来决定派刘鼎继续去张学良处工作。临行前。周恩来对刘鼎说，党中央决定你去担任驻东北军代表，这件事非常重要，做这样的统战工作是第一次，中央寄予希望，一定要把工作做好。要善意地帮助张学良，帮助他培养干部，招收青年学兵，他们有很好的条件，有了抗日的干部，东北军就可以成为一支抗日的部队。你带报务员去建立秘密电台，密码由你自己掌握，以后再派译电员去。和中央的联系要勤。秘密交通线建立了，你要经常检查，保证畅通。

刘鼎还随身带去了周恩来给张学良的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坐谈竟夜，快慰生平。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同时又提出忠告：“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这既向张学良表明了他赞同逼蒋抗日的主张，也提醒他要警惕蒋介石的阴谋，注意防患于未然。

周恩来根据不同的统战对象，采取不同工作方法，提出同蒋介石的谈判要与张学良的谈判分别进行；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上层与下层也应分别进行，采取不同的方法。

周恩来写了大量信函给国民党的许多军政要员，阐述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正气浩然，诚直规劝：“进

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为民族罪人。”在写给国民党要员陈果夫、陈立夫的信中，纵论时局，坦率敦促：“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实在此一举。”写给胡宗南的信中，则历述利害，诱发开导：“西北再失，则同陷浩劫”，“应一切以救亡为前提，共矢御侮真诚”。在写给陈诚、汤恩伯、胡宗南的信中，则义正词严，晓以大义：“今大敌当前，舍同仇御侮、共谋民族出路外，则只有相率为奴耳。”在给张伯苓的信中，情恳意切，肝胆照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居今日中国，应不分党派，不分信仰，联合各地政府、各种军队，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统一对外，并开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以促其成。先生负华北重望；如蒙赞同，请一言为天下先。”

对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下层官兵，周恩来认为其中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是可以争取的。党的政策不是瓦解东北军、西北军，而是巩固它，“使东北军的下层官兵在抗日救国的政治目标下团结起来”。周恩来指示在西北军中的地下党组织，不要以过“左”的面目出现，要在部队中成立抗日会、俱乐部等组织团结和教育抗日分子；对于表现较好的东北军、西北军部队，周恩来还要求苏区地方政府组织慰劳活动，当地红军也可以同他们一起联欢，做好他们的工作。在得知东北军缺盐吃的消息后，立即打电报给彭德怀，调5000斤盐送给东北军官兵，以解他们的困难。为了进一步教育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广大官兵，周恩来还建议组织军官参观团，到苏区参观，用苏区的新气象和红军的模范行动去影响和教育他们。

7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统一战线工作问题。周恩来报告了对东北军的工作。毛泽东对周恩来领导的东北军委员会的工作给予很高评价，称赞它“可为很好的模范”。毛泽东认为，由于对东北军工作的进展，党的整个工作部署应该相应地改变：原来的工作次序是，第一在西边建立根据地，第二在东边建立游击区，第三建立联合战线，现在应改为把联合战线的扩大放在第一位。周恩来还建议，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共产党组织应该把上层同下层严格分开。会议同意了 this 建议，并决定成立白军工作部，由周恩来负责，鉴于西北地区以东北军人数最多，白军工作仍以做东北军的工作为主。

但是，任何工作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张学良因为受到东北军内一些上层军官的反对，以及规劝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实行联合抗日毫无进展，思想产生了波动。7月初的一天，张学良突然情绪很紧张地对刘鼎说：“我翻来覆去地考虑了几天，现在主意打定了。前面是强大的日本鬼子，后面是比蛇还毒的蒋车，整我，迫我。我的队伍里年青有为的人不少，但老气横秋、顾虑重重的也很多，加上别有用心的，胆怯而危险的家伙，很难对付，要他们联共抗日非常困难！和他们纠缠有损无益，干脆撒手。迟分不如早分，与其将来被动，不如现在主动，早下手为强，可以保留最大的力量来抗日。”“劝蒋介石团结抗日的事，原来我想有可能，现在看，不容易。他自成一系，损人利己，太阴毒。我反复地想了一阵，难得好结果。不如明着跟你们干，旗帜鲜明，干两年，一定会有很大成就，然后再逼他抗日，更有力。”他还说：“我的日子难过。我连想了几天，想把队伍拉出去，能拉多少就拉多少，和红军一起干。请你向你们党中央和毛先生、周先生报告，我立即派飞机送你到肤施，回来时，我到哪里你追到哪里，告诉我结果。”刘鼎觉得事关重大，一面急电向党中央报告，一面立即返回苏区当面汇报情

况。中央政治局认为事情紧急，立即召开会议研究。

中央认为，张学良宣传抗日。训练抗日骨干，是大好事，很不容易。有一些高级军官思想不通，甚至反对，是可以想见的。张学良遇到这样的难题，并不奇怪。随着东北军内部的分化，张学良准备和红军一起干，这是个了不起的转变。但是，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不是瓦解、分裂，或者把它变成红军。而是帮助、团结、改造他们，使之成为抗日救国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盟友。因此，中共中央不赞成张学良拉出一部分队伍到红军中来，这不是增强而是削弱了抗日力量。要劝张学良不要性急，做扎扎实实的工作，团结更多的人，把全部东北军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对于蒋介石，要张学良不与他闹翻，要讲策略，不要太刺激他，从积蓄全国抗日力量的全局出发，对蒋介石要有更大的耐心，劝他抗日，准备更大的斗争。会议决定刘鼎尽快返回西安，把中共中央的意见转达给张学良，多做解释工作，并继续帮助张学良做培养和团结干部的工作。

刘鼎回到西安向张学良转达了中共中央对他抗日决心和热情的高度赞扬，并希望他能够团结全部东北军，耐心争取蒋介石和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张学良被共产党人的真诚所感动。他说：“从今以后，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劝说蒋委员长，把他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我和委员长交情很深，我要认真利用这个地位加快步伐向他进言，争取他幡然省悟。你们党中央既然要我这样办，纵使碰钉子，或者削职为民乃至坐牢杀头，也在所不惜！”

为了进一步帮助张学良、杨虎城，中共中央决定派叶剑英、彭雪枫、朱理治、汪锋、边章伍、张文彬等一批干部到西安，作为红军的代表，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和领导中共在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地下党组织。10月，毛泽东、周恩来等40余名红军将领致信国民党在西北的将领，表示红军“誓与你们合作到底”。

至此，周恩来提议建立的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红军三位一体合作关系正式确立起来，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基本形成了。

#### 四、指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军事斗争

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和人民救亡运动的感召下，逐步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他们多次要求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停止“剿共”内战，实行联共抗日，但是屡遭蒋介石的拒绝。10月下旬，蒋介石在解决了“两广事变”之后，亲自坐阵西北，逼迫张、杨继续“围剿”红军、张、杨一再苦谏无效，忍无可忍，于1936年12月12日被迫发动“兵谏”。扣压了蒋介石及其在西安的部分党、政、军要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当日，张学良、杨虎城等将领联名向南京政府及全国各机关、政党、团体发出通电，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随后张学良又宣布撤销西北“剿总”，停止一切“剿共”行动，成立抗日联合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内一片混乱。南京政府打着维护“国统”，讨

伐“叛逆”的旗号，任命亲日派头目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调动大批军队进逼西安，企图扩大内战，并乘机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更多的人力主和平解决事变。全国各救亡团体，广大人民热烈支持张、杨的爱国义举，强烈要求惩治蒋介石。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致电当时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在得知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后，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议认为事变的发生，是蒋介石实行“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也是国民党内主张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进步力量，同主张联日反共的反动势力尖锐斗争的表现。因此，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无论是行动本身和提出的纲领都有积极意义，是应该拥护的。同时决定从国家和全民族的利益出发，尽力促使事变和平解决。与此同时，中央依张、杨的邀请，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解决好这次事变。

在周恩来动身去西安之前，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及事变后西安的情况还不十分清楚，很多问题需要等周恩来到西安进一步弄清情况后才能作出决断。对蒋介石的处置及各种在苏区难以估计到的复杂问题，都要由周恩来到西安后临机处理。周恩来面对的将是异常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政治局势。但是周恩来不负众望，以其超众的才智，过人的胆略，帮助张、杨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终于实现了由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向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历史性转变。周恩来在西安的活动，面对的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敌我友三方矛盾交织在一起的政治斗争。这不是本书所要研究的问题。但是任何政治斗争的背后总有军事力量的活动作后盾。周恩来在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正确运用了军事力量，促成了政治斗争的胜利，实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目的。

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虽然蒋介石被扣，但不等于蒋介石集团的军事力量被打垮，内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如果处理不好，可能还会爆发更大规模的内战，必须防备南京政府采取军事进攻的手段。在战略上，周恩来提出，在军事上应该准备迎击南京方面对西安的夹击，在政治上下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

12月12日，中共中央接到张学良的电报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立即复电张学良，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第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固原、庆阳、邠县、甘泉一带只需留少数兵力。红军不会乘机进占友军一寸土地。同时命令红军各军团进入战斗准备，随时支援友军抵抗国民党中央军的进攻。为了支援东北军和西北军抗击南京政府“讨逆军”的进攻，还命令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红二十八军向大水坑附近地区出动，以监视和钳制胡宗南军的行动，并根据张、杨的建议，派陕北地方红军接替东北军和第十六路军收缩兵力后遗留的防务。15日，陕北地方红军进驻延长，18日进驻延安，维持地方治安，掩护友军侧翼，监视陕北地区蒋系部队的行动，陕甘宁军区独立师等部进驻三岔、毛居井、豫旺堡和曲子以南地区，同驻守固原、太阳等地的东北军靠拢，协调行动；并准备在南京政府“讨逆军”向西安进逼时，全部红军迅速南下，协同友军迎击“讨逆军”的进攻。

12月17日晚，周恩来到达西安。这已是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6天了。局势有了进一步发展。南京政府已对张学良下了“讨伐令”，其先头部队5个师已开进潼关，进逼渭南，并派飞机轰炸渭南、华县等地。蒋介石的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携带宋美龄致蒋、张的信件乘飞机到达西安。随后来子文、宋美龄也到达西安。在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对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看法也多种多样，有的主张杀蒋，有的主张把蒋送到苏区去，也有的主张只要蒋答应抗日，不但要释放蒋，还要拥护蒋当领袖。

周恩来当晚即会见了张学良，向他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南京，和平解决问题。同时还商定了与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的谈判条件。周恩来和张学良还共同研究了迎击国民党中央军进攻的军事部署。他们商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带，红军主力兼程南下，先到达庆阳、环县一线，击退胡，宗南部，然后出渭水下游，侧击从淹关西进的国民党中央军。红军加入由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

周恩来回到驻地后立即打电报向中共中央报告商谈的结果。根据计划，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同红二、红四方面军各2个军组成红军主要突击集团由环县、定边地区立即南下，以10天时间到达长武、邠县（今彬县），再用10天时间到达咸阳、兴平，而后进到蓝田、商县以南地区，担任对敌东集团军左翼的主要突击，配合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主力在渭南等地的正面作战；以红二十八军和骑兵第一团会同红三十二军组成追击军，在胡宗南部由大水坑等地南移时，由其侧翼平行追击，并协同陕甘宁独立师监视、钳制该部，配合固原、兰州等地的东北军第六十七、第五十一军积极钳制敌西集团军；红二十九、红三十军仍担负定边、盐池和吴起镇到保安一线的保卫任务；红八十一师调至延安，协同陕北地方红军，保障西北线安全。

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经过同宋子文、宋美龄谈判，达成了六条协议：1. 明令中央入关之部队于25日起调出淹关，从本日起，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蒋介石个人负责。2. 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3. 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4. 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之国家。5. 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6. 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责。蒋介石接受了谈判达成的协议，宋子文承诺保证实行。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监禁张学良，并纵容何应钦再次调集25个师，重新进逼西安。1937年1月5日，蒋介石又任命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调集37个师的兵力，分5路向西安推进。其中进入潼关，直逼西安的有12个师。内战乌云重新笼罩陕甘上空。

周恩来一方面在政治上表明严正的态度，声明：“只要中央军下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作战，若进入潼关之中央军必欲逼此间部队，为自卫而战，则红军义难坐视。”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和杨虎城等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协商，作出部署，准备击退国民党中央军的进攻。周恩来经报中共中央批准后，立即直接电令红一军团迅速进到西安附近的淳化、三原、耀县地区，准备打击由渭水以北向西安进攻的中央军；电令红十五军团经咸阳、蓝田于16日以前进到商县地区，同在陕南坚持斗争的红七十四师陈先瑞部会合，配合当地第十七路军一部，担负抗击由雒南方向进攻的中央军第八纵队李默庵部，保障渭南地区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主力侧翼安全；由红

八十一师和陕北部分地方武装组建的红二十七军进驻洛川，钳制位于蒲城、白水等地已经叛杨投蒋的第十七路军第四十二师冯钦哉部；追击军跟踪监视胡宗南部进至天水东北地区，配合东北军工以哲部作战。

为了保证作战胜利，周恩来指示在几天之内将大批红军所急需的弹药、给养、无线电器材等迅速由西安运往前线，使红军迅速得到补充，并亲往前线看望红军指战员，鼓舞士气。红军开入关中，在各方面引起了很大震动。由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做了相应的军事准备，加之全国各方面舆论的影响，迫使蒋介石也不敢轻易挑起内战。

西北方面，与蒋介石军事压力抗衡的力量是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的联合。但是由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在南京，三位一体中最大的一支力量东北军变得群龙元首，内部开始发生分裂。其中少壮派情绪激烈，坚决主张打一仗，营救张学良，甚至不惜采取激烈手段，暗杀主和派的高级将领和共产党员。杨虎城也因蒋介石背信弃义，感到安全没有保障，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和国民党中央军打一仗。形势万分严峻。

1月30日，周恩来和博古、叶剑英乘汽车赶到三原县云阳镇红军前敌司令部开会。会上，周恩来认为，我们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但是南京方面继续进攻，我方要自卫。当前我们的主张还未能说服西安左派和杨虎城等，况且蒋介石能否同意实行抗日统一战线还是个未知数。而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这两个朋友坚持要打，解释无效。并且发展到了答应开战是朋友，不答应就会导致敌对情势。这是一个颇难两全的困难局面，如果拒绝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要求，这两个朋友失掉，和蒋介石搞统一战线也就更加渺茫。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帮助他们打这一仗。参加会议的人都同意周恩来对情况的分析和判断，决定只要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两方面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支持他们的主张，和他们一起打，在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谈判和平。会后，立即把会议决定报告党中央。周恩来、叶剑英当天赶回西安，分别向杨虎城、少壮派转告红军的决走，并对他们说：“只要你们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绝不会对不起你们两位朋友。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当日，延安也紧急发来电报，重申：“甲、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乙、但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丙、向张杨两部表示，我们始终同他们一道，在他们不同意撤兵以前，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丁、用以上态度争取最后的和平。”电报充分肯定并采纳了周恩来的正确主张。

由于周恩来处理问题时既坚持原则，又采取灵活的策略，使得杨虎城、东北军少壮派认清周恩来是真正为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前途着想的，是为国家的利益着想的，是诚心维护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团结的，是他们真正的朋友，从而最终放弃了与国民党中央军开战的想法，保证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促成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作出了贡献。

周恩来在处理西安事变中，把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灵活运用军事力量保证政治斗争的胜利。在战略上，军事力量的运用始终围绕着实现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这一基本方针。当国民党中央军威逼西安时，不一味地让步，而摆出战斗姿态，迫使蒋介石顾忌发动内战的严重后果。充分体现了周恩来运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高超指挥艺术，和战略上的高瞻远瞩。当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主张与国民党中央军决战，以武力解救张学良



的声音日高时，周恩来则主张红军以战斗求团结，以团结求和平。从而体现了周恩来准确地把握何时应该示弱、何时应该示强、何时应该开战的时机，把用兵的基本方法与用兵的实际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了运用自如的境地，充分展现了周恩来军事谋略方面的卓越才华。

## 五、坚持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独立领导权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新时期。对国共合作抗日的前景，党内的有些同志比较乐观，但周恩来依据多年与国民党打交道的深刻体验，对此则保持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高瞻远瞩地指出，蒋介石尽管承诺了联共抗日的条件，但“蒋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共的”，“实际政策也在那里限共防共”。表面上，蒋介石也赞同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但不承认共产党与国民党有对等的地位，甚至不承认其合法存在，总想削弱并准备在将来消灭共产党。”在十年斗争之后，要学习合作是很难的”。这一切都决定了国共之间要实现合作，仍需付出巨大的努力。在此紧要的历史关头，周恩来作为共产党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为促进两党合作的正式建立，从1937年2月起，历时7个月，不辞劳苦，不畏艰险，东奔西走，往返于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之间，同国民党进行了5次谈判。谈判的对手初为顾祝同、张冲等，后来是蒋介石本人。其间困难重重，一波三折，最后在客观形势发展的推动下，终于扫除障碍，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了全民族抗日的新时期。

谈判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回顾说：“是要他们承认我们的军队，承认我们的边区，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组织各党派的联盟，就是统一战线。”在这里，周恩来把“承认我们的军队”放在谈判的首要位置，说明红军改编确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其核心内容是红军在改编后，必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必须在编制体制、军事指挥、干部配备、政治工作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坚持共产党对红军的独立领导权。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是武装斗争。掌握革命武装是中国共产党争取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条件。尤其是抗战初期，能不能坚持党对革命武装的领导权，能不能把红军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能否争取到领导权的关键所在。蒋介石深知军队的重要性，他从其阶级利益考虑，千方百计地想把共产党和红军控制起来，把“容共”变成“溶共”，进而予以吞并。周恩来是共产党内最早认识到革命武装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到抗战时，他的认识更加深化了。在谈判中，他从民族利益出发，围绕共产党对红军的独立领导权这一中心问题，同国民党方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红军在抗日战争中保持独立性，并不断巩固、发展和壮大力量，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2月西安谈判初见成果。

1937年2月8日，南京政府的军队进驻西安。第二天，南京政府的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到达西安。当天，周恩来即与顾祝同会面。顾祝同告知，蒋介石原定10日与周恩来的杭州谈判推迟了，要他先和周恩来谈判。这样，以顾祝同、张冲、贺衷寒为一方的国民党代表，和以周恩来、叶剑英为一方的共产党代表，开始了正式谈判。

这次谈判适逢国民党正在准备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为了推动国民党向抗

日的立场转变，中共中央于2月10日发出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四点保证是：“（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报，进行了深入思考与研究。国共两党十年血战，现在要坐到一起，谈判合作抗日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应采取什么样的谈判方针呢？经过深思熟虑后，他致电张闻天、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五项原则：

“甲、关于谈判方针，我意：

一、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

二、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惟国民党如能改组为民族革命联盟性质的党（蒋在西安有改组党的发轫），则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

三、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可改四个师，每师三个旅六个团，约一万五千人，其余编某路军的直属队。

四、红军改编后，共党组织饰为秘密，拒绝国民党组织，政训人员自行训练，可实施统一的政训纲领，但不能辱骂和反对共产党。

五、苏区改特别区后，俟共党在非苏区公开后，国民党亦得在特别区活动。

乙、以上各项关系重大，请考虑后示复，并报远方。”

第二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和周恩来的这份电报，都成了谈判的基本指导原则。

西安谈判一开始，双方就直接进入实质问题的谈判。周恩来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精神为依据，陈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意见。双方就中共适时公开、苏区改制、红军改编等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谈判进行较为顺利。

2月15日，国民党举行五届三中全会。西安谈判暂停下来。在三中全会上，国民党内就抗日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提出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等。这些话表面看是老调重弹，但正如周恩来后来解释的那样：“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那时候一方面和平了，一方面又埋伏了文章。”22日，蒋介石在大会上发言，承认在一定条件下，开放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集中人才等。会后，蒋介石密令所属，从此以后不得再使用“赤匪”“共匪”等字眼。这些都表明国民党的政策已开始向着抗日的方向转变。

2月26日和27日，周恩来同参加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回到西安的张冲继续会谈。谈判的焦点集中在红军改编上。周恩来提出红军改编后人数至少六

七万，共6个师，每师3个团。张冲则坚持红军最多只能编4个师共4万人。周恩来表示不能接受。张冲坦率承认，蒋介石、顾祝同并非轻视红军，而是怕红军迅速壮大。两天会谈没有结果。经过3月1日和2日的反复磋商，双方既有坚持也有让步，意见逐渐接近。3月8日，双方认为意见已大体一致，决定为一个月来的谈判做一个总结，由周恩来写成条文，以便电告蒋介石作最后决定，这便是《三八协议》，国共第一次谈判取得的成果。

到此为止，谈判还算顺利。没想到两天后，国民党方面又横生枝节，就红军的编制和领导权问题向中共代表团发难。3月11日，贺衷寒突然提出一个修改方案，对《三八协议》作了重大改动。如红军改编后只能有3个师，每个师只能有1万人，要服从南京军事委员会和蒋介石的“一切命令”。政训人员由南京政府派人担任，各级副职也要由南京政府逐渐派人充当等等。其实质就是要裁减红军，改变共产党对红军的独立领导。

周恩来感到问题严重，当即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着重指出：“这些争执基本上仍是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问题，不是与顾、贺可以解决得了的。”中央书记处在12日复电称：“贺、顾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关于此点，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立场，绝对不能迁就。”当晚，周恩来约见张冲，指出贺衷寒横生枝节，一切都有根本动摇之可能。要他以原来商定条文电告蒋介石，否则只有请张冲回南京面见蒋介石。同时也表示，我党只是不承认贺衷寒，对于两党团结救国和拥护蒋委员长的根本方针，并不因贺案而动摇。在西安已无法再谈了，只能到南京同蒋介石直接谈判解决。15日，张冲申明贺案作废，改以《三八协议》作为谈判基础。周恩来要求迅速面见蒋介石谈判。

西安谈判告一段落，虽有波折，但初见成果。如红军改编为3个师，在西安公开设立红军联络处，从3月份起国民党接济红军的军饷等。表明在经过10年的敌对状态后，国共两党开始了初步的接触。

第二次，3月杭州谈判较为顺利。

3月下旬，周恩来到杭州与蒋介石直接谈判。一见面，周恩来就严正声明，中共为国家民族利益计，与蒋介石及国民党合作，不能忍受“投降”“改编”的诬蔑。并提出了六项合理要求：（1）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2）红军改编后人数须达4万余人；（3）3个师之上必须设总部；（4）国民党不能派遣副职及政训人员；（5）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6）红军防地须增加。

蒋介石在这次谈判中，态度还算比较好。他一开始就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和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承认由于国共分家，导致10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国共双方都应检讨自己的错误。

开场白之后，蒋介石谈到了主题，即国共怎样合作？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有自己的想法，他说，不要讲与国民党合作，只是同他本人合作。“一个党在环境变动时常改变其政策，但一个政策必须行之十年计年方能有效。”我希望中共这次改变政策，要能和我永久合作，即使我死了也不发生分裂。我们要“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周恩来表示：“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一个最好办法。”蒋介石说：“你们赶快商量与我的关系及纲领问题。”周恩来一再问：“还有什么具体办法吗？”蒋介石回答：“没有，你们先商量。”

谈到红军改编和边区改制等重要问题，蒋介石反而说：“这是小节，容

易解决。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几个月后都要开，你们可以参加。行政区要整个的，须由中共方面推荐南京方面的人来担任正职，以应付各方面，副的以下由你们推选，自己干，我们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你们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我们决不破坏你们的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可以设法。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肯定，我也决不再打了。”

从表面看，蒋介石还是很坦率，很爽快的。周恩来则一眼看穿了蒋介石的真实企图所在，“总观蒋的谈话意图，中心在领袖问题。”“他认为这一问题如能解决，其他具体问题自可放松一些，否则必从各方面给我们困难，企图逼我就范。”尽管如此，这次谈判还是较为顺利的。

4月初，周恩来带着比较宽松的心情返回延安。党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杭州谈判的汇报。大家对这次谈判表示满意，决定由周恩来起草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并具体研究两党合作的形式。4月7日和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开会，认真研究民族统一战线纲领问题。周恩来强调指出，整个统一战线的原则，第一，要有共同的纲领；第二，要有联合的组织，才能行动；第三，在承认我们纲领的条件下，可以承认蒋为领袖。周恩来又强调，我党在谈判中，要坚持三个原则：第一是组织的独立性，无论如何不能混合；第二是国际性，不能断绝同国际的关系；第三是阶级性，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周恩来始终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独立性，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从而在纷繁复杂的谈判斗争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第三次，6月庐山谈判陷入僵局。

6月4日，周恩来到达庐山，8日至15日，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和杭州谈判相比，蒋介石的态度起了很大变化。他撇开周恩来带来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另外提出一个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这个同盟会由国共双方同等数量的人员组成，由蒋任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两党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同盟会如进行顺利，将来可扩大为两党合组之党。这个主张，实际上是要把共产党溶化在国民党之内。

对红军整编等重大问题，蒋介石也有许多改变。本来在杭州谈判他作了承诺，红军可设总司令部，这次却只答应“设政治训练处以指挥之”，由政府委派参谋长、政工人员辅佐。并无理提出：“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各边区的武装也要“实行编遣，其首领须离开”。对共产党公开的问题不再提起，反而规定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时“不以共产党名义出席”。周恩来对此是有充分准备的。他在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表示组织革命同盟会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共中央才能决定。红军改编后3个师之上设政治训练处不能同意；要朱毛出洋更是没有道理。双方就上述问题争执不下。周恩来曾与宋子文、宋美龄、张冲反复磋商。由于蒋介石坚持己见，周恩来也下让步，谈判进入了僵持状态。6月18日，周恩来回到延安。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了蒋介石的意见，为顾全抗日大局，决定再作让步。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先确定共同纲领，而后承认蒋介石根据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拟于7月中旬发表宣言，如果蒋介石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于8月1日自行宣布改编。力争朱德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官，编3个师，共4.5万人。周恩来于22日就红军指挥机关问题致电蒋介石，强调3个师以上如无指挥机关，无法进行改编，朱德不能离开军队。鉴于抗日形势日益严重，中共中央准备再作重大让

步，同意改编后，红军以政治机关名义指挥，以朱德为政治主任。这是最大限度的让步。由于蒋介石仍坚持原议，对中共所提要求都没有同意，遂使谈判陷入僵局。

第四次，7月庐山再谈仍无结果。

6月26日，南京方面电邀周恩来继续谈判。7月初，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草案。7月4日，他偕同博古、林伯渠到西安。7日到达上海。

当晚，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发生了。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为了使此次谈判尽快取得成果，7月13日（或14日），周恩来到达庐山后，随即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4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介石指挥下努力抗战，红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

当晚，蒋介石、汪精卫在庐山召开座谈会，却不准周恩来出席，旨在表示中共不合法。直到17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才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等举行会谈，谈判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军改编的指挥和人事问题。上次庐山谈判时，蒋介石表示3个师以上的政治机关可代行指挥权。周恩来问他，政治机关如何指挥军事？蒋介石说道，我要你们指挥，你们亦实能指挥，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次谈判他又改口了，要求红军改编后各师直属于行营，政治机关只能管联络，无权指挥。周恩来看出蒋介石是要彻底篡夺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借改编把红军拆散搞垮。18日，他将急需确定的问题写成12条，其中特别提出，中共为从大局出发，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机关可以平时设政治处指挥，朱德为主任，彭德怀为副主任。但战时不能不设军事指挥部，以资统帅。但蒋介石仍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指挥机关，3个师直属行营，3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处只能转达人事、指挥，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周恩来严正表示，我党绝不能接受蒋介石的意见。

由于谈判仍然没有进展和结果，张闻天、毛泽东7月20日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于是周恩来飞到上海观察形势。21日，他致电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建议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须立即自行改编3个方面军、6个单位的统一组织，每个方面军编足1.5万人，独立军、师部都编入，加强干部，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23日，蒋鼎文向周恩来转告蒋介石的话，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28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返回延安，与中共中央书记处商议决定，主力红军集中三原改编，3个师以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

第五次，8月南京谈判达成合作。

8月1日，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共商国防问题。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12日，谈判开始。周恩来、朱德和张冲、邵力子商谈《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内容。蒋介石不但压着宣言不予发表，而且通过康泽对宣言提出许多无理要求，仍坚持向红军派参谋长和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当即表示，有的可以研究，有的不能同意。

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战火烧到南京政府的心脏地带。蒋介石为了让红军上前线对日作战，只好同意红军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侧面作战，

协助友军骚扰和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18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下编3个师。国民党不派军官到八路军任职，只在总部和3个师各派联络参谋一人。僵持已久的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终于获得解决。当天，周恩来、叶剑英立即把这一消息电告毛泽东。并建议至少派一个旅为先遣部队先行东进。从8月下旬起，八路军3个师的主力陆续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这次南京谈判历时十余天，还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8月21日，周恩来、朱德离开南京，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谈判工作由叶剑英继续进行。

8月22日，洛川会议讨论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研究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任务和基本政策。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央军委，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8月25日，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布命令，宣布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同时宣布3个师主要领导干部的任职。这标志着主力红军改编的历史任务已圆满完成了。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经过半年多艰难曲折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国共合作，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谈判不是战场，但胜似战场。在5次谈判中，周恩来坚决贯彻了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审时度势，机智果敢，以坚定的原则性和高超的谈判艺术，围绕着红军改编和苏区改制这一关键问题，呕心沥血，艰辛谈判，正确处理了其间存在的许多重大而复杂的问题，为争取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独立领导权，为八路军、新四军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第七章 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军事斗争

1937年7月7日，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发生了。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的进攻，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迫于形势，同意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将陕甘宁苏区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开赴大江南北，对日寇作战。中国共产党终于实现了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的，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如何领导和实行这场民族革命战争的一系列新的问题，又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

### 一、率领八路军出师华北

八路军出征前夕，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点研究抗日战争中党和红军遇到的两个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一个是红军的作战方针问题，一个是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

会上，毛泽东首先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他指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保存与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为实现这一任务，红军的作战方针应该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作战原则应是：“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了就跑。”对于国共两党关系，毛泽东提出，一方面要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另一方面要有政治警觉性，保持党的阶级的独立性。

周恩来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着重分析了华北战场的局势，认为，在华北，目前还不具备粉碎日本进攻的条件，但是我们愈持久，群众的积极性可以更大起来，我们的部队也能壮大起来，敌人消耗愈多，愈增加困难，对我们愈有利。他认为红军应该采取在“我们的地区，是布置敌人后方游击战争，必要时集团力量消灭敌人”的方针。在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要推动国民党抗战，对国民党的限制要一步一步冲破，对国民党的缺点要随时指出，要向其他军队说明抗战不是单纯地依靠红军，而是大家一起抗战。他强调：“今天是要使国民党的战略不束缚我们自己的战略方针。这不仅是军事问题，将来还有政治问题、全国群众工作问题。”

会上，对坚持党对红军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坚持在山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红军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组织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洛川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准备回南京继续与国民党谈判。毛泽东仍留驻延安，主持党中央的工作，掌握战争全局，指挥八路军作战。

洛川会议虽然为八路军挺进华北抗日前线制定了基本的作战方针，但是仍面临着一系列具体问题。八路军的作战对象是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军，它在武器装备、战略战术以及军队的军事素质上都是内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所不能比拟的；八路军编成在国民革命军的序列中与友军一起作战，这就带来了诸如指挥关系、作战方向、作战方法、协同配合、兵力运用、后勤补给等一系列新问题。而这些问题难以由延安及时给予指示、解决。因此，需要一位既能够在战略上把握全局，又精通周密组织计划与指挥的人才在前线具体

指导八路军最初的作战行动。毛泽东提出要周恩来亲赴前线指挥作战。8月30日、31日，毛泽东两次急电正在前往南京路途中的周恩来：“周宜即赴太原、大同晤阎（即阎锡山——作者注），商好红军人晋后各事（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

9月3日晚，周恩来和彭德怀、聂荣臻、徐向前、萧克等从西安出发，从潼关渡黄河到达风陵渡，乘阎锡山派来的专列开往太原。他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领导华北的抗日战争，为中国军队实施太原会战、八路军的战略展开和坚持华北的持久抗战，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 （一）指导太原会战

太原会战是由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和太原战役组成的，是中国军队在华北战场最重要的一次会战，会战以山西的晋军和国民党中央军一部为主，八路军也参加了这次会战。

周恩来到达山西之时，整个华北战场的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日军攻占南口、张家口之后，驻守天镇的晋军不战自溃，放弃了平绥铁路东段。国民党第二战区（包括晋、绥、察三省）司令长官阎锡山认为，日军下一步将集中兵力进攻山西，首先夺取大同，然后进攻太原。他判定日军主力将沿平绥铁路向大同进攻，以一部兵力沿平汉路南下进攻石家庄，然后沿正大路向西攻击，威胁太原翼侧。依此判断，阎锡山制定了在大同与日军决战的部署。但是进攻山西的日军主力板垣师团并未沿平绥路西进，而循着当年板垣假借旅游亲自勘探的路线，出冀西先后攻占了蔚县、广灵、涞源、灵丘，进入晋东北，准备经平型关，抄袭雁门关，这样既切断了大同的后方补给线，又可避开晋军主力，直取太原。阎锡山由于判断失误，不得不下令放弃大同全线撤退，对抗战也失去了信心。

在此关键时刻，周恩来到雁门关西的太和岭口第二战区前线指挥部会见了阎锡山，耐心地向阎分析了抗战的形势，说明目前敌人虽强，我们虽弱，但日本国小人少，坚持打下去，必然是敌人一天天弱下去，我们一天天强起来，日本军国主义是一定能够打败的，鼓励阎锡山坚持抗战。阎锡山听后解除了许多顾虑，说：“周先生对抗战前途看得非常清楚。”他请周恩来帮助写一个第二战区的作战计划。由于周恩来始终对华北的战局非常关注，敌我情况了如指掌，因此仅用一天时间就写出来了。阎锡山看后吃惊地说：“写得这样好，这样快！如能这样打，中国必胜。”并感叹地说：“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

**平型关战役** 阎锡山由于不战而放弃大同，感到不好交待，想在雁门关、平型关一带组织一个防御战役，阻止日军向雁门关进攻。阎锡山是山西的土皇帝，惨淡经营数十年，南起娘子关，经龙泉关、平型关沿晋绥东部省界及北部外长城一线，修筑了绵直的永久性防御工事。阎锡山准备依托这些工事，抵御日军进攻。

周恩来在参观了雁门关一线防御工事后，对阎锡山说，不要单纯死守雁门关，而应主动出击，采取侧击和伏击的战法来破坏日军的进攻计划。并提出将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部署到平型关东北方向的五台、灵丘地区，待机设伏，以运动战配合晋军在平型关消灭日军。9月21日，周恩来和刚到山西的朱德与阎锡山一起研究确定了平型关战役的作战计划。决定利用平型关及其东北便于隐蔽和突击的有利地形，采取伏击的战术手段，歼灭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的敌人。具体部署是：第一一五师在灵丘至平型关公路一侧伏击，首先实



施中间突破，将进犯的敌军分割包围，八路军先集中力量歼灭敌后卫和辎重部队，然后向平型关方向发展进攻，配合防守平型关的友军歼灭敌前卫部队。原晋军将领陈长捷回忆道：“周恩来至雁门关岭口同阎锡山会商作战方略，决定用运动战来配合阎锡山所拟的平型关围歼日军的作战计划。”“他为我们讲授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的要旨，并一再指示我们：必须发动群众，才能取得抗战的伟大效果。”

9月24日晚，第一一五师在林彪、聂荣臻率领下，冒雨进入伏击阵地。第二无清晨7时许，日军第二十一旅团主力和大批辎重车辆进入伏击圈内。八路军立刻发起猛烈攻击，当即把日军截为两段。战至午后1时，将敌后卫部队和辎重部队全部消灭，而后八路军迅速向敌前卫部队展开攻击。由于国民党军未按计划出击，致使敌人突围逃跑。是役，八路军歼灭日军精锐1000余人，缴获步枪1000余枝、机枪20余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

平型关大捷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它表现出中国军民确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勇气和力量，使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从而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 and 士气，增强了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八路军的信任和拥护，为顺利地在敌后创建并发展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为国共两党军队的真诚合作奠定了基础。

**忻口战役** 平型关战役后，国民党军继续后撤。日军在河北沿平汉和津浦铁路南下，击溃了国民党第一战区在河北的部队，正向石家庄、德州进犯。在山西，日军突破了晋军的长城防线，继续南进，矛头直指太原。阎锡山调集了8万兵力，由刚刚入晋的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担任前敌总指挥，在太原以北90公里的忻口地区与日军决战。日军兵分三路，以中路为主力沿同蒲路南犯。阎锡山根据日军的进攻态势，将作战地区分为左、中、右三个部分，以主力在正面防御，并向代县、忻口方向突击；在同蒲路东的右翼由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晋军一部向代县、平型关间的敌军实施突击；在同蒲路西的左翼，由晋军一部和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钳制由宁武南进之敌，必要时将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也投入到左翼参加战斗。

周恩来考察了战区的地形条件和敌我态势之后，对阎锡山的作战计划提出了修改意见。他建议，在中部地区应以小部兵力依托长城钳制当面之敌，将敌军主力诱至代县、忻口一线，然后以主力实施侧击消灭敌人：右翼部队不仅要展开于平型关、繁峙……线，广泛实施游击战，还应向雁门关方向游击，牵制敌军，切断中路敌军与张家口的联系；左翼兵力较弱，提议把八路军一二师第三五九旅也调往左翼，投入战斗。该区部队应向宁武南北游击，切断敌南下部队与大同的联系。为了统一指挥参战部队，周恩来还和阎锡山商定，中路各部队由卫立煌指挥；右翼各部队由朱德、彭德怀统一指挥；左翼各部队由杨爱源统一指挥；预备队由傅作义指挥。周恩来和彭德怀还赶到忻口前线指挥部会见了卫立煌，不赞成把所有兵力都放在正面打阵地战，更不赞成把一二九师调到正面打阵地战，要求他把一二九师派到日军后方，寻找有利条件打击敌人。

周恩来的建议一方面在于力求改变国民党军消极防御的战法，力求多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使山西的抗战尽可能持久一些，以利整个华北抗战的发展，同时又能发扬八路军善长运动战、游击战的特点，便于八路军在敌后实施战略展开。

阎锡山虽然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但是他作战的基本思想仍然是只重视正面堵击，以求保护太原。这种打法，势必损失大，而胜算小。周恩来一再向他建议改变战法，阎锡山表示同意改变部署，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去做。与此同时，八路军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积极配合中地区的防御作战。右地区的第一—五师在晋东北、察南、冀西地区作战1个月，歼灭日军千余人，收复县城10座，并广泛袭击了敌后方兵站和据点，击毁日军汽车百余辆、马车数百辆，切断了张家口至代县的敌后方交通线。第一二师积极向大同、雁门关、宁武一线出击，广泛开展伏击战，打击敌军的运输补给部队，消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敌军汽车100余辆，缴获大批军用物资，一度收复宁武和雁门关。至此，日军由大同经朔县至宁武和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以及由张家口至代县间的交通全被八路军切断。进攻忻口之日军的后方补给濒临断绝，攻势顿挫。日军地面进攻受挫后，加紧对忻口国民党军阵地实施空中打击，使国民党军遭到惨重伤亡。这时在代县附近地区待机的第一二九师派出一部兵力袭击日军设在代县西南的阳明堡机场，歼敌100余人，毁伤敌机24架。这次战斗的胜利，削弱了日军的空中运输能力和空中打击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友军的作战。忻口战役结束后，卫立煌曾对周恩来说，“八路军把敌人几条后路都截断了，对我们忻口正面作战的军队帮了大忙。”“没有把一二九师调去打阵地战是做对了。阳明堡烧了敌人二十四架飞机，是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代表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对于八路军表示感谢，感谢！”八路军英勇抗战的精神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教育了国民党军队中的许多爱国官兵，增强了他们与八路军合作抗战的愿望。

**娘子关战役** 日军在山西的进攻受挫之后，加紧了沿平汉路和正太路向晋东的进攻。周恩来在修改阎锡山忻口战役计划的时候就指出，日军占领石家庄后将以夺取太原为主要目标，忻口和太原难以久守。为了使华北的抗战能够尽可能地持久一些，并保证忻口和太原的侧翼安全，应迅速加强娘子关一线的防御部署。周恩来建议阎锡山立刻组织正太铁路员工和井隆、阳泉两煤矿的工人破坏铁路和煤矿，以迟滞日军的行动。鉴于国民党军队在娘子关一线的防御力量薄弱，周恩来提议把八路军一二九师调往娘子关方向，支援国民党军作战，他还亲自到娘子关，会见负责指挥娘子关一线国民党军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对东线的作战提出许多建议。10月中旬石家庄失守后，第一二九师迅速向进攻娘子关之敌的侧后挺进，打击日军后方运输线。在七亘村，第一二九师接连两次设伏打击向平定进犯的日军，共歼灭日军400余人，缴获骡马400余匹以及大批军用物资。

由于国民党军队没有认真采纳周恩来的建议，预置重兵在娘子关设防，娘子关很快被日军攻破。周恩来立即令八路军总部率第一一五师主力南下晋东南地区，配合一二九师积极打击沿正太铁路西进之敌，配合友军作战，掩护阎锡山、傅作义部署太原防务和忻口友军的南撤。第一二九师在黄崖底伏击向昔阳进犯的日军，以伤亡30人的代价，歼敌300余人，毙骡马300余匹。第一一五师在广阳设伏，歼敌近千人，缴获马匹700余，步枪300余枝及大批军用物资。

**太原战役** 周恩来在帮助阎锡山制定忻口战役计划时，就对阎锡山说，应该及早布置太原的守备工作。10月12日，周恩来再次向阎锡山建议，必须转变作战方法，力争在忻口等地区求得小胜利。保卫太原的战斗必须背靠

山地，在野战中求胜利，不应以众多的兵力守城或正面堵击。我军必须变单纯防御为攻势防御，只有积极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才能有效地阻止日军前进。11月2日，国民党军放弃忻口，向南撤退。当日，阎锡山在太原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守卫太原问题。周恩来出席了会议，并指出，胜败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只要我们坚持继续抗战，实行全民总动员，进行民主改革，最后定能改变不利形势，在战场上取得主动。会议决定由傅作义负责指挥守城、会后阎锡山等纷纷撤离太原。周恩来仍从容地坚持在太原危城之中，部署八路军向晋西北、晋东北和晋东南地区的各重要交通线和日军后方活动，抗击敌人的推进，一方面牵制日军对太原的进攻，一方面派部队收集溃兵、散枪及一切资材，以发展游击战争。在撤离太原之前，周恩来再次找傅作义谈话，强调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在战略上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要注意保存有生力量。并且郑重地说：“我愿代表中国共产党，还有全民族，诚恳地对你说一句话：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之深厚的伟大力量，请你保重。”傅作义回去后，把这句话向他的左右讲了一遍，并说：“把周代表所讲的话记录下来。”傅作义在完成掩护撤退任务后，放弃太原，转向绥远继续抗战。

太原失守后，山西正面战场的大规模作战基本结束，以八路军为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全面展开。

太原会战，在周恩来直接参与指挥下，前后坚持了近两个月，虽然最后以放弃太原而告结束，但是大量杀伤了敌人，消耗敌军达2万余人，迟滞了日军夺取山西的行动，争取了时间，破坏了日军在河北平原作战的计划，使平汉线的中国军队得以南撤。太原会战，成为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战场上惟一对日寇进行了有效抵抗的会战，也是国共合作取得较好成果的一次战役。周恩来对合作抗日的真诚态度，解除了国民党中许多高级将领对统一战线的疑虑，使他们成为坚决维护统一战线旗帜的骨干分子，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

## （二）指挥八路军实施战略展开

周恩来到山西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指挥八路军实施战略展开。八路军出动之前，中共中央根据华北战场的形势，决定八路军在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9月17日，根据华北战场局势的变化，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提出，在日军大举进攻山西的情况下，八路军如仍按原计划全部进入晋东北地区，必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完全陷于被动地位。为了在战略上立于主动地位，八路军应将3个师分别部署在晋东北、晋西北、和晋南太岳山脉。

八路军主力挺进华北前线是主动行动，由于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承认八路军的抗日行动，因此，南京政府对于八路军的出动并没有给予积极的支持和帮助，处处加以限制，阎锡山对于八路军开进山西更是心存戒心，他曾表示：“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只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即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

周恩来和阎锡山第一次会谈时就提出，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八路军的任务是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要求将八路军部署在太行山脉及太行山北端地区，划定周围晋察冀绥四省的13个县为八路军的作战区域。阎锡山口头上虽然表示同意，但迟迟不让八路军开动，他企图将八路军留在正面战场打阵地战，抵抗日军的进攻，以达到他消耗八路军的目。9

月 13 日，周恩来派南汉宸到岭口见阎锡山，再次要求迅速输送八路军到涞源、灵丘一带，以巩固恒山山脉，用侧击和袭击方式作战，掩护国民党军队防守雁门关。阎锡山仍以口头同意加以敷衍。9 月 21 日，周恩来同朱德再次到岭口会见阎锡山，商谈八路军的游击区域、军队驻扎和兵力使用等问题。这时阎锡山正准备发起平型关战役，周恩来及时抓住阎锡山作战计划不完备和抗战信心不足的弱点，提出修改作战计划，积极建议将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派往平型关东北地区，侧击日军，支援晋军正面防守平型关。由于晋军战斗力和战斗意志极差，根本不敢到日军侧后作战，阎锡山只得同意第一一五师向日军侧后出击。9 月 23 日，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一一五师向平型关前进的日军发起侧击。第一一五师顺利地晋东北地区实施了战略展开。

9 月 24 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汇报了八路军即将开赴地区的地理情况。他说，晋西北山势较薄，转向吕梁山脉更好；恒山山脉绵延在桑乾河右岸，颇利于敌后游击；五台山脉山势高峻，蔓延极广，南北东西部不易突入，机械化兵团更难；太行山脉沿正太路两侧山势极险，也极利于游击，并且同太岳山脉连接，最便于转移。根据当时的战况，周恩来建议，派王震第三五九旅进入河北阜平地区；贺龙率第一二 师师部及第三五八旅开往晋西北；第一二九师速开正太线南北地区武装民众，组织游击战争，扩大队伍，以后逐步向西南山地转移。中央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

为了实现第一二 师在晋西北实施战略展开的计划，周恩来随后向阎锡山提出，第一二 师应集结在神池、宁武一带，增援雁门关守军。时值平型关失守，日军进攻矛头直指雁门关，阎锡山只好同意了周恩来的要求。9 月下旬，贺龙、关向应、萧克率领第三五八旅到达神池地区。忻口战役即将发起之时，周恩来再次向阎锡山提出，其战役计划的左路力量薄弱，应将第三五九旅也调到左路，归还第一二 师建制，以加强左路军的力量。左路军是以阎锡山的晋军为主，阎锡山最害怕其受到损失，立即同意了将第三五九旅调往晋西北地区。10 月下旬，由于华北战局的不断恶化，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必须发展绥远游击战争的战略建议。他指出，敌人已进入包头，转瞬将达五原，西北门户洞开。欲保陕甘宁边区及争取蒙、回族，连系新疆、内蒙，必须发展绥远游击战争，这决非单纯防御黄河西岸及长城以南所能成功。不能因沙漠地带气候寒冷就不发展游击战争，且河套地区出产丰富，游击队亦下难发展。中共中央采纳了周恩来建议，以陕甘宁边区警备第六旅挺进淡水河、和林格尔、托克托地区，归第一二 师指挥。之后，周恩来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指出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已失，归绥省政府人员已跑，该地区无统一指挥，成混乱状态。绥远与陕北仅一河之隔，蒙骑随时能突入伊盟，进扰陕北。建议组织千人以上的武装并配备部分骑兵，加强绥远敌后游击战争。中央随即派出骑兵团和蒙汉支队前往三边以北开展工作。不久，第一二 师也组织了大青山支队挺进绥远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这样第一二 师也全部顺利地进入预定战略位置。

第一二九师是八路军最后进入山西前线的一个师，时值忻口战役正打得激烈。国民党军中路部队不敢按照周恩来的建议，以主力从侧翼攻击日军，采取死守阵地的消极防御战法，结果伤亡惨重。阎锡山坚持要求第一二九师参加忻口正面防御作战。为了支援友军的作战，周恩来同意第一二九师一部投入中路作战，但强调必须把第一二九师派往敌人的侧翼和后方作战，以发扬八路军的特长。10 月 10 日石家庄失守，娘子关吃紧。娘子关方向的守军

只有刚从四川、陕西等地抽调的 8 个师，战斗力很弱。娘子关是太原东边的门户，也直接关系到在忻口作战的 20 余万国民党军队的安危。周恩来再次抓住时机，向阎锡山提出，将第一二九师调往正太路南北地区，侧击西进的日军，支援国民党军的娘子关防御作战。由于娘子关事关太原的安危，阎锡山再次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这样，第一二九师也顺利地进入了预定的战略地域。

吕梁山脉纵贯山西西部，其中、南段与陕甘宁边区隔黄河相望，是边区的战略屏障。周恩来到山西不久，就在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吕梁山区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是开展游击战争的极好地区。阎锡山放弃太原后，国民党军队全线败退。周恩来判断阎锡山很可能将部队撤到黄河以南，退出山西。周恩来一方面做卫立煌和黄绍位的工作，指出在华北坚持抗战的可能性与有利有条件，坚定他们在晋南坚持抗战的信心。另一方面令第一一五师主力沿太行山脉迅速南下，侧击沿同蒲路南下的日军，掩护国民党军撤退，并从太原以南地区转向西进，阻止日军前出到黄河一线，在吕梁山区站住脚跟。1937 年底，第一一五师进入晋西南地区，完成了战略展开的任务。

至此，八路军分别挺进到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和晋西南敌后战场，完全实现了预定的战略目标。这与周恩来在山西前线运筹帷幄是分不开的。在太原会战的四个战役中，周恩来始终坚持把八路军派往最危险、最艰苦的敌人侧翼和后方作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八路军全体将士坚定的抗战决心和英勇牺牲精神，有力地支援了友军作战，维护了抗日统一战线中各派力量的团结，同时又挫败了削弱八路军力量的企图，巧妙地实现了八路军在敌后的战略展开，充分体现了周恩来高超的谋略艺术和用兵之道。

### （三）指导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在新的对手和新的环境下，八路军必然会遇到许多新的问题和困难。周恩来到山西前线的又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帮助中共华北局和八路军解决这些问题和困难。周恩来认为，在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是完全可能的。他说：“敌人的兵力没有可能统治全华北，不仅是乡村占不了，城市也占据不了太多。即使是铁路公路要道，也不能普遍占据。因之，敌人不能不用汉奸部队来统治许多城镇，用他的重兵火力巩固他的交通要道，用他的主力来和我们的部队作战。正好，我们便以游击部队消灭汉奸，武装民众，以一部轻装部队袭击、截断敌人大道交通，劫夺敌人辎重弹药，并以主力部队在山地寻求敌人一部而消灭之。”他一路上十分注意考察各地的兵要地志，不久就对山西全境的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及时向中央报告了山西和绥远、河北部分地区适宜开展游击战争的区域，并积极组织那些地区的游击战争。

八路军进入山西后，隶属于国民党第二战区战斗序列，在指挥关系、作战区域、后勤保障等许多方面都受到二战区行营的节制。而国民党的军事思想仍是陈旧的消极防御思想。这与八路军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产生了矛盾，既要使八路军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又要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这是周恩来所要解决的第一大难题。

周恩来在山西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在第一次同阎锡山会谈时，就明确阐述了八路军所要执行的战略方针，并和阎锡山商定，八路军入山西后以太行山脉及太行山北端为根据地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在以后与阎锡山的多次会谈中，又反复强调八路军必须坚持自己的战略方针，并决定

八路军在山西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周恩来采取了逐步过渡的办法。先在战略战役以至部分战斗中，与国民党军队密切协同。例如在平型关战役中，八路军主力与友军就是在一个作战计划中，共同完成同一战斗任务（虽然国民党军队没有按规定执行），以部分部队深入到敌后远纵深，独立实施游击战，掩护主要战斗。八路军的辉煌战果，使国民党当局逐步减少了对八路军独立开展游击战的限制。忻口战役中，八路军各部队基本上就是在敌后独立地组织各种战斗，主动地配合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八路军神奇的游击战术为国民党许多高级将领所折服，从而认识到八路军游击战战略方针的巨大威力。太原失守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主动挺进晋西南，在战略上实现了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目的。正如周恩来所说的那样，华北随着由正规战转到游击战，八路军将取得领导地位。

周恩来以其高超的领导艺术，既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又完美地解决了“协同”与“独立”这对矛盾，为顺利实施“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作出了重要贡献。

军队是敌后游击战争的主体。只有军队在敌后实施游击战争，才能以其实际行动，激发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热情，坚定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八路军必须担负起这一重任。虽然中共中央提出了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八路军实行由运动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但是这支军队从1930年年底起，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已达七年之久，这期间创造出整团、整旅、整师地歼灭敌人的光辉战绩，广大指战员熟悉运动战的各种战法，很多人都希望能运用运动战，大量地消灭敌人，尽早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去。针对这种想法，周恩来向八路军指泽员说明，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兵力及战术特长，现已同阎商定，开赴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运用山地战、游击战侧击西进与南下之日军，配合友军正面作战，八路军在决战问题上不是主力，但在敌后游击战中将起决定作用。因此，八路军作战的战略战术要改变，其组织必须适合山地运动战和游击战，才能扎根敌后，在艰苦的环境中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抗战。

为了更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周恩来还注意动员和帮助国民党军队开展游击战争。他亲自给国民党军将领讲授运动战和游击战的要旨，并一再强调必须发动群众才能取得抗战的伟大效果。他还派边章五、李锡九等前往河北驻军赵寿山、孙殿英等处，督促这些部队背靠太行山做游击战争的准备。此外，他千方百计地抽出时间撰写文章，参加各种群众集会，发表演讲，号召各抗日救亡团体和群众组织要学会打游击战，到敌后去发挥作用。他还征得阎锡山同意发枪4000枝用来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太原失守后，周恩来又及时指示八路军要抓住时机，放手收容溃兵、散枪及资材，用于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开展游击战争必须以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依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抗日武装深入敌后，远离战略后方，后勤保障、兵员的补充和扩大、部队的休整和训练，都难以解决。只有建立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就地解决为主，后方支援为辅的办法，才能坚持持久抗战。周恩来一到山西就十分注意研究在新形势下如何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问题。他根据新的情况，提出在敌后成立“战地动员委员会”，由各省府代表、各地军队代表以及各有关民众团体代表组成。他亲自领导起草了动委

会的工作纲领，规定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牺盟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参加，共同组成，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这个工作纲领通过多次谈判交涉，阎锡山被迫同意。9月20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会在太原成立。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中共代表程子华任人民武装部部长，南汉宸任组织部部长、武新宇任动员分配部副部长等职。动委会成立后，在晋东北、晋西北、雁北和察哈尔、绥远等地，配合八路军动员群众，组织人民自卫军，开展游击战争，支援前线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薄一波同志后来回忆说：“阎锡山看到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这一条，不大高兴，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如果让了，山西夫陷的地方，今后就没有了。关于‘战地动员委员会’的领导问题，周恩来同志估计到阎锡山可能不同意，因此，找我们事先作了研究，如果阎锡山不同意的话，让我去说服他。我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对阎锡山说：‘现在把沦陷区交给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是最大的人情，同时还可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果不让，共产党、八路军一定要坚持，也无可奈何，因为那些地方是共产党、八路军从日本人手中夺回来的，怎能不让？如果不让，连个人情也落不到。’阎锡山想了想，也只好如此。”

之后，周恩来进一步提出，把动委会发展成实际的政权组织，作为统一战线的“初步政权”。八路军在第二战区驻地是主要的政权力量。因此，以八路军代表参加和领导战区动委会最适宜，这样可使新政权组织逐渐代替旧行政机关。他具体指导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对各地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周恩来及时指出，一方面要注意纠正组织上和工作方法上关门主义等“左”倾表现，另一方面还要克服右的倾向。他总结各地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发出一系列指示。例如：在敌占区，“共产党与八路军以自己的名义，公开直接去领导群众”；在我军后方，“共产党与八路军应努力争取公开地位与公开直接动员群众的权利。各地党部在可能时应有公开代表在群众中活动，完全代表党的态度，传布党的主张”，“一切共产党员在群众运动中，要完全依照党的主张去领导群众运动”；八路军在游击区活动时，“要以共产党代表的面目在群众中出现，不要使群众只看见八路军看不见党。”“八路军在各地要努力直接去扩大我军，地方党要动员群众去加入八路军”，“在游击区域中应注意去筹措经费”等等。这些重要指示是各级党的组织和八路军处理同阎锡山的关系和党的工作的原则，这些原则创造性地发展了根据地建设的理论，对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没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游击战争就不可能走出战术的范畴，上升到战略地位。周恩来关于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实践与理论，为游击战争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四）军事实践与理论探索的主要成果

周恩来在山西期间，是他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直接领导军事斗争的主要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的80天，但是在军事实践和理论探索上的贡献，对于华北抗战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 提出华北必须并且能够持久抗战的思想。周恩来到华北后具体研究了敌我两个方面的政治、军事状况，考察了日军的战略战术和作战能力，运用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深刻分析了中日双方力量消长的规律，明确指出，华北抗敌必须持久，因为它将“影响和推动着全国抗战的开展，掩护全国新的军队的组织；全国抗战的开展，也正支持着它，同时也使着日本无法结束它的战争，而要影响着全世界援助中国抗战的运动。”坚持华北持久抗战不仅

必须，而且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华北抗战是“以游击战争为主体”，游击战争“要在持久战中，壮大自己，武装人民，恢复许多城镇，破坏敌人交通，消灭部分敌人，最后得到全国生力军的参加，可以转到胜利的反攻，收复失地，驱逐日寇帝国主义出中国！”八路军“有着长期运动战及游击战的素养。他将要发挥在这方面的特长，来影响友军，来组织和领导广大民众齐来抗战。”

周恩来还进一步指出，华北战场是全国抗战的中心。尽管日寇在上海发动进攻，但是日寇的整个战略中心仍然在华北，进攻上海意在压蒋介石就范，企图达到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问题，保住华北既得利益，以利“以战养战”的目的，蒋介石没有接受周恩来的观点，为了维护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利益，将其精锐部队几乎全部投入“淞沪会战”，造成了南北两个战场同时失利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和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却始终坚持华北抗战，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对整个抗战作出了卓越贡献。

2. 积小胜为大胜的作战指导思想。进攻华北的是日军精锐部队，其不仅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而且有大量的坦克和骑兵部队，机动能力很强。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超过日军，但武器装备，尤其重型装备，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差，部队的训练和战斗能力都远不及日军。周恩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未发生根本转变之前，企图通过几次大的战役将日军打败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军队不仅要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不断消耗敌人，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也必须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那种大规模的阵地攻防战，同敌人拼人力、拼物力，而应该力求积小胜为大胜。当周恩来得知阎锡山企图利用雁门关至娘子关一线的国防工事，拒日寇于山西境外时，恳切地时间阎说，必须转变作战方法，力争在忻口地区求得小胜利。周恩来的这个思想不仅对整个抗日战争的作战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纠正当时流行的“速胜论”的错误观点，起了积极作用。

3. 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实施防御的作战原则。防御作战本来是可以有多种目的的，但是抗战初期，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中国军队处于战略防御阶段，防御的目的主要是迟滞敌人的进攻，争取时间，积蓄人力和物力，以求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状况。周恩来针对国民党军队屡战屡败的情况，强调指出，我军必须变单纯防御为攻势防御，积极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才能有效地阻止日军前进。在太原会战期间，周恩来反复向阎锡山建议，不应以众多的兵力守城或正面堵击，必须依托山地，将主力部队运动到敌人的翼侧，以伏击或侧击手段，力求在野战中消灭运动之敌；担任正面防御的部队也要适时而积极地组织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要注意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在战略上不应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力争取得战场上的主动权。

4. 因势利导，实施战略展开，适时抢占战略要点。八路军挺进华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是实行外线作战，完全不同于红军反“围剿”战争时期采用“诱敌深入”的方针，实行内线作战。周恩来深知“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的道理。决不能采取先等敌人占领山西之后，再考虑如何在敌后作战的问题。周恩来到山西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八路军如何适时实施战略展开的问题。他认真研究了毛泽东一系列关于八路军实施山地游击战的指示，吸取了红军反“围剿”时期外线作战的经验教训，抢在外线尚未形成之前，以其高超谋略艺术，将部队调往战区，夺取战略要点，以先机之利，



争得战场的主动权。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无论战争环境如何残酷、艰难，这一批最早的战略区始终是华北敌后战场坚不可摧的重要支柱。

周恩来在山西期间，以缜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深入研究了华北战场许多重要的作战实践和军事理论问题，创造性地发展并且丰富了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形成的军事理论。

## 二、协助国民政府指导正面战场作战

周恩来回延安不久，参加了1937年12月9日至1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2月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工作；还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外交代表团，任务是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12月23日，中共代表团与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中共代表团与长江局合为一个组织，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称长江局。成员由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组成。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周恩来主要负责统一战线和军事工作。在长江局近一年的时间里，由于王明是个空头理论家，既下会搞统战，更不懂军事，因而在协助国民政府指导正面战场作战的实际工作中，周恩来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

### （一）巩固国共政治组织上的合作，促蒋长期抗战

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形成，但尚没有共同的政治纲领和合作的组织形式，这样的合作基础是不利于长期抗战的。为此，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继续进行谈判。

协商制定共同纲领，从政治上巩固合作。12月20日，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等开始接触，陈表示要规定共同纲领，并努力实现。21日晚，王明、周恩来、博古会见蒋介石，在会谈中对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决定共同纲领等问题作了具体提议。蒋介石同意中共代表团所提意见，决定组织两党委员会。26日，两党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决定中共方面由周恩来，国民党方面由刘健群参加起草两党共同纲领。周恩来很快写出《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纲领》草案。长江局讨论后，拟交两党委员会讨论。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召开了全国临时代表大会，通过了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中共中央认为，该纲领的基本精神同我党的主张是一致的，应取赞助与拥护态度。周恩来认为，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是有进步的，我党提出的共同纲领草案对《抗战建国纲领》起了推动作用。

争取解决合作形式问题，从组织上巩固合作。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合作组织形式：一是党内联盟，像第一次国共合作那样；二是党外联盟，组成两党共同委员会，拥蒋为最高领袖；三是维护现状，遇事协商。蒋介石拒绝了前两种形式，采取了“遇事协商”的办法。

围绕两党合作形式的斗争，实际上是反对蒋介石的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溶共”政策的斗争。周恩来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其间，长江局书记王明提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的主张。但在中共代表团中，与蒋介石直接共过事的只有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周恩来是中共参加两党谈判的主要代表，蒋介石亦视周恩来为主要谈判对手，这就决定了周恩来在长江局的核心作用。在解决两党关系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周恩来始终坚持了正确的路线，他

对两党合作的政治纲领、具体组织形式都提出了系统的意见。对于危害两党关系，危害抗战的言论和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8年3月12日，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怎样纪念孙中山的伟大》一文，指出孙中山先生的一个伟大特点，是善于联合各种革命力量，“他根据每一个时期革命的需要，能将当时各种革命力量革命组织，特别看重的是群众组织联合一起，共

同努力”！“这种伟大的革命精神正是目前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极端需要的。”这是针对蒋介石推行的“取消党派”、“一党专政”主张进行的有力地批评与斗争。

## （二）坚持持久抗战方针，从军事上增强合作

坚持什么样的作战方针，是抗战初期国共军事合作的中心问题。早在1937年8月4日，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正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朱德、博古就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实现抗战的方针必须“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势。在山西前线，周恩来又提出了华北持久抗战的问题。1938年1月8日，他在《群众》周刊上发表了《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一文，进一步论述了持久战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措施，明确提出八项具体办法。同年5月，毛泽东写了《论持久战》，集中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集体智慧，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持久战的战略思想。

在抗日战争实践中，在与国民党的军事合作中，周恩来不断坚持和发展持久制胜的思想。反复强调：中国抗战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持久战的方针是确定的。1938年2月14日，他会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主张，指出中国抗战必须坚持持久战的道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后，周恩来向白崇禧作了介绍，被日军称为“战神”的“小诸葛”白崇禧，称赞《论持久战》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徐州失守后，蒋介石态度犹豫，国民党内部一些将领准备保存实力，使抗战出现严重危机。6月15日，长江局以王明、周恩来、博古名义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文章过分夸大了保卫武汉的意义，大有决一死战之势，主张拒敌于武汉门户之外，没有把重心放在广泛发动群众上面。这些违背持久战方针的错误言论，主要反映了王明当时的右倾思想，但周恩来是长江局副书记，并且签了名，也有一定的责任。

周恩来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很快纠正了上述错误。7月7日，为纪念抗日战争一周年，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一文。文章指出，日军战略方针，必然是集中主力，以包围武汉，切断粤汉、平汉、陇海，逼我退出一切铁路交通线，以便最后威胁广州、兰州。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军队应实行内外夹击敌人的方针。保卫武汉也不是“决战”，主要是给敌人以极大的损伤，万一不利，转移作战区域，继续抗战。10月7日至9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论目前抗战形势》，进一步指出抗日战争的形式，正如毛泽东所说，必须经过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保卫武汉的战斗，从整个抗战的形势看来，它只是第一阶段能否即过渡到第二阶段的关键，而决不是能否继续长期抗战的关键。”他分析了相持阶段到来的可能性，说：“保卫武汉的战斗，固然愈久愈好，但决不能在长期保卫武汉的条件尚未具备的今天，想作孤注一掷的侥幸的尝试，这不仅对于保卫武汉并无大的帮助，而且对于继续长期抗战是有害的，是不利于转入相持局面之过渡阶段的。”“只有坚持长期抗战，加强国内团

结，才是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转入相持局面的基本方针！”这篇长文在当时影响很大，还印成小册子大量发行，使许多人头脑开始清醒，增强了持久抗战的信心。

在对日作战的实践中，如何把阵地战、运动战及游击战三种作战样式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能不能坚持持久战方针的一个重要问题。1938年2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党应向蒋介石建议，战略方针以运动战为主，包括阵地战，以游击战为辅。6月17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谈徐州失守后中国军队的战略方针，应是将正规军主力组成许多野战兵团，依托太行山、嵩山、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黄山、天目山一带，开展大规模的山地战，以阻击日军西侵，加强长江防务。同时抽出一部分正规军，组成挺进队，深入敌后，发展游击战，造成战略夹击形势，大量消耗敌人。依据这些思想，周恩来多次向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建议作战方针和形式。乃至参与筹划、指导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

1938年3月，白崇禧奉命赴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临行前，他邀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就第五战区的对日作战方针提出建议。周恩来中恳地指出，在津浦路南段，由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在张云逸（新四军参谋长、三支队司令员）率新四军一部配合下，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淮河流域，威胁日军。同时，在徐州以北必须采取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白崇禧对这些建议深为赞赏，他到徐州后，基本上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之后，周恩来又派张爱萍去见李宗仁，当面转达他的意见：一是日本侵略军占领济南后南下，几乎是长驱直入，非常嚣张，骄兵必败，而且还是孤军深入；二是济南以南、徐州以北的地形很好，台儿庄、张庄一带都是山区，地形对我有利；三是广西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北边有八路军在战略上的配合，应该在这样有利的地形和敌情下，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既可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又可以提高广西军队在整个民众中特别是在国民党中的威信。李宗仁认为这些意见很好。这些建议，促成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10月中旬，日军进攻广东，华南抗战开始。周恩来起草致国民党当局意见书——《对日寇进攻华南的初步分析及建议》，全面分析了战争的起因和军事特点，提出的方针是坚持华南抗战，以击退日寇冒险的进攻。并列出了9条具体建议，如增调至少30个团作为四战区补充部队；动员民众，配合军队等。周恩来关于作战方针的建议，引起了国民党军事当局的重视。国民党中将厅长刘为章曾在意见书上注明这是华南战争的“要着”。

广州、武汉失陷后，周恩来在衡阳出席了蒋介石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他同叶剑英就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事，同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由周恩来往训练班国际问题的讲师，叶剑英任训练班副教育长，帮助国民党军队进行游击战的训练。

12月18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今后敌人的动向》一文，对进入相持阶段的全面抗战提出了系统的建议。他指出，目前战局正处在过渡阶段，这个阶段中，敌人在军事上，正准备从正面继续进攻和深入，封锁和切断我西南、西北的国际交通线。在敌后正在分兵进攻我游击区域和游击部队，企图消灭我在敌后的活动。在政治上，正扩大傀儡政权的组织，加紧汉奸的活动，造谣挑拨，企图分化我国内部团结，削弱国际影响。我们在这个阶段的战略任务，政治上，加紧国内团结，提高民族仇恨，扩大战斗意志，

实施战时动员，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贡献于战争，以克服当前困难；军事上，更应加强正面的战斗，加强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加快我们后方新的力量的补充和训练，以争取相持局面的到来。他还指出，日军速决方针的失败，今后进攻的特点是方向将不限于一个地区，为此，我军今后要加紧布置，到处打击敌人，以增加敌人的困难，争取有利于我们的时机的到来。

（三）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坚持正确的政治工作方针

1938年初，国民党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4个部，蒋介石任命陈诚为政治部长，并要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开始，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婉言推辞，但蒋介石仍然坚持。同时，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要周恩来到行政院任职。2月1日，中共代表团致电中共中央：我们认为，孔祥熙为主和者，行政院方面应谢绝；政治部属军事范围，为推动政治工作、改造部队、坚持抗战、扩大我党影响，可以去担任职务。如果屡推不干，会使蒋、陈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合作者的意见得到加强。周恩来之所以同意蒋陈要求，其深层动因是要用红军先进的政治工作去改造国民党军队，这是协助国民政府指导抗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是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军政部门担任的惟一要职，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一件大事。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下设4个厅，第三厅是管宣传的。周恩来极为重视第三厅的组建工作。他深知政治部副部长是个虚职，只有掌握了第三厅，才能正确引导抗日宣传舆论。在组建三厅人选上，蒋介石想借助郭沫若的影响，请他任厅长，但郭沫若对厅长一职并不感兴趣，特别对国民党派刘键群任副厅长更为不快，表示坚决不到三厅任职。经周恩来劝说，郭担任了三厅厅长。郭任厅长后，联络了大批文化、艺术和学术界的名流，其中有的与共产党关系密切，有的已经是共产党员。比如，掌管动员工作的第五处，由胡愈之任处长；掌管艺术宣传的第六处，由田汉任处长；掌管对敌宣传的第七处，由范寿康任处长；阳翰笙为三厅秘书长。周恩来对参加三厅工作的共产党员明确指示：我们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工作，去斗争，要有高度的警惕性，有很高的策略思想。

周恩来领导了大规模的抗日宣传活动。武汉各界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是三厅成立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周恩来同三厅的同志反复研究了这项工作。他指出，一要扩大宣传对象，二要扩大宣传范围。强调深入到劳动阶层中去，到前线，到战壕里去，提高人们的抗战意识，激励战士们的杀敌情绪。在宣传活动中采用了宣讲、歌咏、美术、戏剧、电影、游行等形式。郭沫若在《洪波曲》中写到：“参加火炬游行的，通合武汉三镇，怕有四五十万人。”在纪念抗战一周年之际还广泛发动了“七七”献金活动，阳翰笙在《风雨五十年》里这样描述：“献金台周围已人山人海……献金中有纸币，有银元，有铜板，有银元宝；还有耳环、手镯、戒指、珠宝等金银首饰，后来发展到献银盾，银盘，奖杯，还有药品、衣服、食品等等”。“这次献金是中国兴亡的重大测验！测验的结果，中国不会亡！”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支援下，三厅还建立了10个抗敌演剧队和4个抗敌宣传队，1个儿童剧团。周恩来要求他们既是演剧队、工作队，也是战斗队。让他们进行集训，学习政治，学习业务，还有军事训练。勉励他们要深入民众，积极进行抗战的政治动员工作。周恩来十分重视军队政治工作，1938年1月，周恩来发表了《抗战军队的政

治工作》一文。他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强调指出：“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政治工作，原是以革命主义、革命政纲来团结和联系军与民、官与兵的。”4月初，周恩来为民族解放丛书撰写的《抗战政治工作纲要》一书由解放出版社出版。书中对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战时一般政治工作、战时对俘虏的政治工作、抗战游击队的政治工作都作了深刻的阐述。周恩来还针对抗战军队中存在的问题，多次向陈诚提出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具体建议。所有这些，对抗战军队的建设，激励战斗情绪，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三、组织与指导华东、华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华东、华南地区不仅党的工作由中共中央长江局分管，许多军事工作也由长江局和后来的南方局直接领导。无论在武汉还是重庆，周恩来都是华东、华南敌后游击战争的主要组织者和指导者。特别是后来的南方局，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专门成立了军事组，更加有力地领导着华东和南方各省的抗日游击战争。

#### （一）指导新四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周恩来为组建新四军，颇费了一些周折。早在“五次谈判”中，周恩来与蒋介石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红军南方游击队改编问题。由于蒋介石害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事力量扩大，从中不断加以阻挠，因而使改编工作进展很迟缓。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叶挺获悉要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他去上海找周恩来，周恩来希望叶挺参加这支队伍的领导工作。叶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以个人名义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将中共在江南各地的游击队组织一个军，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形势危急。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披露，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向国民政府领取了新四军关防和5万元经费。并找到博古、董必武，说明他是按周恩来的意见进行活动的。11月3日，叶挺到达延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切接见了。叶挺表示，一定遵照党指示的道路走，坚决抗战到底。12月初，在汉口成立新四军筹备处。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成立，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支队，以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任支队司令员，全军1万余人。新四军组建不久，周恩来在武汉接见了新四军所属部队的一些负责人，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战略方针，部署了部队的东进计划。

1938年4月，新四军军部由南昌进驻安徽泾县云岭。此时，新四军的抗战功绩在全国是有影响的。但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时，存在两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与八路军在华北、山东开创的抗日局面相比，存在较大距离，项英对挺进敌后尚在迟疑；二是新四军军部内，项英对军长叶挺很不尊重，使叶难以工作。8月28日，叶挺致电周恩来，准备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周恩来复电：项英赴延安开会，新四军工作请你实际负责，待会议结束后，我们拟去一人帮助整理新四军工作。后叶挺到重庆，周恩来多次同他谈心，并于1939年2月23日，以回浙江绍兴故乡省亲为由，偕叶挺同到云岭新四军军部。周恩来到皖南，主要是传达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确立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及解决领导人之间的团结问题，同时也视察东南一些省党的工

作和抗战有关事宜。

周恩来到云岭后，首先听取了新四军领导的汇报，以及各支队负责人的意见。而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召开各部门座谈会，还到附近机关、医院和驻地连队看望广大指战员，了解生活、学习、军事训练等情况。周恩来本来对新四军情况就有较多的了解，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心中更有数了。他认为，从总体看，新四军仍处在十分不利的态势。新四军主力聚集于皖南，而长江沿线据点被日军所占，军部背后为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左右两侧均有国民党军驻扎，形成一面临敌，三面被围的态势。新四军活动区域仅有横宽约100公里、纵深不过50公里的狭长地带，万一遇到不测，回旋余地很小。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周恩来进行了紧张的工作。他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在新四军党委会和干部大会上作了《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论述了统一战线的性质、特点、形式、原则、方法及其发展前途。向部队和地方干部作了《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报告，分析了武汉失守后形势变化的特点，指出了新四军在新形势下的地位作用、任务和面临的困难以及作战方针。

关于新四军的敌后发展方向问题，周恩来提出了确立发展方向的三原则：“（1）那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那个地方发展。（2）那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3）那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他指出：“根据过去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我们认为，现在在跟民族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大江南北游击根据地的创造是完全可能的。”

关于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周恩来反复筹划，明确地提出“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后来，中共中央在此基础上，将其概括成：“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其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这对新四军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正确的战略决策。“向北发展”就是抽部队过江，把江北建成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据地。“向东作战”就是出击沪宁地区，让江浙敌人不得安宁，造成国际国内巨大影响。“巩固现在阵地”就是巩固皖南和苏南茅山根据地。这是符合形势发展的正确方针，得到了新四军大多数领导干部的赞同。项英表面上不反对这个方针，但实际上仍坚持自己的错误主张，这就种下了皖南受损的祸根。

关于新四军主要的作战方针。周恩来根据抗战新阶段的任务和新四军的具体情况，明确指出：“游击战仍然是我们新四军主要的作战方针。”他强调，要适合所处地区的特点，对游击战术有新的发展，新的研究，新的发扬。应该更加灵活，更加机动，更加出没无常，更加变化无穷。

关于新四军的建设，周恩来提出“以强大为原则”，“第一要精，第二要发展。”强调：“干部在我们成为强大的新四军上有决定的意义。”提出加强游击战术动作的训练，特别是夜战、白刃战，发扬长江水上游击队的特长。提出以政治工作保证建军工作的完成，巩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保持并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

周恩来在帮助新四军解决发展方向问题的同时，还耐心地帮助项英与叶挺改善相互关系。项英与叶挺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早在新四军整编时就存在。1938年4月，蒋介石命令新四军要依大茅山脉向芜湖、宣城一带行动，叶挺认为此举可行。而项英则认为，这是蒋介石借刀杀人，不应执行。并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想撇开叶挺，由他同蒋介石打交道。毛泽东却同意叶挺

的意见，并要项英处理好与叶挺的关系。但项英仍然我行我素，连中共中央一些重要指示也不向叶挺传达，叶挺处处受到冷遇，感到无法工作下去，提出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不久，叶挺即离军赴香港。周恩来与叶剑英 11 月 2 日致电项英：“希夷（即叶挺）尚未见，正从各方面探访中。我们拟向希夷说明两点：一、新四军应保持我党领导，不能改变现行制度，此事已向蒋说明过，希夷不应有异议；二、至于工作关系不良，可以改善，而且应当改善。”电报还指出：“我们估计希夷不回部，蒋亦不肯另委别人，为着统一战线的继续发展，希夷回部工作是有利的。”

叶挺赴香港不久，便返回家乡惠州，留粤从事游击战争。后在东江收编了溃散的 5000 余名粤军。

叶挺辞别新四军，一时引起很大反响。蒋介石多次谈到，连叶挺都不能与你们共产党合作，将无人与你们合作。蒋介石还考虑另派更难处的军长，或改新四军为游击队。周恩来认为。这对我们更为不利。1939 年 1 月 8 日，他致电中央书记处；提议叶仍回新四军，解决的原则是：“共产党的领导必须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变，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正项副，项实际为政委。”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复电：“应尊重叶之地位与职权，我们提议，项多注意四军总的领导及东南局工作，而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办。”

经过周恩来的关怀和耐心的工作，叶挺于 2 月初到重庆，与周恩来、叶剑英晤谈，表示愿意回新四军工作。因而，周恩来借东南行之际，陪同叶挺回到新四军军部。为了解决项叶关系，周恩来向项英等领导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叶挺工作的意见。还找项英多次谈话，批评项英说，叶挺是个好同志，很有军事才能，这样的将领如不去团结，还要团结谁呢？还指出，叶挺是热爱党的事业的，热爱人民的事业的，不能因为他现在不是党员就不欢迎他，他不参加党，留在党外对党的工作有利得多。

经过周恩来艰苦细致的工作，项英作了自我批评，叶挺留下坚持工作了。当周恩来离开新四军军部时，叶挺依依不舍，一直把周恩来送到青弋江边，直到周乘竹筏远去以后，才转身回去。

## （二）组织指导华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周恩来主持南方局工作期间，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积极有效地领导了华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指导建立和发展了华南各抗日纵队，建立了东江、琼崖等抗日根据地。

1938 年 10 月，广州沦陷后，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把工作重心放在东江、琼崖两地区，筹建抗日游击队。1939 年 4 月，根据南方局指示，取得了第四战区的统一番号，改编成立了第四游击挺进纵队第二大队，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共 700 余人，并建立了抗日游击基地。在海南保留下的琼崖红军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全队 300 余人。在珠江三角洲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也有 300 人左右。在灵山、潮汕等地也先后建立了抗日武装。这些抗日武装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广东省委的领导下，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狠狠打击了日伪军，阻滞了敌军的进攻。

周恩来十分关心广东省委的工作和华南抗日武装的发展。为了加强华南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1942 年 1 月，广东军政委员会成立。12 月，中共广东省委临委成立，以林平为书记。周恩来在重大问题上，均给以详细的指示。1942 年 9 月 3 日，关于东江游击队接洽谈判问题，周恩来指示中共广东省委，谈判在原则上必须坚持：1. 政治独立。2. 不混编。3. 不订调训。4. 不派人。

对派教官来部队训练需慎重，派政治工作人员需拒绝。对派出谈判代表“尤需慎重人选”。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广东游击部队和根据地的领导，1943年2月25日，周恩来指示广东军政会，应加紧实行精兵简政，缩小后方，充实战斗部队。由于周恩来的正确指导，华南各根据地军民积极开展了反“扫荡”、反“蚕食”、反“磨擦”的斗争。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敌后抗日根据地有所扩大，游击队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1943年冬，日军发动了打通广九铁路的战役。东江游击队重创日军，紧紧卡住了广九铁路，12月，正式成立了东江纵队，由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委，琼崖独立纵队采取“坚持内线，挺出外线”的方针，向琼东南、琼西南发展，在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成批地歼灭日、伪军。1944年秋改称琼崖纵队，由冯白驹任司令员兼政委。同时，建立了东、西、南3个军政委员会和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珠江的武装力量采取了“发展中山。经营番禺”的方针，向中山、禹南、南海等地发展，粉碎了日、伪军9000余人对五桂山的10次围攻，部队发展到2700余人，1944年10月，成立了中区纵队，周恩来始终关注着华南抗日武装的发展，他批驳了那种认为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会影响统一战线”的论调，肯定了开展华南游击战争的做法，并对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和军事统战等重大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明确的指示。从而为华南游击战争的迅速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1944年5月，日军发动了打通湘桂和粤汉线的作战。第二年1月，日军占领韶关，打通了粤汉线，广东处于全面沦陷状态。1945年3月6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华南工作方针的指示”，明确指出：华南抗日武装斗争应由小北江入手，以湘粤桂边区为主要发展方向，方能向北有所依靠，并便于造成更大的根据地，进行持久的斗争：东江沿海和珠江三角洲也有必要注意建立向北山地之基础；关于沦陷区工作要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抗日武装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尽力组织部分党员转入乡村工作，在农民中建立党的秘密的基础；上层统战关系及外交工作，应力求打通南路与李济深、张炎的关系。中央决定将临委及军政委合并，改为区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华南各路纵队坚决执行上述方针，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到1945年8月，华南抗日武装已有7个纵队，2.8万余人，共建立了面积为8.7万平方公里的根据地和游击区。各抗日纵队曾在70多个县内浴血奋战，抗击与牵制日、伪军达15万多人，对日、伪作战3000余次，歼灭日、伪军2万余人。不仅从战略上配合了全国抗日战争，而且还配合和支持了太平洋战场盟军的作战。

#### 四、深入开展军事统战工作

以周恩来为核心的南方局，设立了军事组，由叶剑英任组长，专门负责军事统战工作。在周恩来、叶剑英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驻重庆、桂林、香港、长沙（后邵阳）、广州（后韶关）、衡阳、贵阳等地办事处、通讯处、交通站和各地《新华日报》分支机构等公开机关，运用合法地位开展统战工作，动员群众进行抗日斗争，支持地下党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 （一）进行军事联络，指导各地办事处开展工作

进行大量的军事联络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军事当局的联系事项颇多，需要交涉处理的问题十分繁重。凡重大事项，均由周恩



来、叶剑英等过问和处理，诸如呈转国共两党来往公文函电，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报告八路军、新四军战斗情况，通报日、伪军的情况，交涉处理国共两军发生的磨擦等。

其他问题则由八路军、新四军驻南方各地的办事处经办。重庆等办事处经常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或当地军需处交涉军需保障事宜。仰领取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武器弹药、军需物资、医药、车辆、通讯器材等，并负责将所领物资分送到各单位和地区。当国民党停止对我八路军、新四军的供给后，重庆办事处则秘密购置医药用品、通讯器材，运往延安。

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周恩来亲自指导各办事处，通过集会、讲演、举办训练班、创办报刊、举行招待会等形式，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宣传八路军的胜利战果，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有许多重大的活动，周恩来都亲自参加。1939年2月中旬，周恩来飞抵桂林，向桂林办事处工作人员和文化界人士200余人作报告，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形势和任务。这对桂林办事处的工作，有很大的推动，使桂林这座文化名城成了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4月中旬，周恩来到衡山视察游击干部训练班，向学员讲了《中日战争之政略和战略问题》，提出动员全国人民展开全面抗战。5月31日，周恩来发表广播讲话，指出：“二期抗战的重心是在敌后”，“争夺敌后的方针便是广大发展游击战争”。这样，变敌人后方为前方，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方针可完全成功。6月6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举办的训练班上作题为《关于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的报告。他针对日寇“重视敌后，相机进攻”的“以战养战”的新政策，提出在新形势下游击战术的新原则应是：“敌击我隐、敌分我袭、敌进我伏、敌围我散”。

募集捐款和各种物资，介绍进步青年投奔革命。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游击队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斗争。各办事处为了支援前线的斗争，经常开展募捐、义买义卖和献金等活动。国内外同胞尤其是爱国侨胞热烈响应，纷纷捐送款项和物资。

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党领导的根据地和人民武装力量不断扩大，急需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进步青年。南方各地办事处，在周恩来的具体指导下，招聘和动员了大批人员到延安和各解放区。还介绍了不少追求革命有文化的青年到敌后根据地，投笔从戎，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始终把开展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他领导下的南方各办事处贯彻党的政策和策略，主动开展统战工作。例如桂林办事处领导人李克农与桂系首脑人物李宗仁就保持了经常的接触，争取他们开放民主，团结抗日。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负责人徐特立与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也常有联系，促使张在湖南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团结抗日的举措。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等，对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及国际友人也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当宋庆龄组织保卫中国同盟时，香港办事处支持了这一举动，团结了大批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国际友人，支援中国的抗日斗争。

利用办事处的合法地位，掩护地下党的秘密工作。南方各省党的地下组织，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任务。他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极其危险和艰苦。周恩来指示南方各地办事处，要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积极支持、掩护地下党的工作。例如，南方局的许多重要的对外活动，就是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的名义进行的。桂林办事处的李克农代表南方局与粤、赣、湘等省地下党保持联系，协助他们建立秘密电台和交通站。有的办事处还掩护地下党召开重要会议。

对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赞扬。1939年8月初，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毛泽东对这个报告作了充分肯定，并对南方局的工作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说，这是广大的地方工作与统战工作，“工作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绩”。并说，具体讲，“这是在恩来领导下的成绩”。

## （二）制止反共逆流，维护统一战线

日寇在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对国民党的方针，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蒋介石国民党当局由于十分害怕八路军、新四军的壮大，仇共、惧共心理日益加剧，因而其政策的重点也迅即由对外转向对内，由抗日转向反共。从1939年底至1943年春，先后掀起3次反共高潮，各种反共事件层出不穷。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确定了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对国民党的反共活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周恩来亲自领导了国统区反对国民党反共高潮的斗争，顶住了反共逆流，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1. 反击国民党军队的挑衅与磨擦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中全会，原则通过了要“限制异党活动”。此后，国民党秘密颁布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训令，还专门设立了从事反共工作的特别委员会。

国民党军队则在“溶共”、“限共”、“反共”方针的指导下，有计划、有领导地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挑衅活动和磨擦事件。

周恩来对蒋介石的反共本能是有高度警惕的。1939年6月上旬即报告中共中央，指出，目前阶段，国民党当局及其后方军政机关均重在如何对内，如何限制共党，防备共党，乃至反对共党，如何消灭同情共党的影响及其分子，如何消灭国共以外的中间分子，以冀造成国民党独霸的局面。于是思想复古，磨擦丛生……对共产党，对陕甘宁边区，对八路军、新四军乃至发生许多苛刻要求。无理之限制，不平之待遇，以至杀人捕人武装冲突。周恩来的这个判断是非常正确的，为中共中央采取相应的对策提供了依据。面对国民党特别是其军队的挑衅和磨擦，周恩来采取“争取好转，勿忘防御”，“争取合作，勿忘斗争”的策略，在维护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比如，1939年5月，国民党部队包围了陕甘宁边区的镇原县，旬邑县被攻占，整个边区受到进一步的封锁。周恩来要求国民党部队退出侵占的各县，停止挑衅活动。并会见蒋介石，专门商谈边区问题。蒋介石说，非边区停止向外进攻，不能谈判具体问题；周恩来当即反驳道：“并非我们进攻，乃被人所攻”，边区为自卫行动。最后决定双方派员调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6月22日，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政厅氏兼民军总司令张荫梧突然率领5000余人，配合日军扫荡，偷袭驻深县的八路军吕正操部，杀害八路军指战员400多人。吕正操部奋起反击，除毙伤外，俘获张部旅长以下2000余人，张荫梧带10余人逃走。张恶人先告状，陈诚竟电周恩来提出抗议。周恩来不得不复电陈述事实真相，说明十八集团军贺、刘两师和吕正操部坚持抗击日寇扫荡，张荫梧却诬八路军见敌潜逃，进攻友军。冀

深两县发生的武装冲突，都由于张部挑衅，“张部乔司令明礼尚在吕部驻地，不日即将带队归还张处，方可知此事。”于是，真相大白。后来张荫梧被免去职务。

北事未平，南事又起。7月2日，周恩来得知湖南平江发生惨案，八路军平江通讯处主任涂正坤被打死，八路军少校副官罗祥铭等8人被活埋。周恩来立即致电陈诚提出严重抗议。并电徐永昌、何应钦、程潜、朱绍良等，要求迅速派员到各地调查磨擦冲突，查处深县、平江二地惨案真相，令其部属勿再故生是非，致使事态扩大。周恩来还写信给蒋介石提出抗议，并痛斥国民党的反共阴谋，要求最高当局“本大公无私之怀，必能平反此案，为死者伸冤，为生者保证其最低合法权利也。”

1939年冬，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敌后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当时，周恩来正在苏联疗伤。针对共产国际中一些人对中共进行的统一战线政策产生怀疑，甚至担心中共热衷于搞磨擦。为了说明真相，周恩来写了一份5.5万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全文分四个部分，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反对投降与分裂；坚持民主与进步，反对倒退；支持抗战，反对内江与磨擦的严正立场。这个备忘录经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看过，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由于周恩来的努力，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中的声望，扩大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

## 2. 以政治上的进攻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

1940年9、10月间，国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德、意、日三国于9月27日在柏林签订协定，正式结成三国轴心。在这前后，英美也签订协定，组成同盟国。当时，这两大集团都在争取蒋介石，使蒋一时踌躇满志。他认为时机有利，可以有恃无恐地再次发动反共高潮，削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这一次，蒋介石把矛头对准了皖南的新四军。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和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致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限八路军、新四军在收到电报1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这就是著名的“皓电”。同时，他们又向顾祝同发出围攻新四军的密令。一时间，汤恩伯、马鸿逵等纷纷赶到重庆密商反共阴谋，长江南北的国民党军队开始调动，各种舆论强化了反共宣传，对有共产党嫌疑者加紧监视和逮捕。对此，周恩来敏锐地作出了判断：“何、白十九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断言：破裂的危险已至，反共局部战争会开始。

面对如此危急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应采取什么对策呢？11月1日，周恩来两次急电毛泽东，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大家一致望我们拿出办法来，并望我们让步，以缓和破裂。”他还转达了冯玉祥的建议：“要软硬两用，表面让步，实际自干。”所谓软硬，就是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稍后，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明中共中央的政策是：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缓和所以争取群众，抵抗所以保卫自己，软所以给他以面子，硬所以给他以恐怖。”

关于新四军的行动问题，周恩来提出，或将新四军北移，以便集结应战；或立即分散，皖南部队一部分秘密转苏南渡江，一部分准备就地打游击。江北部队须作应战准备，防备顽固派的偷袭，李先念部要防止陈诚“清剿”。对于“皓电”，周恩来认为，原则上不能同意，但需答复，建议用朱德、彭

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通电，答复何应钦、白崇禧。

11月9日，根据周恩来向中共中央的建议，由朱德、彭德怀、项英电复何应钦、白崇禧（即“佳电”），申明长江以北的抗日军队不能撤退的理由，拒绝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答应将江南的正规部队移至江北。

此后，周恩来同国民党代表张冲多次面谈，并于12月21日致函张冲，在历数各地反共事件后，着重指出惟目前最严重之事件，莫过于新四军江南部队已整装上道，而一切补给犹无着落，新四军、八路军在江北部队已听令停止冲突，而山东之东北军、安徽之广西军犹向之步步逼近。并与江苏方面友军配合，造成对新四军、八路军在苏北之包围形势。直逼至于江海之滨，尚有何渡江北移之可能？并请张冲转告蒋介石中止这些行动。

12月下旬，局势仍在迅速恶化：国民党已完成对新四军的合围态势。同时，由于国民党故意泄露新四军北移消息，日军封锁长江。蒋介石还下达了对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命令。据此，12月29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性”，“仍以分批走苏南为至要”。次日，毛泽东、朱德电告项英：“我们同意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1941年1月3日，毛泽东、朱德再次致电叶挺、项英：你们全部坚决离开皖南，并立即开动。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由泾县云岭出发北移。6日，在皖南茂林地区遭第三战区顾祝同和三十二集团军7个师8万余人包围伏击。我新四军将士血战7昼夜，除突围2000余人外，其余6000人大部阵亡，一部被俘，叶挺被扣，项英遇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千古奇冤——皖南事变。

1月7日，周恩来接到新四军在北移途中被围的告急电，愤慨万分，当即向张冲提出强烈抗议，并分别向顾祝同、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人提出抗议，严正声明，如不制止对新四军的包围、袭击，“新四军只有突围四出，散于民间，战于敌后。”

1月17日，国民党污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并通缉项英。至此，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峰，周恩来打电话谴责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当晚，周恩来召集南方局工作人员开会，向大家讲述皖南事变的经过，并指出，形势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国共合作完全破裂，二是经过斗争两党继续合作抗日。当周恩来得知《新华日报》关于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社论和报道被检查扣压后，立即为《新华日报》题写：“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18日晨，载有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5000多份，出现在重庆的大街小巷。

为进一步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周恩来、董必武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提议实行政治上的全面进攻。经中央同意后，周恩来和董必武等，在重庆广泛地同社会各界人士接触，秘密散发由周恩来审定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使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国民党的反共真面目，人们的同情越来越多地转到中国共产党方面来。周恩来还在外交方面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异常孤立和被动的地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皖南事变那些极端紧张的日子里，中共中央十分担心周恩来和南方局其他领导成员的安全。曾去电要求他们撤离重庆。周恩来断然表示要坚持到最后，这个意见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历史表明，周恩来坚持在重庆的决策，保存了中共在国统区的指挥中心，保存了国共联系的主

渠道，保住了团结抗战的局面，对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

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要求悉心整理部队，坚持抗战到底。

中共中央及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同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得到了全国民众、海外华侨和进步团体的声援，国际舆论也纷纷谴责蒋介石的反共活动。在国内外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表示退却。国共关系开始趋于一定程度的缓和。

### 3. 制止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

蒋介石为了削弱和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维护其反动统治，于1943年春天又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肆宣扬封建主义，鼓吹法西斯，反对共产主义。扬言要在两年内消灭共产党和一切革命力量。6月，国民党顽固派乘共产国际解散之际，叫嚷共产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在军事上，蒋介石调动驻守河防的两个军加上原有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共50余万人，准备分兵9路“闪击延安”，并于7月7日和9日，炮击我关中地区。

为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周恩来一行于6月28日离开重庆，取道西安，于7月16日抵延安。8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8、9两个月发动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运动，通电全国要求取消各种特务组织，严禁传播法西斯主义思想。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决定的精神，周恩来针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起草了《论中国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报告提纲。这是从政治舆论上回击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重磅炸弹。提纲深刻分析了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历史根源，政纲和策略，组织和活动，指出蒋介石国民党是法西斯主义，必须“公开地揭穿其法西斯主义实质”。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是以极端的唯心论哲学为其思想体系的基础的；它的历史根源，“是官僚资本与特务制度的结合”，“是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它的纲领是反抗战、反共反民主的；它的策略具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对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和革命群众时，则采取以消灭为中心的时软时硬的策略；它的组织“就是特务组织”，进行最反动、最野蛮、最残暴的活动。但是，“世界法西斯主义正走向死亡，中国法西斯主义决难独存。中国的抗战有它胜利的前途”，“中国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的。”

这份报告提纲，连同党中央陆续发表的《国民党六十二个叛国投敌的党政要员概况》、《抗战以来敌寇诱降与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活动的一笔总账》等材料，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破坏抗战、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所有这些，对解放区军民起到了政治动员的作用。

由于解放区在军事上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加上美英要利用中国抗击日本，不赞成蒋介石此时发动内战，迫使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在没有发展成为大规模武装进攻的情况下，便被制止了。

### （三）团结爱国将领，扩大统一战线

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南方局遵循中共中央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把“认定和各地方军队联系”列为统一战线工作原则之一，对国民党军中的地方实力派开展多渠道、多层次的军事统战工作，取得了积极的

效果。

对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冯玉祥是一名爱国军人，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周恩来对他有很深的影响。1938年2月14日，周恩来去看望冯玉祥，交换了对抗战形势和前途的看法。冯玉祥感叹知道的东西大少了。之后，他请周恩来派人给自己及随从人员讲统一战线、游击战和持久战，并在汉口大量印刷《列宁全集》、《论持久战》等著作。到重庆后，周恩来还常去看望他，共同商谈国是，彼此间友谊笃深。周恩来对西北军将领张自忠、冯治安、张克侠、何基洋等做了许多统战和联系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周恩来在会见国民党第七十七军副军长何基洋时，赞扬了何在卢沟桥抗日的义举，认为中山陵前出了剖腹明志的续范亭将军，卢沟桥上出了坚持抗日的何基洋将军，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他亲自安排何基洋秘密去延安，促使何基洋接受中共主张，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对滇军的统战工作。周恩来、叶剑英等不断做龙云、卢汉的统战工作。1942年9月，龙云请周恩来来到昆明会晤。南方局派华岗为代表到昆明与龙云直接联系，还建立了与南方局联系的电台。滇军一八四师师长张冲在共产党的影响下，积极参加抗战，并为我云南地下党提供一批枪支弹药。

对桂系的统战工作。周恩来十分重视对桂系的统战关系。1938年武汉失守后，周恩来在撤退途中，向白崇禧阐明了国共合作和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并得到白的同意，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1939年2月，周恩来应白崇禧之邀，出席军训部成立两周年纪念会，并发表演说，宣传毛泽东关于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周恩来对桂系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的统战工作很有成效，经常得到韩提供的有关情报。1945年9月，四十六军进驻海南岛，韩练成尽力保护我琼崖党组织和游击队。

对粤军的统战工作。周恩来应张发奎要求，派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组成战地服务队到粤军工作。有的中共党员还担任了长官部秘书、副官、参谋等职。秘密党员吴仲禧任中将军法监，左恭任政治部主任秘书等。皖南事变时，张发奎持中立态度。广东沦陷后，广东省委派120名党员和数百名进步青年到余汉谋的第十二集团军建立政治工作，并建立了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为后来配合东江纵队主力北上，开辟粤北根据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对李济深、蔡廷锴的统战工作。周恩来通过各种渠道同他们进行联系。李济深曾阅批放行大批抗战物资经桂林运送到延安，保护了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的安全。李济深还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回家乡苍梧组建民众武装配合游击队抗日。抗战后期，周恩来多次致电广东省党组织，力求打通与李济深、蔡廷锴的关系。1945年8月5日，周恩来致电林平转狄超白，指出应强调李济深自治自卫的主张，要帮助民主同盟在华南发展，以便与昆明相呼应，对重庆造成犄角之势。还指出，如李济深、蔡廷锴派人参加在延安召开的人民代表会议，不论代表或列席，我们均欢迎，并愿代守秘密，不予宣布。这些重要指示精神的贯彻，对李、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对川康军的统战工作。周恩来曾多次会见刘文辉、邓锡侯或其代表，向他们宣传我党团结抗日的方针和政策，激发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南方局还派人到刘文辉处建立秘密电台，长期同中共中央和南方局保持通信联系。邓锡侯部的师长陈离，其部驻在老河口时，与新四军建立了友好关系，曾支援新四军部分枪支弹药和经费。这些工作不仅推动了团结抗战，而且对刘文辉、

邓锡侯等在解放战争后期率部起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周恩来还对程潜和河南其他将领也做了大量工作，对推动第一战区抗战起了积极作用。

## 五、把握世界战局和抗日战争的发展趋势

1941年，在经历了皖南事变那段特别困难的日子后，国共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然而，国际形势却经历着异常激烈的动荡和变化。这一年，发生了震撼世界的两件大事：一件是6月22日法西斯德国向苏联进攻，一件是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和力量对比，并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高度，及时回答时局、任务和策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才能真正把握抗日战争的发展趋势，使中国人民在重重迷雾中不致走偏方向。为此，他在半年多时间里，先后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十多篇评论文章，以其严密的逻辑和透彻的说理，深刻分析了世界和中国的战争形势，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见解，对统一认识、团结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 （一）科学分析日美矛盾，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方针

1941年，抗日战争已进入第五个年头。中国内部的矛盾日益增加，抗战能不能进行下去，出路在哪里？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国民党内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依赖美国的倾向，认为日美在太平洋地区的矛盾正在上升，如果地中海被切断，迫使日本南进，英美也就非努力对付日本不可，中国抗战就有了希望。蒋介石甚至表示，中国惟一的希望只能依靠美国。另一种倾向是夸大日本的力量，暗中酝酿投降日本。

周恩来感到这两种倾向对于坚持抗战都是十分有害的。大凡在敌人的国际环境较好而能集中力量进攻的时候，便常易发生悲观的论调；在敌人的国际环境较坏而又在其休整的时候，便常易过分乐观。这种悲观和过分乐观，都是长期抗战中所不应有和不必要的。

5月25日，周恩来发表了《论目前战局》一文；5月31日，又为《新华日报》撰写社论《论时局中的暗流》，可视为前文的姊妹篇。两篇文章均指出，日美矛盾虽在激化，但也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制约。英美作战的重心尚在大西洋不在太平洋。如果能推迟太平洋上的冲突，而又能使中国抗战拖住日本，以便其先对德后对日，英美是会不惜代价以缓和的。何况在西方，英德妥协共同反苏是世界战争的一股暗流，在东方，新的一股暗流在日美的少数人中渐渐生长起来，他们企图或承认美国为中介来调解中日战事。由于这些因素的干扰，日美战争未必在日内就能爆发。在分析了日美矛盾及各帝国主义的战略企图后，周恩来就中国的抗战发表了结论性的意见，指出：“必须弄清主从，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是我们抗战的基本国策，运用友邦对日矛盾及争取外援，是服从于基本国策的对外政策。”他认为，我们现在只有号召全国军民，坚持独立自主地抗战，拿这种自信的坚决的抗战方针，来争取和适当运用外援，不应该只是希望和等待太平洋上的冲突。那么，怎样结合当前时局，进行独立自主的抗战呢？周恩来于6月8日为《新华日报》撰写的社论《论敌寇两面政策》，明确指出，日本侵略者现时对于军事进攻以外，还使用政治进攻的法宝，企图以诱降和分化来动摇我们抗战的意志，瓦解抗战的力量，以便于征服中国，这就是敌人侵华的两面政策。我们要独立自主

地进行抗战，就必须“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就是敌人以军事的进攻和扫荡来，我们以各线出击和破击战回答他。敌人以政治的诱降和分化来，我们以反对投降和巩固团结回答他。敌人以军事政治双管齐下来进攻我们，我们便以团结抗战来回答他。敌人要抽身南进，我们便坚持抗战发展力量，求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敌人想通过美国调解中日战争，我们便坚持独立自主抗战到底的立场，来击破敌人这一阴谋。”总之，要对付敌寇的两面政策，“我们便应一方面加强我们军事力量，协同我们军事动作，以粉碎敌人的进攻和封锁。另一方面，坚持我们独立自主的抗战立场，加紧我们全国的团结，以粉碎敌人的诱降分化和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周恩来的这些言论，对鼓舞全国军民克服困难，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洞察欧战形势，提出“以不变应万变”抗战策略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突然向苏联大举进攻，苏联人民开始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对德国法西斯的突然袭击，周恩来是早有警惕的。1941年春，希特勒为实施“巴巴罗萨计划”，很想拉日本一起进攻苏联，并派所谓“狼团”到东方来活动。在上海，他们收买了很多人，同时也泄露了德军行动的准确日期——6月22日，正在南京政府任职的中共秘密党员阎宝航得知这一重要情报后，迅速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综合了各方面的消息，通过冷静分析，立即判断出了这份情报的价值。鉴于当时苏联疏于对希特勒的戒备，周恩来决定马上转发莫斯科，并直接口述俄文，发往延安，同时要求务必于当天转发斯大林：“据可靠情报：巴巴洛沙（红胡子）计划将在6月22日4时全面展开。周恩来”。1941年6月22日中午，从广播证实了这一消息。6月23日斯大林回电：“……由于中国的情报及时，所以苏联红军提前准备了24小时……”

由于周恩来密切注视着欧洲战场，并对欧战形势有着准确的洞察和判断，因而当许多人担心苏联能否支持得住，苏德战争结果将会如何的时候，周恩来在战争发生的第七天（28日），写了《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的斗争》一文，富有远见的指出，纳粹德国向苏联进攻，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两万万苏联人民立即起来应战，是正义的自卫战争。战争的发展方在开始，“‘其战果决不是短时期所可看出，更不是几个仗便见分晓’，但是我们可预言的是时间有利于苏联。纳粹德国利在速决，故一开始便攻势甚猛，企图仍以闪击战达到其两个月征服苏联的狂言。苏联的战法，不论是拒之于国门之外，或是引之深入，只要苏联的主力在，人力在，物力在，时间一久，法西斯侵略者必然要遭受最后的惨败。故我们对苏德战争，不能以一时的出入胜负为断。”接着周恩来表明了中国人民应有的立场，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4年来久已站在反对日本法西斯强盗的前线，更会不落人后的将自己抗战的胜利与苏联抗战的胜利紧密地联在一起，共同努力于全世界反法西斯事业的成功。

周恩来还尤其重视国民党当局的动向。因为国民党当局看到日本已将大量兵力从国内运往中国东北，就判断日本要在1个月内进攻苏联，那时他们就可以乘机将中共的力量压到黄河以北。对此，周恩来明确指出日本北进并不是没有困难和顾虑的，“第一，中国问题将因此更陷于不能解决之境；第二，西伯利亚并没有像南洋那样多的国防资源；第三，时间上不很易于侥幸成功，万一拖长，则日寇的另一泥足又要陷于冰天雪地之中；第四，万一英美在其发动攻苏后，实行太平洋上的封锁，岂不陷于前后绝境？！”在此基



基础上，周恩来指出，中国的抗战要以不变应万变。不论日本侵略者是准备北进，或者南进，或者南北并进，或者先来一个西进，“我们总应准备敌人西进，乃至迎头打击敌人西进，这才是万全之策。”我们应当努力“加紧国内的团结，改善政治上的设施，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尤其是要加强军事的力量，国防的生产，以便一方面能有力的抗击敌人的进攻，收复一些据点，另一方面，在敌人果然北进时，我们也可配合友邦，实行反攻，击败敌人。”周恩来的精辟见解，消除了一些错误思想，使许多人在重大历史关头认清了方向。

### （三）系统总结抗战经验，坚定抗战必胜信心

1941年7月至9月，正值“七七”事变四周年，“九一八”事变十周年。周恩来感到，当时的局势，无论是欧洲苏德战场，还是中国抗日战场，都处于比较困难的境地。为了坚定中国军民的必胜信心，他及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总结抗战的经验教训，激发军民的爱国热情，申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立场和决心。

《“七七”四年》一文，是周恩来为纪念“七七”事变四周年，为《新华日报》撰写的社论。文章着重总结了四年抗战的成绩与经验，尤其是对战略战术作了精辟的总结与概括：“敌人企图速决，我们便应之以持久。敌人欲歼灭我主力，我们便分散而消耗他。敌人只能正规战，我们便发动游击战困他，敌人占领我点线，我们便以面来包围他。敌人建立傀儡政权，我们便以敌后抗日政权对抗他。敌人欲以战养战，我们便以封锁和抵制破坏他。敌人封锁我们，我们加强生产，自力更生。”“四年抗战，证明了我们中华民族是永远征服不了的民族。”文章还明确指出，日寇虽失道寡助，但也有帮手，我们虽得道多助，但英美对日寇存有幻想，与苏接近也刚刚开始。一小部分人对长期抗战有些不耐，对于敌人诱降发生动摇，有的不重视自力更生。军事上忽视训练，政治上动员群众不够，经济上国防工业是最弱的部门等。面对这些问题，周恩来强调，要坚持长期抗战，要努力于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阵线的联合，要加强军事力量和装备，要组织战役上的反攻力量，要加强对于敌后游击区和游击部队的领导和帮助，特别是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各党派的合作，要加强“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坚固团结，这是我们战胜日寇的基本力量”。

9月18日那天，周恩来发表了《“九一八”十年》，这是一篇充满爱国激情的文章。他为在敌人铁蹄蹂躏下过着奴隶牛马生活的东北同胞，为流亡在关内苦难的东北同胞，发出了悲愤的呐喊。他向苦斗中的东北义勇军及东北流亡人士，致以深深的敬意：“海可枯，石可烂，你们的民族正气，是永远不会磨灭的！”文章于激情之余，也清醒地指出，美与日谈判是“不智之举”，有上日寇大当的危险，“谈判中的妥协气氛，更给美国一部分上层分子以幻想，而减弱太平洋上的戒备，同时，更可使日本少壮派感觉美国易与和可欺，而愈加肆无忌惮。”后来的珍珠港事件证明了周恩来的判断。文章最后着重写道：“在纪念‘九一八’十年的今天，我们中共党人，再一次向全国声明：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总是坚持抗战到底，不达到驱逐日寇出境，决不罢休！”周恩来充满爱国激情的文章，给抗战军民以很大的鼓舞。

### （四）揭露日本内阁改组的实质，做好应付日美开战的各种准备

10月16日，日本第三次近卫内阁总辞职，陆相东条英机奉命组阁。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内阁改组呢？许多人一时迷惑不解。周恩来则保持着清醒

的头脑。他在3天后发表了《太平洋的新危机》一文，毫不含糊地揭露了日本内阁的改组，其实质在于“日本法西斯军人再也不能忍耐目前沉闷拖延的局面，而必须自己出马，采取冒险的行动了。”东条新内阁的大概趋势是太平洋新危机之到来。新危机的范围决不会止于北进，必然以占领西伯利亚，囊括南太平洋，解决中国事变，为其联贯的方针，企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针对有人认为东条新内阁对外尤其是对美政策将无变更。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意见是不对的”。东条英机属于法西斯军人派，其方针重在依附轴心国。东条原有对苏对华两面作战的主张，现在恐怕更有三面乃至多面作战的主张了。何况这次近卫已倒阁，明显反映了日本内外方针上存在的分歧，不管东条组阁后从那一方面下手，总是要向冒险路上走的。周恩来的结论是：“这次日本军人内阁的出现，是日寇大冒险行动的信号。”

那么，日本大冒险行动的矛头首先指向哪里呢？周恩来断定，会向南，日美之间有爆发战争的可能。在苏德战争空前激化；日美矛盾愈加尖锐，中国反攻局部胜利，美、英、中、荷四国的南洋封锁越发强化的时候，太平洋的新危机是异常紧张了。东条组阁更成为这一新危机的导火线，因此，我们要做好应付使日美开战的各种准备工作。当香港的一些共产党员认为日本不会打美国时，周恩来立刻去电，指出日美有开战的可能，要他们做好应变的准备。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廖承志、潘汉年等人，组织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经各种途径转移到安全地带，前后一共有800多人。

#### （五）预见太平洋战争的进程，提出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

早在1941年5月25日，周恩来在为《新华日报》撰写的社论中就指出：“太平洋上的冲突是迟早不可避免的”。果然，1941年12月7日，日本未经宣战，出动了强大的海空军，突然偷袭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重要基地珍珠港，使美国遭到惨重损失。次日，美英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在中国，有人认为日本可能放松对中国的侵略，有人认为太平洋战争会很快结束，也有人认为苏联应该出兵进攻日本等等。特别是国民党一些官员，对太平洋战争爆发感到欢欣鼓舞，相互祝贺。为了澄清这些模糊观念和错误看法，周恩来除向各方面人士广泛进行解释外，12月13日又写了一篇题为《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的长文，从多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判断。

周恩来首先肯定全世界反侵略的国家和民族必定取得胜利。文章历数了七个方面的有利条件，指出，这些条件只说明战争胜利的必然前途。由于各民主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生产力还没有能全部动员，使用尽当，也还没有做到完全团结和信赖无间，因而还须要经历若干过程才能走向胜利。他强调，要重视这些弱点，应联合友邦，奋起急追，全力以赴，共同去克服这些弱点，解决这些困难，以担负太平洋上伟大艰苦的抗日任务。

周恩来预计战争初期会有若干挫败。其原因在于日寇是无耻海盗，将继续扩张战果；日本海空军在太平洋上有优势；美、英在精神上、物质上还准备不周等等，但是，只要太平洋沿岸各友邦、各民族团结一致，坚持到最后，必能改变太平洋的不利局面。

周恩来通览太平洋战争的全局，高度概括了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特征，认为太平洋战争是持久战，决非速决战，决不能“冒取攻势，自陷错误”；以海军为主，空军陆军只能为辅；英、美不宜立即采取攻势，而应先巩固要塞的守卫和主要交通线；必须以持久的消耗战才能制日本最后以死命。“必需记着：生产能力是决定现代战争的主要因素”。

周恩来还进一步深刻阐明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特点，即长期性、不平衡性、全面性、一致性、阶段性、主从性。指出太平洋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懂得目前世界战局的规律，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太平洋战争的任务和进程。

这些是周恩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仅 5 天的时间里所写的文章。此后战争的整个进程，正如周恩来所预见的那样而展开的。许多事实都表明，周恩来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他总是能够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高度，以清晰的判断力和远见卓识，去认识世界战局的规律，预测战争发展的方向，进而把握中国抗日战争的大趋势，拨去层层迷雾，指导抗战沿着正确道路不断发展。

## 六、发展和完善民族革命战争的军事理论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革命进入了民族革命战争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是加强对军事工作的研究，探索民族革命战争的规律，指导抗战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游击战争，领导全国人民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斗争，周恩来是我党民族革命战争军事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之一。在八年抗战的伟大实践中，他以其高度的理论思维和丰富的实际经验，对坚持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中的军事斗争，制定正确的抗战路线、战略战术及其作战指导原则，加强抗日军队的政治建设等重大军事理论问题，都提出和阐明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为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军事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争取抗日武装领导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周恩来高度重视在统一战线内部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尤其是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独立领导权。他对各种抗日武装的军事统戡工作，在思想上有深刻的认识，在理论上有着精辟的论述。他的许多思想和观点，对建立和巩固抗日武装力量的统一战线起到了重大作用，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

第一，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是争取革命领导权问题。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比大革命时期要复杂得多，艰巨得多，能否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生死存亡。

周恩来吸取了大革命失败的深刻教训，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时候，对争取革命领导权问题给予高度重视。早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周恩来就意识到，领导权问题应该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他致电中共中央：党要“适合干新的环境，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主导者。”明确提出了争取领导权问题。1937年7月1日，他在《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告诫全党，陈独秀的根本错误是失去了独立性，做了资产阶级的尾巴，在政治、军事上放弃领导权。由于周恩来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在后来的国共两党历次谈判中，虽然在具体问题上灵活多变，但在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都据理力争，从不让步，这就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一直处于主动地位。周恩来在抗战期间，曾三次集中论述党的统一战线问题，每次都把争取领导权作为核心问题来论述。特别是在党的七大上，周恩来在《论统一战线》的报告中着重指出：“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机会主义的问题是：“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可以说

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周恩来关于争取革命领导权问题的论述，成为民族革命战争军事理论的基本前提。

第二，掌握革命武装是争取领导权的关键环节。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是武装斗争，因此掌握革命武装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争取领导权的关键环节和主要条件。周恩来较早认识到这一问题，到抗战时期认识更加深化了。西安事变时，他就意识到，必须使红军保存独立的组织领导。五次谈判时，他把保持红军的独立性，保持共产党对红军的独立领导权，作为谈判的总方针和基本原则。并在红军改编的各个环节上，都同国民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武汉抗战期间，周恩来针对王明等人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片面强调“抗战高于一切”，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放弃领导权的右倾主张，坚持认为统一战线中领导权应该拿，但“领导权要用力量来争”，因为蒋介石就是怕一个东西，怕力量。而武装工农永远是中国共产党力量的无限源泉。周恩来的这些观点，为我党坚持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独立领导，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抗日战争的历史表明，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掌握着自己的军队，才开辟了敌后战场，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进行抗战，当国共合作再度破裂时，党才有力量奋起反抗，避免重蹈大革命失败的覆辙。

第三，广泛争取抗日武装力量是争取领导权的重要方面。周恩来有一个基本思想，就是重视争取各种抗日武装力量，其原则是加强搞好关系，只要是抗日武装便与他们合作，支持他们，推动他们进步。为此，就应建立、巩固并尽可能扩大抗日武装力量的统一战线。周恩来深刻指出，有两种武装力量。一种是我们党的武装力量，另一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敌人营垒是会变化的，“有些敌人在一定条件下是有两面性的。”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时期，有许多地方实力派就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专制，有转向抗战的可能，在这一点上就可以跟他联合，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极为重视对国民党军队的影响和改造工作，一方面对其上层领导多说服，多争取；另一方面对地方实力派进行积极的军事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共同反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战和独裁政策。这不仅对扩大抗日武装力量的统一战线，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影响，有着重要意义，而且与后来解放战争中国国民党将领率部起义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 （二）全面阐述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

第一，关于全民族抗战的指导原则。1937年4月，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强调指出：“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这就明确阐述了全面抗战的指导原则。在此以后的一系列谈话或论述中，他进一步论述了全民族抗战的思想，诸如，在前线，军民坚决抵抗日军进攻；在后方，掀起全国性的救亡运动；全国各阶级、阶层都参加战斗。不仅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一部分地主买办、海外华侨等都应参加联合战线，共同反对日本侵略；各党派都要以民族存亡为重，求同存异，团结抗战；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指挥的敌后战场，战略上要互相配合，共同御侮。

第二，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在抗日战争中提出了“真正的人民战争”的理论原则，并把它提到战略的高度，贯通于八年抗战的全过程。对此，周恩来较早地提

出了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进行革命战争的思想。1936年初，他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新的形势下党的组织任务》的报告中指出，整个政治形势中心问题是开展民族战争，党的任务是团结千千万万群众在党的周围，进行革命战争。显然这是从战争全局的高度提出问题的。后来，无论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还是在华北前线；无论在武汉工作期间，还是主持南方局工作期间，他都把依靠和动员人民群众作为重要的工作来抓。

第三，关于持久制胜和游击战争的思想。抗战之初，周恩来在华北前线就提出持久制胜的思想。只有全民众起来抗战，抗战才能持久，只有坚决反对投降主义、失败主义等倾向，才能团结全华北人民全华北军队，影响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坚持华北持久抗战而取得最后胜利。1938年初，《群众周刊》发表了他的《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一文，系统地回答了持久抗战的一些重大问题。文章开宗明义：“只有持久抗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这是抗战五个月中最主要的教训！”他在批判“可以幸胜”与“和平妥协”的错误倾向后，提出为“贯彻持久抗战的基本方针，就必须对于怎样进行持久抗战，提出更积极更具体的任务，号召和动员全中国的同胞，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奋斗。”

第四，关于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的地位及相互关系。沪宁失陷后，周恩来认为就全国战场来说，今后作战，将更便于发挥中国军队在山地运动战的特长，但这并不是说阵地战就不要了，没有某些支点和要塞的顽强的防御，便不能吸引暴露敌人的兵力，阻止敌人前进，使我主力部队得以进行突击；游击战争将逐步成为主要形式。运动战是正规战的一种，并不是游击战，游击战是配合正规战的一种主要的形式。在敌人占领和包围的区域内，部队不易立足和不易集中行动的条件下，必须以游击战争为主，要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要发挥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特长，并且要在提高技术的条件和军队现代化的基础上，使我军逐步提高打阵地战的能力。

第五，关于实施持久抗战的具体办法。周恩来全面提出了坚持持久抗战的一系列具体原则和方法，主要包括，一是巩固前线，坚定持久抗战的决心。发挥运动战、山地战的特长。“改变过去某些时候专守防御的战略战术，尽一切可能求得在广大地区以运动战消灭敌人”。万一敌人突破某些支点，“必须抛弃过去全线后撤的办法，在正面留下箝制部队，坚守纵深配备的支点，将突击兵力转移到敌人的侧面后方，寻求新的机动，以迟阻敌人的继续深入。”二是发展敌人占领区的广大游击战争。应抓紧敌人的弱点，“派遣某些得力部队，到敌人占领地区的侧面后方，做游击战争的骨干，去动员组织和武装被敌摧残压迫或被欺骗的民众……去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以袭击、扰乱、疲惫、分散和吸引敌人，并配合我主力作战。”三是进行广大的征募兵役运动。“动员新兵上前线，应成为今天动员工作的中心。”政府和民众团体，应抓住这一中心工作到乡村中去直接召集群众大会，动员群众自动参军参战。”四是巩固后方，“为准备长期抗战，我们应……构筑和加强全国必要的要塞和支点，巩固全国的交通运输，特别是宣传和组织各地民众，使之适合于军事抗战的需要……肃清一切汉奸敌探……以造成统一的坚固的后方。”五是加强国防机构。改造不适合战时需要的重复的庞大的机构。军事组织，应便于指挥战争，组织战争。六是运用国际有利条件。抗战要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但我们并不反对运用国际环境中存在着和发展着的有利条件。特别重要的是，要利用各国可能的赞助。（三）系统总结抗日军队加

强政治建设的新理论和新特点抗日战争初期，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同时担任中共代表团主要负责人，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等职。他常常以双重身分，既十分关心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政治建设，又关心其他抗日军队的政治建设，他结合民族革命战争的新情况，对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及其基本理论、原则、制度等重大问题，都作了深刻地论述，并不断总结了新的经验。第一，进一步阐明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地位与作用。周恩来针对民族抗战的特点，提出“革命的政治工作是民族革命的生命线”的论断，认为“改造军队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只有在抗战军队中把政治工作实际地建立起来，才能把民族抗战的战斗力提高，才能把官与兵、军与民联结成一条心，象一个人一样，为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战斗到底！”他指出，北伐战争所以能节节胜利，一个铁的事实教训，是以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为中心，继续成立新的军队，改造旧的军队。苏联红军，我党领导的红军，所以能经住长期斗争的考验，主要原因“就是由于革命军队有坚强的革命政治工作！”他肯定他说：“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在此基础上，周恩来有力地批判了对政治工作的误解或偏见。有人说，政治工作是空谈，是“卖狗皮膏药”；政治工作影响关系，增加磨擦；不能指挥士兵和人民。针对这些论调，他指出：“这些非难政治工作的理由，不是不了解政治工作的实际意义，就是故意反对军队中的革命政治工作，而不想军队革命化。政治工作之变为空谈，这决不是政治工作的本身错误，而是由于政治工作人员没有实行真正的革命的政治工作。”

第二，阐明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目的和基本任务。周恩来指出：“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基本目的，是提高革命军队的战斗力，保证战争的胜利，是使军队本身团结起来，军队与人民结合起来。”政治工作基本任务：一是保证党现阶段总任务的实现，“使全国军民上下一心，军民一体……坚持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二是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全国军队的革命的政治工作，必须恢复以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为基础，革命的三大政策为骨干”。对八路军、新四军来说，虽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了，但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路线则是军队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共产党对军队必须实施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领导。三是保证革命军队的自身建设，使之沿着“军队革命化”的方向发展壮大。

第三，进一步论述了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我军政治工作早已形成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三大原则。周恩来在抗战时期，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进一步阐明三大原则。他说：“我以为革命政治工作应分为军队，居民、敌军三方面的工作。”他紧紧围绕着这三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论述，阐明军队内部的团结，军民团结和对敌军的政治瓦解，已形成战争制胜的强大政治因素。在军队内部，他强调实行革命的政治教育，提高官兵的民族觉悟及自我牺牲精神；努力注意改善士兵待遇与生活，使官兵生活愉快与兴奋；建立革命军队自觉的革命风纪；保障军事指挥员的行政命令的贯彻执行；强调政治工作人员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对人民群众，他强调保护人民利益，使军民打成一片；组织人民，武装人民，动员广大人民参战；发动人民肃清汉奸，捕灭间谍、奸细。对敌军经常进行宣传煽动，使敌军瓦解和涣散；在火线进行喊话，或散放传单，使敌动摇，禁止虐待俘虏，经过优待、教育、解释后，立即把他们放回去。

第四，恢复和发展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制度。我军政治工作基本制度，除党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外，政治工作本身还有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制度。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根据国共双方协议，取消了政治委员，改行“一长制”，政治委员改为军事副职，政治部（处）改为政训处。这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建设和所担负的任务均极不适应。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1937年10月22日决定，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第二年1月，周恩来指出：“应排除一切忽视政治工作，把政治机关看成点缀品，装门面的错误观念。”在十年内战中，国民党军队的政训处，大多数变成了进行反共宣传、侦探和监视官兵思想和行动的特务机构。对此周恩来有清醒的认识，指出：“大革命时代军队的政治组织与制度已不复存在于现在的所谓政训处中。”“要进行革命的政治工作，获得政治工作的完满效果，必须建立严格的政治工作制度与健全的政治工作组织。”“必须在军队的各级，从最高的全国的总政治部直到连队的政治指导员，建立其独立的组织系统。”在政治工作的方法上，他强调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灵活的方式去进行，不要造成军事与政治对立，不要造成格格不入的现象，不要脱离军民。要以耐心说服诱导的精神，争取官兵和人民的信仰，团结他们在革命主义与政纲的领导下而坚决奋斗。”

## 第八章 力争实现和平民主，准备自卫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饱受长期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与安定，迫切需要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积极准备发动新的大规模内战，并假意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企图以此欺骗人民，掩护内战准备，并诱使共产党人交出军队，中共中央一方面对蒋介石的阴谋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时刻准备用战斗来粉碎国民党可能向解放区发动的进攻；另一方面决定同国民党进行谈判，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的意愿，实行一定的政治改革，以维持国内和平，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为此，中国共产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到重庆与蒋介石国民党谈判，力争制止内战爆发，商讨民主建国的大政方针。在重庆和谈期间，周恩来负责同国民党代表进行有关具体问题的谈判。通过艰苦复杂的谈判斗争，在解放区军民胜利反击国民党军队军事进犯的有力配合下，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虽然国民党代表在“协定”上签了字，但是蒋介石仍命令其军队不断向解放区进犯。为此，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同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继续就“停战”、“整军”、“军事冲突”等问题进行谈判。在谈判斗争中，周恩来深刻揭露蒋介石扩大内战的阴谋，维护停战协定，推延和限制内战的升级，为人民解放战争赢得了宝贵的准备时间。在蒋介石内战阴谋彻底暴露后，周恩来继续利用谈判斗争，收集军事情报，组织领导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反内战运动和敌后游击战争，开展敌军工作，分化瓦解敌军，为配合解放区战场作战做了大量艰苦细致和卓有成效的工作。近一年的谈判斗争，充分显示了周恩来善于根据国际国内政治风云的变幻，把军事斗争和谈判斗争完美结合起来的高超斗争艺术。

### 一、确保抗战胜利后人民军队的战略主动地位

中国人民经过 14 年的浴血奋战，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一道，给日本军国主义以极其沉重的打击。到 1945 年 8 月，日本军国主义已濒临崩溃的边缘。8 月 8 日，苏联政府在法西斯德国宣布投降 3 个月之后，对日宣战，使日本企图争取苏联保持中立，与美、英两国实现有条件议和的幻想最后破灭。8 月 10 日，日本政府被迫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请求无条件投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在这急剧变化的世界风云面前如何把握准中国人民革命的方向，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的严峻考验。已经有着 24 年斗争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以坚定的意志和信念，排除国内外各个方面的干扰和破坏，拨开重重迷雾，始终牢牢把握着中国革命航船的方向，并把它引向胜利的彼岸。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也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无论是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还是对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都有着深刻的认识。

前苏联是打败法西斯德国的主要力量。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要强国之一。这不仅对美国企图称霸世界的野心起着限制作用，而且对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起着支持作用。东欧、东南欧及亚洲一些国家先后建立起人民民主制度，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成为战后世界政治格局中一支强大的力量，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力量



的对比。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和军事强国。它依恃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充当世界反动势力的堡垒和国际宪兵。企图控制欧洲乃至全世界。在打着“遏制苏联势力”的旗号下，美国竭力帮助战败国建立“和平民主政府”，叫嚣要“运用他们的力量命令全世界朝着美国模式的民主资本主义走去”，反对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美国虽然把欧洲作为战略重点，但又把中国划入其势力范围，认为中国是亚洲的重心，夺取了中国，就巩固了它在亚洲的地位，就可以集中力量控制欧洲，并称霸世界。

前苏联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抱有很高的警惕，力图在自己周围建立起一个“缓冲地区”，以便于同美国的遏制战略相抗衡。但是美苏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都极力避免直接相撞，而把争夺的场所置于欧、亚等广大中间地带。

在国内，中国人民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得到了锻炼，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成为一个拥有 120 多万党员的大党，创造了有 1 亿多人口的解放区，并锻炼出一个能够正确把握政治斗争方向和驾驭整个革命战争的领导集体，人民军队发展到 120 余万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人民中的威望空前提高，共产党提出的“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方针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所有这些，在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上，都是不曾有过的。

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将其大部分军队退缩到西南和西北地区，以保存实力。到 1945 年 7 月，其陆军总兵力已达 524 万余人，准备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从人民手中夺取抗战胜利果实。在政治上，国民党统治集团继续坚持反动政策，实行法西斯统治，受到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国民党内民主派人士的强烈反对。在经济上，国民党及其控制的政府日趋腐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果夫）四大家族利用特权控制国家主要经济命脉，攫取巨额资产，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到处出现民生凋敝，民怨沸腾的严重局面，国民党已陷于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之中。

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础。大会明确指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后，中国存在着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为了实现这一伟大任务，在军事上“解放区的军队应向一切被敌伪占领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的进攻，借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为了抗战的胜利和制止内战的危险，“主力军、地方军、游击队、民兵都还要扩大”，“并逐渐准备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扩大解放区应注意争取东北。他说：“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这样“我们的胜利就有基础”，现在我们“有基础，但是还不巩固”，“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么，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清醒地看到，要实现这一伟大任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有许多困难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面前。

第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代表着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的利益同广大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为了维护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和政治上的独裁统治，蒋介石积极准备发动新的大规模内战，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1945年5月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公开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这就为国民党制定了一条抗战胜利后决心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的政治路线。

第二，美国政府为了在战后形成对苏联的战略包围态势，把中国视为这个战略包围圈在东方的主要环节。因此，在抗日战争后期，美国一改过去“扶蒋用共”的政策，转而实行彻底支持蒋介石的政策，1945年4月2日，美国驻华大使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公开阐述美国“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他说，美国方面曾过分估计了共产党武装的力量，“而最强大的力量，依然是重庆的国民政府。”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阻止中国的统一。美国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政府，并且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上支持它”。美国企图从政治、军事、外交诸方面向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以建立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进而把中国置于美国的势力范围。

第三，苏联从其自身利益和对抗美国的国际战略考虑，确定在欧洲集中主要力量与美国抗衡，在亚洲获得一定政治、经济、军事利益的前提下，与美国达成某种妥协。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雅尔培举行会议，以有损于中国主权和利益为条件，达成了“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及“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的协议。此后不久，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一系列“协定”，使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获得了许多特权。苏联领导人企图藉此防止美国势力伸向东，北，以屏障其在远东的安全。作为交换条件，苏联承认并在道义上物资上援助“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在战争结束后将东北的行政大权交给国民党政府。为了尽力拉住蒋介石使其不完全倒向美国，苏联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与国民政府妥协，以避免内战。斯大林曾说：“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发展起义的条件，中国同志应当同蒋介石达成维持正常关系的暂定条款，并解散自己的军队。”苏联的这种政策，给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带来困难，并使中国共产党在确定自己的革命策略时面临着复杂的情况。

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共中央坚持党的“七大”提出的正确方向，制定了以真和平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假和平，以军事自卫对付蒋介石军事进攻的方针，并且将这个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强调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为了实现党的任务，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七大”刚开完不久，6月16日，周恩来在起草中共中央给广东区党委的指示中指出：“美政府目前政策是在扶蒋抗日反共。”“因此，我党除在华北、华中扩大武装、扩大解放区外，还须在华南利用目前有利条件，迅速建立战略根据地，以便在敌人败退时，我华南武装，能进退有据，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你们能配合全国起来，制止内战。”第二天，他在给王若飞的电报中强调指出，蒋的内战方针是确定了的，除非我们有力量胜过他，才能制止之。在大后方，

应着重农村武装斗争之积极准备及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他还指示南方局要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民主人士的宣传和联络工作，特别是同国民党军队的联络，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以便在情况变化时，能与我们一道起来制止内战。

1945年8月10日，日本请求投降，战局骤然变化，抗日战争即将结束。这比中共中央原先预计“大约日寇溃败国民党反攻仅有一年至一年半左右时间”大大提前了。在形势急剧变化的关键时刻，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当即为延安总部起草了命令解放区各武装部队向日军发起全面反攻的电文。命令要求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这是中国抗日军队发出的第一个对日本侵略者进行最后一战的命令。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又连续为延安总部起草了给各解放区的五道命令。第二号命令要求：“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二、原东北军张学待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第三号命令要求晋绥解放区和晋察冀解放区的八路军向北发展进攻，“准备接受日‘蒙’敌伪军投降”。第四号命令要求所有驻山西的人民抗日武装统归贺龙指挥，“实施肃清同蒲路沿线及汾河流域之敌伪军，并准备接受敌伪军投降与进入太原之任务”。第五号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所有沿北宁路、平绥路、平汉路、同蒲路、德石路、正太路、白晋路、道清路、津浦路、陇海路、粤汉路、沪宁路、京芜路、沪杭甬路、广九路、潮汕路等铁路线及其他解放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两侧之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统应积极举行进攻，迫敌伪无条件投降。”第六号命令要求在“华北对日作战之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

这六份命令言简意赅，一气呵成，它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敌后人民抗日武装对日寇最后一战的总的作战方针、计划和部署。第一个命令可以说是总任务总方针；第二个命令规定了占领东北是整个任务中的重点；第三个命令则可以防止离东北最近的驻绥远国民党军队的袭击，保障进军东北部队的侧翼安全，放手开辟东北根据地；第四个命令是力争控制山西进而控制华北，牵制晋西、豫西、陕西的国民党军队，保障进军东北部队的后方安全。第五个命令则是要求全面控制通过所有解放区的交通运输线，迟滞国民党军队抢占东北的行动，为进军东北的人民抗日武装争取更多的时间。第六个命令要求在中国解放区的朝鲜义勇军迅速配合苏军收复自己的国土，有利于我八路军、新四军部队进入东北。后来实际上有一些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和小部分部队就是假道朝鲜去东北的。命令从战略构想、组织指挥、斗争策略三个方面体现了周恩来卓越的军事才能。

周恩来看到东北地区东、北两面背靠苏联，西面是蒙古，东南面是朝鲜，西南与冀热辽解放区相连，并与山东解放区隔海相望，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在经济上，东北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钢铁和煤

炭的产量占全国的绝大多数，铁路、公路各占全国的一半，是中国主要产粮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如果能控制东北，并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将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非常有利于人民革命力量的积蓄和生长，还可以与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这不仅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人民革命力量长期在战略上受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的局面，而且可以使东北成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重要基地。“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队主要力量大都退居大西南，远离东北，中间隔着大片解放区，陆路不通，海上空中运输困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抗日武装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当时正配合苏军迅速进占东北各战略要地和大中城市。因此，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迅速抢占东北，使人民革命力量保持战略上的主动地位。

为了实现占领东北的战略设想，周恩来首先命令靠近东北的各解放区迅速组织力量出兵东北，然后部署各个老解放区的作战行动，使之相互连接成一个有掩护、有牵制、有保障的有机整体。华北是关内陆路通往东北的必经之地。蒋介石要想抢占东北，必先夺取华北。8月13日，蒋介石制定了借受降之机向解放区进攻的部署，其中把主要力量投入华北和东北战场。周恩来的周密部署和指挥为后来有效地迟滞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起草的命令中都是要求原东北军将领和朝鲜义勇队领导人率部出兵东北，这样在同国民党的谈判斗争中，就可占据主动，也可以在国际上产生影响，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后来中共中央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专门发出指示：“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要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的力量，但在东北决不能采用八路军的番号，也不能用共产党的公开名义和红军接洽并取得其帮助，而只能用东北地方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如东北人民自治军，某某省防军，保安旅团，县、区、乡队，工人自卫队等）及非共产党的面目，才能与红军指挥机关作正式接洽，并可取得红军的各种帮助及委任。”这说明通过抗日战争的锻炼，周恩来已具备了国际斗争的丰富经验。

周恩来起草的这几份命令为后来中共中央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力确保人民军队的战略主动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命令也充分体现了周恩来深邃的战略远见，高超的组织指挥艺术和巧妙的斗争策略。

## 二、尊重人民意愿，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而斗争

抗日战争中壮大了的人民革命力量，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不惜一切地要消灭共产党、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为蒋介石提供了再次发动反共反人民罪恶内战的时机。他不择一切手段，要从人民手中夺取胜利成果。8月11日，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疯狂地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并接连下了四道命令，第一道命令要求国民党军队：“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千万不要等中共部队已经把包围圈中的敌伪解决了才到。第二道命令要求日伪军将领坚守原有阵地，只向蒋介石的部队投降。第三道命令要求第十人集团军朱德总司令的部队“留守原地，听候命令，不准受降！”第四道命令要求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蒋介石军队接收之前负责做好有效的防

御，“如有共军所占领，日军应负责任，并由日军将其收复，再交还中央接收部队！”8月15日，蒋介石的发言人宣布，“委员长之命令，必须服从”，“违反者即为人民之公敌”。蒋介石的无理要求，当然地遭到人民的拒绝。8月13日，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新华社评论，严词批驳蒋介石荒谬绝伦的“命令”。评论指出：“根据这种意见，可以逻辑地解释为朱总司令根据波茨坦宣言及敌人投降的意向，下令给所属部队促使敌伪投降，倒反错了；应该劝使敌伪拒绝投降，才是对的，才算合法”。评论尖锐地指出，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现在惟有呼吁全国同胞、世界盟邦一致起来，和解放区人民一道，坚决制止这个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国内战。”

解放区人民的正义立场，使蒋介石迅速夺取全国大中城市和抢占东北的企图无法实现。美国总统杜鲁门认为：“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由于共产党人占领了铁路线中间的地方，蒋介石要想占领东北和中南就不可能。事情很清楚摆在我们面前，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因此，我们便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并开进海港，我们便将他们送回日本。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正是在美国政府的唆使下，蒋介石采取了一种缓兵之计，企图用“和平谈判”来麻痹共产党，欺骗人民群众，为他调兵遣将，部署内战争取时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共两党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谈判斗争。

#### （一）重庆谈判

蒋介石一方面继续整军备战，不断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另一方面，他于8月14日、20日和23日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8月2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刊出蒋介石给延安第二封邀请电报后，总编辑陈训恂说：“双方距离这样远，”共产党的态度这样坚决，怎么会来谈判嘛！”社长胡建中说，陈立夫“不赞成这种搞法，他认为与共产党谈判只会助长共产党的声势。他说对共产党的问题只有动大手术才行。”总主笔陶希圣说：“现在动大手术也不是时候，国内有厌战情绪，国际形势也不允许中国打内战，一打起来我们更被动，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好做。”由此可见，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做的是官样文章。如果毛泽东不去，他就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头上。其用心是十分险恶的。

中国共产党接到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的电报后，尽管知道这是蒋介石玩弄的阴谋诡计，但是，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也为了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揭露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的真面目，以利于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决定派遣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到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中共中央的这个决定是十分慎重的，是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并研究了具体对策后作出的。周恩来在中央作出这个决策的前前后后，做了许多工作。

8月14日，在接到蒋介石第一封邀请电后，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重庆南方局的指示电，揭露了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的骗局，通报了党

中央反对内战的方针，指出：“国共谈判，蒋之三月一日演说已拒绝于先，六参政员携回方案又被拒绝于后，而且又骂我们为人民公敌，故请毛往渝全系欺骗。”我们“应集中于宣传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主张和平、主张民主四个口号”，“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均极有利于我们反对蒋之内战，望坚持此方针，以便放手动员群众，巩固和发展我们已得的胜利。”8月20日，蒋介石发出第二封电邀毛泽东赴重庆的电报。8月22日，毛泽东电复蒋介石：“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周恩来为谈判做了许多细致的准备，草拟了准备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紧急要求12条，主要内容有：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及抗日军队；撤退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划定中共军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解放区抗日军队有权派代表参加处置日本投降后的一切重要工作，严惩汉奸，解散伪军，释放爱国政治犯；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特务机关，取消一切妨碍人民自由的法令和新闻出版物的检查条例；召开政治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积极措施，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周恩来草拟的12条经毛泽东看后，又增加了两条，成为14条。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研究后，改写成《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同时，会议决定由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会上，周恩来强调指出，从抗战转到和平，实现这个方针的后盾一个是力量，一个是人心。8月23日，蒋介石第三次发出邀请毛泽东赴渝的电报。8月25日，中共中央经过反复权衡利弊之后，决定同意毛泽东去重庆，周恩来、王若飞与毛泽东同去重庆参加谈判。8月26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研究在谈判中作出一定让步的问题，并且向全党发出通告，对谈判可能出现的结果向全党作了周密的分析，要求全党必须做好充分准备，防止敌人的各种阴谋。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行，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的陪同下，乘飞机抵达重庆。

毛泽东到重庆的消息震惊了全国和世界，国内外记者纷纷报道毛泽东抵渝盛况，称颂毛泽东的伟大气魄与胆略，赞扬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社会舆论同声期望国共两党会谈成功。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毛泽东与蒋介石就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多次直接商谈。具体问题的谈判，由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进行。

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没有真正的诚意，根本就没有准备谈判方案。9月3日，周恩来和王若飞向国民党代表提出11条建议，作为两党谈判之方案。这11条建议的要点是：

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民主义；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三、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六、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八、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各项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十一、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

这11条建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实现和平、团结、民主的愿望出发，以国共两党现有的政治军事力量的实际状况为基础，并在作出许多重大让步的情况

下提出的。

但是，国民党方面却连把这 11 条建议作为双方讨论的基础也不愿意接受。这次谈判，蒋介石的方针是，准备在政治上作出一些关于开放民主、自由的空头许诺，但一定要在“政令军令统一”的名义下，取消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因此，国民党方面对中共代表提出的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党派合法平等、结束党治、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项方案，表示接受；但对于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的地位却坚决不予承认。这些问题成为谈判中争论的中心问题。

为了使谈判能够成功，周恩来、王若飞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并且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先后多次作出让步。比如，在承认解放区人民政权合法地位的前提下，解放区各级政府可以重新举行人民普选，选出的各级政府由国民政府加委；在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原则下，中共愿将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按照与国民党军队 1：6 的比例缩编为 24 个师或至少 20 个师，并且可以把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 8 个解放区的部队撤退到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但是国民党代表仍然不肯接受中共的要求，坚持中共领导的军队至多不能超过 5 个军 16 个师。

很明显，蒋介石在故意拖延时间，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9 月 20 日，他密令各战区司令长官：“目前与好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好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在谈判已延续近 1 个月，仍处在僵持的状态下，周恩来在 21 日的会议上愤怒地指出：“今日我等之商谈，系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故国民党及其政府皆视我党为被统治者，自西安事变以来即一贯如此。”周恩来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作了说明：“现在政府尚在国民党党治时期，我们何能将军队、政府交与一党政府。因此政府今日欲求达到统一全国军政之理想，必须采取民主之方式，循一定之步骤，而非可一步登天，一蹴即就。”并且正告国民党代表们：“过去在抗战期间，两方商谈可以拖延，问题可以僵持。现在和平建国时期，问题之解决，必须从速，双方商谈不能拖延，亦不容僵持。”并决定暂时中止同国民党代表的谈判。

在此期间，晋冀鲁豫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发起了上党战役，重新夺回了被国民党从八路军手中强占去的六座城市，并消灭国民党军 3 万余人。其他解放区也纷纷给入侵的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

国民党方面看到，一味施加高压是无法使中共屈服的，而且这次谈判是举世瞩目的，如果谈判破裂，或无结果而散，就难以向国内外作出交待。因此，谈判刚中断 3 天，国民党谈判代表就坐不住了，主动找中共代表要求重开谈判，并宴请周恩来、王若飞等，表示军队问题基本上已有结论，尽快商量解放区问题和政治问题。重开谈判后，进展比前一段要顺利些。由于周恩来等人的努力和诚意，终于使谈判有了进展。10 月 5 日，周恩来将他起草的《会谈纪要》提交讨论。《会谈纪要》写得很有特色，不仅把双方一致同意的内容在文字上确定下来，并且对没有取得一致的问题也分别说明双方各自的看法，在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上还说明了中共方面先后提出的 4 种解决方案和双方目前争执所在，表明了继续商谈的愿望。10 月 10 日下午，《政府

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终于在曾家岩桂花园客厅内签字。第二天，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留在重庆就解放区问题和政权问题继续同国民党方面谈判。12日，《会谈纪要》由国共双方公布。

这个《会谈纪要》的产生，是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而得来的，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重庆会谈纪要是恩来同志起草的，采纳国民党方面意见略有修改。”“这个东西，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未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

## （二）停战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

国共双方虽然达成了初步协议，但最重要的是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推进的问题没有解决。国民党方面坚持将他们的军队开赴一切敌占区受降，而不准中共领导的军队受降。这样，《会谈纪要》签订没多久，蒋介石就扩大进攻解放区的规模。10月19日，蒋介石又发布进攻解放区的密令，要求国民党军队将领按照他所订的《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国民党军队沿着平汉、同蒲、正大、平绥、津浦5条主要铁路线，气势汹汹地向解放区推进，企图割裂华北解放区，抢占北平、天津，进而夺取东北，力图在战场上用武力解决问题。

在重庆坚持谈判斗争的周恩来坚定他说：“和平方针是矛，坚强抵抗是盾。战而遇到抵抗，使其知难而退，便会走向和。”“我们今后谈判的方针，应本着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基本方针，实行政治进攻、军事自卫的原则，确定双十会谈纪要我方提案为基本价钱，来进行‘边谈边打’的谈判。”在谈判中，周恩来始终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例如，在解放区的地位问题上，周恩来认为：“对中国人民来说，根据地比什么都重要，武装固然重要，但武装毕竟是保持根据地的工具，武装脱离了根据地就无法生存。蒋看清了这点，他也特别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此，他无论如何不承认。”周恩来在谈判中则针锋相对，始终坚持国民党必须承认解放区的合法地位，国民党军应该全面停止向解放区进攻，从侵占区全部撤退，从8条铁路线撤退；取消各地“剿匪”命令；保证再不进攻解放区。双方争执不下，谈不到一起。11月25日，周恩来返回延安。

经过3个月的激烈战斗，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大举进犯全面受挫。在主要方向上，沿平汉路北犯的国民党军受到晋冀鲁豫地区解放军的顽强阻击，成功地争取了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1万余人起义，并全歼马法武部2.3万余人。在绥远，解放军收复丰镇、集宁、卓资山、陶林、凉城、和林等地，阻止了傅作义部进攻张家口的企图。新四军和山东军区解放军发起津浦路战役，挫败了国民党军打通津浦路的企图。在同蒲路南段，太岳军区解放军解放县城4座，控制公路铁路110余公里，切断了国民党军南北联系。这些胜利，有效地掩护了八路军、新四军进军东北的行动。

3个月的局部性内战证明，尽管美国尽一切可能帮助蒋介石运送了5个军到山海关，2个军到华北，2个军到山东，但他的绝大部分兵力还在西南，华北的兵力仍然不足，无法继续打下去。这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再次跳出来替蒋介石献策。杜鲁门认为国民党“绝对没有能力用军事手段镇压共产党”，相反，大规模内战却可能导致“共产党控制全中国”。12月15日，他发表对华政策声明，提出：“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谋早日解决



目前的内争——以促成中国之统一。”并派马歇尔为美国总统特使赴华进行“调处”。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发表公报，声明坚持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政策。蒋介石在美国政府的唆使下，又重新高唱起“和谈”的调子来。

周恩来认为国内国际的各种因素使内战有可能暂时停止，和平谈判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的任务是：为了配合军事自卫，开展政治攻势，也准备寻求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应当要求在全面停战、实现双十公告后才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目前，应以政治协商会议为我方进行政治攻势的主要讲坛，辅之以国共的幕后商谈。不要希望这次商谈有什么大结果，要准备在‘政协’中以政治攻势和国民党撕杀一场，也可能在撕杀中得到一些结果。为在‘政协’中采取政治攻势，其提案应着重于民主问题，国共商谈亦当以此为标准。”

12月16日，周恩来同中国共产党准备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们一起到达重庆。18日，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中共代表这次来渝，一方面是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另一方面是要继续国共之间的谈判，其中首先待解决的问题是停止内战的问题。以后在与马歇尔会谈时，周恩来再次表示，希望在国内实现停战和建立联合政府。“我们欢迎外来的友谊协助”，“同时也愿望盟国能恪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诺言。”

经过反复磋商，1946年1月7日，由国民党代表张群、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组成“三人会议”，会商解决军事冲突及有关问题。从此，美国代表正式介入国共停战谈判，国共双方的谈判转到“三人会议”内进行。1月10日，周恩来和张群正式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等4份文件。美国代表马歇尔也在有关的文件上签了字。命令规定：“一切战斗行动，立即停止”；“除另有规定者外，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为实行停战协定，应即在北平设一军事调处执行部，该执行部由委员三人组成之”，分别代表共产党、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

这样，战争在全国范围内暂时停止了一个时期，给经历了长期战乱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也为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扫清了道路。

1946年1月10日上午10时，举世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的国民政府礼堂开幕。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民主同盟和社会贤达五方面的代表共38人，共同就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军事、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5个问题进行讨论。

讨论之前，周恩来在会上回顾了国共谈判9年的历史，语重心长地总结了4点经验教训，作为政治协商会议的借鉴。他说：

“第一点是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既然商谈了，就是要政治解决，也就应该互相承认，不应互相敌视，尤其是商谈的双方代表，更要常常保持这种态度。

“第二点是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既然是政治解决，就是要互相协议，而不是一方面决定了，通知别方面去做，这样是无法求得解决的。

“第三点是互相让步，不要独霸。既然政治解决，总是要于国家人民事业有利。既然于国家人民事业有利，那么两党之间、各方面之间，有什么不可以让步的？

“第四点是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我们觉得既是政治解决，求合

作，那么两党也好，各方面也好，总有些意见不同，应该在工作上竞赛，在地方上努力，而不是说，你做好了，我不高兴，或者这一方面做好了，那一方面不高兴。”

周恩来的发言对开好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具有重要作用。

在讨论改组政府和施政纲领时，中共代表董必武系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国、人民自由权利、结束训政、扩大政府民主基础、筹备国大、制定宪法、实行地方自治、整编全国军队等十项主张。周恩来作了补充发言。他还特别提出要立即释放“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的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

在讨论军队问题时，争论异常激烈。国民党代表提出必须由共产党先交出军队，然后它才能开放民主。周恩来批驳说，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要同时实行，不能认为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军队是从人民来的，只有军队能真正保护人民利益，才能保护国家，才能保护民族。”并表示，同意成立一个委员会，执行整编全国军队的任务；同意全国整编与大量裁兵的原则；凡是抗日有功的军队，应该一面承认，一面整编；要改革军队的制度与教育；地方治安应由地方的保安队或自卫队负责维持。

政治协商会议历时 22 天。其间，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反动分子不断对政协进行低毁和攻击。蒋介石称：“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陈果夫则称，中国如行多党政治，照现在党政、军政未健全之际，颇有蹈覆辙之可能，请悬崖勒马，另行途径。何应钦等则发出血腥叫嚣，反对政协会议，反对裁军，宣称要以武力收复东北并继续“剿匪”。他们还不断派出特务、打手，破坏会议，殴打代表，捣毁《新华日报》社，写恐吓信等，无所不用其极。会议排除了这些干扰和破坏，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后，于 1946 年 1 月 31 日闭幕。

政协协议虽然还不是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但它在实质上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在当时条件下基本符合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协议的通过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亲密合作并同国民党内坚持民主进步的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中国人民的政治胜利。会后，军事三人小组经过协商，达成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这个方案规定，全国陆军为 108 个师，其中中共军队为 18 个师。怎样看待这个方案呢？周恩来说：“整军方案是使中国人民的武装受束缚的，但也受保障的，这有它的两面性。在数目上，五十比十，对我们是一个束缚，但也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规定要经过美国装备，我们的十个师也包括在内。”“美国人是想经过这些东西来控制我们，但这是否能把我们完全困死了呢？不会的。整军方案还有它好的一面，这就是地方自治。人民的武装是地方自治的东西，六十个师只是在国防上的。地方自治要依靠人民的武装的自卫，我们这里已经自治了，不再需要国家的军队来防匪了，这样就保障了我们解放区人民自己的武装下受国家军队的干涉。”他还指出：“在整军方案中，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与蒋军的平等地位。抗战八年，蒋以他的统帅地位来压我们，但在谈判过程中，马歇尔来后，为了套我们，在地位上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与蒋军的平等地位，结果蒋成了一方面的统帅，而不是两方面的统帅。”

周恩来为这个胜利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 三、维护停战协定的斗争

整军方案签订后，周恩来、张治中和马歇尔飞往各地视察。这期间，国民党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说：“政治协商会议所决定的修改宪草原则有若干点实在与五权宪法的精神相违背”，“我绝对不会抛弃五权宪法而不顾的。”会议全面否定政协协议中规定的一切民主原则，顽固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制度。会上竟然要求把各民主党派推选的国民政府委员拿到国民党中常委会“选任”。会议还提出对宪法草案通过五点修正原则。企图推翻政协修改宪法草案的原则，不受政协决议的约束。在整军和停战问题上，也违反政协决议和整军方案的规定。

对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驳斥。中共中央表示将“绝不动摇地坚持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决议，特别是宪法原则决议，必须百分之百实现，反对有任何修改，并呼吁一切民主人士与全国人民准备为此神圣的任务进行严重的奋斗。”周恩来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指出蒋介石的行为是一种欺骗。“我们不受骗，也决不去骗人民。我们要向人民说真话，说实事，一定要先弄清楚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定是想做些什么？这不是一人或一党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欺骗老百姓的问题。”他严正警告那些企图破坏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的人：“我觉得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这是由五方面代表起立通过的，应成为中国的民主契约。谁要破坏，谁就是破坏今天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

蒋介石不顾中国人民的反对，一意孤行，再次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全国政治局势迅速逆转。周恩来与国民党的谈判进入一个为维护停战协定的艰难阶段。

蒋介石再次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东北。停战令下达后，蒋介石请美国集中第七舰队的运输舰将其精锐的新一军、新六军等5个军运抵秦皇岛，转赴东北，加上先期到达东北的两个军，国民党军在东北的部队猛增至7个军共28.5万人。这些部队大多是美械装备。东北上空战云密布，大战一触即发。2月24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东北问题将为斗争焦点，对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请予防范和准备。3月初，苏联驻东北的部队开始撤军。3月13日，国民党军队随着苏军的撤退进驻沈阳。随后，国民党军分南北两路向解放区进攻，先后占领了抚顺、辽阳、铁岭、营口等城，扩展他们的控制区。蒋介石自以为得计，企图乘机夺取整个东北。3月22日，他命令其精锐部队向沈阳以北的战略要地四平发动进攻。在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领导下，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进行了顽强阻击，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进攻。周恩来在重庆与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代表紧急磋商，确定立即由军事调处执行部派遣执行小组到东北调处停止冲突。蒋介石却一意孤行，蛮横地拒不承认在东北的中共军队和民主政权。他在国民参政会上公开声称：“我们中央对于东北的职责，现在只有接收领土，恢复主权行政的完整。”“我们可以说东北9省（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将东北划为9省——作者注）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问题可言。”“军事冲突的调处，只在不影响政府接收主权、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前提之下进行。”他还说：“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政府组织的协议案在本质上更不能够代替约法。”

蒋介石的言行，已公开表明他决心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大规模内战。周

周恩来立即采取各种对策应付不断恶化的形势。4月2日，他打电报给东北局，指出，照目前情况看，四平街、本溪、鞍山都有失掉的危险，长春也暂难为我所有。我们不如以消灭蒋军为主，守城为次，这样较易争取主动，打得蒋痛，以利谈判。4月5日，他再次致电中共中央，强调：“东北应准备大打，决勿幻想国方能让步。关内，国方重在蚕食封锁与破坏，我拟进一步揭穿之，将关内问题与东北问题联起来解决。”中共中央完全赞同周恩来的意见，当即复电：“情况估计及应付方针甚为正确，望坚决执行。”4月8日，周恩来再次将美国企图帮助蒋介石抢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的情报转告中央，并建议，非打不足杀其威风。

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真相。4月4日，周恩来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批驳所谓共产党没有在东北抗日的谬论。尖锐指出：“究竟是谁把东北断送了？谁又在东北组织了游击队，发展为抗日联军，坚持了十四年的抗日战争？谁在抗战中主张恢复‘七七’事变时的国土就够了？谁又坚决主张打到鸭绿江边？中共在东北的抗战，连日寇也承认，八路军二十六年（1938年）打到热河，二十八年（1939年）打进辽宁，创造了冀热辽军区，谁能抹杀这许多事实？准还能说十四年来中共未在东北抗过日？未组织过抗日联军？没有共产党员被敌人捕杀？甚至敌人投降前，东北并无中共部队？”使人们再次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真抗日，而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丑恶嘴脸。

周恩来还多次会见马歇尔，利用马歇尔伪装公正的假面具，以牵制蒋介石的行动。他对马歇尔说：“他们既然不遵守这些条款，我们便被迫要采取自卫的行动，也没有再遵守条约的义务，这样使得过去的约束不再生效了！”同时又指出：“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是愿意停战的，我们希望停了以后来谈一切，我们也愿意承认国民党军队的地位。这是我们和他们不同之点。”他还指出，蒋介石不愿承认中共已有力量的地区，凡是能用武力则用武力，只有不得已时才能谈判；而在谈判中又认为他是中央，一切得听他的命令，只在被迫时才让一点，因此很难协商。但是，他仍尽一切努力求得问题的解决。周恩来犀利而又巧妙的言辞，使得马歇尔进退维谷，无言以答。事后，马歇尔承认，周恩来是他从未遇到过的外交对手。

此时，各民主党派也多方奔走呼吁，停止内战。4月29日，民主同盟再次提出一个新的调停方案：中共军队退出长春，国民党只派行政人员进入长春和平接收，不得派军队进入；同时国共重开谈判，依据政协决议和整军方案的精神解决东北问题。马歇尔当着民主人士的面说这个提案很有意义，但是第二天一早就辞而别，溜之大吉。民盟的努力又告失败。可以想见，正是在美国政府的怂恿和唆使下，蒋介石才在东北大打出手，为美国人火中取栗。

谈判斗争是一场为人民忍辱负重的战斗！面对复杂而艰巨的谈判斗争，周恩来曾感慨他说：“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谈商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我虽然将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又最艰苦的一段路！”

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街鹿麇整整1个月，利用劣势装备，顽强抗击国民党军在飞机、大炮、坦克掩护下轮番疯狂进攻，以伤亡8000余人的代价，歼敌1万余人，显示了东北民主联军的战斗力。这对于配合东北的和平谈判，

推迟国民党军队的北进计划，开辟与巩固北满根据地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鉴于国民党军队大量增兵，死守不利，5月19日，东北民主联军撤出口平街，并撤出长春，一部分主力转至松花江北岸休整，其余部队分别转向西满和东满建设根据地。国民党军于5月23日、28日分别进占长春、吉林。

蒋介石因一时得计，更加得意忘形，气焰嚣张。他摆出咄咄逼人的架势，提出在停战谈判中美方要享有“最后决定权”；中共军队要退出察哈尔、热河、烟台、威海卫、苏北及东北大部，分驻在关内陕北、上党、大名、临沂等几个地区，企图逼中共方面作出更多的让步，或者逼迫中共退出谈判，好把破坏和平责任强加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6月7日，周恩来飞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谈判情况，并研究对策。中共中央决定的方针是，在不丧失基本利益下实现和平，“决定竭力争和平，哪怕短时期也好”。周恩来回南京后，会见马歇尔，直截了当地指出，国民党的打算，是在东北用接收主权的名义占领大城市和交通线，在关内用恢复交通的名义占领华北铁路。如果中共不同意，就把中共除外，召开“国大”，通过“宪法”，表示中国已经实现“民主”，以便取得外国援助，肃清中共。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要争取和平民主，但目前内战的危险日益严重，迫使我们不能不抵抗。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国民党的内战政策不能达到目的，使他认识困难，再回过头来趋向和平。周恩来继续同国民党谈判，但谈判越来越艰难。他电告中共中央：我们既要避免破裂，又要不作大的让步，今后一周将是斗争最紧张的一周。

但是蒋介石也碰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经过1个多月的战斗，国民党军队损失6万余人，国民党军队内部反内战的情绪也在不断增长。东北的国民党军分布在南起山海关，北至长春的漫长铁路线上，已无力再向北进。蒋介石只好宣布休战15天，企图从谈判桌上继续与中共争夺。以后又再次延长休战时间8天，双方谈判仍未达成任何协议，整军谈判也毫无结果。6月24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我在停战、交通及美方职权上均作了某些让步，今日大致通过三个方案，足够表示我方愿求解决，留下的争论在整军，蒋绝对不会放弃他的打算。”他要求“中央批准我在此相机行事，以便使谈判破裂做得愈于我们有利愈好。”中共中央第二天复电表示：“你可根据既定方针便宜行事。”

对这一阶段的谈判，周恩来后来做了总结性评述：“东北三四五月大打，从沈阳打到长春，停战、政协都被破坏了。但为什么又有六月休战呢？因为国民党占了长春后，兵力分得很散，没有兵再进。当时我们在东北占了有利的地位，山东、山西收复了几个伪军占领的城市，这样国民党需要在东北实行几个月的休息，而在关内动手大打，于是有东北休战。二十三天的谈判，讨论了许多问题，我们还打算再让一二个地方以保全广大的解放区。在停止东北战争、恢复交通、整军等问题上，都作了许多的让步，但结果还是破裂，中心问题仍是政权问题，根据地问题。蒋在形式上是要我退出苏、皖、承德、安东、冀东等地，但他承认的只是黑龙江、兴安两省及嫩江半省，华北只是临沂、大名、上党等几个地区，想把我们完全隔开，先限制在这几个地区，然后再来消灭我们。”

蒋介石在关内进攻解放区的重点是以鄂中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中原解放区是抗战胜利后，由鄂豫皖边区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从广东北返的王震领导的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从河南南下的王树声领导的嵩岳军区部队会合而成的。1945年10月24日，这三支部队在豫西的桐柏

山区胜利会师，以新四军第五师为主组建了中原军区，李先念为司令员，郑位三为政治委员。

蒋介石认为中原军区所处的位置，南扼长江黄金水道，东逼平汉铁路，对其大批军队出川，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于是纠集大量兵力向这个地区进逼。中共中央为了避免冲突，指示中原军区主动撤出这一地区，向东转移到安徽五河一带，向新四军主力靠拢。中原军区部队于 1946 年 1 月上旬行进到湖北礼山（今大悟县）和河南光山一带时，正值“停战令”颁发。中原军区恪守停战协定，立即停止前进，临时在以宣化店为中心，东西长约 100 公里、南北宽约 25 公里的地区内就地待命。由于这块地区十分狭小，中原军区 6 万余人的部队密集在这里，无论态势和地形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蒋介石蓄谋先消灭这支处于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之中的中共部队。他利用停战期间，先调集 11 个正规军 26 个师约 30 万人，紧紧包围了这个地区，构筑碉堡 6000 余座。在 3 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挑衅进攻达 240 多次，将中原军区及所属的 3 个军分区分割成“品”字形，并断绝对这个地区的粮食、医药供应。

周恩来一直非常关注中原军区部队的困难处境。早在 1946 年 2 月，他就向马歇尔提出，在解决东北问题的同时，应该解决中原军区的问题，要求国民党军队撤围，让中原解放军安全转移到其他解放区，并借给他们转移所需的粮食和经费。周恩来一方面亲自找国民党政府的粮食部长协商接济中原军区部队粮食问题，一方面指示大行、晋绥、山东等解放区领导人，“五师困于粮款，顽方又蚕食挑衅，不允我军马上转移，因之五师危急万分，各地均有立即抢救五师的责任。”并提出准备粮食援助五师的具体办法。周恩来还委托董必武到宣化店视察，代表中共中央慰问中原军区军民，并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

由于国民党当局不仅对中原军区实行军事、经济封锁，而且实行新闻封锁，致使广大群众和新闻界人士不了解中原地区的危急情况。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乘机大肆宣传“中原无战事”，无需调处，以掩护国民党军队继续对中原解放区的挑衅和进攻。

周恩来多次要求派出执行小组到中原军区视察均无结果。5 月 3 日，中共代表由重庆迁到南京。当晚，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愤怒驳斥国民党当局散布的“中原无战事”的谎言，严厉警告美方和国民党方面，必须“首先协议停止中原内战，以免牵动全局，发展成为全国内战。”在周恩来一再坚持下，美方和国民党方面被迫同意组成三人小组去宣化店视察。

5 月 5 日，周恩来与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徐永昌、美方代表白鲁德在汉口会合。徐永昌托病不去，派遣武汉行辕副参谋长王天鸣做他的代表。

第二天，三方代表、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共 60 多人冒着滂沱大雨，向武汉以北 100 多公里的宣化店进发。由于山洪暴发，黄歧县境内十棵松河上的桥梁被冲断了。国民党代表找来当地的乡、保长，但乡、保长却找不到人帮忙。王天鸣、白鲁德乘机向周恩来提出返回武汉，等洪水退了再来。周恩来不同意，提出去宣化店通过原中共黄歧县委书记任士舜去找群众帮忙。任士舜很快就找来了一些群众。周恩来对乡亲们说，我们要到宣化店和平谈判，你们有办法帮助我们过河吗？一位老大爷说有办法。他组织十几个大汉把吉普车连同坐在车里的白鲁德、王天鸣一同抬过了河，并把其他美蒋方面的人员一一背过河去。周恩来走向河边时群众争着要背他。周恩来恳切地对大家

说，你们为了争取和平，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我很感谢你们。二万五千里长征，跋山涉水，是我们共产党的本领。今天，我不能再麻烦你们了。说着，他便脱下长裤，由警卫员陪着，赤脚蹚过这条百多米宽、水深及腰的河流。周恩来的行动，震撼了美方代表白鲁德。他立即拿出照相机，拍下了这一感人的场面，并说他要这张照片珍藏起来，作为私人留念。几十年后，白鲁德对周恩来的高尚品德仍赞叹不已。当晚，三人小组及随行记者在姚家大湾过夜。周恩来住在一位贫农家里。快吃晚饭时，周恩来到伙房揭开锅盖，看看这家人吃些什么，发现锅里尽是野菜。他立即叫警卫员把随身带的口粮倒入锅里，煮成一锅野菜粥，和这家人一同吃。老乡们感到过意不去。周恩来却笑着说，我们是一家人，就应该同吃一锅粥啊！

随行的中外记者们看到这一切，感慨万千。他们从周恩来的一言一行中，看到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全心全意为全中国人民服务的，中国的老百姓是真心拥护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

5月8日中午，周恩来一行到达宣化店。下车后，周恩来先将美国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送到竹杆河西岸的礼山中学休息，自己则匆匆返回河东，到中原军区司令部，听取军区负责人的汇报，研究布置同美蒋代表谈判事宜。周恩来详细了解了部队的情况和敌我双方的态势，并一一记录在地图上，听完汇报后，周恩来向大家介绍了当前的形势，指出和平已不可能，内战难以避免，他要求中原部队一面拖住敌人，尽量延长时间；一面要随时做好迎击国民党军突然袭击的准备。

下午，三方在礼山中学会谈。李先念在会上愤怒地历数国民党军队破坏停战的大量事实，使得美国代表和国民党代表无言以对。周恩来再次严厉警告美蒋代表：“应该知道，中原战争如果爆发，必将宣告和平结束，成为全面内战的起点。”当晚军区举行欢迎晚会。晚会结束后，周恩来继续听李先念的汇报，并反复指示：“你们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幻想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你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你们脑子必须复杂一点，一定要设法用枪杆子突围出去！”“对幻想和平的即使是极少数人，也必须认真抓紧进行教育。”周恩来同军区负责人一起，在油灯下展开地图，仔细察看军区制定的作战方案，对选定的突围路线，预定经过地区敌人兵力部署的情况、敌人战斗力的强弱，以及地形、河流、碉堡封锁线设置等等都进行了详细研究，一直工作到清晨。

9日下午，三人小组回到武汉。第二天，三方签订了中原停战协议。这个协议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迫使国民党方面同意将中原解放军2000多名伤病员、非战斗人员及部分地方干部遣送到河南安阳。这就精简了部队，有利于部队的突围准备和战斗行动。

6月22日，蒋介石以为消灭中原解放军的时机已到，命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中原地区国民党军队，秘密完成对中原解放军的包围及攻击准备。26日，开始全线进攻，并企图在48小时内一举消灭中原解放军。

中原军区将获得的情报紧急报告中央，6月23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指示中原局：“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时机，并保机密。”6月26日，中原解放军除留部分地方部队在原地坚持斗争外，以1个旅伪装主力向东转移迷惑敌人，主力部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周恩来在宣化店时一起研究的作战部署，分左右两路开始向西突围。蒋介石判断中

原解放军将向东北方向突围，以便向离得最近的新四军主力靠拢。他将其主力大都部署在东线和北线。中原解放军以突然的动作向西突围，打乱了蒋介石的全盘计划。结果左右两路连同担任牵制任务的部队全部突破了重围，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任务。中原解放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执行中央的战略意图，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 30 个旅以上的兵力，使华北、华东及东北人民解放军渡过国民党大举进攻的最困难时期，在战略上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面对全面内战爆发的局势，周恩来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对马歇尔说，能让的都让了，不知政府是破裂呢？还是一面打一面谈？我们愿意和平，但不能接受蒋的这一套。国民党政府军于 6 月 26 日起大规模进攻湖北李先念部队，这必然会引起全国性的大规模军事冲突，责任完全在国民党政府。6 月 30 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蒋方是边打边谈，在东北兵力不足，一时不致有大动作，关内则向我中原、苏北、山东、热河等地进攻，可影响晋冀鲁豫，建议在政治上揭露大打，在军事上各个击破。7 月 1 日，中共中央向各解放区发出通知：“敌反共反人民的大内战已从二十六日围攻五师开始。我即将进行自卫战争。”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 四、坚持战斗在国统区，支援人民自卫战争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共谈判破裂已成定局。但是蒋介石还想继续利用谈判作为他扩大内战的烟幕，并想把谈判破裂的责任推卸给共产党，因此，他并不宣布停止谈判。而中共中央也决定继续利用“和谈”这个战场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团结和组织更多的力量共同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内战阴谋。

对这个阶段的谈判，周恩来作过这样的概括：“这个阶段是表面谈判，实际大打，也就是拖中大打。一方面是我们坚持政协路线，另一方面是蒋不断地破坏它。我们把谈判作为教育人民的工作，这个方针，连马歇尔也对叶剑英参谋长说：周将军最近几个月来，并不是为谈判而谈判，而是为宣传而谈判。这句话有一半道理，但责任并不在我，因为对方不愿解决问题，我们就告诉人民是他不愿解决，用以教育人民。从七月到我回来以前就是这样一个方针。”

在这种复杂情况中的谈判，实际上是一场特殊条件下的战斗。周恩来在这样险恶的环境里表现出大智大勇，坚定沉着，出色地完成了中共中央托付给他的重任。

##### （一）揭露蒋介石扩大内战的阴谋，唤醒更多的民众

在谈判中，蒋介石和马歇尔一唱一和，相互配合。他们时而施加高压，时而又美言引诱，力图使中共代表犯错误，以便把破坏和谈的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7 月 2 日，蒋介石对周恩来、董必武再次提出要中共让出苏北、安东、胶济线。”他说，这个问题解决了，全国就和平了，1 个月后就开国会，改组政府。他还装出一副很友好的样子说，如果你们让出这些地方，全国人民都说你们好，你们不会吃亏的。周恩来坚定地回答他，今日必须一面求全面停战，一面开政协，谈改组政府。

蒋介石在发动大规模内战的同时，也加紧了对反对他们独裁的民主人士的迫害。7 月中旬，国民党特务接连暗杀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企图以此恫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周恩来等人在《新华日报》上公开发表给闻一多夫人的唁电，痛斥国民党特务的野蛮行径，“此种空前



残酷、惨痛、丑恶、卑鄙之暗杀行为，实打破了中外政治黑暗之记录。中国法西斯统治的狰狞面目，至今已暴露无遗。一切政治欺骗，已为昆明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政治暗杀枪声所洞穿。”周恩来还愤怒地当面对马歇尔指出，现在国民党有一切权力可用，但却用暗杀的手段来对付民主人士，是无耻、法西斯的作风，令人愤慨。我得到消息后，愤慨得无话可说。国民党用这样的方法，还有什么谈判、民主可言？连别人说话都怕！国民党用武力来打中共，双方还可以对打。民盟并无武力，要用这样方法是压不下去的。第二天，周恩来又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向中外舆论界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和镇压和平民主运动的罪行，当记者问他中共代表团和他自己有无危险时，周恩来从容回答：“我们来谈判就是准备着的，过去在重庆准备了八年，今后再准备八年吧。”同时他又留下谈判的余地，不把话说死。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和真心悔过的人握手。我们和多少人握过手，我很难过他说，甚至和手上梁有皿的人握过手。为了人民，为了民主，为了国家，我们不惜忍气吞声地这样做。我们日夜祈求停止此种暴行。”“现在情形如此严重，我们仍为和平民主而奋斗。只要能永远停止战争，我们仍愿在政治协商的前提下，解决任何争执的问题。”周恩来的一系列言论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巨大反响，使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丑恶面目。

但是蒋介石认为内战的形势对他很有利，拒绝任何停战谈判。他以为中共代表要求停战谈判，是因为中共军队抵挡不住国民党军的进攻。他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不仅坚持要中共军队退出前面提到的三个地区，同时变本加厉地要求中共军队让出山东、山西的大片土地及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并且限令在1个月至6周内完成，否则停战和改组政府都无从谈起。对于蒋介石的无理要求，周恩来一口回绝，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致电周恩来：“你的答复很对。我各解放区正在动员全力粉碎蒋介石进攻。”周恩来继续采用记者招待会和发表文章等办法，不断揭露蒋介石用“拖”的办法蒙骗要求和和平的人民，欺骗世界舆论，并揭露美国政府公开露骨地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8月10日，马歇尔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认为国共争论的问题“似难获致解决之方法”。这个声明等于承认他们进行的所谓“调处”工作已“实际失败”。在他们看来，今后主要是在战场上决胜负的问题了。

1946年9月，局势进一步恶化，国民党方面宣布要进攻张家口。这表明蒋介石已决心实行最后破裂。于是周恩来愤然离开南京，来到上海，以他的行动使全国人民和全世界都知道，和谈已处于破裂的边缘，蒋介石所谓的谈判还在继续，和平仍有希望，只是一种假象。到上海后，周恩来专门接见美国联合社记者，声明：“本人已暂退出南京政治谈判，不再与政府及美国代表进行‘无意义，之磋商。”“除非蒋主席同意重开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本人将不返南京。”他强调指出，这种磋商，现在只能掩饰中国内战的情况，使中美两国人民不能了解真相。美国政府实行错误的对华政策，已使中国内战波及全国，但即使中共失去张家口、哈尔滨、淮阴及其他铁路沿线的重要城市，中共亦决不向国民党屈服，不相信武力可以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

为了进一步揭露蒋介石和美国的反动政策，10月1日，周恩来在上海再次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国内外公布事实真相，使广大群众了解国民党政府正在蓄意制造全面破裂，在精神上有所准备。会上，周恩来重申中国共产党对当前局势的基本态度：“全国内战越打越大，现已打到察哈尔大门。”“如

果政府军不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军事进攻，我们便认为蒋主席决心破裂，最后放弃和平谈判，一切严重的后果和责任，都应由国民党政府负之。”他严正宣告：“在今天，主要的关键是立即停止进攻张家口，因为绝不能在向解放区军事政治中心之一的张家口进攻的炮火中，来一条一条地商谈停战协定、改组国府及召开国大等问题。这等于拿刀放在人家的脖子上逼其投降，这种希望，是永远不可能在中共身上达到的。”周恩来还强烈谴责美国政府正在变本加厉地推行援助蒋介石扩大内战的政策。他说，美方帮助国民党运军队运军人，以八亿二千五百万美元的美军剩余物资转让给国民党政府，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华北帮助守卫国民党军队的据点和铁路运输线，美国的军事顾问团在训练国民党军队使用美国武器。“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国民党要进行像今天这样大规模的内战，是不可能的。”最后，周恩来义正词严地指出：“今天中国的情况是空前严重的。如果国民党政府不改悔，仍继续向张家口进攻，如果美国政府仍旧公开地或隐蔽地帮助国民党政府打仗，继续保留军队驻华，那么，中国的内战是无法停止的，中国必将是一个全面破裂的局面。内战的继续扩大，将使中国人民遭受更惨痛的牺牲，经历更长期的黑暗。但我们深信，中国人民有力量走完这段艰苦的过程，克服一切困难，战胜内战制造者与援助者。”

周恩来的讲话，外国通讯社和国内外许多报纸都在显著位置予以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可是蒋介石却完全陶醉于他在军事上的表面优势，不顾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再警告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悍然于10月11日下午攻占张家口。他得意忘形，又于当天下午再次单方面宣布如期召开国大。

周恩来的一系列反击措施也剥去了马歇尔“和平使者”的外衣。马歇尔着急起来，他在写信要求周恩来回南京不成的情况下，又亲自飞到上海劝说周恩来回南京，仍遭到周恩来的严词拒绝。国民党当局和美国代表一计不成再施一计，他们再次放出和平空气，引诱第三方的民主人士参加“国大”，同时又要挟中共宣布参加“国大”，提出代表名单。第三方面代表中的一些人害怕和谈破裂，加上对蒋介石仍抱有一线希望，纷纷到周恩来的住所劝周恩来回南京重新进行谈判。本来谈判已经因国民党攻占张家口而破裂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考虑到仍然有必要再做第三方民主人士的工作，使他们不要再对蒋介石和美国政府抱有幻想。于是他致电中共中央：“目前局势是国民党正在发动和平攻势，而第三方面因怕破裂，也参加这一和平运动。现在的中心环节是争取第三方面。如能争取到民盟全部或大部不参加‘国大’，就是胜利。”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和第三方面的代表们回到南京。尽管第三方面的人士求和心切，提出种种方案，但是蒋介石始终寸步不让，不仅提出要全部按照他的方案谈判，而且要他们交出参加“国大”的名单。第三方面的许多人士终于看清了蒋介石根本不愿和谈的真面目。

## （二）支援解放区的自卫战争

周恩来利用停战谈判期间与国民党和美国代表直接接触的便利条件，以及到各战区视察监督停战的机会，收集军事情报，分析研究国民党军队作战部署和作战意图，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自卫战争，提供了决策依据。

1. 研究蒋介石战略企图，收集军事情报。在谈判期间，周恩来始终高度警惕着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1946年4月中旬，周恩来发现陈诚在会见东北人士时忽然改口赞成东北先停战，立即估计到国民党军队不可能顺利通过

四平街，不能在 15 日前到达长春。他立即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东北民主联军在两天内派兵进入长春。第二天中央即电告东北局：按周电办。4 月 18 日，四平保卫战打响。19 日，民主联军进入长春，下旬占领哈尔滨、齐齐哈尔，从而使我军于东北不仅在军事上占有有利地位，而且也增加了谈判的砝码。6 月初，蒋介石提出东北休战 15 天。周恩来立刻察觉到蒋介石将要把战场转移到关内，并且很有可能爆发更大规模的内战。6 月 17 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蒋介石“战意已大明”，建议中央令各解放区速做好各种准备，迎击蒋方的进攻。中共中央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立即向各解放区发出指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不久，蒋介石又宣布将休战再延长到 6 月 30 日。周恩来根据谈判的动向，认定这是蒋介石施放的烟幕，很有可能在这 8 天里对解放区发动新的进攻。他再次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国、美方案不仅在东北，即在关内也想侵入我区。国方一切为了打，8 天后整军方案也难得协议。故应在此 8 天积极备战。果然蒋介石在 6 月 26 日悍然向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企图一举消灭我中原解放军。因中原解放军已预有准备，在国民党军发起进攻之前果断突围，一举突破了 30 万敌军的包围，粉碎了蒋介石的企图。

蒋介石下令进攻中原解放区，挑起全面内战之后，下一个进攻的矛头将指向何处，这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极为关注的问题。周恩来根据谈判中出现的国民党方面一再强调要中共军队让出苏北，组织地主还乡团在南京等地“示威游行”，狂呼“请政府保护我们还乡”，到处张贴“打回老家去”的标语等种种迹象，判定国民党军队下一个进攻的重点地区将可能是苏北。他及时电报中共中央，提出：“蒋有可能将东北问题再拖数日，而先在苏北、山东开刀并及热河。”毛泽东立即将周恩来的电报转告给陈毅等：“宁周电称，蒋决定大打，除围攻五师外，胶东苏中两区必定进攻”，“华中须准备于蒋军大举进攻苏中时，坚决粉碎之。”6 月 30 日，周恩来再次致电中共中央：蒋介石在东北一时不致有大动作；关内向我中原、苏北、山东、热河等地进攻。建议中央在军事上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7 月中旬，蒋介石集中了 50 万正规军，准备向华东解放区大举进攻。7 月 12 日，周恩来及时向中央报告：“苏北大战即将开始，（国军）部队由徐州向南、津浦路向东、江北向北，三面同时开始进攻，以武装难民作先锋，先求解决苏北后，再打通津浦、平汉等。”第二天，周恩来再次向中央军委和华中军区紧急通报：15 日苏北和郑州的国军将向我发动进攻。人民解放军立即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奋起反击，苏中解放区的部队，在粟裕等人指挥下，以 3 万多人的兵力迎战 12 万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从 7 月 13 日起在 1 个半月的时间里七战七捷，歼灭国民党军 5 万余人，迟滞了国民党军队对苏皖、山东解放区的进攻。

10 月 15 日，周恩来根据 3 个多月来各个战场上所反映出来的作战特点和经验，向中央建议，在军事战略上应与政治相配合。在“国大”前后不宜打出来，在解放区易于歼敌。

2. 组织开展国民党统治区的游击战争。全面内战爆发后，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领导中共代表团，组织和恢复南方各省的武装斗争，建立和发展游击队伍，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敌人，策应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争。国民党军队准备向华东解放区大举进攻之际，周恩来预计到人民解放军将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北收缩，达到集中兵力运

动歼敌的目的，将有大片老解放区被敌人占领。他及时向中共中央建议在苏皖组织游击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皖南地委派人到南京与中共代表团联系，汇报皖南准备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周恩来帮助他们与华东局建立了联系，为他们准备了电台。

琼崖纵队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队伍，在中共琼崖特委的领导下，不仅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坚持了武装斗争，而且还经受了八年抗战的严峻考验。蒋介石拒不承认琼崖纵队的合法地位，阻挠其北撤山东。周恩来听取了纵队副司令员庄田要求纵队留在海南岛坚持斗争的情况汇报。周恩来认为这个建议很好。经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后，周恩来于9月中旬指示琼崖纵队：全面内战已经开始，为适应长期斗争，琼崖在远离中央、孤悬敌后的情况下，必须精简，分区游击，从打击敌人中求补充，建立依托山地之根据地。周恩来还通过内线指示与我党有联系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在驻海南期间给琼崖纵队以帮助。琼崖纵队在党中央的正确指导下，历经千难万险，到解放战争后期发展到1.5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海南岛的战斗。

1946年11月初，在国民党召开“国大”前夕，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凡有可能建立公开游击根据地者，应即建立公开游击根据地。原有各根据地，如海南岛，如南路、中路、西江、北江、东江、闽南、闽西，应鼓励原有公开或半公开武装，紧紧依靠群众继续奋斗”。“东南各省望周[恩来]、董[必武]、刘[晓]直接布置”。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对南方各省的游击战争作了布置。闽西、东江、琼崖、滇黔、川东相继巩固和发展了游击队伍和根据地，在还不具备公开武装斗争的地区，则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建立秘密武装骨干，相继建立起“护村团”、“护乡队”、“人民自卫队”等多种形式的群众武装。敌后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区自卫战场作战。正如后来周恩来所说：“今后的半年到一年内，的确是最紧张的一个时期。假使再打半年到一年，战局一定要改观，这也就影响到蒋管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与农村的武装斗争。这三种斗争的汇合，在不久的将来，将会造成民主的新高潮。”

3，开展敌军工作，分化瓦解敌军。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国民党军队中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的指示，积极开展工作。1946年夏，周恩来秘密会见了中共秘密党员、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要其在国民党军队上层开展策反工作。他对张克侠说：“现在，要向国民党军官兵，向那些高级将领和带兵的人，说明共产党的政策，指明他们的出路。蒋介石是一定要打内战的。他要打我们就打。我们不但在战场上狠狠回击他们，也要从敌人内部去打击顽固派。要争取策动高级将领和大部队起义。这样，可以造成更大声势，瓦解敌人的士气。”之后，周恩来又专门致电中共中央和叶剑英等，告知西北军张克侠与我们有来往，被国方注意，可接他的家属到张家口，使张克侠可以自由行动。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张克侠同另一位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一起，在淮海战役中引导所属部队1个军3个师共2万余人举行火线起义，为战役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由于周恩来深入开展了瓦解敌军的工作，很多国民党将领逐步认清了蒋介石发动内战，反共反人民的罪恶行径，纷纷举行战场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士气，严重削弱了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大批国民党军战场起义，成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一大特点。正如朱德曾经指出的，国民党军队的起义与“解放区军民的抵抗，蒋管区人民的民主运动鼎足而三，这三个潮流汇合一起，必然会直接造成反动派的军

事失败，有效地恢复全国的和平。”

周恩来还十分注意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情报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北方由叶剑英、李克农通过军调处开展工作，南方由他和董必武亲自负责。通过艰辛的努力，从国民党参谋总部的作战部门，到各大战区“剿总”司令部的作战、机要部门都有我军的情报人员。这些战斗在秘密战线的同志收集了大量的军事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人民解放军的各级司令部门，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4. 利用谈判斗争，制止和限制国民党的破坏活动。抗战初期，蒋介石不顾人民死活，悍然下令在河南省花园口掘开黄河堤坝，企图依靠黄河水泛滥来阻挡日军前进，结果非但没有阻止日寇的铁蹄，反而使豫、皖、苏大片土地成了泽国，600 万人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后来黄河故道水涸沙淤，解放区人民在民主政府的保卫和帮助下，逐渐在此建立新居：发展生产。蒋介石为了大举进攻解放区，破坏解放区的生产，限制人民解放军的行动，又在黄河水道上，重耍阴谋，下令限期堵口，企图迫使黄河改归故道，将黄河之水引向解放区。为了拯救解放区黄河两岸军民，揭穿蒋介石的罪恶阴谋，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于 1946 年 7 月 14 日飞往上海，向联合国和国民党行政院的善后救济总署交涉，商谈有关黄河堵口、救济费等问题。18 日，周恩来在参加善后救济总署为解决黄河堵口问题而召开的联席会议上，严正驳斥了国民党当局立即堵口的罪恶阴谋。周恩来为着黄河两岸 700 万军民生命财产安全，坚持在堤岸修复、居民迁出以后，方可堵口放水。

7 月 19 日，周恩来乘飞机离开上海去开封进行实地考察。他中午到达开封南郊机场，下午即赶往花园口。周恩来到了花园口堵口工地，健步登上坝头，仔细观察了被洪水冲垮的木柱、石坝，这是国民党强行堵口的证据。7 月 20 日，周恩来在国民党黄河水利委员会举行的座谈会上，以渊博的知识，铁一般的事实，从黄河的悠久历史谈到黄河的改道，从国共谈判讲到中国的前途，从黄河复堤谈到花园口堵口，严正警告国民党当局，黄河协议必须坚决执行，任何耍弄阴谋诡计的人绝没有好下场，玩火者必自焚，玩水者必灭顶。

周恩来利用视察的机会，会见了解放区的负责人。提醒他们在谈判中要注意研究斗争策略，揭露敌人阴谋，争取主动权。并要他们转告刘伯承、邓小平，从整个形势上看，靠谈判不能解决问题，现在要靠自卫战争，迎击进攻。

周恩来返回上海后，终于同国民党方面和联合国有关机构达成了协议。协议决定先复堤，9 月汛期过后再堵口，修复黄河故堤坝的费用由政府支付，救济故道居民款 150 亿，也由政府支付，从而挫败了国民党的阴谋。这一斗争的重大胜利，保证了解放区军民的安全转移，避免了一场灾难。同时为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自卫战争创造了条件。在黄河大堤将堵未堵之际，晋冀鲁豫解放军在黄泛区先后取得了出击陇海路战役、定陶战役、郟城战役的胜利。

### （三）开辟蒋管区第二战场的斗争

以学生为先锋的群众斗争，从 1945 年昆明“一二一”反内战、反独裁运动开始，到 1946 年底抗议美军暴行的群众运动和 1947 年“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形成。这些运动和先后爆发的城市工人罢工、“二二八”台湾人民起义和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等，标志着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的大觉醒，以及蒋介石反动统治末日的来临。第二战场斗争

动员之广泛，政治影响之深远，实为中国现代史所少见。它以排山倒海之势，震撼着蒋家王朝。

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国共谈判、政协会议、国共美三方谈判中，为争取、保卫人民的权利，同国民党和美方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向中国人民和国际舆论彻底揭露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面目，和美帝国主义“扶蒋压共”政策，孤立、分化了国民党反动派；广泛地团结了蒋管区的进步力量，争取了中间力量，发展了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指导了地下党组织的工作，为击退国民党大举进攻和配合解放区自卫战争的胜利，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国民党关闭谈判大门之后，他继续领导和发动蒋管区人民开展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形成了反对蒋介石反动政府的第二战场，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

“第二战场”战略思想是周恩来最早提出的。1947年2月1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把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称作“第二战场”。“第二战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提法。他把抗战结束以来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民主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提到了同第一战场——人民解放战争相配合的战略地位。他认为许多人原来对美国有幻想。而当时，学生运动和小贩运动都直接地是反美运动。群众中，从贫民、工农到民族资产阶级都不满美国的压迫。斗争还要继续发展下去。这个运动是配合自卫战争最有力的运动。同年5月22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中再次强调，要“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周恩来关于“第二战场”的战略思想，很快为毛泽东所肯定，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中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这既是对学生和乎民主运动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周恩来“第二战场”战略思想的充分肯定。

周恩来回到延安后，一方面协助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另一方面兼任中央城工部部长，继续领导蒋管区第二战场的斗争，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斗争的战略、策略、方针等，有效地领导着第二战场斗争的正确发展，为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结束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为了更深入地开展第二战场的斗争，1947年2月28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中指出：“针对目前蒋的镇压政策，我们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在宣传上，我们对蒋之任何一个反动设施、恐怖行为，都要尽情揭露，宣告中外”。“在行动上，我们应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去硬碰，这不是保守，而是领导群众变换方式，绕过暗礁。”同时，在斗争中有时要联系并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联系到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在组织上，“要建立可以自保的防线，即在名称上与行动上、在蒋特发现施以高压后，不妨改换名称或分开作战”。“在工人与城市贫民（如小贩）中，更要着重经济斗争的领导和发展。”

为了保全力量，利于今后的斗争，周恩来强调蒋管区的斗争必须要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他提出：“针对当前紧急情况及可能发展的情势，除乡村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尽量发展武装斗争、在条件不成熟或我工作薄弱的地区坚持群众工作和隐蔽党的组织以待解放军的到来外，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单独进行工人、市民的武装起义，肯定他说，一般地是不可能的。”周恩来的这些指示，既给城市民主爱国运动指明了斗争的正确方向，又给他们指出了正确的斗争策略，从而使人民革命运动在斗争中避免了不必要的损伤。

随着国统区群众斗争的不断深化，周恩来及时提出“应有一从长期全面着眼的战略计划”。1947年9月间，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已经开始。为了迎接新阶段革命高潮的到来，周恩来对国统区在新阶段的工作方针作了系统的阐述。他说，当前形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进入全国反攻，2年到5年内可以打垮蒋介石。但是，还要估计到可能发生的种种变化，这就“决定了目前形势仍有一定时期的长期性，切勿片面急躁，缺乏分析，忽视各种可能，只有一种想法，主观制造高潮，轻易搞联合性斗争，或过早决战，招致暴露，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蒋区工作的总方针是：长期打算，积蓄力量，发动斗争，推动高潮，配合反攻形势，发动第二战场，准备里应外合，争取全国胜利。”他要求蒋管区的工作要有整个的长远计划，根据不同地点、时间和条件，因时因地制宜，开展多种多样的斗争。他特别强调，腹心城市或战略要地，“必须是长期打算，积蓄力量，适当斗争，攻势防御，决非一往直前的斗争。组织形式、斗争形式必须十分灵活，斗争要有目的，尽可能取得斗争的胜利，即有损失亦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损失。非到大兵压境与敌总崩溃时，不可决战。”关于斗争形式，他指出，在一般情况下，“其内容多是经济性、局部性的，其形式是此起彼伏的、波浪似的。只有在充分有利条件与时机，具有全国性、民族性及有关人民生活之最直接联系的某些个别问题”，“才可以发动一定时期的、较大规模的、及某些不同地区之相互配合的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关于第二战场的理论和实践，是应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范例。他坚持把党的三大法宝灵活地运用到斗争中去，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宝库。

#### （四）科学预见人民解放战争必胜

1946年6月下旬，全面内战爆发后，周恩来不仅继续留在南京与国民党进行斗争，同时十分注意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他深刻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及双方作战的特点，认真研究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基本特点和指导规律，对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进程作了许多科学的论述和预言。他的这些论述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和国统区革命人民的斗志，对那些同情革命，但又担心反动势力强大、人民力量弱小难以取胜的朋友们，则是很好地教育和帮助。

194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开幕后的第二天，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了《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及讲话。他指出，国民党召开“国大”“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和平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并向中外记者宣布：“我们肯定还要回来的，回来估计有两种，

一是请回来，国民党打的一败涂地，必然请求再次谈判；再一种就是我们打回来，后一种可能性大得多。”“看形势，三、五年之后回来，可能性很大。”

周恩来的这些科学预言，是建立在对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解放军多次自卫作战和全国解放战争初期各战役的科学分析和研究基础之上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不断派大量部队进攻解放区，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共中央“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的原则，先后成功地实施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绥远战役、津浦路徐济段战役、四平保卫战等多次自卫作战，歼灭国民党正规军约 12 万人。1946 年全面内战爆发后，3 万中原野战军成功地突破 30 万国民党军的重围，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任务。随后，华中野战军发起苏中战役，奋起迎战国民党军对苏中解放区的大举进犯，歼敌 5 万余人。1946 年 9 月 3 日，晋冀鲁豫野战军虎口拔牙，从 30 万国民党军队的钳形攻势中，发起定陶战役，一举歼灭国民党 2 个整编师。这两个重要的战役为中央军委制定和完善战争初期的战略方针提供了实践依据。在解放战争的最初 4 个月里，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 32 个旅，占国民党进攻总兵力的 1/6，月平均歼敌 8 个旅。虽然蒋介石下令重新组建被歼灭的部队，但增加的速度赶不上被歼的速度，总兵力减少了约 20 万人，战局已开始出现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变化，国民党军队愈深入解放区，占领的地方和城市越多，守备任务就越重，加之有生力量被大量歼灭，能够机动作战的兵力逐渐减少，因而战线过长与兵力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士气日益低落。到 1946 年 11 月，敌人用于一线的进攻兵力逐渐减少，全面进攻的势头开始下降。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在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以后，缩短了战线，兵力逐渐集中。虽然人民解放军在 4 个月的战斗中损失 12.2 万人，但由于解放区广大翻身农民踊跃参军，而且还吸收了 60% 以上被俘士兵参加到解放军行列中来，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 127 万人上升到 137 万余人，特别是野战兵团得到了充实和加强，并以缴获的大量武器，改善了自己的装备，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这一系列战果为周恩来的预见提供了基本的科学依据。按照第一年这样的歼敌速度，国民党军队的 310 万地面正规作战部队，大约需要 6 年时间可以全部消灭。但是随着敌我双方力量彼消我长的变化，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人民解放军歼敌的速度将不断加快。那么，人民解放军大约可用 5 年左右的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完全有可能的。

此后，周恩来又多次预见人民解放战争发展进程。1946 年 12 月 17 日，周恩来在给宋庆龄的信中说：“如果内战继续下去，蒋介石的武力再经过半年到一年的消耗，解放区人民的武力将有可能与蒋介石的武力渐渐的处于平衡的地位”。“中国人民只要坚持和平民主独立的方针，渡过这一历史上的困难时期，光明胜利的前途一定会到来。”12 月 31 日，周恩来给郭沫若的信中又说：“国内外形势正向孤立那反动独裁者的途程中进展，明年将是这一斗争艰巨而又转变的一年。……我们这一面，再有一年半载，你可看到量变质的跃进。”1947 年 9 月 28 日，周恩来在陕北佳县神家堡向中共中央直属单位的干部、战士作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时，再次强调指出，“蒋必败，我必胜！”“我们打倒蒋介石是有把握的，第二年打出去，实行大反攻的决定是正确的。无论国内条件、国际条件，都是有根据的，是能够实现的，当然不是再打一年就能解决的，要到第三年，可能到第四年。”周恩来的这些科学预见，被解放战争的实践所证明。从 1946 年 6 月国民党发起全国内战到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前后用了不到3年时间，就打垮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南京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响应党中央“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宜将剩勇追穷寇，追歼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先后又解放了上海、汉口、西安、广州、重庆等县以上城市1000余座，肃清了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残余军队。1951年5月，人民解放军又和平解放了西藏。至此，除台湾省以外中国大陆全部获得解放，人民解放军总共用了不到5年时间。如果算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只用了3年多时间，这与周恩来的科学预见是多么惊人的相似。

周恩来之所以提出用三五年时间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设想，不仅因为人民解放军具备了打败敌人的可能性，同时又是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尽管美帝国主义全力支持蒋介石，但直接出兵的可能性尚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政府战后国内政策调整的结束，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就完全有可能直接出兵干涉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那时将给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增加许多困难，因此，人民解放战争不能像抗日战争那样打持久战，而是需要加快战争进程，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去消灭敌人，夺取胜利。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越快，受到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就越小，革命人民夺取全国胜利的把握就越大。

周恩来对人民解放战争的正确预见，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基础上的。首先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敌我双方的变化，从中找出战争进程的一般规律。由于周恩来对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等都掌握的十分清楚、正确，从而为他的正确预见提供了客观依据。其次，他所预见的正确性建立在群众的努力奋斗上。正如他指出的：“在革命战争和阶级变化的发展上，需要我党有领导的预见，但证实这个预见的正确，还需动员全党领导群众在实际工作中循着这个预见的方向努力奋斗，否则，预见便会落空。”因而，他的预见不仅仅是个人的智慧和天赋，也包含了集体智慧的结晶，并且，由于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参与重大问题的讨论研究，因而也为他的科学预见提供了条件。

## 五、融军事斗争与谈判斗争为一体的高超艺术

周恩来领导军事斗争几十年，亲身参加过无数次战斗、战役，有着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军事理论。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谈判家，有着几十年军事斗争和谈判斗争集于一身的独特经历，它促使周恩来把军事斗争与谈判斗争这两种斗争方式，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斗争艺术。

### （一）军事斗争和谈判斗争都必须符合人民的最高利益

周恩来认为无论是军事斗争，还是谈判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继续，都必须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符合人民的最高利益。

周恩来在旅欧期间，就已经确立起武装斗争的思想，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树立了军事工作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心工作的思想。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危急时刻，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民族战争不仅仅是依靠工农阶级所能够实现的，必须联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力量，团结一切赞同抗日的阶级和阶层共同抗日，还要争取世界上一切反法西斯主

义的力量，包括美国、英国、法国这些长期侵略中国，支持蒋介石反动集团镇压人民革命的国家，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他最早产生了逼蒋抗日的想法，并在做东北军、西北军工作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这个思想，并向中共中央正式提出。这个重要的思想被中共中央所接受，并进一步发展成为联蒋抗日的方针，而要实现这个方针，只靠军事斗争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艰苦的谈判斗争来实现。

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坚持敌后抗战数年、战功卓著的新四军遭受惨重损失。为了击退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周恩来积极向中共中央建议并参与组织领导了从军事上、政治上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由于斗争环境险恶，中共中央、毛泽东考虑到在重庆的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的安全，指示他们设法迅速撤回延安。周恩来考虑到，一旦中共代表团撤走，再回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应保持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联系，否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复存在，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将会大大地推迟。他宁可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坚持留下来继续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谈判斗争。周恩来的这种深远的战略眼光，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赞扬，赞同他留在重庆，继续通过谈判，与蒋介石斗争。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周恩来提出的军事斗争与谈判斗争并用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饱经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希望能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而蒋介石一心要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但通过八年的抗战锻炼，人民军队已成长为具有丰富经验且数量可观的武装力量，完全有能力与国民党军队相抗衡。周恩来据此指明，要尊重人民的意愿，通过谈判斗争，争取以和平方式，实现人民的愿望。周恩来再次担当起谈判斗争的主角，在谈判斗争中，周恩来主张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宁可损失一些局部的、暂时的利益，但决不能丧失原则。尽管蒋介石一心发动内战，一再破坏谈判进程，但是周恩来为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避免挑衅，推延战争，积极准备反击的方针，并为教育人民，以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坚持谈判斗争，终于使广大人民群众认清不给人民以和平的是蒋介石反动集团，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人民解放军，这就使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有了根本的保证。谈判斗争的这个成果是军事力量所不能代替的。

## （二）军事力量是谈判斗争的重要后盾

周恩来说过，我们的谈判是以力量、人民为后盾的。他很清楚，谈判斗争离不开军事力量作后盾，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否则任何谈判都是徒劳的。因此，周恩来在谈判斗争中始终注意运用军事力量，以保障谈判斗争的顺利进行。

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到西安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工作。工作的重点是通过谈判，迫使蒋介石放弃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实现全民族的抗战。周恩来深知这场谈判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尤其应以军事力量为后盾。他到西安后，立即指导成立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工农红军“三位一体”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及西北联军参谋团，并派叶剑英任参谋团参谋长；组织和调动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的部分力量，准备抗击国民党中央军对西北抗日联军的军事进攻，有力地保障了与蒋介石谈判的顺利进行。周恩来知道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同盟是实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基本保障，容不得丝毫的损害。当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事件发生后，杨虎城感到安全难保；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力主用武力解救

他们的少帅。这两股力量合在一起，主张与蒋介石军队打一仗的气氛日益上升。他们还逼迫周恩来同意红军共同参加军事行动。这些都不符合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周恩来考虑到与蒋介石方面谈判的基本力量就是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力量。如果这个力量被破坏、削弱或分裂，都将给谈判带来很大的障碍。为了维护三个方面的团结，保存“三位一体”的军事力量，如果一旦同蒋介石的军队打起来，红军应该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一起战斗。为此，周恩来一面赶到三原红军总部，与那里的红军将领交换意见、布置任务，一面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周恩来的正确主张被中共中央所采纳。

抗战胜利后，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毫无诚意，想用“拖”的办法，为他向解放区调兵争取时间。毛泽东、周恩来识破了蒋介石的阴谋，命令各解放区军民坚决阻击向解放区推进的国民党军队，对已经侵入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只要好打，就坚决将其消灭。各解放区军民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奋起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特别是晋东南的上党战役，一举消灭入侵的国民党军队 3.5 万余人，大大加强了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谈判的地位，迫使蒋介石承认了“双十协定”。

（三）用军事斗争叩开谈判大门，以谈判巩固和发展军事斗争的成果

许多谈判是通过军事斗争才争取来的，而通过谈判则能更好地巩固和扩大军事斗争的胜利成果。“打”与“谈”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两种斗争手段必须相互配合，以达到共同的目的，两者不可偏废。

1935 年秋，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为了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迅速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同时又必须对“围剿”苏区的主力——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开展工作，激发广大官兵的爱国主义热情，使他们放弃与红军为敌的政策，和红军共同对日作战，为拯救中华民族而联合奋斗。但是要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建立联系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只有通过战斗来实现。周恩来和毛泽东亲临前线，指挥了直罗镇战役，歼灭东北军一个多师，加上红十五军团先前消灭的一个多师在内，东北军在很短的时间里接连吃败仗，损失 3 个师的兵力。这就使张学良知道红军不仅是消灭不了的，而且在与红军的战斗中东北军自身都难保。这样，直罗镇一战，就叩开了红军与东北军谈判的大门。接着周恩来又亲自领导了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谈判工作。谈判斗争为巩固红军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为西北苏区的巩固和扩大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46 年停战谈判期间，蒋介石、国民党拒不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在东北的地位。周恩来在多次与国民党代表陈诚、美国代表马歇尔交涉没有结果的情况下，致电中共中央，建议组织东北民主联军坚决抗击进犯的国民党军，先在军事上打掉他的威风，才能真正打开东北谈判之门。正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在向东北推进中，受到民主联军的沉重打击，国民党方面才不得不同意派出军调小组，到东北商谈停战事宜。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利用停战谈判的有利时机，抓紧整顿部队，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人民解放战争在东北的胜利，打下了良好基础。

（四）适时转变两种斗争方式

周恩来非常善于把军事斗争与谈判斗争两种方式并用，在以军事斗争为主时，用谈判斗争配合军事斗争的胜利；在以谈判斗争为主时，以军事斗争

保障谈判斗争的胜利。但是在实际斗争中，往往由于任务的变化，斗争方式的重点也会随之发生转变。抓住时机，适时实现这种转变，对于保证胜利至关重要。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长达一年多的国共谈判中，周恩来作为中共方面的主要代表，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警觉性，把握着政治局势的变换。他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方针，以谈判为主要斗争方式，力争实现国内的和平与民主，并积极以军事斗争配合谈判斗争，先后取得了双十协定的签订、停战协定的签订、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及政协决议的通过等重要成果。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公开推翻了与中共签订的各项协议和政协会议通过的决议。周恩来洞察了蒋介石决心发动内战的企图，及时将斗争方式的重点转移到军事斗争上来，以谈判斗争保障军事斗争的胜利。并积极利用谈判期间与国民党直接接触的机会，收集军事情报，分析国民党军队的动向，为人民解放军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恩来自如地运用两种斗争方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这是周恩来斗争艺术独具风格的一面，是他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周恩来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

## 第九章 协助毛泽东领导全国解放战争

周恩来回到延安后，立即投入到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之中。他和毛泽东、任弼时一起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转战陕北，组织指挥人民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他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领导总参谋部分析、研究人民解放军一年来的作战历程，总结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的成功经验，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新的战略决策提供了依据。毛泽东、周恩来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提出了尽早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他们亲自组织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为了协助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行动和支援陕甘宁军民的反攻，组织大岳军区主力向豫陕鄂边地区挺进；组织华东野战军主力一部向豫皖苏边地区出击，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行动。三路大军的进攻，大大加快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随后周恩来又进一步分析总结了人民革命战争以来的基本经验，写出了《军事原则》一文，全面精辟地归纳了人民解放军的基本军事原则，大大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久，周恩来和毛泽东等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一起，作出了实施战略决战的伟大决策，创造了除用战斗解决国民党军队方式以外的北平方式、绥远方式，进一步加速了国民党军队的崩溃。他还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了战略追击，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一、转战陕北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

周恩来回到延安不久，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经过 8 个月的作战，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国民党正规军 66 个旅（师），连同非正规军，共消灭 71 万余人。前 4 个月，国民党军损兵 32 个旅共 30 万人，占领了解放区的淮阴、承德、张家口等 153 座城市，后被人民解放军收复 48 座，尚占 105 座。后 4 个月，国民党军损失正规军 34 个旅，连同非正规军共 41 万余人。人民解放军的歼灭战规模越打越大，全军总兵力已发展到 168 万人，炮兵部队已初具规模，工兵部队也组建起来，从而增强了部队的攻坚能力和工程保障能力。军队政治工作有了新的发展，以诉苦为主要形式的阶级教育，以激发革命英雄主义为目的的杀敌立功运动，以加强团结互助为目的的“王克勤运动”，以评指挥、评战术、评技术为基本内容的军事民主，在各个部队开展起来，使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量明显提高。

与此相反，国民党军损失的兵力中，被俘、投诚、起义的人数成倍增长，敌军士气低落，战斗力明显下降。在其原总兵力的 200 多个旅中，被歼灭后重新组建的已占 1/4。由于战线不断延长，守备任务不断加重，能用于第一线的突击力量锐减。结果，由原来的以“兵”换“城”，变为只见“兵去”不见“城来”的窘况。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在后方和交通要点上，不但要处处设防，而且每一处设防必须布置一团以上的兵力。我们的兵力就都被分散，我们的军队都成呆兵，而匪军却时时可以集中主力，采取主动，在我广正面积活动，将我们各个破击。”结果是“占地愈多，则兵力愈分，反而处处被匪军牵制，成为被动。”蒋介石在战略上的主动地位正在逐渐削弱，战局正在向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发展。

蒋介石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自 1947 年 3 月起，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改为集中兵力进攻陕甘宁和山东两大解放区，这就是蒋介石所谓“哑铃型攻势”的重点进攻方案。蒋介石认为：“我们在全国各剿匪区域中，应先划定匪军主力所在的区域为主战场，集中我们部队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然后再及其余战场。”“凡是匪军的者巢……及其发号施令的首脑部的所在地，必须犁庭扫穴，切实攻占”，而“在主战场决战的时期，其它支战场唯有忍痛一时，缩小防区，集中兵力，以期固守。”并提出：“匪军的主力集中在山东，同时山东地当冲要，交通便利，有海口运输，我们如能消灭山东境内匪的主力，则其他战场的匪部就容易肃清了。”为了实现这个战略意图，蒋介石调集了占进攻解放区总兵力43%的94个旅于陕北和山东。在东西两翼的广阔中间地带，强使黄河的花园口大堤合拢，让黄河水流入故道。构成从风陵渡到济南约1000公里正面的“黄河防线”，以阻止晋冀鲁豫野战军向南支援山东战场。

毛泽东、周恩来等对战争局势的这些变化是十分清醒的。早在1946年10月，毛泽东在接见国民党起义将领高树勋部下赴延安参观团时就指出，中国好像是一条大河，现在河里有两条船在朝不同的方向开着。蒋介石的那条船是逆着潮流，背着风向，已被风浪打得破烂不堪，现在快要翻了。那条人民的船，正在一帆风顺地驶向胜利的彼岸。这就形象地揭示了历史的辩证法：“得民者昌，失民者亡”。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指示，指出：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确定人民解放军在今后几个月里继续执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内线作战。要求陕北、山东两区解放军实行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抓住战机，逐批歼灭进犯之敌，为尔后转入战略进攻创造条件；要求豫北、晋南、晋察冀、东北等战场的部队，根据各自情况，举行战略性反攻，大量歼灭敌人，逐步收复失地，以配合陕北、山东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

#### （一）撤离延安，抑留胡宗南集团于陕北的重大决策

1947年3月初，蒋介石在西北地区集结了34个旅共25万人的兵力，准备进攻陕甘宁解放区。其部署是：以胡宗南部主力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整编第十五、第三十八师各一部共15个旅，由宜川、洛川一线向北担任主攻，以整编第十师等5个旅为预备队。以西北行辕所属的马鸿逵、马步芳部整编第十八、第八十一、第八十二师由银川、同心、镇原一线向东进攻；晋陕绥边区总部所属第二十二军由榆林向南，配合夺取延安，占领陕甘宁解放区，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首脑机关及边区部队于黄河以西，或逼迫解放军撤到黄河以东，而后会同华北的国民党军，歼灭解放军于黄河以东地区。蒋介石企图用攻占延安，“摧毁匪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意志、削弱其国际地位”，借以掩饰其全面进攻的失败，提高其日益衰颓的士气。以求迅速解决陕甘宁解放区后，抽出胡宗南最后一支战略预备队加强其他战场的攻势。3月11日上午，驻延安美军观察组刚刚乘飞机撤离，下午国民党空军的轰炸机就飞临延安上空进行狂轰滥炸，国民党军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行动开始了。

当时，在西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的机动兵力有6个旅共2.7万人，加上地方部队共3万人。1946年秋，为防备国民党在召开伪国大的同时进攻延安，中共中央曾制定了内线作战，配合陈谢兵团在外线作战的方法，以保卫延安。1947年3月6日，毛泽东打电报给刘伯承、邓小平，认为“胡宗南实际上主

持郑州军事，急欲抽兵进攻豫北，故先给延安一个打击。而我们则须保持延安及边区，以便钳制胡军。只要延安及边区存在，即能钳制大量胡军不敢东调。”提出：“陈谢率五个旅寅皓渡河袭占陇海潼洛线，为调动胡军、保卫延安最好方法。”“我现布置内线纵深防御可能迟滞十天时间，主要依靠陈谢从外线解围。估计陈谢五个旅切断潼洛必能引起变化，即使突入延安亦难持久，而陈谢在潼洛之行动又需你们积极援助。”3月16日，毛泽东发布命令，指示：“我边区各兵团有坚决保卫延安任务，必须在三十里铺、松树岭线以南，甘泉、南泥湾、金盆湾地区再抗击十天至两星期（十六日至二十九日），才能取得外线配合，粉碎胡军进攻延安企图。”同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鉴于进攻延安的国民党军队剧增，中共中央原先设想的作战方针，已不适应战场情况的变化，3月17日，周恩来提出，目前国内外形势日益向有利于人民的方面发展，中国六大战场，东北、鲁苏、冀豫、晋绥，我已渐取得主动，冀察热在对峙中，只西北胡宗南集中兵力向延安突入。即使延安不守，胡敌也将消耗甚大，而我反得以从容各个歼灭之。倘以边区现有力量能钳制与削弱胡宗南主力于此，则对争取全国胜利将帮助甚大。故现时边区正以全力进行此长期战争，并不望敌人退出。这样，中共中央关于西北战场的任务就由解延安之围，改为主要的是抑留胡宗南部于西北战场，逐步加以消灭。中央军委根据新的情况与任务，确定西北人民解放军的基本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在延安以北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逐次加以歼灭，达到将胡宗南集团牢牢牵制在陕北，以支援其他各战场解放军实施战略性反攻的目的。并强调指出：“以边区地域之广，地形之险，人民之好，有把握钳制胡军并逐渐削弱之，保持广大地区于我手”。

撤出延安是一件震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大事，不少干部和战士一时想不通，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为此，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指出，放弃延安虽然有某些损失，但不足为患，“我军行动将更自由，分别消灭敌人的机会也会增加。”“若能将胡敌大部吸引在陕甘宁而加以打击消灭，这正便于其他解放区打击和消灭敌人，恢复失地”。周恩来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反复做好动员工作。他对战士们说：“我也不愿意离开延安，毛主席也不愿意离开。但是，我们撤离延安是为了保卫延安，现在走是为了将来不走。”他问战士们：“你们一顿饭能吃多少馒头？”战士回答：“一斤。”周恩来接着说：“一斤一个没法吃，还得做成三、四个才好吃。这次蒋介石调动二十万大军围攻延安，也得把他们拉开，一个一个地吃，这样才能吃掉。”他满怀信心地说：“毛主席讲了，这次撤离延安，少则三个月，多则一年，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

周恩来亲自领寻和部署延安地区党政军机关、单位、学校以及人民群众的撤退工作。他每天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接连到延安周围的枣园、杨家岭，唐凉山等地布置检查群众的疏散转移和各机关的坚壁清野工作，使得各项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由于周恩来周密地部署和细致地检查，撤离延安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周恩来检查后说：“要不是有条延河，胡宗南连口水也休想喝上。”

3月18日下午3时许，炮声、枪声逼近延安城，敌人先头部队已从南泥湾插到七里铺，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还在窑洞里开会。当警卫人员催促

中央领导快些上路时，毛泽东风趣地说：“不要紧，来得及！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他走他的，我走我的……怕什么！”

下午5时，延安已成空城。毛泽东环视古城，坚定而深情他说：“告诉蒋介石，延安是我们的！”周恩来对毛泽东说：“该走了！”毛泽东说：“好吧。现在还有点时间，咱们吃了饭再走。”周恩来赞同地说：“那好，吃了饭再走。”傍晚7时许，周恩来走出窑洞，发布命令：“准备汽车，马上出发！”毛泽东、周恩来一行离开了延安城，汽车走了七八十里，到了离开延安的第一站——延川县永坪镇刘家渠住下。至此，开始了转战陕北的艰辛历程。

1947年3月19日午时，国民党军侵占延安。胡宗南以损兵5200人的代价，换取延安一座空城。敌占领延安后，蒋介石兴高采烈，大肆宣传他的“胜利”。实际上胡宗南并不知道解放军的主力转移到哪里去了，急于寻找解放军主力作战，彭德怀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部署，以小部兵力诱敌北上安塞，主力隐蔽集结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甘谷驿等地待机歼敌。21日，敌主力向安塞扑去，另以整编第二十七师的第三十一旅旅部率1个团，由临镇向青化砭前进，担任侧翼掩护。解放军侦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以5个旅的兵力赶到青化砭周围设伏，求歼敌第三十一旅主力。25日，该敌进入我伏击圈，解放军采取拦头、断尾、两翼出击的战法，仅以1小时47分钟的战斗，将该敌2900余人全部歼灭，俘其旅长，取得撤出延安的第一个胜利。

## （二）坚持让帅旗在陕北高高飘扬

青化砭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陕甘宁边区广大军民的斗志，也为中共中央进一步确定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提供了实践依据。

3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5位书记先后转移到子长县的王家坪。青化砭胜利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能好好地打胜仗。”他不同意给陕北增调部队，说：“不能再调部队了，陕甘宁边区巴掌大块地方，敌我双方现在就有几十万军队，群众已经负担不起，再调部队，群众就更负担不起了。”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3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留在陕北的决定。当天，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到晋西北去布置工作，安排中央后方机关的行动。

3月29日，中共中央转移到清涧县的枣林子沟。当晚，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问题。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第二天，毛泽东打电报给周恩来：“中央决定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少奇主持下进行各项工作。”要求周恩来“接电后请你于数日内回来，嗣后即由毛、周、弼三人主持中央。”“我们准备移至安定、保安之间。为免被敌隔断，故请你早回河西，河东事由刘、朱、董、叶处理。”

周恩来接到电报后，于4月2日返回陕北。4月10日，在靖边县的青阳岔与毛泽东、任弼时会合。与毛泽东、任弼时研究了晋西北之行的情况后，中央作出新的决定，在晋西北的中央工作机构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回到陕北，一部分去太行，一部分暂留原地不动。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刘



少奇、朱德、董必武、康生、彭真为常委，到华北领导全国土地改革和建设根据地的工作。董必武担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中央及军委大部工作机构暂留晋西北，组织后方委员会，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李维汉、邓颖超为委员。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又称前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前委。按照军事编制，编为一个支队，先由任弼时任支队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后由周恩来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周恩来提议，为了保密，每个人应起个代号。毛泽东说，我们一定得胜，我叫李得胜。周恩来说，革命事业必定成功，我叫胡必成。任弼时问，我叫什么呢？毛泽东说，你是支队司令，就叫史林；定一同志是政委，就叫郑位吧！4月12日，周恩来同中央机关转移到靖边县王家湾（今属安塞县），在这里停留了56天。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住在两孔半窑洞里，不仅指挥着陕北战场的作战，而且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因总参谋长彭德怀在前线，又实际担负起总参谋长的重担，成为毛泽东的第一军事助手。他们每天通过电台和各个战略区联系，共同研究各地的作战方针，商议起草电文，指挥全国战事。正如毛泽东在1950年回顾这段历史时所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周恩来自己也曾说：“我们领导革命战争时，在全国、在中央决定问题的只有三个人。当时中央书记处共有五个人，分散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刘少奇同志和朱德同志，他们领导全国土改，搞根据地；在中央只有三个人，毛主席、周恩来与任弼时同志，所谓中央，就是这三个人嘛！”

### （三）指挥粉碎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

中央机关迁到王家湾后，成立了一个军事组，直接受周恩来指挥，主管作战方面的工作。曾在军事组工作的作战参谋张清化卧亿说：

“在这个阶段，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周副主席在军事上是党中央、毛主席完全不能缺少的得力助手，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军事组织者和指挥者。当时他运筹帷幄，出谋划策，深得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和全军的拥戴。凡是党中央研究、毛主席下了决心以后，具体的组织布置和如何执行等都是周副主席具体来抓的。无论前方或后方，无论是后勤供应或部队调动，总离不开他的具体的组织指挥。”

这段时间里，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指挥下，无论是遭受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的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还是其他战场，都接连取得了重大胜利。正如周恩来所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西北战场** 青化砭战斗后，胡宗南发现西北野战军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即令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主力共11个旅向延川、清涧地区前进。这次胡宗南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改变了战术。他令部队开进时；几个旅集结为一路，数路并列，缩小间隙，便于互相策应。国民党军这种“滚筒”式的战法，减少了被解放军各个击破的机会。根据敌情的变化，毛泽东、周恩来及时致电西北野战军首长，指出敌情正在起变化。我军主力在现地隐蔽待机，以三四个营各带电台四面袭扰敌人，长时期地疲惫、消耗敌人，耐心等待敌人弱点的暴露和兵力的分散。结果胡宗南的11个旅在陕北转了一大圈，不仅没有找到解放军的主力，反而使部队疲惫不堪，只好南撤到蟠龙、青化砭休整，4月12日，胡宗南判断解放军主力在蟠龙、青化砭西北集结，即令其主

力8个旅向青化砭西北方向前进；令第一三五旅从瓦窑堡南下策应。中央军委获悉敌人的这一动向后，周恩来当即令军委电告西北野战军首长，并指示以伏击手段歼敌第一三五旅。14日晨，敌第一三五旅进至羊马河地区时，被我预先埋伏在那里的4个旅包围，经8小时激战，全歼该旅4700余人。获得了我军撤离延安后第二个胜仗。

4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总结西北我军前段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发出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这种办法叫‘磨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西北野战军继续在陕北与敌人周旋。敌军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为防止遭伏击，只走小路，不走大道，连续行军，露宿荒野，部队被拖得苦不堪言，减员日益增多，但仍找不到西北野战军的主力，反而使自己陷入兵疲粮缺的困境。国民党军后来在总结陕北作战的教训时写道：“战斗遂行中，我军因情报搜集无法深入匪区，仅凭无线电测向及空军报告以为研判之资料，影响于指挥及部队间之行动不小”。而共军“始终凭藉其严密之情报封锁，灵活之小后方补给，以避实击虚，钻隙流窜……尤以陕北原已人烟寥落，匪复利用其地方组织，将仅有之人与物等可资利用之力量，全部撤离。使我军行动之区，渺无人迹；行军作战，均发生极大之困难”。4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研究了陕北战况后，指示西北野战军，以小部兵力诱敌主力北上绥德，以2个旅打援，以4个旅围攻蟠龙守敌。周恩来还专门找负责情报的二大队队长胡备文，要求在3天内破译胡宗南部的全部密码，为蟠龙战役提供情报。二大队如期完成了任务，为蟠龙战役提供了可靠的情报保障。5月2日夜，西北野战军向蟠龙守敌发起突然进攻，经两天激战，全歼蟠龙守敌第一六七旅等部67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给养。

为了庆祝“三战三捷”，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到安塞县的真武洞，出席西北野战军的祝捷大会。14日，祝捷大会召开，会场周围漫山遍野都是人，群情激奋。彭德怀宣布大会开始后，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代表中共中央祝贺你们，我代表中国人民感谢你们。并宣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自从撤出延安后，一直留在陕北，同边区的全体军民共同奋斗。他说，蒋介石、胡宗南梦想赶走中共中央，消灭西北解放军，征服边区人民，但是一件也没有做到。他号召边区军民团结一致，下定决心，坚持斗争，彻底消灭胡宗南部队，彻底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早日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这次大会，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战胜胡宗南集团的信心。

会后，周恩来和彭德怀具体研究了野战军主力西进，打击马步芳、马鸿逵部，收复其乘我军与胡宗南作战之机蚕食的陕甘宁边区的区域。从5月29日西进，至7月7日，西北野战军先后发起了陇东、三边等战役，基本收复了被马鸿逵、马步芳所蚕食的地区。

**山东战场** 2月下旬，华东野战军在山东莱芜取得一战歼敌5.6万余人的胜利后，蒋介石集中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人，分南北两线，以南线为主，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坐镇徐州指挥，企图继续寻找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毛泽东、周恩来等军委领导人根据敌重兵逐步集中山东战场的情况，研

究华东野战军的作战方针，认为在山东我仍需坚持内线作战，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他们发电报给华东野战军首长，指示：“考虑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大量歼敌，即是对于敌人之威胁与对于友军之配合，不必顾虑距离之远近。转入外线之时间现亦不必顾虑”。为此，“对敌津浦集团”北进不要阻止，让其进至泰安一线，于我最为有利。”要求华东野战军“在今后十个月内，以平均每月歼敌四个至五个旅……共须歼敌四十至五十个旅”。指示还要求华东全军在3月份彻底休整，以利尔后作战。

华东野战军经过1个月的休整后，在鲁南、鲁中地区实行高度机动回旋，力求调动敌人，捕捉战机，先后歼敌2.8万余人。但由于敌人吸取了莱芜战役的教训，在进攻中保持高度警觉，采取密集平推、稳步前进、遇攻即缩、不轻易分兵的新战法，而我军耐心持重不够，因而一些战斗未能达成目的。毛泽东、周恩来根据华东战场情况的变化，研究确定了我军的行动方针，由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起草电报，指示华东野战军：“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你们后方移至胶东、渤海，胶济线以南广大地区均可诱敌深入，让敌占领莱芜、沂水、莒县，陷于极端困境，然后歼击，并不为迟。惟（一）要有极大耐心；（二）要掌握最大兵力；（三）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凡行动不可只估计一种可能性，而要估计两种可能性，例如调动敌人，可能被调动，亦可能不被调动，可能大部被调动，亦可能只有小部被调动。凡在局势未定之时，我主力宜位于能应付两种可能性之地点。”

陈毅、粟裕认真研究了中央军委的指示，总结了前一段作战的经验教训，决定野战军主力后退一步，并以一个纵队隐蔽在鲁南地区，待机配合主力作战。我军主力后退后，坐镇徐州指挥对山东实行重点进攻的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判断华东地区解放军在他们稳扎稳打战术的打击下，已难以在鲁中地区持久作战，津浦集团，指集结于津浦铁路沿线的兖州、邹县、滕县地区之国民党第七军、整编第十一、第六十四、第二十师等部。开始撤退了。于是命令各部“跟踪进剿”。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自恃辖有6个整编师的兵力，改变稳扎稳打的战法，不待友邻兵团统一行动，急于争功，即令以整编第七十四师为主，向北进犯。敌整编第七十四师是国民党军自诩为“五大主力”之首的以美械装备的精锐部队。全面内战爆发后，曾几次与我军交手，尚未受到重大打击，也助长其骄狂的气焰。打掉国民党军这张“王牌”，是华东野战军的夙愿。5月12日，汤恩伯命令其第一兵团继续北犯。13日，华东野战军两个纵队以隐蔽的动作分别楔入了敌第七十四师与左右邻的接合部。第七十四师发现后立即收缩兵力，但已来不及了。华东野战军以5个纵队将敌人合围在孟良崮。顾祝同以为该师战斗力强，且与左右邻靠近，正是与我进行决战的良机。于是一面命令第七十四师坚守孟良崮，吸引我军主力，一面督令10个整编师分路向孟良崮驰援，企图内外夹击，聚歼华东野战军主力。我军主攻部队对被围之敌加速猛攻，以求迅速全歼该敌。经过3天激烈战斗，终于将敌整编第七十四师及整编第八十三师1个团共3.2万余人全部歼灭，击毙师长张灵甫，迫使进犯的敌军全线溃退。这是一个震动全国的大胜利。蒋介石在东西两翼发动的重点进攻都遭到严重挫败，已成为强弩之末了。

**其他战场** 由于蒋介石集中兵力于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并且又被解放军牢牢牵制住，使得其他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无力对解放军发动新的进攻，处于全面守势，这又给各解放区创造了大反攻的有利条件。

**豫北、晋南两个战场。**由于蒋介石把许多部队抽到陕北和山东，豫北、晋南的兵力空虚。刘伯承、邓小平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兵分两路，一路由陈赓率领，在晋南战场作战，主要配合西北野战军击破胡宗南集团，主力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在豫北战场配合华东野战军击破顾祝同集团。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刘伯承、邓小平的率领下，于4月初插入敌人纵深的新乡、郑州之间地区，辗转机动歼敌5000余人，迫使蒋介石将原拟调往山东的两个整编师调往豫北对付晋冀鲁豫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避开优势之敌，挥师北上，诱敌深入。4月16日至18日，以预伏重兵出击的手段，全歼国民党军第二快速纵队，然后乘胜追击，一仗歼敌2万余人，收复县城3座。5月1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以突然的动作包围了汤阴，经两天激战，全歼敌暂编第三纵队。接着晋冀鲁豫野战军再次北上，一路作战，历时两个月，共歼敌4万余人，控制平汉铁路150余公里，有力地支援了华东野战军在山东的作战。

在晋南，由于胡宗南抽调了7个正规旅的兵力投入到陕北战场，毛泽东、周恩来根据晋南敌人兵力空虚的情况，及时发出指示，要求晋南我军“须在三、四两月消灭晋南胡军几部分，基本改变晋南局势”，并“配合边区作战，阻止胡军进攻延安”；同时强调在晋南作战中，“自己须完全立于主动，各个消灭敌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晋南我军于4月4日发起攻势，向临汾以南地区出击。经过1个多月的连续作战，歼敌1.4万余人，收复除运城、安邑、临汾以外的全部晋南地区，并且使吕梁、太岳两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打破了敌人在晋南的防御体系，使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敌军侧后暴露在晋南我军面前，处于晋南我军威胁之下，从而有力地策应了陕北我军作战。

**晋察冀战场。**毛泽东、周恩来研究了华北战场的敌我情况，并根据前段作战经验，就晋察冀军区的作战方针，多次发出指示：今后作战应采取大踏步进退，不拘于一城一地的得失，完全主动作战。即“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周恩来还指示军委电告晋察冀军区首长，应以有利于集中我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为基准，独立作战。不论在何地作战，只要能歼灭敌人，就是对于其他地区的配合。晋察冀我军根据军委指示和当面敌情，决定举行正太战役。第一步攻歼石家庄外围之敌；第二步乘胜沿正大路西进，歼击正大路沿线之敌和太原方向可能的援军。战役于4月9日发起，至5月4日止，晋察冀我军共歼灭敌人3.5万余人，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进一步孤立了石家庄之敌。正太战役后，中央军委又及时指示晋察冀军区，下一步作战必须钳制关内敌军，不使其增援东北为目标，晋察冀我军于6月中旬继续发动攻势，先后解放3座县城，歼敌2万余人，将原拟增援东北的敌第九十四军1个师牵制在华北战场，有力地策应了东北我军的夏季攻势。

**东北战场。**东北局根据东北地区的敌我情况变化，认为北满根据地已基本巩固，且有松花江阻隔，无需重兵防守，现应将战略主攻方向与主要兵力移向南满。决心以主力大举南下，打通北满与南满的联系，把两个拳头合为一个拳头，放手打击敌人，以彻底改变东北战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批准了东北局的计划。1947年5月中旬，东北我军开始发起夏季攻势。第一

阶段，北满主力和东满、西满、南满的部队同时向当面之敌防御薄弱部位发起攻击，经过半个月作战，歼敌近5个整师，沟通了东、西、南、北满的联系，切断了北宁路，割断了国民党军关内外的陆上联系。第二阶段，东北我军向四平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我军曾一度攻进四平街，后因敌军大批援兵赶到，且队形密集，打援困难，随即主动撤出战斗。历时50多天的夏季攻势结束，东北我军共歼敌正规军4个整师，连同非正规军共8万余人，攻克城市36座，迫使敌人收缩于中长路四平南北段和北宁路沈阳、山海关段的狭长走廊地带，使东北我军在东北战场获得了进一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的极为有利的条件。

#### 转战陕北 西北野军主力西进之后，国民党整编第

二十九军军长刘勘亲率四个半旅，沿延河北上，寻找中共中央领导机关。6月8日，其先头部队进到离王家湾只隔一个山头的寺湾，而中央警卫部队只有4个连300来人，情况相当危急。毛泽东、周恩来沉着处置，留下一个加强排在王家湾掩护，中央机关冒着大雨连夜向西转移。临行前，周恩来一个窑洞一个窑洞地检查，不让留下一点中央机关住过的痕迹。当夜，风雨大作，天黑路滑，伸手不见五指，加上山路狭窄，泥泞难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没有穿雨衣，同干部、战士们一起，手拉着手，互相搀扶着，翻山越岭，艰难地前进着。天亮时，队伍到达靖边县的小河村。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一行，就在小河村休息。下午1时，周恩来接到报告，一股敌人正从王家湾向小河村扑来，离这里只有十来里路。他立即命令警卫团长刘辉山派1个排带1挺机枪到村东的制高点监视敌人，然后率领队伍迅速撤离小河村。部队还没有出村子，大雨又下起来了，霹雳电闪夹着豆粒大的雨点劈头盖脑地泼下来，小河水陡然暴涨，把河上惟一的一座小桥卷走了。部队只好重新架桥。在等待架桥这段不长的时间里，侦察员先后几次向周恩来报告，敌人离这里只有8里、7里……4里了。周恩来严肃地命令刘辉山：“告诉留在东山上的那个排，敌人不进村，不许开枪。敌人和他们接火以后，要坚守阵地，阻击敌人，掩护主席和全支队转移之后再撤！”到天黑时，浮桥终于搭好。部队刚过河，爬上河对面的山顶，后面就传来了激烈的枪声。留在小河东山的警卫排已同敌人接上了火。不一会儿，左侧山沟里和山头上都燃起了篝火。敌军军官的叫骂声和骡马的嘶鸣声全都听得清清楚楚。但是敌人对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就在他们身边仍懵然不知，更没有发现支队的行踪。周恩来通知任何人不准打手电，不许抽烟，不许有喧哗声，继续前进。队伍静悄悄地冒着风雨摸黑向西继续前进。天快亮时，雨停了。当清晨红日升起的时候，队伍到达了天赐湾。这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转战陕北期间最困难的一段历程。

天赐湾的坡下面就是通往保安的小路。部队正准备生火做饭，侦察员就来报告，敌人向这个方向出动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判断敌人的去向可能是保安，只要隐蔽好，就不会有问题。果然敌人顺着山沟向保安方向开过去了。不久敌人又有队伍向这个方向过来了，周恩来为了中央机关的安全，决定派出1个排把敌人吸引走。这个排装着和敌人遭遇的样子，边打边向西南方向撤退，把敌人越引越远。天赐湾村子太小，中央机关在这里不便展开工作。1个星期后，形势稍见缓和，毛泽东、周恩来即率队伍又返回小河村。几天后，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一次极为重要的军事会议，决定人民解放军开始转入战略进攻的新阶段。

人民解放军在 1947 年 3 月至 6 月的 4 个月里，歼灭国民党正规军折合 31 个旅，连同非正规军共计 40.7 万余人。敌占我城市 95 座，我收复城市 153 座，得失相抵我军净得 58 座。敌人在陕北、山东两个主要战场损兵折将，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愈陷愈深，其重点进攻已基本被挫败。在其他战场上，敌损兵失地，连主要的点线也难以连起来。战争形势的这个变化，表明战争的主动权已开始逐渐转入人民解放军之手。人民解放战争将翻开新的一页。

## 二、参与制定尽早转入战略进攻的英明决策

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了整整一年，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召开会议总结一年来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情况，研究下一年的战略方针和作战任务。

周恩来作为人民解放军总部的主要领导人，亲自组织力量进行一年战争情况的总结，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制定新的作战方针提供依据。他打电报给各地区和各野战军，要求各种材料和统计数字必须准确无误。他向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交代了需要总结的项目、内容和完成的时间，反复审查和修改各种图表和文字材料，并准备在会上作军事总结报告。

1947 年 7 月 21 日至 23 日，中共中央前委在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除留在陕北的中央领导人外，还有彭德怀、习仲勋、贺龙、王震、陈赓等。

在会上，周恩来作了人民解放战争第一年的总结报告。他说，过去一年蒋军有了极大的变化。从建制人员、武器说，都损失了约 1/3，从质量说，不止降低 1/3。敌军在去年 7 至 10 月，占领解放区 104 座城市，兵力分散；1947 年 11 月至 1948 年 2 月，敌军逐渐集中兵力，但在此期间我歼敌最多，城市则得失相当；3 月至 6 月，敌军攻势已成弩末，仅在山东、陕北两处进攻，在其他各处我都转入反攻，得城市 62 个。人民解放军在去年停战时，主力、地方部队共 140 多万；复员中减少一些；7 月大打后又陆续增加，连后方机关共达 190 多万人，已超过解放区的负担能力。所以，今后发展必须求之于新区，主力的发展则求之于地方部队的升级。

这次会议的一个主要议程是研究讨论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尽早转入外线作战，提前实施战略进攻的设想与方案。战争发展的一般规律，就防御的一方来说，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反攻两个阶段。在基本收复失地，积蓄的力量大于对方的力量时，才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夺取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人民解放军转入外线作战设想的主要依据，一是从国际斗争发展的趋势来看，为了减少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避免增加人民革命进程中的困难，需要中国人民加快解放战争的进程，力争在帝国主义国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疲劳和创伤中恢复过来之前，打败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二是解放区大都是敌后抗日军民队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得来的，这些地方曾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的摧残，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人民生命财产遭到极大损失，无论从人力还是物力、财力上支持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均有限。三是从军事上看，蒋介石以长江为其基本线，以南是他的主要基地，长江以北至黄河、陇海铁路之间是他极力要控制的地区，并作为他向解放区进攻的主要攻击线。两线之间靠津浦、平汉两条铁路相连接，加上长江航运和陇海

铁路，形成了一个交通运输网，在这个交通运输网络的支持下，其华东、华中、西北三个战场可以相互配合，东西呼应。人民解放军如果能够派出数支大军，一路从津浦路东、一路从津浦路西、一路从平汉路西南下，直插长江边，依托苏中、鄂豫皖、桐柏三个老解放区实施展开，就可直接威胁蒋介石统治的上海、南京、武汉等心脏地区，势必使其交通运输网络七零八落，打乱蒋介石在南线的整个军事体系，三个主要战场将被切割孤立。这对于人民解放战争来说将是极好的形势。

毛泽东、周恩来的这一设想已有很长时间了。早在1946年6月，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停战的周恩来，看出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已不可避免，便向中共中央提出：“我如以两支强兵南下，一插津浦路东，一插路西，直抵江边，京沪局势必将大乱。”这是大军南下，中原突破的最初设想，得到中央的重视和接受。6月22日，毛泽东曾经设想了一个外线作战的方案。这个方案是：“太行区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应以最大主力出出于豫东区域”，“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山东区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以渤海对付济南，其余鲁中、鲁南、滨海三区主力及新四[军]主力全部南下”，“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为了配合上述计划的实施，同时命令新四军五师向西突围，钳制河南之敌，命令新四军苏中野战军对付江北之敌，配合作战。“上述作战胜利……后，如形势有利，可考虑以太行、山东两区主力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并且强调：“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的精神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可保障五师不致被消灭或吃大亏”。并认为：“这一计划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并不冒险。”

6月下旬，蒋介石虽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但是广大中间人士还被美国政府和蒋介石的和平谎言所蒙蔽，对和平还抱有幻想。周恩来为了彻底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争取尽可能多的第三方面人士，提出“在军事战略上应与政治相配合”，主张在伪“国大”召开的前后，解放军不宜打到外线，以利于争取中间力量。同时从苏中战役的基本经验来看，人民解放军尚未完成从游击战向大规模运动战的转变。许多正规兵团刚刚组建，广大指战员还没有树立起运动战的意思，部队的组织指挥、军事训练等许多方面，还不适应运动战的需要，作战还离不开依托解放区。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于10月15日，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暂不实施外线作战的方针。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于12月20日在给陈毅、粟裕的电报中，明确提出了“在内线多歼灭几部分敌人再转外线作战更为有利”的主张。

到1947年初，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被粉碎后，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考虑外线作战的问题。他们先后两次指示华东野战军和晋冀鲁豫野战军，要准备在五六月间举行战略出击，“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努力争取于五一以前在内线解决蒋军主力，并完成外线作战的一切准备条件”。5月4日，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遏制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重点进攻的势头。毛泽东、周恩来根据新的情况，对整个南线的战略进攻作了通盘规划，初步决定：“（一）刘邓陈粟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顾祝同系统。（二）晋南（陈谢）陕北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胡宗南系统。（三）刘邓军十万立即开始休整，已东以前完毕，已东后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

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并与陈粟密切配合行动”。“（四）陈谢主力（四个旅）在现地工作待命，随时准备从下流或从上流渡河，受彭习指挥，歼灭胡宗南及其他杂顽，收复延安，保卫陕甘宁，夺取大西北。”

根据中央军委的计划，晋冀鲁豫野战军率先开始行动，于6月下旬发起鲁西南战役，在鲁北强渡黄河成功。这时，华东野战军4个纵队正分两路向费县、枣庄和泰安、大汶口挺进，形成与刘邓野战军夹运河东西呼应作战的态势，严重威胁着进攻山东之敌的侧翼和后方。

7月19日，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会见先期来到小河村的陈赓。他们认真研究了陈赓集团的任务，认为陕甘宁边区土地贫瘠，人口稀少，国民党军队已侵入到中心地区，陕北的群众已负担不起更多的部队了。当前战略方向的重点在中原，把陈赓集团的力量投入到中原战场，则更有利于中央经略中原计划的实现。于是决定陈赓集团改为由晋南强渡黄河，在豫陕鄂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配合刘邓大军向中原出动。

小河会议对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的设想和部署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认为，我军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基本上挫败了重点进攻，使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蒋介石的总兵力由战争初期的430万人下降到373万人，正规军虽然还保留着248个旅的番号，但其中有113个旅被歼灭或遭受过歼灭性打击，有些虽然得到补充，但战斗力严重削弱。由于国民党整师、整旅地被歼灭，大批高级将领被击毙或俘虏，敌军士气急剧下降。在兵力部署上，蒋介石用227个旅进攻解放区，而在长江以南及西北等19个省境内只有21个旅，作为战略预备队和维持战略后方安全，后方极度空虚。在军事处境日益不利的同时，蒋介石的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加剧。蒋管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工农业生产迅速下降，人民生活更加贫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迅速扩大。蒋介石为了摆脱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困境，于1947年7月4日发布了《全国总动员方案》，接着又颁发了所谓《动员勘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加紧搜刮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战争。蒋介石还千方百计乞求美国援助。因此，毛泽东、周恩来的外线作战设想是完全必要和及时的。

与敌人情况相反，人民解放军不断发展壮大，总兵力已由战争初期的127万人增加到195万人，虽然总兵力仍少于国民党军队，但是机动兵力的人数已超过敌人；由于解放军坚决贯彻了“以战养战”的方针，部队装备得到很大改善；在战争中广大指战员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军事素养有了很大提高，士气旺盛，对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充满信心；解放区普遍实行了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提高了发展生产和支持战争的积极性。但同时由于战争已深入到解放区的中心地区，解放区受到很大摧残，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十分困苦，人民解放军在人力、物力上都遇到很大困难。因而必须尽早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将蒋介石的战争补给能力和战争支持能力为我所用，这样既可以减轻解放区人民的负担，又可以加速国民党军队的崩溃瓦解，一举两得。

会议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二年的作战任务和战略方针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



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

会后，周恩来给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和警卫部队领导干部作了报告，传达小河会议精神，回答了为什么要在解放战争一年后提出大反攻？提出大反攻以后又是怎样个打法？他着重讲解了中央制定第二年作战方针的依据和如何打垮蒋介石的问题。他说，我军去年到今年6月是战略防御，现在是战略进攻，进攻才能打垮蒋介石。光在解放区是打不垮蒋介石的，还要打出去。我们提出大反攻，打垮蒋介石的口号是适当的，有人民的同情的。现在我军准备用三路，刘邓大军打到大别山是第一路；陈谢大军打到豫西是第二路；陈粟大军越过陇海路是第三路，这三路大军都过了黄河和陇海路。他比喻说，黄河就像是蒋介石的外壕，陇海路则是他的铁丝网，长江是他的内壕。在中国中部有江、淮、河、汉四条大水。三路大军打过了蒋介石的外壕和铁丝网，要在江、淮、河、汉之间发展。东北解放军也已出击了，陕北大军也要出击。这是全国大反攻的形势。

周恩来进一步指出，要把蒋介石军队消灭在蒋管区是有把握的。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从敌人方面看，存在着兵力不足、后方空虚和人民反对三个弱点。周恩来着重分析了整个战场国民党军队的态势，指出，蒋介石军队在全国的部署分为南北两线，南线包括江苏、山东、河南、安徽、陕西等省，北线包括东北、晋察冀、冀东等省。在南线蒋介石集中150多个旅的兵力，除胶济线上的18个师可用于机动作战外，整个南线没有进攻力量。北线集中70个旅，只有河北的29个旅可以出击，东北、山西等地均只能防御。从新疆、甘肃、青海，经长江以南各省直到台湾，只有21个旅。其中有8个旅在新疆抽不出，云南、台湾各放2个旅，整个江南只有9个旅，后方极为空虚。所以从全国的形势看，打垮蒋介石是完全有把握的。加上国民党政治破产，贪污腐化，人民反对国民党，拥护我们，这就是打出去的根据。

从我们自己方面看，有愈战愈强、土地改革、扩大解放区三个优点。周恩来指出，人民解放军愈战愈强，在战争初期只能消灭敌人1个旅1个团，而最近刘邓大军一次就消灭敌人10个旅。山东也是如此，陕北现在可以消灭敌人1个师，包围5个旅。解放军的人数增加，力量强大了。这是打出来和锻炼出来的。我们军队的补充有两方面来源，翻身农民和捉俘虏。有的俘虏一抓过来就帮助我们打敌人，因为他们都是贫苦农民。我们是为农民办事的，农民拥护我们。我们现在有200万正规军，大的打出去，小的又成长起来，正规部队打出去，地方兵团又壮大起来。实行土地改革，90%以上的农民都赞成。现在华北正在开土地会议，宣布土地法。这样我们就无敌于天下。扩大解放区，打出去吃蒋管区，负担是蒋管区。把蒋介石抓壮丁的计划打破，使他今后的兵员更加减少。这都是我们的有利条件。我们也有困难，那就是地形不熟，蒋管区的人民有的对我们还不了解，但是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

三是看国际形势是否允许。周恩来说，国际问题大家所关心的就是美国对蒋仍在援助。但是我们开了门就要看到全世界，不只看到美国。美国能帮助蒋介石什么东西呢？一是给军火。过去帮助装备了45个师，东北多，山东多，但我们在两地缴获也多，正合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兵工厂就在前线，军械来的多并不可怕。二是借款。过去帮助40亿美元，到现在还是破产，物价更飞涨。蒋介石就是个败家子。美国在世界各地借款救济的结果，欧洲还是经济恐慌，亚洲打仗，殖民地要解放。美国为了卖东西才向外借款，不能

解决问题。在欧洲的账单，16个国家就需借224亿美元，美国全年预算才300多亿美元，中国也要，土耳其也要，加拿大也要。蒋介石放到了第四位。魏德迈来中国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更加殖民地化，为了把军事基地、海港、矿山，权利都归美国。三是直接出兵。美国有110万军队，很多地方都要摆兵，至多抽20万军队来中国，也算不了什么。我们把日本兵都打了，美国兵是少爷兵还能打仗？他是虚张声势，是纸老虎。另一方面，他来20万军队，更暴露了他是侵略中国，便利我们动员全国人民。原子弹吓不了农民战争。当然有美国的帮助，给我们增加一些困难。但只要一分析，克服了困难就是胜利。美国东西卖不出去，工厂就要关门，工人罢工闹革命，二次大战后，全世界有14个国家闹经济危机。相反，苏联的五年计划成功，欧洲许多国家革命成功，越南正闹革命，缅甸、马来亚都闹革命，都要起来。意、法、德共产党都发展很快。世界人民的力量一天天起来，从世界潮流看，我们也有把握打垮蒋介石。

周恩来还回答了打垮蒋介石需要多长时间的问题。他说，今后两年是关键，解决问题，要到第三年，可能到第四年。中国革命是从乡村到城市，乡村包围城市。主力打出去，地方兵团起来“拔钉子”。打了胜仗也不要骄傲。信心是定了的，但要有克服困难的忍耐心。每个同志像一颗螺丝钉，全国全解放区是一架大机器，大家都动作起来，发挥自己的作用。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周恩来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中共中央提前转入战略进攻的主客观条件，坚定了全党全军以及全国人民的信心，为夺取战略进攻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小河会议召开前夕，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根据中央的意图，率先向外线出击，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歼敌4个整编师师部、9个半旅共6万余人，拉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小河村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研究了刘邓大军出击鲁西南，华东野战军西兵团出击鲁南、鲁西后的形势，认为我军已开始取得战略主动权。为了确保和扩大战略主动权，我军应该改变原定逐步向豫皖苏边区和鄂豫皖边区发展的计划，争取在其他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回援之前，先敌直插鄂豫皖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中指出，湖北全境空虚，你们如能乘胜攻占长江以北、大别山以南各线，必能威胁长江，分散敌人，开展局势。7月23日，中央军委指示刘伯承、邓小平：“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此后，毛泽东和周恩来进一步研究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认为敌人可能采取三种办法对付我军。一是“迅速组织进攻”；二是“宁可给我以立足机会，不急干尾我进攻”；三是“同时采用上述两种办法，既以十二个旅左右分数路迅速进攻，又从山东抽调十几个旅用于长江方面”。他们立即电告刘伯承、邓小平，并要求他们“必须同时准备对付这几种办法，而主要准备对付第一种办法，即用全副精神注意于运动中大批歼灭敌人，一切依靠打胜仗”，实现挺进大别山的任务。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刘邓大军在华东野战军5个纵队的掩护下，于8月7日以突然的动作跳出敌人即将形成的合围圈，向南疾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刘邓大军以锐不可当之势，先后跨越陇海路、黄泛区、

沙河、涡河、汝河、淮河等重重障碍，经过 20 多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在 8 月末进入大别山区。随后，部队又克服极度疲劳，粮弹匮乏，疾病流行，减员严重，以及缺乏在南方天候、地形条件下的作战经验等严重困难，摆脱国民党重兵的合击，以主力出皖西、鄂东，先后取得歼敌 1 个整编师及 3 个半旅的胜利。经过艰苦斗争，到 11 月下旬，共歼敌 3 万余人，并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初步完成了大别山区的战略展开。

与此同时，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大岳集团共 8 万余人，在西北野战军的配合下，于 8 月 22 日开始，以偷渡与强渡相结合，从晋南豫北交界处突过黄河，乘胜向陇海路发展，东逼洛阳、郑州，西叩潼关，往返机动作战，吸引了尾追刘邓大军的 4 个旅回援。陕北方面，胡宗南也急忙将主力南撤，拱卫西安。陈谢集团随后挥师南下，以一部向陕南进击，主力向豫西沿平汉路两侧进击。到 11 月底，共歼敌 5 万余人，建立了 39 个县的民主政权，完成了在豫陕鄂边地区的战略展开，有力地支援了刘邓大军和西北野战军的作战。

当刘邓野战军向大别山跃进，山东敌军开始抽兵回援之际，中央军委立即命令华东野战军迅速以 6 个纵队组成西线兵团，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路以东广大地区实施战略展开，恢复与扩大豫皖苏解放区，与刘邓野战军和陈谢集团共同经略中原。陈毅、粟裕根据军委指示，挥师南下，在鲁西菏泽以东的沙上集歼敌整编第五十六师 9000 余人，迫使敌人再次队山东战场和大别山地区抽调 3 个整编师来援。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乘胜继续南下，越过陇海路，进入豫皖苏边地区。中央军委又及时指示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在一个月至两个月内只打小仗，不打大仗，分散作战。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实行土地改革，建立各县基干武装。至 10 月底，西线兵团歼敌 1 万余人，在沙河以南、淮河以北建立了拥有 1000 多万人口的新解放区，完成了在豫皖苏边地区的战略展开。

在人民解放军三路大军向外线出击的同时，毛泽东、周恩来指挥全国其他战场积极开展攻势，在华东、华北、东北和西北战场组织多次大的战役，大量歼灭敌军有生力量，牵制住当面之敌，下使南调，积极配合南线作战。尤其是在陕北战场，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令西北野战军结束在陇东的作战，回师向东，攻打榆林，调动胡宗南主力向北增援，配合陈谢、刘邓大军外线作战。为了更有力地指挥西北野战军作战，中央前委支队改由周恩来任司令员，于 8 月 1 日离开小河村，率领支队向东作长距离转移，向西北野战军总部靠拢。蒋介石得知我军攻打榆林，急令胡宗南派出 8 个旅分两路由南向北驰援榆林。另以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长钟松率领所属两个旅由西向东驰援榆林。军委立即指示西北野战军撤围榆林，休整待机，力争求歼其一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不顾自身安危，率领中央前委支队吸引向北开进的国民党军 6 个旅，向黄河边转移，拉开两路敌军的距离，为西北野战军创造歼敌良机。8 月 14 日，周恩来致电彭德怀：“钟松可能向南走二三十里，明日必向镇川前进，其目的是占米脂。刘勘五个旅十六日上午可到绥德。你们明日如集中八个旅打钟松于归德、镇川线以东以北的地区，是一个好机会，不知部署来得及否。”8 月 20 日，西北野战军将敌整编第三十六师诱至沙家店我军伏击阵地，一举全歼。中央前委支队经过 19 天的转战，也与西北野战军总部胜利会合。沙家店战役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改变了整个西北战局，使西北野战军开始由防御转入反攻。西北野战军最困难的时

期已经过去，战争的主动权已经掌握在解放军的手中。同时，这次战役把胡宗南集团的主力拖在陕北，有力地支援了陈谢大军南渡黄河、挺进豫西的行动。

在中央前委支队经历的那段极为紧张而又艰险的行军作战中，“周副主席是部队最忙碌、最辛苦的人，事无大小，都要亲自安排、布置、检查，他往往睡得更晚，起得更早。毛主席休息的时候，除了有特急电报，周副主席总不肯惊扰毛主席。他自己经常是睡上两三个小时，就会被秘书叫醒几次。前线发来的战况报告，如有新出现的情况和地名，周副主席为了使毛主席能集中精力考虑战略决策，总是亲自加上注释，附上小图，再送给毛主席阅示。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周副主席也总是细心观察，想尽办法使毛主席减轻劳累。”

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以“品”字形阵势展开于中原地区，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移到长江北岸，使这一地区成为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这是一个对解放战争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连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承认：“大部华中地区，全为匪军糜烂，我全盘战略形势，乃从此陷于被动。”这期间，中共中央于8月30日决定由周恩来代理军委总参谋长。周恩来担负起了落实中央战略方针的重任，他不仅组织指挥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的作战、而且指挥全国各个战场配合三路大军的行动，重新划分各内线兵团的作战区域和作战任务，建立健全新的组织领导指挥系统，组织了许许多多次大的战役。我军转入外线，实行无后方作战，部队遇到许多新的困难和新的问题。如到外线作战地形不熟，周恩来预先指示邯郸局翻印中原各省的五万分之一地图，以备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之用。针对外线作战部队后勤保障困难，周恩来一方面组织各有关解放区积极支援，另一方面指示各部队采取即俘即补的方针和弹药补充主要靠取之于敌的办法。为此，他要求部队注意打有准备有把握之仗，同时要求各部队严整军纪，争取群众，尽快在中原地区创造巩固的根据地，从根本上解决作战行动和后勤保障问题。总之，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出击外线，站住脚跟，经略中原的胜利，与周恩来精心的组织指挥、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分不开的。他为人民解放军提前转入战略进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三、总结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原则

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1947年底，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6月份以后，全国各个战场人民解放军的内线和外线的攻势作战，共歼敌75万余人，解放战争已转入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阶段，战争已经主要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国民党军队丧失了大量的有生力量，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入“全面防御”，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人民解放军在革命战争中所处的战略防御地位，这标志着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这是蒋介石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衰亡的转折点，是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衰亡的转折点。

为了全面制定中国共产党的行动纲领，准备夺取全国胜利，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会议，对有关问题进行充分的酝酿和讨论。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在中央前委驻地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召开了中央会议。会议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主持，深刻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研究讨论了彻底打败蒋介石

石、夺取全国胜利的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纲领政策。会议举行之前，召开了 18 天预备会议，与会人员分为政治、军事、土地小组对有关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

周恩来作为主持中央工作的书记之一，为开好这次会议做了大量的组织准备工作。他召开一系列小型会议，研究战争形势，研究土地改革的政策等问题。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他对军事问题的研究更加广泛和深刻。他对战争形势是这样总结的：战争的第二年，各条战线无例外地转入主动。开始于 7 月的刘邓渡河，使南线形势根本改变。现在，南线不但是大别山，就是江汉、桐枣地区也已站住了脚。比小河会议时不同，敌已完全被动。敌 248 个旅中，受过歼灭或歼灭性打击的达到 145 个旅。地区则发展得更快。停战令时解放区原有 230 万平方公里，现已恢复，约占全国的 32%。解放区人口现有 15000 万。在蒋管区群众斗争方面，学生运动在全面内战爆发后发生了三次高潮：抗暴，反饥饿、反内战，反暴行。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工人斗争也是如此。农村游击战争在粤、闽、浙、皖有很大发展。

更重要的是，在对战争形势分析的基础上，周恩来对人民解放军在历次革命战争中的基本经验，特别是解放战争的基本经验，进行了深层次的理论思考，写出了《军事原则》这篇充满辩证唯物主义光辉的军事理论文章。

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系统地归纳了人民解放军的基本作战原则，共有十条：

“一、避强就弱。先打分散之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

二、先面后点，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及广大农村，后取大城市。

三、歼敌为主，略地次之。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及地方为主要目标，后者是前者的结束，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

四、一点两面的包围战，歼灭性打击。劣势中的优势，转入全体优势。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五倍、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之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之目的。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就数量说，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但在局部上，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优势，保证战役胜利。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为优势，直到最后歼灭一切敌人。

五、无准备、无把握不打。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之把握。

六、勇敢牺牲，不怕疲劳。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与连续作战（即短期内不休息地连续打几仗）的作风。

七、运动战与阵地战。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意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及城市。

八、区别攻城战的各仲情况。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城市，则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之守备而又为环境所许可之据点及城市，则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之据点及城市，则等待条件成熟时，然后取之。

九、主要补充在前线。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及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十、间隙休整不要长。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与整训部队。休息时间一般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时间。”

周恩来说：“以上这些，就是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的主要方法。”

周恩来提出的这十条原则，是在分析、研究、总结、归纳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上提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些经验中，有许多是他在长期领导革命战争中总结出来的。

早在红军反“围剿”初期，周恩来就提出了“集中红军主力，实行各个击破敌人”；“如无胜利把握时，即不应采取决死的战斗”。在进入中央苏区领导和指挥红军反“围剿”期间，周恩来系统总结了红军的战术原则，提出了“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与敌人进行运动战斗，集中力量给敌弱点以重大打击”；“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军对敌人要塞用兵，应基于战略和政策必要上来决定，实行时又须依据当时情况来决定”；“利用战斗间断及配置后方的一瞬间来实施训练”。抗日战争时期，提出“袭击、截断敌人大道，劫夺敌人辎重弹药”；“积极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解放战争中，他又提出“现在是运动战，将来还要打阵地战”；“我们的办法，是一点两面，大胆地派部队从中间切断敌人”；“我们的供应主要取之于敌”等重要思想。所有这些，都是形成十条作战原则的重要基础。

周恩来从毛泽东、朱德等人民解放军的领导者、指挥者那里学习到许多军事理论与战略战术原则。如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三个月总结》、《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等文件，是周恩来归纳作战原则的依据。解放战争时期，各战略区的军事指挥员也都在探索和总结初期作战的经验，提出了大量符合客观实际的作战原则，他们给中央的军事报告和文电，都是周恩来提炼、总结作战原则的重要素材。

十条作战原则高度概括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经验，内容极为丰富。其精神实质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围绕这一基本原则，对作战方针、打击目标、作战样式、作战方法、作战准备、战斗作风及补充休整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形成了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十条作战原则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作战指导中的这些重要关系作了科学地阐述。

第一，先打弱敌与后打强敌的关系。这是战役、战斗中选择打击目标的重要问题。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把基点放在打弱敌上。歼灭了弱敌，强敌也就变成弱敌；分散孤立之敌、守备薄弱之敌被歼，中小城市收复后，集中强大、守备坚固之敌及大城市也就变弱了。

第二，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与保守地方的关系。在战争初期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歼灭敌人和保守地方两项目标不能同时达到。因此，我军的基本作战原则应该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周恩来说：“我用空城换他的军队，我丢掉100多座空城，换了他100多万军队、70多万俘虏”。“大城市得的早了也守不住”，“城市要在最后取得，才是牢靠的”。解放战争的实践证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越多，夺取城市就越多。战争初期一般着重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到战争中后期则是歼灭敌人和夺取城市并重。

第三，运动战与阵地战的关系。人民解放军在战争初期完成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后，主要的是运动战，辅以必要和可能的阵地战。但在转入

战略进攻之后，周恩来及时指出，现在是运动战，将来还要打阵地战。阵地战还未学好，火力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所以火力要发展。因为随着战略进攻的开始，敌人转入防御，为了推进战争的发展，人民解放军将不可避免地要对利用坚固阵地和大中城市组织防御、以防被歼之敌发起进攻。否则不仅不能大量歼灭敌人，还可能因此而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重新组织新的进攻，就不能达到收复失地，以至解放全中国的最终目的。

第四，准备、休整与连续作战的关系。在十条作战原则中，有三条规定了进行作战准备和休整补充的问题。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战争形势迅猛发展，为了不给敌人喘息机会，加快战争进程，需要进行连续作战，这就使部队补充人力物力和休整等问题更突出。解放军长期依托根据地进行战争，靠人民的支援和从敌人手中夺取人力物力补充自己。部队进入新区作战，人员物资消耗大，老解放区的支援难以很快跟上。这就更需要把补充人力物力的着眼点放在前线。周恩来及时指出：“我们的一切补给要取之于敌，过去只是武器取之于敌，今后要一切取之于敌。”部队连续作战，战场环境差，需要及时休整。因此，要求指挥员善于利用两次战斗和两个战役间隙休整部队，使部队能够打一仗战斗力提高一步，以利再战。

这些作战原则来自战争实践，并且经受了长期战争实践的检验，在人民革命战争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但与此同时，还必须有正确的战略方针作指导，为此，周恩来又写了文章的第二部分：

“一、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野战军与地方军相呼应，正规军与民兵相配合。

二、内线与外线配合，由内线转到外线，由外线形成内线，再由内线转往外线。

三、夺取敌人武器，加强自己，以提高技术和战术。

四、大踏步前进、后退和机动，与发动群众创造战场相结合。

五、节省人力、物力及弹药，用于歼灭敌人解决战斗方面。”

周恩来提出的五条原则系统阐述了战略指导中必须注意的几个关系。

第一，人民解放军进行的战争是人民的事业，需要军民一致，共同奋斗；需要全军一致，共同努力。周恩来指出，团结一致，密切协同，实行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野战军与地方军相呼应，正规军与民兵相配合，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才能充分发挥作战原则的作用。歼敌战机的形成与歼敌战场的选择，不仅要通过部队的大规模机动和密切配合来创造，还需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诸如封锁消息、迷惑敌人、支援前线等。离开了这些因素，人民解放军所进行的一系列伏击战、歼灭战都是难以取得胜利的。离开了人民的支援，离开了全军上下一致的团结，再好的方法也无用武之地。这与国民党军队分成众多的派系，相互之间明争暗斗，互相排斥、拆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第二，人民革命战争的规模从小到大，人民解放军的力量由弱到强，革命根据地的面积从无到有，这一整个发展过程是波浪式、跳跃式的。解放战争一年半的历程充分显示了这一规律。第一年解放军以内线作战为主，但周恩来还在南京时就指出，必须迅速在被敌人占领的解放区发展游击战争，同时在敌人战略后方的广大农村，只要有条件的，都要积极开展或准备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人民解放军在内线作战，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并没有采取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场那种平推式的方法，而是运用直接从内线跳到外线

作战的方式，由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出击到外线实施战略进攻，建立新的解放区，形成新的内线，再进一步向外发展。这种战略指导方针完全打乱了敌人的防御体系，并且使其很难形成稳定战线，大大加快了战争的进程，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第三，武器装备与战术技术的关系。早在红军时期，周恩来就强调，红军指挥员应研究和学习指挥以劣势装备的军队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方法。随着人民解放事业发展到战略进攻的阶段，运动战的规模越来越大，阵地战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战争对人民解放军的战术技术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从根本上说，武器装备决定了战术技术的高低。为了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就必须解决好武器装备与战术技术的关系。努力改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是提高战术技术的物质基础。周恩来指出，解放区军事工业基础薄弱，不能解决重武器和先进武器的供应问题。“我们的兵工厂就在前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只能注重从敌人手中夺取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以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战术水平。

第四，前方与后方的关系。人民军队长期处于农村及偏僻的不发达地区，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极其有限。到1947年底，解放区的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1/4；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县以上城市占全国的1/4。解放区的力量已负担不起现有200万人民解放军。在陕北战场，人民解放军有能力投入更多的兵力，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但是受到战场条件的限制，不能派更多的部队进入陕北战场，因为那里不能保证部队的粮食供应。后方支持战争能力的大小，直接制约了前方战役战斗规模的大小。随着战争规模迅猛扩大，人民解放军的数量还将继续增加，后方支持战争能力不足的矛盾将日益突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在到中央苏区后，曾着手建立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使苏区有限的财力、人力、物力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效能，用于解决反“围剿”战争的需要。为了解决解放区在战争中的这个突出矛盾，周恩来强调必须“节省人力、物力及弹药，用于歼灭敌人解决战斗方面”。同样，战争指导者也必须根据现有的力量来组织战役，既不能盲目扩大战役战斗的规模，造成战役战斗的损失，也不能缩小战役战斗的规模，使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能充分发挥其效益。

十条作战原则和五条战略指导原则的完整提出，表明周恩来军事思想和作战理论已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战争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敌我双方随着力量对比及战略战术的变化，都在不停地改变或调整自己的作战方法，以避免被动和力争主动。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后，人民解放军各级指挥员对战争规律的研究日趋深入，对作战原则的运用更加得心应手。面对我军战略战术的变化发展，国民党军队将可能采取什么样的应变措施，这是作为一个战争指导者所必须进一步了解和研究的。周恩来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对蒋介石针对人民军队的作战原则可能采取的对策，作了分析和研究。他写道：

“敌人可能之对策：

一、强守弱跑。强者守，弱者跑。

二、大者守，中者诱，小者弃。大城市筑坚固工事，以中等力量守之；中等城市或集重兵或备援兵，诱我往攻；中等城市无重兵可守、可援者及小城市退给敌不守，有利时调重兵反攻。

三、消耗当之。以消耗战为主，守则坚守，攻则穷追，不受城市及地域



的牵制，尽力摧毁一切战争人力资源。

四、避免包围，坚持消耗，保持全面优势，争取扫荡优势。坚持消耗战，避免被敌孤立包围、分散兵力；坚守据点，强大兵力连环前进，分散固守，集中扫荡；守点线为劣势，扫荡面争优势。

五、迫敌作战，逼迫敌人打无准备、无把握的仗，以增加其消耗。

六、轮番战术。准备连续轮番作战，增加敌之疲劳、消耗。

七、变运动战为阵地战，变速决战为消耗战。以连环前进避免被围，以轮番作战增敌疲劳，使运动野战转成村落阵地战，造成对方很大消耗，调集各路增援，准备连续决战。

八、坚守弱退，中等相机。守城原则，弱者退；中等工事而又有援可增者守，否则退；城坚者必守。

九、焦土战。摧毁乡村，集中人力资源，退者攻者炸毁一切，使一无所有。

十、调兵轮战。调援兵力，轮番作战，使自己有休整，使敌人无喘息。”

尽管蒋介石可能采取这样那样的办法，企图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但这是徒劳的。蒋介石也不可能采用人民解放军的这些军事原则挽救其即将覆灭的命运。因为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原则是建立在人民战争思想基础上的，离开了人民的支援，这些军事原则也就失去了威力。蒋介石违反人民的意愿，发动了罪恶的全面内战，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必败无疑。

周恩来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些军事原则，正是由于他自始至终参加并领导了这场经历了 20 年之久的、规模空前的人民革命战争，进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及毛泽东军事思想。

不难看出，周恩来提出的这些军事原则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在很多地方都是一致的。周恩来提出的这些军事原则，同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一样，对解放战争的中后期作战，起了重大指导作用。

中央十二月会议不久，西北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关于转入外线作战的指示，发起了宜川战役，歼灭胡宗南集团 1 个整编军部、2 个师部、5 个旅，共约 3 万人，从根本上扭转了西北战场的形势。中央前委坚持留在陕北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为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胜利，中共中央决定东渡黄河，移驻华北，指挥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8 年 3 月 23 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前委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在他们东渡黄河后不到一个月，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

从 1947 年 3 月 18 日撤离延安，到 1948 年 3 月 23 日东渡黄河，历时 1 年零 5 天，行程 2000 余里。毛泽东、周恩来等，历经延安、延川、清涧等 12 个县，在 37 个村庄战斗和生活过。在整个转战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人民解放军从重点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取得了震惊中外的胜利。

中央十二月会议后，在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军事原则的指导下，人民解放军转入外线作战后所遇到的许多新问题和新困难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周恩来夜以继日地指挥着各个战场的战略进攻，密切注视着战场的变化，进一步验证和发展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原则。5 月下旬，中共中央改变了原定抽调华东野战军 3 个纵队挺进江南作战的部署，决定集中主力尽可能多地歼灭国民党军主力于长江以北。能否在国民党精锐兵团密集的长江以北大量歼敌，是周恩来十分关注的问题。华东野战军精心组织了豫东战役，决心在主

要点线控制在敌人手中、战场狭窄的情况下，寻歼国民党军主力。周恩来作为代总参谋长，一方面积极指导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作战，一方面组织各有关战场积极配合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作战。

6月3日，周恩来致电华东野战军的韦国清、陈丕显、姬鹏飞、粟裕等，提出采取临时分散作战的方针，避开敌人主力追剿，配合地方武装，以疲惫敌人，寻求歼灭分散敌人之战机。待情况变化后，再按照新的情况确定独立作战的计划，或分散、或作战、或休整、或在内线作战、或在外线作战。总之，一切均以有利于调动敌人，减少自己损失和争取打胜仗为目的。要按照当地情况采取适当行动，取得各个歼灭敌人的胜利。6月30日，周恩来起草命令，指示许世友、谭震林率七纵等部火速南移，首先围攻滕县，抓住敌二十五师，阻止其西援。第二天又致电聂荣臻、薄一波，现在粟裕部正在围歼区寿年兵团共5个旅，同时要分割东西来援之敌4个师和1个快速纵队，形势严峻，故应速令冀鲁豫独立一、三两旅到陇海路南配合作战。7月4日，周恩来得知蒋介石从南面增调两个兵团增援区寿年，立即电令刘伯承等，粟裕部正在续歼敌二十五师及第三快速纵队等部，你们应阻止敌胡（璉）吴（绍周）两兵团北援，保证粟军南面安全，严令陈、谢以全力向胡〔宗南〕作攻势战斗。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在其他战场部队的积极支援、配合下，经过20天的连续作战。歼敌1个兵团部、2个整编师、4个正规旅、2个保安旅，连同阻援作战在内，共歼敌9万余人，给中原敌军以重创，其间还一度攻占河南省会开封，这是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期间第一次攻占省会城市。豫东战役的胜利是在中央军委的正确指导下，战区指挥员精心组织下，全体参战的指战员共同英勇奋战取得的。这次战役完全改变了中原和华东战场的战略态势。蒋介石的伪国防部在其《中原会战经过及检讨》中说，此次豫东会战，“共军表现特异”的有三点：“敢集中主力作大规模之会战决战”；“敢攻袭大据点”；“对战场要点敢作顽强固守，反复争夺”。这也从反面进一步证实了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军事原则，正在日益发挥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7月11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参加豫东战役全体官兵的贺电中，兴奋地赞誉道：“这一辉煌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

#### 四、组织指挥战略决战

1948年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到达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所在地——平山县西柏坡村。毛泽东本来准备赴苏联，暂未离开城南庄。由于国内形势发展很快，毛泽东暂不能去苏联，于5月26日也来到西柏坡。西柏坡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山村，在太行山东麓，为太行山区与冀中平原的交界处。村庄背靠百坡岭，有小商店、集市，村前有滹沱河流过，距石家庄90公里，可通汽车。这里成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5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集中抓总参谋部的工作。

##### （一）参与制定实施战略决战的决策

1947年9月，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不久，为了争取全国胜利早日到来，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500万，

歼敌正规军 500 个旅，5 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

周恩来非常赞同毛泽东的这个设想。他说，这个计划是根据两年来的经验，谨慎的估计，很有实现的可能。如果给蒋介石的打击很严重，加上财政经济崩溃，内部倾轧，蒋介石垮得早些，胜利来得快，我们也应有此准备。当然，也有可能遇到挫折，时间就长些。我们要估计到这些，不要因胜利大快而没有准备，也不要因胜利推迟而不耐心。

他总结了敌我力量的消长情况，指出，人民解放军从 1946 年 7 月的 120 万人增加到 280 多万人；国民党军队由 430 万人减少为 365 万人，其中甲于第一线的只有 170 余万人。人民解放军虽然在数量上还少于国民党军队，在装备上还劣于国民党军队，但是经过两年作战锻炼，已经大大提高了战斗力。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大量敌人，缴获了大量的现代化武器，加强了自己的装备，建立了炮兵和工兵，初步取得了攻坚经验，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同时，人民解放军用诉苦、三查和群众性练兵的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加强了内部团结，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军事技术和战术。

他分析了战场形势，在全国战场上，蒋介石已被迫放弃“全面防御”和“分区防御”的计划，而进行所谓“重点防御”，企图以现有的兵力和工事，固守重要战略点线。但是他的 5 个战略集团已被人民解放军分别牵制在南线、北线的西北、中原、华东、东北 5 个战场上。东北战场为卫立煌集团，共 48 万人，分布在长春、沈阳、锦州 3 个孤立点上，依靠北宁线作为他们和关内联系的通道。华北战场的敌人共 60 余万人，分布于平绥线上的归绥、张家口及北宁线上的北平、天津、唐山、山海关等要点，依靠塘沽港作为他们海上补给的通路，太原孤城的守军已被围困。华东战场为刘峙集团，共 70 余万人，分布于津浦线中段和陇海线东段及徐州、济南两要点周围地区，依靠陇海线与国民党华中集团联系和保持海上通道，依靠津浦线保持徐州与济南之间的联系，企图阻止华东野战军南下。中原战场为白崇禧集团，约 75 万人，分布于平汉线南段及以汉口为中心的地区。西北战场为胡宗南集团，约 30 万人，被牵制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一隅。除上述 5 个战场外，敌人后方仅有 36 个旅，约 23 万人。国民党军队已没有完整的防线了。

针对蒋介石 8 月初在南京“军事检讨会”上制定的将作战重点置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以东北巩固华北，以东北、华北屏障黄河以南的作战方针，以及以主要城市为战略要点，加强其守备兵力和防御工事，以精锐主力为骨干组成若干机动兵团加强应援力量，企图使人民解放军因对战略要点“啃不烂”，对增援兵团“吃不掉”而陷于被动的计划。周恩来规定了人民解放军应采取的作战方针。他说，要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战争负担加之于敌。“今后仍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则可能增加。”“攻坚与野战互相结合。攻坚敌必增援，造成野战的机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的作战计划中，全国的重心在中原，北线的重心在北宁线，各战略区的战役协同增加了，战争的计划性更增加了。他特别强调：“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的会战”，实现第三年的作战计划。

9 月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始组织人民解放战争中规模空前的战略决战。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是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的主要助手。那时，他们天天见面，一有什么问题，随时交换意见，共同商议解决。毛泽东是挂帅的，周恩来参与决策，并具体组织实施。

当时，“除了军委作战部外，周恩来还有个作战室，由张清化任主任，

相当于他的军事秘书，每天根据局势的变化负责标图。周恩来常到军委作战室了解情况。他对敌我双方的战争态势、兵力部署，部队特点、战斗力强弱，甚至国民党方面指挥官的简历、性格等，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有了什么情况，周恩来总是先仔细地核实并弄清，然后向毛泽东报告。”“有一次，军委作战室一个干部把战绩统计表送来。周恩来接过去，看了一下便问：‘这数字核对过了吗？’‘核对过了。’他再问：‘没发现错误？’‘没有。’他立刻指了出来：‘那么碾庄地区被我军歼灭的黄百韬兵团中，为什么少了一个团？’”前方来了电报，一般经毛泽东、周恩来商量研究确定对策后，多数由毛泽东起草文电，少数由周恩来起草，而所有军事方面的文电都经周恩来签发。张清化回忆说：“发送军事方面的文电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议后发，有了情况，书记处几个领导人共同商议，然后由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文电发出。二是阅后发。由于军情紧迫来不及一起商议，由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好文电，再送其他领导人传阅后发出。这种状况是比较多的。三是发后阅。由于情况紧急，刻不容缓，为了争取时间，由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好电文先发出，再送其他领导人传阅。”

## （二）组织济南战役，拉开战略决战的序幕

为了有把握地进行“带有决定性的大会战”，毛泽东、周恩来决定先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攻坚战，进一步取得经验。他们选中了济南这个目标。

济南是津浦、胶济两铁路的交会点，是连结华北地区与华东地区的战略要地。蒋介石为屏障徐州，隔断我华东与华北解放区的联系，并钳制华东野战军不能全力南进，在济南集中了 10 万余人的兵力坚守济南。为了确保济南防务，蒋介石还拟定了一个“会战计划”，即在济南遭到攻击时，以 3 个兵团共 17 万人的兵力由徐州北援，企图在克州、济宁间击破华东野战军主力，以解济南之围，还集中了 200 余架飞机进行空中支援。

毛泽东、周恩来选中济南，正是为了彻底割裂国民党南、北两个战场的联系，使我华东、华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造成战争初期打入我腹地华北、东北的国民党有来无回的局面，为实施战略决战，形成一个完全有利我的总体布局。他们指示华东野战军：“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为保障战役的胜利，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研究了战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以及相应的对策。他们致电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指出，此役关系甚大，战役计划应以能对付最坏的情况为根本出发点。鉴于济南能否攻克，取决于时间，而取得时间则决定于是否能阻住援敌并歼其一部。因此在兵力使用上，“不是要求你们集中最大兵力，不顾一切硬攻济南，这样部署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求你们的是以一部兵力真攻济南（不是佯攻，也不是只占飞机场），而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援与打援”。“如援敌进得慢，而攻城进展顺利，又有内应条件，则可考虑增加攻城兵力，先克城，后打援；如援敌进得快，则应以全力先打援，后攻城。”

作为代总参谋长，周恩来还对这次战役作了细致的指导。他针对济南城防工事坚固，防御体系完备的特点，指示济南前线指挥员：“应号召部队注重爆破技术，工兵战术和指挥艺术，并使之互相配合。”为了保障华东野战军进行济南战役时的后勤供应任务，他责成华东军区组织一个“坚强健全的后勤司令部，分遣其所属机构和兵站随军工作”。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比较健全完整的后勤司令部，为我军后勤建设适应现代战争，进行了有益的实践。为保障攻城需要，他指示华东局和军委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山炮炮弹

全部存山东，另由华北再送 9 万发 82 迫击炮弹、10 万斤硝铵炸药。弹药均由杨掌握，并运至接近济南、兖州两地适中地点，“待军委电令及时增补前线”。“对炸药、迫击炮弹都应尽一切可能增加生产，以利济徐战役的补充。”同时他指示济南前线指挥员许世友等：炸药对此役胜利关系极大，因此要“谨慎使用”，“严格管理”，“反对浪费”。9月20日，周恩来得知刘峙已组建增援济南的兵团后，及时电告粟裕，刘峙已令邱清泉兵团集结临城待命增援济南，而在金乡、城武、曹县方面只用小部佯动迷惑我军，你们应迅速集结打援兵团，全力于邹、滕地区准备歼灭邱兵团。济南战役胜利后，9月29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人民解放军的贺电：“庆祝你们解放济南，歼敌十万的伟大胜利。”“胜利影响已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内部。这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尚望继续努力，为歼灭更多蒋军，解放全华东人民而战！”

济南战役的胜利，为中央军委组织指挥带决定性的大规模战役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特别是攻克敌重兵守备的大城市的经验。济南战役也进一步暴露出国民党军的弱点，其重兵组成的增援集团，在遇到人民解放军坚决阻击时，不敢全力增援，生怕中了“围城打援”之计。

从此，人民解放军战略决战的序幕拉开了。

### （三）组织辽沈战役，造成“关门打狗”之势

毛泽东、周恩来在部署了济南战役，切断国民党军南北两战线的战略联系之后，即开始组织大规模的战略决战。大决战的初战方向指向了东北。

他们之所以选择东北为第一场战略决战地点，有许多因素：一是到 1948 年 3 月，东北战场上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东北地区 97% 以上的土地和 86% 以上的人口已获得解放。经过土地改革，解放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工农业生产，尤其军工生产有了较快发展：二是人民解放军发展到 103 万人，其中野战军主力已达 70 万人，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国民党军队；三是国民党东北“剿总”卫立煌集团虽有 4 个兵团 14 个军 55 万人，但是被人民解放军分割包围在长春、沈阳、锦州 3 个相互孤立的地区。企图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牵制东北我军于关外；四是蒋介石随时有将东北的国民党军撤往辽东和热河，打通北宁线，巩固华北，或撤往华东战场的可能，无论东北的 55 万国民党军队加入到华北战场还是华东战场，都将不利于人民解放军作战。相反，如果将东北国民党军 55 万人消灭在东北，则人民解放军可抽出 70 多万战略机动兵力，这股力量不论加到哪个战场，都将摧枯拉朽之势，把国民党军队一扫而光。所以毛泽东、周恩来把东北选为决战的第一战场。

济南是连接国民党南北两条战线的战略要点，锦州则是连接国民党军北线中东北和华北两大战区的战略要点。毛泽东、周恩来理所当然地把东北决战的重点放在锦州。他们从 1948 年 2 月初，就要求东北野战军首长把作战的重心移向北宁线，截断敌军由陆上退往关内的通路，将蒋军封闭在东北各个歼灭。经过多次做工作，使东北野战军首长接受了中央军委关于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线作战的意见。9月7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辽沈战役的方针》，明确指出，必须在 9、10 两个月或再多一点的时间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10月2日，周恩来还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电，要求他们“靠

自己的力量对付津榆段可能增加或出关北援之敌，而关键则是迅速攻克锦州，望努力争取十天内外打下该城。”但是林彪当天却因蒋介石派兵增援葫芦岛而动摇了攻打锦州的决心。毛泽东、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进行研究，接连发电，要求林彪等坚持打锦州的既定方针，坚决制止回师打长春。电报指出：“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如果真的回头攻长春，你们将要犯一个大错误。”林彪、罗荣桓等也感到动摇攻打锦州的决心不妥，于10月3日重新向中央表示：“决心仍攻锦州”。毛泽东、周恩来及时命令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发起“察绥战役”，钳制傅作义集团，策应东北野战军作战。

10月15日，锦州解放。两天后长春守军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周恩来认为这是一个瓦解国民党高级将领，特别是蒋介石嫡系——黄埔系的一个极好机会。毛泽东同意这一分析。随即由周恩来起草致电东北局并告林彪、罗荣桓等，介绍郑洞国的有关情况，指出郑“现即已动摇，可努力争取之”。18日，周恩来给郑洞国写信，促其起义。信中指出：“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倾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时机急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该信言简意赅，情真意切，而且十分适时。这生动地体现了周恩来“攻心为上，不战屈兵”的高超军事谋略。10月19日，长春在郑洞国率部放下武器后宣告解放。

长春解放的第二天，周恩来又及时提醒林彪：“在东北敌情的分析上，必须估计到沈阳敌人在受锦、长两处惨重失败的打击下，有选择依现态势西退或转向营口由海路撤退的两种可能，如此两种可能均告失败或无法实现，则只有退集沈阳，依靠空运撤退一部。”但这一重要提醒没有被林彪所重视，以致在辽沈战役最后阶段仍有少数国民党军队从营口海路逃走。毛泽东后来曾批评林彪，这件事“是一个不小的失着”。

锦州攻克后，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围歼从沈阳增援锦州的廖耀湘兵团。经过8天激战，全歼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及特种兵部队共10万人，其中包括号称蒋介石“五大主力”的第一军主力和新六军全部，并俘虏廖耀湘，从而取得了辽沈战役的决定性胜利。随后，人民解放军乘胜前进，11月2日解放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沈阳，并收复营口。敌第五十二军军部率1个师万余人乘船逃走。辽沈战役胜利结束。11月9日，锦西、葫芦岛之敌从海上撤向关内。至此东北全境和热河省均获解放。

辽沈战役历时52天，共歼敌47万余人。这是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决战阶段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中的第一个战役。这一伟大胜利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敌军总兵力下降到290万人，由长期优势转为劣势。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上升到300余万人，由长期劣势转为优势。从此，东北野战军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支强大的战略预备力量。

（四）组织淮海战役，“中间突破”，轮流歼敌，逐步扩大战役规模

正当辽沈战役方兴未艾之时，毛泽东、周恩来决定华东人民解放军挟济南战役之余威准备发起淮海战役，把打击矛头指向徐州的刘峙集团，并指示

中原野战军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

刘峙集团以 70 万重兵猬集于徐州附近地区，依靠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形成所谓一点两线的部署，企图阻止华东野战军南下作战，以屏障南京。当时华东、中原两大解放区共有兵力 60 万人，与敌军总兵力相比，敌军虽然占有优势，但已相差无几。而且华东、中原我军连战皆捷，士气旺盛，华东、华北两大解放区已完全连成一片，中原解放区也日臻巩固，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运输力，基本上有了保障，已具备了歼灭刘峙集团的必要条件。

华东战场敌军的态势与华北、东北战场一个显著的不同是，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若要攻歼其任何一部，必须阻得住敌人的援兵，才能争取到歼敌的时间。能否有效地楔入敌人各兵团之间的接合部，抗击增援兵团攻击，是影响战役胜败的关键。毛泽东、周恩来与前线指挥员进行反复研究和磋商后，发出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规定：“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峰县、枣庄、临城、韩庄、沭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如何赢得歼灭黄百韬兵团的时间呢？毛泽东、周恩来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即以一半以上的兵力牵制和阻击及歼灭援敌一部，并从西面和北面威胁徐州，使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不敢全力东援，并要求打援部队应在援敌的侧面，即位于徐州的北面、西北面、南面，造成围攻徐州之势，使徐州之敌“第一个感觉是我军似乎有意夺取徐州，而不能确切断定我军并非夺取徐州，而是歼灭黄兵团。等到我军对黄兵团攻歼紧急而决定增援时，又发现如不解除南北两侧威胁，则很难赴援。这样就给我军以必要的时间歼灭黄兵团。”一般说来，主要兵力应集中使用于攻歼目标上，毛泽东、周恩来却在我军有足够兵力，且在敌军兵力集中的情况下，采取了相反的方法，创造性地处理了战役目的和手段的关系，灵活地运用了集中兵力的原则，因而顺利地牵制了徐州敌军强大兵团的东援，为全歼黄百韬兵团赢得了时间。

正当华东野战军全力围歼黄百韬兵团之时，蒋介石急忙从华中抽调黄维第十二兵团 10 余万人紧急增援华东战场，同时命令第六、第八兵团沿津浦路徐蚌段增援徐州，均被中原野战军阻截在徐州西南面和南面。毛泽东、周恩来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原定向两淮发展的部署，以中原野战军为主求歼黄维兵团，为华东野战军赢得短暂的休整时间，然后，或求歼敌南线的第六、第八兵团，或全力消灭敌徐州集团，以求基本解决华东、中原的战事，这就形成了“吃一、夹二、看三”的形势，两个野战军轮流作战，互为预备队，使得淮海战役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计划，歼敌 55.5 万余人，取得了中原决战的伟大胜利。从此国民党反动统治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

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军事原则在豫东、济南、辽沈、淮海等一系列战役中得到了全面的运用。但是，战争实践又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后勤保障方面的问题。大兵团作战，规模大，各种作战物资消耗量大，作战范围跨战区、跨军区，地域广阔。这是我军过去从未遇到过的问题。淮海战役的保障就牵扯到华东、华北、中原三大战略区及若干分局和地区。周恩来及时预见到这方面的问题，积极摸索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在西柏坡，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了淮海战役后勤业务会议，研究战役后勤保障问题。会后，他派总后勤部长杨立三到淮海前线，指导和协调三大战略区的后勤保障工作。11 月 9 日，中央军委致电陈毅、邓小平和中原局、华北局：“应极力

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11月22日，他又起草致中原局、华北局、华东局的电报，部署淮海战役后勤保障工作。电报指出：“淮海战役正在胜利开展中，我应作最大估计，准备在徐蚌地区作战三个月到五个月，歼灭蒋匪江北机动兵力四十个至五十个师，以利尔后突破长江防线，向江南进军，彻底摧毁蒋匪的中心统治。”“现决定中原局应速令豫皖苏分局立即动手筹集和保证中原野战部队及华野转入豫皖苏地区作战部队的粮食，并应从豫西运粮食去。华北局应速令冀鲁豫区调集一亿斤至一亿五千万斤粮食，供给华野部队需要。两局对此如何布置，统望电告我们及华东局。关于弹药接济，除华东负责补充华野外，华北应分担中原及华野一部分的补充”。他还及时指示前线在兵员补充工作中要“注意进行公开的政治动员，加强地方上优待抗属、烈属和动员逃兵归队及部队中巩固工作，并由军区政治部发一政治动员的训令，责成三级军区政治部抓紧这一工作，亲自布置，督促和检查，以保证十一万人的补充计划的完全实现。”周恩来对后勤工作强有力的领导，保障了淮海战役的胜利，为加强人民解放军的后勤建设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五）组织平津战役，斩头击尾，以战促和，创造三种解决敌军的方式在辽沈战役尚未结束，淮海战役即将展开之际，毛泽东、周恩来又开始组织平津战役。

正在双方统帅部运筹华北战事之时，蒋介石为了挽救危局，决定孤注一掷，令傅作义集中第九十四军、新编第二军，配备汽车400辆，组成1个快速纵队，经石家庄偷袭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情势十分危急。10月25日，中央军委接到华北局城工部的紧急情报后，立即进行了审慎的研究，决定为争取全局上的主动，采取内紧外松、张机设陷的巧妙部署。周恩来立即起草电报，向华北军区领导人聂荣臻、薄一波等通报情况，并作出部署。电报指出，据北平确息，蒋、傅决定集中第九十四军3个师及新二军两个师经保定向我石门（即石家庄）实施空心袭击，并企图炸毁石门。估计27、28两日敌九十四军可能集中保定，29日可能会合新二军大部向石门前进。为坚决保卫石门，破敌计划，华北军区第七纵队主力应即移至保定以南，坚决抗拒南进敌人，第三纵于26日起以5天的行程，不惜疲劳赶到望都地区，协同七纵作战。杨（得志）、罗（瑞卿）、耿（飏）率主力相机行动。同时，又起草给华北第三兵团杨成武、李井泉电，指出目前傅作义“正图乘虚袭我石门，杨罗耿兵团须使用在平保线上，故攻打归绥计划应暂缓执行”。但为吸引傅之一部兵力注意归绥，以利杨罗耿主力隐蔽南下，望令第一纵队及第八纵队第十一旅亦作攻打归绥的准备，另以第八纵队一部及地方部队仍在绥东方面积极行动，迷惑敌人。中央军委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又命令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秘密入关，进到北平东北地区，随时准备威胁平北。周恩来随时保持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电话联系，亲自指挥这场粉碎蒋介石偷袭的战斗。据《周恩来传》记载：“二十七日清晨四时半、六时、七时，这两个半小时内，周恩来接连三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了第三纵队的行动状况。这个纵队根据中央军委的要求，在两天两夜内赶了二百七十余里路，在二十七日翻过紫荆关。聂荣臻立即用电话通知他们：‘周副主席要我转告你们：突袭之敌今天已集结保定，明天会合刘化南师南犯，我们已令七纵和九地委至少在保定到唐河段阻敌两天以上，只要你们三十日赶到望都地区，就有破敌把握。’第二天，国民党第九十四军两个师开始向方顺桥及其以南作试探性推



进。二十九日凌晨，聂荣臻用电话向周恩来报告：傅作义令第三十五军、第十六军的两个师和第九十二军的一个师迅速南下增援。周恩来放下电话，稍加思索，立刻又起草了中央军委致聂荣臻、薄一波、杨得志、罗瑞卿等电：照此部署，傅作义部除去沿途守备兵力，真能到保定以南者，不过两个军多一点，是我歼敌良机。我应集中三、四、七纵及二纵一个旅各个歼敌。并对华北野战军各部的任务作了具体部署。三十日拂晓，第三纵队提前一天到达望都。第二天凌晨，又进至第七纵队防守的沙河一线。第三纵队司令员郑维山用电话向聂荣臻报告部队位置，聂荣臻在电话中对他说：‘周副主席让我转告你们，傅作义得知你们到达望都，惧怕九十四军被歼，已令其回逃，敌韩迪师已逃回望都县城。你们很疲劳了，要抓紧时间休息，恢复体力，做好战斗准备。如果敌人撤得慢，四纵又能赶到，争取在满城地区打一仗，吃掉它一部。’可是，国民党军队发现人民解放军已有准备，慌忙全部回窜，第二天先头部队已撤过保定，他们这次行动徒然损失官兵三千七百余人，战马二百四十匹，汽车九十余辆，以及其他大宗作战物资。一次偷袭石家庄的冒险计划，就这样失败了。”

蒋介石偷袭计划的破产，为取得平津战役的胜利扫清了障碍。当时华北敌军被辽沈、淮海两大战役所震撼，已成惊弓之鸟。华北傅作义集团，是国民党这时在战略上惟一可能机动的部队。50多万人分布在西迄张家口，东至山海关的500公里铁路沿线。蒋介石鉴于徐蚌大战一触即发，为加强长江防线，应付徐蚌会战，企图实施战略退却，将华北兵力撤往江南；傅作义则企图在乎、津危急之时将部队撤往绥远老巢。华北蒋军无论是退往江南还是退往绥远，都对战局的发展不利。因此，不使之退出平、津、张地区，就成为平津战役的关键问题。

周恩来认为：“傅作义正徘徊于平、张、津、保之间，对坚守平津或西退绥包（今包头市），似尚未下最后决心。但我如攻打归绥，有促使傅作义集其嫡系三个军及骑兵三四个旅提早西退可能，而我杨（成武）李（井泉）兵团因无打援把握，亦有被迫撤围南退可能。”因此，为了“抑留傅作义部队于平、张、津、保地区，以待我东北主力入关协同华北力量彻底歼灭该敌”，特令华北第三兵团停止实行攻打归绥的计划；第二兵团一部继续监视北平之敌。他强调，对付傅作义部，“尤重在抑留傅敌于平、张、津、保地区不使西退，亦不使其得由海上南撤。”11月17日，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围歼国民党黄百韬兵团的战斗即将结束之际，周恩来判断：“在我胜利威胁下，蒋匪必将考虑其长江防线问题”。“蒋匪嫡系二十四个师从华北海运江南，是蒋介石今天唯一可以使用的机动兵力。不论他将这个兵力直接使用放防守江南，或先使用於协同黄维、李延年向北接出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兵团，然后集中约九十个师的兵力，布防长江下游两岸，对于延缓蒋匪反动统治的最后崩溃说来，自会起较大作用。”他指出：“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二十四个师及傅系步骑十六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也使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但欲抑留蒋、傅两部于华北，依华北我军现有兵力，是无法完成的。”因此，他要求林彪、罗荣桓等郑重考虑“东北野战军提前放本月二十五日（戌有）左右起向关内开动”的问题。同时，他还提出：“太原早克确有惊动蒋、傅促其西撤南撤的危险”，应暂停攻太原，待东北野战

军“攻平、津时再打太原”。周恩来的思想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第二天，中央军委正式发布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的命令。命令规定，东北野战军“立即令各纵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廿一日或廿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为了不过早地惊动敌人，周恩来命令程子华、黄克诚暂不要占领滦河铁桥。周恩来的一系列指示，对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地区，从而取得平津战役的胜利，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确定了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进一步研究了实现作战方针的战法。他们认为：“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为了造成敌人错觉，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敌军南下，又令华东战场我军对杜幸明集团残部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要点，做好防止敌军向青岛逃跑的准备。这样就稳住了敌人，完成了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使华北敌人完全陷入收不拢、逃无路的绝境。

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军委的作战意图，于11月29日向张家口之敌发起攻击，吸引傅作义部西援，平津战役由此开始。我军采取“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方针，抓住西线，稳住东线，迅速将敌分割包围于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和塘沽5个孤立的据点上。接着采取先打两头、再取中间的战法，逐次消灭新保安、张家口和天津之敌，使北平守敌陷入重重包围之中。一举攻克天津和新保安，给傅作义的“一字长蛇阵”来了个斩头去尾，把“肚子”北平完全包围起来。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处理了同傅作义谈判起义的问题，使得北平于1949年1月31日和平解放，平津战役以歼敌52万余人的胜利而告结束。之后，周恩来又协助毛泽东妥善解决了绥远国民党军队的问题，为我军尔后解决国民党100多万残余军队提供了“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对进一步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历时4个多月的战略决战中，共歼敌231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将战线推进到长江北岸。至此，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基本归于消灭，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成定局。

## 五、努力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

1949年，在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上是极其光辉的一年，人民革命战争夺取全国性胜利在这一年实现。在这一年里，周恩来的工作更忙了，他不仅主持与国民党方面的和平谈判，继续协助毛泽东组织战略追击，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而且为筹建新生的人民政权做了大量组织领导工作，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为了迎接这个伟大时刻的到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月上旬召开会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的任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报告。报告规定了党在1949年的17项任务。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着重讲了随着全国胜利的到来，怎样将原来长期处于分散状态的各解放区工作统一起来，已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特别是战争还没有结束，为了夺取战争最后胜利，国家的整个工作特别是与战争有直接关系的工作应该统一起来，为战争服务。

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又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这是中国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议制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各项工作的方针。关于军事工作，会议认为，今后解决残余的10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天津方式，即战斗方式，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用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增加了，应当注意学会运用这些方式。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说，现在是前方打仗前进，后方搞生产。后方生产，第一步是要恢复，支援前方，争取全国胜利，今天还不是转入建设。现在210万野战军南下，加上民伕超过300万，后方一定要指定地区支援前方：以华北的大部支援西北野战军，以东北加中原支持东北野战军，以华东与华北加上一点东北支援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中央的作法是：抓住华北，依靠东北，支援前方。这样中央也坐稳了。这些重要决定，对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追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3月23日，新华社向全国发表了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新闻公报。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了西柏坡，向北平进发。他们将在那里领导中国人民夺取全国的最后胜利，将在那里筹建新中国的诞生。

#### （一）主持和平谈判，争取和平渡江

当历史进入1949年之时，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庄严声明：“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战略决战后，蒋介石自己也清楚，这个仗打败了，但仍不肯放下屠刀，企图作垂死的挣扎。他为了赢得时间，依托长江以南半壁河山，重整军力，伺机反扑，决定再度打出“和平谈判”这张牌。他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法，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出面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

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伎俩，中国共产党人心里是非常清楚的。早在1948年夏天，周恩来就提醒人们，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面前，“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则有不少的派别及个人，已在美帝国主义当权派的策动和鼓励下，进行一种假和平运动……实际上是为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喘息时间，以便休整兵力，卷土重来，消灭人民力量。”他要求大家“必须注视这一局势的发展”，“区别反动统治内部的倒蒋和平阴谋与人民群众及民主分子中的和平要求两者之间的不同性质。”但是人民需要真和平，中国共产党也愿意实现真和平。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他说：“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长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1月16日，周恩来在给民主人士报告时局时，指出时局的趋向不外乎三种：第一种是国民党改组政府，并且承认我们提出的八条；第二

种是美国出兵，对此我们已经有了准备；可能性最大的是第三种，继续打下去。

李宗仁上台后，一方面表示“政府工作目标在集中于争取和平之实现”，“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另一方面企图通过谈判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他对国民党副参谋总长刘斐说，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

但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同意接待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这是因为当时“要考虑的是如何用和平方式来达到胜利，以便使国家少受破坏，多保存一些人人力物力，使将来的和平建设多一份物质力量。”正如周恩来所说：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较量，蒋军主力部队已被歼灭殆尽，可以说，内战基本结束，剩下的不过是打扫战场而已。但为了尽快地收拾残局，早日开始和平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在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基础上进行和谈，我们还是欢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有足够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扫除和平的一切障碍，李、白不应该再对帝国主义有幻想，不应该再对蒋介石留恋或恐惧，应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坚决向人民靠拢。也只有这样，才是他们唯一的光明的出路。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过长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够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同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李的安全，他可以调桂系部队一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赶来支援。

和平谈判中，周恩来坚持党的原则，抓住中心问题，既挫败了蒋介石集团企图利用和谈获得喘息机会的阴谋，又教育了广大群众，争取了一些希望走第三条道路的人。周恩来对和谈作过一个精辟的论述：

“不论和也好，打也好，我们有信心、有力量使它一定实现。我们要尽可能用和平方法来实现，但如果不能用和平方法，用战斗也一样要把它实现。”

“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中心问题是接收和改编。南京代表团和我们固然是有距离，但他们有一个概念是好的，即国民党的失败是一定的，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是一定的，他们承认错误，承认失败，因而愿意交出政权，交出军队，不过，南京代表团虽有此认识，南京政府却还没有这个认识，至于广州、溪口就更不用说了。”

“今天的革命，决不能再如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那样，由于中途妥协而使反动派最后又得到胜利。历史经验证明，革命如不能进行到底，则一定失败。今天我们决不能再蹈此覆辙。”

“这八条二十四款，南京代表团表示可以接受。我们限定南京国民党政府在二十日以前答复，如不接受，则二十日我们一定打过江去。再不过江，连南京代表团都说，江南人民实在受不住了。所以不能再延了，再延就大对不起那里的人民了。当然，打过江后，如果他们又愿意签字也可以。总之，门是开着的。”

由于南京方面没有接受周恩来的忠告，历时 20 天的谈判，终因国民党方面拒绝在《国内和谈协定》上签字，致使和平未能实现。尽管如此，但谈判中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是向国民党军队投出的一颗重磅政治炸弹，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官兵的抵抗意志，对加速国民党

军队的崩溃起了重要作用。这以后，中国共产党仍愿本着这个协定的精神，继续同国民党的任何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

## （二）加强敌军工作，加速国民党军队的崩溃与瓦解

解放战争期间，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有了很大发展。周恩来对部队创造的许多新经验、新办法十分重视，及时加以总结和推广，为保障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

1949年7月，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对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在解放战争中的重要发展，作了精辟地论述：“人民解放军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呢？当然，这首先是因为人民解放军所进行的战争乃是正义的爱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因为他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利益，为全国人民的利益而战。但在这里，我们应当指出人民解放军本身的素质，这就是：人民解放军经历了二十二年的锻炼，已经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严格的纪律、坚强的战斗力、成熟的战略战术。尤其最近三年来，人民解放军又经过了一次改造。我为什么要用改造这两个字呢？因为他的绝大部分战士，不久以前还是俘虏兵，不经过改造就不能遵守解放军的纪律。最有效的改造武器，就是唤起他们的阶级觉悟，实行诉苦运动和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三查运动，评干部、评党员、评战功的三评运动，使他们感觉到大家的出身都是劳动人民，都曾经受过反动派的压迫剥削，人民解放军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军队，大家应该团结一致，为自己的利益，向曾经压迫他们、剥削他们的仇人作战。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有严格纪律的军队，但是这个纪律是建筑在自觉的基础之上的。人民解放军在部队内部实施了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制度，在部队外部进行了瓦解敌军工作、拥政爱民工作和地方群众工作，这就使得人民解放军指挥员、战斗员得以密切地联系群众，使得他们的觉悟程度不断地提高，使得人民解放军获得无上的战斗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在各项政治工作中，瓦解敌军是做得最有特色的工作之一。对于这项原则的运用，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从初期的自卫作战开始，在强有力的政治攻势下，敌军工作卓有成效，不断从国民党军队中分化出反内战的部队。如1945年，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高树勋率所部2个师起义，国民党苏北绥靖公署所属第四军军长赵云祥率1万余人在盐城起义；1946年，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军长孔从洲率部起义，国民党第六十军第M4师师长潘朔端率部起义；1947年，国民党第五十二军第五十八师师长王家善率部1万余人在辽宁营口起义。

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以后，国民党部队起义的规模越来越大，造成的影响和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如国民党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部2万余人在济南举行战场起义，为我军迅速攻克济南作出了贡献；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2万余人在长春起义；“东北剿部”副总司令郑洞国率4.7万余人投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都是中共秘密党员）率2.3万余人在淮海前线举行起义，为淮海战役的顺利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国民党第八十五军第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率部在淮海前线起义，为迅速消灭黄维兵团起到了重要作用；“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率部25万人接受和平改编，为减轻战争损失，保护古城北京作出了贡献。

到了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瓦解敌军工作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把进一步加强瓦解敌军工作放到了重要位置，要求注意和学会运用“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这是大规模解决国民党

残余军队的战略决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认真总结了前一段敌军工作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更加有力的措施，支要有：不断加强军事压力，随时做好以战斗方式解决敌人的准备；制定并公开宣布各项优待敌军起义、投诚的政策；充分利用敌人内部分崩离析、士无斗志的有利条件，以各种手段对敌展开政治攻势，进一步瓦解敌军士气；派遣各种有关人员深入敌人内部做策反工作。在周恩来的具体组织指导下，瓦解敌军工作，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

为了和平解决湖南问题，周恩来指示在香港的乔冠华：“争取程潜、李默庵、陈明仁站在我们方面反美反蒋反桂极为必要。请你们认真进行此项工作。如有可能，应与程潜或李默庵建立电台联系。”7月2日，他又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电报中指出：“程潜只要决心反桂系，并布置截断桂系退路，表面上主张湘桂合作，以麻痹桂系是可以谅解的。”他“应力求留在长沙，作为内应。”以后，他一直细心地指导这一工作，直到程潜、陈明仁等于8月4日在湖南宣布起义。

对新疆问题，周恩来派邓力群去见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给他们送去张治中劝他们起义的信件，并希望他们派人到兰州同彭德怀取得联系，洽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办法。9月15日，邓力群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同陶峙岳、包尔汉会面，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和张治中对他们的期望。9月25日，新疆宣布起义。

对西南地区，周恩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对国民党四川地方实力派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在刘文辉处建立秘密电台长达8年之久。8月下旬，周恩来通过秘密电台，告诉刘文辉，大军行将西指，希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在周恩来的指导下，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宣布起义。在他们的带动、影响下，西南地区地方军队大批起义，甚至连退入四川的其他部队也都纷纷起义，如雪崩一般。

对国民党其他地区的和平解放和部分空军、海军的起义，周恩来也都进行了直接的指导。

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起义的人数达177万，其中有153个整师、1000余名将领，飞机26架、舰艇72艘。在4年多时间里，发生这么多大规模起义，这在中国战争史乃至世界战争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对加速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崩溃，缩短解放战争的进程，减轻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起到了重要作用，周恩来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

### （三）统一军队编制体制，提高部队战斗力

战略决战的伟大实践，使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军事原则得以充分的运用和发挥。但是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不仅在中国的军事史上，就是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空前的。因此，必然会遇到许多新问题。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人民解放军的编制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大规模战役战斗的需要。例如，由于人民解放军长期处于高度分散状态，各战略区的部队根据所在地区的条件和作战对象的不同，编制体制各不相同，但是大规模战役往往需要多个野战军共同进行，如淮海战役、平津战役都是在两个野战军之上成立总前委，统一指挥，共同完成作战任务。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两个以上野战军的部队共同组织战役战斗的机会越来越多。编制的不同，将影响战役战斗的集中统一指挥。人民解放军长期进行游击战、运动战，部队编制与游击战、运动战相适应，战役战斗规模较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大规模战役中，

过去经常独立进行作战的团、师甚至纵队，都要在兵团甚至野战军的编成内作战，独立性相对减少。在进攻战斗中，需要有连续的突击能力，不能攻不动就不攻；在防御战斗中，需要建立大纵深的防御体系，进行顽强抗击，不能守不住就撤。编制体制如不适合战斗的需要，将影响部队战斗力的充分发挥。因此，新的战役战斗规模要求部队的编制应该适应这些变化。

周恩来深刻认识到编制体制对战斗力发挥的重大影响，无论是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还是加强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都很有必要对人民解放军的编制体制加以调整。在战略决战的前夕，周恩来在9月8日至1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军事组织逐渐走向正规化、集中化，这就可使第三年战略任务计划实现的更好。”他提出人民解放军要统一建制，今后成立新部队要报告，不准擅自增编，番号要全国统一排列起来，还必须建立若干正规制度，要向建立特种部队的方向努力，特别是要建立炮兵。要建立地方武装，精简后方机关。

10月间，周恩来根据9月会议精神，草拟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指出，根据中央政治局9月会议关于战略任务更进一步地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的要求，中央及军委关于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特作下列各项的统一规定：全军今后一律统一称呼，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号，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野战部队在军以上设野战军和兵团两级，原有的纵队改称为军，师和旅统一称师。将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依次编成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全军有16个兵团及1个铁道兵团，57个军。兵团和军、师、团都按照统一顺序号排列。军以下各级一般按三三制编组。编入野战军的特种兵纵队，统帅所属的炮兵、战车部队和工兵部队。地方部队，全国设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华北五大军区，与中央局同级，并受其领导。军区又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军分区。此规定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于11月1日下发实行。

由于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尚未调整，战略决战便已开始。为了避免在战争过程中造成混乱，到1949年春，三大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各部队先后按照中央军委决定进行整编，并在此基础上，对部队重新进行装备和训练。1月15日，中央军委又决定将华北军区的3个兵团直属人民解放军总部。经过整编、训练和装备，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正规化建设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对夺取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 （四）加强军队后勤建设，逐步适应现代战争需要

战略决战中所表现出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后勤保障工作。由于战役规模大，战斗异常激烈，物资消耗极大。如淮海战役中，仅华东的部队和支前的民工，每一天需要粮草500万斤之多。国民党军队的粮食仅靠极有限的飞机空投，根本不能保证部队的需要，甚至为了一块大饼而自相残杀，大批国民党官兵因饥饿难忍，向解放军投诚，以求不致饿死。在这种情况下，靠缴获是根本不能满足部队需要的。战斗激烈，部队伤亡巨大，俘虏难以及时补充部队。部队运动快，战场范围广，大量物资如单靠人扛肩挑，难以及时保障部队需要，以及大量物资分配、调拨、运输、供给的办法，大批伤员的救护、运输、医疗的组织和药品器材的保障等工作都出现了许多困难。实际上，那时武器主要靠从敌人手中缴获，而弹药则主要靠中央统一调拨，物资除由解放区输送外，还要用货币从当地市场购买。因此，人民解放军过去那种主要靠战场补充和就地补给的办法，难以适应大规模战役的需要。

周恩来作为代总参谋长，除了协助毛泽东指挥作战外，还承担了人民解放军的庞大后勤供应的组织领导。他从兵员补充到武器弹药的生产 and 分配，从财政经费到物资供应，都逐一作出细致周密的安排。在西柏坡，周恩来经常同总后勤部长杨立三、薛暮桥等一起研究后勤工作。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他首先抓了组织建设，将各大军区原先的供给部改建成后勤部和后勤司令部，下设供给、卫生、军械、运输等部门，逐步健全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供应系统。他派杨立三到淮海战役前线协助和指导工作。他在每个战役开始之前，都要召开后勤工作会议，研究战役的后勤保障计划，及时发出各种指示，做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役进行中间，根据战场出现的新情况，及时加以调整和补充；战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不断提高后勤保障能力。例如，济南战役发起前，周恩来于8月28日，指示华东局及军区、华北局及军区、粟谭陈唐、中原局，部署了济南战役后勤保障的任务。在淮海战役发起前，他亲自在西柏坡主持淮海战役后勤业务会议，研究战役后勤保障问题。东北野战军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周恩来指示华北军区预先为东北野战军准备粮草供应问题。在淮海战役胜利进行之时，周恩来于11月23日，致电中原野战军，查问粮食供应情况如何，强调解决粮食问题是实行战役总方针的重要环节，要求各级后勤部门解决好部队的粮食供应问题。

为了加强人民解放军的后勤建设，在三大战役即将结束时，周恩来组织召开了军委后勤工作会议，总结战略决战阶段后勤保障工作的经验教训。他在会上作总结报告时指出：“战争是五年计划三年完成，后勤工作就加重、加快、加大了。前后方合作才能更快地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取得全国胜利。”他提出“部队要正规化，首先是后勤工作要正规化”的思想，指出：“后勤工作的中心关键在于检查效率。”3月中旬，他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财政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新老解放区的财经和后方勤务工作做了全面部署。他指出：“中央领导之下的区域制，在相当一个长时期内仍然成为必要。”但是，全国财经和后方勤务工作“应该是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之上，在可能与必须的条件下，有重点地、有步骤地走向统一。”

周恩来组织领导战略决战期间后勤保障的实践，以及对后勤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考，对人民解放军的后勤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 （五）指导实施战略追击，夺取全国胜利

1949年4月20日，同国民党和平谈判破裂后，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跨过长江，开始了扫清国民党军残余力量，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周恩来这时虽然以大部分精力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准备工作，但是他仍继续协助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追击。

早在1948年12月中、下旬，周恩来就和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着手研究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在1949年1月8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上，初步决定：“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2月19日，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部署第四野战军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问题，批准由第十二兵团率两个军提前南下。3月17日，中央军委再次就渡江南进问题发出指示：“华野中野两军决于四月十日渡江，向着湖口、芜湖、南京、镇江、上海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国民党军六十个师举行攻击。”后来由于与国民党方面谈判尚未结束，推迟到4月20日渡江。



4月20日晚，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渡过长江，开始在江南和西北广大地区实行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第二、第三野战军一举突破了国民党的长江防线，于4月23日占领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南京城。5月23日，在上海即将攻占前夕，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共同研究了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后，向全国进军的具体部署：以第一野战军向西北进军，负责歼灭马步芳、马鸿逵等部及胡宗南集团一部，解放并经营陕、甘、青、宁、新五省，其中一部则准备入川；以第二野战军在协同第三野战军占领宁、沪、杭后，待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减少后，向西南进军，在第一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歼灭退入四川的胡宗南集团主力及西南地方军阀部队，解放并经营川、滇、黔、康四省；以第三野战军向闽浙进军，负责经营鲁、苏、皖、浙、闽等省，同时准备解放台湾；以第四野战军向中南进军，歼灭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部，解放并经营豫、鄂、湘、闽、粤、桂等省。为了预防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5月28日，中央军委指示：“我们应当预筹对策，以期有备无患”。“对策的主要方面是，我各路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前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使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完全丧失他们的走狗。第二方面是，力求经济上的自足自给，准备着海上被封锁时，我们仍然有办法。在这方面，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站在我们方面极为重要。第三方面是，在华北、华东部署充分兵力，以防美国海军协同国民党海陆军向我后方的袭击和扰乱。”

周恩来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做了大量的组织指导工作。6月30日，华东野战军为加强海防的防御力量，防止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决定攻占长山列岛。这是人民解放军首次进行渡海作战。周恩来极为关注这次作战行动。他指示粟裕等前线领导人：“最主要的是详查敌情地形，认真准备强渡强攻的战术和技术，但下放弃对于偷袭的争取。”7月23日，为保障夺取长山列岛战斗的胜利，他又致电山东分局和军区，及时通报长山列岛的敌情。8月20日，长山列岛解放。

在解放大西北的作战中，周恩来于8月6日就歼灭马步芳等部问题，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等电：“发来歼灭甘、青匪军的预备命令，一般甚好。惟请注意左兵团所取之路线似过于迂回，且经临桃、临夏渡黄河直取西宁，系深入马家老巢。”他提醒注意吸取历史教训：“过去四方面军曾打算走此路西渡，因遇阻路险折回。”提出，“令一兵团负责仔细调查此路道路、粮食情况及渡河条件，尤其是回民关系如何，对大军经过具有决定意义。”“据一般了解，青马残暴，在其主力未被歼前，对我敌意甚深……故对深入青马老巢寻其主力作战，须谨慎将事，大意不得。”

为了积极准备解放台湾，根据毛泽东、朱德的提议，周恩来积极抽调干部和人员到苏联学习空军和海军，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以及一批舰艇，连同现有空军和海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准备1950年夏解放台湾。

伟大的全国解放战争，经过解放军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到1949年秋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人民解放军正在继续向胜利进军之际，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经过20多年的浴血奋战，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从此，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制度、帝国主义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被彻底推翻，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 第十章 参与决策和组织指挥抗美援朝战争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它冲破了帝国主义在东方的阵线，改变了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人民反帝斗争和民主革命运动。这对美帝国主义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仍然顽固地坚持与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为敌的反动政策。1950年，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并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野蛮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城市。中国人民为了保卫领土主权完整，支援友好邻邦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为了世界和东方的和平，不惜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派遣自己最优秀的儿女——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共同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把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美国军队及其仆从李承晚的军队赶回了三八线以南。周恩来作为这场反侵略战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 一、防止意外事变，参与决策出国作战

美帝国主义为了遏制苏联，实现其独霸世界的野心，始终把东北亚作为其“全球战略”中的重要一环。为达此目的，美国首先染指朝鲜。它背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关于使朝鲜自由独立及成立统一的朝鲜政府的协议，制造朝鲜分裂，妄图把朝鲜变成它的殖民地，作为进一步侵略扩张的前进基地。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立即进行武装干涉。6月26日，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命令其驻远东的空、海军参战，支援南朝鲜李承晚的军队。6月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公开宣布武装入侵朝鲜，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侵略中国领土台湾。6月30日，杜鲁门又下令美军地面部队投入侵朝战争。与此同时，美国违背联合国宪章，在常任理事国苏联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被蒋介石集团非法占据不能行使否决权的情况下，通过所谓给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以“紧急的援助”的决议。并纠集16国军队，以美军为主的所谓“联合国军”的名义武装干涉朝鲜内战，任命美国驻远东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总司令。这成为联合国历史上最黯淡的一页。

#### （一）声讨美帝的战争罪行

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武装侵略，激起了世界人民的极大愤慨。中国人民对于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侵略祖国领土台湾，严重威胁中国安全，更不能容忍。

6月28日，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中国人民“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一天，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身分，就杜鲁门27日的声明发表声明。严正指出：“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郑重宣布：“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

台湾而奋斗到底。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的中国人民，必能胜利地驱逐美国侵略者，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

7月6日，周恩来又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反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6月27日在美国政府操纵下所通过的非法决议。指出，这一决议“是支持美国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和破坏世界和平的”，破坏了联合国宪章。同时“这一决议是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个常任理事国参加下通过的，显然是非法的”，中国人民坚决反对。8月20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和秘书长，斥责美国制造朝鲜事件，侵略朝鲜和台湾，企图以此扩大战争，并阻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支持苏联和平调处朝鲜问题提案，同时坚持反对美空军对朝鲜的野蛮轰炸。

针对美国飞机连续侵入中国东北领空，狂轰滥炸，8月27日，周恩来以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身分，致电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严重抗议，同时致电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控诉，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径。

## （二）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

周恩来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密切注视朝鲜战争局势，时刻关注国家的主权和安危。他收听广播电讯，阅读西方广播文稿，凭借着敏锐的政治嗅觉，从军事斗争格局的战略高度，清醒地意识到，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朝鲜内战形势很可能发生逆转；由于美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蒋介石集团正在窥测时机，蠢蠢欲动。据密报，蒋介石已向麦克阿瑟提出要派一支部队赴朝参战。一旦朝鲜战局恶化，很可能造成对我不利的南北对应的态势：北面，美军和蒋介石残部从鸭绿江逼入东北；南面，蒋介石集团在美军第七舰队海空力量的支援下，进攻大陆。

为了有备无患，1950年7月7日和10日，周恩来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连续两次亲自主持召开国防会议，朱德总司令、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总政治部罗荣桓主任，以及其他有关方面负责人林彪、萧华、萧劲光、刘亚楼、杨立三、李涛、许光达、滕代远、谭政、万毅、苏进、贺晋年、赵尔陆等出席了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一致认为，随着美国介入朝鲜内战，战局有恶化的可能，必须提防美国扩大战争，甚至入侵我国。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本着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会议决定，抽调战略预备队——第十三兵团（辖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三个军）和第四十二军、炮兵第一、第二、第八三个师，以及其他特种兵部队，共26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其任务是，保卫祖国东北边防，并准备在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7月13日，中央军委根据两次国防会议的精神，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接着，周恩来又协调军委三总部和政府有关部门具体组织边防军的调运工作。随后，各军、师迅即向东北开进，在靠近朝鲜的中国边境地区集结，并以美军为假想敌，展开突击整训。这是人民解放军由国内型战争走向国际型战争的重要一步。

为了对朝鲜战局有一个准确的判断，总参谋部作战室和有关部门的同志，根据朝鲜战场态势，进行图上模拟对抗演习。结果表明，美军下一步行动最大可能是在人民军侧后登陆。而在6个可供登陆的港口中，以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为最大，后果也最严重。这将是美军企图扭转朝鲜战局的很厉害的一着棋。作战室的有关人员于8月23日夜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一判断结果。周恩来听后，非常重视，认为这是朝鲜战局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他马上拿起电话向毛泽东作了简要汇报。毛泽东也非常重视这一判断，并要周恩来立刻

带作战室的同志到他那里，当面详谈。毛泽东听完汇报后，也认为这个分析颇有道理。为了防止万一，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马上采取三个措施：

第一，检查督促东北边防军各项战备工作的情况，严令在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工作，保证随时可以出动作战。并强调，只要把这件事办好，我们就主动了。

第二，将敌人可能在仁川等地登陆，和朝鲜人民军应该有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如主动后撤、在仁川摆点部队、作点工事等，告诉朝鲜和苏联方面，供他们参考。

第三，总参谋部和外交部，要随时密切注视朝鲜战场情况的变化。

几天后，朝鲜人民军副总参谋长李相朝来访时，毛泽东、周恩来都向他指出美军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并建议采取相应的措施。

根据在毛泽东处商定的计划，8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的会议。朱德、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等出席了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自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以来，朝鲜问题就成了世界至少是东方局势的焦点。经过两个月作战，证明友方原来设想一鼓作气，把李承晚伪军和美军赶下海，很快解放全朝鲜是不可能的。目前敌人主力集结在洛东江三角洲进行死守，人民军要分割歼灭这些敌人已不大可能。根据多方面情况判断，美军很可能要在仁川登陆。如果登陆成功，在洛东江前线的人民军主力势必要向后撤，势必要准备在长期战争中进行复杂艰苦的斗争，逐步地消灭敌人。现在看来，最后各个歼灭美军的任务，势必要落在我们肩上。我们东北边防军必须在9月底以前做好一切作战准备，否则，万一形势恶化，就会借手不及，陷于被动。会议决定加速特种兵建设，立即增编4个飞行团，3个战车旅（9个团），18个高炮团和10个军的队属炮兵，年底前完成组训工作。会议还决定向苏联订购一批急需的装备，以便适应出国作战的需要。

8月31日，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东北边防军建设计划会议。为了进一步加强东北边防，并在必要时有足够的机动兵力援助朝鲜人民军同美国侵略军和南朝鲜军作战，会议决定，东北边防军以11个军（36个师）70万人作三线配置：以第十三兵团（含第四十二军）为第一线，第九兵团为第二线，第十九兵团为第三线。会议还决定，从第四野战军抽调10万老兵，用于开战后补充一线部队。会议还要求后勤部门组织相应的医疗力量。这些决定，体现了周恩来以变应变，避免仓促应战的军事战略思想，为后来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做了极为重要的准备。

### （三）掌握战场变化，应付突发事变

为了把握朝鲜战争的发展趋势，必须进一步准确了解朝鲜战争的具体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天，就郑重宣告互相承认，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但中国驻朝鲜首任大使倪志亮因病尚未到职。朝鲜内战爆发时，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尚未建立。因此，需要立即派人到朝鲜去开展工作。

周恩来召集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军委情报部第一副部长刘志坚和正准备出国的外交官柴成文等人，指示他们迅速挑选几名军事干部组成一个精干的班子，由柴成文负责，以驻朝大使馆武官的名义，前往朝鲜同金日成保持联系，开展战场考察工作。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刘志坚从军委情报部武官训练班挑选了5名既有作

战经验、又有分析能力的军事干部，由柴成文带领，组成工作班子。柴成文为临时代办，5名军事干部的名义分别为参赞、一等秘书、武官和副武官。从东北原驻平壤的商务代办处抽出一名代表任参赞。此外，还选配了两名译电员、两名报务员，配备了一部电台。这个工作班子名为大使馆的外交官，实质上是中国派往朝鲜的战地考察组。

7月7日，准备工作就绪。8日上午，周恩来再次接见柴成文等即将出国的6位同志，向他们介绍和推断了朝鲜战争当前形势及发展趋势。指出，美帝国主义者必然会纠集更多的国家出兵，所以朝鲜战争的长期化很难避免，这就会带来影响全局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因此，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就成为军事考察组的主要任务。并指示他们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支持，只要朝鲜同志提出要求，就一定尽力去做。

柴成文一行于7月10日晨到达平壤，当天下午5时，受到金日成首相的接见。柴成文把周恩来亲自签署的介绍信递交给金日成。金日成感谢中国党和政府的支持和帮助，并表示柴代办今后有事可以直接找他。为了保持联络，金日成当即命令为柴代办架设一部直通电话。

柴成文率领的工作班子，迅速展开了工作，从此，有关朝鲜战场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飞到北京，飞到中央军委，飞到周恩来的手中。

#### （四）研究战局发展，警告美国不要扩大战争

在朝鲜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进展顺利，到8月份，已攻至洛东江边，解放了南朝鲜90%以上的地区和92%以上的人口。在解放了的南半部国上上，开始实行土地改革和贯彻劳动法令，采取了教育、文化、保健等民主化的一系列措施。人们兴高采烈，以为整个南方指日可下，胜利在握。在庆祝“八一五”祖国解放五周年大会上，金日成向全军发出命令，要使8月成为完全解放朝鲜国土的月份。然而，周恩来并没有被眼前的胜利所迷惑。他清醒地看到朝鲜人民军孤军突入，后方薄弱，战局很可能出现曲折和反复；认为美帝国主义决不会轻易甘心其失败，利用海空力量优势，很可能会反扑过来。他说：“不经过反复多次较量，不消灭美军的力量到不能支持的时候，朝鲜战争是不可能轻易结束的。这个战争将是一个持久复杂的斗争，至于持久到什么时候，是一年、二年、三年？甚至更长，要看各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才能确定。反正一两个月，一两个战役是不行的。我们宁可把情况估计得复杂一点。”周恩来提出朝鲜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争的预见，被后来的战争实践所完全证实。

9月15日，一个不幸而言中的判断成了无情的现实，美军果然在仁川登陆，在李伪军的配合下，对朝鲜人民军实施南北夹击，战局急转直下，人民军被迫实行战略退却，危机接踵而来。金日成派遣朝鲜人民军次帅朴一禹到安东（今丹东），向东北边防军负责人介绍急剧恶化的战局，并代表朝鲜党和政府恳切地提出请求，要中国出兵支援他们。这时，斯大林也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询问中国能否出兵，助朝鲜人民一臂之力。

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从而表明了在必不得已时，中国人民将举起出兵援助邻邦的义旗。”

朝鲜战局瞬息万变，为了做好出兵的各项准备，周恩来决定再为驻朝使

馆增派5名武官。在此之前，东北边防军向中央建议派一个先遣小组前往朝鲜熟悉情况，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周恩来一直没有批复，现在终于决定，立即派出。但在是否出兵未作出最后决定之前，不宜使用先遣组的名义，决定都称武官。他们是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张明远、第十三兵团司令部侦察处长崔醒农、第三十九军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何凌登、第四十军第一一八师参谋长汤敬仲、军委炮兵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黎非。9月18日，周恩来接见了全体先遣人员，交待他们先期入朝，实地了解大兵团出动后的后勤保障问题，并指示柴成文率领新派武官尽快出发。先遣组到达朝鲜后，立即从作战、供应两个大的方面进行了实地考察，积极为大兵团出国作战做必要准备。

#### （五）参与制定抗美援朝的重大决策

10月1日，朝鲜外务相朴宪永带着金日成首相给毛泽东主席的信件，飞到北京。朴宪永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恳请中国人民出兵支援。金日成的来信在介绍战局后写道：“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机，不予我们时间，如果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这样，是否出兵参战这个严峻重大的、关系到中国战略全局的问题，刻不容缓地摆到了中共中央面前，并且到了作出最后决策的关头。

从1950年10月1日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关于出兵问题，中央领导虽然早有考虑，早有准备，但因问题重大，一直思之未决。当时一些领导同志认为，中国连年战争，破坏很大。现在建国才一年，当务之急是发展生产。不到万不得已时，最好不打这一仗。因此一时难以形成一致意见。

早在9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后，中苏两国领导人都已看出单靠朝鲜人民军作战已经不行了。所以中苏两党此时就开始协商如何支援朝鲜人民的问题。斯大林当时担心苏联出兵与美军直接对抗，会把战火引向欧洲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破坏二战后形成的世界格局。因此他们不愿出兵，想让中国参战。虽然，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力很弱；部队装备很差，都是常规武器，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情况下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军作战，必将付出重大代价。但毛泽东认为，从国际主义的整体利益出发和反对美帝称霸世界的需要，中国必须出兵援助；美帝扩大侵略战争，不仅危及朝鲜生存，也是针对中国的；我们同美帝国主义的较量是不可避免的。美帝虽有经济技术装备优势，但也是有弱点的，是可以战胜的。经过反复协商，最后中苏两党达成协议，中国出动陆军援朝，苏联派出空军支援，掩护我军作战。

10月2日，毛泽东让与会者着重摆出兵的不利条件和出兵后的困难。大家畅所欲言，摆了不少不利条件和困难。毛泽东听了大家的发言后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在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就在10月2日这一天，毛泽东作出了举足轻重的决策，决定用志愿军的名义，派一部分军队到朝鲜境内同美、李军作战，援助朝鲜人民。但没有下达行动命令，也未通知朝鲜政府。

党中央、毛泽东作出出兵决策之后，周恩来挑起了协助毛泽东组织领导这场战争的重担。但这时在中央领导层中仍有人不主张出兵，10月6日，军委常委在居仁堂举行会议，林彪还是坚持不出兵的意见。他说，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5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我军打蒋介石

石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能否打得过美军很难说，它有庞大的陆海空军，有原子弹，还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把它逼急了，它打两颗原子弹或者用飞机对我大规模狂轰滥炸，也够我们受的。因此他不赞成出兵，最好不出兵。如果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这是上策。周恩来是坚决拥护中央出兵决策的。他在林彪发言后说，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美国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最后一定会胜利的。特别是现在朝鲜政府、金日成首相一再请求我们出兵援助，我们怎能见死不救呢？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已定，现在我们不是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

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在毛泽东作出出兵决策之后，周恩来为避免战争扩大，使朝鲜问题得到和平解决，又作出一个很重要的外交、军事部署，通过适当渠道，再警告美国一次。10月3日凌晨，周恩来约见印度驻中国大使，请他给美国方面转个话：“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同时还重申：“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但美帝国主义把我国政府的声明、谴责、警告一概视为恫吓，认为中国软弱可欺，不予理睬。

10月7日，联合国不顾中国政府的警告，又通过了“统一”朝鲜的所谓决议，美军也越过了三八线。10月8日，毛泽东发布了关于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下达了“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的命令。

#### （六）秘密访苏，要求苏联出动空军和提供援助

根据先前达成的苏方提供军事援助和出动飞机掩护我志愿军地面作战的协议，10月10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11日午后，周恩来飞抵苏联高加索地区黑海边的克里米亚，同斯大林等举行会谈。周恩来介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朝鲜战局和是否出兵援朝的情况，说明中国出兵后将面临的巨大困难，要求苏联提供空中掩护并援助中国抗美援朝所需的军事装备。莫洛托夫当时表示，苏联可以出动空军支援。斯大林则表示，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要的飞机、坦克、大炮等军事装备，但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需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能出动。会谈后，斯大林、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说明会谈情况。斯大林表示暂不出动空军掩护志愿军的态度，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所始料未及的。

毛泽东收到联名电报后，不得不于12日电告已在沈阳的彭德怀和高岗：暂缓出动，来京一谈。13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最新情况进行讨论。讨论结果，再次肯定出兵的必要，决定即使没有苏联空军掩护，困难再大，也必须尽快出兵，援助朝鲜。会后，毛泽东电告尚在苏联的周恩来。

当晚，周恩来收到毛泽东22时的电报，并要他转告苏联领导人。毛泽东在电文中指出，在苏联空军暂时不能出动的情况下，“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毛泽东对苏联援助中国的军事装备能否采用租借办法和两个半月内能否出动志愿空军没有把握，但这两件事又至关紧要。因此，他在电文中指示周恩来留在莫斯科几天，

同斯大林等苏方领导人继续商谈上述两个问题。深夜，周恩来紧急约见莫洛托夫，转告毛泽东的来电内容，请他立即转告斯大林。

14日，在得到苏方将以信用贷款的方式援助中国军事装备和将出动16个团的航空兵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答复后，周恩来致电斯大林，进一步提出八个问题请苏方答复。其中包括：“苏联空军在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之后，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苏联政府除派志愿空军参加朝鲜作战外，可否加派掩护空军驻扎中国近海各大城市？”“苏联政府的援助，除飞机、坦克、炮类及海军器材外，中国政府请求在汽车、重要工兵器材方面，也给予信用订货的条件。”并随电附去中国政府第一批关于各种炮类及附属器材的订货单，请斯大林批准。随后，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报告了上述有关问题。

这一天，周恩来先后收到毛泽东3时和21时30分的两封电报，分别介绍朝鲜战局的最新情况和我志愿军出动后的初步计划，并指出“我军决于十月十九日开动”，告以彭德怀将于15日返安东，在安东布置两三天后，即去德川与金日成会面。周恩来迅将两电内容通知了斯大林。

鉴于“联合国军”北进甚速，平壤危在旦夕。15日5时，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了4个小时前发出的“志愿军决于十月十八日至迟十九日开始渡江”的命令，指示彭德怀、高岗：“我军先头军最好能干十七日出动”，“第二个军可于十八日出动，其余可在尔后陆续出动”。但是，就在这极其严峻的形势面前，斯大林却从苏联自身利益出发，为避免同美军直接对抗，改变了主意，指示莫洛托夫转告周恩来，苏联只派遣空军到鸭绿江北岸的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和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16日，周恩来飞离莫斯科。

得知斯大林改变主意的消息后，17日17时，毛泽东急电彭德怀停止执行17日入朝命令，并要彭、高再次返京商谈。

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研究出兵问题。刚刚回到北京的周恩来在会上汇报了同苏方会谈的情况，彭德怀汇报了志愿军出动前的准备情况。会议正式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日入朝参战。总之，在是否出兵、何时出兵的问题上，虽受到苏联关于出动空军、军援问题的影响，一波三折，反复多次，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作出支援朝鲜人民民族解放战争、出兵入朝作战的重大决策上，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也是十分慎重的。

## 二、自力更生，持久作战

中共中央在决定出兵朝鲜后，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立即开始运筹如何打击美国侵略者。9月20日，周恩来根据美国军队在朝鲜作战的特点，以及朝鲜的地形气候等战场条件，拟定了关于入朝作战的基本方针：应是自力更生的持久作战，在战役战斗中，必须集中兵力与火力的绝对优势，围歼被我分割的少数敌人，逐步将敌人削弱下去，以利长期作战。这一方针，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

1950年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命令：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



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之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决定出国作战之时，朝鲜战场上的敌军正分三路向北朝鲜的首都平壤至东部港口城市元山一线推进。东路为南朝鲜第一军团 2 个师；中路为南朝鲜第二军团 3 个师；西路美国第一军 2 个师、英国 1 个旅及南朝鲜 1 个师为一线部队，美军第九军指挥 2 个师在美第一军后面跟进。三路均由美国第八集团军统一指挥。为了配合美第八集团军陆上的进攻，麦克阿瑟从日本增调美第十军开往元山海域，准备再次实施登陆作战，同第八集团军在平壤、元山会合。然后再向北推进，由李伪军打头阵，一直推进到鸭绿江边，“联合国军”则在离中朝边境以南七八十公里处建立缓冲地带。此时朝鲜人民军主力部队尚被隔断在三八线以南地区。

根据战场态势，周恩来和毛泽东研究志愿军出动后如何行动的问题。他们根据志愿军装备极为落后的实际情况，决定从打防御战开始。他们规定，在志愿军入朝后，先在平壤至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至宁远沿线以南地区构筑 2 至 3 道防御阵地，第一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军。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将其分割歼灭之；在 6 个月之内如敌军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亦不去打平壤、元山。待我军从苏联订购的装备到达，并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具有压倒优势条件之后，即在 6 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

10 月 15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飞赴太平洋中部的威克岛，与麦克阿瑟讨论朝鲜战局。他们错误估计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和力量，认为中国军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组织力量出国作战，即使出兵也只能是象征性的派五六万人进入朝鲜保障边境地带的安全，不足为虑。况且出兵朝鲜的有利时机已经过去。美李军可以大胆北进，麦克阿瑟狂妄地叫嚣要在“感恩节”（11 月 23 日）前结束战争。于是美国决定立即改变其原定的东西对进和建立缓冲地带的计划，全力向北推进。10 月 17 日，麦克阿瑟命令东线改由美第十军统一指挥，东西两线的部队以最快的速度直接向朝中边境推进，先控制要点，堵住朝鲜人民军的退路，并防止中国从军事上“介入”；而后再占领整个北朝鲜，进而向中国扩大侵略。这时侵朝敌军总兵力已达 42 万人，第一线的作战部队有 13 万余人，气焰嚣张异常，毫无顾忌地以师甚至团营为单

位，分路向朝中边境高速推进。整个进攻布局被朝鲜中部的狼林山脉分割成东西两个部分，相互之间出现了 80 余公里的大间隙。

面对朝鲜战场形势的急剧变化，毛泽东、周恩来再次审慎地全面分析了志愿军出国作战后将可能发生的情况。他们认为，第一，如果志愿军能够利用刚刚出国作战的突然性，在一开始就消灭李伪军 2 至 4 个师，打一个大胜仗，敌人的整个战线将被我军打乱，出现对我有利的态势，而敌人将立即处于被动的地位。反之，突然性作战的胜利不大，未能达成迅速消灭李伪军第一线的几个师，让第二线敌军增援上来，迫使我军从阵前后撤，将对我军下一步作战不利。第二，敌人空军对我军行动造成危害的大小，将严重影响我军作战的行动。如果我军能够熟练利用夜间行动，使敌人虽有大量飞机但不能给我军以太大的杀伤和妨碍，则我军可以放手进行野战，除朝鲜几个大城市在我无空军掩护下无法攻取外，其余任何地方的敌人都可能被我军各个歼灭。即使美国再从国内增调几个师，我军也有能力将其各个歼灭，并有迫使美国同我进行外交谈判的可能。反之，如果敌人空军严重影响我军的作战，则我军在空军未能出动之前的半年到一年之内，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第三，如果我军能够争取给美军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在较短的时间里消灭美李军几个师，造成美军在从国内增兵到朝鲜之前，增补跟不上消耗，这将使敌人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反之，在敌人得知我军大批出动后，往朝鲜战场投入更大的兵力，则将使我军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基于对作战趋势的这种判断，他们认为原先拟定的作战计划已难以实现，志愿军应迅速向朝鲜境内出动，抢先占领有利地形和战略要点，以争取主动。同时，由于敌军盲目冒进，东西两线距离过大，无法相互支援，给我军创造了在运动中予敌以突然打击、各个歼灭的极好机会。根据战场形势的这些变化，毛泽东、周恩来决定采取以下五项措施：

一是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即入朝。10 月 18 日，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以毛泽东的名义，命令志愿军于 19 日开始向朝鲜境内出动，争取战机。第二天，党中央正式向党内发出通知：“为了保卫中国支援朝鲜，志愿军决于本日出动，先在朝鲜北部尚未丧失的一部分地方站稳脚，寻机打些运动战，支持朝鲜人民继续奋斗。”

二是改变原定第一个时期以防御作战为主的部署，确定采取在运动中各个歼灭进攻之敌的作战方针。

三是按照我军一贯先打弱敌的作战原则，决定首先打击李伪军，争取首战能够歼灭李伪军三几个师，夺取第一仗的胜利。

四是决定集中主力首先打击对我威胁最大的西线之敌。

五是必须力争保持战略、战役的突然性，在意外的打击下造成敌指挥官惊慌失措，处置失当，为我军下一步作战行动创造战机，同时造成敌人士气低落，厌战情绪增加。

为了保障战役的胜利，周恩来指示东北军区加紧做好志愿军的各项后勤保障工作，组建前方后勤指挥所，确定部署三条纵向兵站线，分别由三个后勤分部负责向前方运输各种作战物资，每条兵站线则从国内到前线分三线作纵深梯次储备作战物资。

志愿军总部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于 10 月 19 日晚开始，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分三路秘密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各部队采取夜行昼伏，严密伪装，封锁消息，以战斗姿态向预定作战地区开进，随时准备在运动中歼

灭敌人。10月25日，志愿军与向北冒进的李伪军遭遇，当天即歼灭李伪军1个整营及配属的1个炮兵纵队，打响了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个战役，至此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志愿军总部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具体指导下，针对敌军以师、团为单位分散冒进的实际情况，多次变更部署，积极捕捉战机，灵活地采用了分别歼敌、逐步扩大战果的办法，给向北冒进的敌军以迎头痛击，从而使仓促入朝作战的志愿军在交战一开始便取得了先机之利，掌握了战役主动权，为各个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根据敌军机械化程度高，重装备多，作战物资消耗大，所带来的对道路和后方补给依赖性极大，从而对其侧后十分敏感的特点，以及怕夜战、近战，攻击精神差，对空军、炮兵和坦克的依赖大，惧怕被分割包围的弱点，志愿军大胆地实施战役迂回，采取穿插分割、迂回包围的战术，切断敌人的退路，造成敌军全线动摇，迅速撤退。志愿军勇猛追击，经过连续13昼夜的英勇作战，歼灭敌军1.5万余人，其中给李伪军第六师以歼灭性打击，重创伪第一。第八师，美王牌军骑兵第一师第八团直属队及第三营被全歼，击溃了企图救援的美骑一师第五团。把疯狂进犯的敌人从鸭绿江边一直打退到清川江以南，粉碎了敌人企图于“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初步稳住了朝鲜战局，赢得了初战的胜利。

彭德怀认为，第一战歼灭敌人数量不多，而且我军实力尚未暴露。基于敌人可能稍事喘息，调整兵力后再次发动进攻的情况判断，为保持战场主动地位，彭德怀向中央军委建议我军暂时停止继续进攻，巩固现有胜利，争取诱敌深入后再各个加以歼灭。毛泽东、中央军委同意了彭德怀的建议，并指示志愿军积极创造战场。志愿军遵照中央军委指示，恢复疲劳，总结经验，加强运输，储备粮弹，准备再战。

志愿军突然出现在朝鲜战场上，并取得了初战的胜利，这不仅打乱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步骤，而且引起美国政界、军界惴惴不安和种种猜测，惊呼局势严重，充满着“爆炸的可能性”，他们连日召开会议研究对策。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第一，中国建国伊始，不敢也没有能力与美国较量；第二，在美军退守釜山滩头阵地的有利时机和从仁川登陆的关键时刻，中国均未出兵，迟至美军接近中朝边境时才出兵；中国军队在初战胜利之后并没有实施大规模追击，说明了中国无意与美国较量。对于中国出兵的目的，他们进一步分析判断，不外乎有三种可能：一为保护边防安全和鸭绿江电力设施；二为从战略上钳制和削弱美国的军事力量，打一场有限规模的持久消耗战；三为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半岛。其中第一种可能性最大。但又估计中国在东北地区集结了大量军队而感到不安。英法等国从其本国利益出发十分害怕战争扩大。在采取何种对策的问题上，敌人营垒内部发生矛盾。麦克阿瑟强调中国大部队“自满洲运过鸭绿江”，将有使“联合国军全部被歼的危险”，因而强烈主张“轰炸满洲”志愿军基地和鸭绿江上的一切桥梁，阻止我军继续向朝鲜投入兵力。以英、法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则认为轰炸中国东北有可能挑起世界大战，而主张设立“缓冲地带”，再以政治方式解决朝鲜问题。11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从维护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决定在未判明中国出兵的意图之前，继续坚持以军事进攻迅速占领全朝鲜，批准麦克阿瑟“在军事方面他可以相机行事”，并批准了轰炸鸭绿江上所有桥梁的计划。同时通过瑞典和英国向中国试探，企图以“保证中共利益”为诱饵，换取中国停止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则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所谓“最后

的攻势”——圣诞节攻势。

敌人经过调整，使第一线作战部队增加到 22 万余人。11 月 6 日，以美、英军队为主，在 1000 余辆坦克、1 万余门大炮及 1200 余架飞机的支援下，仍以东西两线开始向北进攻。敌人以西线为牵制集团，企图将志愿军主力吸引在西线；东线敌军则加紧向北推进，并迂回志愿军侧翼，切断志愿军退路，围歼进入朝鲜北部的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部队。

毛泽东、周恩来决心利用敌人恃强骄横、判断错误的时机，采取诱敌深入，继续以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相结合，内线与外线相结合的方针，力求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打击重点仍选择西线敌军，准备将西线敌军吸引到大馆洞、妙香山一线预设战场，加以歼灭。为了保证战役的顺利进行，决定志愿军第九兵团迅速入朝参战。周恩来要求东北军区与敌人空军的狂轰滥炸作坚决的斗争，全力保障志愿军的后勤供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东北军区后勤部前方指挥所增设了一个后勤分部并对原有分部进行了加强，调 1 个铁道兵师入朝，参加铁路抢修，以增强物资运输能力。

志愿军东西两线部队根据中央军委的意图，节节阻击，步步后退，诱敌向预定战场放胆前进。敌人错误地判断志愿军“怯战退走”，并断定志愿军兵力“最多不过六七万人”，其所实施的空中战役已迫使支援部队不能进入朝鲜，于是加快了进攻速度，麦克阿瑟对志愿军的作战意图毫无察觉。他乘飞机亲临战场上空指挥，当东线美军 3 个师已抵达对志愿军进行包围的重要位置上时，便认为他的钳形攻势即将成功，立即下令全线发起总攻。同时发表《公报》，向全世界宣布要在圣诞节（12 月 25 日）结束朝鲜战争。并狂妄叫嚣，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妄图进一步扩大侵略。

11 月 24 日，西线清川江以东的李伪军 3 个师已开始进入志愿军预定战场。周恩来立即指示中央军委电示志愿军总部，指出志愿军在清川江东岸发起进攻后，在清川江以西的美军两个师将很可能向东增援。清川江西岸志愿军现在的部署，难以达到配合东岸部队歼灭李伪军 2 个师的目的，进而可能影响志愿军下一步作战计划的实施。建议西岸志愿军调一个军东进，与东岸部队靠拢，既可增强志愿军左翼的突击力量，保证歼灭 3 个李伪军师，又可及时阻击美军的增援，并对下一步对美军作战造成战役迂回的有利条件，志愿军总部根据军委指示和当面敌情变化，及时调整了部署。第二天，西线各路敌军均进入志愿军预定战场。当天夜里，西线志愿军乘敌立足未稳，出其不意地首先发起了反攻。志愿军担任迂回任务的部队以坚强的战斗意志，果敢穿插，行动迅速，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切断了敌人的退路。担任正面攻击的部队迅猛突击，以战役迂回和战术分割相结合的战法，迅速将敌人分割包围，逐一加以歼灭。敌人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拼命夺路逃跑。经过 6 天的艰苦战斗，西线志愿军歼灭了李伪军第七、第八两个师和土耳其旅大部，并给了美第二师以歼灭性打击，重创美骑兵第一师和第二十五师。共计歼敌 2.3 万余人，缴获坦克 100 余辆、汽车 2000 余辆，各种枪 5000 余枝，缴获与击毁火炮 500 余门。继西线志愿军发起反击之后，东线志愿军于 11 月 27 日也开始向当面之敌发起反攻。志愿军战士冒着零下 30 左右的严寒，踏着没膝的大雪，勇猛穿插，采取与西线志愿军同样的战法，连续作战，给美陆战第一师及步兵第七师以歼灭性打击。

这时麦克阿瑟才如梦初醒，志愿军主力果然过了江，应验了他所说的，中国的大队人马过江，将使“联合国军”有“全部被歼的危险”。他一面惊

恐地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中国军队大举反攻的情况，一面决定立即将部队撤至朝鲜半岛的蜂腰部之元山、阳德、成川、肃川一线组织防御。29日，敌人全线撤退。志愿军根据毛泽东、中央军委的指示，立即转入全线反攻。兵败如山倒，溃退的敌军一发不可收拾，根本不可能在预定地带建立防御阵地，一气逃到三八线以南，连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也在仓皇逃跑时翻车身亡。至此，除襄阳一地外，收复朝鲜北部全部领土，并在部分地段前出到三八线以南地区。

第二次战役，是志愿军在战略反攻阶段打得最漂亮的一次战役。这次战役，毛泽东、周恩来利用敌人战略上的错误判断和恃强狂傲的心理，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从而取得了大大超过原来预想的重大胜利，同朝鲜人民军一起把敌人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以南，粉碎了美帝国主义迅速占领朝鲜的企图，迫使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扭转了朝鲜战局，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遭到志愿军第二次战役的沉重打击后，敌人营垒内部异常混乱，笼罩着一片失败情绪。美国舆论界惊呼这是“继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最惨的军事败绩”，是一场“恶梦”和“悲剧”。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则就失败问题互相指责攻击，而其重要盟国英法等国则普遍对战争局势表示忧虑，深怕把力量陷在亚洲，而削弱了他们在欧洲的力量，更害怕战争进一步扩大。他们要求美国政府保证“朝鲜事件不至于把全世界搅进一场大战”。美国政府为了摆脱危机，挽回败局，与前线指挥官连续召开一系列紧急会议，磋商对策。他们认为朝鲜战争现在已是“在完全新的情况下，和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完全新的强国进行一次完全新的战争”，必须从这一观点出发重新对战局作出估计，并依此“重新制定可行的、足以应付有关现实问题的政治决定和战略计划”。经过激烈争吵，美国政府仍不打算放弃对朝鲜的侵略，决意保持其在朝鲜、在亚洲的地位。11月30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宣称“联合国部队不打算放弃他们在朝鲜的使命”，并且将“从三个方面来应付新的局势”，即坚持侵朝战争，加强欧洲防务，加强美国的军事力量。同时，他还在答记者问中公开表示打算在朝鲜使用原子弹，妄图恐吓中朝人民。但事与愿违，反而把其盟友吓坏了。英国首相艾德礼在国会100多名国会议员的联名抗议下，急忙飞到美国与杜鲁门会谈协调两国侵朝政策。决定继续坚持侵朝战争，同时，妄图诱我停战，争取喘息时间。

与美帝国主义有着长期斗争经验的毛泽东、周恩来一眼就看穿了美国人的鬼把戏。他们清楚地知道，虽然中朝两国军队取得了两次战役的胜利，但是消灭敌人的数量还不足以使美国人真正愿意坐到谈判桌上。周恩来清醒地看出朝鲜战争的发展将是长期抗战的局面，特别是从后勤保障方面看，志愿军在无制空权的情况下，运输线再难以向前延伸，志愿军的后勤供应将越来越困难。

但毛泽东考虑到政治上的需要，打破敌人玩弄“先停火，后谈判”的阴谋，决定志愿军必须越过三八线，打到汉城一线，再进行休整。否则敌人继续向南退缩，与志愿军脱离接触，志愿军又无能力继续深入南方作战，这种情况在军事上对志愿军下一步作战极为不利，有可能失去战场主动权。经过研究，决定再寻歼李伪军几个师，如进展不顺畅即适时收兵，争取控制三八线，作长期作战的打算。随后，我军又连续进行了第三、第四和第五次战役，经过与敌人在三八线南北一带反复争夺，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

1951年5月下旬，中央军委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方案。会议认为，“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投入战场的兵力，已增加到69万人，而志愿军和人民军的总兵力已增加到112万人，虽然我在兵力上占据优势，但在技术装备上仍处于劣势。敌方在战场上拥有1670余架作战飞机，舰艇270艘，坦克1130余辆，各种火炮3560余门。一方是兵力强大，一方是装备先进。较量的结果，谁想吃掉谁都力不从心。

根据对国际形势和战场局势的分析，周恩来认为志愿军入朝作战已完成了战略反攻的任务，战争将进入一个相互对峙的新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中，志愿军的作战方针应不同于反攻阶段以运动歼敌的方针。他及时向毛泽东提出，志愿军在战略上应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毛泽东赞同周恩来的建议，决定采取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聂荣臻在回忆这次军委会议的情况时说：“第五次战役以后，中央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会上多数同志主张我军宜停在三八线附近，边打边谈，争取谈判解决问题。我当时也是同意这个意见的。我认为，把敌人赶出朝鲜北部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停在三八线，也就是恢复战前状态，这样各方面都好接受。如果战争继续下去，我们不怕，而且会越打越强，但是，也不是没有困难。会议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最后确定了边打边谈的方针。”

彭德怀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于7月1日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

“经过八个月的激烈战斗，对朝鲜战争是长期的，认识上更深刻了。美为维持东方和世界政治地位，依靠技术优势，故不甘失败。惟战争激烈，远隔重洋，人员物资耗费大多，运输亦困难（比我们好），兵力分散，长期坚持下去，力量削弱。”

“我步兵强，人员多，但运输极困难。朝鲜地形狭窄，我军作战受到很大限制，在我空军不能维护交通运输和必要的、部分的配合作战前，此种优势目前难以发挥应有的有效作用。我只有决心作长期打算，准备好各项有利条件。”“平均两个月进行一次较大反击战役，打退敌进攻。如此我以二十一个军以三番或十八个军作两番进行战斗，似此每月需补充兵员三万。每年战费七至八亿美元（以一九五一年比值计算）。上述概算，估计人力可支持，财力有困难。”

“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方针是完全必须的。我能掌握和平旗帜，对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均有利。坚持以三八线为界，双方均过得去。”

此后，志愿军作战由以运动战为主要形式，转变为以阵地战为主要形式。

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也认识到企图用武力占领整个朝鲜的目的是无法达到的。在这种情势下，不得不要求同中朝方面正式举行停战谈判。但是为了在朝鲜争得更多的利益，仍采取停停打打、打打停停的两手，阻挠谈判的顺利进行。

在毛泽东、周恩来及志愿军总部的领导下，志愿军在实战中逐步学会了现代条件下的阵地防御作战。他们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战法，建立了以坑道为支撑点的坚固的阵地防御体系，抗击敌人飞机的狂轰滥炸和坦克装甲部队的攻击，并且大量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有效地保存了自己。

美军为了夺取战场上的主动地位，利用其空中优势，集中打击志愿军后方运输线，这就成了战争第二阶段的一个突出特点。周恩来以极大的精力领

导了后勤战线上的这场战争，先后粉碎了敌人的空中“绞杀战”、细菌战，以及企图实施登陆作战切断志愿军后方运输线的阴谋。

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组织领导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是在他担任政务院总理，领导全国各项工作的同时进行的。他对朝鲜战场的有关电报都要亲自审阅。当时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为减轻周恩来的一些工作量，对一些内容不很重要的电报就没有送给他看，周恩来知道后批评了聂荣臻，要求今后朝鲜发回的电报都要送给他看。他既要研究作战问题，还要抓后勤保障问题，更重要的是积极领导外交战线上的斗争，紧密配合志愿军在战场的作战行动。经过他的艰苦努力，使世界舆论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开始有许多国家支持美国出兵朝鲜，到后来许多国家转而站在中朝人民一边反对美国侵略朝鲜，并在全世界掀起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对美国侵略朝鲜争取世界和平的运动。为了及时了解美军这个对手的作战特点，他发动曾留学美国的原国民党起义将领及在押的战犯，撰写有关美军作战的战术特点、武器装备的性能等资料，为志愿军作战提供帮助。

### 三、改革后勤体制，提高保障能力

后方勤务保障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众所周知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古训，向来为历代兵家所遵循。“现代战争主要是打后勤”的说法，从一定意义上讲，并不为过。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围绕着战争期间的后方勤务保障，周恩来在处理中朝两党、两国之间的关系，政府工作与军队工作的关系，前方作战与后方供应等关系中，胸怀全局，统筹安排，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怀着景仰的心情写道：

“整个后勤工作，当时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这方面的事情，我几乎每件都向他请示。他抓得很细。在志愿军准备出国前夕，恩来同志多次听取后勤保障工作的情况汇报或出席有关的会议，对出国部队的粮食、被装、武器弹药等的供应，交通运输，伤病员救护治疗，后勤干部的调配等等，都一一作了明确指示。他提出了出国作战要自力更生，立足于国内供应的方针。第一批志愿军出国时，走得非常仓促，冬装要得很急。恩来同志多次给总后勤部打电话，催问冬装的生产、调运情况。入朝初期，为紧急解决部队的于粮问题，他指示政务院向东北、华北、中南各省市布置，发动群众，家家户户炒面，从东北一直炒到长沙。他还亲自到北京市的一些机关视察，同大家一起动手炒面。”

“我们在后勤供应上特别重视东北地区，因为那里是转运站和志愿军的后方基地。恩来同志尽管工作非常繁忙，仍多次要我们询问东北在后勤保障方面有什么问题，还派入到现地了解情况，亲自拟定解决问题的实施方案，要总参、总后对东北的困难，一定全力以赴地帮助解决。一九五一年一月，东北军区召开后勤会议，研究志愿军的供应问题，恩来同志要我同他一起，专程赶到沈阳听取汇报，并且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那次会议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使国内的后勤保障工作有了较大的加强和改进。总之，恩来同志对志愿军的后勤保障费尽了心血，作出了宝贵贡献。”

（一）确保“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1950年7月13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的第二天。周恩来就指示东北局、东北军区负责解决东北部队的供应问题。规定：“除武器、弹药、服装、医药器材、电讯器材、汽车油料，由军委直接补给外，其余粮料、柴草及一切经常费与作战费等，完全由东北人民政府负责供给”。并且就东北边防军供应事项，提出了六项具体办法。22日，周恩来就东北边防军的指挥与供应问题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边防军的供应需要强有力的后勤组织方能胜任，而中南只能组织轻便的后勤机构，刚到东北恐亦有困难。基于以上情况，请主席考虑边防军目前是否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并统一一切供应，……中南李聚奎到东北后，即兼任军区后勤部长，所带之后勤机构，即合并到东北后勤部中；因东北军区后勤部太弱，不能胜目前的大任。这样，部队指挥既可免生脱节现象，供应问题也较容易解决。”毛泽东于次日批示：“同意”。根据周恩来的意见，7月26日，中央军委决定，重新成立东北军区后勤部，任命李聚奎为部长，张明远为副部长。8月7日，东北军区后勤部成立，接着边防军各军、师也相继恢复和健全了后勤机构，并增编了兵站（供应站）、医院（医疗所）和运输、装卸等勤务部（分）队。后勤供应系统的组织机构问题从而得到了解决。在总后勤部的领导下，东北军区后勤部各个部门立即着手进行东北边防军的日常供应和出国作战的后勤保障准备。到1950年9月底，为东北边防军准备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和各种作战装备。这些作战物资分别储存在安东至辑安、凤城至通化、本溪至梅河口、沈阳至四平的四线八点”上。10月8日，毛泽东发出“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的命令之后，从11日起，“东后”开始突击向朝鲜境内前运作战物资。至25日，各种作战物资已分别屯集到龟城、新仓、双芬洞、别河里、前川、中城于等地区。

与此同时，还组建了后勤分部，部署通往战区的兵站线，补充了后勤人员和技术人员，部署了卫生勤务保障工作。抽调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张明远、东北人民政府林业部长杜者衡组成“东后”前方指挥所，作为“东后”的派出机构，随作战部队入朝，简称“前勤”，负责作战地区的后勤供应。

8月24日，周恩来就边防军的供应问题再次给毛泽东写信，报告8月23日晚，召集有关各方讨论边防军补充及东北供应问题的情况。信中说：“关于东北供给问题，原则决定：一、粮、草、料、煤由东北供给；二、经常费由四野拨出、由总后勤部拨给东北；三、预算外之一切作战费用，统由中央支出，东北代付；四、东北增加发行，由中央拨付其所需花纱布作为支出，换取东北货币回笼。具体办法，责成财政部、贸易部本此原则解决。我与一波意见，为东北不致担负发行过重，应准备提早实行关内外货币统一。此事拟待陈云回后商决。”毛泽东当日批示：“同意”。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总后勤部、东北军区后勤部立即作出《关于东北边防军供应关系的决定》。

周恩来考虑到东北边防军一旦入朝作战，战时后勤供应问题绝不同于国内战争，一定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此他决定派出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张明远，以武官身分先期入朝，取得第一手材料，张明远入朝后，着重就战时后勤保障的各个方面作了实地考察，了解了地形、交通、气象、农业生产等情况，回国后作了详细汇报。铁路方面，几条主要干线因路基被炸，桥梁被毁，只能区段通车，装载量低，车速慢；公路方面，由于多在山间盘旋，路窄、弯多、坡陡，且弹坑累累，影响行车速度；当年农作物虽然长势好，但处在战争年代，丰产未能丰收；国有山林多，烧柴不会发



生困难，但需要部队自己动手砍伐；蔬菜种类主要是白菜、萝卜，但产量低，只能在短期内供应少数过往部队；马料也有限，无法保障；气象方面，最低温度在零下40℃以下，积雪厚度为20~50厘米，江河冰层为20~30厘米。更为严重的是，整个运输线都处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之下。据此，张明远提出四点建议：一、志愿军过江后，粮食，蔬菜和马料等供应就地筹措比例极低，主要靠国内前送；二、为保障供得上、救得下，要采取火车、汽车、畜力、人力并用的运输手段；三、入朝部队要做好露营准备，因此要准备帐篷和盖布；四、为防止乱砍乱伐山林，建议我国政府与朝鲜政府统一交涉，要教育部队遵守群众纪律，要体谅战争年代朝鲜人民的困难。对此，周恩来明确提出了志愿军“出国作战要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供应”的方针。

就当时条件下的我军后勤保障工作而言，在周恩来的统筹指挥下，能想到的都想到了，能做到的都做到了，可以说，万事俱备，只等令下了。

## （二）改革组织机构，逐步完善后勤保障体制

志愿军一踏入朝鲜土地，就投入到战争之中。美军依仗其空中优势，拥有制空权，把轰炸破坏朝鲜后方作为重要战略手段。当时美军投入朝鲜战场的空军达11个联队、4个大队，另有海军航空兵4个大队，各种飞机1100余架，同时还有英国、澳大利亚、南非联邦和南朝鲜的飞机100余架。这些飞机除一小部分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外，大部被用于破坏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后方。“联合国军”一方面以其大编队的B—29型和B—26型轰炸机，对朝鲜北部城镇、工厂、车站、桥梁等重要目标进行残无人道的毁灭性轰炸，另一方面又以其P—51型和F84型战斗机，昼夜不停地进行超低空搜索扫射，对一人一车、一缕炊烟也不放过，使志愿军后方的人员、物资、装备受到严重损失。

朝鲜北部山多河多，铁路多在沿海，公路纵线多，横线少，盘山跨水，弯急坡陡，又多与铁路并行，往往一处被炸，铁路、公路各线同时受阻。志愿军运输主要靠汽车。而敌机恰恰抓住这一点，把破坏交通线和运输工具作为轰炸扫射的重点。刚入朝时，志愿军共有汽车1300多辆，一星期内就损失217辆，其中82.5%是被敌机炸毁的。第三分部汽车第四团入朝时，因经验不足，车辆待避过于集中，一次就被炸毁73辆。经过前三次战役，志愿军共损失汽车1200多辆。由于没有制空权，运输工具的大量损失，是造成补给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志愿军一投入战斗，战线就迅速向前推进。第一次战役打到清川江，第二次战役进至三八线，第三次战役插到三七线附近。短短76天，运输线由50公里延伸到500公里以上。补给线的迅速延伸，是造成跟进供应困难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运输能力不足，尽管鸭绿江边作战物资堆积如山，却运不上去。在第一、第二、第三次战役期间，时值隆冬，东线山区气温低达零下40℃，滴水成冰，雪凝路冻。汽车没有防滑链条不能行驶，骡马没有冰掌不能驮载，武器没有冬季润滑油打不响，人员因无棉衣造成冻伤，不仅直接削弱了战斗力，而且还加重了医疗、后运的负担。第三次战役后，周恩来为了解决后勤保障中的困难，向毛泽东提出采取部队轮换入朝作战，既可保持作战的生力军，部队又能得到切实整补，使部队具有持久作战和高度机动作战的能力。到1951年4月中旬，志愿军入朝部队已达16个军共48个师，另有7个地炮师，4个高炮师，4个坦克团，9个工兵团，3个铁道兵师和两个直属团，再

加其他部队，总兵力多达 95 万人，比刚入朝时增加近 3 倍。加之攻防交替，战线伸缩不定，物资供应不上，伤员抢救不及时，部队是在挨饿受冻的条件下打败敌人的。尽管广大指战员斗志昂扬，但因挨饿受冻，体力不支，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有的战士说：“不思家，不想婆，只想吃个热馍馍。”当时部队普遍存在着“三怕”情绪：一怕没有饭吃，二怕没有子弹打，三怕负伤后抬不下来。这“三怕”，成了志愿军后勤战线跟进供应必须解决的难题。因此志愿军的后方勤务工作，只能坚持边打边建的方针。

自从中央军委把志愿军后勤保障的重任交给东北人民政府后，善于设身处地考虑对方困难的周恩来，1950 年 11 月 5 日亲自给高岗、李富春写信。信中说：“对于东北全部支（援）部（队）工作，我们已想见其繁重。只要东北提出要求，我们愿全力以赴，帮助你们解决困难。凡为东北已决定者，我们定做你们后盾，支持你们贯彻下去，有些事情职权属于中央，但你们仍可便宜行事，只要通知一声，当由中央追认；凡能统一于东北者，我们无不赞成统一于东北。”这充分说明周恩来对于抗美援朝后勤工作的高度重视。

为了进一步解决志愿军后勤保障工作中的困难，周恩来就关于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的问题，听取志愿军分管后勤工作的副司令员洪学智的汇报。洪学智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前方后勤保障的困难局面和建立后方勤务司令部的设想。他说：“从朝鲜战争中彭总和我们都逐渐认识到了现代化战争中后勤的作用，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在空中、地面、海上，前方、后方同时进行，或交叉进行，战场范围广，情况变化快，人力物力消耗大。现在欧美国家都实行大后勤战略，50 里以前是前方司令部的事，50 里以后就是后方司令部的事，战争不仅在前方打，而且也在后方打，现在，美国对我后方实施全面控制轰炸，就是在我们后方打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规模，不仅决定了我们在前方进行战争的规模，而且也决定了前方战争的成败。我们只有打赢了这场后方的战争，才能更好地保证我们前方战争的胜利。后勤要适应这一特点，需要军委给我们增派防空部队、通信部队、铁道部队、工兵部队等诸多兵种联合作战，而且需要成立后方战争的领率机关——后方勤务司令部，以统一指挥后方战争的诸兵种联合作战，在战斗中进行保障，在保障中进行战争。”

周恩来听了洪学智的汇报后，派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副部长张令彬、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和炮兵司令员陈锡联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到志司驻地空寺洞，具体了解后勤工作中的困难，研究如何加强对志愿军后勤的支持，如何加强志愿军的后勤建设。彭德怀对他们说，现在最困难、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后勤供应问题，就是粮食供应不上，弹药供应不上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加强后勤建设，而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不解决这个问题，其他问题都不好解决。

当周恩来进一步了解了朝鲜前线后勤供应中的困难和应采取的对策后，于 1951 年 5 月 19 日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志愿军后勤工作的决定》。《决定》规定：

“着即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负责管理朝鲜境内一切后勤组织与实施（包括铁路、军事运输在内）；

“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直接受志司首长领导；

“凡过去配属志愿军后方勤务部各部队（如工兵、炮兵、公安、通信、运输、铁道兵团各部队，工程部队等），其建制序列及党、政、军工作领导，

指挥与供应关系等，今后统归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负责。”

中央军委任命洪学智副司令员兼任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周纯全为政治委员，张明远为副司令员，社者衡为副政治委员。

中央军委的《决定》，阐明了后勤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扩大了后勤工作的职权和范围，标志着志愿军后勤由单一兵种向诸兵种合成的重大转变，是志愿军后勤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性文件。

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成立后，运输、装卸、警卫、工兵和通信部队迅速得到充实，1951年2月，周恩来同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研究，并征求彭德怀的意见，调周纯全加强“前勤”工作，同时将“前勤”指挥所改为“志后”指挥所，后勤分部由3个增加到7个，1951年8月，中央军委组建14个辎重团入朝，使“志后”直属的辎重、运输、担架团达29个；调6个工兵团、1个步兵师配属“志后”；新编3个汽车团，补充司机3000名，汽车1130辆；调拨2个电话营，并配备了电台，使志后直属部队发展到14万人，加上配属的警卫、步兵、工兵、高炮部队4万人，总数达18万人，初步形成一支多兵种、多专业的合成部队。从此志愿军有了涟全的后方组织指挥机构。它不仅“负责管理志愿军在朝鲜境内之一切后勤组织与实施”，而且统一指挥配属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的工兵、高射炮兵、警卫、通信、运输、工程等部队。把战区后方的各种保障力量从组织指挥关系上统一起来，既有利于加强后方建设，更便于开展后方对敌斗争。当时第五次战役已经结束，按照防御作战的战略方针，“志后”一面指挥后方战斗，同敌人的封锁破坏作斗争，一面组织供应，保障作战需要，使志愿军后勤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 （三）建立钢铁运输线

东北军区为了解决志愿军后勤供应困难，特地召开志愿军后勤工作会议。周恩来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强调指出：“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会议确定增调铁道兵和工程部队入朝，抢修铁路、公路，并采取措施，建立兵站运输线。为保证朝鲜铁路军事运输畅通无阻，周恩来还同金日成协商，组建以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为司令员、以中共中央东北局秘书长张明远为政治委员的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统一计划和指挥战时朝鲜铁路的运输、修复和保障事宜。随后又提出建设“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的任务。

“联合国军”依赖其空中优势，对志愿军后方设施和交通运输线进行封锁破坏，一直是其侵朝战争中整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随着战争的发展一再加强。1951年夏，朝鲜北方发生特大洪水，志愿军交通运输线受到严重破坏，增加了志愿军粮弹供应的困难，8月中旬，“联合国军”为了配合停战谈判，决定在发动夏、秋季攻势的同时，对志愿军后方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空中封锁战役”，也叫“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即所谓的“绞杀战”。美军头目宣称“我们要用空中力量这把刀，去割断地面巨人的咽喉，从空中实施外科手术，巧妙地让敌人完蛋”。“这就是从空中绞死敌人”。为了实施“绞杀战”计划，敌人通过估算中朝军队的数量，每天需要补给品的数量，火车运输和汽车运输的吨位，以及从鸭绿江到前线所需要的时间，认定火车运输比汽车运输要经济得多，因此，决定对朝鲜铁路实施“全面的空中封锁战役”，即炸断铁路桥梁，摧毁铁路车辆，破坏铁轨和路基。他们动用了绝大部分空军和海军航空兵，以大中型轰炸机和战斗机混合编组，有计划、有

分工地对志愿军后方交通枢纽和重要目标，进行大规模的毁灭性轰炸，企图切断我后方运输线，摧毁后方设施，窒息全线供应，扼杀志愿军的作战力量。

为了同“联合国军”的“绞杀战”作斗争，志愿军后勤战线也采取了积极对策：一是组织对空作战，把掩护后方交通的高炮部队组织起来，重点部署在铁路沿线，保护车站、桥梁和兵站、仓库；派出部分高炮分队实施机动作战；同时在后勤部队中广泛开展利用轻武器打击低空飞行敌机的活动，创造出步枪打落敌机的记录，打得猖狂至极的敌机不敢肆无忌惮地低空低速飞行“查户口”。二是加强防空哨。在运输线上，分段设哨，严密监视敌机活动。一有空情，立即报警，能打则打，不打则防，变被动为主动。三是做好各种物资的保护工作。对各种物资进行疏散、隐蔽、伪装；设置各种各样的假目标，以假乱真，迷惑敌机，把各种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1952年上半年，敌人继续实施“绞杀战”。志愿军后勤战线大规模地建设地下仓库，挖掘开式的半地下库，能容纳2000节火车皮的各种物资。四是组织力量抢修运输线。随着铁道部队、工程部队入朝数量的增多，抢修力量的增强，凡是被敌机炸毁的铁路、公路、桥梁，都力求做到随炸随修，并采取开辟迂回道路，架设公路便桥，组织漕渡等手段，保证把各种物资运到前线。

在周恩来的积极组织筹划下，为了夺取部分制空权，中央军委派遣年轻的人民空军入朝作战，担负保护平壤以北主要交通线的任务。到1951年12月，共出动5个师，同敌人展开争夺局部制空权的斗争，迫使敌机不得不缩小活动空域，以致转入夜间活动。志愿军年轻的空军在高炮部队的配合下，夺取了清川江以北一定空域的制空权，使这一地区被美国人称之为“米格走廊”。

美国空军所实施的“绞杀战”，并没有使志愿军后方瘫痪，1952年5月31日，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在汉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也不得不承认：“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难以令人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送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1952年11月，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他声称要体面地结束朝鲜战争，一面高唱“和平”，一面策划美国侵略军在中朝军队的侧后方登陆，配合正面进攻，企图在停战谈判中取得军事上、政治上的有利地位。

为了保证抗登陆作战的物资供应，中央军委决定建设从龟城，南经价川到殷山与平元线相接的铁路，和八面院经球场到长上里的铁路，其中首先抢建殷龟铁路。接着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新建铁路指挥局，负责指挥铁道工程部队，执行在战争期间抢建铁路的任务。

知人善任的周恩来选派具有丰富经验的第四野战军、中南军区铁道运输司令员兼铁道兵团前进指挥所副司令员郭维城担任新建铁路指挥局局长。郭维城接到命令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立即入朝进行实地勘察。经勘察，殷龟铁路全长129公里，要穿过龟山等4座大山，力争取时间，即使不打隧道，也要开凿3个坯口、4个临江峭壁、3个深路堑，还要横跨大同江、清川江、九龙江、大宁江、川坊江和东门江6条江河；时逢严冬，又有敌机轰炸扫射。在战火中抢建铁路，困难可想而知。郭维城向中央提出两条建议：一、要全部使用铁道工程部队；二、工期是否缓至1953年5月完成。毛泽东得知此事后，下达命令：1月入朝，2月开工，4月完成。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命令作出决定：抢建铁路部队除已下令调上的4个铁道兵师外，再增调两个师，但工

期不能缓，一定要赶在敌人前面，做好反登陆作战的一切准备。洪学智对郭维城说，说严重一点，没有这条铁路，如果敌人从西海岸登陆，前沿部队就很难活下去。郭维城深感任务之艰巨，责任之重大。他坚定地向军委表示：“请毛主席放心，我就是用身体铺路，也坚决按时完成任务。”

在中央军委的关怀下，经过广大铁道兵指战员的英勇奋战，新建的从龟城到殷山的铁路，提前于4月15日全线通车。经中朝新建铁路理事会验收，工程按战时标准为良好，容许行车时速为30公里。为此，彭德怀亲自来发贺电，指出这条铁路是在敌机轰炸下和严寒季节中抢建的，铁路的建成将进一步保证在敌人大举进攻下的后勤运输能力。

#### （四）努力改善武器装备，提高作战能力

抗美援朝战争主要是同装备现代化的美国军队作战。毛泽东、周恩来深知要同美帝国主义作战，光靠小米加步枪是不行的，要迅速改变志愿军武器装备极端落后的状况。在志愿军出国之前，中共中央就派周恩来来到苏联去与苏方商量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地面部队作战的问题。战争打起来之后，周恩来继续抓紧改善志愿军装备的问题。他反复研究了志愿军作战的需要和国家经济的承受能力，积极组织力量同苏联谈判，解决武器供应问题。先后派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率领航空代表团到苏联去谈判，进一步解决购买作战飞机，建立飞机修理工厂的问题，千方百计地争取志愿军空军能尽早投入战斗，为志愿军提供空中支援。到1951年，中国有偿接收了苏联政府派来中国协助防空的12个苏军航空兵师的装备，从而保证了空军及时投入作战。

周恩来派出以总参谋长徐向前为团长的兵工代表团，同苏联签订了有偿转让8种轻武器制造技术的协议，同时进口了约60个步兵师的武器装备和36个师的轻武器。从而大大改善了志愿军的武器装备，既加强了火力，也给后勤保障减少了许多困难。与此同时，周恩来对军工厂的改建工作抓得很紧，使进口的技术装备能够迅速投入生产，为前方提供武器弹药。他还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前线，根据战场需要，自行研制一些急需的武器，并组织力量改进了一些武器的技术战术性能，进一步改善武器装备，提高了部队的作战能力。为了对付敌人的坦克，中国自行研制了反坦克火箭筒，增加了对付敌人坦克的作战手段，受到前线指战员的欢迎。

#### （五）全力解决前线部队的实际困难

为了扭转“联合国军”空中优势给志愿军后勤供应带来的被动局面，后勤战线的广大指战员遵循周恩来关于边打边建的指示，与敌人的封锁进行了坚决斗争。他们采取了许多措施：一是转入夜间工作，美机虽然昼夜出动，但夜间比较少，相比之下，夜间威胁比白天小，因此，志愿军各级后勤部门和部（分）队把主要工作转入夜间进行，从而减少了被炸的危险性。二是供应部队炒面，解决吃饭问题。三是设立防空哨。从1951年二三月份开始，一、三分部在几条运输干线上设置防空哨。一听到敌机声音，立即鸣枪报警，运输车随即闭灯隐蔽；敌机飞走后，防空哨再发出解除警报的音响，运输车再开灯前进，从而减少了损失。这一做法受到彭德怀的表扬，并加以推广。不久，在志愿军管辖的2100公里长的运输线上，设置了多达1650个防空哨位，形成了一支专司对空监视和报警的大军。四是实行重点保障。在供需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只能保障重点，即先运粮弹和油料，后运其他物资；先保障主要作战方向，后保障次要方向；先前方，后后方；先部队，后机关，使有限的物资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解决最关键的问题。

在中央军委和周恩来的领导和关怀下、在战局相对稳定的条件下，随着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的建立，分区供应和建制供应相结合体制的逐渐形成；随着铁路、公路的新建和修复，运输工具的增加和供应经验的积累，整个后勤战线的防卫能力和综合保障能力日益增强，逐步适应了现代战争的需要。

到 1951 年底，志愿军的后勤供应就开始好转，改变了入朝初期的被动局面。到了 1952 年，后勤战线不仅保证了日常供应，而且日益改善。经周恩来亲自批准，志愿军各部队开设了供销社，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大为好转。组织部队在战斗空隙开展战地种菜和副食品加工，使部队能够吃上新鲜蔬菜和豆腐、豆芽。国内运往战区的物资也逐渐丰富，干部、战士不仅吃得饱，而且逐步做到吃得好。“四川榨菜到朝鲜，黄河鲤鱼上了山，生活不断有改善，后勤真是不简单”，就是当时战地供应的缩影。

从 1952 年冬到 1953 年春，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根据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关于做好抗击敌人大规模登陆准备的指示，整个“志后”系统连续奋战一个冬春，抢运储备各种作战物资，使战役战术地幅内储备的物资，足够作战部队使用半年，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登陆计划，同时也为进入阵地战阶段的各个战役做好了准备。

在闻名中外的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为了保证战役的胜利，志愿军后勤总共供应各种作战物资 1.6 万吨，平均每天出动 180 辆汽车，8566 人担任人线运输，把弹药、粮食送到每一个阵地。志愿军依托坑道作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守住了阵地，歼敌 2.5 万人，击落击伤敌机 274 架。1953 年 5 月 13 日至 7 月 27 日，志愿军为配合停战谈判，促成停战早日实现，发起了夏季进攻战役。这是志愿军转入阵地战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投入兵力 53 万，火炮 4000 多门，在宽达 200 公里的正面战线上，发起大小战斗 133 次。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在 75 天中，共供应各种作战物资 6 万吨，其中弹药消耗 3 万吨，平均每天 400 吨。由于有足够的物资供应，保证了战役按计划进行，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歼敌 12.3 万人，攻占敌阵地面积达 238 平方公里，造成了有利态势，促成了停战的实现。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就后方保障而言，由国内向朝鲜战场运送物资 9600 多种，260 多万吨；补充枪械 48 万多枝（挺），火炮 1.3 万门，汽车 2.1 万辆；抢救伤员 38.3 万名，病员 45.5 万名；修复和新建铁路 996 公里，修复和新建公路 1.06 万公里，修建仓库 1.53 万个（座），病房 6900 幢，简易营房 7.06 万座。从而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巨大胜利。

在周恩来的领导与关怀下，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逐渐变被动为主动，并建立起一套适应现代战争的比较完整的后勤保障体系。这些做法和经验，对志愿军加强后方勤务系统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 四、领导停战谈判斗争

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到 1951 年 6 月，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已趋于均势。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经过连续五次战役，已歼灭“联合国军”23 万余人，并将之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

战争，从来不是孤立的军事行动，它是实现一定政治目的的手段，而且

常常和外交斗争相配合。

6月2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发出秘密指令，要他一字不差地准确执行。6月30日，李奇微奉命向中朝方面和新闻界发表声明希望举行停战会议，以停止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及武装行动。7月1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发出复电，同意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朝鲜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参与制定边打边谈的斗争方针

美国要求进行停战谈判的声明似乎发表得很突然，中朝方面的答复也似乎异乎寻常的迅速。其实，善于驾驭局势、精通外交斗争艺术的周恩来，早就预料到这是战争进程中的必然阶段，美国用武力霸占朝鲜的目的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1950年10月2日，在志愿军赴朝参战之前，苏联等国就曾向第五届联合国大会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国一直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当苏联等国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提案时，周恩来立即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这项提案。但这项提案却被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否决了。美国无视中国政府的声明，把侵略战争推进到中国东北边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被迫应战。志愿军参战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维护世界和平。

美国之所以提出停战谈判，是不得已而为之。周恩来对此是一清二楚的。

首先是美国兵力不足。当时，美军现役陆军只有18个正规师，投入朝鲜战场就有7个半师，占总数1/3还多。除去在欧洲部署的4个师，国内只剩下6个战斗师，而且又多是定额不足、缺乏训练的部队。因此，再往朝鲜增兵，就非常困难了。这是它致命的弱点。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说，为了把在朝鲜作战的美军“补充到接近于作战的员额，必须实际上调光国内的正规军，但是连这样做都不够，还不得不动员后备队。”追随美国参加“联合国军”的其他国家，本来就是在美国胁迫和驱使下才象征性地派出少量部队的，由于看不到在朝鲜取胜的希望，都不愿再增兵朝鲜了。柯林斯为此发出哀叹，联合国的盟友在开始时支持联合国在朝鲜采取行动的决心，正在消失。

其次是长期陷入朝鲜战争不符合美国全球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直把欧洲作为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斗争的全球战略重点，并把苏联作为斗争的主要对手。在朝鲜战争中，美国主要的作战对象是中国军队，而不是苏联军队；美国军事力量在朝鲜大量消耗，而苏联则养精蓄锐，以逸待劳，这同其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发生了深刻矛盾。所以杜鲁门左右为难他说，我从来没有使自己忘记，美国的主要敌人正端坐在克里姆林宫里；或者忘记，只要这一敌人还没有卷入战场而只在幕后拉线，我就决不能将我们再度动员起来的力量浪费掉。由此可见，在朝鲜长期打下去对美国是极其不利的。

第三是战争消耗太大。美军侵朝仅一年，已经伤亡10万余人，运往朝鲜的各种物资竟达1500万吨，直接战争费用100多亿美元。这几个方面的消耗都比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年的消耗多1倍。由于侵朝战争，美国1950年7月1日至1951年6月30日会计年度的军费在420亿美元的预算拨款外，又特别补充拨款64.6亿美元；1951年7月1日至1952年6月30日会计年度军费预算拨款，增加到600亿美元，使每一个美国人平均分担307美元，加重了美国人民的负担。战争的巨大消耗，引起美国人民的强烈不满，要求

和平和停止侵朝战争的反战情绪日益高涨。1951年3月,美国人民发起了“和平十字军”运动,召集了36个州的2500名代表到华盛顿,要求政府结束侵朝战争,从朝鲜撤回美国军队。由于侵朝战争胜利无望,使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前驻华美军司令魏德曼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说,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

这时,美国正在为前进不能,后退不利的进退维谷的窘境而感到苦恼。朝鲜战争走进了死胡同。美国不得不放弃以武力“统一”朝鲜的企图,不得不重新考虑解决朝鲜问题的途径。5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了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决定,准备同中朝方面进行谈判,寻求所谓“光荣的停战”。

周恩来对于美国的战略企图了如指掌;对于中国志愿军的情况更是全局在胸。

周恩来既明了新中国所面临繁重的经济建设任务,又明了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对于保卫祖国、维护东方和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既了解敌方在战场上的狂妄与脆弱,又了解志愿军的优势和弱点。当时志愿军虽然步兵占有很大优势,但由于敌我装备相差悬殊,部队机动和物资供应均受到很大限制,因而难以充分发挥志愿军的作战效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企图歼灭敌人重兵集团是困难的。而要彻底解决朝鲜问题,关键在于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但这需要有一个敌我力量的消长过程。周恩来认为战争是一种综合力量的较量,战争的胜负要受各种因素的制约。我们只能在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去争取战争的胜利,而不能有丝毫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速胜是不可能的,那么当客观上出现停战谈判的可能性时,就应该抓住时机,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何况这和我们的参战目的、一贯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周恩来高瞻远瞩,对于形势的正确判断,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待朝鲜战争的分析和谈判的态度。是否与美方举行停战谈判,是关系到中、朝两国的大事。毛泽东、周恩来一向尊重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在朝鲜战争期间,每有重要决定,都要事先与朝鲜政府协商。当美国政府于6月中旬又通过中立国家的外交使节向中国政府进行停战谈判的试探之后,金日成应中国政府邀请,于6月30日到达北京,同毛泽东、周恩来共同讨论朝鲜战事的发展趋向,协调以后的行动。关于谈判时机,双方一致认为,综观战场实力,我占优势,如能再歼灭更多一些敌军后再谈判,会更有利;关于谈判条件,双方一致认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中朝两国的历来主张,如能讨论以逐步撤退外国军队,包括朝鲜的前途等问题为条件,我方不宜拒绝。这样,美方由于在战争中连连碰壁,无计可施,放弃了战争初期侵占全朝鲜的企图,中方也达到了恢复战前状态的参战目的。可谓一方无可奈何,前倨后恭,提出妥协方案;一方伺机而行,见好就收,争取主动。从此,朝鲜战争出现了边打边谈、文谈武打同时进行的新局面。

## (二) 确定“止于所不可不止”的指导思想

谈判也是战斗,是一场无硝烟、不流血、凭借正义与实力的唇枪舌战。它与炮火连天的战场有一点极为相似,就是要有能够驾驭“战局”、斗争艺术高超的指挥员。

为了更直接地掌握谈判的情况,周恩来选派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兼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李克农赴朝组织具体的谈判斗争。又指定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会长兼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作为李的助手。选定李、乔赴朝指挥停战谈判,



是周恩来领导抗美援朝战争建立第二条战线的重要措施。

7月2日，李克农、乔冠华一行即将赴朝前，周恩来在接见他们时，引用了一句古训：“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前一句话的含意是该做的就应该做，义无反顾；后一句话的含意是该停的时候就该适可而止。他指出，抗美援朝既是“当行”的爱国主义的正义战争，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可是，当敌人伤亡惨重、被迫求和的时候，我们就得审时度势，把战争停下来，争取在和平的环境里建设新中国。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是周恩来在外交上的一贯思想，在朝鲜停战谈判中运用得非常成功。在与李、乔握别前，一向处事周密的周恩来还特别交待，要他们转告彭总，通知位于谈判地点开城地区的军队负责同志，迅速安排谈判的房屋、用具和食品等项事宜，迅速查清谈判地点的情况，对谈判会场、双方代表团的宿舍要进行很好的布置，搞好会场警戒，务必保障安全，绝不容许出乱子。

根据中朝双方的商定，中方确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邓华将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将军为谈判代表；朝方确定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朝鲜人民军副总参谋长李相朝少将、朝鲜人民军一军团参谋长张平山少将为谈判代表。南日为朝中方面首席代表。

对方的谈判代表团组成人员是：首席代表美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中将，代表为美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迪斯少将，美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奇少将，美远东海军副参谋长阿雷·勃克少将，南朝鲜第一集团军司令白善焯少将。

李克农一行到达朝鲜后，立即受到金日成的亲切接见。因为有关大政方针两党早已商妥，所以会面时只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磋商，按照中朝两党的协议，朝鲜停战谈判的第一线工作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由中朝双方组成的谈判代表团像一个“工作队”。由于李、乔二人对外不出面，为安全起见，大家称李克农为“李队长”，称乔冠华为“乔指导员”。李、乔二人到达朝鲜后，谈判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进入了更紧张、更具体的阶段。李克农深知自己肩负的重担，要把党、国家的谈判主张和周恩来的谈判意图化为具体行动，争取谈判的胜利，是非常不容易的。从原则到具体细节，从战场到会场，从准备预案到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方面，他都得想到。而且他还要把自己思考的意见同乔冠华、同5位谈判代表及代表团的其它人员商量，请他们补充、修正，以便成为大家的共同行动。

经过紧张的准备，朝鲜停战谈判于1951年7月10日在开城来凤庄正式开始了。

### （三）边谈边打，以打促谈

朝鲜停战谈判是在战争仍在进行的情况下举行的。因此战场上较量的结果对于谈判成功与否起着决定性作用。美国迷信其强大的军事技术优势，企图用武力压中朝两国，以期从谈判桌上得到它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这当然是痴心妄想。

志愿军刚入朝时，周恩来就说过：“现在对美帝如果不抵抗，一着输了，就会处处陷于被动，敌人将得寸进尺。反之，如果给以打击，让它在朝鲜陷入泥坑，敌人就无法再进攻中国”。他还说：“美帝国主义用武力压迫别国人民，我们要使它压不下来，给它以挫折，让它知难而退，然后可以解决问题。我们是有节制的，假如敌人知难而退，就可以在联合国内或联合国外谈判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是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在这里，他把战场上的抵抗

和胜利同进行谈判、争取和平之间的关系讲得十分清楚。因此，谈判开始后，周恩来同毛泽东一直坚持争取和、准备打、不怕拖的方针。

整个停战谈判，大体上可以分为五项议程：

第一项是解决谈判的议程问题。

第二项是划分停战后的军事分界线问题。

第三项是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与职司。

第四项是关于战俘的遣返问题。

第五项是关于召开高一级的政治会议，讨论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以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美帝国主义对于朝鲜停战谈判，表现得既狂妄又虚弱，出尔反尔，能拖则拖。他们时而玩弄阴谋伎俩，时而蛮横抵赖，时而节外生枝，时而无理休会，其间还发生过枪杀中朝方军事警察事件，多次出动飞机轰炸开城中立区、俯冲扫射中朝方代表团驻地事件。破坏谈判的事件一个接着一个，其无理、无赖、无耻的做法，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

由于美方的破坏，谈判进展缓慢。从谈判开始算起，用了44天时间，开了32次代表团大会和小组会，只达成一个五项议程的协议，讨论停战的军事分界线未获结果，其他议项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随后便中断谈判长达63天。

10月25日，谈判地点由开城移到板门店，谈判恢复，继续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中朝方面主张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立即停战，各自后撤5公里，建立非军事区，脱离接触。美方却以侮空军优势为由，无理提出要把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阵地的大后方，企图不费一枪一弹就能得到1.2万多平方公里的朝鲜北部土地。这一政治讹诈当然被中朝方面所严词拒绝。但美方首席代表却威胁说，“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也公开宣称：“用我联合国军的威力，可以达到联合国军代表团所要求的分界线的位置。”企图通过恫吓、讹诈，得到它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停战谈判陷入僵局。周恩来在领导朝鲜停战谈判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军事斗争对谈判斗争的配合，因此伴随着谈判的常常是战场上的较量。在谈判陷入僵局时，志愿军强大的地面部队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不仅粉碎了“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和所谓空中“绞杀战”，而且还组织了局部反击作战，志愿军以伤亡3.3万余人的代价，取得了歼敌15.7万余人的胜利。

“联合国军”在战场上的失败，证明他们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战场上也得不到，迫使他们放弃了原先企图侵占1.2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无理要求，同意朝中方面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及非军事区的主张，于11月27日达成第二项协议。

第二项议程达成后，立即进入第三项谈判议程。

关于停战监督问题，中朝方面原以为军事停战只是向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迈出的第一步，只有迅速召开高级政治会议，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彻底解决朝鲜问题，才能真正使敌对行动没有再次爆发的可能。但美方却用心险恶，企图通过停战监督干涉中朝方面内政。他们提出要禁止朝鲜境内机场和航空设备的恢复、扩充与修建，还要在停战之后到朝鲜后方去进行空中和地面的“自由视察”。这当然遭到中朝方面代表的拒绝。经过5个多月的激烈斗

争，美方理屈词穷，放弃了这一无理要求。

谈判常常处在僵持中，但“联合国军”在战场上已经没有多大作为了，而志愿军在争取和、准备打、不怕拖的方针指导下，掀起了大规模的构筑坑道的热潮，西起汉江口，东到高城，长达 250 多公里的整个战线上，形成了 20~30 公里纵深、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大小坑道总长度为 1250 公里，各种堑壕和交通壕总长度为 6250 公里，成为攻不破、炸不烂的钢铁阵地，使装备优势的敌人无计可施。

从 1951 年 12 月 11 日起，讨论第四项议程战俘遣返问题。由于美方胡搅蛮缠，一开始就僵住了。1952 年 1 月 31 日，美方建议同时讨论第五项议程，企图否定在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后 3 个月内，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分派代表举行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经过前后将近半个月的谈判，美方终于不得不在 2 月 17 日接受中方的修正草案作为原则解决的方案。

#### （四）既有原则的坚定性，又有策略的灵活性

第四项议程是谈判战俘的遣返问题。按照国际公约，“战争结束战俘应该毫不延迟地释放并遣返”。中朝代表团原本认为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没想到竟成为谈判中的重大障碍。由于美方和李承晚集团公然践踏国际公约，强扣俘虏，并借此阻挠停战协定签订达一年之久。

1952 年是美国的大选年。杜鲁门为了民主党的竞选，不想当年在朝鲜停战，以免被共和党指责为承认失败。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处境不同，回旋余地较大。他竞选时许诺当选后将去朝鲜结束战争。因此周恩来特别关注这年的美国大选。

美方在战俘问题上从四个方面向中方施加压力：一是在谈判桌上炮制“一对一”交换、“平民顶战俘”的谬论，拒绝全部遣返中朝被俘人员。为迫使中方接受其无理要求，动辄单方面休会，十分无理。二是操纵联合国通过相应决议，以壮声势，欺骗舆论。三是在战俘营里制造多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并对战俘进行“甄别”，强迫刺字、按手印、写血书、转移营地，要求遣返即遭毒打、截肢或杀害，甚至挖心割肉，以恫吓其他俘虏。四是在上甘岭地区发动攻势，继续进行细菌战，加紧轰炸中国边境城市，扬言扩大战争。

对于敌人的种种伎俩，中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敌人强扣和屠杀被俘人员的暴行，周恩来和中方谈判代表团分别发表声明，详加揭露，并以中方被俘人员可歌可泣的反抗和斗争，证明敌人所谓的“强迫遣返”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对联合国大会在 1952 年 12 月 3 日通过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周恩来致电联大主席，指出在战俘问题上，联大支持了美国的错误立场，是在中朝没有参加的情况下通过的，是非法无效的。对敌人发动的上甘岭战役，志愿军英勇奋战，一个半月歼敌 2.5 万人，美方大惊。中方宣布准备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时为止。对敌人进行的细菌战、轰炸中国领土的强盗行径，周恩来提出强烈抗议。并对敌人叫嚷要蒋介石集团出兵，在朝鲜后方进行两栖登陆做了准备。总之，整个朝鲜停战谈判是“压”与“顶”的过程，即美方不断施加压力和中方坚持原则坚决顶回去的过程，在谈判俘虏问题阶段尤为明显，使美方骑虎难下。

在谈判过程中，李克农驻开城，与北京有一条热线。每天上午谈判，下午李、乔在开城将谈判情况汇总，报到北京。北京在黄昏前研究完第二天的谈判对策和发言稿，周恩来连夜修改后，发往开城。李克农吃透精神，指导

前台谈判。谈判前后拖了近两年，每天的发言和斗争方式都是这样由周恩来定下来的。那时周恩来的工作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刚上台不久的艾森豪威尔，面对这个谈判形势，从总的战略出发，不得不改变破坏和拖延的政策，开始实行转弯。1953年3月28日，美方提出先交换伤病战俘便是一个信号。

具有非凡政治头脑和外交眼光的周恩来，敏锐地抓注了美方的新动向，同意交换伤病战俘，并建议恢复由美方无限期中断的谈判。以此为契机，为推动停战的实现，中方采取了自谈判以来的最关键的步骤，也是最大的让步。

1953年3月30日，周恩来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声明。声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致主张，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停战谈判代表应即与联合国军停战谈判代表开始关于在战争期间交换病伤战俘问题的谈判，并进而谋取战俘问题的通盘解决。”声明还说，中朝两国政府为了消除谈判双方在战俘问题上的分歧，促成停战，提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声明指出，这一提议并非放弃了日内瓦公约的遣返原则，也并非承认了联合国军方面所说的有所谓拒绝遣返的战俘，而是为终止朝鲜流血所采取的新步骤，以便将在对方恐吓和压迫下心存恐惧，不敢回家的我方被俘人员在停战以后转交中立国，并经有关方面的解释，以保证他们的遣返问题能得到公正解决。周恩来提出的这一新的方案，成为恢复停战谈判和最后达成停战、战俘遣返协议的基础，因而在国际上受到广泛欢迎。

对把暂时不能遣返的战俘交中立国的提议，美方以存在实际困难为由加以反对。中方遂同意把他们交由设在朝鲜非军事区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一段时期，以便他们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行使被遣返的权利。6月8日，双方终于达成了最后协议并正式签字。周恩来认为，这个协议虽然采纳了印度原先向联大提出的有关提案中的某些步骤，但与该提案却有很大不同。印度提案要把最后剩下的战俘交联合国处理。而联合国当时是交战的一方，这是中方所不能接受的。况且，当时美方气焰嚣张，还不想真正停战，只是要逼我就范。如果中方那时让步而接受印度提案，就等于在压力下示弱，正中美国下怀，是不可取的。

在战俘遣返问题上，中方始终坚持了全部遣返的原则，但从实现停战的全局利益考虑，在遣返的步骤、时间和方法上作了必要的让步。至于如何掌握让步的程度和时机，周恩来曾经指出，美国蛮横无理时不能让步，虚张声势时不能让步，不起作用时不能让步，让步必须能扭转局势。他在战俘问题谈判陷入僵局时提出“分两步走”的建议，促成了战俘问题以至停战协议的签订，生动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但是，就在正式签订《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文件后不久，南朝鲜傀儡政府头子李承晚冒天下之大不韪，开始了扣留战俘的罪恶活动。他们以“就地释放”的名义，胁迫朝鲜人民军的2.7万被俘人员离开战俘营，编入南朝鲜武装部队，从而造成了严重局面，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愤怒和谴责，就连他的同伙艾森豪威尔，也不得不向他发出急电称，要是你坚持目前的行动方针，就无法使“联合国军”司令部继续同你一致行动。

为了给李承晚军以惩罚性打击，经彭德怀提议、中央军委批准，决定在金城地区发动以歼灭李伪军为主要目标的进攻战役。这是志愿军在抗美援朝

战争中的最后一役，共毙、伤、俘敌 7.8 万余人，战线向南扩展了 170 多平方公里，拉直了金城以南的战线，有力地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进行的国际性现代化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坚决执行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思想，成功运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思想。中国人民同朝鲜人民一道，打败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军”，歼敌 100 多万人，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不仅支援了朝鲜人民，也保卫了中国的安全，迫使敌人于 1953 年 7 月 27 日在板

门店正式签订了停战协议。朝鲜战争最后以中朝方面胜利和美方失败而结束，无怪乎“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他后来撰写的回忆录中发出如此哀鸣：“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

抗美援朝战争中，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协助毛泽东组织领导了这场抗美援朝战争。他们从战争实际出发，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因势利导，扬长避短，克服了一切困难，解决了各种复杂的问题，取得了以劣势装备战胜高度现代化装备敌人的极为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对加速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加强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和研究未来反侵略战争，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 第十一章 参与组织与领导国防现代化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十分关注国防现代化建设。他和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同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及时抓住了迅速发展国防现代化事业的有利时机，适时调整发展战略。并且积极参与指挥人民解放军同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残余势力的军事斗争，以及对朝鲜、越南、老挝等国的军事援助；参与组织保卫祖国领土、领海和领空的军事斗争；提出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同时并进、相互促进”的思想；亲自领导了以核武器、导弹、人造卫星、核潜艇等为代表的尖端武器的研制，为国防尖端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领导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抵御外国侵略、维护祖国统一的伟大实践中，周恩来的军事思想不断发展，形成了以“积极防御”理论为基础的，把军事斗争、国防力量建设、外交斗争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国防现代化思想。目的就是要维护祖国领土、领海和领空的完整和统一；制止或延缓外国侵略势力对中国的侵犯，为国家进行大规模现代化建设，赢得尽可能长的和平环境；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周恩来的国防现代化思想和实践，是他留给中国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对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 一、高度关注新中国的安危与主权完整

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始终以极大的精力关注国家主权的完整与安危。他以一个伟大战略家的胆识和胸怀，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和平大业出发，站在国际战略的高度，时刻把握世界风云变幻的脉搏。不仅在理论上深刻阐述了新中国必须建立强大国防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而且在实践中，为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长期稳定的周边环境，维护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一）为了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先后进行了抗美援朝、援越抗法、援越抗美和援老抗美的斗争，周恩来为做好对外军事援助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这两大阵营的对抗。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败，英国、法国、荷兰等国的势力受到极大的削弱，美国成了最大的战争受益者，几乎控制了这一广大地区，并将其战略前沿延伸到日本、朝鲜半岛、中国、菲律宾一线，大有把太平洋变成美国内湖之势，并构成了对社会主义阵营战略大包围的态势。中国人民在东方的胜利，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冲破了帝国主义在太平洋及东亚的势力范围，打乱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布局。中国人民的胜利，对全世界，特别是亚洲和非洲正在反抗殖民主义统治的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极大地推动了战后在全世界掀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帝国主义决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更不甘心退出中国大陆，它们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进行经济封锁，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妄图支持蒋介石反动集团重返大陆。

周恩来针对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的重要战略地位，运用马克思、列宁

关于国家学说的理论，深刻分析了世界形势及中国周边环境，认为“帝国主义存在一天，战争的土壤也就存在一天”。对美帝国主义发动朝鲜战争，轰炸中国东北地区，企图把战火扩大到中国的侵略行径，周恩来严正指出：“美国政府由于这些疯狂横暴的帝国主义侵略行为，已经证明了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危险的敌人。”面对帝国主义可能的侵略，周恩来庄重声明：“对任何外来的侵略，我们一定要进行抵抗，坚决击退这种侵略。”他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为巩固和发展人民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不可能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护自己。我们必须及时地加强我们的国防建设，并且随时警惕地注视着帝国主义敌人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

1953年6月，抗美援朝战争即将胜利结束。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美帝国主义能否因侵朝战争的失败，而放弃发动战争、侵略中国的企图？周恩来对上述问题作了科学分析和回答。他深刻指出：“今天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是和平与战争问题”。美国虽然从朝鲜战争上得到了教训，但并未改变包围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战争威胁的战略企图。“我们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一切国际纠纷，对方则主张用战争来解决。如果战争来了，我们毫不畏惧，敢于抵抗，而且一定能够击败战争挑拨者。”历史充分证明了周恩来的这一英明论断。

1950年1月，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秘密访问中国，向中共中央提出援越抗法的请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向胡志明表示，尽管新中国刚刚成立4个月，面临很多困难，但一定尽力向越南提供抗法斗争所需要的一切援助。在1950年至1954年的越南抗法斗争期间，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毛泽东批准，在周恩来的具体筹划和部署下，中国向越南总计提供了各种枪械11.6万余枝，火炮4630余门和大批弹药及军需物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军训练了部分主力部队，还帮助越军开办军官学校和专业技术培训班，培训了军事和技术干部1.5万余人。这些工作中都包含着周恩来的关怀和指导。由于中国的大力援助和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全力帮助，越南军民奋力战斗，连续取得了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尤其是边界战役、西北战役和奠边府战役是抗法战争中具有决定性的三个战役。周恩来一方面时刻关注越南战场上的战役进程，另一方面又在谈判桌上以他特有的方式进行着援越抗法的斗争。1954年4月至7月，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同苏联、越南等国领导人一起，采取“联法抗美”的策略，同德、英、美等国代表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先后妥善解决了停火、撤军等问题，并最终达成了和平协议。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斗争，对于和平解决越南问题，制止当时印度支那战争升级，防止美国武装侵略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维护了国际和平。

1964年8月，美国借口其军舰在北部湾海域遭到越南北方海军的攻击，派出大批飞机轰炸越南北方，从此越南人民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救国斗争。面对日益扩大的越南战争，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严正指出：“美国以为，不把对越南的侵略扩大到中国，中国就不援助越南。我们认为，即使不扩大到中国，中国也一样要援助越南人民，只要越南民主共和国提出要求，只要南越民族解放阵线提出要求。战争扩大时，是无法划一条界线的，就像火势会蔓延一样。美国要玩火，要冒险。中国要扑灭这场火。”中国人民“准备向南越人民提供包括武器在内的一切援助，在南越人民需要的时刻，将派出中国人员和南越人民配合作战。”从1965年开始，中国对越南进行了大

规模的援助。周恩来对援越抗美是十分重视的。1966年5月，周恩来对外交部、外贸部、总参谋部负责人指示说，要把援助越南看作援外工作中的头等重要的事情。6月接见越南外贸部长李班时又重申，凡是越南需要的，我们就优先供应。后来，周恩来还对运往越南南方战场的武器装备的包装问题，作了具体指示：“要便于输送，便于携带，便于使用，便于隐藏”；“弹药包装每箱最大重量不能超过25公斤”。中国人民解放军认真贯彻上述指示，向越南提供了数量大、品种多、范围广的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同时，还陆续派出了防空、工程、铁道、后勤、扫雷等部队，到越南北方担负防空作战、国防工程建设及海上扫雷任务。周恩来对每项援助任务都非常关心。比如，1972年5月，中国海军扫雷工作队进入越南，担负海防港至东北群岛海区航道的扫雷任务。周恩来特别指示他们，要搞好破雷调查，摸清海区及美军布雷情况，先扫通主航道咽喉区段，再逐段扩大范围，打通全线。指战员们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科学调查，勇敢排雷，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总之，周恩来对援越抗美做了大量的工作。1966年4月13日，越南领导人黎笋向周恩来说：“我们一直认为中国跟我们是最近的，中国给我们的援助最大，而且是最充分的。”“要是你们不给我们热心支援的话，我们恐怕要多牺牲二三百万人才能取得胜利。”

1960年，老挝根据日内瓦协议成立了五方联合政府。但美国却积极支持老挝的极右势力发动内战。根据老挝人民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决定积极支援老挝人民抗美救国的斗争。1961年4月12日，周恩来同吴努总理谈老挝问题时说：“如果美国要在那里打局部战争，那么这对美国来说，比朝鲜战争将是更加错误的地点和更加错误的战争。”以后他又多次代表中国政府严正声明，老挝是中国的近邻，美国对老挝的侵略，也是对中国的严重威胁，中国绝不会坐视日内瓦协议被撕毁，让战火烧到自己身边。1961年12月2日，经周恩来审批的外交部关于援老工作的请示报告，提出了要“在逐步促进老方自力更生的前提下，采取积极援助的方针”。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即承担了向老挝提供军事援助的任务，派出大量工程部队，无偿为老挝修筑公路。周恩来对此项援助极为重视。例如，1961年4月25日，周恩来总理同老挝王国政府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在联合声明中指出，中国政府应老挝王国政府的请求，同意帮助老挝王国政府修筑1条公路，即丰沙里至帕卡公路。9月，周恩来又指示修建“丰帕”公路“要动用工兵部队”，“包下来，修得快，修得好”。我援建部队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克服重重困难，保质保量完成了任务。在全部援建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帮助老挝修筑了822余公里的道路，并在筑路中进行了防空作战，为老挝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作出了贡献。

（二）为了抗击外国军队的武装侵犯，建立长期稳定的周边环境，周恩来对保卫中国边防和海防的斗争，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发展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但是有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奉行扩张主义，蚕食中国领土，有的甚至派遣军队侵犯中国领海和边境地区，使中国周边环境在长时间里不够稳定。周恩来和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样，十分关注保卫中国边防和海防的斗争。他在分析总结近代中国的惨痛历史教训时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国百多年来的历史特别是近二十几年的历史表明：中国一直是帝国主义侵略盗匪的重要目标”。之所



以如此，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就是旧中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落后，而导致了有国无防、有海无防的状况。中国人民要想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使自己强盛起来，并且有强大的国防力量作后盾。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周恩来直接领导了历次保卫中国边、海防的斗争。他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制定了一系列边、海防斗争的方针政策。鉴于边、海防的斗争不仅是军事斗争，而且涉及到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的复杂情况，中共中央规定了边、海防涉外事件，无论大小都要请示报告。周恩来根据中央确定的方针，亲自掌握斗争原则和策略的具体执行情况，使每次斗争既教训敌人，又锻炼部队，同时着眼有利于边境的长期稳定，发展睦邻友好关系。

1962年10月至11月，印度军队越过中印边界东段、西段双方实际控制线，悍然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作战。作战期间，周恩来随时了解战况，并及时指导中国边防部队作战的进程。当中国边防部队收复了一些被印军侵占的领土，取得重大胜利后，考虑到当时国际形势和斗争需要，中共中央决定我方单方面实行停火和撤军。周恩来亲自部署撤军工作，规定参战部队在撤离战场之前，先将缴获的印军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擦拭清点，交还印军。为了照顾印度的面子，还专门指示，通知印方人员改变打白旗的传统做法，打绿旗来接受其武器装备。随后又将印军俘虏礼送出境。实行这些政策和策略，不仅对稳定中印边境局势具有深远影响，而且受到了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热烈赞扬。

1969年3月2日，大批苏联军人乘装甲车和汽车，侵入中国领土珍宝岛，突然袭击正在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人员。中国边防人员在警告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在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中，周恩来一方面指导中国边防部队作战，一方面采取了顾全大局的态度，坚持自卫原则，据理斗争，尽量避免事态扩大。9月11日，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应苏方要求，趁苏联总理柯西金途经中国的机会，在北京机场与他进行了坦率的会谈。周恩来指出，中苏之间理论和原则的争论，不应该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中苏两国的问题，只要我们心平气和地处理，总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周恩来强调，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打开地图就知道，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争议地区。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我们没有任何军队驻在国外，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周恩来还明确表示，中苏两国不应该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中苏边界谈判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对此，柯西金表示同意，根据中国方面的提议，中苏达成了缓和边界冲突的临时措施，周恩来为夺取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作出了很大努力。正是这种努力导致了1969年在北京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

1974年1月15日至18日，南越军队侵入中国西沙永乐群岛海域，打死打伤中国渔民和民兵多人。针对南越军队的侵犯活动，经周恩来、叶剑英研究，并经毛泽东同意，决定采取加强巡逻和相应的军事措施，保卫西沙群岛。当时周恩来虽病魔缠身，仍对西沙自卫反击作战作出指示。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叶剑英、邓小平等军委领导人，部署了打击南越入侵军舰，收复珊瑚、甘泉、金银三岛的军事行动。从1月17日至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对入侵西沙永乐群岛的南越军队进行了英勇的自卫反击作战，击沉

南越护航舰一艘，击伤驱逐舰3艘，收复了3个岛屿，取得了作战的胜利。西沙海战是周恩来生前组织的最后一次自卫反击作战。这次海战的经验，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保卫海岛的自卫作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为了打击国民党军队的窜扰活动，周恩来组织指挥了人民解放军一系列作战行动，赢得了重大胜利

国民党当局从撤退台湾的时候起，就在美国政府的怂恿和支持下，不断派遣军队，从海上和空中对大陆进行各种袭扰破坏活动。人民解放军打击国民党军队窜扰大陆活动的作战行动，从1949年开始，到1969年基本结束，历时20年。在旷日持久、范围广泛、尖锐复杂的反窜扰活动中，周恩来高度关注并组织指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次作战行动，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有时战况十分复杂，战机瞬息万变，为了及时掌握情况和作出决断，周恩来经常是日以继夜地工作。他常同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他的办公室应是全天候的，一天24小时值班，凡是发生重大情况或突然事件，不管他是否已经休息，都要及时向他报告。周恩来的工作精神和斗争艺术，鼓舞着指战员不断取得作战的胜利。

国民党军队逃到台湾后，不断以小型舰艇进行海上窜扰活动。在屡遭挫败后，决定用海军战斗舰艇送小股武装特务登陆袭扰。1965年8月5日，国民党海军舰艇“剑门”号和“章江”号，准备输送向福建渗透的一股武装特务。6日行至东山岛东南海域，被严阵以待的南海舰队一举击沉。这便是著名的“八六”海战。8月17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作战有功人员代表。当时周恩来夸奖他们说，这次海战是打近战、夜战、群战，是小艇打大舰，打得很好。1965年11月，台湾当局的两艘军舰袭扰福建崇武以东海区，当时正值深夜。周恩来得到报告后，亲自听取总参谋部的汇报，并直接组织指挥了这场反袭扰海战。当解放军舰艇向敌舰接近时，周恩来又指示，集中兵力先打一条，一定要打好，发扬我军近战、夜战、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解放军集中力量击沉一舰后，另一艘带伤逃走，这就是崇武以东海战。当晚，周恩来始终坚守在作战指挥位置上，关注着战斗进程，直到次日凌晨，亲自签发了新闻战报后才离开。崇武以东海战以后，国民党海军的海上窜扰活动逐渐减少，到70年代就终止了。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国民党空军凭借当时的空中优势，不断进行空中窜扰活动。对此，周恩来高度重视，经常关心空军和防空部队的建设，并对如何打击空中窜扰活动，给予具体的指导，新中国建立初期，国民党空军主要在东南沿海地区上空窜扰，遭到解放军沉重打击。周恩来接见了有功人员，给指战员们很大的鼓舞。后来国民党空军变换手段，利用夜间使用各种机型的低空慢速飞机入窜大陆纵深地区进行侦察。1957年11月20日夜，国民党空军1架B—17G型飞机窜至湖南、河南、山西、河北等地区，解放军航空兵共起飞歼击机18架次，层层拦截，均未获战果。周恩来得知后当即指示，应用一切方法将国民党飞机击落。副总参谋长陈赛根据周恩来指示，立即开会研究对策，制定了加强夜间防空作战的措施和方案。1959年5月29日晚，国民党空军2架B—17G型飞机互相策应，入窜大陆，被我击中，凌空爆炸。有功人员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从1958年起，国民党空军经常使用U—2型高空侦察机入窜大陆。1962年9月9日，U—2型飞机从2万米高空窜至南昌机场上空时，被我严阵以待的地空导弹第2营击落。周恩来得知这个胜利喜讯后，高兴他说，这很好，是一个很大的胜利。1964年7月，周恩来陪同毛

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该营全体指战员。由于国民党的空中窜扰活动屡遭打击，到1968年就基本停止了。

1958年炮击金门战斗，既是为了反击国民党军队的挑衅和骚扰活动，又是为了反对美国当局入侵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维护中国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因此，这是一场政治、外交和军事交织在一起的斗争。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在整个炮击金门的日子，不仅参与决策和指挥，而且在炮战的紧张日子里，一直坚守在作战室，密切注视着战况的发展和斗争策略的应用。当美国政府以种种借口调兵遣将，频繁在台湾海峡进行侵扰活动时，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严正声明，中国政府完全有权对盘踞在台湾岛屿的蒋介石部队给予坚决的打击和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任何外来干涉，都是侵犯中国主权的罪恶行为。并且警告美国政府，如果继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干涉，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当美国军舰为国民党运输舰护航时，福建前线部队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以打击国民党军的方式对付美舰护航，进行了大规模的炮击。美舰在我炮击开始后迅速逃离战区海域，国民党军运输舰也立即逃窜，当金门国民党军陷入严重困境，台湾海峡地区出现了复杂斗争形势时，为了粉碎美国政府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制定出新的斗争策略，采取打打停停，打而不死，封而下登的方式炮击金门，从而稳住了金门的国民党军，拖住了美国。炮击金门到了60年代，进入了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的阶段。这种作战行动表现形式是军事斗争，而实质却是一场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其中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周恩来的大量心血。

综上所述，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在担负党和国家繁重的日常工作的情况下，仍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建设和巩固国防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周恩来在许多场合都反复强调，中国人民加强国防建设不是为了侵略而是为了维护一个和平的环境：使中国人民能够安心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指出：“改善生活是人类最基本的要求，也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中，在社会的前进中，才能做到改善生活，因此我们反对侵略战争。”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人民。周恩来说：“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国土以后，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但是，中国人民也深知，和平不是乞求可以得到的，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去争取。一旦帝国主义把侵略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周恩来代表中国人民庄严声明：“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

周恩来还把国防建设与世界和平联系起来，他认为，我们建设现代化国防的种种努力，不仅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自身利益，同时也是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国防的现代化，对于帝国主义侵略企图是一种重要的遏制，特别在亚洲和东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都要受到中国力量的牵制，使其不能轻举妄动。美国侵略朝鲜和越南战争的失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中国的国防现代化是对世界和平运动的支持，周恩来进一步强调，我们建设现代化国防的目的，就是“要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战争，万一它发动战争，就叫它遭到失败”，以“争取持久和平的国际环境。”周恩来的这些论述，是他建设中国现代化国防的思想和实践的出发点和基本依据。

## 二、领导和关怀人民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周恩来十分重视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他认为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是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军队是国家抵御外国侵略、保卫主权不受侵犯、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无论在主持军委工作，还是在不承担军委领导期间，他都时刻关心和指导着军队“三化”的全面建设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主持军委工作，和毛泽东一起领导了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为了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迅速改变人民解放军单一军种的落后状况，周恩来强调：“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人民空军和人民海军，才能够击退从空中和海上袭来的武装盗匪，保护我们的领空领海不受侵犯。我们的人民陆军必须陆续加以强化，使它足以战胜任何侵略者。”根据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要求，解放军进行了大规模精简整编。周恩来提出了缩减陆军，尤其是步兵，加强空军、海军及特种兵部队的方针。这一方针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举行了一系列会议，讨论研究人民解放军精简整编问题，并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复员委员会（后改为转业建设委员会），以加强对精简整编工作的领导。通过精简整编，压缩了军队人员定额，节约了军费开支，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创造了一个良好条件。在精简步兵的基础上，周恩来领导了空军、海军和特种兵部队的组建，很快建立起了这些新建军兵种的领导机构，确定了体制编制，完成了人员、装备及物资的调配工作，及时开展军事训练，迅速形成了战斗力。

经过周恩来的精心筹划，1949年11月，人民空军正式组建。1950年4月，又组建了海军。同年8月至1951年3月，炮兵、装甲兵、防空兵和工程兵的领导机关也先后建立起来，此后又建立了铁道兵。经过3年多的时间，空军建立了20多个航空兵师和其他勤务部队，海军建立了少量的水面舰艇和航空兵部队，陆军各技术兵种也达到一定规模。

在新军种兵种的组建过程中，从领导干部的配备、编制的确定、兵员的调动、武器装备和各种物资的调拨，周恩来都亲自过问，有时还参与具体组织实施。在组建空军的过程中，他对诸如领导机关的组建，飞行人员的选拔和培养，飞机的购买，机场的修建，特种油料的解决，都作出详尽的指示，并亲自筹划，检查落实。1953年，中央决定加快海军建设步伐，周恩来曾就海军的近期任务和长期规划，作了重要指示。1953年11月2日，周恩来在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陶勇的陪同下，乘“大别山”号军舰在长江口海面检阅了“武昌”、“沽河”舰艇部队，还观看了鱼雷艇和海军航空兵第一师第一团的操作表演，并为该部队题词：“加强训练，提高技术，为了巩固祖国的海防而努力”。1957年8月4日，周恩来在海军司令员萧劲光陪同下，检阅了海军驻青岛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国的海岸线很长，美帝国主义还霸占着我国的领土台湾。海军必须继续努力，为建设坚强的海军力量，保卫祖国和世界和平而奋斗。萧劲光在致词中指出，总理这次对我们的检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建军历史上最大的光荣，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和信心。周恩来还给受阅部队题词：“希望你们为建立一支更加强大的足以保卫自己的人民海军，为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而奋斗不息！”1965年3月10日，周恩来在陈毅副总理、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政委刘浩天陪同下，检阅了东海舰队某舰艇部队和海军航空兵某部队，观看了海、主协同作战表演。周恩来看完表演，再次作了“从实从严从难训练部

队”的题词，要求海军部队从实战出发，搞好训练。

60年代初期，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为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周恩来于1962年6月明确提出了“备战整军”的军事工作方针。在这期间，中央先后在广州、北京召开全军编制装备会议，进一步确定了整编原则和整编方案。会后，国防部颁发了陆军军、师编制表，全军按南、北步兵师和大中小师的编制，进行了全面整编。为了加强地方部队建设，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部队和守备部队的编制也进行了调整。从1959年到1965年，人民解放军在实行统一正规的部队编制的同时，还重点加强了海军舰艇部队和空军航空兵部队的建设。同1958年相比，海军增编51.6%，空军增编41.8%。为适应国防工程建设和援助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需要，工程兵、铁道兵也作了相应的扩编。特种兵的迅速发展，对加强国防建设和保卫国家安全，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适应现代条件下反侵略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建立一支独立的核打击力量，并由周恩来主持筹建工作。1957年12月，中国开始组建战略导弹部队。初建时期，该部队由解放军炮兵领导机构领导。到了1966年，这支新建的部队已具有一定规模。1966年7月1日，在已建立的导弹部队的基础上，正式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的领导机构。经周恩来提议，这支部队被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简称“二炮”。随着战略核武器的发展，这支战略导弹部队的装备逐渐得到加强。1966年以前，部队是用从苏联购买的P—2近程导弹和中国仿制的近程导弹进行教学和训练的。从1966年起，第二炮兵部队装备了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中近程导弹，70年代初又装备了中程导弹，成为一支初具规模的独立兵种，并较快地形成了作战能力，增强了人民解放军的威慑力量。

1962年11月，根据现代战争不分前后方的特点，中共中央决定扩编铁道兵部队。11月11日和23日，周恩来两次召开会议研究扩编问题。他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对铁道兵性质、任务和编制等问题的重要指示，指出：铁道兵是工程部队性质，无论平时和战时都是执行工程任务，是工程部队，不是战斗部队，性质决定任务，组织编制服从于任务；干部编制数不能超过总定额的10%，生产人员编制数要达到80%以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铁道兵部队从1963年3月开始整编，无论担负林区建设或者铁路建设的铁道兵师，编制的生产人员都占80%以上。到1963年整编后，铁道兵总兵力比上年增加1倍。

在不长的时间里，人民解放军就初步发展成为一支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并在抗美援朝战争和保卫边海防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建设现代化合成军队的同时，周恩来非常重视建设一个与合成军队相适应的现代化的、得力的指挥机关，他根据把总部机关建成精干、很灵、及时、准确、效率高的指挥机构，以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指导思想，领导了总参谋部的正规化建设，主持了空军、海军以及各特种兵指挥机关的组建，保证了海、空军和特种兵部队的顺利组建。

周恩来还提出必须加强对军队干部的培养，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现代化作战的指挥能力。为此，他以很大的精力抓军队院校的建设。1950年7月2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制定了全军院校建设方案，确定在战争年代原有学校的基础上，改造和新建适应现代化战争条件的各类正规院校，各军兵种要新建一批专业学校，全军创办一所综合性的军事学院。他明确提

出军事训练的基本方针应该是，在解放军现有素质的基础上，用迅速而有效的方法，使部队学会掌握现代化的兵器及其他军事技术，使指挥员学会组织与指挥各兵种联合作战与协同动作，了解参谋业务与通信勤务，以加速我军的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并要求全军在正规化训练方面做到：统一战略、战术、意志，统一教材、典范，统一训练机构、教育制度、学校管理，提高效率 and 战斗力。他强调指出，军事学院的办校方针，仍然是抗大的教育方针，课程主要是讲授毛泽东思想、战略战术、中央军委文件；其次是要学点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还要学一点现代战争的理论和诸军兵种协同作战与指挥的内容，也可学点战术概则。并强调要搞好科学技术教育。在教学方法上，周恩来提出要多采用启发式，讨论式，不要灌注式，他指出，军队的干部经过战争的锻炼，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要让他们献宝，把好的经验谈出来，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教学活动。这一系列重要指示，使全军院校建设得到迅速而健康的发展，很快形成了具有初、中、高相衔接，诸军兵种院校齐全完整的军官培训体系，对促进部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制定军队的条令，建立正规化的军事制度，是正规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周恩来在抓人民解放军正规化建设中，首先抓条令建设。正规化建设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最根本的是制定各种条令、条例，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完善各种军事法规。从这个意义上讲，正规化就是条令化、制度化、规范化。周恩来认为，现代化军兵种的战斗行动，最重要的是协同动作，而协同动作，就要有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他曾形象地说，解放军像一部大机器，这个齿轮和那个齿轮，必须准确地运行，才能真正协同动作。条令、条例就是保证正规化的根本条件之一。他指示所有部队，要实行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纪律。周恩来的这些重要思想和指示，成为人民解放军制定新条令、条例的基本原则。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军委军训部于1950年夏季组织起草三部共同条令。1951年2月1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总参谋部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队列条令（草案）》、《纪律条令（草案）》，在全军试行。以后又对上述条令进行了多次修改补充。人民解放军现行的三大条令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军队发展变化的新情况加以修改补充制定的。三大条令是全军进行管理教育，建立良好的内外关系，内务制度，养成良好的作风，进行队列训练，维护和巩固纪律，以及实施奖励、处分的依据，它对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有一次，个别高级干部在外事活动中不遵守内务条令的规定，周恩来对此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说：“你们颁布的条令，自己不遵守，迎宾尚未结束，我还没有离开，你就懒散地走了，这样影响多不好，军队还要条令干吗？”他抓住典型事例，对高级干部进行严厉批评的原则态度，对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制定共同条令的同时，各军兵种还先后翻译、颁发了苏军一些专业和勤务部门的条令、条例、教令、教程、教范，如《步兵战斗条令》、《骑兵战斗条令》、《高射炮兵战斗条令》、《空军战斗条令》、《海军战斗条令》、《实弹射击教令》等供部队试行。试行过程中又进行若干次修改。后来人民解放军又集中力量，开始编写自己的战斗条令。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先后编写出《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等条令、教令、教材和其他训练法规。1963年，中央军委正式颁布了《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步兵战斗条令》、

《合成军队军师战斗条令》、《合成军队团营战斗条令》和《司令部工作条令》等一大批条令和条例，要求全军贯彻执行。这些条令、条例充分肯定了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对搞好军事训练和部队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此外，人民解放军还相继制定、颁布了《政治工作条例》、《军官服役条例》以及其他各种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从而使人民解放军在作战、训练、工作、生活秩序等方面都有了遵循，有力地促进了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训练，是和平时期军队工作的中心。周恩来历来重视部队的训练。他指出：“我们已不是在战争中进行锻炼，而是在保卫和平、保卫建设、保卫祖国边防的和平环境中进行锻炼。”在和平时期，训练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主要手段。1950年11月，在周恩来、朱德的亲自指导下，召开了全军军事院校及部队训练会议。会后起草了《关于军事院校建设与军队训练问题》的报告，送呈军委审批。一天，总理办公室通知萧克晚饭后去开会。出席会议的有政务院和中央一些部委的负责同志。所谓“开会”，就是周恩来将有关部门请示报告的领导或成员召到办公室，一个一个地研究或回答解决问题。已经11点多钟了，前面的人离开后，周恩来才开始审阅军训部起草的报告。他说，这是军事学校和部队训练方针性的综合文件，要力求准确。并逐段逐句地读，逐段琢磨，重要的地方反复多次。当时的情景，几十年后萧克仍然历历在目。当周恩来读到“掌握新的技术，学会联合作战”两句时，以同志式的讨论态度与萧克商量其准确性。因为当时人们常常使用“现代化”、“联合兵种”这类词汇。军训部意在进一步把现代技术与现代指挥结合起来，概括成两句明确的话，便于理解和记忆（刘伯承后来把“联合兵种”这个提法改为诸兵种合同战术，更为贴切）。周恩来经再三斟酌后同意了 this 提法。这份六七千字的报告，一直修改到凌晨4点。周恩来这种不辞劳苦、严肃认真、高度负责的精神，深深地教育了萧克。就是在这份重要的文件上，确定了人民解放军在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的基础上，以学会现代军事技术与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指挥，作为军队长期的训练方针。

周恩来强调指出，战时要打仗，平时就应该进行战斗准备，眼睛盯着敌人，思想上警惕敌人，准备战争。尽管现在整个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和平的可能性更大了，战争推迟的可能性更大了，但是松懈是不允许的，必须警惕突然事变。这是军队的主要任务和根本任务。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周恩来提出了以学会现代军事技术与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指挥为长期的训练方针。军事工作的这一重大战略转变，使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不断得到加强。60年代初，在叶剑英、贺龙、罗瑞卿等领导下，全军掀起了军事训练的热潮，使人民解放军的战术技术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1964年6月，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的部队和民兵在北京向中央领导人汇报表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表演。看后，周恩来兴奋他说：“你们表演得很好，我看了很高兴。练兵就是这样的练法。把兵都练成这个样子，把民兵也练好，那就什么敌人也奈何不了我们。”“文化大革命”期间，部队的军事训练受到严重干扰破坏，一度陷于被取消状态。周恩来在接见广州军区军以上干部时，明确指示，部队要加强军事训练，“支左不能占多了人”。他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亲自主持召开军委会议，研究部队训练问题。他明确指示，全训部队除野营拉练外，全年步兵军事训练90天，技术兵军事训练120天。周恩来采取这一重要措施，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使全

军军事训练逐步得到恢复，对保持和稳定军队的战斗力，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是多方面的，它包括军事思想、作战理论、武器装备、编制体制、后勤保障等，其中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就提出：“我们虽不赞成唯武器论的观点，然而军队技术的提高，装备的现代化，是迫切需要的，没有装备好的技术高的政治坚定的现代化的几十个师，是不能最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他还说，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是一个软骨动物。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6年里，周恩来自始至终亲自抓武器装备的研制和生产。

1951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由周恩来兼任主任。当时人民解放军拥有各类枪支200多万枝（挺），其中步枪，手枪、冲锋枪约占94%，各种火炮2.9万多门，其中60毫米迫击炮约占60%。而且品种繁杂，枪支竟有100多个品种，火炮也有80多种口径，产自20多个国家，曾有“万国牌”之称。重装备中只有410辆坦克，100多架飞机，100多艘中小型快艇和炮艇，其中多数是从战场上缴获的美、日等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大战期间生产的产品，性能落后，有的破旧不堪，零部件已无来源。这些武器装备虽然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发挥过重大作用，但依靠它们来从事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是根本不可能的。周恩来认为，常规武器必须立足于自给。于是首先抓紧建设了一批枪炮、汽车、坦克工厂和武器装备的定型生产。他要求军工生产部门从仿制入手，逐步过渡到自行研制适合作战需要的新型作战武器上来，走出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道路，逐步实现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的国产化。1952年7月，周恩来又以兵工委员会的名义向中央写了《关于兵工工业建设问题的报告》，提出兵工要提早建设，要改造老厂，建设新厂，用三五年时间迅速建立中国自制陆军武器、弹药及空军、海军弹药的基础，并规定18种枪炮为国家制式武器。根据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他提出了分阶段、有重点发展的方针，使国防工业得到迅速发展。

对现代化武器装备，周恩来从现代战争的特点出发，认为空军的作用正在迅速提高，对战争的胜负将越来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此提出必须优先发展空军的思想。并且从航空工业技术含量高，中国技术落后的现实出发，提出先维修、后制造的发展方针，使中国的航空工业稳健而迅速地发展起来。1950年12月下旬，周恩来主持召开两次会议，研究航空工业发展的问题。他在会上说：“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在朝鲜打仗，大批作战飞机需要修理。我国是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6亿人口的国家，靠买人家的飞机，搞搞修理是不行的。因此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应当是适应战争的需要先搞修理，再由修理发展到制造。”当时中国经济正处在恢复时期，而且正在朝鲜打仗，财力有限，所以周恩来一再强调，开始规模要搞得小一些，先解决飞机修理的需要，保证朝鲜打仗，原则是先修理后制造，由小到大。在设计建设修理厂一的同时，应考虑今后转为制造工厂的安排。1951年8月，航空工业局与苏联顾问一起酝酿在3至5年内试制成功活塞式教练机雅克-18和喷气式歼击机米格-15比斯（后改为米格-17埃夫）。周\* 恩来为讨论这个方案，亲自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落实。经过讨论，他提出，就按你们提的计划办，这个计划完成之后，可以生产3600架飞机。在这个数量中，歼击机、教练机、运输机各种



机型的比例，要请空军审议一下看是否符合军委有关规定的比例关系。关于明年的订货问题和3至5年内从修理过渡到制造的计划。先发个报给苏联，请他们予以考虑。至于实现这个过渡计划之后，修理任务归航空工业局还是归空军，今天暂不确定。接着又说，同意再向苏联聘请25名专家。完成这个计划所需要的人员、资金等问题，由富春同志办理，看来需要的资金折合小米50亿斤就可以够了。准备拿出60亿斤，办一所航空大学。之后，周恩来再次强调，关于发展航空工业的方针、原则和建设计划，年底已经定下来了，要继续抓下去。同时还着手轰炸机厂的基本建设，争取1957年底正式投产。

“到1955年底，人民解放军利用进口和国产的武器装备，换装和新装备了106个步兵师，9个骑兵、守备、内卫师，17个地面炮兵师，17个高射炮兵师，4个坦克、机械化师，33个航空兵师，9个舰艇支队。至此，海军和空军的装备已初具规模，陆军特种兵的装备得到迅速改善，步兵的旧杂式武器装备绝大部分被淘汰，基本上实现了武器装备的制式化。全军武器装备的水平比新中国成立时大大提高了一步。

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紧张局势逐步缓和。周恩来及时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向中共中央建议，放慢国防工业建设的步子，把原子弹、导弹、遥控装置、远程飞机搞起来，并提出使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的重点由常规武器转向尖端武器的战略设想。周恩来认为，中国的国防力量建设虽然要坚持人民战争的基本思想，但是，在当今世界，尖端武器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尖端武器的发展将决定未来战争发展的方向。中国人民一定要研制和发展自己的尖端武器。毛泽东非常重视周恩来的建议，经过深思熟虑，决心发展中国自己的国防尖端武器。实践证明，周恩来的这一战略设想是非常英明的。由于及时实现了武器装备发展的战略性转变，使中国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事业，从无到有迅速地发展起来。随后，中共中央又决定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对研制尖端武器工作的领导。在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专委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下，核武器、导弹、人造卫星、核潜艇等尖端武器陆续研制成功，使中国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其巨大的战略威慑力量，有效地遏制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对中国可能发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保障了局部自卫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革命化是国防现代化的政治基础。周恩来十分强调必须坚持以革命化保证正规化和现代化的思想。针对在和平环境中，部队政治工作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特点，1957年12月，他在《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的讲话中重申“党一定要管军队”的原则，指出：“我们军队如果没有党的领导，要使它成为一支既有高度军事素养又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军队是不可能的，因此一定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不仅党中央要管军队，地方党委也要管所在地区驻军的重大问题，使军队了解党的方针和政策。在军队内部，周恩来强调必须有严格的纪律，这种纪律是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纪律。同时应加强内部团结，改进相互之间的关系。他强调：“主要是改进上下关系、左右关系、官兵关系。相互之间，不要因为实行了军衔制度、规定了礼节等而拘束起来。我们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应该保持与发扬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工作、打仗要强调按级服从，平时互相交往应该有同志式的友爱，象兄弟一样，不必过分拘泥于形式。”“军队的民主是我们的优点，应该发扬这个光荣传统，进一步增强军内团结。”周恩来还要求军队要注意

密切军民关系，指出，军队有了营房，有了严格的军事勤务以后，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就比较疏远了，这是要注意改进的。他语重心长他说：“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完全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子弟兵。解放战争胜利时，全国人民对我们解放军那真是衷心拥护，军民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是从人民中来的，我们过去的胜利都是在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不能忘本。”他要求军队关心国家建设，多组织义务劳动，帮助人民群众生产，通过劳动锻炼，进一步加强劳动观念和群众观念，使人民看到今天的解放军还是当年的子弟兵，还是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最可爱的人。他殷切希望：“军队要永远保持人民子弟兵的光荣称号，永远保持最可爱的人的光荣称号，永远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1971年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被粉碎后，周恩来再次强调必须坚持党指挥枪，而不能枪指挥党的原则，要求人民解放军必须自觉地接受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周恩来关于人民军队必须实行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的思想，在新中国国防建设的实践中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国防现代化建设。使人民解放军经受了各种考验，出色地完成了抵御国外侵略扩张势力的侵犯，保卫祖国领上、领空、领海安全的光荣任务，无愧于伟大祖国钢铁长城的光荣称号。

### 三、组织领导国防科技现代化建设

周恩来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对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还难以顾及到科学技术领域。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作为共和国的总理，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统一领导下，主管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深知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的严重状况，也密切关注着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他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他于1954年9月提出：“没有现代化的技术，就没有现代化的工业。”1956年1月，他进一步强调：“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并向全国人民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他说：“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下大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1963年，周恩来再次明确指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长期领导国防科学技术事业建设的实践中，周恩来提出和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原则，是国防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基本依据。

#### （一）必须制走符合国情的科学规划

周恩来认识到，在我们这样一个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国家中。要向科学进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绝不是一声号召所能解决问题的，他涉及到许许多多复杂的组织领导工作，其中十分重要的就是首先要有一个符合国情的科研规划。因此，他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和有关部门制定出1956—1967年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对制定规划总的方针，周恩来作了明确指示，他说：“这个远景规划的出发点，是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

界科学的最先进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来，把我国科学事业方面最短缺而又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们科学研究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就是制定12年规划总的指导思想和依据。

为了制定规划，1956年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及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的协助下，国务院成立了科学技术规划委员会，组织600多名科学技术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经过深入调查，反复讨论研究，历时四五个月，最后形成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

制定这样的科学规划，在中国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它的重点是迅速突破和掌握国防尖端技术。原子能技术，喷气与火箭技术，半导体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被列为国家12年规划的57个项目中12个重点项目的前列，并确立了奋半目标：在喷气与导弹技术方面，争取在12年内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在国防电子技术方面，力争在“三五”计划末期满足武器配套需要；在核技术方面，要求在“三五”计划内，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这对增强国防实力，带动国家现代科技进步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被誉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五朵金花”。

## （二）必须瞄准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科学技术非常落后的情况下起步的。关于如何发展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问题，周恩来提出应该有一个高的起点，应该瞄准世界最新的科技成果，他反复告诫说：“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我们要记着，当我们向前赶的时候，别人也在继续迅速地前进。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个方面付出最紧张的劳动。”他还说，我们这样的国家，这样的人民，处在这样的时代，是可以快一点的，也应当快一点。我们不应该跟在别人后面把所有的程序都走一遍，那样我们将永远落在后面，既要有尊重科学的态度，又要破除迷信。要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最先进的成果都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才能比较快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周恩来敏锐地注意到当时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并且科学地预见电子学和其他科学的进步，“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这个革命的意义将远远超过蒸气和电出现而产生的工业革命。近代历史上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绝大多数都首先运用于战争，并且决定着战术的发展。朝鲜战争的实践使周恩来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对战略的影响将越来越大。他深刻指出：“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无论在和平的竞赛中或者在敌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战胜帝国主义国家。”周恩来率先向党中央提出发展国防科学尖端技术，研制原子弹、导弹、遥控装置、远程飞机等尖端武器的建议，并亲自领导了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当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接近完成的时候，周恩来就指示：“核武器的研究方向，应以导弹头为主，空投弹为辅。”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又提出要尽快完成核航弹的空投爆炸试验，同时要以主要力量抓紧原子弹小型化的研制工作，准备用运载火箭发射；同时还要求加快氢弹和导弹的研制。这就把国防科研工作的方向始终瞄向世界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它对加快中国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

差距，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当前改革开放形势下，这仍然应该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

### （三）必须要分阶段、有重点地发展

周恩来还指出，发展科学技术必须要有重点。科学技术的领域非常广阔。中国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经验都非常缺乏，因此需要集中力量分阶段、有重点地发展。在国防科学技术事业中，周恩来提出了抓重点带动全局，抓尖端带动常规的思想。他强调尖端技术应该是发展的重点，在尖端技术中又应以核武器的研制为重点。周恩来之所以选定以核武器为重点，一是因为 50 年代世界已进入“原子能时代”，核技术代表了当时世界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集中了世界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以核技术为重点，不仅可以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而且可以带动起一大批科学技术的发展。二是因为在五六十年代，中国严重受到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周恩来知道越是起劲地对别国进行核讹诈的人，越是害怕核武器。中国核武器研制成功，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威胁，遏制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

早在 1949 年春，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赴巴黎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成员中有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钱三强为培训原子能科学干部和筹备建立实验室，想借到巴黎的机会，托他在法国的老师约里奥·居里教授帮助订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仪器、图书、资料。这件事被周恩来知道后，表示大力支持。尽管当时新中国尚未成立，人民解放战争正在继续进行，经济相当困难，还是拟定在代表团的出国费用中拿出 5 万美元。听到这个消息，从国外归来只有半年多的钱三强感到很振奋。他想，有这样为民族、为事业着想的党和领导，中国新兴科学的发展定会大有希望。后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就是用这批仪器、资料，以及中国科学家自己制造的一批核科学技术实验设备开展研究工作的。

1952 年 5 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研究国防建设 5 年计划时，就酝酿过发展特种武器问题，并征询过有关科学家的意见，决定从各个方面进行准备，积极创造条件。

如何迅速发展新中国科学技术，进而突破和掌握核自卫能力，是周恩来思之已久的问题。从 1950 年到 1954 年，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支持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在 20 多个科学领域开展了研究工作，培养了一批科研骨干，取得了一定的科学成果，为创建中国核事业在科学技术上做了基础准备。1954 年，地质部门在广西发现了铀矿床，当时在地质部门工作的刘杰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十分高兴，并且认为在我国是能够找到足够数量的铀矿资源的。不久，周恩来就指示在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下设立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加强了中国铀矿资源的开发工作。

随着核科学技术研究的逐步展开和铀矿资源的发现与开发，为建立中国核工业提供了技术和物质条件。此时，心系国防、时刻关注国家安危的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是作出发展核事业战略决策的时候了。

为了使中央领导了解情况，为作出决策提供依据，周恩来事先做了周密准备。1955 年 1 月 14 日，周恩来亲自把著名科学家李四光、钱三强和地质部负责人刘杰请到他的办公室，详细了解中国核科学技术研究的进展、人员、设备和铀矿资源的普查情况，仔细询问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以及利用核能所必须的条件。周恩来告诉他们，中央要讨论发展原子能问题，届时要他

们带着铀矿石和简单的探测仪器，进行汇报并操作表演。在周恩来进一步掌握了实际情况、做好各方面准备工作后，当天晚上，写信给毛泽东，约定15日下午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同李四光、钱三强一谈，并观看表演。信中说，下午三时前，李四光午睡。晚间，李四光身体支持不了。请主席明日起床后通知我，我可先一小时来汇报一下今日所谈，以便节约一些时间。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薄一波等中央领导人。会议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和刘杰的汇报，并根据周恩来会前的安排，由科学家用铀矿标本和探测仪器进行现场表演。当盖革计数器接近铀矿石发出嘎嘎声时，出席会议的中央领导人都高兴地笑了。毛泽东看完表演，询问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有关问题。周恩来坐在毛泽东身边，一边插话补充情况，一边提醒科学家抓住重点，尽可能讲得详细和通俗一些。听完汇报，看完表演，毛泽东十分高兴他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找到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矿床。解放以来，我们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你们也经常反映，但其它事情很多，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央书记处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从而揭开了中国研制国防尖端武器的序幕。

#### （四）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周恩来在提出瞄准世界先进水平，有重点地发展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同时，十分强调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他说，我们向科学进军，应该是“认真地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他为国防科研工作制定了“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的方针。他指出，要认识客观规律，不能怕失败。科学实验有时必须经过失败，甚至多次反复，才能成功。想超越阶段跳过去也是不行的。科研工作总是靠突击是不行的，只能在有一定可能性时才能突击。科学研究，尖端技术，要循序渐进，不可能一步登天，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攀，要有步骤和秩序，要像登珠穆朗玛峰那样分几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上去。当然这个中间也会有跳跃。科学研究工作不能停顿，要坚持不懈，发扬连续作战、不断前进的精神，才能迅速把中国的科学技术搞上去。

导弹核潜艇是最具有威慑力的核打击力量，同时又是综合了核武器、导弹武器、海军武器等多种高技术的武器装备，周恩来在领导研制导弹核潜艇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他决定研制工作要分两步进行：第一步研制鱼雷核潜艇，解决核动力用于潜艇和反潜鱼雷等重大技术问题；第二步再研制导弹核潜艇，解决潜地导弹及其发射系统等关键技术问题。对于担负研制核动力装置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周恩来指示先建成陆上模式反应堆，作为研制潜艇用核动力装置的阶梯，先经陆上模式堆试验验证后，再为潜艇研制核动力装置。1971年4月，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开始在码头进行系泊试验。周恩来指示中央专委认真检查系泊试验中的启动反应堆联合试验及航行试验准备情况，要求试验要按系泊试验、航行试验、长航试验、深水试验阶段进行。从1971年8月到1974年4月，按步骤、分阶段完成了上述试验。由于在整个研制过程中，广大工程技术人员认真按照科学规律办事，成功地研制出中国第一代鱼雷核潜艇。试验证明，鱼雷核潜艇水下航速较高，续航能力大，隐蔽性好，设计和建造是成功的，可以交付海军使用。鱼雷核潜艇的研

制成功，为研制导弹核潜艇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资料和经验。1983年第一艘国产导弹核潜艇装备了海军部队，开始形成了新的核打击力量。

#### （五）必须注重汇集和培养大批优秀人才

发展科学技术需要大批人才，周恩来非常重视这项工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就十分注意影响和团结中国科技界的人士，希望他们能够为未来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解放战争时期，他又指示中共地下党组织帮助这些科学家摆脱国民党特务的迫害，暂时到国外去。新中国成立后，又通过各种渠道动员他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说：“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就需要各种科学专家。”如何使中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迅速接近世界水平呢？周恩来强调指出，首要的一条就是集聚和培养人材。他指示，要按照我们所最急需的门类，最迅速地派遣若干组专家、优秀科学工作人员和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国外去实习研究一两年。在国内要有计划地组织大批科学工作人员向在国内的外国专家学习，并且要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科学研究方面。他强调培养人才是一个重大任务，必须从各个方面加强培养，除办好各种专门学校外，还应在工厂中培养技术工人，加强干部的业务学习和技术培训。周恩来多次指示要“专业对口”、“专家归队”，“把人才用在刀刃上”，让专家、科技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经周恩来批准，首先从各条战线抽调一批水平较高的优秀科学家集中到科学研究部门，并任命他们为研究机构的领导人，或为某项研究课题的负责人，从而迅速聚集了一批科技研究人才。与此同时，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通过外交途径，千方百计地争取爱国科学家回国，以适应国内科技事业发展的需要。1955年10月8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和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冲破重重阻挠，从美国归来。在这前后，还有留美、留欧的科学家陆续回到国内，其中包括核科学方面的科学家张文裕、汪德昭、王承书、李整武、谢家麟等10人。

“文化大革命”中，大批领导干部和科技专家受到冲击和迫害。周恩来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各种方式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保护了大批有关部门的领导和科技专家的人身安全。1966年，当他得悉二机部有的专家被抄家，家属受牵连，引起科技人员严重不安，影响科研工作时，十分不安，立即要求中央军委严肃处理。根据他的指示，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军委领导责成国防科委、二机部认真做好善后工作，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并将处理结果报告中央军委。在此同时，负责研制导弹的七机部专家的安全也受到威胁，周恩来立即要求七机部列出必须重点保护的科技专家和技术骨干的名单，经他批准后，由各单位军管负责人保证他们的安全和能够正常从事科研工作，并要经常向他报告执行情况。他曾对军代表们说：“名单中的每个人，你们要保证，出了问题我找你们！”大连工学院结构力学专家钱令希教授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当时，核潜艇研制部门需要他参加审查核潜艇结构设计和编写结构设计规范。周恩来知道后，立即批准钱教授参加这项工作。钱学森在回忆当年受保护的情景时，曾深情他说：“没有周总理的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

谁都知道，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和部分中级科技人员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有些是从国外学成归来的，他们的家庭出身或社会关系属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相当普遍。他们对中国尖端科技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在“文革”中，“反动学术权威”、“里通外国”、“特务”、“臭老九”等各种帽子

在国防科技战线满天飞。今天把这顶帽子套在这个人头上，明天把那顶帽子套在那个人头上。周恩来坚决反对“左”的一套。他主张对高级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愿意为祖国服务就行，不能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他们。他还针对有些单位强调海外关系问题时说：“如果说海外关系，我最多，连马歇尔都认得，怎么办？”他认为不能把海外关系作为拒绝用人的理由，进而抵制了“左”的倾向，保护了一大批专家学者。由于周恩来的不懈努力，使中国的国防科技队伍迅速成长为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 （六）必须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

国防尖端事业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发展国防尖端事业困难极大。因此必须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为此，周恩来提出了密切协同、通力攻关的原则。他多次强调，为了有效地发展我国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贯彻协作的原则。他说，我们发展尖端事业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要发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组织全国大力协同，从科研一开始就组织协作。要发扬风格，有关部门要做到有人出入，有力出力，共同攻克技术难关。通用的技术不要保密，不要门户之见，要拧成一股绳，“否则各部都自己搞，来个万事不求人，是什么也搞不出来的。”他对科学家们说，我们党的机构中有两个部，一个是宣传部，一个是组织部。不论做什么工作，历来都是宣传先行，然后才是组织落实。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重要意义只有少数人知道是不够的，要让大家都知道，特别要让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各部门负责同志都知道。周恩来特别强调，要迅速突破和掌握核武器，需要组织全国性的大协作，需要集智攻关。要做到这些，没有宣传是不行的。他要求核物理科学家在宣传时，不但要重视科学性，而且要通俗易懂，不能尽讲行话。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国科学院组织宣讲团，由钱三强在宣讲团内试讲并作出示范表演，请大家提出修改意见后再次试讲，最后由宣讲团成员分头宣讲，使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重大意义。各单位各部门在尖端事业的发展过程中，真正做到了顾全大局，全力支持，要人给人，要设备给设备。1956年6月，为组建导弹研究院需要从教育部、机械工业部、冶金部、化工部、铁道部商调有关专业人才。为此，聂荣臻召开了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在会上各单位的负责人纷纷表示，要谁给谁。之后，聂荣臻把需要商调的300多名高级技术人员名单报送给周恩来，周恩来对聂荣臻说：“你们所需要的干部同各部门商调就可以了”。就这样，所需人员很快就调齐了。许多单位还没接到调令，只是打个电话，人就报到了。1962年11月，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听取汇报，他针对核工业的薄弱环节，当即决定加强第二机械工业部的科技力量以及党和行政领导的力量，限令各有关部门、部队和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于12月底前，为二机部选调各方面出类拔萃的人员500名，并调配1100多台仪器设备。其中许多领导干部和科技专家是经周恩来亲自审定和提名的。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宣传在先，“全国一盘棋”，一呼百应的局面是不易形成的。在他的亲自组织领导下，全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协作体系。仅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就有国务院26个部委和20个省、市自治区的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联合起来进行科技攻关、设备制造和生产材料，解决了近千项重大课题，在短短的两年里就完成了第一次核试验的任务。

#### （七）必须建立强有力的科研领导机构

1953年，在周恩来的关怀和过问下，中国科学院派出以钱三强为团长的

访苏代表团，考察苏联关于科技工作的组织和领导，科研现状和发展方向，并就两国科技合作问题交换意见。代表团回国后，进行系统总结汇报。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并结合实际对中国科学院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调整措施，如进行进选学部委员的工作，成立若干学部，建立奖励制度，并第一次颁发了全国自然科学奖金。在他的亲自组织领导下，国务院设立原子能事业部。当时名为第三机械工业部，以后又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负责实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为了加强导弹武器的研制，又设立了第七机械工业部，统一管理导弹的科研、设计、试制、生产和基本建设工作。此外还设立了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机械工业部，分别领导和管理航空、电子、常规武器和舰艇的研制和生产工作。为了加强科研工作，又相继建立了导弹研究院、原子能研究设计院、电子设备研究院、航空研究院、舰艇研究院及其若干分院，并且建立了一批相应的试验基地，大大加快了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1962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有关原子能工业生产和核武器研制情况的汇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指出，各方面的配合很重要，中央要搞个委员会，以加强这方面的领导。要求提出个方案名单，报中央批准，并说：“这件事要请总理出面才行。”11月3日，毛泽东批准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由7位副总理和7位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中共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专委）。中央专委在周恩来主持下，加强了对原子能工业生产和换代武器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组织有关方面大力协同配合，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及时进行调度，卓有成效地集中了各方面的主要力量，成功地组织了全国的大协作。

#### （八）必须提高经济效益

研制国防尖端武器需要大量的财力和物力。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国家的财力有限。周恩来深知用于国防科研的经费，是全国人民节衣缩食一点一滴省下来的，决不能浪费，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笔经费的效益。因此，他要求在研制尖端武器的过程中，必须坚持质量第一，安全第一，力求减少损失，各项武器试验工作必须做到“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他提出了凡是通过试验应该得到的科学知识，我们都要得到的指导方针，使中国在研制尖端武器上以尽可能少的投入，得到最大的效益。例如在研制核武器的工作中，周恩来明确提出：“我们反对核讹诈和核威胁，不主张搞几百次核试验，因此我们的核试验都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都要作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在周恩来这一正确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在发展核武器的过程中，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巨大浪费和损失，30多年来，中国仅进行了30余次核试验，不及美国的1/20，投入的费用也比美国少得多，但成功率和效益却相当高，从而以较少的代价研制成功了原子弹和氢弹，并在新的核武器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对航空工业受到严重破坏非常痛心。他挺身而出，毅然提出批判极“左”思潮。1969年4月，周恩来接到空军有关航空工业产品质量下降的报告。他在报告的空白地方列式计算由于航空发动机的质量问题造成飞机停飞的总架数。4月12日，周恩来召集国防工办、空军、航空工业部领导人开会严肃指出：“一个军事工厂搞得这样怎么行？四一〇厂取消了检验制度你们是不是知道？报告了没有？你们为什么不敢抓？为什么不下命令恢复？”“我是早上看到报告的，看后非常难过。”当他听说正在逐步恢复时，生气他说：“你们现在还说检验制度正在逐步恢复。什么逐



步恢复！你们怎么能这样说话，怎么能用这样的词句？不是逐步恢复，而是应当马上恢复！”“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合理的还是要保留，一概取消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不尊重科学”，“是极左思潮。”如果不是周恩来挺身而出，采取种种果断措施，我国航空工业的产品质量不知将陷入何等境地。

#### 四、提出国防现代化必须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思想

国防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共同构成了国家现代化的完整体系。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之际，周恩来就指出：“现在，全国的工作已经开始从军事方面转向建设方面”。要求在战争结束之后，国家的整个建设必须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安排。他在领导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必须以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为主要内容的宏伟目标。他在主持制定国家全面发展战略时，始终把国防现代化和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融为一体加以筹划。他指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不能等工业现代化以后再来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因此，必须在国家统一领导下，从国家整体建设的全局出发，分清轻重缓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建设。”他正确地阐明了国防建设和国家经济建设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对四化建设的协调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周恩来一方面从维护国家安全考虑，强调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工业，但同时又清醒地看到，在和平时期国防工业生产力过剩是一个突出的矛盾。如果把过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到国防工业，就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建设，人民生活也不能得到改善，综合国力不能迅速提高。况且军事科学技术正在迅猛发展，武器装备更新的速度不断加快，不适量的武器生产会造成严重的浪费。真正的备战，不是大量生产武器装备，而是有计划、有预见地储备先进技术和生产能力。所以，周恩来在主持国家建设中，始终坚持国防工业必须以国民经济为基础，必须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而逐步增强，国防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一定要同国力相适应的方针，使国防建设基本上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而不断发展。

##### （一）重工业是国防现代化的基础

重工业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也是国防现代化的基础。这是周恩来关于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思想。他非常重视国家工业化的问题，认为这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前提，是中华民族能够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他指出：“这是一百多年来多少志士仁人所追求并为之流血奋斗的宏伟事业。不实现工业化和经济改造，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完全独立，就不能持久，就不能避免遭受挫折。”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是“自己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够独立地制造机器，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机器，还要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精密机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象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还要有相应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等等。”周恩来还由此进一步指出，国家经济建设以工业为主导，就是要大力发展重工业。强调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他说：“因为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整个工业的

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国防力量的发展，并且归根结底，也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他还特别指出：“国防工业是要在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的”，在帝国主义时中国实行全面封锁政策的情况下，我们“更要加速发展重工业，以加强国防。”

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充分注意到，重工业需要的资金比较多，建设时间较长，赢利较慢，产品大部分不能直接供给人民消费。中国在搞工业建设时必须以苏联的教训为鉴戒，提出“我们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他反复指出：“我们说‘集中主要力量’，并不等于冒进。”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不是说把一切力量都用在工业上，其他的都不搞了，农业不发展了，轻工业也不发展了，那是不行的。而要采取重点建设与全面安排相结合的方针。

## （二）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发展国防现代化建设的立足点。它是周恩来在领导国防建设中始终遵循的一贯方针。周恩来认为，自力更生不仅是革命斗争，而且也是建设事业的基本立足点。他说，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丰富，需要很大的国家，无论从国际和国内的要求来说，都需要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国防体系，专门依赖国际援助的思想是错误的。并且强调“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50年代初，苏联热情帮助、支援中国进行国防建设。那时周恩来就指示有关部门，不仅要引进生产线和图纸，而且要准备自行设计和制造。这个指示成为与苏联谈判援助项目的重要原则，并且对中国的国防工业建设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50年代末，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和图纸，给国防建设造成了严重困难。但由于国防工业建设从一开始就立足于自力更生，为广大科学技术人员和工人、部队战胜困难奠定了基础，经过短短几年的艰苦奋斗，使中国的军工生产迅速由仿制生产到自行研制，由轻武器发展到重武器、战略武器及尖端武器。

1961年初，赫鲁晓夫从苏联全球战略的需要出发，致电毛泽东，表示愿意向中国转让米格—21飞机的制造权，希望中方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进行谈判。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但考虑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和空军建设的需要，周恩来决定利用这个引进技术的机会。在听取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空军工程部部长丁仲和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徐昌裕的意见后，周恩来当即决定派刘亚楼率领代表团赴苏联谈判，并明确指出，如果他们想利用制造权来长我们一下，我们就不干；如果他们想压我们在原则问题上让步的话，就宁可不要，周恩来在国内密切关注着这次谈判。第一轮谈判之后，代表团估计苏方可能在下轮谈判中提出派遣顾问的问题，向国内请示。周恩来立即回电明确指示，派技术专家可以，对专家如何使用，我们完全可以主动。派顾问不能答应。如果他们坚持要派顾问，我们宁可不要米格—21飞机。经过谈判，签订了苏方向中方转让米格—21飞机制造权的协议。1966年中国顺利制造出了这种型号的机种，国内命名为歼—7飞机。此后，又根据周恩来提出的学习、引进、创新的方针，在原型机的基础上，成功地改进设计了歼—7I型、M型，发展成为歼—7飞机系列。从1965年开始，中国成功地自行设计制造出第一种高空高速歼—8飞机。后来歼—8飞机发展成为全天候歼—8I型飞机。看到这些成就，不能不使人联想起当年周恩来当机立断决定购买米格—21

飞机制造权的正确决策。

实践证明，周恩来关于只有把方针放在依靠我国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才能不受他人所左右的思想是非常正确和英明的，只有真正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建立起强大的国防。

### （三）必须注意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

周恩来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时，也很注重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即使是在帝国主义封锁和苏联停止援助的情况下，他仍然充分利用一切有利的国际环境，指示有关部门要想方设法得到外国的先进技术。他要求“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他反对闭关锁国的错误方针，指出，在一个长时期内我们国家还需要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同时也需要同其他国家发展与扩大经济、技术、文化的交流。并且强调：“即使我们在将来建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国之后，也不可能设想，我们就可以关起门来万事不求人了。事实表明，不仅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技术的协作范围将不断地扩大，而且由于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的力量日益强大，国际局势日益趋于和缓，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孤立思想，也是错误的。”周恩来的这一正确思想不仅对加速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也适应了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

1965年4月，周恩来得知英国纳贝尔飞机制造公司倒闭，要拍卖全部设备，便立即通知第三机械工业部研究有无引进价值。三机部很快写了报告，建议全部购买。周恩来批示，不能全部买来，要有选择地购买。根据这一指示，三机部选派得力的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前往英国。周恩来原准备在他们出国前再亲自和他们谈一次，不要饥不择食，防止上当，但人已走了，于是他指示有关人员赶快起草电报并经他亲自审阅，发往英国。结果，出国人员精心选购了一批精密度很高的齿轮加工设备，只花了40万英镑。这些设备，在中国60年代后期研制新型航空发动机中，对高精度的齿轮加工，起了很大作用。

研制飞机发动机的技术非常复杂，在70年代，中国飞机发动机的研制还不过关，成批生产中经常发生质量问题。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解决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周恩来得知后，曾多次指示要解决这个“心脏病”。当时，英国罗伊思·罗尔斯航空公司制造的斯贝航空发动机比较先进。1971年7月，周恩来顶住江青等人的干扰，批准航空工业部从英国进口16台民用型斯贝发动机；同年12月26日，周恩来在航空产品质量问题座谈会上，再次指示要进口斯贝发动机。他说，飞机没有“心脏”怎么行呢？不能认为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都不好，它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能搞，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东西。根据这一指示，航空工业部随即协同外贸部，展开了引进斯贝发动机的有关工作。1975年正式签订引进军用型斯贝航空发动机的专利合同，这是引进西方航空军事技术的一次突破，从而使中国的飞机制造业又向前跨进了一步。周恩来关于注意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的正确思想，不仅对加速中国的国防建设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改革开放的路线，奠定了理论依据。

### （四）必须贯彻平战结合、军民两用的原则

“寓战于平，寓军于民”，是周恩来又一重要的国防建设思想。他认为，

现代战争力量决定于人力、物力、生产力的总和，没有这三种力量全部的动员，是不能进行现代战争的。因此，国防建设不仅仅是国防工业部门和军队的任务，还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努力，才能保证国防建设宏伟目标的实现。从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中，周恩来深刻体会到，要打赢现代战争，必须要增强后备力量，健全国防储备制度。要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保持必要的物资、财政、矿产资源及生产能力储备，贯彻“寓战于平、寓军于民”的原则。各主要经济部门和企业制定发展计划时，应将国防建设的有关因素统一纳入规划，协调发展。他明确要求工交、通信、航运以及农田水利建设事业都必须坚决贯彻这一原则，把战备设施建设和战场建设的需要一并加以考虑规划。其他民用工业也要按照不同行业、生产工艺，分别制定转产军品的计划。他还多次指示要把体育事业和国防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提倡在全国开展劳卫制运动。强调要掌握现代化的武器，必须要有健康的身体。

另一方面，周恩来又明确提出，国防工业要学会两套本领，能军能民，军民结合，并强调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条根本方针。他要求各个事业单位和经济部门，只要有可能，都应该“打破军民界限，共同协力，军民两用。”他说：“军工部门有的，民用工业部门可以下搞，可以结合起来共用”。周恩来还要求第二机械工业部不能只是个“爆炸部”，还要搞核电站。这不仅提高了国防工业的经济效益。而且从根本上加强了国防现代化建设。

#### （五）国家工业布局应从战略全局出发

周恩来认为，新中国为了应付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应该有组织地建设国家的战略后方。早在1950年他就指出：“从国防观点来看，工厂不能都放在沿海，过去许多工厂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现在要为人民利益服务，就要面向广大的内地农村。”周恩来的这些思想为国家调整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布局提供了理论依据，科学地确定了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经济地带的战略性布局。周恩来还要求沿海比较发达的地区不仅要从人力、物力上帮助内地工业的发展，而且更要从技术力量上加以帮助，并及时提出了加强沿海与内地的联系，建立起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经济网络，加强横向和纵向的技术经济协作，不仅使国防经济建设的布局日趋合理，而且使国家在历史上形成的重要工业主要分布在沿海的不合理状况，逐步得到改变。虽然从表面上看，把大部分新的工业摆在内地，比摆在沿海地区投入的各种力量要大，发展的速度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却对提高后勤保障能力和国防经济潜力在现代战争中的稳定性，赢得未来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也为中国80年代以来，整个国民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周恩来关于国防现代化建设必须与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并举的思想和他所采取的重大措施，为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进一步加强中国的国防力量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 五、把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贯穿于外交斗争中

保卫国家的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完整，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神圣职责。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中国决不会侵略别的国家，它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新中国的武装力量建设、国防工业和科技建设，根本目的都是为了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形成了积极防

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周恩来不仅为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创造性地把积极防御的理论运用到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中。

外交和战争是政治斗争的两种重要手段，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周恩来深刻明了外交与战争之间的关系。他说：“外交同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周恩来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同时又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他独特的身份和长期从事领导革命战争的经历，使他在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外交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对外交与国防的关系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见解。他把外交工作和防御侵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外交斗争去制止和推迟战争。他不仅指出要继续运用“积极防御”的理论去打赢反侵略战争，而且把“积极防御”理论运用到制定国防战略方针上，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斗争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形成了完整的以积极防御为基点的国防战略理论。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作为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方针是：“为防备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我们应该在和平斗争中巩固国防，加强经济力量。要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战争，万一它发动战争，就叫它遭到失败。”

维护和平是新中国国防战略的首要目标。“维护和平”与“制止战争”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说法。周恩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主要矛盾作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战争与和平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的论断。他指出，尽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根本的，但当前主要表现出来的是和平与战争的矛盾。“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一切活动只能是为和平的目的，而不能是其他的任何方针。”因此，“争取持久和平是我们的努力方向，这对于我们祖国的建设，对于各国人民的进步和繁荣，都是有利的。”关于维护和平的目的是否能够实现，周恩来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只要我们同世界上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决心维护和平，和平是有可能维护得住的。”在外交工作实践的基础上，周恩来创造性地提出了“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把中国的和平外交方针进一步具体化了。这些原则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冷战共处的对立面，反映了世界各国尤其中小国家的普遍愿望，已经成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准则。对维护和平，避免和减少战争冲突，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是周恩来为制止战争、维护和平而提出的一项重要政策。新中国建立初期，周恩来指出，外交工作要分清敌友我，“我们要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外交工作更灵活一些，不是简单的两大阵营对立，没有什么工作可做。”

周恩来阐述说，朋友方面以国家来分有两种。第一种是基本的朋友，这是指当时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理所当然的应该同他们联合在一起，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这是维护和平的基本力量。第二种是一时的朋友，从国家性质上说，它们是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的。这后一种朋友也不完全一样，有的只能在某一时期内成为朋友，有的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朋友，区别的主要关键是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周恩来认为，这些国

家在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对我们是有利的。所以对这些国家，我们不能采取敌对态度，不要把它们挤到敌人的营垒里去。要这些国家站在和平阵营方面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性虽然极少，但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一方面要看和平阵营力量的增长程度；另一方面我们要有预见，在战争爆发前，努力做好争取工作。他具体指出：“东南亚国家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同帝国主义有矛盾，我们要在战争时争取它们中立，在和平时争取它们同帝国主义保持距离。”

周恩来指出，对帝国主义阵营也要分析，“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应该区别对待。”他要求对那些无论是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还是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也都要分别对待，做好工作。即使是那些与中国关系较坏的国家，也应该给一些影响，使它们不过分同我们敌对。把战争势力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对极少数同我们最敌对的国家，则同它们作坚决的斗争。

在同采取敌视中国政策的国家和势力作斗争的问题上，周恩来指出，从外交上说也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遏制和抵御战争。这也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通过各种外交途径严正警告那些企图发动战争的人，“今天的中国是新中国，我们不侵略别人，对外来的侵略，我们一定要进行抵抗，坚决击退这种侵略。”“如果战争来了，我们毫不畏惧，敢于抵抗，而且一定能够击败战争挑拨者。”五六十年代，美国几次企图利用朝鲜和越南战争，把战火扩大到中国境内，周恩来不失时机地向美国发出义正词严的警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950年10月3日，周恩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请印度政府向美国转达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企图扩大朝鲜战争严正立场。他说：“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1965年4月2日，周恩来在与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会见时，请他向美国转告，“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将抵抗到底，别的出路是没有的。”“美国如果打中国，就会进得来，出不去。”“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轰炸，那就是战争，而战争是没有界限的，所有的军人都了解这点。”“对此我们已有精神准备和物质上的准备。”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坚强意志和决心，是遏制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力量。

第二种办法是彻底揭露企图推行战争政策的阴谋，引起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警觉。在日本国内一小部分人企图恢复军国主义，走侵略战争的老路，对此，周恩来告诫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这对远东和亚洲的安全是个威胁，对中国也是个威胁。他强调指出，过去军国主义给亚洲人民造成灾难，给中国人民造成灾难，也给日本人民造成灾难。因此，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对那种认为企图恢复军国主义的人只是极少数，实现的可能性很小，甚至没有的说法，周恩来严肃地批驳说：“在我们看来，这种可能性不能说完全没有。日本统治阶级已经有人这样想，美帝国主义也想培养这部分势力作为它侵略亚洲的先锋队。”这些论述表明周恩来是有深远的战略眼光的，日本历届政府内阁成员都始终有人否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历史。在全世界人民都在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今天，日本政府中仍有某些主要内阁成员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否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为战争罪犯招魂。他们在美国巨大的核保护伞下，打着曾遭受过原子弹伤害的幌子，竭力反对中国为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和核垄断所进行的有限的核试验，而对美国拒

不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同意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霸权主义态度却加以默认，表明了他们敌视中国人民的立场。事实上，日本遭受原子弹伤害的根本原因，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走侵略战争道路的恶果。这说明，周恩来的这些重要思想和外交方针，今天仍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外交工作的另一方面，是要争取和平，使各国人民觉醒，尤其要使敌视中国的国家的人民觉醒。周恩来认为，要发动侵略战争，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发动战争的力量是否准备好，二是国内人民、同盟国是否愿意。如果“国内人民不要打，同盟国不要打，中立国家不让打”，“那么战争还是打不起来的。”当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不断升级，并不断对中国的领海、领空进行破坏、骚扰，企图进一步扩大战火的时候，周恩来首先对美国发出严正警告，同时请阿尤布·汗总统“在有机会对美国人民说话时告诉他们，不要不看到美国政府玩火的危险，战争扩大的可能是存在的，那时美国人民会被卷入大战之中。”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追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周恩来则采取民间外交的办法，大量接触日本各阶层人士，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动员日本国内的反战力量和爱好和平的力量以及主张日中友好的力量，打破了美国孤立、遏制和封锁中国的政策，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周恩来关于把遏制战争的外交工作一直做到敌人“家”中去的思想，最大限度地扩展了“积极防御”的领域，创造性地发展了“积极防御”理论。

外交斗争并不是万能的，外交斗争要与军事斗争互相配合，是周恩来的又一个重要思想。他指出：“我们的外交工作是和平斗争，军事工作是武装斗争，这两种斗争是互相配合的。外交斗争需要有后盾，这主要是军事力量。”当美帝国主义不顾中国政府的再三警告，把朝鲜战争推进到鸭绿江边时，周恩来明确提出，我们采取消极办法是不行的。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是一步步地制造并扩大战争。现在如果对美帝不抵抗，一着输了，就会处处陷于被动，敌人将得寸进尺。反之，如果我们予以打击和斗争，让它在朝鲜陷入泥坑，无法再进攻中国，它可能缩回去，否则它必然照计划继续前进。同时他又强调，我们出兵朝鲜是有节制的，“假如敌人知难而退，就可以在联合国内或联合国外谈判解决问题”。周恩来指出：“我们在推进友好方面是积极主动地以友好的态度求得同人家的友好相处的；如果谁敌视我们，我们将进行抵抗，但是敌视不为人先，这是我们的原则。这些原则用两句话来说，就是友好当先，抵抗在后。”“后发制人”是实施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一个重要原则。周恩来将这个重要原则，创造性地应用到了外交斗争战线，具有重要的意义。

周恩来为外交斗争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策略，既是周恩来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国防建设和开展外交工作的重要理论依据。

